

刘东 主编 彭刚 副主编

Dynamics of Contention

人文与社会译丛

斗争的动力

Doug McAdam Sidney Tarrow Charles Tilly

[美国] 道格·麦克亚当 西德尼·塔罗 查尔斯·蒂利 著

李义中 屈平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人文与社会译丛

斗争的动力

《斗争的动力》出自三位一流学者之手，它毫无疑问是过去二十年内关于社会运动（及相关现象）最雄心勃勃的著作，或许也是最重要的著作。

——《社会学》

责任编辑 李瑞华 封面设计 胡 范

ISBN 7-5447-0064-X



9 787544 700641 >

凤凰出版传媒网：www.ppm.cn

ISBN 7-5447-0064-X

I·47 定价：31.50元

人文与社会译丛


斗争的动力

Doug McAdam Sidney Tarrow Charles Tilly

[美国] 道格·麦克亚当 西德尼·塔罗 查尔斯·蒂利 著

李义中 屈平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斗争的动力 / (美) 麦克亚当 (McAdam, D.), (美) 塔罗 (Tarrow, S.), (美) 蒂利 (Tilly, C.) 著; 李义中, 屈平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 9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Dynamics of Contention

ISBN 7-5447-0064-X

I. 斗... II. ①麦... ②塔... ③蒂... ④李... ⑤屈...
III. 政治斗争-研究-世界 IV. D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1612 号

DYNAMICS OF CONTENTION by Doug McAdam, Sidney Tarrow & Charles Tilly

Copyright © 2001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3-095号

| | |
|------|--------------------------------------|
| 书 名 | 斗争的动力 |
| 作 者 | [美国]道格·麦克亚当 西德尼·塔罗 查尔斯·蒂利 |
| 译 者 | 李义中 屈平 |
| 责任编辑 | 李瑞华 |
| 原文出版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
| 电子信箱 | yilin@yilin.com |
| 网 址 | http://www.yilin.com |
| 集团网址 |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
| 印 刷 |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
| 印 张 | 16.625 |
| 插 页 | 2 |
| 字 数 | 360 千 |
| 版 次 |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7-5447-0064-X/I·47 |
| 定 价 | 31.50 元 |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道格·麦克亚当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政治过程与黑人暴动的发展，1930—1970年》（1982），《自由之夏》（1988，该书使作者得以分享1990年C.赖特·米尔斯奖）。

西德尼·塔罗 美国康奈尔大学政府学教授，著有《意大利南部农民共产主义》（1967）、《民主和混乱：1965—1975年意大利的抗议和政治》（1989）和《斗争、政治与改革：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反抗周期》（1989）、《运动中的力量》（1998）等。

查尔斯·蒂利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约瑟夫·L.伯滕威泽教授，著有《欧洲革命》（1993），《大不列颠的民众斗争》（1995），及《持久的不平等》（1998，该书获2000年美国社会学学会杰出学术出版物奖）。

本书选取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18例斗争事件，试图通过比较性的分析，为研究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各类政治斗争事件提出一个较具一般性的方案。几位作者详细说明了他们在解释革命、民族主义及民主化问题时所使用方法的含义，力图阐明一再引发广泛的斗争政治活动的各种机制及其作用过程，如居间联络、范畴形成和精英背叛等等，由此对目前斗争政治研究领域盛行的静态的单一行动者模式提出批判，并将分析的重心转移到斗争中的动态互动上。

HUMANITY

主编的话

刘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囿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前言与致谢

我们的工作起始于一次不成功的行动。1995年,查克·蒂利的一班朋友、学生和他的合作者们在阿姆斯特丹组织了一个聚会,组织者们本打算把这次聚会当作庆贺查克·蒂利退休安享晚年的联欢会,但不巧的是,查克·蒂利本人却未能得知这一消息。为此,麦克亚当和塔罗只好做出了一个次佳的决定,他们决计要让蒂利暂时地从他的其他工作方案中,转到一个能使他吃苦头最少的新差事上,眼前的这本书即是他们这一退而求其次做法的产物。

麦克亚当和塔罗对于能否使查克·蒂利就范没有把握,二人遂计划进一步扩展他们的“密谋”。在他们想来,如若研究社会运动、革命、民族主义以及民主化这些彼此相关领域的学者们,能够超越名义上各各有别的学科界限,转而寻求可能将这些相关领域综合到一起的路径,则岂非壮举?这次谈话最终导致他们向“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提出了一项特殊项目建议,该项目以一年为期,旨在探讨令他们萦绕于心的综合研究之可能性并实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征得蒂利同意加入这一计划后,他们随即拟订了一项计划书,该计划书先是经菲尔·康弗斯(Phil Converse)和鲍勃·斯科特(Bob Scott)(二人分别为当时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及副主任)的严格审查,随后并得到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特殊项目顾问委员会及其理事会的批准。至此,他们的“密谋”进一步地成气候了!

可一当特殊项目开始启动,我们手头这项颇为巨大的工程便有了一项重大的变故。鲍勃·斯科特比我们更早意识到我们

所要达到的研究目标是如何超出我们的预计,他为此而鼓励我们去寻求能够使我们将这一项目延伸为一个更长时限的研究框架所需的支持。在他的建议下,我们于1995年向梅隆基金会(Mellon Foundation)属下的“索耶研讨丛书”(Sawyer Seminar Series)提出申请,寻求它支持一项围绕斗争政治这一宏大主题而组织撰写的三年期的研讨丛书系列。令我们感到高兴同时又觉得惊讶的是,梅隆基金会居然答应了我们的请求。我们要感谢哈丽特·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感谢她以她的远见以及她的耐心,促成了索耶研讨计划所作的这一非同寻常的 plan 的变化;我们也感谢尼尔·斯梅尔塞(Neil Smelser)(继菲尔之后任中心主任)和鲍勃,感谢他们同意我们在中心安营扎寨;我们还要感谢中心的全体成员,在面对我们这“纷扰的一帮人”的“猛攻”时,他们以其耐心和善意忍受了数年来我们所带来的叨扰。

但我们接着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为实现那次谈话时的构想寻找合适的核心成员。幸运的是,在“斗争政治之无形学院”的草创时期,我们的四位同事受吸引而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三年里,罗恩·阿明扎德(Ron Aminzade)、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利兹·佩里(Liz Perry)以及比尔·休厄尔(Bill Sewell)和我们一起,作为一个团队共同努力,并致力于在斗争政治研究中形成一种更为注重学者间相互交流与交互影响的风气,这一努力的成果之一是作为本书姊妹篇的《斗争政治研究中的沉默与声音》(*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一书的问世。我们希望,继这两本著作之后不久,还有其他更多著作的行世。我们自己的著作也从与这些朋友和同事的相互交流、影响中得益匪浅,在此我们表示热忱的谢意。

我们要感谢的还不止斗争政治研究小组的这些核心成员们。尽管中心和梅隆基金会都未曾向我们提出要求,但我们七

个人还是很快就研究生——不限于我们自己的学生——加入我们的研究项目一事达成一致。比起那帮受到学科界限或学术传统束缚的有出息的年轻学者来,在一些重大课题上,有谁能够像这些研究生们一样,能更好地为我们提供新颖的视角呢? 1996—1997年第一批加入的研究生是:丽莎·贝尔(Lissa Bell)、帕梅拉·伯克(Pamela Burke)、罗宾·埃克哈特(Robyn Eckhardt)、约翰·格伦(John Glenn)和约瑟夫·路德斯(Joseph Luders)、随后的两年又有九个人加入,他们分别是:霍尔赫·卡德那一罗阿(Jorge Cadena-Roa)、戴维·坎宁安(David Cunningham)、马纳里·德赛(Manali Desai)、戴比·古尔德(Debbie Gould)、霍永·金(Hyojoung Kim)、海迪·斯沃茨(Heidi Swarts)、尼拉·范·戴克(Nella Van Dyke)、希瑟·威廉斯(Heather Williams)和吉姆·威廉斯(Kim Williams)。他们不仅对我们的项目帮助殊多,而且也为我们眼前的这本《斗争的动力》贡献不小。我们热忱地感谢他们并希望他们能够从我们彼此的相互交流合作中,和我们同样地获益。

还有其他人我们提供过帮助。在梅隆基金会项目的三年时间里,每年,项目的七位核心成员和他们的年轻助手都要组织三次小型会议,每次会议都集中探讨某一与总体理解社会斗争相关的特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宗教与斗争,情感与斗争,斗争的全球化,政治斗争中的认同与网络。每一次这样的会议都会有两三名特邀专家出席。对马克·贝辛格(Mark Beissinger)、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比尔·盖姆森(Bill Gamson)、杰夫·古德温(Jeff Goodwin)、罗杰·古尔德(Roger Gould)、苏珊·哈丁(Susan Harding)、迈克尔·赫克特(Michael Hechter)、林恩·亨特(Lynn Hunt)、简·詹森(Jane Jenson)、阿瑟·克莱因曼(Arthur Kleinman)、汉斯皮特·克瑞埃西(Hanspeter Kriesi)、马克·利奇

巴奇(Marc Lichbach)、约翰·迈耶(John Meyer)、安·米希(Ann Mische)、奥尔登·莫里斯(Aldon Morris)、玛丽简·奥萨(Maryjane Osa)、盖伊·塞德曼(Gay Seidman)、凯瑟琳·斯金克(Kathryn Sikkink)、维塔·泰勒(Verta Taylor)、马克·特劳戈特(Mark Traugott)、保罗·韦普纳(Paul Wapner)以及蒂姆·威克姆—克劳利(Tim Wickham-Crowley)的合作,我们在此表示感谢。

还有更多我们要感谢的人。项目进行到第三年时,当时我们住在中心,我们的同事罗恩·阿明扎德和我们一起,为中心内对斗争政治感兴趣的研究人员组织了一次以斗争政治为题的综合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我们荣幸邀得一大批杰出的研究同行参与其中,他们当中有:杰里·戴维斯(Jerry Davis)、简·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罗布·桑普森(Rob Sampson)、卡罗尔·斯温(Carol Swain)、埃德·蒂尔亚基安(Ed Tiryakian)和凯瑟琳·维德里(Katherine Verdery)。感谢他们愿意参与我们时有争议的会谈。

离开中心后,我们仍然坚守我们从许多专家学者们那里学得的知识。至于我们是否拓展了他们或我们自己的知识,他们自有判断。从以下这些人那里,我们曾经得到过宝贵的建议、批评、信息以及技术上的帮助,他们是:帕洛玛·阿吉拉·费尔南德斯(Paloma Aguilar Fernández)、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罗恩·阿明扎德、拉蒙·阿德尔·阿吉里斯(Ramón Adell Argilés)、马克·贝辛格(Mark Beissinger)、理查德·本塞尔(Richard Bense)、瓦莱丽·邦斯(Valerie Bunce)、霍尔赫·卡德那—罗阿、拉斯—埃里克·塞德曼(Lars-Erik Cederman)、鲁思·科利尔(Ruth Collier)、玛丽亚·库克(Marria Cook)、唐纳泰拉·德拉·波塔(Donatella della Porta)、丽塔·迪莱奥(Rita di Leo)、拉斐尔·杜兰·穆尼奥斯(Rafael Durán Muñoz)、尼尔·弗利戈斯坦

(Neil Fligstein)、乔纳森·福克斯(Jonathan Fox)、卡门萨·加洛(Carmenza Gallo)、米里亚姆·戈尔登(Miriam Golden)、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罗杰·古尔德(Roger Gould)、戴维德·格林伍德(Davydd Greenwood)、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朱迪·赫尔曼(Judy Hellman)、史蒂文·卡普兰(Steven Kaplan)、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马克·凯塞尔曼(Mark Kesselman)、伯特·克兰德曼斯(Bert Klandermans)、格里·范·克林肯(Gerry van Klinken)、鲁德·库普曼斯(Ruud Koopmans)、汉斯皮特·克瑞埃西(Hanspeter Kriesi)、海厄克·夸恩(Hyeok Kwon)、戴维·莱廷(David Laitin)、彼得·兰格(Peter Lange)、维纳·兰佐纳(Vina Lanzona)、马克·勒纳(Marc Lerner)、马克·利奇巴奇、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戴维·S. 迈耶(David S. Meyer)、何塞·拉蒙·蒙特罗(José Ramón Montero)、雷纳尔多·Y. O. 奥尔蒂斯(Reynaldo Yunuen Ortega Ortiz)、伊丽莎白·佩里(Elizabeth Perry)、哈亚格里瓦·拉奥(Hayagreeva Rao)、威廉·罗伊(William Roy)、赫克特·沙米斯(Hector Schamis)、卡西·施奈德(Cathy Schneider)、简·施奈德(Jane Schneider)、波·斯特拉思(Bö Strath)、苏杨(Yang Su)、安德鲁·沃尔德(Andrew Walder)、伊丽莎白·伍德(Elisabeth Wood)、巴里·韦恩加斯特(Barry Weingast)、托马斯·韦斯科普(Thomas Weskopp)、维维亚纳·泽利泽(Viviana Zelizer),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斗争政治讨论班的成员们。

就在我们的项目行将结束之际,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又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对我们的工作成果进行加工提炼的机会。2000年夏天,举行了一个有二十名活跃的年轻学者参加的夏季讲习班,麦克亚当和蒂利主持了讲习班,塔罗也在其中跑前忙后。其间,学者们发挥他们各自的智识,针对我们的手稿展开了

激烈的讨论。在此,我们要热忱感谢肯尼思·安德鲁斯(Kenneth Andrews)、乔·班迪(Joe Bandy)、尼尔·卡特(Neal Carter)、戴维·坎宁安、克里斯蒂安·达文波特(Christian Davenport)、鲍勃·爱德华兹(Bob Edwards)、高滕·戈什(Gautam Ghosh)、约翰·吉德里(John Guidry)、弗雷德里克·哈里斯(Frederick Harris)、彼得·霍特泽格(Peter Houtzager)、贾森·考夫曼(Jason Kaufman)、德博拉·马丁(Deborah Martin)、拜伦·米勒(Byron Miller)、S. 佩雷斯—戈多伊(S. Pérez-Godoy)、库尔特·肖克(Kurt Schock)、保罗·西尔弗斯坦(Paul Silverstein)、杰基·史密斯(Jackie Smith)、戴维·斯通(David Stone),以及德博拉·雅沙尔(Deborah Yashar),感谢他们就我们的著作所作的深思熟虑的评品。

所有的著作都不仅是企图向他人传播知识,而且是著作者们自身所经历的学习过程,这本书的写作——也许比绝大多数著作更多地——是一次加强学习的过程。之所以如此,理由有三:首先,我们的计划项目要求对许多事件进行分析,这些事件在地域和历史范围上已经超出了我们以前所从事过的研究。其次,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我们的计划要求经常不断的学习。这是因为——如我们下面将要强调的——如果相同的社会斗争过程和机制会在广泛的地域和不同形式的斗争行动中重现,那么,我们从一个事件中所了解到的东西就不可能与其他许多事件毫无瓜葛。每一次发生在新地域上的突然事件都会唤起人们对曾经感到满意的解释提出新的质疑。第三,因为我们三个人当中的任何人都不具备足够的权威对其他人的观点和见解行使否决权(“让他试试看吧!”),因此,有关我们著作的内容和其中的解释的讨论很是热烈的,并且常常是争论性的。我们的整个工作进程仿佛在许多流转不断的研讨会,其间,许多教师、学生和好事者围着桌子转来转去,好不让人眩晕。

那么,我们的这部著作又有什么地方与迅速扩展的斗争政治研究领域相符,以及与总体上的社会科学相符呢?一如其他的学者和教师,我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始终不断地保持与前人(包括我们自己此前)的观念和研究成果对话。几乎没有哪一段文字的形成,我们没有就其与以前著作的关系进行反思或论辩:这一点证实了 X,那一点与 Y 相矛盾,另外一点与 Z 相同但又多少有点区别,如此等等。本书的头两章对我们广泛引用的一些学术著作进行分辨归类,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本书定位于对其他著作的讨论。本书早些时候的文本,其中包含了对一些特殊观念的起源、对其他相竞争观点的不同看法,以及对与我们本身著作类似著作的鉴定。考虑到读者们对我们的初稿所提出的抱怨,我们认识到,类似这样经常提及相关的著述,既使我们的论点晦暗不明,也让我们的论著变得冗长不堪。

在重写时,我们删除了几乎所有对以前著作的明细讨论。大体上,我们仅限于明确提及那些我们的论点所直接仰赖的作者们的独特观点和成果。对于本书所跨越的许多研究领域的专家们来说,他们或许时时感到我们没有给予其他作者的相关著述以足够的认可,或者没有对相反的观点给予足够的注意。不过,总的说来,我们认为,绝大多数读者将不会因为表面性地提及相关著述而分散他们对本书中所作分析的注意,并从中得益。

我们希望,由此而来的减少对其他相关作者所作分析的提及,并不表示我们对我们所敬重的同仁们所持观点和所作努力的轻视。在我们三位合作者分别出版的著作中,我们已经采取联名或以个人名义的方式,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论点与其他有关斗争政治的著作关联在一起(例如参见:McAdam, Tarrow and Tilly, 1997; McAdam 1999; Tarrow, 1998; Tilly, 2000)。无论如何,本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依靠与斗争政治最近的调查研究进行对话,并保

持对它们的尊重,是一件很快就会变得清楚明白的事。

研究斗争政治学的人们也许希望我们就当前发生在结构主义者、文化论者以及理性主义者之间的论战明确表示立场。要是他们想寻找经常出现在学术杂志中的范式之争的证据,那他们将会感到失望。如果说,我们所具有的坦率的调和观点有它的名称,那么,它就只能叫做“相关性的”(relational)。尽管我们承认理性主义者、文化论者以及结构主义者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但我们仍然认为,斗争政治研究将会从系统关注斗争政治中的行动者、制度以及斗争政治之流的相互作用中获益殊多。我们的计划就是以此为出发点,通过运用对斗争政治的机制与过程进行比较分析的方法,而对发生在各个不同地区的斗争政治展开探究。

对本书的研究方案感兴趣的学生们,如何进行他们的下一步研究呢?实际上,大量前人的分析已经确认了一些有力的因果机制,并且运用这些机制去解释斗争事件的突出特征,而这些分析会不断给将来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些有实用价值的模型。这些我们大致可以区分为采用结构主义、文化论和理性主义方法的分析人士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以及他们就某些问题给出的答案,对于下一轮的探讨仍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我们希望,现存知识工具的熟练使用者们,不是去烧毁他们的使用手册,或者扔掉他们的工具箱,而要去发明使用这些工具的新方法来。我们也希望,他们将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驳诘、挑战、修改、扩展——有时甚至是去证实——我们在本书中所提出的论点。

纽约州伊萨卡

2000年9月23日

目 录

前言与致谢

第一部分 问题何在？

- 一 他们为何怒吼？ 3
- 二 斗争的轮廓 48
- 三 比较、机制与事件 91

第二部分 尝试性的解决之道

- 四 比较视角下的动员 115
- 五 斗争行动 160
- 六 斗争的转变 210

第三部分 应用与结论

- 七 革命的轨迹 255
- 八 民族主义、民族解体与斗争 280
- 九 斗争的民主化 334
- 十 结论 391

参考文献 449

索引 485

第一部分 问题何在？

一 他们为何怒吼？

1789年7月17日，巴黎书商西米恩—普罗斯珀·哈迪(Simeon-Prosper Hardy)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一想到自这个星期开始以来所发生的多起事件，人们就震惊不已。”[BN Fr 6687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Fonds Français, no. 6687)]的确，这个星期是巴黎所经历的不同寻常的一周。哈迪用工整的笔迹写下这个星期的日记，内中的每一页都呈现出斗争政治的异常生动的图景。自1648—1653年的福隆德运动(the Fronde)以来，巴黎还从未受到过如此剧烈骚动的冲击。从在凡尔赛参加三级会议的第三等级代表们在6月17日宣布他们组成国民大会时起，王室军队的多支分遣队就一直在巴黎四周集结。不过，有几次发生了整个连队士兵拒绝使用武力对付平民，或者甚至加入到民众一起，攻击那些仍然忠于国王的军队的情形。其实，大分裂的迹象早在7月初就已经开始在政权内部出现了。

就在国王于7月11日解除平民出身的财政部长雅克·内克(Jacques Necker)的职务时，群众的抗议进军和集会就开始遍布巴黎许多街道。当晚，人们还洗劫了位于城郊的一处收费站，随后便围着变为废墟的收费站跳舞欢庆。在以后的几天里，选民大会和他们的临时委员会，以及他们匆忙组建起来的民兵，开始了对巴黎不少地区的管理。与此同时，一群又一群的巴黎市民冲进监狱和其他公共建筑物，释放囚犯，抢夺武器，带走库存在

建筑物内的各种食物。

7月14日,寻找武器的活动仍在继续,据哈迪记载:

3 人们去到巴士底监狱,要求监狱长德洛内侯爵(the Marquis Delaunay)交出武器和弹药。在遭到拒绝后,近郊圣安东尼的工人们便试图包围城堡。起先,监狱长让他的手下朝圣安东尼的工人们开火,在此同时他先是打出一面白旗,然后又收起白旗,像是要投降的样子,但炮火的力量却较之前更为猛烈了。在通向城堡内第一道天井的两座吊桥边上,他装作接受群众对武器弹药的要求,打开了其中一座小吊桥的门,让待在那里的一些人进入天井。但当打开的门被关上,吊桥被拉起之后,他便下令射杀进入第一道天井的所有人,其中包括三名巴黎的选举人……他们是为和他协商解决问题而去的。这便激起了民兵们的义愤,他们对自己的市民同伴遭受如此野蛮对待激愤不已,又得到法国卫队榴弹兵的支持……不到三小时他们便完全夺取了城堡。[BN Fr 6687;更为详尽精确的描述见 Godechot 1965]

就在这同一天里,巴黎人不仅处死了巴士底监狱的监狱官,还杀死了两名弹药库的管理员,这两名伤残院的老兵向前去夺取军火的人们开枪。此外,他们还处死了巴黎市常设委员会的主席。随后几天,来自巴黎许多地区的代表团,其中包括有国民大会的成员和王室军队的不满分子,都郑重地承诺为巴黎人的事业奋斗。7月16日和17日,国王亲自召回内克,撤除巴黎地区的军队,并且,国王还被夹在代表们和民兵中间,做了一次前往巴黎市政厅的颇具象征性的徒步旅行。受到威胁的国王还剩下三十多个月的日子可活,其间的绝大部分日子他依然还是名

义上的国家元首。不过，到 1789 年的 7 月 16 日，法国即已进入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斗争政治时期。

斗争政治

把发生在 1789 年的诸多事件称作“斗争政治”似乎有将一次大革命降格之嫌。但本书意在表明：“斗争政治”的标签不仅对于理解这些事件富有意义，而且有助于解释在这个喧嚣的夏季里，巴黎以及法国其他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呈现在诸位面前的这本著作还探讨了当斗争的两种变化形式——有节制的和逾越界限的 (contained and transgressive) 斗争——在一场斗争的主要事件中相互交错时两者间的关系。而且，它还表明了不同形式的斗争——社会运动、革命、罢工浪潮、民族主义、民主化等等——皆因相似的机制与过程而起。它还确信经由比较引发不同形式的社会斗争的动力机制而不是单个地看待它们，我们能够对所有这些形式的斗争了解更多。最后，它探讨的是这些机制与过程的几种结合形式，意在发现导致斗争政治一再发生的因果序列。

4

我们所谓的斗争政治指的是：

发生在提出要求者 (makers of claims) 和他们的要求对象 (objects) 间偶尔发生的、公众的、集体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发生在 (a) 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的对象，或者是要求的赞成方，(b) 所提出的要求一旦实现，将会影响到提出要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时。

大致说来，这一定义指的是集体性的政治斗争。

当然,这一定义中的每一术语还需要做进一步的限定。例如,“偶尔发生的”(episodic)一词排除了那些定期的按计划进行的事件,诸如投票、议会选举和有组织的协会会议——尽管任何这类事件也有可能成为触发斗争政治的根由。再者,我们在使用“公众的”一词时,是把那些完全发生在包括教会和公司在内的界限明确的组织中的提出要求的行为排除在外的。尽管某些发生于这些界限之内及之外的斗争相互间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在此,我们还是集中探讨那些在政治上具有明显广泛性的斗争行动。

不过,我们会听到一些反对意见。有人会问:这一定义岂不是划定了一个太过宽泛的研究领域吗?对于那些突破了规则界限或者挑战现存的准则和预期而提出其要求的体制内的政治斗争,又该如何对待呢?下面让我们依次来回答这些反对意见。

所有的政治都是斗争性的吗?依据对我们所作定义的严格理解,答案当然不是。政治生活中的相当一部分——按我们的推测,甚至是大部分——是由仪式、协商、科层管理过程(bureaucratic process)、信息的收集、重大事件的登记以及如此等等的活动组成。军务活动报告、投票登记、纳税、参加协会会议、落实政策、实施法律、从事行政工作、读报、请求政府官员施惠以及类似的其他行为构成了大部分的政治生活内容,它们通常几乎都与集体斗争无涉。政治多半发生在某一政党、政府机构、政治小派别、联盟、社区或者利益集团内部的社会关系中,而毫不涉及集体性的公众的政治斗争。我们所关注的斗争政治是间歇性的而非连续性的,它的发生具有公众性,它包含了提出要求者与其他人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是被其他人认为对他们的利益产生影响,并且是让政府在其中充当调解人、目标或者提出要求者的。

那么,限定范围和体制内的斗争又怎样呢?这种政治子集(subset of politics)太过散乱无形而无法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研究领域吗?我们当然反对做这样的推定。让我们直截了当地提出我们的看法。官方调查以及后来对理查德·尼克松的弹劾属于和20世纪50年代肯尼亚的所谓“茅茅起义”(Mau Mau rebellion)同样的限定范围,按我们的术语来说,二者都可说成是斗争事件(episodes of contention)。这类事件构成了我们的研究领域。

我们并不宣称这些事件是具有同一性的事件,也不认为它们与某个单一的总体模式相一致,在许多重要方面它们是存在明显区别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将其组合在相同的定义之下,这里的原因有二:首先,政治斗争的研究已经变得太过狭隘,从中产生出了一大批主题各不相同的著述——诸如革命、社会运动、工业中的劳资冲突、战争、利益集团政治、民族主义和民主化,它们借助于不同的词汇、技术方法和模式,处理的却是相似的现象。本书则通过探询名义上各不相同的斗争形式的相似性而有意打破这种界限,它所作的是从殊为不同的斗争中探求相似的因果机制与过程。

其次,我们对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ized and noninstitutionalized)政治界限划分表示异议。尼克松的弹劾调查几乎完全是在法律规定和被官方认可的裁决此类冲突的程序范围内展开的,而茅茅起义则不是,我们承认这一区别的存在。的确,我们很快会利用这一区别去区分斗争的两大范畴:有节制的斗争和逾越界限的斗争。但即便当我们采用这一区分时,我们仍然坚持认为:在政治研究中,很久以来就已经在正式的、规定的政治活动与采用其他方式进行的政治活动之间划定了具体的界限,由此而产生的不良后果是,分析家们忽略或者误解了二

者之间的相似性及其相互作用与影响。

将二者间的界限具体化的做法,由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界通过在传统政治和非传统政治(conventional and unconventional politics)间制造出学科和概念上的截然区别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政治科学宣称“正常的”合乎规定的政治才是其研究兴趣之所在,而把对于社会运动的研究留给(用威廉·盖姆森带有讽刺意味的话说)“其心智使其适于更好地理解非理性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家”(Gamson 1990:133)。社会学家则宣称(社会)运动是他们选定的研究领地,他们常常忽视(社会)运动与制度性政治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在过去三十年里,这种严格的学科研究分工很大程度上已经消逝,但它仍给我们留下了再生出最初的二元性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和一整套范畴(革命、社会运动、利益集团、选举政治等等)。

在制度化的与非制度化的政治之间难以做出精确的界限划分,非但如此,更重要的是,二者之间还不断地发生相互影响并且包含着相似的因果过程。联合、战略上的相互影响以及争取认同,既广泛发生于既存体制的政治活动中,也同样存在于反叛、罢工和社会运动这类分裂活动中。理查德·尼克松发起的地下战争引发了闯入水门大厦的拙劣作为,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尼克松的弹劾调查,很大程度上,这场地下战起因于尼克松对反战运动以及新左派的其他运动的敌视。与之相似,茅茅起义并非源于反殖民暴力行动的某种突然爆发,而是发端于一场有限的冲突,这一冲突包含了四种合法形成的政治角色:肯尼亚殖民当局、英国官员、肯尼亚民族主义者以及肯尼亚白人居民共同体。实际上,所有广泛的社会运动、革命以及类似现象都植根于不易察觉的体制内的斗争事件中,而发掘这些根由即是本书的主要目标之一。

有节制的斗争和逾越界限的斗争

我们从把斗争政治分为两个较大的亚范畴——有节制的斗争和逾越界限的斗争——开始。（较之更为熟悉的将其划分为“制度性的”和“非传统的”政治的做法，我们更偏爱我们自己的划分方法，因为它使得我们既能够强调体制内的越界行为，又能够突出外部挑战者的许多日常活动。）

有节制的斗争 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斗争实例，在其中，所有各方都属于运用确定的方式提出要求的体制内的行动者。这种斗争是由提出要求者及其要求对象之间偶尔发生的、公众的和集体性的相互作用所致，这种互动发生时：(a)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被要求的对象或要求的赞成方；(b)所出的要求如能实现，就会影响要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c)所有参与冲突的各方均属于此前已得到认可的体制内的政治行动者。

逾越界限的斗争 由提出要求者及其要求对象之间偶尔发生的、公众的和集体性的相互作用所致，这种互动发生时：(a)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被要求的对象或要求的赞成方；(b)所提出的要求如能实现，就会影响要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c)至少参与冲突的某几方属于新近出现的自我认同的政治行动者，以及/或者(d)至少某几方采用了具有创新性的集体行动。（一项行动要成为创新性的行动，则它必须体现行动者的要求、为行动者选定其要求所针对的对象、将行动者的集体性的自我表达纳入行动之中，以及/或者采用那些要么从未有过先例、要么为现存政权所禁止的方式。）

本书偏重于选取逾越界限的斗争实例,这类实例通常涉及到新政治行动者的形成或政治手段上的创新,或者是同时涉及二者。我们之所以区别有节制和逾越界限的斗争,系由两个方面的原因所致:首先,许多逾越界限的斗争事件来自于正在发生的有节制的斗争事件,二者间的这种相互作用明显值得关注。其次,短期的实质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更多地来自于逾越界限的斗争,而较少产生于有节制的斗争,后者更经常地倾向于再生产现存的政治体制。大致说来,这便是我们的观点。

为明晰起见,本书集中讨论与逾越界限的斗争有关的抗议事件。我们突出强调的是偶尔的而非连续性的斗争事件,是有新的行动者介入和(或)涉及到创新性地提出要求的斗争事件。为使问题进一步简化,我们所选取的主要是这样一类实例,在其中,民族国家是以直接参与者或行动者所提要求的重要支持者而出现的。把重点放在民族(国家)的而不是局部或地区性的斗争事件上,主要是基于实用性的考虑。民族(国家)层面上的斗争事件较之局部性的事件通常会更多地提供学术研究所必需的材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分析方案仅仅适用于民族(国家)这一大范围内发生斗争的时期,适当地修改一下,它同样也适用于地方性的、局部的、国际的和跨国的斗争。

我们的做法是,通过对十四例主要斗争事件进行比较,以探明这些事件所表现出的因果过程以及形成这一过程的诸多机制。在本章及下一章中,我们将以三个此类事件——法国革命、美国民权运动和意大利的抗议运动——为例,来描述我们所采取的对机制和过程进行分析的方法。稍后,我们还会在本书中再次谈到这几个较为熟悉的实例。在第三章中,我们会更详尽地描述我们所采取的配对比较方法。眼下,这样说就够了:我们

的做法是基于对诸多事件做出详细分析,这些事件首先必须具备如下条件:(a)它们涉及发生在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中的具有本质区别的斗争事件;(b)它们具有进行分析性比较的价值;8 (c)有足够的研究这些事件的学术资料。

让我们再回到对连续性和偶发性过程所作的区分,公众政治会涉及相互冲突的要求,但它也能在冲突渐增的过程中继续前行。例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探讨的(美国国内)围绕奴隶制问题的论争,在其持续的四十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就主要是在国会辩论中展开的。相反,一些制度化程度很高的政治行动却常常是偶发性的,瑞士在1971年通过承认妇女选举权而将其选民扩大一倍,即是一例。我们的注意力大多被那些结合了冲突性要求和偶发性行动的实例所吸引。

我们强调冲突性要求和偶发性行动之间的结合并非因为它是唯一值得关注的情形,而是因为它常常:

- 制造不确定性,由此而引发行动者做出重新思考并寻求新的认同
- 揭示错误的路线,由此在政治体内造成可能的重新组合
- 威胁和激励挑战者采取进一步的斗争行动
- 迫使精英分子重新考虑他们的承诺和忠诚,以及
- 在斗争的方式方法、制度性实践以及政治认同上留下变革的痕迹,而后代人会借此提出他们的要求。

本书的新意所在

本书力图从范围广泛的斗争政治形式中——其中不仅有革

命,还包括罢工浪潮、战争、社会运动、种族动员、民主化和民族主义——辨明存在于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和不同之处,以及它们所经历的路线与轨迹。近年来,在描述和解释上述各种重要斗争形式方面,一些专门从事此类研究的学者们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总体说来,他们彼此之间对各自在研究中的新发现却少有关注。例如,从事罢工研究的学者就极少利用种族动员方面研究的新成果,而从事种族动员研究的学者也一样忽视对方的成果。但罢工和种族动员之间实际上却存在着很大、尽管也许只是部分的相似性,比如说,在第三方的行动影响其成败的方式上,以及在既存的个人关系网络对于行动参与者征募新成员的9 模式所产生的作用上,罢工与种族动员之间就颇有相似之处。

另外,研究社会运动、种族动员、宗教冲突、劳资争斗和民族主义的学者们都经由各自的研究而独立发现了仪式在政治生活中的突出影响,在仪式进行的场合,一方或另一方的支持者们公开展示各种符号、数字、承诺以及对有争议地区提出的各种要求。不过,这些专家们却几乎不曾留意其邻居们的工作,遑论对不同背景下的仪式做系统性的比较了。例如,某位研究14世纪阿拉贡社会结构中穆斯林和犹太人所受攻击的颇有造诣的历史学家,却几乎不曾考虑从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对类似暴力行为的当代研究中,寻求有助于其研究的指导(Nirenberg 1996;其他未提及的事件参见:Brass 1996;Connor 1994;Daniel 1996;Roy 1994)。而某个人类学家对于阿尔斯特地区的行动主义分子们的游行活动以及其他视觉表现形式所作的以丰富文献为基础的研究,尽管大量吸取了人类学理论和修辞理论的成果,却全然忽视了地理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对发生在英国诸岛和西欧其他地区类似做法所从事的有见地的研究(Jarman 1997;相关的研究如:Baer 1992;Brewer 1979—1980;Butsch 1995,2000;

Davis 1975; della Porta 1998; Fillieule 1997; Lindenberger 1995; Plotz 2000; Steinberg 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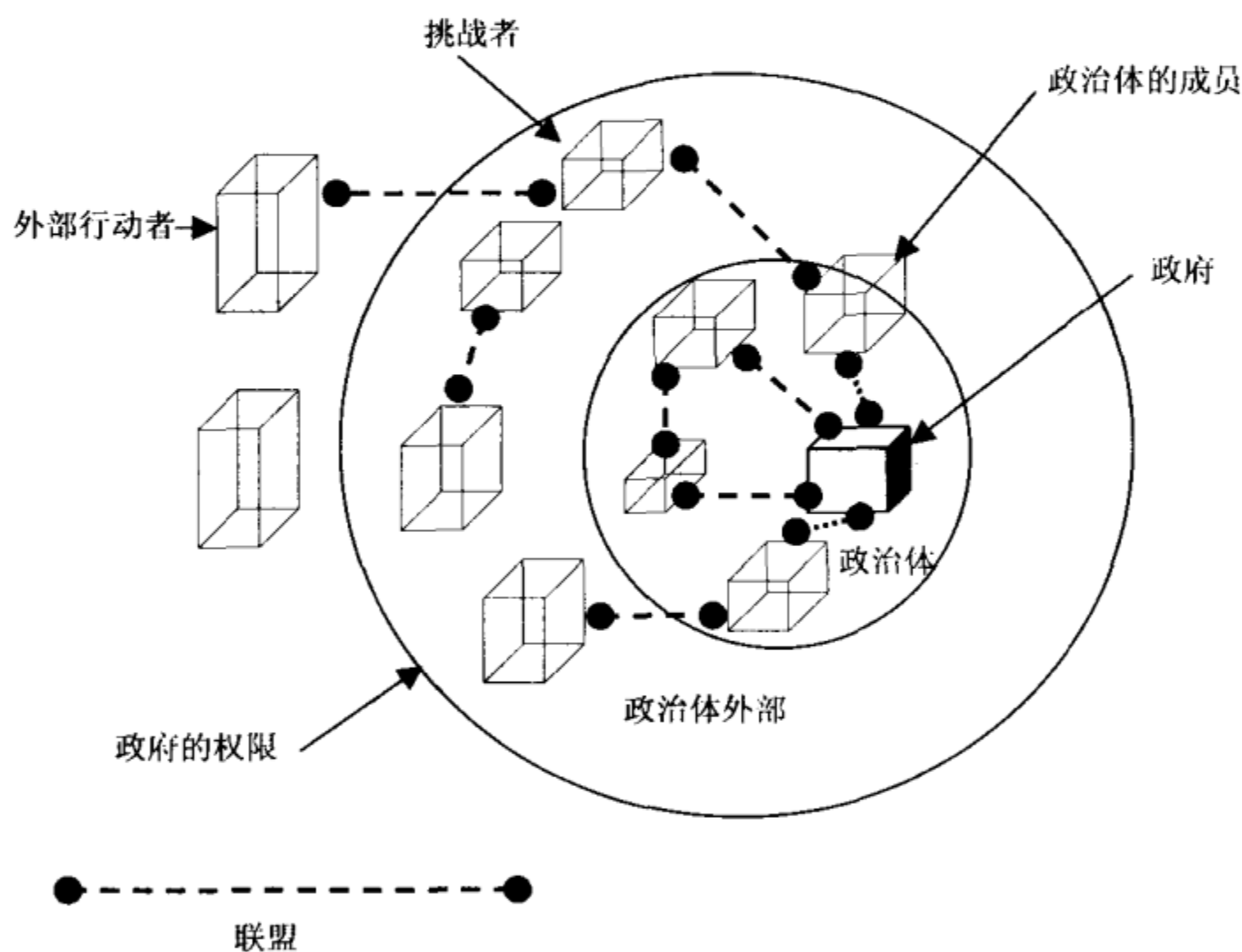
和在欧洲的许多类似情形一样,对阿尔斯特地区的行动主义分子们所作的这一研究辨明了一个跨越名义上各不相同的政治活动而存在的共同现象。观察家们倾向于把公开展示统一制服和其他显然具有政治性的符号的做法与受政府规定限制的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原因是这些做法常常被当局用来为国家权力做宣传。但是,类似做法有时却构成了激烈斗争活动的主要特征。实际上,诸如悬吊某人的雕像或故意拙劣地模仿加冕典礼之类的官方仪式,常常会为持不同政见者提供现成的素材。在压迫性的政权统治下,经官方认可的公众仪式和节日庆祝活动也经常成为行动者们提出要求的场合,尽管这一时机极其短暂,但倘若在其他场合发表类似的陈述,就会令提出要求者冒受到监视和遭受惩罚的很大风险。同样地,在各种形式不同的斗争中,受当局保护的时间和空间条件吸引行动者们提出自己的要求。本书将着力辨明诸如此类的相似性、相互关联与不同变化。

从政体模型到斗争动力

不过,这样的探讨要留待后面的章节进行,目前,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如何辨明斗争政治中的行动者、他们的要求、他们的要求所针对的对象以及对提出要求所作的反应。在诸多人们 10 有时会借以提出其要求的名义中,何以仅有少数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才成为斗争性互动发生时普遍的公众基础?这种互动的过程与结果又是受制于哪些因素?人们为什么以及怎样在行动与无为之间做集体的举动?为了澄清我们对斗争政治所作的分

析与对政治生活所作的一般性研究之间的区别,我们采取的做法是从一开始就对斗争政治进行两方面的简化。

我们的第一种简化办法是在我们转向动态分析之前把对政治背景的静态概念作为我们的起点。图 1.1 提供了发生斗争的政治背景的一个简单的静态模型。其中所列示的政治体制是由政府及其与统治下的民众之间的关系构成的(Finer 1997)。从中我们挑选出集体的政治行动者(拥有名称、内部组织以及在公共政治领域中一再发生互动的行动者),然后做如下区分:



11 图 1.1 简单的政治体模型

政府代理人

政治体的成员（享有与政府代理人和各种资源正常接近途

- 径的政治行动者)
- 挑战者** (缺乏与政府代理人和资源正常接近途径的政治行动者)
- 普通国民** (尚未组织成政治行动者的人与集团)以及,
外部政治行动者,包括其他政府。

公共政治是由政府代理人、政治体的成员、挑战者和外部的政治行动者之间在提出要求时的互动所构成,而斗争政治系由(大的)子集所组成,它们所提出的要求是集体性的,并且这些要求一旦实现,就会影响到被要求对象们的利益。逾越界限的斗争则出现在至少某几方采用了创新性的集体行动,以及/或者至少其中的某些人是新近出现的自我认同的政治行动者的时候。为使这一模型有效地反映动态的政治过程,我们必须让每一个行动者都动起来,必须将多个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考虑在内,必须表明行动者之间的联合是以实力的增长、衰落和持续不断的反复谈判为条件的,还必须清晰地表明政治行动者的构建、瓦解或他们的转变。

我们的第二种简化办法与政治行动者有关。很快我们就会发现所谓运动、认同、政府、革命、阶级以及类似的集体名词,并不代表着固定不变、界限分明的对象,它们不过是观察者们从普通人以及结为群体的人们相互间持续进行的协商性互动中所做的抽象。由于置身特殊环境中的每个人仅仅展示出其范围广泛的心理状态、认知条件、行为和社会联系的一小部分,因此即便人本身也并非如日常语言所示的那样明确而固定。而且,某个特定的人常常会扮演不止一个政治角色,他(她)有时是工人,有时又被作为某个教会的成员,如此等等。不过,为使我们的分析得以展开,我们假定政治行动者是由结为群体的人及其所具有

的某些关系所组成,他们是那些内部组织和与其他政治行动者的联系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保持实质连续性的一群人。随后,我们会放宽这一限定性假设,探讨那些界限变得模糊、组织发生变化和政治地位发生改变的方式,这方面的探讨将是我们在第二章开始的努力方向。

那么,我们将如何使分析由静态转向动态呢?我们为此必须立即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既要说明我们所要解释的内容是什么,又要回答我们是如何做出这样的解释的。依我们的看法,社会过程是由因果机制的序列和因果机制的不同结合形式构筑而成的。要解释斗争政治就要去辨明斗争政治中一再出现的因果机制、这些机制的结合方式、它们一再发生时依据的是怎样的先后次序,以及为何从不同的起始条件出发,因果机制的不同结合形式和不同的发生序列,会产生很大程度上不同的后果。从下一章开始,我们要处理的是动员及其构成机制这一为人熟知的过程,而我们很快也就会发现,动员其实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它是与其他的机制和过程诸如行动者的生成与转变、他们的身份得到合法性确认(certification)或被撤销合法性(decertification)、来自官方的镇压、激进化以及在复杂的斗争发展过程中斗争向新的地点和行动者的扩散交织在一起的。在本书中,我们把解释一系列的动态过程作为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并不寻求去确证动员、行动抑或某些斗争进程的必要与充足条件,而是去探明那些一再出现的因果机制以及它们相互结合时所呈现的规律性。

这一研究方案显得有些要求苛刻,它使得我们有必要采取一些较为经济的做法:

第一,我们并不宣称我们拥有世界各地的政治方面的信息,

相反,我们只是从我们在第三章中列出的图表中,选取经筛选后的政体特征作为实例。

第二,我们并不对所有具备潜在可比性的具体化的斗争形式给予同样的关注,相反,我们集中探讨的是社会运动、民族主义、革命和民主化。

第三,如果我们能够辨明——而不仅仅是断言——跨越斗争政治诸多形式而一再发生的某些特定的机制与过程,则我们就会自认为我们的研究获得了成功。

第四,对这些特定机制及其与某几种发生序列之间的联系做出解释,我们只是希望在这方面开个头,而并不打算在本书中完成这一研究。

笼统的规则与反复重现的原因

我们对一再出现的机制与过程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我们打算将所有形式的对抗纳入同一个模子,使它们服从于普遍性的对抗法则,硬把它们弄成那种单一呆板的平面漫画。相反,我们只是通过对具有部分相似性的对抗形式的探讨,意在由此而发现 13 那些广泛起作用的解释性机制,这些机制在不同的背景下,因结合方式不同而产生出各不相同的结果。在罢工和种族动员中同样发现有第三方的影响存在,绝不表明罢工和种族动员因此而具有同样的起源、发展进程和同样的结果,正如确认老鼠和人类具有相似的记忆过程并不证明老鼠和人在各方面都相同一样。发现法国大革命和南非的自由运动同样存在着竞争与激进化的机制,也并不意味着雅各宾派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彼此毫无二致。我们借助于对部分相似性的探询,目的在于找到驱使对抗朝不同方向发展的机制,只是要等到在本书第三部分里,我们才会对

各种机制如何在充满活力的政治过程中结合在一起加以考察。

我们的做法是展示一系列配对比较,从中,我们提醒人们注意诸如肯尼亚的茅茅起义和菲律宾 1986 年的“黄色革命”之间的相似之处,发生在南亚的印穆冲突和 20 世纪 90 年代发生在南非的民主化运动在驱动机制上的相似性,以及内战前的美国政体在 1860 年的崩溃与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垮台之间的类似之处。我们还要历史地辨明革命形势的不断展开与社会运动的扩展、民主化进程和罢工运动加以比较。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历史地辨明形式不同的斗争政治各自所具有的相应特征,比方说,某一特定国家以前所发生的社会运动是如何形塑这个国家下一轮的斗争的,这个国家日常的体制运作过程又是如何与一系列偶发性的斗争政治交织在一起的。我们把得自于对 20 世纪 60 年代发生在西欧和美国的一系列运动的研究的一套成果与方法,作为我们研究的起点,尽管我们有意超越并挑战这一研究议程。

社会运动的经典研究议程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在北美和欧洲研究这些问题的最出色的作品中,相当一部分集中于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并且,它们由此而将其他形式的斗争同样纳入到一度盛行的解释社会运动的框架中。当时,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是以下四个关键概念:政治机遇,它有时被明确说成是静态的机遇结构,有时又被当作处于变动之中的政治环境;动员结构,它既包括正式的运动组织,也包括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集体行动框架,既指给
14 行动参与者定向的文化常量,也指他们自身建构的文化常量;既定的斗争手法(repertoires of contention),以及这些手段和方法

如何因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和其他次要过程的变化而演进。

这一思路产生于对早先研究传统所作的四个方面的批判。首先，社会历史学家发动了一场他们称之为“(关注)来自于下层的历史”的知识反叛行动，以反对早期历史著作中占主导的重视精英人物与上层政治的倾向。与他们在社会科学界的同道一起，许多社会历史学家寻求重建普通人的政治经历，将这些政治经历置于日常生活的基础上，以此挑战那种将民众政治贬为对非常时期或暂时困难之非理性反应的观点。第二，同样地，许多社会科学家拒斥那种将大众运动及类似现象视为集体行为，视为因一时狂热、幻念、煽动和群体影响而出现的常识混乱的流行观念。第三，这些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强烈反对官方将 20 世纪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工人动员以及其他民众政治说成是冲动和不负责任的自我放纵的发作。第四(同时也是部分地作为对以上三种思路的反应)，曼科·奥尔森(Olson 1965)以及其他理性行动论者反对简单化地断言抗议者的行动具有合理性。他们针对分析民众抗议的人士的见解做了两个方面的有力评述，他们指出，那些分析家们(a)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也许是绝大多数的结为群体的人们，尽管他们有着同样的冤情或利益，但他们并未据此而行动，以及(b)缺乏一种有关共同持有某种利益的人们依据这一利益而组织起来并据此而行动的条件或过程的合理理论。

这些批评的一种主要形式很快以“资源动员”而得名，该术语经由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和迈耶·扎尔德(Mayer Zald)二人有关美国社会运动及其组织的著作而具体化并引起广泛注意。资源动员模式强调组织基础、资源积累和集体协调对于政治行动者们的重要性，突出社会运动与利益集团政治之间的相似性汇合倾向。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再来读早期资源动员

模式方面的著作,就会发现它们夸大了审慎的策略性的决策对于社会运动所具有的中心地位,而贬低了运动政治中存在着的偶然性、情感性、可塑性和互动性诸方面。不过,它们至少引发了人们对于民众政治中组织过程重要性的关注。

- 15 正是从资源动员思想中重视组织过程的角度出发,很快便在这一思想路线内部产生出另一潮流。“政治过程”分析家们以重视动力、策略性的互动以及对政治环境的反应而与他们的同仁们分道扬镳。(本书的三位作者在不同的阶段,对于政治过程这一思想的发展以及对较为简单化的资源动员模式的批评,均发挥过他们各自的作用。)有关政治过程的历史著作提供了现实生活中人们提出其要求的诸多形式——所谓“斗争常用手法”。对政治过程论者而言,斗争常用手法代表着斗争政治中人们相互影响时所采用的经过文化编码的方式,无疑,比起假定人们所能运用的所有形式抑或其他人在不同历史环境或不同历史时期所运用的诸多形式来,它们相对要狭窄些。最近,一些学者在对早期研究中的结构主义方法做出反动时,利用了社会心理的和文化的研究视角,更是为研究社会运动增添了第四个要素:社会行动者是如何形成他们的要求、如何构造他们的对手以及他们的认同的。他们有力地争辩说:这种构造(framing)不仅仅是先期存在的一大批要求的表达,更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和建构的过程。

从本书随后的若干章节中对学术界有关认同政治的见解所做的大量分析中可以看出,一些分析人士有时在他们彼此之间划出界限,而一些观察者有时看到的则是思想派别之间的不同,还有另一些人则仅仅留意于使这些相关的思想有别于理性行动和集体行为的界限。不过,那种将热中于资源动员、政治过程、斗争常用手法和构造的研究者们相互间的区别加以夸大的做

法,将会于事无补。事实上,迄至 20 世纪 80 年代,绝大多数研究社会运动的北美学者都已采取了一种共同的社会运动研究议程,其相互间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他们对构成这一议程的不同要素所给予的强调在程度上的相对差别。

图 1.2 给出了这一经典议程的概貌。尽管各自对不同因素与联系的强调程度不同,但研究者们——包括我们自己在 16 内——却常常以同样的方式发问,他们会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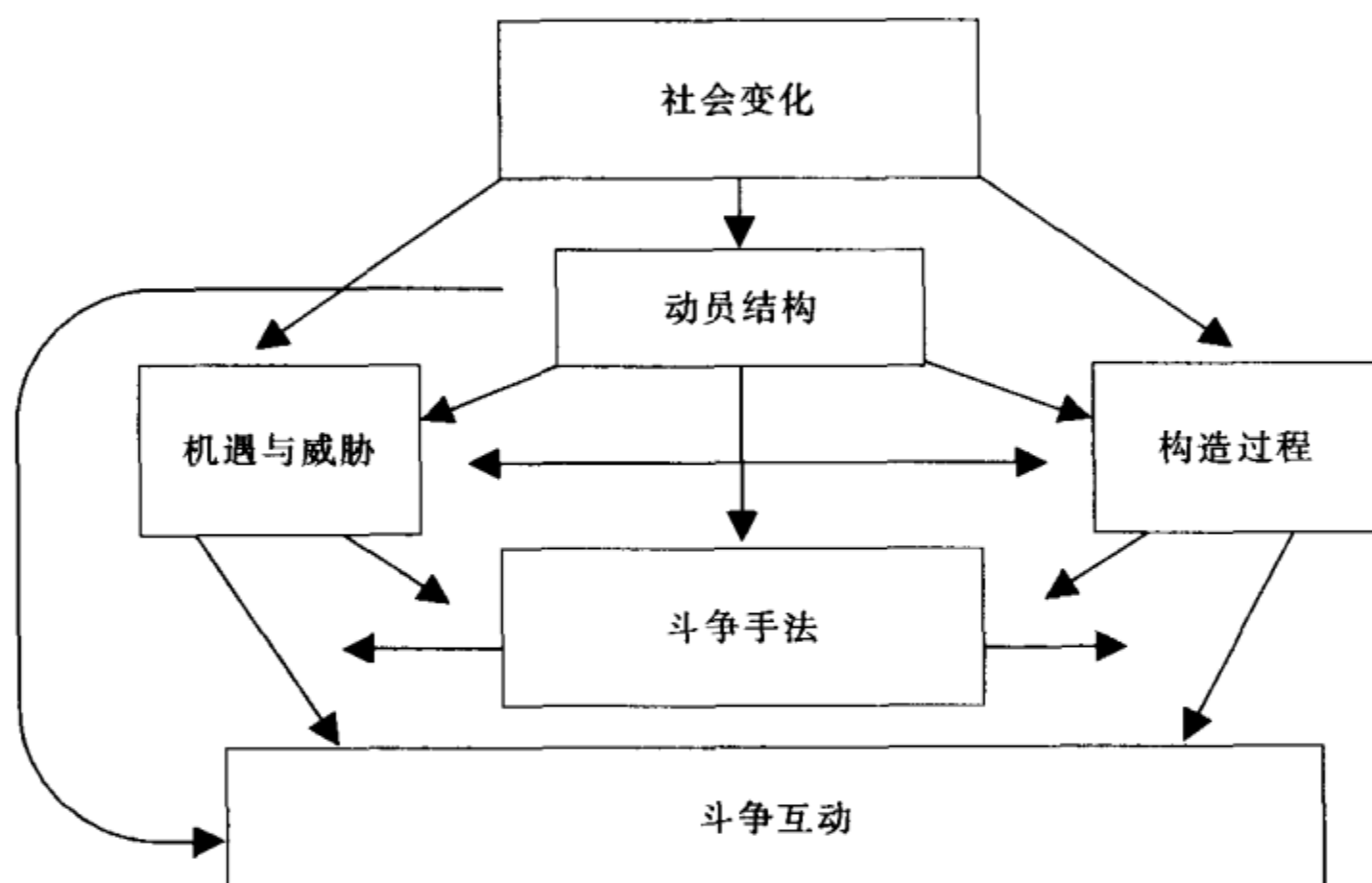


图 1.2 解释斗争政治的经典社会运动议程

1. 社会变化(无论如何定义)是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a)对潜在行动者产生影响的机遇,(b)促进潜在行动者内部沟通、协调和做出承诺的动员结构,(c)产生对于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态之共同界定的构造过程? 举

例来说,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在某个农业人口地区的扩张在何种条件下、如何以及为什么使得这些农业人口中的不同部分面对新机遇的考验,使得这些受机遇变化影响的人们政治上潜在的相互联系发生改变,以及使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态的界定得以改变?

2. 结构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如何形成机遇、形塑构造过程和斗争中的互动?例如:商品和劳动力新市场的创造改变了参与其中的人们的机遇吗?它同时也会改变人们对于可能会出现怎样的情形的共同界定方式吗?
3. 机遇、动员结构和构造过程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如何决定了斗争常用手法——斗争政治的参与者提出集体要求的一系列方式?比方说:资本家对公有财产的攻击、大范围市场的形成以及有关剥削的共同观念的产生,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如何促成了诸如捣毁机器一类民众政治新形式的创立?
4. 现存的斗争方式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如何一方面调节机遇与斗争性互动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对构造过程与斗争性互动关系加以调整的?例如:某一人群素有举行公开仪式羞辱堕落者的传统,这一做法的存在影响其成员会对之做出集体反应的各种机遇以及对机遇的可能解释吗?

我们会在下一章中利用这一研究议程去对动员过程做出解释,眼下,这样说就够了:通过激励做更多的经验研究工作,以及提供一种合理的,或许也是过于结构性的和静态的社会运动基本模式,这一研究议程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它被用于描述民主政体中的单个统一的行动者时,效果

甚佳；而当它被用于说明非西方民主政体尤其是非民主国家中发生的复杂的斗争事件时，其作用就远不是很好了。而且，由于将更多的因果关系一股脑地放在不够明晰的箭头上，而不是放在贴有明确标签的方块中，它所提供的只能是斗争政治的静态图案，而非其动态与互动性的发生序列。鉴于它既是静态的、缺少原因说明的单一行动者模式，又包含了与相对民主的社会运动政治的内在亲和性，因此，当它作为研究广泛存在于西方民主政体之外的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政治之指南时，这一程序就显得很蹩脚了。甚至当它被用于美国时，该研究议程也被证明是 18 有失偏颇的，它过分关注范围有限的行动了。

来看一看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美国密西西比州格林伍德的民权运动情况。格林伍德位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种植园区，是白人优越论者的根据地之一。从 1962 年春开始的一年当中，格林伍德经历了从断断续续的要求维护黑人权利到大规模（最终证明是相当有效的）动员的过程。尽管格林伍德当地的许多黑人团体的成员也曾给予该运动以默默的同情以及物质上的支持，但正如查尔斯·佩恩的报道所言，在运动发生的第一年里，“该运动之所以能得以勉强维持，主要有赖于一些年轻的组织者能够赢得铁路调车场工作人员、女佣、出租车司机、美容师、理发师、保管员和干农活的黑人们的信任”（Payne 1995: 133）。来自其他地方的一些民权积极分子与当地入密切合作，面对来自地方当局各方面的刁难，他们以选民登记作为契机而组织起来，并逐渐建立起彼此间相互信赖的关系网络。

这些人所从事的是一项充满紧张和危险因素的工作。后来成为有关美国种族、政治和家庭生活著名分析家的乔伊斯·拉德纳（Joyce Ladner）的现场报道，传达出了这种紧张和危险感。1963 年春，拉德纳从她所在的图格鲁学院得到一段时间的春季

休假,当年3月的最后一周,她得以在格林伍德度过:

3月24日,星期天:傍晚,有人纵火烧了联合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当天日间,拉德纳曾在那儿工作了一整天。

3月25日,星期一:她从遭遇火灾后的办公室内抢救出残存的档案,然后开始为一场晚间群众集会做准备。

3月26日,星期二:拉德纳一整天都在处理办公室里的一般性事务;傍晚,杜威·格林先生(Dewey Greene, Sr.) [“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的老资格成员]的住处遭到枪击。

3月27日,星期三:针对枪击事件的抗议游行,与市长发生对抗,民权工作人员遭警犬袭击并遭逮捕,又一次群众集会。

除了充满激动和危险,运动中同样也包括了一些枯燥繁琐的日常性与制度性过程:

19 **3月28日,星期四:**搬迁临时指挥部,带领人们进行投票登记,上公民教育课,游行人群遭到带警犬的警察的袭击,接下来是一次有当地和全国著名领袖参加的群众集会。

3月29日,星期五:公民教育课,选民登记,与警察对抗(一人被捕),群众集会。

3月30日，星期六：办公室工作，游说选民登记。
(Payne 1995:168—170)

佩恩指出：“拉德纳的报道，不仅记录了这一运动在当时所表现出的平平常常的一面，也抓住了它紧张刺激的戏剧性的一面。在这个星期当中，她会见过三位民权运动组织的全国性领袖，与来自南方各地的组织者见面，遭遇过一次纵火事件，一次枪击事件，以及难以数计的警察威胁和暴力行径，还打印了许多文稿、写了不少信件。她还目睹了黑人共同体在面对更强大的压制时，以更积极的行动主义做出回应——用更多的群众集会和每天举行游行的方式。”(Payne 1995:168—170)由此可见，在有些分析家那里，通常被硬拼凑成的单一性的民权运动实乃由无数次的行动组成，其中不仅包括警察的暴力和对抗行动，也包括人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及制度内部和周围的日常政治互动日复一日的改变和创新。

如果说，1963年密西西比州格林伍德的这个星期，为我们展示出的是民权运动如此这般的复杂性，那么，将整个民权运动硬塞进图1.2所示的各色方块里，这样做或许可以为要提出的诸多问题提供一个方便的清单，但它绝不会产生有说服力的解释来。那些方块内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些箭头代表的又是怎样的因果过程？要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请出其他的思想资源。

思想资源

如果我们从研究社会运动的经典议程之狭路中退出，再环顾一下四周，就会找到其他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同时也会发现

妨碍利用这些资源的路障。这些新资源由四种相互重叠却彼此较劲的斗争解释思路组成,由于不同思路的解释者们各自在搜集证据与做出解释时,存在着方式方法上的重大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遂构成对新资源加以利用时的障碍。尽管各自的名称容易产生歧义,我们还是可以把这四种主要的思想传统分别称
20 作结构性的、理性主义的、现象学的和文化的方法。

结构性分析 依照其最纯粹的形式,持这种方法的研究者们把他们的兴趣和能力放在所有的集体——共同体、阶级,有时甚至包括人们所谓的社会这类模糊的集体——上,然后,他们主要通过个人和群体与相关的集体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这些个人和群体的行为。就方法论而言,结构论者通常着力表明,斗争事件中的参与和行动是与社会组织的划分相一致的,结构与变化理论给了社会组织划分以特殊的兴趣和能力。

理性主义分析 这派学者有时把诸如公司和州这类集体作为关注对象,但绝大多数时候,他们集中关注的是个人依据其既定的利益、资源和条件制约而做出的审慎选择。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理性主义分析家始终追随一种与结构论者的研究方案直接抗衡的解释方案,这种理论上的直接竞争常常是理性主义分析人士有意识地加给自身的。在诸如工业冲突和选举政治这类斗争研究领域,理性主义者通常占有优势。在实际研究当中,理性主义分析家们常常集中证明有关的个人与集体仿佛就是做出决策的个人,他们能够做出与他们所宣称的利益、资源和条件制约相一致的重大抉择(比如是否加入或拒绝一项集体行动)。

现象学诸方法 其研究对象同样是集中于个人(尽管有时是那些显而易见的个人),通过探讨个人的意识状态以达到解释其卷入斗争政治的目的。许多现象学分析家强调认同问题,重视对“我是谁?”、“我们是谁?”、“你是谁?”或者“他们是谁?”一类问题的回答。他们在从事实际研究工作时,典型的做法是详细考察行动者的言说和有关文本(有时也包括被视作文本的一些符号、物体以及实际行为),以求从中发现有关意识方面的隐义。那些从事研究种族动员、民族主义、宗教冲突和具有明确认同的社会运动的学人们,常常将现象学当作他们解释这类运动的支点。

文化的方法 由于采用这一解释方法的学者们经常将文化视为个人心灵的产物,此类方法因此而与现象学的方法相互重叠。不过,就这类方法的纯粹形式而言,其做法则是将斗争事件的动因归之于个人所亲身经历的以及从外部吸收而来的一些标准、价值、信仰和象征符号。文化论者给予如下两类情形以特殊的关注:代表一定的意识形态或其他得以清晰表达的信仰体系而明确组织起来的斗争行动,以及发生在一些具有独特文化色彩的共同体中以成员身份为基础的斗争行动。和他们的现象学方法同仁一样,文化论者常常以解释学的方法处理文本,有时,他们还对诸如血族关系和贸易网络一类结构做出解释,其所采取的方法是人种史研究者的方法,后者更为关注的是这些结构的意义而非它们的分布情况。 21

作为标签,结构的、理性主义的、现象学的和文化的方法其实分别指的是某种倾向,它们并不标示被断然区分开的不同阵营。尽管绝大多数有关斗争政治的实际分析将自身定位于其中

的一两种方法上,但这并未妨碍它们从其他方法中借用某些观念(Goodwin, et al. 1999; McAdam, Tarrow, Tilly 1997)。例如,最出色的理性行动分析在对个人如何做决策进行分析时,是把它关注的焦点放在个人置身于其中的市场、公司或者州所具有的结构特征和效果之上的;而采用“集体行为”分析路径的学者在专注于发生在群体之中的现象学变化的同时,其绝大多数最具说服力的观点中却包含着制约此种现象学变化发生可能性的结构的和文化的因素。许多结构分析学者在试图解释斗争互动中的关键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一问题时,往往会利用理性选择或现象学的方法。近年来,一大批出自不同观点的分析人士都已开始采取一种我们所谓的“相关性的”(relational)视角。

相关性的视角

我们本身都来自于结构主义传统,但在研究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形式广泛的斗争政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到,我们的研究有必要将策略性互动、意识和作为历史积淀的文化因素考虑在内。我们把社会互动、社会联系、沟通和交谈不仅视为结构、理性、意识抑或文化的表达,更视为创造和变化实际发生之所。我们已开始将人际关系网络、人际沟通以及各种形式的持续不断的磋商谈判——包括有关认同问题的磋商——看成是斗争动力学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理性行动分析学者那里,他们也日渐把主要动因(principal-agent)问题、与第三方的关系、多方博弈以及类似的相关性现象,视为对斗争政治的发起及其进程和结果影响甚大的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结果是使得结构分析学者与理性分析人士之间的对抗与合作同样成为更具经常性的

现象(参见 Lichbach 1998; Lichbach and Zuckerman 1997)。比方说,罗伯特·贝茨以及他的同事们所提出的“分析性的叙事”(Bates, et al. 1998)大体源自于理性主义的观点,但它同时也把存在于政治行动者之中的多重关系涵括在内。不过,如同该研究实例所示,在相关性方法和绝大多数理性分析学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将他们彼此分隔开来的三大歧异之处。

首先是本体论上的分歧。由此而来的是必需在以下二者间做出相应选择:(a)视个人意愿为社会现实与社会行动之根本的甚或是独一无二的发生地点(sites), (b)认为社会事务具有无法还原为个人心理事件之有效真实性。做出(a)项选择的方法论个人主义集中关注的是解释关键决策及其所依据的基本原则,而选择(b)的相关性现实主义则聚焦于解释社会互动网络。本书给予个人行动以充分的关注,但它同时也赋予相关性过程重大的因果效用。

第二项分歧表现在认识论和逻辑方面。这里的选择是:(c)把对政治斗争的解释看成是使低层次的经验性概述被纳入高层次的经验性概述之中,后者终将累积而成为无所不包的笼统规则,(d)把对政治斗争的解释视为对由诸多机制构成的因果链的确认,这些机制以不同的序列和不同的结合形式重现于各不相同的环境中,由此而产生的集体性后果也彼此有异。

依照第一种观点,对斗争政治的总体叙述务必显示出所有的斗争实例都与体现在一再重现的环境、结构和次序中的规则相一致,在此,我们看到的是斗争政治分析和物理力学之间的相似性。而按照第二种观点,所谓真正总体性的叙述事实上无从达到,而仅有强有力的或许也是带有选择性的重复出现的机制和过程,显现于形式各异的斗争政治中,这里,我们所能见到的是斗争政治分析与分子生物学之间的类似。本书决意采取第二

种观点。

第三是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分歧。此处的选择是:(e)无视历史的重要性,对于我们称为文化的东西,亦即由历史积淀而成的共同认识和共同实践,也丝毫未予以重视,当然,那些成为可以明确表述的利益、资源以及制约决策的因素除外,(f)认为斗争政治发生于其中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对于政治斗争的动员、行动者、轨迹、结果及其因果机制之间的相互联系有重大影响。相对于纯粹理性主义的观点,我们把斗争过程看成是深植于历史之中的,以至于我们由此而认为,绝大多数的行动者、行动、认同、动员过程、斗争轨迹及其逻辑上可能的结果——或者甚至已经发生在颇为相似的其他历史和文化背景中的结果——在某些具体的社会环境之内不会物质化。超越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的斗争政治的共同特征并不是由相似的大型结构和序列所组成,而是由联结为因果过程的一再发生的因果机制构成的,这些也就是我们希望通过对本书所选取的诸斗争事件中所存在的互动的考察,去加以揭示的东西。

因果机制、因果过程与斗争事件

现在,让我们从对理性选择一类意在总结所有类型政治斗争的总体模型的探讨,转向分析那些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以不同的结合方式和不同的发生序列,一再重现的规模较小的因果机制。我们先得在社会机制、过程与事件之间作一个大致的区分:

机制:指的是一类有着明确界限的重大事件,它们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以相同或极其相似的方式,使特定的一组要素之间

的关系发生改变。

过程：是指使得那些要素产生相似的(通常更为复杂和偶然的)变化的这类机制的有规则的先后次序。

事件：指的是连续的斗争之流,包括对其他各方利益产生影响的集体性的提出要求。

有关机制的概念,我们从那杰出的却遭到长期埋没的社会学传统中汲取了智慧,现在,让我们先行考察一下我们的机制概念,然后再转到对过程与事件的考察。

默顿的机制概念

我们对社会机制的兴趣可以追溯到罗伯特·默顿,默顿把社会机制定义为“对于社会结构的特定部分具有特定作用的社会过程”,他并且认为,社会学的主要任务便是辨明这些机制(Merton 1968:43—44)。尽管政治学家们始终把注意力放在被他们相当静态地理解的制度性机制上,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乔恩·埃尔斯特(Elster 1989)和阿瑟·斯廷奇库姆(Stinchcombe 1991)使他们的研究转向这一主题之前,几乎没有多少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接受默顿的挑战而关注动态的社会机制。

埃尔斯特集中关注的是使变量或重要事件之间关系得以明确的内在的“社会齿轮和轮子”(1989:3)。斯廷奇库姆则写道:“机制理论”是“一些有关不同层次实体(例如个人)的理论,而不只是关于已经被理论化了的主要实体(例如群体)的理论,它们被用于使较高层次的理论变得更为灵活、精确或更具普遍性”

(1991:367)。斯廷奇库姆和埃尔斯特二人的观点由此而不同于亨普尔(Hempel)及其追随者们所赞成的经典的“笼统法则”模式。步埃尔斯特和斯廷奇库姆的后尘,赫德斯特罗姆和斯韦德伯格决定详细说明使得各变量相互之间连接起来的机制,而不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具有的力量上,后者已成为采用定量方法的社会科学以及运用因果模型方法的学者们的常用工具(Hedström and Swedberg 1998:8—9)。

在这方面,我们追随的是赫德斯特罗姆和斯韦德伯格,我们把机制看成是明确限定的那类重大事件,它们在各不相同的条件下,以同样的或者极为相似的方式,使特定要素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不过,就在他们下结论说,机制分析方法的核心观念是而且必须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尽管是取它的较弱也较少整体主义色彩的形式)时,我们与赫德斯特罗姆和斯韦德伯格之间也就彼此分手了(Hedström and Swedberg 1998:12—13)。他们的结论导致他们仅仅聚焦于在个人层面上起作用的那些机制——诸如“自证预言”——或者聚焦于源自其中的“网络效应”与“随大流效应”(bandwagon effects)。有关这类个人层面上的过程的研究,一些学者如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和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他们还是严重制约了我们对诸如斗争政治中牵涉到的集体过程的解释。

在斗争政治内部,我们可以在环境的、认知的和相关性的机制之间做一个大致的区分:

环境的机制 意指从外部产生的、作用于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各种条件的影响力。此种机制能够直接发生作用,例如:
25 资源枯竭或资源增加对人们投身斗争政治的能力的影响(Mc-

Carthy and Zald, ed. 1987)。

认知的机制 通过个人的和集体的感知起作用。类似如承认、理解、重新解释和分类这样的词汇体现了认知机制的特征。我们对发生在巴黎和格林伍德的情形所作的简介,显示出人们对通过集体行动可能会发生什么的想法存在着意识方面的变化,而当我们更为近距离地观察时,我们还将会看到一个一个地起作用的多种认知机制。例如,承诺(Commitment)就是一种一再出现的单个机制,在其中,那些私下里并不愿意冒参与集体行动之险的人们发现,他们的退缩不可能不伤害他们珍视与其团结一致的其他人——有时甚至要以其他人付出严重损失为代价。

相关性机制 使人们、群体和人际关系网络之间的联系发生改变。居间联络(brokerage)是本书第二和第三部分一再出现的一种机制,我们将其定义为使两个或更多以前未曾发生联系的社会地点发生联系的一个单位,该单位在两地间的相互关系中和/或它们与其他地区的关系中起中介斡旋作用。绝大部分的分析者把居间联络视为使固定地点的集团和个人之间发生相互关联的机制,但它同样也可以成为在斗争政治发生期间起动员作用的相关性机制,如一些新群体因互动与不确定性的增长而匆忙聚拢到一起,而后再去找他们共同的利益所在。

环境的、认知的和相关性的机制联合在一起发生作用。例如,在第六章中,我们将会看到美国内战是如何在环境机制不利的背景下(内战前,人口和选民大规模的转到西部),通过认知机制(广泛流行的把南北双方因北方向西部扩张而形成的对抗解

释为得失所系的赌局),和相关性机制(在到西部寻找自由土地的人们和反奴隶制的北方人之间居间斡旋,促其形成联盟)的作用而发生的。我们对诸如人口增长与变化、无产阶级化和城市化这类环境机制给予某些关注,但我们在叙述中更为关注的是认知的和相关性的机制。

我们如何能在某种社会机制出现时认出它来?一般地说,当一种机制起作用时,我们就会看到有关的要素之间的互动使它们原本已确立的联系发生改变。看一看斗争政治中常见的我们称为“发信号”的机制,在某种充满风险的形势下,参加者常常要相互审视一番,以找出准备承担代价而不变节的迹象,再根据对其他参加者临阵脱逃的可能性的估计,来调整他们自身的行为。例如,某些可能的示威参加者在示威前,会通过语言和姿势上的相互交流,发出他们在决心、沉着和恐惧程度上的信号,老练的示威者和熟练的组织者将他们的信心投射到经验不足的参加者身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形式的信号减少了经验不足者脱逃的可能性。不过,倘若老练的示威者们认为与他们对阵的愤怒的当局军队很危险,并因此表现出恐惧神态,则此种信号实际上促进了叛逃。机制基本相同,结果却判然有别。

机制与过程

机制很少独立发挥作用,它们具有与其他机制联系在一起而形成更广泛的过程的特征(Gambetta 1998:105)。过程则指的是那些经常重复发生的机制的因果链、次序和组合。值得在此专门谈及的过程包括那些重复出现的机制组合及其发生次序,它们在不同环境下,起相同或极为相似的作用。本书第三部分对此会有更为系统的分析,从革命、民主化和民族主义这些众

所周知的宏观过程出发,第三部分还将详细考察由一系列机制组成的诸如行动者构成、极化(polarization)和规模变化(scale shift)这类较为狭小的过程。我们将会从各色各样的斗争事件中找出如此这般有活力的过程。

机制与过程构成了一个连续统一体,因此,不管我们把居间联络称为一种机制或一组机制,还是称为一个过程,都显得很武断。在本书中,为强调其一再重现的特征,通常我们还是称之为机制。在连续体的一端,某种机制比如“认同改变”——在政治斗争的提出要求阶段,公众对于“你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的改变——可以视为一种目标有限的机制。而在连续体的另一端,民主化也许就不能被说成是一种单一的机制,它显然包括了多种机制在内,这些机制在各种具体经验中,以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第九章概述了民主化的过程理论,其中,民主化就涉及了产生趋向(及远离)民主之行动的机制组合或次序。

本书第二章中有关机制与过程的预览,会阐明我们的想法: 27

- 动员,我们在第二章中首先要详尽描述的这一为人们所熟知的过程,使许多相互起作用的机制——从被普遍称作“社会变化过程”的环境机制到诸如机遇和威胁的归因、社会利用(social appropriation)、争论的建造和创新性集体行动的部署之类机制关联起来。以民权运动为基点,我们将探究对这些机制的共同关注如何使动员得以展开。
- 另一组是我们称作“政治认同形成”的机制。与动员过程的情形一样,这些机制中有些是认知机制,有些则是相关性机制。政治认同的建立既包括了所涉及到的人们以及与这些认同无关的其他各方在意识方面的变化,也包括

受到影响的人与群体之间相互关系的改变。随后的几章将探寻政治认同形成过程的规则,考察在革命、民族主义的动员、民主化和社会运动中,同样的一小群机制的不同组合形式和发生次序是如何产生出大不相同的过程变项,以及由此而来的大不相同的结果。第二章从对动员的描述接着便转到通过法国革命以阐明认同转变机制问题上。

- 由于一组与抗议周期、革命以及其他形式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作用,这两类过程在斗争进程中最终汇聚到一起。我们以本书中的第三个基准案例——意大利的政治斗争事件——为例,通过描述压制、扩散和激进化机制如何在复杂的斗争事件中起作用,而结束第二章的讨论。

事件

我们试图通过将因果机制与过程置于斗争事件之中来弄清其本义。事件并不仅仅是复杂的过程,它们总是包含着两个或者更多的过程。无论我们对 1789 年 7 月巴黎革命这一事件做如何狭义的界定,我们还是会发现动员、认同改变和极化这三种斗争政治中普遍存在却又各不相同的过程与机制的结合。于是,我们的解释程序也就变得很清楚了,它由以下几点组成:

- 辨明斗争性事件或者那些具有某种问题性特征的斗争性事件
- 将过程置于建构或者产生问题性特征的斗争事件之中
- 从这些过程内部找出关键的因果机制

由此,我们就能对人们在压制增加时,采取对敌人做出回击而不是逃窜或消极屈从的回应方式的一系列事件加以探究。在这些事件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动员和极化的过程同时发生,在这些过程中我们又会发现诸如对威胁的集体归因和加强承诺这类产生关键作用的机制。依此,我们便可开始对抵抗大规模威胁的事件做出因果说明。

把整个对抗之流视为一个单一的事件,使得我们可以对发生在其他地方或发生在同一体制内不同历史时刻的一系列冲突的同与异,做深入思考。虽然在某些方面,法国 1830 年、1848 年和 1871 年的革命与 1789 年的革命相仿,但这并不表明发生在法国的所有革命完全相同,它只是使得在这些革命之间进行比较变得有趣。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在 1968 年都出现了斗争高潮,这并未使它们成为“一个宏大运动”的一部分,但这却提出了相似的机制与过程是否彼此激活这样一个问题——更不要说引起对它们之间关系的注意了。

将整个对抗之流视为一个单一的事件,也提出了大量的问题。许多学者把革命、战争、社会运动、大屠杀、示威、抗税叛乱、粮食骚动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件看成是独立的实体,而与此同时其他学者却对这些事件的典型的次序、形式、起源或者结果做出概述。我们的观点在以下四个相关的方面超越了这些方法:

- 首先,我们把整个事件中一再出现的一致性看成是应当小心地加以检验的可疑假定,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对之做出认定。在我们的著作中,我们已发现机制与过程的可变的序列和组合。

- 其次,我们不是把事件视为自然的实体,而是将它看成不同眼光的观察者根据过往事件的参与者、目击者、评论者和分析者所确立的传统,对它们做出的界定和评说。我们坚持认为,对事件轮廓的勾画会自觉地创造出可比性,同时也坚持认为,对事件加以描述——或长或短、在或大或小的地方,以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眼光——的原则,会大大影响到哪些机制与过程会变成可见的。
- 第三,我们把对事件的命名和贴标签这件事本身看成是重大的政治行动,看成是我们最终必须加以解释的部分。对参与者或他们的后继者来说,决定一次事件是被说成一次革命或一次大骚乱,对于认同的激活、同盟的得到或失去、事件所引起的政府举措和其他公民在随后的政治行动过程中的乐意介入,都会有所影响。
- 第四,我们不是把这些事件看成斗争的线性发生序列——在其中,同一群行动者经历的是刻板地重复表达早已确立的要求——而是把它视作反复出现的互动地带,在其中,不同的动员与遣散(demobilization)之流相互交错,认同形成并演进,新的行动形式在行动者们彼此互动以及与对手和第三方的相互影响中被创造、检验和拒绝。

我们利用机制和过程作为我们解释的重要工具,而把事件当作我们描述的重要工具。我们因此而敢于对社会性的世界如何运转做如此断言:大的结构和序列绝非自我重复,而是产生于范围极广的机制的不同组合与发生序列。看一眼我们的第三个基准案例就会明白,甚至在某个单一的事件中,我们也将会发现多形态的、变化不定的和自我建构的行动者、认同及各种行动与互动形式。

迨至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战后意大利出现的经济“奇迹”已趋回落,随着来自南部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开始枯竭,冷战所造成的紧张形势的缓和,世俗化对天主教政治优势的侵蚀,日益增长的矛盾也开始尖锐化。劳资冲突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的突然迸发,发出了必须做出某些变革的预警。当社会主义者进入政府,剩下他们的共产主义者盟友孤零零地作为反对党时,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缓和时期(Ginsborg 1989: ch. 8)。随之而来的是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每一次改革企图要么是引发了右翼的强烈反应(像电力国有化所引起的右翼反应),要么便是打开了更广泛斗争洪流的闸门(像现代工业关系法的通过所引发的后果)。

当剧烈的动荡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来时,那些原本已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的攻击心存恐惧的人们,更是吃惊不 30 小。揭开 1967—1968 年的抗议浪潮序幕的是意大利共产党传统影响之外的一个社会角色:中产阶级出身的学生们。造反的最早发生地中既有都灵和比萨的世俗大学,又有米兰和特伦托的天主教学术中心,显示出学生中正在出现新的认同。造反派们使用工人人们的措辞来构造他们的要求,则表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亚文化的力量依然存在。但他们与产业工人阶级的联系却很微弱,到 1969 年,以大学为基地的造反主力趋于衰退(Tarrow 1989)。

斗争的第二波甚至在第一波尚未结束时就开始出现了。1968 年的意大利从一开始就以极左和极右翼之间的暴力冲突——以及双方与维护秩序的军队的对抗——为标志,不过,在极左派看来,军队对极右派似乎要温和一些。在新一轮暴力周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发生在米兰丰塔纳广场的农业银行的爆炸,接踵而来的则是“一位被监禁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以及被认为应对这位无政府主义者之死负责的警官的被谋

杀。由于从中学生中间得到新的支持者,同时也由于警方的镇压措施,新一波的斗争在70年代的早期至中期,演变成对实业家、政府官员和报界人士的恐怖袭击(della Porta 1990)。

1969年又出现了第三波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发产生的新一波斗争。受学生的榜样作用激励,同时也由于受到正在讨论的新工业关系法以及越南战争时期通货膨胀这一外在因素的刺激,斗争蔓延到了工厂(Franzosi 1995)。“火热的八月”最初虽然仅限于北部的一些大工厂,但它在由1950年代经济“奇迹”时期进入工厂的半熟练的“大众”工人发起的新一轮斗争浪潮中,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激烈。享受较高工资待遇的熟练工人和白领工人对工人大众的成功所做出的反应,是提出保留工资差别的要求。为免于受到侧翼攻击,工会很快取得了对工人阶级暴动的控制权,并使之在要求与意识形态方面急剧左转。

一连串的这些动员以不同的方式与公共政治发生互动。对所有这三类行动者而言,精英分子的分裂加剧了冲突并且为斗争创造了机遇。不过,对大学生运动的处置采取的是零星的镇压和毫无生气的教育改革相结合的办法。工人们则赢得了新的参政权和工资较大幅度的增长,而恐怖主义者的威胁遭到了一致的镇压。最终,各政治阶层紧密团结在包括左翼各党派在内的民族团结联盟内,以图经济恢复增长和保卫国家免受敌人之害。

对待这一事件的不同看法,将会根据我们集中关注的是1968年的学生运动(在这方面,意大利与其他在同一年中经历了学生造反的国家并没有什么不同)和工人运动(它经历了更长一段时间的曲折变化,同时也比学生运动更多地受到控制),还是集中关注这一时期具有暴力色彩的结局(这其中的行动者不同,行动方式也更为逾越界限),而有所不同。不仅如此,依据我

们集中关注于斗争的哪一个部分或我们探讨的是斗争周期中的哪一阶段,我们还会发现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不同机制与过程。

我们的研究议程

在我们的研究当中,寻找解释性的机制与过程取代了我们从经典社会运动研究议程中所看到的开列变量清单——机遇、威胁、动员结构、斗争手法、构造——的做法。尽管我们曾经帮助提倡图 1.2 所示的研究议程,但我们撰写本书还是意在大大地超越这一议程。图 1.2 中每一方块及箭头所提出的问题,在本书以后各章中会一再出现,但我们寻求的是处理诸如政治认同的形成、不同行动者的动员、集体行动的分化或合作以及斗争不断进行中的道路变化这类现象的更为恰当的方式。例如,我们寻求将解释性的过程牢固地置于社会互动的交换(give-and-take)中,而不是将它们视为自主的因果力量。为彻底弄清因果联系,我们拒绝那种试图建立涵盖所有斗争甚或其各种变化形式的总体模式的努力。相反,我们从斗争的每一主要方面中,去寻求充满活力且具有广泛应用性的因果机制,这些机制解释的是斗争之关键的——而不是其所有的——特征。

把它们分别作为不同的整体来看,法国革命、美国民权运动和意大利的斗争事件显示出各自之间的殊异。法国革命推翻了国家政权,其所有政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也被重新安排;美国民权运动则把稍多一点的政治平等和一整套提出政治要求的强有力的先例,引进到续存的国家政体中。而意大利的斗争事件——尽管它的暴力程度很高——却几乎没有引起多少具体可见的政治实践方面的变化。不过,当我们将这三者的历史分开 32 来看时,我们就会从中发现推动并改变冲突的若干共同机制:贯

穿整个斗争过程的新的行动者和认同的产生；由将以前相互隔绝的各地遭受侵害的怨民联系起来的行动主义分子们所进行的居间联络；导致派系分裂和重组的竞争者之间展开的竞争，如此等等。这些机制又联结成更为复杂的过程，诸如冲突的激进化和两极分化，新的力量均衡的形成，以及政府按照新路线的重新改组。

这些就是我们在本书中寻求的各种联系。我们的计划并不是要去辨识大规模重复的大型结构和序列，而是要找出重要的重复出现的机制与过程及其不同变化的原则，我们的总体策略如下：

- 我们承认，原则上，斗争涉及的范围包括战争、革命、社会运动、工业冲突以及通常被分析家们认为是“自成一类的”(sui generis)其他许多互动形式。
- 详尽阐述使人们注意到这些相似之处的诸概念；采用西方民主国家社会运动研究中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出的有关主要概念，作为我们研究的起点。
- 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再通过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成果运用于其他历史背景和历史时期，以改进这些概念。
- 跨越这些历史背景和历史时期，不从整体现象而从这些现象所显示出的机制中，去寻找重复发生之物——例如，在社会运动周期中和在革命条件下，居间联络机制之间存在的相似性。
- 细究这些因果机制是如何结合成更长的政治过程之链的，比如，在民族主义斗争事件中，认同改变和居间联络是如何结合起来的。从对这些过程的辨识中，产生的并不是有关斗争的总体理论，而只是与这些有力的因果相

似性有关的不全面理论。

- 建立有关这种不全面理论适用于其中以及不适用于其中的时间、空间和社会背景的视界条件(scope conditions)。例如,问一问跨民族的动员是否反映了如同民族层面或地方层面的动员一样的国际机制。
- 将这些视界条件中的非连续性——例如,发现源于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社会运动理论无法适用于解释这些政体之外的情形——不是当作文化路障,而是视为着手新的理论和比较工作的挑战。

33

本书并非研究专著。尽管书中包含了数不清的实例和对案例的持续描述,但本书却主要是通过利用这些案例所提供的证据,以此推出和说明斗争政治的若干新的思维方式。惟其如此,书中常常只对事件作纲要式的概述,而并不深究其基础。我们绝不声称我们已对本书所考察的斗争事件提供了综合性解释,我们寻求的是建立具有启发性的类似物,并运用它们去辨明那些一再出现的因果过程。我们希望由此而启发研究斗争政治的新方法。

动员,行动者,轨迹

我们姑且将这些问题集中在三个大标题之下:动员、行动者和轨迹。这些范畴将成为我们在下一章以及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所作研究努力的指南:

- 关于动员,我们必须解释的是,在某一特定时刻并未提出斗争要求的人们是如何开始提出要求的——以及那些正

在提出要求的人们又是如何停止提出要求的(我们称这一反向过程为遣散)。

- 至于行动者,我们需要解释的是,投身于斗争的是何种行动者,他们采取的是何种认同,以及他们产生出何种形式的互动。在做出了这些解释的基础上,我们详细描述了研究偶然形成的行动者的方法,同时,我们还根据在行动者的政治联系方面起作用的不同行动方式,详尽描述了一种探讨斗争互动的方法。
- 至于说轨迹,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要解释斗争的进程及其转化,包括它对斗争政治的直接互动之外的生活所产生的冲击。

在本书中,我们自始至终关注动员/遣散、行动者和轨迹之间的关系。例如,在何种程度上,某些政治行动者展示了产生标准斗争轨迹的独特的动员模式?当临时委员会和民兵在1789年夏天的法国各地形成之际,某一地方的动员、斗争和转变在何种程度上以及为何类似于它们在巴黎或其他地方的对应的行动?南方黑人卷入民权运动的模式是如何地合乎规则,这些模式又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民权斗争的进程及其结果?还有,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工人从无所作为到采取行动,或者反之从行动到无为的转变,尽管不乏其创新之处,但它采取的仍然是那些某一斗争轨迹通常有似于上一次斗争之轨迹的如此可以预见的方式吗?

在第二部分的研究中,我们从三个基准案例转到一个更大系列的配对比较上,这些配对比较被用来加强将动员、行动者和轨迹联系到一起的分析。在进行这类比较的过程中,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对动员、行动、轨迹以及它们在各种不同场景与形式的

斗争中的互动发生影响的、一再重现的因果机制与过程。

我们的研究努力最终将会要求我们放弃我们在动员、行动者和行动轨迹之间所作的区分，尽管本书的第一部分正是按照这一区分组织起来的。有关谁在行动，他们是如何在行动与无所作为之间转化的，抑或他们的行动遵循的是何种轨迹之类的问题，最终证明不过是一些好的问题而已，因为针对这些问题所作的回答以两种方式消解了这些问题。首先，我们发现，相同的因果机制与过程在三个表面上相互分隔的领域里同样起作用；接下来我们又发现，这三者之中的任一个都只不过是看待同一现象的不同方式而已。一旦我们不再认定在斗争与所有其他政治行动之间存在着鲜明的不连续性，动员问题就变成了行动轨迹问题；而一旦我们开始探究不同地区之间的互动是如何随斗争行动的进展而发生改变的，行动轨迹问题就变成了有关行动者、认同以及行动的问题了。由此，当我们转入第三部分时，我们便着手拆除了本书第一和第二部分得以在其中展开的理论支架。

第二和第三部分采用了各自不同的比较方法，第二部分努力探寻的是那些在殊为不同的斗争政治中产生相似效果的因果机制与过程，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先是通过将某些明显不同的斗争事件加以对比，继而由此表明相同的机制与过程在这些事件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第三章对我们所运用的这一方法做了详尽解释，第四、五、六章的构成暂且遵循在动员—遣散（第四章）、行动者（第五章）和行动轨迹（第六章）之间所作区分的结果，这样，整个第二部分的分析最终为我们带来的是九种范围广泛的机制。

第三部分采用了一种不同的策略。摈弃了在动员、行动者和行动轨迹之间所做的区分之后，该部分转而探讨了三类有着 35

传统名称并被分割开来加以研究的斗争事件：革命、民族主义和民主化。这样做有三重目的。首先要表明的是：在第二部分中得到辨识的各种机制与过程，事实上有助于解释诸如革命、民族主义和民主化之类范畴内对比鲜明的斗争事件之间的显著差异。其次是要确立这样的论点：相似的机制与过程事实上重现于各类形式不同的斗争之中；最后，是要探究一再重现的过程是否通常是由我们经由有关案例所确认的机制构成的。仔细探究的结果是，革命、民族主义和民主化皆由在不同的背景下，以不同的发生序列及组合方式而出现的相似的原因所致。

接下来是我们在本书中所做研究的基本步骤。下一章(第二章)设定了本书意欲解释的问题，它利用我们所选取的三个基准案例以探究动员、行动者和行动轨迹。第三章通过制定比较方案及其所依据的理由而对第一部分做出总结。第四章以对发生在茅茅起义和菲律宾黄色革命中的动员过程的探讨，揭开了第二部分的序幕。第五章就印穆冲突的构成和政治化及其对动员和行动轨迹所具有的含义，与发生在南非的相似机制和过程进行了比较。在第六章中，我们通过对美国反奴隶制和西班牙民主化轨迹的追溯，详细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认同是如何得到改变的，动员又是如何形成的。之后，在消解其区分之前，我们就动员、行动者和行动轨迹间的相互交错得出我们的结论。

在第三部分的研究中，根据我们的探讨所遵循的不同路径，我们着手探讨有关斗争的三种不同表述——革命、民族主义和民主化。这一结论性部分的目标，是要通过对我们在第一和第二部分中揭示出的解释性机制和政治过程的探究，以强调这些不同形式的斗争的共同性及其不同之处。我们为此而采取了两个整合性的飞跃步骤，(a)从近年来主宰美国斗争政治研究的经典社会运动研究程序中走出来，(b)穿越各色各样的研究方法。

主要是通过表明相同类型的各种因果机制(我们已在第二部分中加以确认)是如何在革命过程、民族主义者提出要求以及民主化的进程中重现的,我们才得以完成这两步飞跃。

根据经典社会运动研究议程,我们为老问题提供了新答案。在共同的斗争开始之前,究竟是谁的机遇、威胁、动员结构、方法和构造过程更为关系重大,它们又如何关系重大呢?在人们时常借以提出其要求的诸多名义中,为何仅有少数这样的名义作为斗争性互动的公众基础而典型地占有优势呢?参与斗争这一行为本身是如何改变了机遇、威胁、动员结构、方法以及构造过程?这类问题澄清了社会运动的经典研究方法集中关注的是动员和遣散这一事实,它为解释斗争政治中的行动、行动者、认同、轨迹或者其结果,提供的只是一些不够充分的指导。即便在动员区域之内,当某一个或者少数此前形成的政治行动者转入公众斗争时,它仍然还显得很有说服力。要理解斗争之更大与较少结构性的过程,我们就必须拓宽研究议程。 36

让我们坚持说: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去建构关于革命、民主化或社会运动的总体模式,更不要说建构无论何时何地发生的所有政治斗争的总体模式了。相反,我们的目的在于辨识关键的因果机制,它们一再出现于各类斗争之中,但依据它们发生时的初始条件、结合方式以及发生次序而产生出不同的累积结果。我们从我们最为了解或者认为我们了解的发生于现代西方的法国、美国和意大利的三个斗争事件出发,由此再转到我们对其所知甚少的一些案例的系统比较上,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我们着手探讨革命、民族主义、种族动员和民主化,以图辨明它们彼此间的互动与相似性。如果说,我们的研究已获成功,那么,它就会在读者们掩卷之后,赋予他们对原本熟悉的过程以新的理解,也会由此而带给他们对各种形式的斗争政治展开研究的新计划。 37

二 斗争的轮廓

在何种条件下,那些平日里显得冷漠、畏缩或散乱而毫无组织的人们,会放下他们手中的工具,充满激情地拥上大街,或者冲向街垒呢?不同的行动者和认同在斗争事件中又是如何出现以及如何发生转化的呢?最后,这些过程又是循着何种演进轨迹呢?如同我们在上一章所清楚表明的,我们的最终兴趣并不在于探究那些静态的行动者是如何被吸收到单一的运动之中的,而更在于探究复杂的斗争事件期间,新的政治行动者、认同以及多种形式的行动得以产生、互相影响、联合与演进的动态过程。通向最终理解这些过程的路途漫长而曲折,且让我们循序渐进、一步步地慢慢向它靠近。

在这一章里,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使人们加入到运动之中的动员问题,由此我们转而关注的是集体行动者及其认同的形成,接下来我们再由此转向探讨这些过程发生于其中的斗争轨迹,为我们的叙述提供证据材料的则是发生于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三个基准案例。从一开始,我们就与经典社会运动研究议程分道扬镳,为此我们提出了一个有关动员过程的更为动态的模式。随后,我们经由说明与行动者、认同及行动相联的机制是如何与动员交织在一起,而对我们所提出的模式进行质问和考量。最后,我们探究了某些与斗争轨迹相联的机制,并由此提出在斗争事件进程中,动员以及行动者、认同和行动是如何能够发生转变的。

蒙哥马利市的动员

二战结束后不久的若干年里,冷战的开始使得美国的种族问题重新成为全国性的问题。在进入逾越界限的民权斗争阶段之前,一场将各类联邦政府官员、南方政治家以及民权团体卷入其中的有节制的斗争已经持续了十来年(McAdam 1999)。战后早期阶段的庭审案件、民主党内部的分裂、政治行动主义分子及其活动经历,在1950年代纠集在一起而引发出历史上被称作民权运动的重要斗争事件。我们这就从导致斗争进入逾越界限阶段的事端开始说起。 38

蒙哥马利市,亚拉巴马州,1955年12月

民权运动中至为重要的阶段是从这个中等大小的南方城市发端的。1955年12月1日,四十二岁的女裁缝、长期从事民权运动的行动主义者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因违反蒙哥马利市有关乘坐市内公交车应遵守的种族条规而被捕。问题并不在于她未能按规定坐到公交车的后排而触犯条规,而在于某种更为复杂并且更能说明种族隔离所带有的卑劣性质的东西。蒙哥马利市的公共汽车被分为三部分:前排部分是给白人预备的,后面较小的部分留给了黑人,两部分的中间则是黑人和白人都可以落座的地方,不过前提是不能有任何黑人坐在白人的前面。就在帕克斯登上拥挤的公共汽车时,她想到的还是照规定办事,但当时车厢内已是人满为患,于是便有了第二项规定的生效,该规定要求:如果一辆公交车已满座,则车内的黑人乘客必须依据法律规定将其在车厢中间部分所占座位,让与在他们之后上车

的白人乘客,帕克斯所拒绝的是按照这后一规定去做。随后便发生了历史上称作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抵制行动的事件。帕克斯后来说道:

从被捕当天的星期四晚间[1955年12月1日],以及随后的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我被捕的消息传遍了蒙哥马利全城。……在我受审的当天,人们开始做出不再乘坐公共汽车的决定,这一天是12月5日,星期一。当天早晨,按正常班次发车的公交车,车厢内始终空空如也。人们或步行,或沿途搭乘乐于捎带他们的私人汽车。星期一的晚上,在霍尔特大街的浸礼会教堂举行的群众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场,集会开始后仍有许多人陆续赶来,一些人因此根本无法进入教堂,这样的人为数还不少。拒乘公交车的第一天组织得如此成功,而且,直到当局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我们都没有再搭乘公交车。[引自 Burns 1997:85]

帕克斯后来还说,她几乎“已被推到忍无可忍的境地……于是我决定,我必须一劳永逸地去了解我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公民所拥有的权利”。[引自 Raines 1983:44]

帕克斯并非蒙哥马利市实施公交车座位法令以来遭逮捕的第一人,实际上,发生在市内公交车上的虐待是如此常见,以致成了20世纪50年代早期蒙哥马利市“最为……尖锐的黑人社群问题”(Burns 1997:7)。那么,为什么罗莎·帕克斯的决定在1955年激起了更为广泛的黑人社群的反应呢?也许,答案部分地在于帕克斯女士与蒙哥马利市的民权团体和中产阶级黑人教会团体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联系,这两个组织将成为随后展开的抵制行动的核心(Morris 1984:51—53)。不过,其所以引起更

为广泛的反应,部分地也是源于这一事件本身的动力,源于黑人和白人社群如何理解这一事件,以及媒体和政治机构如何构建有关这一事件的说法。

无论答案如何,蒙哥马利市的黑人社群的确以前所未有的激烈方式,对帕克斯的被捕做出了反应。12月5日晨,该市大约90%—95%平时乘坐公交车的黑人乘客,拒绝搭乘公交车辆,此举令白人政府——和普通市民——全都大吃一惊。受为期一天的象征性抗议取得成功的鼓舞,黑人领袖们决定将抵抗行动置于更为持久的基础之上,在当天下午于德克斯特大道的浸礼会教堂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抵抗行动组织者们组成了“蒙哥马利市改进协会”(MIA),二十六岁的小马丁·路德·金当选为该协会的主席,他同时被推选为抵抗行动的领导人。马丁·路德·金为此而奋斗了近十三个月,直到运动取得成功,蒙哥马利市乘坐公共汽车的种族隔离政策于1956年的12月21日被废止。

比废除种族隔离政策本身更重要的是这场运动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抵制行动受到全国性新闻媒体的善意关注,由此而在公众中产生出对该问题更广泛的意识。抵制运动随后在至少六个其他南方城市引发了类似的抵制行动,更重要地是,它还导致了第一个专属南方的民权组织的诞生。该组织最终被命名为“南方基督教领导人会议”(SCLC),并且同样是由马丁·路德·金担任领袖,它所做的是对贯穿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主流运动发挥关键的推动作用。余下的事情,如他们所说,就属于历史方面的问题了。

但我们还是准备超越我们自己。在此,我们的真实兴趣并不在于随后发生的运动,而在于发生在蒙哥马利的诸多重大事件。让我们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是什么促使蒙哥马利市以及整个南方通常显得温顺的美国黑人,甘冒生计和生命之险以支

40 持民权运动呢？回顾一下第一章中的“经典社会运动议程”，以下这些因素便开始起作用了：

- **社会变化过程**开启了变化过程并且引发政治、文化和经济环境方面的变化。
- **政治机遇与约束**面对着既定的挑战者。尽管挑战者们通常面临资源短缺并且被排斥在日常决策之外，但政治环境却并非任何时候都一成不变，挑战者们从事成功的集体行动的政治机遇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变化则造成某一运动中的起伏涨落。
- **形式多样的组织**（非正式的和正式的）在机遇出现并且成为反抗者们有能力利用新资源的条件时，为反抗者们提供初步动员的地点。尽管有一些相反的证据存在（Piven and Cloward 1977），但大部分证据仍然表明，组织力量的大小是与挑战者们得到认可和赢得让步的能力相互关联的（Gamson 1990）。
- **构造（framing）**是一种有关解释、归因（attribution）和社会建构的集体过程，在机遇与行动之间起中介作用。至少，人们必须既对他们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感到愤愤不平，又对采取集体行动就能矫治这类问题持乐观态度（Snow, et al. 1986; Snow and Benford 1988）。诸多运动在集体行动总体框架内构造了特定的怨愤，它们使斗争要求显得体面，使他们与其他人联系起来，并且有助于在提出要求者之间产生一种集体认同。
- **斗争手法**提供的是诸多方法，人们通过这些方法参与集体斗争行动。这些斗争形式并不是中性的、连续性的或者普遍可用的，不过它们也构成了行动者们能够用于提

出要求的资源(Traugott, et al. 1995)。采用逾越界限的斗争形式能够带来惊奇、不确定性和新异性的好处,但是有节制的斗争形式则具有易于被接受、为人所熟悉并易被提出要求者所采用,而无需他们具备特殊资源或甘愿招致损失和冒风险的好处。

经典议程从三个方面为社会运动研究做出了持久贡献。首先,它强烈主张日常政治与斗争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有助于重构社会运动研究而使之成为社会学和政治学中合适的研究领域。其次,引起人们关注“动员结构”的作用,从而向强调社会纷乱与崩溃的老式集体行为范式提出了有力的挑战。第三,它为 41 社会运动提供了有关动员的可信描述,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大量关于上述几种因素与动员增长相关的经验证据的支持。

我们并未放弃那些促使经典社会运动研究模式获得明确表述的重要问题,但它作为斗争政治的分析工具,也存在着四个主要的缺陷:(1)它聚焦于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关系,(2)在把重点放在个别社会运动上时,它极为有效,但它对于更广泛的斗争事件就不太适用了,(3)它发源于“六十年代”相对开放的美国政治环境中,使得它更为重视机遇而不是威胁,更相信组织资源的扩张而不是许多挑战者所遭受的组织(资源)短缺,(4)它不适当地集中于斗争的起源,而不是斗争的诸后来阶段(更为详尽的批评见 McAdam 1999)。

也许,没有任何其他的例子比美国民权斗争与经典社会运动研究对动员之起源的描述联系得更为紧密了(McAdam 1982; Morris 1984)。对这一运动的通行叙述,首先就其认为该运动是从对 1930—1955 年间一系列累积的社会和政治变化所作的反应中发展而来的,便反映出了前面已概略描绘的模式。这种论

点认为,那些变化逐渐从根本上破坏了自 1876 年重建结束以来盛行于美国的种族政治体系(McAdam 1982, ch. 5)。动摇这一体系的关键性的环境机制则是南方棉花经济的衰落,以及引发“棉花王国”解体的两股同时发生的迁徙流——自南向北与由乡村到城市的迁徙。

于是,经典社会运动议程中的所有四个“方块”都开始发挥作用了:

- 通过把以前不存在的“黑人选票”变成总统政治中重要性日益增长的选举资源,一些移居北方的人们重新塑造出有利于美国黑人的政治机遇。
- 就在向北方迁移正在重新塑造政治景象的同时,南方的城市化也正在变得适合于 1950 年代的群众运动将要从 42 中成长起来的特定动员结构——黑人教堂、黑人学院和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全体大会——的发展。
- 这些变化使黑人所受的文化控制得以放松,由此而使得各种民权力量能够以新的、更具斗争性的方式去构造他们的怨愤。
- 它还使得各种民权力量有能力通过游行、静坐以及其他触犯白人权力的形式,将更广泛的斗争手法包括进来。

研究民权的学人们提供了大量证据以支持这种叙述,但这一叙述是静态而非动态的,它集中关注的是单个的运动而不是单个运动只是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更为广义的斗争事件,它对论争的历史和文化构成未予以特别明确,并且它只是突出强调逾越界限的斗争时期,而置发生在此前以及与之同时发生的许多有节制的斗争事件于不顾。有甚于此的是,它还对必须加以解

释的问题做出一种具有结构确定性的叙述。我们以对这一研究议程的重新梳理而开始我们对于动员的探讨。

走向一种动态动员模式

在经典社会运动研究议程赋予社会变化、政治机遇、动员结构、构造以及逾越界限的行动形式以突出重要性的地方,我们则试图去辨明使得这些变量相互之间及与其他重要行动者之间发生关联的动态机制。我们的这一视角使得经典研究议程的每一组成部分——机遇、动员结构、构造和手法——都处于动态之中。

- 我们并不把“机遇和威胁”视为客观的结构因素,而是把它们看成受制于归因(attribution)的因素。无论机遇如何具有客观上的开放性,它也绝不会引发动员,除非它 a)对潜在挑战者而言是可见的,以及 b)被认识到是一种机遇。对于经典模式重视不够的威胁也应作如是观(但是请参见 Aminzade 等即将出版的著作,第 2 章)。尽管镇压的威胁较之参与行动的机遇更为明显,但还是出现了无数的运动,这是因为运动的参与者们既不能看出威胁,也拒绝承认威胁为事实。机遇或威胁的归因是一种驱动机制,它成为以前无动于衷的人们被动员起来的部分原因。
- 我们要求的不是对先在的动员结构的关注,而是对动员发动地点的积极利用。最初的资源动员理论家们把他们的理论建立在他们从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美国所正确观察到的一种趋势上:集体行动之组织机遇的扩展(McCarthy and Zald 1973,1977)。但是他们的这种强

43

调对世界上的多数地方而言,就不再是正确的了,在那些地方,挑战者们所拥有的更可能是组织短缺而不是组织资源。甚至在美国,挑战者们也是利用现存的组织并将它们变为动员的工具,而不是去创建新的组织。社会利用是第二个机制,它使被压迫的或资源贫乏的人们有时能够克服他们在组织方面的短缺。

- 我们并不把“构造”限定为运动领导者们所采用的一种策略性工具,而是把我们关于构建的观点加以扩展,使之将挑战者、他们的对手、各种基本的国家机构、第三方和新闻媒体之间互动性地构成的争端包括在内。一场运动的政治背景有助于构造运动本身的许多要求,媒体和其他的通信来源无意间为它的参与者和其他人构造了一场运动,文化资源则驱使并且规定了运动领袖们深思熟虑地着手构造行动。
- 我们并不将视界局限于挑战群体的各种行动手法上,而是集中关注于挑战者及其对手们的创新性的集体行动。
- 最后,我们并不聚焦于使得以前无动于衷的人们受动员而采取行动的某一次斗争事件的起源,而是聚焦于总体的动员过程,并把斗争的起源问题当作这种总体过程的一个经验性的变量来对待。

使动员展开

从一种静态的研究议程向一整套互动机制的转变,在经过我们修正的图 2.1 的动员模式中得到概括。该图为分析斗争政治的起源提供了一种尝试性的、动态的和互动性的框架。它把

44 斗争的发生描绘成一种带有高度偶然性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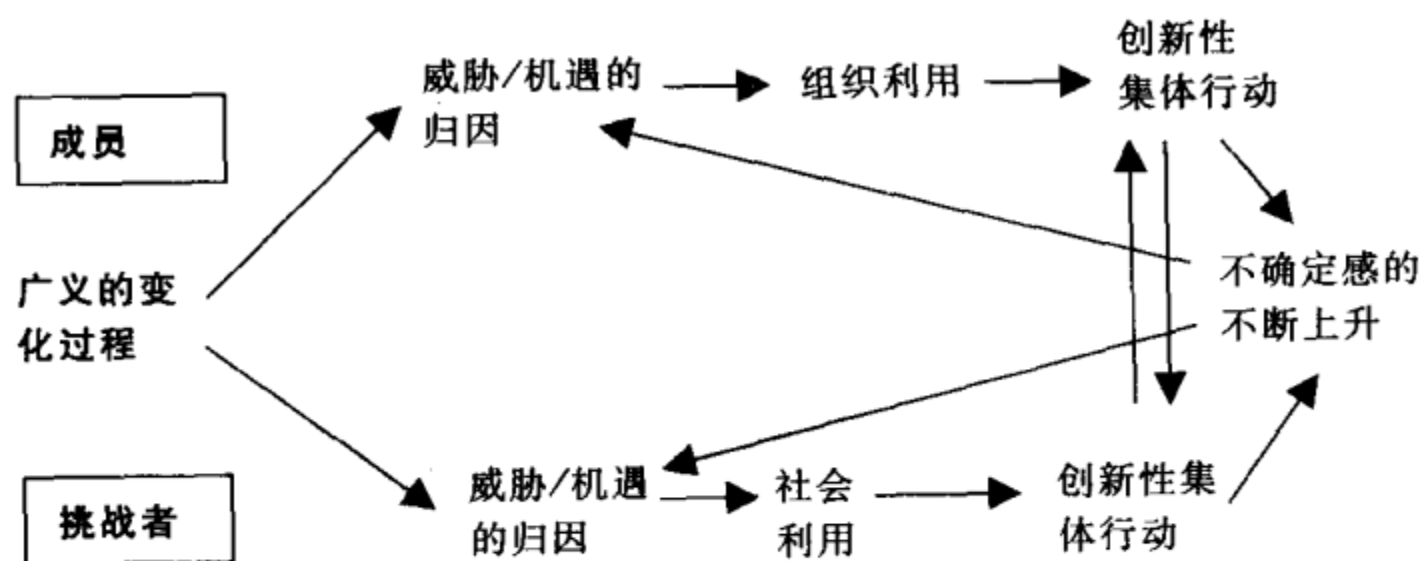


图 2.1 分析斗争政治中之动员的动态的、互动性的框架

这种结果是由包括了至少有一批政府方面的行动者和一个造反群体在内的互动性发生序列造成的。兹概述如下：

- 机遇和威胁并非客观的范畴，而是取决于集体归因的类型，集体归因的类型在经典议程那里是被局限于运动目标之构造上的。它们还包括了运动的正式组织之外的其他行动者：政府成员和普通国民以及其他挑战者。
- 动员结构可能是先前就已存在着的或者是在斗争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但无论如何都必须被用作斗争的工具。
- 整个斗争事件及其行动者和行动都是由参与者、他们的对手、新闻媒体和重要的第三方互动性地构造出来的。
- 创新性行动赢得关注，并将新的不安和焦虑带到互动领域，还典型地导致了一场新冲突中的所有各方共同存在的不确定感的不断上升。
- 动员发生于整个一场斗争事件当中。在我们的模式中出现的机制之间的互动既是连续性的又是重复发生的，而动员则可以部分地被理解为它们之间的一种互动功能。

但在转向互动之前,让我们借助美国民权运动的实例,就这些组成要素的被激活多说几句,以此来说明我们的观点。

从机遇结构到威胁和机遇的归因

“威胁”和“机遇”不能从一些分析家典型地据以建立其分析观点的各种客观变化中自动地被觉察到。让我们回到罗莎·帕克斯,在她那儿,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毫不拘谨的南方女士,自动地利用了机遇的客观结构。她所具有的民权行动主义经历使她以及她在蒙哥马利的支持者们,把机遇不仅归因于在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非正义性,而且归因于蒙哥马利市黑人居民潜在的经济影响力。引发公交车抵制行动的不只是作为一种环境机制的城市化,而是对蒙哥马利市的经济有赖于黑人工人和黑人消费者的认识,以及认识到如能有效地动员这一资源,就会赋予运动对蒙哥马利市的当权者施压的机遇。

机遇和威胁并不仅仅是由运动中的行动者来解释的。民权运动产生于对联邦政府官员吝啬的改革努力的回应,这种改革态度给了黑人造反者坚持他们要求的更多方法。不过,尽管注意到这方面的便利条件,分析人士们还是已经从总体上将他们的注意力局限于运动之逾越界限的阶段上。这既夸大了冲突的大众阶段的特殊性,也妨碍了对于作为一个整体而展开的事件的清晰理解。我们并不是把造反者视为环境刺激因素的唯一解释者,而是认为,当挑战者、政府成员和普通国民在寻求理解他们的处境和依据对现实的解释而形成其行动路线时,他们同时对变化过程做出反应并且同时对他们各自的行动做出反应。

在民权运动中,不仅建立了一些民权团体,而且,一些联邦政府官员(尤其是行政和司法官员)和南方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也把威胁和机遇归因于日益进展的和不确定的环境,并依据这些考虑而行动。早在1946年,与传统的第一次决裂就已出现,当时,杜鲁门总统任命了一个民权委员会,责成它调查“国内现行的民权改善办法,并且为那些已暴露出来的缺陷提供合适的立法补救措施”。即便有联邦政府的这种努力,但民权团体的行动如同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和其他组织一样,仍在不断升级(Lawson 1976;McAdam 1982;Meier and Rudwick 1973)。面对联邦立法和日益增长的黑人行动主义的双重威胁,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也变得更加不安分。杜鲁门政府时期,南方白人也开始背弃在南方一向稳固的民主党。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一些年里,“南方各州与本党持不同政见的民主党党员的反叛”行动,因沃伦为首的最高法院的司法行动主义而得以扩大。 46

作为对抗议增多以及对传统上一向投民主党票的南方日趋加剧的分裂所作的反应,在国会只拥有微弱多数的肯尼迪政府开始将争取美国黑人选票视为一种机遇。但这也并不是客观机遇结构的自动开启,它还必须被理解、被建构并被小心地加以权衡,以应对南方白人的背弃行动和北方工人阶级缺少民权热情的威胁。只是在好一番犹豫之后,政府才开始将民权视为应被抓住的机遇,而不管由此而带来的政治风险如何。

留意一下我们从蒙哥马利来到哪儿了。抵制乘坐公共汽车行动并非运动的开端,而是作为一场全国性冲突中的逾越界限的局部事件出现的,这种全国性冲突发生在蒙哥马利事件之前多年,并且包括了行动者对威胁和机遇的互动性归因在内。

从动员结构到社会利用

挑战者利用充分的组织和大量人员以提供社会的/组织的基础——而不是组织本身——的能力,是使动员成为可能的前提。可能的行动主义分子(其成员数量不亚于挑战者和普通国民)必须要么创造一种组织载体,要么利用现存组织并将其转变为用于斗争的工具。在民权运动的例子中,它表现为多半来源于黑人教堂的当地社会网络,但是直到群众运动崛起时为止,黑人教堂还仍然是一个总体保守的机构,它明确强调的不是“行动的社会福音”,而是实现来世的报偿(Johnson 1941; Marx 1971; Mays and Nicholson 1969)。为了把一些黑人会众变成集体抗议的工具,运动的早期领袖们甚至不得不从事创造性的文化/组织工作,由此而使教会及其集体认同的目标得以重新确定,以与新出现的斗争目标相一致。

如同机遇和威胁的归因,社会利用的过程适用于一次新出
47 现的斗争事件中的所有各方。和普通国民一样,政府成员和挑战者们也面临着动员组织资源的问题。所有这些行动者们都有可能必须与既有的组织领袖们发生争论,这些领袖们不赞同他们将近期的重大事件解释为实现群体利益的重要威胁或者机遇。在社会利用方面,政府成员和挑战者们比普通国民占有一种明显的优势。对政府成员和挑战者而言,绝大多数不断发展的对于环境条件的解释发生在正式的组织之内,这些组织适合于保护或拥戴那些已经妥善确立的利益,且被组织在明显与这些目标相连的稳定的集体认同周围。

从策略性构造到社会建构

尽管存在于运动的成熟阶段中的构造努力不乏其重要性，但它们还是取决于特定的斗争事件进程中更早且更具偶然性的解释性“时刻”。前面两小节集中关注的便是这样的时刻。早在马丁·路德·金无与伦比的构造能力得以展现之前，正是那些已出现的政治行动者们对新的威胁和机遇的集体解释和归因，引发了冷战时期的民权斗争。后来，又是在蒙哥马利所进行的解释性努力，将黑人教会转变为一种合法的动员工具，由此而导致斗争进入逾越界限的阶段。

惟其如此，与图 1.2 所描绘的经典研究议程形成对照的是，我们并不把构造视为斗争政治发生时的一个独特的“方块”或变量，对我们来说，构造与解释远不止意味着一场运动的目标是如何策略性地形成的，而更是一系列的解释性过程，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导致一方或多方把威胁和机遇归因于新出现的冲突，以及对与既存社会地点和/或认同相联系的合法目的进行重新想象的那些。简言之，如同所有的社会生活，动员自始至终充满着集体性的解释和社会建构的努力。

从逾越界限的手法到创新性的集体行动

最后，我们通过集中关注典型地发生在斗争事件爆发时的集体行动地点、形式和意义方面的创新性变化，由此而让静态的斗争手法概念动起来。

48

大体上，共有的知识、关键人物之间的联系以及发生于现场的指导是集体行动之流的方向指南。提出要求者通常与他们的

要求对象、重要的听众以及公共权力机关的代表们发生策略性的互动,他们也常常必须与他们的竞争对手或敌人展开斗争,而所有这些互动都是从以前的关系和累积而成的经验出发的。为此,我们可以将斗争手法当成是表演行为——就像出现在爵士乐或者街头戏剧的即兴表演方式中的互动,而不像艺术歌曲或宗教仪式中更具重复性的常规表演所体现的互动。这样的表演行为组成了手法——一大批为人熟知的作为一个特殊系列的行动者之特征的可能的互动。

这些表演行为在旧有手法的基础上创新,并且常常结合着集体行动的仪式形式。创新性的斗争指的是这样一种行动,它结合了多种要求、选取了要求对象、包括了集体的自我表现(self-representations),并且/或者采用了没有先例或为现行政权所禁止的手段(参见第一章)。在民权运动中,每个新的创新阶段和每个新选定的联系地点,都部分地是对当局就前一阶段所作反应的回应(McAdam 1983)。斗争手法的发展是即兴之作和斗争的结果,但在任何特定时间内,它们都限定了那些对当事各方来说是可行的和可以理解的互动的形式。

创新并不仅限于挑战者,在美国民权斗争的例子中,对战后世界持一种新的同时也是更为不确定的看法,导致一大批团体——政府成员们、挑战者们、普通国民——在“黑人问题”上展开创新性行动。出于对拒绝维持现状的愤怒和恐惧,从1948年南方持不同政见的民主党人的反叛到“白人公民委员会”的建立,再到1950年代中期持续至后期的“大规模抵抗”运动的展开,种族隔离主义者以大量新颖的方式做出了反应。受共产主义威胁的困扰,某些联邦政府官员放弃了国家在种族问题上由来已久的“不干涉”政策,而赞成发动一场意义重大的民权改革运动。受联邦政府政策明显转变的鼓舞,新的民权团体加入到

旧民权团体中,共同投身于一场持续开展的创新性造反运动之中。

不过,被冲突各方所采纳的创新性行动形式却几乎没有多少真正的新意,毋宁说它们是对人们所熟悉的例行做法的创造性的修改或扩展。例如,司法部的律师们对于“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向法庭提出辩护并不陌生,但他们在此之前却从未代表民权运动中的诉讼当事人如此做过。同样地,南方白人自黑人来到这个大陆时起,就忙于用暴力反对这些美国黑人,但却是民权运动引起他们以新的、一致的方式去从事爆炸、殴打和谋杀行动。最后,在逾越界限的斗争阶段充当先锋的黑人教众也只是将熟悉的教会常例改造得适合于运动的需要而已,教会的习惯做法变成了“群众集会”的行为脚本。只是稍作改动,传统的福音赞美诗就成了“自由之歌”。如同马丁·路德·金所说:

我们在群众集会上征求志愿者时的情形,与每个星期天早晨发生在黑人教堂里,牧师向到场者发出要他们加入教会的召唤时的情形非常相似。人们或二十或三十、四十地前来加入我们的队伍。[King 1963:59]

我们已走了多远?

我们从以上所概述的有关动员的观点中看到三个主要的优点,这些优点对应于较早提出的针对经典社会运动研究议程的各种“反对”意见。

- 首先,对图 1.2 所示的经典社会研究议程和我们在图 2.

1 中所提出的框架加以比较,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我们从静态的变量向动态的机制的转变。在其中,动词取代了名词,而被我们用来取代对机遇、组织能力以及某一特定的“动员结构”中可用的构框架与手法的一种客观叙述的,则是对内部的辩论及互动性过程——社会群体通过它们以寻求确定一种共有的集体目标感和认同感并据此而行动——所进行的动态分析。

- 我们所采取的新视角也使我们得以超越经典社会运动研究议程所体现的单一角色框架。诚然,甚至在图 2.1 把这种互动的范围描述为仅包括斗争中的两方时,也只是对它做出了不够充分的陈述,但即便当我们仅仅限于两个行动者时,我们的总体指向也应该是清楚的。所有的政治——逾越界限的以及有节制的——都通过包括政府成员、挑战者和普通国民在内的互动而运作。
- 图 2.1 的第三个含义涉及到具有时限的“起源”概念与更具总体性的动员过程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通过一场具体运动的起源对此做了说明,我们认为动员的发生贯穿于斗争事件的始终。进一步地,我们认为:图 2.1 所提出的框架能够帮助我们首创对遣散以及动员的分析;事实上我们将坚持认为这一框架对于常规政治和斗争政治同样适用。
- 我们的研究议程最重要的含义,是强调斗争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得到发展的,强调将社会建构置于我们所作分析的中心。

我们已经通过对一场著名的社会运动的描述,说明了这一点,但我们认为,我们所推演出的诸机制也同样结合在一起而出

现于其他形式的斗争中。罢工浪潮的兴起、宣战、民族主义事件或者民主化的启动,也包含着对机遇和威胁的互动性归因、现存机构和组织的利用、盟友和敌人以及好与坏的构造或再构造,以及集体行动的创新性形式和有节制的形式之相互结合。如我们将要在下面看到的,1789年巴黎的革命提供了王室军队采取主动的大量实例,而意大利的斗争则更多的是由警察、一些政党或第三方的行动引起的。在后来的几章中,我们还将看到,类似的动员过程可以从诸如茅茅起义这样的反殖民运动、菲律宾的所谓“黄色革命”这样的民主化事件中,还有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事件中被观察到。一旦我们从经典社会运动研究议程的静态组成要素转向一种以动员机制为基础的动态模式,这一模式便可以适用于各种形式的斗争。

不过,我们绝不能声称得太多太早,在我们能够将这些观点调动起来之前,还需要去做更多的理论和经验的工作。一则我们到目前为止还只是探讨了一种斗争形式——社会运动,随后几章将探究我们所提出的框架如何很好地适用于其他形式的斗争。其二,斗争并不仅仅是由动员组成,斗争过程交织着环境压力以及其他的过程与机制。比方说,我们到目前还几乎没有注意到行动者及其行动和认同的形成与转变,我们也还没有分析诸如动员的扩散、镇压对动员的影响、激进化或温和方式的冲击 51 以及不同挑战者之间的关系这些持续的斗争行进轨迹的诸多特征。要具体说明这些机制与过程的作用以及它们与动员之间的互动作用,我们首先还是回到我们的另一个基准案例——1789年法国革命的发生,然后再转向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意大利斗争。

起义的巴黎人

迫于国家无力偿还因战争而带来的债务,也由于强迫最高法院授权其征收新岁入的企图受挫,以及在那些无权征收国家岁入的地区建立新征收机构的尝试同样受挫,加之因政府拖欠债务而对未来的债权人和保证人的过于依赖,1789年5月初,路易十六不太情愿地在凡尔赛召开了法国三级会议。经过一场由预备会议、选举、散发小册子、举行辩论和起草“陈情书”——陈述冤情和建议——组成的全国范围的运动之后,三个等级(教士、贵族和平民)的全国代表出于不同的意图拥入凡尔赛。

国王想干脆利索地解决财政危机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在一些分别开会的教士和贵族代表加入后,第三等级的代表会议于1789年6月17日宣布它自身就是真正的国民大会。

“什么是第三等级?”西哀耶斯(Abbe Sieyès)在这次形成认同的革命中第一次深思熟虑地试图重塑认同,他不无夸张地问道。“(第三等级)就是一切。”他同样不无夸张地回答道。

“在到目前为止的政治秩序中,第三等级一直又被当成什么呢?”“什么都不是。”他自问自答道。

“它现在想要成为什么呢?成为值得重视者。”他最后说道。[引自 Swell 1994:41]

7月7日,由第三等级成员掌握的新国民大会提名一个委员会起草宪法。

在那些早期的日子里,第三等级并非仅有的一种新出现的

政治认同,在巴黎附近,演说者们正在鼓吹对像王室宫廷这样奢侈靡费的地方进行彻底改革,军队的士兵也宣布他们不愿采取反对平民的行动,巴黎的选民们则正在市政厅就采取过激措施展开辩论,而与此同时,一批又一批的巴黎人也正在聚集起来开展游行进军,并喊出对他们日益看作国家的代表的人们的支持。52 当国王于7月11日解除为人们所喜爱的财政大臣雅克·内克的职务并将他流放外地之后,12日(星期天),聚集在王宫的人们从库尔提斯蜡像馆带走内克和奥尔良公爵(一向有大方之名的国王的侄子)的半身像,然后组成一支五千人的队伍,打着哀悼的黑旗游行穿过巴黎的许多街道。游行者与旺多姆广场和杜伊勒里宫的王室军队发生战斗,但在场的法兰西卫队(同样属于王室军队)的士兵们却加入群众队伍,一起展开对试图清场的德国团队的进攻。

当天,坚定的人群还释放了关押在拉福尔斯和巴黎裁判所附近的附属监狱中的囚犯。傍晚,一些组织起来的抢劫者们又毁坏了巴黎外围的收费站,洗劫了圣拉扎尔修道院,闯进市内的许多武器商店。到这时,法兰西王家卫队要么拒绝执行命令,要么积极参加对监狱和其他专制堡垒的进攻。次日(7月13日),巴黎的选民大会在市政厅举行会议,会上成立了一个全市性的民兵组织和一个负责对它进行管理的常设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向选民们许诺:只要当前的社会问题和毛病还在持续,他们就不会放弃对市政厅的控制,以巴黎人的名义,他们公然地向统治巴黎的王室权威提出挑战。

这些步骤累积而形成革命,因为就在法国的心脏地带,他们已建立起一个拥有由他们自己所掌握的军事力量的自主权力机构。市内一些教区大会的代表们则敲响教堂里的鼓或拉响教堂的警钟(发出集体危机信号而急速响起的教堂钟声),并在全

市教堂举行紧急会议。许多地方大会也创办民兵组织,然后派他们去支持委员会。“当各大会集会时,”西米恩—普罗斯珀·哈迪说道:

在街上看到的尽是以各种方式武装起来的人们,许多人衣衫褴褛,他们手里拿着来复枪、刺刀、剑、马刀、手枪、带金属尖头的棍棒,如此等等。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喊着“第三等级万岁”的口号,这口号似乎已经成了他们的集结号。
[BN Fr 6687]

进入斗争事件的第三等级,当初是作为一个抽象的社会范畴被邀至凡尔赛为国王征收新税投票的,至此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认同。其他人——由巴黎的斗争的扩散所致——也很快投入行动。在市政厅,民兵们意欲前去与正在由凡尔赛向巴黎进发的第三等级代表们会合。大约晚上八点,哈迪看到:

七八个第三等级的骑兵,后面跟着约三百名法兰西卫队士兵、掷弹兵和其他兵士,全都武装整齐并且踩着鼓点一路进军,带队的是几个军士而没有军官,跟在他们后面的则是数量惊人的一大群造反者,他们也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武装起来,身着式样各异的制服,并且也带着鼓。据说,他们是去“沙滩广场”,在八十名从凡尔赛来的代表到达市政厅时,去迎接这些代表们。[BN Fr 6687]

7月14日,当警钟又一次响起时,市民们在他们各自的教区里聚集起来。大约七千人去到伤残军人院,在那,他们向住在那里的一群半退休的老兵们(伤残军人)要求得到武器并且将武

器——十二门大炮和三四万支来复枪——拿到手。

下一站是在城区外的巴士底，那儿从13日傍晚就开始聚集了不少人。市政当局匆忙将一大批弹药运抵这所历史悠久的监狱和要塞，交由巴士底狱的监狱长德洛内侯爵保管。当这位监狱长拒绝交出弹药和要塞时，人群中有人闯进了要塞外围的院子里，那儿，一小股士兵向冲进去的人们开了火。普通市民和王室军团中一些不满的士兵们随即纷纷拥向巴士底，开始向要塞发动攻击，并运来大炮向里面开火，经过大约三小时的包围，终于迫使要塞内的守军投降，其间，有一名守军和几百名进攻者死亡。得胜的巴黎人报复性地释放了巴士底狱的七名犯人，集体处决了六名驻守士兵，还杀死了德洛内，并且抬着他的首级到街上游行。他们同样也将常设委员会的主席雅克·德·弗莱塞勒(Jacques de Flesselles)斩首，他因拒绝给巴士底的进攻者们以枪支弹药而被控背叛了人们所从事的事业。

这些行动已在很大程度上转向逾越界限的斗争政治，并且确实也已在很大程度上发展到了对君主的冒犯和革命。尽管巴士底要塞本身几乎没有什么战略价值，而且进攻要塞者也仅仅放走了七名囚犯，但反叛的王室军队、民兵以及普通市民毕竟还是合力夺取了一座有名的监狱兼要塞并处死了它的长官。比起“国民大会”举行辩论的那些天来，如此行为远为突出地表明了政府的脆弱不堪。到7月16日，国王将内克从他的老家瑞士召回，并且命令围在巴黎和凡尔赛四周的部队撤回原来的驻地。一天后，两边分别由两百名巴黎民兵骑手和一百名国民大会成54员伴随，国王本人来到了市政厅，由此而象征着国王已经接受了新体制。自1648—1653年的福隆德运动以来，还从没有民众起义迫使国王做出过如此之大的退让。

不过，1789年7月12—14日上演的几出戏，也还是利用了

人们所熟悉的一些脚本。在得到有关方面适当的官员授权时，召开教区大会和巴黎市大会、组建民兵、打着旗帜列队游行都属于既存的旧政权对危机所做的反应。斩首和将首级示众则属于王室刽子手们为犯有叛国罪的贵族们所预备的罕见并且臭名昭著的惩罚手段。通过不经王室批准并且伴之以武装进攻的方式而做出这些行为，巴黎人正在从事创新，正在擅自行动并且正在慢慢滑向革命，但他们同样也还是在大量地援用旧政权留下的先例。

谁是谁？

这些重大事件之更大的创新则在于谁在行动以及以谁的名义行动——在于凡尔赛和革命的巴黎所发生的集体认同的激活、创造和转变。作为第三等级的成员，作为归属于国家而不是君主政权的公民，作为自己组建的民兵组织的参加者，以及作为合法当局的可辨认的敌人，巴黎人正在形成新的身份认同。他们还在构建像革命或反革命、爱国者或贵族、公民或臣民这类成对的身份认同，而在这些身份认同中，无一是一是仅仅基于个人所具有的稳定特性，也无一成为任何个人之唯一标记。所有这些身份认同都和其他诸如木匠、教区居民或夫（或妻）这样的身份共存的，所有这些身份之间都存在着彼此死命相争的边界，并且作为一种与其他各方的互动功能而不断地发生变化。不过，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这场革命之斗争政治的参与者和观察者们说起来和做起来，就好像爱国者或共和派这样的身份是连贯的、真实可靠的和让人非信不可的一样。就这些方面来看，革命的巴黎所出现的身份认同，只要它们在任何地方开始发挥作用，它们就与政治认同相类似。

政治认同的形成事关紧要,这倒不是因为它影响了学者们之间展开的交流和争论,而是因为两个远更深刻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它们事关参与者之间的激烈争执,其次则是因为认同问题 55 影响到对斗争政治过程的总体解释。为此我们提出——并且试图协调——有关政治认同的创造、利用、激活、转变和遭到压制的六个不同观点。

1. 斗争政治的参与者始终操纵、谋划、修改和重新解释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斗争各方的身份。
2. 在形式殊异的斗争政治中,认同的动员构成了提出要求的一个主要部分。
3. 当新的身份认同在斗争事件进程中出现时,绝大多数的个人最初是通过互动性地诉诸现有的身份认同和成功利用现有的身份认同而参加到冲突中来的。
4. 认同动员的形式、内容和有效性强烈影响集体行动及其结果。
5. 在斗争进程中,行动者、认同以及行动方式的创造、转变和消失改变着行动者、认同及行动在日常政治中显现出的样式,并且一旦特殊的斗争事件结束,便会推动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6. 在着手解释斗争政治时,寻求因果机制的关键不在于个人的心理而在于社会互动。

这六点主张意在解释对斗争政治中的行动者的形成与转变——它与动员过程发生互动并且确实影响到动员的进程与结果——做出十足动态的和相关性的分析。

为什么我们要把对行动的分析与行动者以及认同结合在一

起呢？此系我们对斗争政治所持互动看法的结果。在我们看来，行动者并非拥有固定特征、被严格界定且自我推进的实体，而是深深地嵌入社会并被社会性地构成的存在，他们与其他同类社会存在不断地形成互动，并且在互动中改变其界限与特征。行动也不是由个人经过自我权衡后的能量释放所组成，而是形成于这些社会存在之间的互动。认同则并不内在于这些社会存在者固定不变的属性中，更不要说内在于他们的意识状态中，它们只是内在于这些社会存在者之间的关系及其所卷入的互动中。在这些看似单一的行动者内部，仍然不断地进行着协调、磋商和改变。斗争政治不仅激活此前就已存在的行动者们，它还使行动者们投身于一系列互动性的行为——我们所说的手法——中，这些互动性的行为是通过在各种脚本和组织压力中不断的即兴发挥而持续进行的。斗争在它进行的过程中，改变着参与行动的各方、行动中的关系以及行动的形式。

我们对于行动者、认同和行动所持的相关性观点，能够用来和另两种时下流行的斗争政治研究方法——理性主义和文化论的方法——形成对照。

- **理性主义**：在把利益和行动能力视为给定的和以个人为基础的，把斗争从形成决策到行动再到结果的整个轨迹视为要么是给定的要么就是不成问题的，并把集体决策完全看成是个人决策的放大的形式时，理性行动理论家们就注定要为他们自己在解释社会互动——包括公然的斗争在内——及其结果如何改变行动者、行动以及认同时带来麻烦。当我们要求理性主义者们对 1789 年 7 月 11—14 日发生在巴黎的斗争做出解释时，他们可以告诉我们对于国王、内克或弗莱塞勒来说，处于危险之中的

是什么,但当他们开始解释作为一种政治范畴和一种动员象征的第三等级的突然出现,或者开始解释作为主要行动者的民兵和许多委员会的突然出现时,他们就会显得犹豫而结结巴巴。事实上,正是这些难处促使理性主义分析者近来开始了对背景、信任、第三方关系以及多方博弈的仔细研究(例如:Bates, et al. 1998; Burt and Knez 1995; Gambetta 1988, 1993; Greif 1994; Greif, Milgrom and Weingast 1994; Lichbach and Zuckerman 1997)。

- **文化论:**我们的方法也有别于近期出现的对斗争政治的文化解释。比起他们的理性主义对手来,这些方法更为关注的是认同的建构,不过在他们的叙述中,建构和解释发生在人们的头脑里。行动来源于现象学的状态,而认同则构成现象学状态的最重要方面之一。因此,在某部流行的著作中我们看到:要成为一名积极的参与者取决于采取某种心态——通过把自己“想象”成某个民族的一员(Anderson 1991)。不过,就在如此深陷于现象学之际,文化论者也就使他们自己失去了描述(更不要说解释)集体表现是如何变化的、集体意识状态是如何对斗争互动产生影响的这种可能性,失去了探究作为形成行动者和认同之建构场所的斗争互动的可能。例如,文化论者对于阻止路易十六在1789年7月恢复对巴黎的军事和政治控制之努力的过程,就无法提供说得过去的因果解释。 57

作为近期大量关注这些问题的结果,理性主义者和文化论者都开始认识到,斗争政治始终涉及诸如土著人或女权主义者这类相关政治范畴的社会建构,始终采取与同盟、支持者或要求

(被大大限制于已知的提出要求的形式之内)的目标发生互动的形式,并且也开始认识到,缺少以先前的斗争和/或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作为重要基础,斗争政治中的动员便不可能进行。通过把社会互动作为认同在其中形成、联合、分裂、转变并与其他过程如动员相互交织的发生地点而加以集中关注,我们的相关性方法在这方面走得比理性主义者和文化论者更远。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们将阐明认同形成是如何与我们在本章第一部分中所概略介绍的四种动员机制产生互动的。

创造共和派

从7月14日之后对进攻巴士底狱所作的圣化传说(hagiography),到革命节日的编排策划,再到有关革命纪念碑采取何种形式的争论,以及共和国的服装与世俗宗教的设计出台,我们对那些为将法国转变为共和国而斗争的人们是如何努力重塑法国人的认同的,已经所知甚多(Hunt 1984; Ozouf 1988; Schama 1989)。但由于许多作者都只是静态地关注文化对象并且着力于使他们自己远离政治史,从而使他们的著作缺少了认同形成与政治动员之间的明确联系。随后几章将详细关注各种不同情形下的认同形成机制,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案例当数南亚和南非的斗争(第五章),其他的案例是民主化的西班牙和内战前的美国(第六章),以及民族主义化的意大利与发生解体的苏联(第八章)。眼下,还是让我们对行动者和认同改变与动员机制——这些机制我们已在图2.1中将其单独列出以提请注意——之间的相互交织,做一番说明好了。

首先,让我们回到触发整个过程的环境机制。在法国,我们看到,认同建构奠基于社会变化过程之上。尽管第三等级作

为一种政治范畴只是出现于 1789 年,但它的根基却存在于革命 58 前几十年非贵族的和非教士的财富累积之中。倘若西哀耶斯针对第三等级而提出的要求,未能以其普遍性和杰出而在三级会议的全体代表中间产生真实相关的共鸣,则他那篇著名的文章就会根本无人理睬。而且,法国的认同建构也并不是发生于国家真空之中,已然成为共和派认同标志的“爱国者”一词,其实是取自发生于此前几十年的美国革命和荷兰革命(Schama 1989: ch. 7)。

其次是关于机遇和威胁的归因,出现于革命早期阶段的新认同,很快就被用来将新的行动者团结到一起,以反对他们的敌人和坏人。被动员起来的巴黎群众因受到斗争第一阶段涌现出的成对的身份——革命派或反革命派、爱国者或贵族、公民或臣民——的触动而变得群情激奋。尽管许多早期革命领袖来自于贵族(想想拉法耶特和米拉波),对反对派的攻击会随着他们被贴上贵族或反爱国者的标签以及进攻者开始将自己视为爱国者或共和派而变得愈益残酷。关键的动员事件常常取决于这些已得到动员的认同的展示及其变化。例如,当国王被强制带到市政厅,当一顶革命的小软帽被不敬地强加于他头上时,他对共和派的屈从实际上已经达到顶点。

第三,关于对现存组织的社会利用,在攻打巴士底之后,所谓“市政革命”将斗争行动中的新认同动员起来:以革命的名义,各地的共和派团体利用当地政府作为地方革命的工具,从而为未来的拿破仑帝国和联邦派运动奠定了基础,其中,联邦派运动最终将在法国部分地区造成反对巴黎政权的地方叛乱。至于教会,教士的公民宪法(Civil Constitution)具有同样的极化效果:该法成功实施的地方,世俗化过程就会使宗教变得有利于建国目的;而该法遭到失败的地方,它就会引发共和派与正统主义

者、教士和农民所组成的联盟之间的残酷内战(Tilly 1964)。

59 第四,关于构造,整个革命的十年构成了在认同、意义和仪式的构造和重新构造方面的一项研究课题。莫纳·奥佐夫有关革命节日的著作(Ozouf 1988)和林恩·亨特有关革命纪念物和服装的著作(Hunt 1984)以及有关王室家庭遭贬抑的著作(1992),为我们揭示出,认同象征是如何被用来制造共和派身份和否定君主制的。这些运动以新的或改变了的认同之名,动员了法国的男人和妇女,使他们所要针对的目标失去合法性——它们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革命官员有时候也不得不阻止那些因深刻的认同两极化而热情高涨的公民们对想象的贵族和特务的狂热进攻(Hunt 1984:52)。

最后,创新性的集体行动有赖于也有助于形成有关成员、挑战者和普通国民的不断变化着的定义。政府既规定、容忍或禁止提出要求的做法,又对不同行动者做出不同的反应。他们承认某些行动者(如1789年的王室军队)为政府的代理人,把另一些行动者(如选民大会)视为政府的成员,而某些行动者(如民兵)则被视为已形成的不合法的挑战者,还有某些行动者(如巴士底附近街道上聚集着的人们)则被视为缺乏行动能力的普通国民。在那种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已是相当清楚的相对确定的情形中,普通国民以及某些已形成的挑战者们会依然处于不活跃的状态,但随着不确定性的日益增长,这两类行动者都会转向只是被容忍的行动和遭到禁止的行动。当不确定性达到顶峰时,甚至政府成员也会诉诸遭禁止的做法。不过,在绝大部分时候,政治行动者越是得到承认,其通过指定的或被容忍的政治渠道而提出要求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巴黎的起义增加了整个法国的不确定性,这便激起了遭到排斥的行动者们(包括受压迫的农民)采取只是被容忍的和遭禁

止的提出要求的形式。甚至政府成员对 1789 年夏天的不确定性所做出的反应,也是由被指定的斗争形式转到被容忍的斗争形式,偶尔还转到被禁止的斗争形式。由于斗争互动使权力当局卷入其中并且产生出新的权力机关,斗争中的人们开始替政府做出对被禁止、被容忍和规定做法之间界限的重新划定。例如,在下一年里,民兵大会就从被禁止或勉强被容忍的行动特征,走到形成法国政治生活的标准行动特征这一步。一再闯进国民大会或国民公会的巴黎群众在做出如此举动的时候,是抱着这样的信念的:他们代表着人民,并且有权把他们的要求加之于他们的代表身上。

60

让我们对斗争行动者的策略性处境作一番提炼。考虑一下这种情形:某个社会性形成的行动者——比方说,1789 年 7 月 13 日,巴黎的一个民兵连——发觉它本身已处在斗争过程中的一个特定时刻。从处于斗争间歇时的单个行动者的角度来看,许多互动都是可能的,每一种互动都会产生可能的结果,这种结果的分布状况是我们所假定的行动者根据以前与类似的支持者、盟友、要求对象和并非要求对象却有权进行干预的当局及旁观者之间的互动,而做出估计的。我们所假定的行动者从两个方向进行推论:从行动到后果(如果我们做 X,那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和从后果到行动(如果我们想要后果 Y,那么,什么样的互动可能会产生这种结果,又有多大可能性呢?)。发生在集体行动者内部的组织、评议和磋商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由创造有关这些格栅之内容的临时性协议,以及通过它们形成路径选择而组成,但斗争性的提出要求及其所造成的现实后果持续地改变着这些格栅,由此也不断改变着互动的可用形式及其有效选择。不妨把我们已经构想出的这一幕想象为一部电影长片中的一个镜头好了。

在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的血腥对抗中,我们所看到的正是类似这样的电影画面在不断呈现:要塞里面的军人形成他们对于形势的理解,一群又一群的士兵和市民聚集在要塞外面,整个行动则经历了从派代表谈判到武装对抗再到死刑执行仪式的举行这些不同的场面。而且,在一些回忆性的叙述中,要塞外面的人成了唯一的英雄式的行动者:征服了专制堡垒的意志坚决的人民。于是,因连续的互动——既在社会地形成的行动者之间又在他们自身内部——而引起的行动之社会建构发生了,并且出现了变化。概言之,图2.1所提出的有关动员的四种机制图式的纯粹形式,需要和新的行动者及新的认同的形成相交叉,并且,这一图式也还需要与这些新行动者和新认同通过斗争政治的具体行为而与其他因素发生互动的方式相交叉。

我们如何继续前行呢?我们采取的是如下五个步骤:

61 **第一步:**辨识斗争政治中的行动者、行动及认同之偶然的、集体的和建构的特征。这种辨识将会对我们解释斗争参与者实际动员起来、实际经历并实际加以运用的各种认同发生变化的原因起到突出作用。通过1789年巴黎的例子,探究巴黎人是如何制造、改变以及表现革命派、公民、民兵组织的成员和第三等级这样一些社会关系范畴的。

第二步:详细说明日常的非斗争政治中的行动者、行动和认同与凸现于斗争中的认同之间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它们是相似的或是不同的?通过1789年巴黎的例子,我们将详细说明,对应于贵族—平民、教士—教区居民或老板—工人的既存的社会联系及社会实践,是如何转化为爱国者—贵族、公民—当选官员和士兵—民兵这

类新的对应关系的。

第三步:详尽说明发生在行动者所处环境中的(a)行动者、行动和认同的建构与利用,与(b)有关的行动者、行动及认同与变化着的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发生革命的巴黎为例,对民兵常设委员会成为以国家的名义、通过采取人们在一两个月之前绝不敢问津的行动而集体夺取权力的核心这一过程做出解释。

第四步:对斗争本身是如何改变认同,以及这些转变又是如何改变斗争的特点及其效果的,做出分析。就巴黎所处的形势,说明夺取巴士底是如何以及为什么重新定义了谁是国家的主要代表,以及他们彼此之间是如何建立联系的。

第五步:探究斗争过程中,行动者、认同以及多种形式的行动之被创造、转变和消灭,是如何既改变着逾越界限的斗争政治,又在一段特殊的斗争时期结束之后改变着日常政治的。比如,在法国的例子中,通过探究扩散途径、镇压所造成的压力以及激进化所造成的张力是如何产生出一个日益极化的政府的,来追溯 1789 年 7 月动乱的斗争过程对于巴黎以及整个法国政治在随后几个月里所造成的冲击。

这就将我们带到斗争轨迹的总体问题上去了,而斗争与其说是一个过程,还不如说是各种像动员、行动者建构和极化之类过程前后相继地发生于其中的场所。现在,让我们转到我们的第三个基准案例,利用与动态过程典型性地联系在一起的一组 62 机制,以对一种属于此类范式的互动加以阐明。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早期的意大利抗议运动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起作用的动态机制。

斗争中的意大利

1967—1968 学年度,拖延已久的关于改革意大利陈旧的教育体制的议会辩论,终于在罗马拉开帷幕。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经济奇迹的一项副产品,数千名新生涌入大学,但迎接他们的却是糟糕的设施条件,与渴望保持从法西斯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精英教育体制的教授们。不过,如同民权运动和法国第三等级的例子一样,环境变化引发出我们的故事,却绝不能对它做出解释:就在社会主义、基督教民主党以及一些中左派小党组成的联盟开始吵吵嚷嚷地商议大学改革问题时,官方的学生组织——它们中的绝大部分要么是社团主义的,要么就依附于主要的政党——也在寻求对议会辩论施加影响。在这一方面,他们的做法可能难以奏效,但他们中的激进的少数派却利用了这些组织机构,并且抓住教育辩论的机遇,使之服务于他们自己的目的,其办法是把问题构造为并非对于负载过重的体制进行技术性改革的问题,而是学生从他们所在的大学当局那里获得“自治”的问题。围绕着这一主题,他们还发展出一整套的斗争行动手法,旨在既从他们所属组织的领导人那里,也从直到当时一直控制着他们的政党那里,获取并建立他们的自治。

这一事件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是因为它起始于一场有节制的斗争,其次是由于它生动说明了我们为动员机制所列出的清单(Tarrow 1989:ch.6)。最为重要的则是:它有如一座熔炉,新的学生认同在其中形成,新的行动者也从中产生。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以及天主教的不同背景的学生行动主义

分子们,将他们的要求和主张,围绕从独裁的大学组织机构以及政党所领导的学生组织的高压下获得自治这一主旨而结合起来。这一建构行动部分地发生在人们的头脑里——比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作,一时成为人们争相求读的热门书——但主要是通过学生在所选择的斗争手段(占领教师大楼)内部所进行的互动而发生的。

占领教师大楼的行动,不只是一种逾越界限的创新性集体行动的新形式,它们也是一些互动性的遭遇:在其中,不同组织的学生们相识相逢、认真展开辩论、参加富有生气的学习小组、计划未来活动、击退外部反对者,以及——尤其是对女青年而言——体验一种摆脱封闭的家庭生活后的个人自由感。一种永久集市的气氛,培养出了一种团结意识,并且创造了对许多人而言将持续一代人时间的紧密联系(Lumley 1990)。

从学生的这些占领行动和认同转变中,产生出一大批新的左翼组织和小杂志,由此并引起一些老的组织和刊物争相跟上意识形态和纲领上的快速变化步伐(Tarrow 1989:ch. 6)。从对它们所留下的档案文献进行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新的组织和杂志在主题以及主题的扩展方面反复出现的激进化过程。第一批新出现的群体,结构松散并以其组织内部的民主和自发性而自豪。外国的模式——毛主义、情境决定行为论、伯克利学生造反行动——与意大利国内的传统如劳工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混合在一起,产生出由一群“小组织”(gruppuscoli)拼凑成的乱七八糟的组合。仅仅是靠着对当局的强烈反对,以及渴望从日益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者、列宁主义者或二者都是的政党负责人那里获得自治,才使得它们统一起来。紧紧追随并继续这些发展情形的法国五月风暴,将意大利的这些情形明确化为一种反独裁主义的模式,并且使学生们得以将他们的运动等同于

一波想象中的将由学生来领导的世界性革命浪潮。

但这一段热情高涨的占领大学时期,很快就失去了它的统一和自发性。尽管马克思主义者与左翼天主教之间旧的分歧已经消失,新的分歧却出现在那些不同倾向和不同领袖的同情者们中间。这些群体开始通过分别开会的方式设计学生大会的决议,并监督学生大会内部的辩论。出于对这种复活了的列宁主义的醒悟,以及对这些团体所热中的无休止的单调辩论的厌烦,也由于受警察日益残忍的驱赶行动及法西斯组织的攻击所胁迫,大批学生开始渐渐离去,留下一个坚定的行动主义者核心在寻求重整旗鼓,并从大学之外寻找新的斗争机遇。继1968年“疯狂的时刻”之后发生的是一个极化过程(Zolberg 1972),这导致了某些行动主义者进入恐怖主义的危险地带,另一些人则开始了一场借助于各种机构而进行的长征(Tarrow 1989:ch. 11)。

两种有些片面的模式

我们如何能够捕捉到意大利学生运动中的动力呢?一些研究斗争轨迹的学者利用了这样两个经典模式:“运动生涯”
64 (“movement career”)和“抗议周期”(“protest cycle”):

运动生涯模式 来自于韦伯—米歇尔斯社会学的核心传统(Alberoni 1968)。它提出的假定是:运动组织之自发的非制度性起源,非激进化和官僚制的线性发展趋势,以及从提倡激进变化的魅力型领袖转向更着意于保护其地位的组织专家(Michels 1962)。其结果是,斗争所展现的不过是一条从运动到利益集团、从某种“萌芽状态”的情绪到理性决策,以及从原则性地反对各种制度到参与实用政治的大致的抛物线(Lowi 1971; Piven and Cloward 1977)。

这一模式适当地总结了 20 世纪初发生在中欧社会民主党那里的情形。但这只是一个单一的运动,而不是长期的斗争事件,并且它所具有的一些特异性,也使得它不适合于 20 世纪 60 年代及之后的运动形势(Calhoun 1995)。因为到那时,典型的运动组织已变成分权的和非正式的组织,行动主义也更可能采取“临时组队”而非庞大的官僚制形式,征募或吸收支持者则系以发动运动作为基础,而不是依靠一大批定期缴费的组织成员(McCarthy and Zald 1977; Rosenthal and Schwartz 1990)。

而且,米歇尔斯模式——尽管是动态的——是线性的和刚性的。如我们提到的意大利的例子所显示的,许多出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运动组织并不与米歇尔斯所预言的非激进化的坚定趋向相符。至为重要的是,运动生涯模式偏重于单一运动中出现的组织所具有的内在动力,将这些组织与影响其目标、组织构成和策略的互动分离开来(Oliver 1989)。其实,恰是这些互动在意大利产生出了新的行动者和新的认同,有助于使某些组织激进化而使另外一些组织制度化,并且推动了斗争事件朝着它不完善的、矛盾的结局前进。难道这些行动者和互动能够被排斥在运动组织的演进之外吗?当然不。这便把我们带到了第二种也是更为雄心勃勃的斗争轨迹研究方法上去了。

抗议周期模式 抛弃了通过单一运动中的组织生涯来探索斗争事件的观念,同时注意到包括各种组织和行动者在内的更广泛的斗争轨迹(Tarrow 1989)。它假定:存在着一个社会体系内的冲突增强和互动加剧的阶段,集体行动是从动员程度较高的社会部门向动员程度较低的社会部门迅速扩散的,斗争形式 65 上的创新速度加快,新的或变化了的集体行动框架被创造出来,以及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斗争相互结合。

一旦超越了运动起源问题,周期理论便成了对经典社会运

动议程的完美表述。它将有关不断扩大的政治机遇、新老组织资源、围绕权利或自治之类“主导框架”而组织起来的集体行动、创新性集体行动的爆发的观念,结合到了一起。它坚持强调不确定性所起的作用,认为不确定性不仅为提出要求创造了机会,也威胁到既有的群体,由此导致提出要求者之间出现争夺政治空间的竞争(Eisinger 1973; Stinchcombe 1999)。在某些著作中,它也对一个周期内的认同改变给予强调(Klandermans 1994)。与运动生涯模式形成对比的是,它把激进化和制度化都视为斗争事件中的重要机制。

互动性是该理论的长处所在。经由公开进行的斗争,挑战者们的行动被传达到其他组织中,他们的行动也为其他组织创造了政治机遇,这便导致政府要想出更多的镇压与推动措施,而运动则以激进化或温和做法对政府的这些策略措施做出反应。经历了从精力枯竭、宗派化到合作的过程,周期即告结束。该理论的弱点则在于,它大体上仍然是一种基于推论性地假定继动员阶段之后有一个明显的遣散阶段的阶段理论,无法对出现于周期中各阶段的动员做出说明,也未能就行动者、他们的行动与认同之间的关系加以理论化。通过将斗争事件假定为重复出现的抛物线形状,周期理论避开了有关周期的内部构成,以及是否存在着采取完全不同形式的斗争事件这样的实质性问题。

我们的视角把我们带到了对有关斗争轨迹的运动生涯模式和周期模式的超越。

- 一旦我们认识到单一的运动深深地植根于不同的斗争背景中,并且在反复进行的动员和遣散、认同形成以及创新性集体行动的过程中与其他行动者发生互动,则我们就会理解米歇尔斯模式的局限。

- 一旦我们了解到斗争轨迹不必采取抛物线的形式,也不曾经过一些固定不变的阶段,而推动其前进的驱动力在于行动者的互动,我们便开始把周期模式看成是一种有关斗争轨迹的经验形式,并且轻易地直接转到为斗争进程提供动力的机制与过程上来。
- 经由了解何种机制与过程启动了斗争事件,以及这些机制与过程将斗争事件带到了何处,我们便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何某些事件只是短暂即逝,而另一些事件则迁延良久;为何某些事件以遣散而告终,而另一些则扩展成为革命;以及为何某些事件在合作结盟与政治文化方面产生出根本性变化,而另一些事件除了留下苦涩的回忆外一无所剩。

注意我们的发现所带有的隐含之义。它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任何模式,也不意味着甚或所有能够想象得出的斗争发生顺序都会实际地发生。相反,它意味着斗争的规律性不在于某些标准的斗争发生顺序——不管它们是运动生涯、抗议周期或者其他什么之类,而在于产生新行动者、排除旧行动者、改变联盟、使重要行动者改变策略的诸多机制。这些机制联结而形成我们随后要加以辨识的过程,目前,还是让我们通过举例说明的方式,仅就这一斗争事件中能够观察到的某些机制略加描述。

斗争动态过程中的各种机制

几乎所有旷日持久的斗争事件都会产生权力竞争机制。我们所采用的三个基准事件都显示出这样的两个机制:

- 以我们所举最早的事件为例：在克兰·布林顿所谓的“温和派的统治”（Brinton 1965: ch. 5）的最初一段时期过后，革命联盟中的激进派成员为争夺权力而展开了对温和派的攻击，在“恐怖和德行的统治”下，他们借助于政府镇压和民众动员的手段，将温和派清除出去。第一批宪政温和派被共和派的联盟所击败，接着是共和派联盟分裂成相互竞争的团体，然后成为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最后，获胜的雅各宾派击败并且消灭了他们的吉伦特派同僚。经过一个极化的过程，法国革命“吞噬了它的孩子们”。
- 美国民权运动的动力也说明了内部竞争，只不过它较少带有灾难性的后果而已。当马丁·路德·金和运动中的温和一派成为主流媒体的宠儿时，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和“种族平等大会”（CORE）联系在一起的激进力量便开始争夺他的领导权，并把民权运动推向更为激进的解释（Carson 1981; Meier and Rudwick 1973）。而且，当运动转向北方，新一代的来自城市少数民族集居区的行动主义分子，更是对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之类群体领导人的温和做法以及对当局的妥协提出指责。
- 最后，我们所举的意大利的例子也提供了权力竞争的明显证据：最先是在较为温和与较为激进的学生群体之间；接着，在较激进的群体争夺支持者的过程中，是在那些采取武装斗争的群体与那些朝着采取更为制度化方式发展的群体之间的竞争；最后，当激进的左翼和激进的右翼为消灭对手中的共和派而战时，争夺则是在他们之间进行的。

一旦专家们就近探究这些事件，他们当然会找出那些有助

于解释每一案例中出现的权力竞争的背景性和历史的因素：引起雅各宾派谴责其对手与敌人合作的外部入侵的威胁；1964年的投票权法案通过后，民权运动中温和议程的枯竭；意大利保留了好战的劳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痕迹的历史反常现象。这些因素作为相同机制的具体表达大体上没有问题。

从有关权力竞争的探究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教益。我们并不是通过深入发掘背景，从而为我们在特定案例中所发现的机制提供其得以产生的证据，我们的计划是要去探究机制出现于其中的特定背景，探究在更具总体性的斗争过程中，这些机制与其他机制之间的联系。我们从这三个案例中寻找出现于其中的机制，不是为了要将许多事件硬塞进一个很大的模子里，而是要去探讨任何我们所发现的斗争过程是否是由同样的基本结构组成的。

我们将从许多斗争轨迹中发现的其他机制是扩散、镇压和激进化。

先来看看扩散(diffusion)，它事实上是与抗议周期相连的一种机制(Hedström, Sandell, and Stern 2000; McAdam 1995; McAdam and Rucht 1993; Myers 2000; Oliver and Myers 1999; Strang and Meyer 1993)。在最一般的层面上，扩散包括任何利用现存的通信路线所进行的信息传输。这里，我们集中探讨这一类型的传送，即：以同样或者相似的样式将斗争的形式和要求传送到不同的空间或传送至不同的部门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地方。我们从法国革命中起义从巴黎的扩散中看到它，从整个农村地区农民的“大恐慌”的传播中看到它，也在使得地方共和派在全国各地取得对城市的控制权的“市政革命”中看到它。我们还从美国民权运动中各种公共场所的“静坐”扩散到南方以外，以及由不同的民权团体组织的各种“自由进军”中看到它。在意 68

大利,我们则在工人运动采纳源于学生运动的“自治”框架中,以及在采用“自治”(Autonomia)作为其标签的议会外群体的一个分支中,看到这一机制。

现在来看镇压(repression),亦即对斗争行动者或斗争群体以及对他们负责的组织所采取的制止或压制努力。尽管形式有所不同,但镇压还是一种可以预见的对斗争的反应,同时其影响也相对可以预见——通常,它会使受到威胁的诸共同体加强抵抗,鼓励组织良好的行动者们逃避监视与改变策略,并使其他各方失去动员或行动的勇气。镇压也可能是带有选择性的,在那种情况下,它孤立了较为好战的团体,并将他们限制在规定的或受到容忍的斗争手段上。它或者还可能是总体性的,在此情形中,它则把温和派推到了极端分子的怀抱。

在所有三个基准案例中,我们都可以找到镇压及其所产生的影响:面对被强制征召加入共和国军队的威胁,法国西部的青年农民们聚集到了教士—正统主义者抵抗的旗帜下。而在面临为更广泛的民权共同体所拒斥,并认识到白人警察对他们所造成的威胁时,黑人集居区的好战分子们则组成了诸如“黑豹党”(Black Panther)一类组织严密的城市团体,他们身着类似军人的制服,挥舞着枪械,并使自由派白人民权支持者开始疏远民权运动。因受镇压而被迫转入秘密活动的意大利学生运动中的一些好战分子们,转而采取仍然能够为他们所采取的仅有的几种斗争方式——使用暴力攻击他们的对手或者国家机关。

下面再来看看激进化,亦即集体行动框架向更为极端的议事日程扩展,以及采取更为逾越界限的斗争形式。

作为迈向激进化的划时代的一步,法国的雅各宾派在1791年投票赞成处死国王,从而关上了革命事业向后倒退的大门。比法国革命较少悲剧性的是,南方民权运动中的机会平等议程

不再具有号召力,使得运动中的青年行动主义分子,开始寻求能够用以保持运动生气并使运动推进到北方的新的行动主题和新的行动形式。而在意大利,当新组成的学生群体为赢得承认和 69 支持而斗争之际,他们争相采取越来越极端的计划和越来越激进的行动形式。

在我们的所有三个基准案例中,扩散、镇压和激进化结合在一起,由此而产生出极化的过程。

让我们退后一步思考:我们并不主张所有的斗争事件都基于同样的机制,或者具有相同的轨迹。实际上,许多事件一直被限制在它们最初的发生地之内,对各种对手也只是形成为数极少的威胁,而且是以对政府提出不高的要求而告结束的。尚有其他因素要加以考虑——某个特定国家的斗争历史,是如何为当今时代提供教训的;其他一些机制如“居间联络”的出现如何能够在意识形态的裂隙上架起联系的桥梁,并且能够阻止权力竞争的发生;或者“激进一翼效应”(radical flank effects)是如何驱使对立的行动者们走到一起,以共同反对极端派的威胁的。本书探究了许多此类机制以多少具有爆炸性的组合方式汇集其中的斗争事件,而在其他一些事件中,斗争轨迹则朝着相对有节制的结局发展。在此,重要的是,不要去推论性地假定斗争轨迹呈线性发展,也不要对斗争的结果做推论性的预见,而是要去辨识构成不同斗争动力的诸多过程以及形成过程的诸机制。

结论与前提

这里,我们绝没有为研究斗争政治提出任何一般性的规律,本书后面的部分也不会做如是想。迄今,我们一直在试图阐明,我们带着这许多松散地联系在一起 的机制与过程,究竟是想要

去到何处。

- 动员过程是由环境变化引起的,而且,它是由机遇和威胁的归因、社会利用、框架、形势和认同的建构,以及创新性集体行动的形成组合而成的。
- 一组机制还需要围绕行动者和认同构成的过程,以及构成这些过程的行动,来加以阐明。
- 常常可以在斗争轨迹中发现的一系列机制,会再现于那些延续时间较长的斗争事件中,它们是:竞争、扩散、镇压以及激进化。

在本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我们将再次谈及这些机制与过
70 程,另外还会加上一些经过我们的研究而得出的其他机制。

更一般地说,用动态的和互动性的斗争解释方法,取代在斗争研究领域一向占有优势的静态的、单一角色模式,这一挑战所产生的是一系列新的冒险。首先,我们必须更深入地发掘动员、行动和斗争轨迹,以期查明内在于它们之中的不断进行着的连续性的磋商。其次,我们必须探究动员、行动者和斗争轨迹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不是把它们视为三个各自独立的现象。诚然,我们最终还将消除这些传统的区分,而赞成将它们看成是源自相同的社会互动连续之流的不同抽象。第三,我们必须将这一分析性的问题,重塑为对解释斗争事件关键特征的那些强有力的、
71 重要的机制与过程的辨识。现在,就让我们转到这些任务上去。

三 比较、机制与事件

巴黎的革命斗争、美国民权运动和意大利的战后冲突,这三个先后发生的事件是我们在第一和第二章中已经略述过的,它们代表了西方传统中独特的、同时也是广为人知的斗争政治类型。我们就这三个事件所作的探讨,提出了有关动员、行动者和斗争轨迹的一些标准问题。在斗争政治进程中:(1)哪些过程使人们投入或退出公开的集体性的提出要求的活动?它们又是如何使人们投入或退出公开的、集体性的、提出要求的活动?(2)他们都是谁?他们在做些什么?(3)是什么控制着斗争互动的进程和结果?在每个案例中,我们都发现,标准的社会运动议程——社会变化、动员结构、机遇——只是提供了一种针对有关重大事件提出问题的严格的方法,却未能就这些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答案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既源于它们都是静态的,也源于它们所提供的是对单一行动者而不是对有关行动者之间关系的描述,同时还因为它们充其量也只是辨明了可能的联系,而未能辨明其中存在的因果序列。

第一和第二两章既探讨了现有研究方法的缺点,也探讨了用于修正这些缺陷的思想资源。当涉及有关斗争的起源和动员问题时,我们发现,运用他们的那些术语对该问题所做出的定义,定会招致严重的麻烦:尽管人们对于讲述那种具备明确界定的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故事怀有迫切的希望,但斗争事件却几乎

很少干脆利落地开始和结束。相反,某些行动者的动员、其他一些行动者的遣散以及行动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却常常发生在最为复杂的斗争之中。比方说,我们就发现许多这样的环境,在其中,有节制的斗争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但只是为了转变为逾越界限的斗争,亦即那种此前未被承认的行动者和/或行动形式得以凸现的斗争。甚至传统上将动员结构从集体行动中分离出来的做法,结果证明也只是造成许多麻烦,这里72的原因在于,斗争性互动实际上改变了存在于社区、教堂、协会、公司以及其他通常被分析者视为在行动之前即已存在且塑造了行动的结构之中的日常社会关系。在此,以前的分析所具有的静态的、个人主义的以及常常是具体化的特点——包括我们自己当年的分析在内——又一次堵住了通向对动员和遣散做动态的、互动性分析的大门。

很显然,斗争行动的分析者们需要就该主题做出新的明确表述,以使其能够把握并有助于解释行动者、认同以及集体行动形式之变动不居的、策略性的和互动性的运作方式。结构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和文化论的方法,并未提供完成这一任务的充足的现成办法。所有这些方法中存在着的具体化(reification)和个人主义化特点,阻碍了通往动态的、互动性的说明斗争行动的道路。

类似的麻烦也困扰着对斗争轨迹问题的处理。运动生涯和抗议周期的观点把一些动态因素引进到处理斗争问题上,但这首先是以过分聚焦于孤立的运动组织为代价,其次则是以形成那种有着明确的开头、中间和结尾的相对固定的序列形象作为代价的。迄今为止,一些可用的模式几乎未曾就关键时刻实际发生了些什么给予指导。在斗争进程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主要的互动形式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重大改变的?

固然,也并不是我们才最先注意到有关斗争动员、行动或者其轨迹的现存研究模式所存在着的弱点。理性主义者通过把斗争事件视为反复出现的策略博弈,已一再寻求将动态因素引入他们自己的模式;而文化论者和集体行为理论家们通过探究意识的改变、结构主义者通过对大规模社会变化过程的详细说明,也力求把动态因素引进各自的模式中。不过,所有这些努力,并未产生出对于斗争的动态的、互动性的说明,而这种动态的、互动性的说明正是 1789 年的巴黎革命、美国的民权斗争和战后意大利冲突之类的斗争事件所需要的。社会运动研究经典议程之政治过程版本(如它的名称所示),已作为一种就斗争的动态方面进行思考的思维方式而出现。但它主要地是通过促进人们注意到作为行动之原因而发生 在动员结构、机遇、威胁、框架和手法方面的变化而取得进展的,并未在那些个人要素的改变以及它们之相互依赖的改变方面,为人们提供令人满意的理论。

更有甚者,标准的社会运动研究议程在处理行动者、其目标与对手以及第三方之间的互动时,也表现得很笨拙。在它介入 73 其中的所有领域里,政府通常充当的是一种“左右结局的魔鬼”^①角色,它制造机遇、等待动员、对某些行动者施以重击而给予另一些行动者以种种便利,不过,它并不直接地参与斗争。实际上,如我们在第二章(比如:图 2.1)所主张的,政府和挑战者是参与斗争互动的,它们各自对机遇和威胁做出界定、动员既有的和新创造出的资源、采取创新性集体行动以回应其他行动者的策略,而且,在某些情形中还改变着互动的进程。

^① diabolus ex machina, 拉丁文专有名词。字面意思是“devil from the machine”,专指古希腊罗马戏剧中由舞台机关送出来的解围的凶神。引申为左右结局的关键的邪恶人物或祸事。——译者

拓宽解释的范围

通过将研究从旨在总结所有种类斗争的总体模式,转向对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和不同的累积后果而一再出现在不同历史背景中的较小规模的因果机制的分析,我们能够将我们的解释范围加以拓展。我们并不试图远离涵括了社会运动、种族冲突、利益集团政治或者革命的“集体行动”一般法则,相反,我们探求以各种方式组合起来而出现于所有这些斗争以及其他形式斗争中的一些机制。我们主张,一种有关斗争政治的大致可行的观点,是从探求其发生原因方面的相似之点开始的:辨识表面上时间、地点和形式各不相同的斗争的相似原因。

在第一、第二两章中,我们集中关注的是发生在法国、美国 and 意大利三国的一些为数不多、熟悉且有充分文档记录的事件,现在则到了扩展我们的范围的时候了。在余下的研究当中,我们将超越我们的“本垒”,其理由有如下几点:避免将历史性地归于西方政治的特定特征,误认为是斗争的一般特征;了解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将各种概念和解释延伸至截然不同的政治背景,而不致使这些背景走形;为意外发现和对已接受的观点做出意想不到的挑战创造更多的机会。

在第二部分,我们将探究自 1800 年以来的许多斗争现象,这些现象在时间、地点、规模、持续时间、统一性、政治体制、行动者的类型以及斗争形式各方面大为不同。这里,我们把将在第二部分中探讨的六个案例配对后列示如下:

- 1983—1986 年菲律宾的反马科斯动员和 1950—1960 年肯尼亚的茅茅起义

- 最近发生在南亚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和 1980—1995 年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及其后果
- 19 世纪美国反奴隶制的动员和 20 世纪 70 年代西班牙的民主化

显然,我们未曾将 1800 年以来世界上发生的任意一例斗争事件——不论此类事件可能会包含什么内容——都集中在一起加以探究。相反,我们只是挑出那些斗争政治中富有教益且对比鲜明的案例,而这些案例均属已有大量学术分析问世的案例。然后,我们再使这些案例形成一对一的比较,旨在使关键机制从殊为不同的背景中分离出来。

第二部分开始于我们现在已熟悉了的前两章出现的三个主题:动员对遣散、行动者和他们的行动方式,以及斗争的轨迹。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该部分既涉及了范围更为广泛的许多案例,也较少关心现存的研究经典,并且,还首次试图从形式各异的斗争中辨识出其相似的原因。第三部分则通过对另外五个案例的分析将这一逻辑进一步延伸,其中,有关的分析则是通过提出一些经过精心配对且差异更大的事件来展开的,这些事件大抵又被汇集于三类通常有所不同的文献之中:

- **革命**:第七章对我们在 1979 年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中发现的机制进行了比较。
- **民族主义**:第八章考察了民族建构和政府瓦解过程中的民族主义事件,将 1848—1900 年的意大利统一和 1985 年之后苏联的瓦解做了比较。
- **民主化**:第九章比较了出现于 1830—1848 年瑞士的政治冲突和墨西哥 1968 年以来的长期民主化中的机制与过

程。

表 3.1 总结了我们所提出的这些案例的范围及其种类——包括那些我们在第一部分已涉及的案例在内——做出这样的总结,依据的是历史—地理背景、政体类型以及这些案例通常所归属的斗争种类。由此,类似于“社会运动”、“革命”和“民主化”这样的标签就不再代表我们对事件所做的分类,而是其他的分析者在展开分析时所采用的醒目标题了。

表 3.1 斗争事件的地理分布与传统意义上的斗争形式

| 事件 | 地理分布 | | | | | 斗争形式 | | | |
|-----------------------------|------|----|----|----|----|------|----|-----|------|
| | 美国 | 欧洲 | 亚洲 | 非洲 | 拉美 | 社会运动 | 革命 | 民主化 | 民族主义 |
| 1. 美国反奴隶制运动 | + | | | | | + | | + | |
| 2. 当代印穆冲突 | | | + | | | + | | | + |
| 3. 意大利统一 | | + | | | | | | + | + |
| 4. 茅茅起义 | | | | + | | | + | | + |
| 5. 菲律宾反马科斯运动 | | | + | | | + | + | + | |
| 6. 桑地诺革命 | | | | | + | | + | + | |
| 7. 1980—1995 年的南非 | | | | + | | + | + | + | |
| 8. 苏联解体 | | + | | | | + | + | + | + |
| 9. 西班牙的民主化 | | + | | | | | | + | |
| 10. 瑞士的统一 | | + | | | | | | + | + |
| 11. 墨西哥的民主化 | | | | | + | + | + | + | |
| 12. 美国民权运动 | | + | | | | + | | + | |
| 13. 1960,1970 年代 意大利抗议周期 | | + | | | | + | | | |
| 76 14. 1789 年的巴黎革命 | | + | | | | | + | | |

只消看一眼表 3.1 就会证实,这绝不是一份随意的抽样。尽管

我们的案例中包括了两个拉丁美洲的案例、两个亚洲的案例以及两个来自非洲的案例,但比起地理上的广度,我们更多的努力还是在增加文化的差异或多样性上。比如,我们所选的两个亚洲的例子,其区别就很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反马科斯革命,是发生在政治、宗教和经济制度都带有两个前殖民宗主国——西班牙和美国——浓厚印记的菲律宾;而发生在当代南亚的印穆冲突,尽管部分地是由英国殖民主义造成的,但还是广泛地利用了非西方的宗教与文化分裂因素。

同样地,我们的两个非洲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的茅茅起义和1980年以来南非反对白人霸权的斗争——则来自于不同的欧洲殖民统治模式中,且体现了殊为不同的地区性文化。而我们的两个拉丁美洲案例——墨西哥迁延日久的民主化和桑地诺革命——则在速度、动力与结果方面表现出深刻的差异。甚至发生在文化和地理上相对接近的美国与欧洲的斗争事件,也存在着文化和历史上的重大差异:瑞士联邦运动、内战前美国的反奴隶制运动、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的统一运动、20世纪70年代西班牙的民主化和90年代苏联的瓦解,就几乎无法适用某个有关事件或政治体制的单一范畴。

很快就会变得明显的是,表3.1在将有关实例分类为“社会运动”、“革命”、“民主化”或“民族主义”时,提供的只是一种大致的初步划分。但它同时也提供了把这些宏大术语拆解成特定的机制与过程的要求,尽管如此,它仍然说明,分析家们是依据经典社会运动议程来看待十四个案例中的六个案例的——美国反奴隶制运动和民权运动、印穆冲突、意大利战后斗争、反马科斯的动员和墨西哥的民主化——与此同时,却把其他的八个案例通常视为斗争的不同类别。我们的目的不是去攻击这一议程,而是要指出:这些形式不同的斗争,既有相互之间的部分重叠,

也在一些关键细节上存在着彼此之间的部分相似；而它们的结果，则是由不同历史背景下基本相似的机制以不同的结合方式造就出来的。

举例来说，就在许多观察家们已经把 1980—1995 年的南非斗争视为“民主化”的一个实例时，也不妨貌似有理地将这些斗争行动看成是社会运动或者革命，更不用说把它们当成是被从表 3.1 的标题中省去的战争、劳资冲突和种族动员了。同样地，77 美国的反奴隶制动员，则把好战的废奴主义社会运动、一场内战、一次将南方邦联建成为分离政权的企图和民主化的一个重要过程，以及南方的重建统统包括在内。至于苏联的解体，我们很容易地就可以这样发问道：这是一个属于何种一般现象的实例呢？是民族主义？当然是！但在同一个事件当中，我们也发现社会运动、工业冲突和种族内战出现于其中并发生互动，这样的一个复合过程，则是任何分析家都将难以对其做出归类的。不仅如此，乐天派们还会把民主化也包括进去，此外，尚有其他许多观察家，把东欧危机看成是一系列的革命——或者至少一系列的革命形势。

国家能力与民主

除了考虑地理和文化上的分布广度外，我们还把这些案例依其政体类型的不同做了排列，其政体类型的不同则是根据两个至关重要的维度——国家能力和民主的程度——来确定的。

我们所谓的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是指国家代理人在其统治的领土范围内，有权对人员、活动和资源实施控制的程度。实现国家能力的增长，要经过四个常常是相互补足的过程：以直接统治取代间接统治；中心地区对外缘地区的渗透；国家行为实

践和认同的标准化以及贯彻国家预期政策之手段的增加。目前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国家,从1980年左右拥有高度(尽管已经受到一定威胁)能力的南非,到1830年作为一个整体(不过并不是指单个的各州)表现出引人注目的能力低下的瑞士联邦,在国家能力上显示出相当的差异。

从逻辑上说,国家能力的这四个方面是各不相同的,而这种不同有时也通过经验实际而具体地呈现出来。举例来说,继法国革命而起的历任政权增进了直接统治,实现了认同的标准化,也渗透到了外围地区,并且建立起贯彻预期政策的新手段;而美国革命后所建立的政权,则是经过了一条联邦与地区分离之路,才曲折地走向直接统治,并且只是在经历了一场内战之后,才得以实现认同的标准化,与此同时,其在渗透和政策手段的建立方面则进展迅速。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能力演进的各种途径则又是趋于相互之间交织互补,且趋于围绕重要历史分水岭而暂时地簇集在一起的。

我们所谓的民主,则基本指的是受保护的磋商体制(protected consultation)。我们结合了四个方面来对民主或民主的缺席加以判断,第九章将就此做进一步地说明。这四个方面是:政治体成员的广度;政治体成员的平等;政治体成员具有就有关政府成员、政策与资源而进行集体磋商的实力;这后一点我们把它看成是由(a)磋商具有怎样的约束力和(b)磋商如何有效地全面控制了政府成员、政策和资源这两者复合而成的;第四个方面则是保护政治体成员及个人免受政府代理人的专断行为之害。 78

从逻辑上说,这四个方面也同样是各不相同的。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对其中每一方面所产生的变化,做出不依赖于其他几方面的独立分析。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注意到独裁政体常常以社团主义组织或大众政党的形式强加于广泛的政治体成员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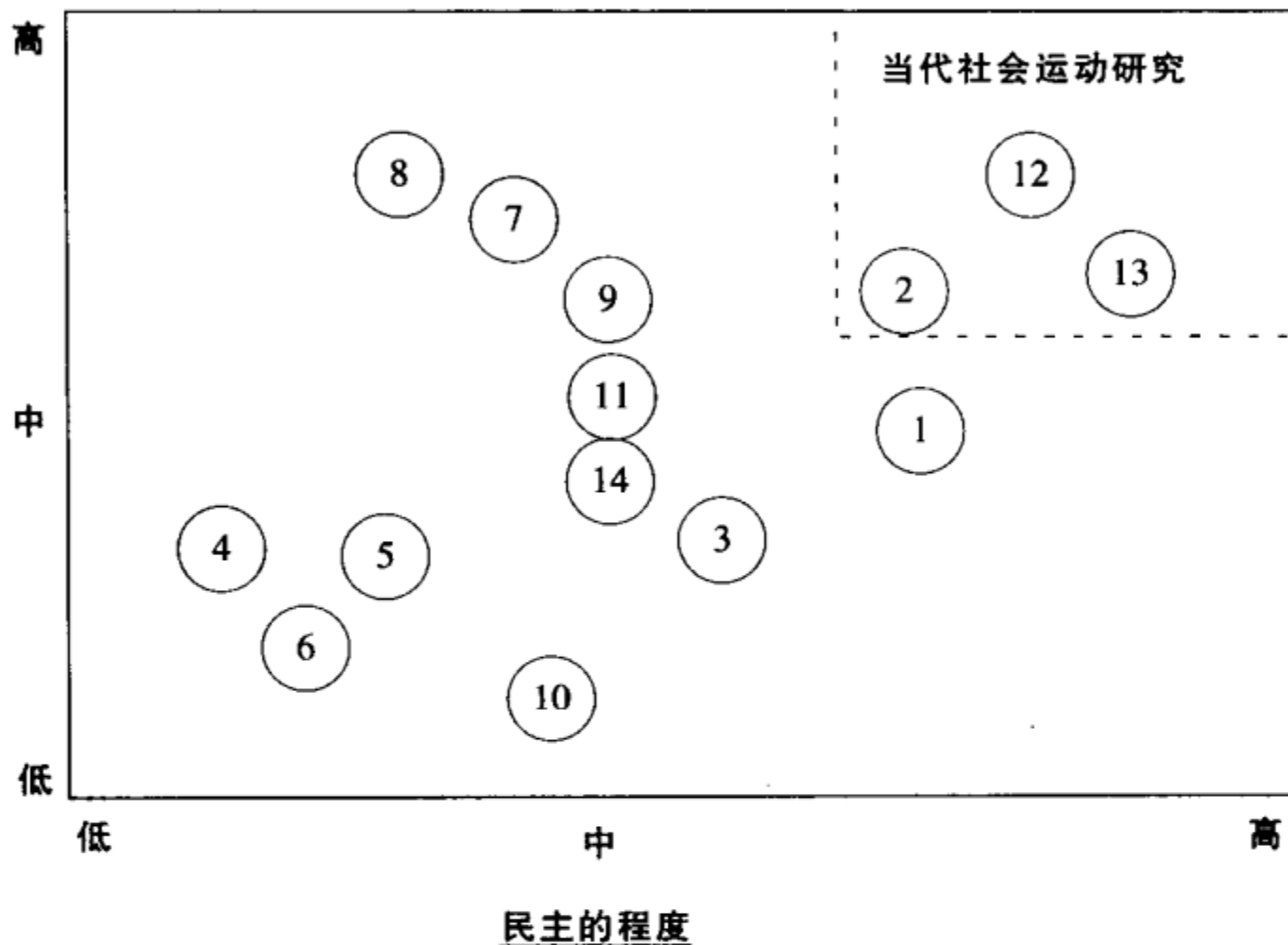
上,而同时却对其公民提供极少或不提供保护。不过,这四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足以令它们所意味着的很大一部分逻辑空间变成实际上的空洞无物。例如,范围广泛的政治体成员的存在,就很少与政治体成员之间急剧的不平等相伴生。自1800年以来的这段时期,此四方面的相互关联程度之高,已足以让我们聚拢所有的政体,而将其视为或多或少是带有民主意味的。倘若我们想对当今资本主义的诸民主体制做出在广度、平等、磋商和保护几方面的估价,而以每一方面为0代表其在历史上的最低值,以每一方面为1代表可以从一国范围内的任何一地发现的最高值,则四者中的任一方面的可能得分就会是在.65至.85分之间变化。

图3.1大致地估计了每一政体在我们要描述的事件的起始之际所处的位置。经由把国家能力和民主划分为高、中、低三档,该图使事情大大地简化了。比如,依据这种划分,战后意大利扮演的是一个国家能力中等、民主程度高的角色,而处在统一运动过程中的意大利(这当然涉及到将许多小王国合并为一个国家)则被视为国家能力低下而民主程度相当混杂的政治体。我们所讨论的这些政体是复合型的、受到挑战的和处于过渡之中的这一事实,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暗示:我们的分类法还只是一个起点。它主要用以表明,我们所加以比较的斗争过程开始并结束于殊为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中。

这一分类法也被用于强调我们力求超越大多数社会运动研究中存在着的研究范围相对狭隘的局面。就在大多数社会运动研究习惯性地停留在图3.1右上边的四分之一部分时,我们的大多数案例则集中于图中的其他三个部分。如果说我们是在“欧美”(Euramerican)这一点上与经典社会运动研究议程分道扬镳的,那么,我们很快就将明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分类

法的另一个用途,将是帮助我们展开对斗争政治在政治体发生改变的进程中所起作用的探究。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斗争的不同形式与结果是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必然使政治体的能力由 79

能力:



- 1. 美国反奴隶制运动
- 2. 当代印穆冲突
- 3. 意大利统一
- 4. 茅茅起义
- 5. 菲律宾反马科斯运动
- 6. 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
- 7. 1980—1995年的南非
- 8. 苏联解体
- 9. 西班牙的民主化
- 10. 瑞士统一
- 11. 墨西哥的民主化
- 12. 美国的民权运动
- 13. 1960—70年代的意大利
- 14. 1789年的巴黎

图 3.1 我们所举事件在政体空间中的位置

低向高转变的,从非民主向民主转变的,以及贯穿这一系列范畴的转变的?下面我们将采取配对比较的方法,以帮助我们探讨这些问题。

配对比较方法

在比较政治领域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两种主要的比较方法:

最为不同体系分析:这主要是对多个案例进行的一些定量分析,所选取的这些案例则用以代表范围无所不包的各类变化形式——所有的政治体、所有的民主体制、所有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所有近期的战争、所有民主化案例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最为相似体系分析:狭隘地选取两个或少数几个案例加以分析,以此最大化可比较性,采用的则是构形性的(configurative)、历史的和定性的方法。这类比较分析的范围涵盖了从逸事趣闻式的和人种志的比较到系统和严格的比较。

对于这两种方法实际上基于以及应当基于相同逻辑的程度,社会科学家们已经多有论争。一些人认为,涉及“大量”案例的定量分析所采取的同样的推理方法也应成为涉及“少量”案例的定性比较的基础(King, Keohane, and Verba 1994, 2000)。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企图将应用于案例数目多的(“大量”)定量研究的统计推理法则,应用到案例数目较少(“少量”)的定性研究方面,是对构形性和叙述性分析所提供的背景信息的浪费。

“少量”比较的提倡者们将他们的分析置于文化或制度的相似以及地缘上的相邻的坚实基础上一——意在使变化形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过,其批评者们却指出:他们的研究既难免遭

“变量多/案例少”之苦,也存在习惯性地仅举因变量为例的问题(参见 APSR 1995)。在有关革命的案例中,该方法典型地只挑选“大革命”为例,而忽视那些不够大或者未能发生的革命(Geddes 1990)。在从事定性研究的学者当中,仅有查尔斯·拉金(Ragin 1987,1994)和为数不多的其他人,大胆地试图使他们所涉及的少量案例适合于对关键变量所做的严格的系统性分析。

“大量”定量研究的拥护者们,则循着一条相反的逻辑思路。他们希望利用案例数量多以及案例所涉人群范围广的潜力,更好地处理各类变化形式。这派人的批评者们则指出:他们缺少对单个国家及其历史的深切了解,而由于需要使诸多变量在许多各不相同的案例中得以标准化,这一方法还导致了特异性的大大减少。在斗争政治的研究中,这一方法采取的是将一系列从小型暴力到社会革命的范围广泛的现象,通过暴动、叛乱和社会运动的形式还原为“冲突研究”的形式。

共同的基础与不同的基础

与大多数相似案例的研究者们一样,我们选取的是在多半基于定性证据的情境化的案例之间做配对比较的方法。但我们又与这类主张配对比较的研究者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有所不同,大多数这类学者在选取一些案例进行比较时,对于他们从中观 81 察到的一些变化,采取的做法是把这些变化置于共同基础的背景中加以分析,并利用这些案例的共同特征以遮蔽其判然有别之处。他们在如此行事时抱定的希望是,他们选取的案例所具备的相似之点,足以令那些未受注意的变量不太可能对他们希望加以解释的结果给出解释。例如,小巴林顿·摩尔(Moore 1966)有关法国通向民主的暴力之路的分析,即大多有赖于与英

国之间进行的配对的比较。彼得·卡赞斯坦(Katzenstein 1984)在比较瑞士和奥地利的社团主义经济政策时,是把它们作为小国适应国际竞争的两个例子来看待的。而彼得·霍尔(Hall 1986)则是依据英法两国作为自由主义国家的根本共同性,来看待两国在制定政治经济政策方面的不同的。

此种“共同基础”方法既有优点也有缺陷。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制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崩溃来加以说明。当这两个国家刚刚通过选举权的扩大而把工人阶级吸收到政治体当中不久便转向独裁主义时,一些观察家们就断言“工人阶级独裁主义”是埋葬民主制的主要原因(Lipset 1960: ch. 4)。但“共同基础”方法却模糊了民主制在这两个国家崩溃的起点方面所存在的深刻差异:德国是一个拥有很大且已科层化的社会民主主义亚文化(其影响大多是在工人阶级中间)的国家,意大利则是一个蓄积已久的乡村激进主义在左翼运动中的重要性胜过工人阶级的地方,后面这种情形在意大利的农村地区造成了极化与对立,而这种极化情形则驱使土地所有者以及持有小块土地的农民一齐投向了墨索里尼。意大利的政治过程因此而与导致魏玛共和国瘫痪的极化之间有着深刻的差异。倘若当初能聚焦于这些并非共同的(uncommon)基础,想必对利普塞特和其他人找出导致意大利和德国民主制垮台的不同机制来会有所帮助。

那么,我们在以后各章中开展的研究工作又会与此有着怎样的不同呢?在与“共同基础”传统分道扬镳之际,我们仍将运用配对比较的做法,不过,我们并不是借此而使相似性得以最大化,或者甚至突出强调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同,我们要做的则是去发现相似的机制与过程,是否推动了发生在殊为不同的时期、地点和政体中的变化。来看一下瓦莱丽·邦斯有关国家社会主义

以及西方民主政体在政策创新方面的研究成果(Bunce 1981)。邦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提到,苏联领导人的更替总是伴随着它在财政支出方面的大幅增加,不过她并未因此而退回到(当时占主导的)苏维埃政治领域研究——这类研究或许就会去 82 强调苏联争夺权力的内部斗争,苏维埃制度的官僚特征或者新领导人的人格特征了。相反,邦斯把她的研究视线转向自由资本主义政体的政治领导人更替上,在那儿,她发现了因领导人变更而带来的相似的财政后果。在如此截然不同的两类制度中发现因领导人变更而产生的相似结果,促使她想进一步去寻求那些把不同类型的制度中领导人的更替与政策创新联系起来的机制。设若邦斯停留在“苏维埃研究”的可靠范围内,则她的研究成果便不会如此丰富,也不会具有理论上的启发意义。

对非共同性案例所作的配对比较,是要揭示导致变化产生的相似机制在各不相同的历史性变化进程中,是如何与各种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以不同的方式相结合的。这里,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动员问题:一个熟悉的例子是,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在19和20世纪之交从中西欧传播到东欧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像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完全处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影响之下,而这一模式是通过松散和开放的选举形式以及工会形式以实现其动员的,但到了沙皇俄国这样的落后条件中,动员便不得不采取隐蔽和克制的形式——此即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为俄国革命者制定的行动方法。俄国革命这一独特的历史事件部分地产生于一个动员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是来自于招募、控制以及冲突这类特定的机制。

从殊为不同的案例中辨识其因果机制,还能够更好地解释很少被加以比较甚或是相互矛盾着的结果。考虑一下民族主义的问题:大多数就这一现象所作的研究,或者聚焦于民族国家的

建构,或者集中关注的是作为民族性结果的国家解体。相形之下,在本书第八章中,我们在对19世纪意大利创建国家的民族主义与20世纪后期苏联的国家解体做出比较后,从中发现了存在于这两个明显相反的案例中相似的机制,机制相似结果却判然有别。我们的比较不仅强调了这些机制,也揭示出它们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各案例之情境特征是如何相互交织的,我们还想借此以表明,机制之不同背景、序列和结合方式,是如何产生出对比鲜明的政治过程和结果的。

采用“非共同基础”的方法带来了很大的风险。除了我们并非第二、第三部分中我们所探讨的所有案例方面的专家——83 我们也并不企望如此——之外,我们还冒着忽视使斗争政治研究更趋丰富的情境性因素的危险。对于第一种危险,我们试图通过求教于有关一些案例的研究专家,使他们的见解成为我们写作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加以应付,至于后一种危险,我们会倍加关注是否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辨识斗争政治的总体法则。

这是什么样的计划?

经由辨识斗争事件内部及其之外的诸多关键机制和过程,而寻求对于斗争政治的解释,要求我们与斗争研究的传统方式做出决裂。就消极方面而言,我们的计划意味着:

1. 放弃通过增加变量、对“方块”与“箭头”中的要素加以重新解释,或者详细说明这些要素之间的新的联系,而对经典社会运动研究议程的“方块”与“箭头”进行修改的努力。

2. 消除经典研究议程所假定的本质上是把事件与对应的“方块”——社会变化、动员结构、政治机遇、构建过程、常用方法以及斗争行动——相匹配的有关分析。
3. 在可以利用的时候,继续采用对动员、行动者和轨迹之间所作的区分,但在做解释时,则将其弃置不用。
4. 在运用案例进行比较时,尽量少地关注必要和充分条件(比如:罢工或不罢工、革命或不革命),而主要是对更为动态的分析必须加以解释的东西做出详尽的说明。
5. 同样地,主要运用共变(covariation)分析(如通过统计相关性)来说明哪些斗争特征强大有力因而需要解释。

该计划也有它非常积极的一面。它在鼓励对斗争做经验性的分析时,遵循了下列规定中的一种或几种:

6. 挑选较为常见的过程(机制的结合与序列),对之做更为详尽的研究,通过对事件和事件系列的比较,以发现这些过程是如何运作的。例如,本书后面几章即是从各种 84 广泛不同的事件中,去追寻动员/遣散、认同改变和极化的相似过程的。
7. 辨识出现于各种斗争事件中的诸特殊机制,揭示它们是如何产生影响的。比如,后面的几章会一再向我们展示,居间联络机制是如何在以前联系不多或不存在联系的各个地点之间造成联系,并由此而促进这些地方的协调行动的。
8. 在处理每一事件时,(a)要认识到:当观察者给事件确立开头和结尾时,必然要求确立观察者的惯例,同时密切

关注由采用观察者惯例而引起的后果,(b)详细说明某个事件或某个事件系列需要给予解释的独特之处何在;(c)通过与至少一例有着不同于该独特特征的事件进行比较,以巩固所作的详尽说明;(d)辨识产生出这些独特特征的关键机制与强有力的过程。尽管本书给予观察、衡量和正式比较问题的关注相当少,但在我们根据事件当中发生的突出过程——它们分别是动员和遣散过程、认同转变和行动转变过程,以及最直接地影响动员和行动轨迹的诸过程——而选择一些事件用于比较时,第二部分的三例配对比较还是表明了我们究竟是如何进行的。

9. 取一组具备共同的地点、行动、行动者、行动轨迹或者结果的事件,将我们拟订的上述计划中的各点重复一遍。本书的第三部分寻求对那些逻辑上具有可比性但同时又各不相同的事件,包括革命过程、种族—民族主义的动员以及民主化的过程加以比较。

在寻求重要的机制与过程时,本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将初步尝试运用这一研究计划。

我们的事件

机制及其所产生的过程合成了事件:在相关要素中所发生的关系方面的改变的特定序列。一个可以辨识的承诺—履行螺旋(commitment-performance spiral),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成为一个较长序列的一部分,在其中,某个国家的民主化的参与者(比如,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的工人、学生、地主、工人工会、各党

派、地方民族主义者、企业家、立法者、和法西斯残留分子)进行动员、遣散、形成联合以及展开相互斗争。因此,要对二战后意大利的独特的民主化做出解释,就意味着要将民主化分解为连贯的、重复出现的、证据明确的机制与过程。

随后几章将在事件与形成事件之机制和过程之间划出相当明确的界限。通过审视与比较不同的事件,希望辨识出(1)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且解释这些事件展开时之主要特征的机制与过程;(2)使事件相互区分并说明事件之间主要区别的机制的独特构形。

例如,在动员的标题下,第四章对肯尼亚茅茅起义和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菲律宾的黄色革命中结合在一起的威胁/机遇归因、社会利用和居间联络机制进行了比较。第五章则分析了两个复杂的斗争事件所具有的一些特征:被政治化了的印穆冲突在南亚的发展,与南非种族隔离主义的倾覆。在每一案例中,我们都指明了起作用的四种机制——居间联络、范畴形成、对象转移以及合法性确认——正是这些机制影响到斗争行动者们以何种名义、依托何种组织进行动员与提出要求。在有关轨迹的第六章中,我们从内战前美国共和党的建立以及西班牙的民主化当中,都发现了居间联络机制的存在,我们也遭遇了“激进一翼效应”机制,在这一机制中,由政治连续体的某一极所采取的强有力行动,驱使居于中间立场的行动者们结合到更紧密的联盟当中,采取更为一致的提出要求的行动。

我们还探究了斗争手法在斗争互动中的变化,这些变化包含了或来自于居间联络、范畴形成、对象转移和合法性确认诸机制,但它们同时也有赖于其他一些机制,这些机制在我们从行动、行动者和认同转向另外两个关注焦点即动员/遣散和轨迹时,变得更为突出。我们运用配对比较,意在揭示各不相同的事

件中出现的强有力但仍是部分重现的机制,由此而进一步辨识出范围广泛的机制。

实际上,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整个一个斗争进程中所具有的全部复杂性,这恐怕只会比一位地理学家解释——或者试图解释——整个一座山脉的每一个特征来得更不容易。所谓解释是由这样两步组成:先是选取一些现象的有问题的特征,接着是辨识产生这些特征的重复出现的机制。等待着我们的是一项挑战性的议程。我们必须再次提起斗争动员、行动与轨迹,不过这一次是要辨明在动员、行动与轨迹中突出显现的因果机制和过程。我们必须更为详细地探究斗争事件,对它们之有疑问的特征大致给出部分的解释。我们还必须转向整个一组事件——尤其是那些包括了民族主义动员、民主化和革命的事件——以图揭示出突出的机制及其所产生的过程之被发现,是如何重塑了对这类事件所作的解释。

第二与第三部分采取了殊为不同的方法。在第二部分中,我们探究那些对比鲜明的事件,主要是为了确立两条原则。第一,相似的因果机制与过程会出现于完全不同类型的斗争政治中。尽管存在着将劳资冲突、战争、种族屠杀以及其他形式的斗争看成是遵循各不相同的规律性的诱惑,但仔细审视之后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是由相似的因果链组成的。第二,相似的机制与过程出现于总体结果大为不同的事件之中。尽管从定义出发,充满活力的机制与过程无论它们在哪里发生作用,都会产生出相同的直接效果,但它们的背景和结合方式也关系甚大。最初的条件、结合方式与发生序列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影响着结果。即便两个事件中机制与过程的基本排列相同,我们也不能指望它们的轨迹和结果是一致的,除非幻想最初的条件、结合方式和发生序列也相互一致。

第三部分转变了方向。该部分通过有意识地将具有下列特征的事件加以配对,而使其仍旧奠基于第二部分之上,这些特征是:

- 它们属于分析家们常常为其提出这一或那一总体模式的斗争范畴
- 它们的整个轨迹和结果大为不同
- 不过,对它们的解释仍然引起了原则上类似的问题
- 根据对一些现象——革命、民族主义的动员和民主化——习惯上的理解,我们能够将它们某些特征视为成问题的特征。

由此,第三部分通过表明精心选择的一系列小的因果机制与过程,可以用来解释不同事件之成问题的特征,而对第二部分的分析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挑战。这种挑战态度两度出现:第一次是在配对比较中,接下来是出现在一些跨越了传统上有所区 87 分的大的斗争类型——革命、民族主义和民主化——的机制与过程中。

为方便起见,第二部分的各章仍然维持了动员、行动与轨迹之间的区分,不过,应当清楚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采用的这三个标签主要是用作启发性的工具,而不是用于分析性地辨明各自不同的现象。因此,尽管第四章集中关注的是动员问题,但它同时也引入了包括在认同形成和行动轨迹中的机制与过程,其用意即在于此。在第五章中,有关行动者、行动和认同的讨论,实际上是动员问题的继续;而第六章在对斗争轨迹做出新的分析时,通过结合有关行动者及其动员的评述,利用了前面几章的阐述。

我们循此以行,第四、五、六各章依次探讨了动员、行动者与斗争轨迹问题,我们依次关注的是那些具有启发性的成对事件:肯尼亚的茅茅起义和菲律宾驱逐费迪南多·马科斯的行动(第四章),南亚的印穆冲突和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覆灭(第五章),美国反奴隶制的动员以及西班牙从独裁主义向战后民主化第一阶段的过渡(第六章)。之后,我们分别讨论了革命(第七章)、民族主义(第八章)和民主化(第九章),直至最后结束我们的整个学术探险(第十章)。

第二部分

尝试性的解决之道

四 比较视角下的动员

现在我们位于何处？在第二章中，我们已经确认了标准的斗争起源分析中所存在的困难，接着，在第三章中，我们针对在辨识可广泛应用的因果机制以及辨识由这些机制所合成的、一再出现的动员和遣散、行动者、行动轨迹之类过程时所存在的一些困难，提出了我们的矫治方法。在本章中，我们将开始表明这一方法在被运用于包括在表 3.1 和图 3.1 中的范围广泛的斗争事件时之适用性。我们并不是对有关斗争起源的某些总体理论进行检验，相反，我们只是试图辨识出那些在种类各异的动员和遣散之中起重要因果作用的机制而已。

通过集中关注 20 世纪 50 年代肯尼亚的茅茅起义和 80 年代菲律宾的黄色革命，我们提出了有关动员——第二章中已对其特征做过先行描述的过程——的一些重要问题。这两个事件之间存在着很大不同：茅茅起义带有高度的暴力特征，菲律宾的这场运动则多半采取的是非暴力的方法；茅茅起义几乎未涉及任何正式组织，菲律宾黄色革命则依靠的是大量已有的和新出现的全国性的组织与机构。尽管茅茅起义长期被看成是一场反殖民的起义，但它同时也多少具有一场发生在基库尤人 (Kikuyu) 之间的内战的性质。菲律宾的运动则既非反殖民战争亦非内战，它更接近于是一场团结了大多数马尼拉人——如果说不是整个菲律宾社会的话——的广泛社会民主运动。尽管运

动中的措辞以及运动的整个结构较之茅茅起义要来得温和,但就运动的结果观之,发生在菲律宾的这一事件必得被视为一场革命,毕竟,它导致了一个政体的倾覆。与此同时,尽管有不少学者持反对意见,仍有许多人把茅茅起义看成是一次带有迷信色彩的、返祖式的造反行动。

尽管这两个事件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但对它们的分析仍将为我们显示出从许多动员的例子中可以一再发现的起作用的三个因果机制——威胁和机遇的归因、社会利用以及居间联络。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的机制在此处或别的什么地方不起作用,比方说,这两个案例就将显示出我们到以后几章中才会详细探讨的合法性确认与撤销合法性确认机制的作用。在本章及第二部分的其余各章里,我们主要并不是关注对配对事件之间所有不同点的解释,而是要表明相同的因果机制不仅出现在这些成对的案例中,而且所有三个机制均对动员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解释事件之间存在的突出不同之处而对事件进行的比较,要到第三部分的第七至第九章才会成为我们的主要任务。

茅茅起义

“茅茅”一词,通常被用来描述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至中期发生在肯尼亚的、主要由基库尤人组成的非正规的“自由战士”对抗英国军队和一部分效忠英国人的基库尤卫队的武装反叛。该起义的起止日期难以被精确界定,但 1952 年的 10 月 20 日无疑是加速起义发生的一个关键日期。这一天,殖民当局宣布肯尼亚进入“紧急状态”,当局随后逮捕了民族运动领袖肯雅塔(Jomo Kenyatta)和其他一百四十五名重要的肯尼亚政治人物。当局的这一举动所引起的直接结果是瓦鲁休(Waruhiu)酋

长——一位保守的部落领袖和名义上的英国人盟友——在 10 月 7 日被暗杀,但在随后两年里,“紧急状态”的宣布也导致对保守的当地非洲人领袖以及临时的欧洲定居者的攻击出现普遍增多的势头,而这又促使政府当局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当局设想存在着一个统一和集中领导的阴谋,为此政府指控肯雅塔“操纵‘茅茅’这一秘密社团,该秘密组织誓言将英国的统治和白人农场主赶出肯尼亚”(Lonsdale 2000:197)。

宣布“紧急状态”深刻而持久地改变了冲突的本质。受政府采取行动的威胁,几千名“茅茅”的支持者来到内罗毕北部和西部的森林保护区,他们在那发动了一场很大程度上属于防守性的游击战争,这场多少具有连续性的游击战争一直持续到 1956 年中期。不过,正如罗斯伯格和诺丁汉(Rosberg and Nottingham 1966:277)所指出的,起义的准军事阶段“起源于‘紧急状态’法令本身所造就的条件”。在这种意义上,“宣布‘紧急状态’……则是一次由殖民当局采取的针对肯尼亚一部分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及其支持者的先发制人的进攻”(Barnett and Lonsdale 1966:71),殖民当局和那些认为“白人的意图是要消灭整个基库尤部落”的基库尤人都同样作如是观(Barnett and Njama 1966:71)。但其实冲突并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场由基库尤起义者发动和领导的反殖民起义。另外,正如朗斯代尔和伯曼(Lonsdale and Berman 1992:ch. 12)所努力指出的,冲突也是一场基库尤人的内战,它起因于二战后严重的土地短缺及其所产生的对于基库尤部落传统“道德经济”的腐蚀性影响。

起义最终屈服于占优势的军事力量和“茅茅”组织本身长期存在的整体协调配合的缺乏。但这场充满讽刺意味的起义最后颇具讽刺意味之处则是,殖民当局的军队在赢得了战争的同时却失去了整个肯尼亚国家。由“茅茅”起义附带产生的政治结

果——它远远超出了战争进行时期,并且开始体现在 1959 年 3 月发生在霍拉(Hola)“改造”营地的十一名“被拘留者”死亡事件与企图掩饰这一事件的做法上——最终使肯尼亚的殖民政府失去了英国内政部的支持,加速了它在肯尼亚的殖民统治的终结。埃杰顿写道:

发生在霍拉的一些重要事件,使 [英国首相哈罗德·] 麦克米兰确信,非洲的变化步伐必须加快,他为此而做出了一项将要改变肯尼亚未来的决定。麦克米兰用伊恩·麦克利奥德取代艾伦·伦诺克斯—博伊德担任殖民大臣一职,前者对霍拉所发生的事情深感不悦。 [Edgerton 1989: 198]

很快,麦克劳德便策划在冲突各方——白人定居者、非洲民族主义者和殖民当局——之间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倡导实现肯尼亚向基于普遍选举权的议会民主制的迅速转变。肯尼亚的最终独立时间则是 1963 年的 12 月 12 日,差不多是在宣布“紧急状态”的十一年后。

引发茅茅起义的历史变化过程

这场被称为“茅茅”的运动的起源,生动说明了作为斗争催
93 化剂的广泛变化过程之重要性。在开始探讨某些有助于确立茅茅起义背景的特定变化之前,曾经在第二章中被我们提到的一点,值得在此强调一下。较之我们在本书中着手处理的各种机制,我们并未赋予这些“变化过程”以更为不同的认识论地位。(其实,若我们经验性地聚焦于这些变化过程,则我们便会看出

它们也同样结合着理性的、认知的和环境的诸机制。)不过,为了避免无止境的经验上的倒退,在此,我们还是更多地把它们视为必要的历史背景,而不是把它们当成本身就已构成我们着手研究的对象。

在肯尼亚的例子中,有关的变化分为两类,那些影响了二战后肯尼亚内部政治经济状况的诸多变化以及二战后非殖民化的总体趋势(Cooper 1996; Mamdani 1996)。后一种趋势有大量文献记载且并非肯尼亚所独有,而前一组变化则需要做出更多的解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肯尼亚开始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时期和大量白人移民入境的时期。这两股趋势显然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伴随移民入境的是农业产量的日益增加,而总体良好的经济又反过来刺激了更多的移民进入肯尼亚。不过,在这一有益的动态的另一面,也存在着一种不祥的趋势。二战后白人移民的入境导致出现严重的土地短缺,而土地的短缺从总体上影响到肯尼亚的非洲人口尤其是当地的基库尤人。土地的这种紧缺因白人移民实行农业机械化、当地非洲人口的快速增长和殖民当局强制实施特定的农业政策而进一步被恶化。这些政策包括将当地非洲人——通常是基库尤人——占地者从马塞地(Maasai-land)和白人移民地区驱逐出去,这些被逐出的人们随后被强制重新安置在基库尤保留地上。

各种人口和经济方面压力所产生的后果,则是基库尤人物质和道德经济生活的彻底瓦解。正如约翰·沃尔顿(Walton 1984:111)所说:

扩张性的持有土地对地方上的家族部落和村庄体制至关重要。一旦达到成年年龄并且经过了割礼仪式,首次结

婚的年轻的基库尤战士就被授予一块现有的或者新的家庭所有土地。拥有土地成为基库尤战士及其妻子作为家族部落和村庄之全权公民的确证,有财产的男性成员后来可以成为村庄会议中的长老,该会议是按照带有民主倾向的分权式的等级制度而组织起来的,其权限及于地方和部落的层次……当殖民者开始占领基库尤人的土地时,他们同时……也就开始了对基库尤人社会基础的摧毁。

二战后白人移民至肯尼亚的步伐加快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基库尤人持有土地的不断丧失,加剧了基库尤人在阶级、性别和代际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情形有助于说明在随后发生的与英国殖民当局的冲突中,基库尤人内部分化为不同派系的事实。握有地产的年长户主们倾向于持保守态度并且尽力避免卷入与殖民当局的冲突,或者作为殖民当局的拥护者而从情感和行动上对当局积极表示忠诚,而那些缺少土地(或不具备拥有土地权利)、属于年轻“年龄组”的成员们,则在支持反殖民当局的运动中,倾向于表现得更为好战和积极。

基库尤人——尤其是其中一些特定群体——所面临的土地危机,是在另一个对肯尼亚的社会稳定起破坏作用的变化过程——二战后非殖民化的大趋势,以及肯尼亚民族主义者受民族独立前景在望的鼓舞而展开日益增多的有节制的政治活动——已经出现的背景下发生的。此类制度化的政治活动遭到了来自殖民当局的全面抵制,当局之所以采取如此做法,是由他们被夹在英国内政部日益上升的自由主义政策与当地白人定居者的不妥协态度之间的情势所致。当然,殖民当局的抵制措施也不乏某种思想基础,他们真诚地以为,政治活动只会加剧“现代化”所造成的张力,并且彻底破坏安逸的(和非政治性的)部落生

活传统。非洲人被认为尚未从文化和心理上做好采纳西方式政治的准备,因此,任何就“土著人”的政治活动所作的有利于土著人的反应,都会被当局看成是对他们在保护其“照看对象”免受“现代化”所带来的紧张之害时应尽的家长式责任的取消。这些便是二战后一段时期内对肯尼亚发生影响的有关变化过程。但茅茅起义的起源并不在于这些变化本身,而更在于不同的冲突方是如何解释这些过程以及如何试图对这些过程做出反应的。

二战后肯尼亚的威胁与机遇归因

威胁或机遇的集体归因是动员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机制。它包括(a)创造或输入以及(b)传播一种对某些政治行动者可能采取的行动(或者未能实施的行动)有可能产生的结果方面所发生之变化的共同界说。威胁—机遇归因常常因赞成对威胁和机遇做不同解释的人们之间的互相竞争而起,其结果则是其中一方的观点终会占据上风。此类不同意见的竞争,当然也出现在“茅茅”这一案例中。日益展开的肯尼亚冲突中的各方把主要的社会变化解释为重要的威胁和机遇。二战后非殖民化的大趋势以及由此而催生的民族主义运动被大量移居肯尼亚的白人定居者视为严重威胁,殖民当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其视为一种威胁。这种威胁感因1948—1949年英属马来亚殖民地爆发的共产党人起义而明显增加(Kattenburg 1990)。(那里的殖民当局所做的反应是在1949年宣布“紧急状态”,该模式很快被肯尼亚当局借用。)

肯尼亚民族主义者则把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看成是前所未有的独立机遇即将到来的证据,其结果是肯尼亚与非洲其他地区同样出现了民众动员的上升势头。诚然,甚至在二战结束前,

对战后世界所持的日益增长的乐观主义态度就已经在肯尼亚温和的民族主义者中间激起了有节制的政治活动,1944年“肯尼亚非洲人联盟”(KAU)的成立便是这一趋向在组织上的表现。

停止军事上的敌对行动丝毫未能打消肯尼亚民族主义者的斗志,相反,一系列相继快速发生的重大事件,明显增强了变化就在眼前的强烈感受。首先是在伦敦的英国政府发表了一项通告,宣布对英属非洲殖民地采取“种族多元主义”(multiracialism)的新政策,尽管该通告仍显模糊,但它似乎还是预示着与战前白人至上的现实彻底告别的前景。接着便发生了印度争取最后独立的一幕幕,而1946年欢呼肯尼亚民族运动主要领导人肯雅塔流放归来,又为处于二战刚刚结束之际的一时兴奋中的肯尼亚民族主义团体提供了一种激奋之情,肯雅塔于1947年登上“肯尼亚非洲人联盟”主席一职更是增强了他们的这种情绪。由此,不仅由“肯尼亚非洲人联盟”参与领导,还包括其他政治组织参与进行的政治活动,进入了一个上升时期。例如:以内罗毕为基地的“东非工会大会”(EATUC)在蒙巴萨发动了一次有15000工人参加的总罢工,这次行动又进一步地增强了战后最初一段时期肯尼亚普遍出现的不稳定感。

如果说战后非殖民化的总体趋势已经让白人定居者忧心忡忡,那么,日益增加的由肯尼亚大多数本地民众参与的政治活动则更是令他们惶恐不安。受这两种情形以及英国政府所提出的“种族多元主义”含糊政策的威胁,白人定居者们于1949年公开提出他们对南非式白人至上政策的支持计划。这份题为“肯尼亚计划”的声明,在非洲政治圈内得以广泛宣传,并且被肯尼亚民族主义者们解释为对土著人利益的严重威胁。

各种斗争事件的发生,典型地来自于并且也依赖于国家与非国家的精英及挑战者对出现在环境方面的重大不稳定态势的

洞察与理解。这种共同理解则确保了双方持续性把当时的情形视为实现各自集团利益的意义重大的威胁和/或机遇。二战刚刚结束之际广泛出现的非殖民化趋势,正有利于造就这种有关肯尼亚种族政治重构的普遍不确定感。用朗斯代尔的话说:

二战后……肯尼亚历史上不和谐的几股绳,又被拴在未来将由谁来控制的问题之结上。肯尼亚会变成像南非那样由占少数的白人统治的自治领,还是会变成像拟议中的中部非洲那样的多种族以伙伴身分共处的地方,抑或成为一个纯粹的黑人国家呢?在世界各地均处于衰落之中的殖民统治又能维持多久呢? [Lonsdale 2000:212]

与不确定感相联的威胁或机遇感的增强,转而促进了现有的冲突各方互相密切监视各自的行动,并且从事逐步升级的反应性动员。至1950年,肯尼亚已经明显出现了那种为人们所熟悉的具有斗争动员典型特征(参见图2.1)的行动模式,的确,这一年为人们展示的是那种反复发生的斗争行动之经典样式,而它则源自弥漫于肯尼亚战后政治中的广泛的不稳定感。“东非工会大会”发动了一场反对英国提出授予内罗毕市“皇家特许状”这一看似无害且多半属于仪式性的计划的运动,在肯尼亚的民族主义者那里,该计划则被理解为殖民当局怀有将基库尤人周围地区的政治控制权交给由白人掌握的城市政府的阴谋企图。在随之而来的运动进行期间,“东非工会大会”的领导人弗雷德·库拜(Fred Kubai)和其他激进分子遭到当局的逮捕,这一事件随即又引发了一次持续了十八天的总罢工,直至被警察和士兵镇压下去。

同年,肯雅塔和他领导的“肯尼亚非洲人联盟”也发起了一

次请愿活动,意在要求恢复已失去的(多半属于)基库尤人的土地。请愿活动延续到 1951 年,征集了 67000 人的签名,但殖民当局对此却完全不置一词,始终未能表示出相应的尊重和做出应有的反应。肯雅塔为此在继续推进请愿活动的同时,直接向殖民大臣詹姆斯·格里菲思(James Griffiths)发出吁请,要求将选出的十二名非洲人议员增补到“肯尼亚立法会议”中。这一请求发生在格里菲思访问肯尼亚期间,其结果只是为肯尼亚当地人新增了两个立法会议的席位,而不是肯雅塔所要求的十二个,与此同时,当局还答应第二年将就有关总体问题举行一次“立宪会议”。但由于此前已宣布的“紧急状态”法令,拟议中的这次立宪会议始终未能得以召开。

从有节制的斗争到逾越界限的斗争

值得安慰的是,已经发生的这些事件不啻是将紧随二战之后肯尼亚日趋积极的动员行动限定在有节制斗争范围内。但与此同时,尚有另一股新出现的集体行动之流,它代表的是更为逾越界限的挑战方式,不仅挑战肯尼亚的种族体制,而且向基库尤社会内部传统的年龄、阶级和性别关系提出了挑战。这股行动流与其说是对肯尼亚非殖民化的威胁或者前景所作的反应,还不如说是针对战后严重的土地危机做出的回应。

这第二股起义流的具体起始时间不太清楚,但从某些在马塞地的奥伦古鲁昂(Olenguruone)定居点遭驱逐的基库尤人“占地者”中发展起来的草根抵抗运动,显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事实上,所谓的占地者们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就已经被逐出白人所在的高地地带,尽管他们对那儿的土地还保有所有权,但

他们随后还是被迫迁居到马塞地的奥伦古鲁昂。更为火上浇油的是,作为被迁移居民重新安置计划的一部分,占地者们被要求参加一项旨在保护土壤的修建梯田的计划,该计划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同时还打上了某种文化上的贬抑印记。另外,其他一些增加负担的法规也相继被当局实施。

殖民当局的种种做法,与从奥伦古鲁昂的占地者们中间发展起来的共同命运和信任关系的正面遭遇,最终引发了一场普遍的抵抗运动,一场基库尤人拒绝执行殖民当局的种种规定与当局威胁驱逐基库尤人之间的长期斗争随之而起。

使事情更趋复杂的是,殖民当局倚重的是得到官方承认并且握有强制力量的基库尤人“首领”和其他传统的部落精英,以强迫推行其重新安置移民的计划。1946年,当一群占地者从奥伦古鲁昂出发,长途进军150英里,去找“大头领”科伊南格 98 (Koinange)商讨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时,冲突达到了顶点。这些占地者在向大头领发难的同时,也向肯雅塔发出了求助。

肯尼亚历史最悠久的非洲人政治协会“基库尤中央协会”(KCA),帮助将3000名奥伦古鲁昂移民组织成为“基库尤高地占地者协会”,但所有这些活动最终均毫无结果。基库尤人首领科伊南格和肯雅塔以及其他拥有土地的基库尤精英,在他们给予严阵以待的占地者们以支持时,并未显示出多少好斗的成分。而一心要把“土著人起义”扼杀在萌芽之中的殖民当局,则做出了采取镇压措施的进攻性反应。起义尚未来得及(1)加深基库尤人在阶级、年龄与各王朝之间的分歧——大部分的部族首领最终都反对起义,(2)使殖民当局和白人定居者在对基库尤人内部分裂依然无知时饱受民众动乱的威胁,就在1947年年中宣告失败了。

奥伦古鲁昂起义以一种更重要的方式塑造了冲突的发展。

起义首次采用了作为“茅茅”标志及其征募新成员主要手段的“激进起誓”(radical oathing)的做法,通过立誓而建立部族成员之间的团结、加强集体责任感,是基库尤人部落生活中由来已久的主要方式之一,不过这一做法习惯上仅限于那些被认为适于承担誓言所赋予责任的基库尤人(比如,年长的户主和拥有土地的男性)。而与奥伦古鲁昂起义联系在一起并标志其重大意义的立誓做法——它因此也威胁到年长的户主们——则显示出与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做法的彻底决裂,在起义中,立誓被用来征募任何愿意参加斗争和抵制移民重新安置计划的人们——非户主的男性、妇女甚至儿童。除了与殖民当局有着紧密联系这一层原因外,正是激进起誓所带来的十足的政治和文化挑战,使得传统的基库尤精英表现出对占地者们所发起的运动的厌憎。

重要的是,激进起誓并未随占地者起义失败而告终,战后土地短缺已然在整个白人控制的高地以及马塞地造就出与奥伦古鲁昂类似的环境和条件。如同对压迫人的重新安置计划的普遍抵制约定在人们中间得以迅速传播一样,奥伦古鲁昂的立誓做法也在受影响的占地者们中迅速传播。不过,要不是以内罗毕为基地的、松散组织在一起的年轻而无地的好战者们,与以内罗毕周围的农村地区基安布(Kiambu)为根据地的年长而温和的“基库尤中央协会”的老手们之间形成的短命的联盟,这第二种民众抵抗运动的命运或许就只能是始终处于涣散状态并最终逐渐消逝。形成这一联盟的根本动机并不完全清楚,或许,立誓做法的传播已使得“基库尤中央协会”的老手们确信,有一批更为年轻和激进的支持者们需要他们去组织利用,或许,他们是出于对殖民当局完全不妥协态度的灰心丧气,而确实打算通过制造普通民众运动的方式,以取代请愿和劝说这类更为传统的政治手法。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基库尤中央协会”的老手们还是很快地抛弃了这一联盟关系。也许,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出于部落首领们对奥伦古鲁昂占地者所持的那种普遍威胁感和文化反感,因为这一流产的联盟引起的是比激起奥伦古鲁昂起义的起誓更为激进的起誓运动。新的起誓运动在两个方面表现得比以前更趋激进,首先,尽管缺乏标准化的立誓形式,但它的一些变化形式带有强制性和文化上的危害性(比如,一些与性有关的和/或造成身体痛苦的做法)。其次,至少对那些新加入者来说,起誓的一些行为要求,开始具有较作为占地者起义特征的总体上的消极抵抗形式更多的东西。由此,随着1950年运动的开始发生,我们也就开始看到一种针对殖民当局及其基库尤同谋的人身和财产而进行的较低程度的暴力活动。这类暴力活动最早的例子之一,为它的总体情形提供了很好的例证。这一例子发生在1950年初,当时,大头领科伊南格的一个儿子,因涉嫌拒绝起誓和被怀疑向政府告密而被杀。

尽管新的起誓运动最初是以内罗毕为基地,但它很快便蔓延至其他基库尤地区——尤其是穆拉维(Murang'a)和涅里(Nyeri)——如同对那些被认为应对基库尤社会内部日益增长的不公正负责的人们所展开的攻击在基库尤各地的迅速扩散一样。不出意外的是,这些攻击——尤其是当它们与制度化的肯尼亚政治骚乱结合在一起时——引发了白人定居者和殖民当局广泛的惊慌和恐惧。暴力活动同时也加深了存在于基库尤人自身内部的危机。不过,尚未看出基库尤社会内部出现的分裂的肯尼亚白人和英国当局,仍然把这些零星发生的攻击理解为协同和普遍的基库尤人造反。殖民当局尤其确信的是,肯雅塔以及“基库尤中央协会”所从事的制度化或曰有节制的政治,多少是与日益上升的暴力势头连接在一起的(或许还为其提供庇护

100 所)。

为人们的行动、解释和反应加速提供动力的决定性时刻,是宣布“紧急状态”的 1952 年 10 月 20 日。名义上,宣布“紧急状态”的理由是又一位与英国人结盟的部落首领遭暗杀,但实际上,继科伊南格之后担任大首领的瓦鲁休在 10 月 7 日的遇刺,只不过是殖民当局采取一段时间以来白人定居者不断敦促采取的决定的先制人的打击行动的合适借口罢了。当局在 10 月 20 日的行动以及在宣布“紧急状态”后紧接着采取的一些行动表明,在他们的信念中,已经发生的这些攻击和肯雅塔以及其他温和的基库尤政治家们逐渐增加的政治活动,不过是一场统一的起义行动之不同方面表现而已。

紧随着“紧急状态”的宣布,当局对内罗毕和基库尤人居留地周围展开了扫荡行动,逮捕了 146 名政治要人,而这 146 人多数属于观点相对温和者。不过,当局这次扫荡的重要战果却是抓获了肯雅塔,他们仍然确信的是,肯雅塔是这场起义邪恶的幕后策划者。肯雅塔随后遭到审判,并依据显然是编造出来的证据,被囚禁了近十年时间。肯雅塔在卡彭古里亚(Kapenguria)的被审判,不仅远未能压服非洲人的抵抗,反而促进了肯尼亚国内以及其他地区广泛掀起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一份出自 1952 年 12 月的警察秘密报告指出:

一种民族主义的精神已然在肯尼亚诞生,……而知识分子的明显意图正是要充分利用这一形势。发生在卡彭古里亚的一幕所提供的是……肯尼亚非洲人能够指望从西海岸、印度和苏丹得到支持的明显证据,对那些不仅把这次审判视为对基库尤领导人的审判,而且将其视为“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实力较量的非洲人产生深远的影响。这

种隐伏的外在影响最为危险,并且,如它明显的意图所表明
的,它将鼓励那种基库尤人正在为正义事业而战的信念。
[Lonsdale 2000: 236]

一些最忠诚的“茅茅”新加入者对大规模逮捕做出了迅速反
应,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有多达两万人,主要是年轻而贫穷(无
地)的基库尤男性,逃到内罗毕北部和西部的森林保护区内。斗
争的积极军事行动阶段也已经开始,它产生于那种复杂但依旧
为人们所熟悉的冲突互动样式,此类互动发生在各种挑战者与
政府及非政府精英之中,这些人日益协调彼此行动,并且有着对
体现在不断发展的形势中的不确定性和威胁的共同感受。在这 101
种意义上,“紧急状态”的宣布和基库尤人退至山区,就只不过是
逐步升级的冲突中一再发生的更晚也更为引人注目的诸多步骤
中的两步而已。

茅茅起义中的社会利用和居间联络

以上所略述的斗争事件的社会结构的与文化的根基何在
呢?当威胁和机遇的利用导致产生多种创新性的集体行动之
时——这一切明显地发生在肯尼亚——特殊的行动者们常常利
用现存的社会空间和集体认同,以帮助做出这些有关威胁和机
遇的解释。我们称这些机制——我们最初看到这些机制是在美
国民权运动中黑人教堂所起的动员作用上——为“社会利用”
(social appropriation)。与此相关的是,我们把“居间联络”(bro-
kerage)视为在斗争行动者的社会性生成、聚合和转变过程中起
作用的第二种关键机制。在第一章里,我们已把居间联络界定
为经由某个中介单位在以前互不相连的两个或更多社会地点相

互之间关系以及/或它们与其他地点之间关系方面的斡旋,将以前互不相连的两个或更多社会地点连接起来的一种机制。那么,这两种机制在肯尼亚所发生的冲突中又有怎样的表现呢?

斗争政治的许多实例产生于由已有的各党派率先采取创新性的集体行动,但倘若冲突导致了前此未曾组织起来或不关心政治的那部分人的动员,则政治斗争便只会转化为革命、农民造反、民族起义或者群众运动。奥伦古鲁昂占地者们的造反和激进起誓运动及其所引发的普遍抵抗,在战后肯尼亚不断发展着的冲突中所起的就是这样的作用。

这些草根民众事件的很大一部分意义,来自于它们进一步加深了殖民统治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这正是战后肯尼亚的显著特征。不过,这些事件又转过来使冲突从既有的政治力量(比如殖民当局、“肯尼亚非洲人联盟”、白人定居者等等)之间的一种策略性互动,转变为真实的逾越界限的斗争事件。如同在许多此类事件中所发生的那样,引起这一转变的关键是此前未曾得到动员者——特别是奥伦古鲁昂的占地者们以及后来以内罗毕为基地的第二波激进起誓的新加入者——的被动员。在这一动员过程中出现的是何种现存的社会结构与关系网络呢?这一过程中被利用的又是何种既有的认同呢?又是谁在激进起誓的传播中充当了中介的角色呢?

由于斗争的这一草根民众运动阶段具有两种不同的地理—时间起源——1940年代的奥伦古鲁昂和1950年左右的内罗毕,因此我们想针对不同“地点”分别来回答这些问题。遗憾的是,也许是由于以内罗毕为基地的运动、宣布“紧急状态”以及冲突的军事行动阶段的开始,这几者之间有着更为紧密的时间上的联系,所以,较之更早一些发生在奥伦古鲁昂的事件,目前的学界对于内罗毕运动有着更为系统的学术研究。但无论如何,

我们仍将对这两个地点分别加以处理。

奥伦古鲁昂

有关奥伦古鲁昂起义的社会起源及其日常认同,目前仅有极少的系统学术研究。不过,即便这次起义具有广泛的基础,而整个奥伦古鲁昂定居点表面上也接受了起义,我们还是可以做这样的猜度,那就是:这次起义是沿着既有的王朝权威和世代权威的路径而得以传播的。现有关于奥伦古鲁昂诸事件的为数不多的概略记述(Buijtenhuijs 1982; Furedi 1974; Spencer 1977)与我们的猜度也正相吻合。例如,我们知道“塞缪尔·科伊纳(Samuel Koina),奥伦古鲁昂定居点的领导人,‘把[激进]起誓带到基安巴(Kiambaa)和古松古里(Githkunguri)[两个邻近的基库尤人定居地]……[那儿]激进起誓与传统的起誓相混合并且形成为一种统一的起誓形式’”[Spencer 1977:238,转引自詹姆斯·比尤塔(James Beuttah),一位基安巴的重要政治人物和上述事件的见证人]。

如果定居地的“领导人”本人积极卷入到新的起誓做法的传播中,我们便能有把握地设想,运动在整个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并且得到半官方的认可。而假设这一条件是具备的,那么,便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起誓以及与之相关的抵抗运动是在定居地既有的决策团体内部发展起来的,并且仅仅是通过呼吁村民团结的传统方法,以及通过共同体生活围绕其运转的王朝认同、代际认同和性别认同的正常补充办法而得到促进的。不过,尽管这一叙述或许貌似有理,我们还是要重申,它据以建立的基础只不过是非常有限的和粗略的经验材料而已。

不过,我们对于奥伦古鲁昂的起誓做法在白人所在的高地

地区的传播,以及促进这一传播过程的多种形式的居间联络,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了解。系统的学术研究针对的是奥伦古鲁昂起誓与抵抗运动扩散过程中,三种中间人所起的作用(Furedi 103 1974a,1974b)。弗雷迪确认了传播过程中的两个群体:

奥伦古鲁昂的斗争对纳卡鲁(Nakaru)地区的占地者影响很大。有一条径直的大路将奥伦古鲁昂与莫洛(Molo)和埃尔布根(Elburgon)连接起来……埃尔布根“基库尤中央协会”的激进分子们与奥伦古鲁昂始终存在联系。1946年初,一大批来自奥伦古鲁昂的好战分子动身去农场,以争取占地者对他们的斗争的支持。他们为埃尔布根地区和索伊桑布(Soysambu)大庄园——“基库尤中央协会”的一处重要活动中心——的许多“基库尤中央协会”的激进分子们施行一种新的统一起誓。[Furedi 1974a:3]

在激进起誓的传播和投入激进起誓所意味着的下层民众斗争方面,“基库尤中央协会的激进分子们”以及“来自奥伦古鲁昂的好战分子们”,都表现积极。

“基库尤中央协会”的激进分子们所起的作用,与对许许多多的运动和革命早期下层民众抗议的传播所作的有关叙述,是一致的。一旦认识到有机会借助于下层民众活动以加强或者重新激活其组织,既存组织的成员们通常会充当即将来临的运动的居间联络者。在当前的这一案例中,“基库尤中央协会”的老手们的动机,或许就非常类似如此。显然,他们是赞成奥伦古鲁昂运动的总体目标的,但此外,他们可能还指望借助于由运动所动员起来的下层民众的能量,重新激活因“基库尤中央协会”的建立及其与魅力型领袖肯雅塔相连而变得多少有些黯然失色

的某个组织。

但“基库尤中央协会”的激进分子们并非是使奥伦古鲁昂斗争的“好消息”得以传播的唯一一群人,决意为运动动员提供支持力量的斗争领袖们,也积极致力于把起誓做法与运动的更大目标以及对运动的理解带到白人控制的高地的农场里。弗列迪指出(1974a:1):“奥伦古鲁昂斗争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是象征性的或者有示范意义的,还在于它对政治组织领域的影响。奥伦古鲁昂的移居者们发动了一个政治动员过程,这一过程则为白人高地的‘茅茅’运动的增长提供了直接的组织推动力。”

在传播占地者最初起义的过程中,还有最后一个表现积极的群体,他们是那些巡回流动的商人们,他们每天的日常活动要求他们穿行在他们所在的居留地、内罗毕和白人高地的农场之间。鉴于由这些商人所维系的联系已然存在,因此这些商人们所扮演的便不再是建立新联系的中介人角色,而更多的是起到传播者的作用。而他们在起誓做法的传播中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商人们的出现,本身便是战后土地紧缺的部分写照,他们其实并不是那种可以任意选择从事某种有利可图的生意的殷实而富足的商人,而更是一些由于缺少土地或在城里没有找到合适职业,只能通过充当农场的临时佃农或者一有机会便在一分为三的基库尤各地从事一些商业活动以勉强度日的边缘人。 104

尽管这些商人们生活处境贫寒,但他们从内罗毕城四周到他们的居留地以及白人高地之间的定期活动,却使得他们成了不可或缺的信息和通信联络之源。是他们将基库尤社会结合到了一起,他们是早在茅茅起义发生之前就从事居间联络的中介人。在有关奥伦古鲁昂斗争的叙述中,伯曼和朗斯代尔(1992:418)在谈到这种商业上的“微弱纽带”(Granovetter 1973)在激

进起誓做法的传播中所起的作用时指出：“受与奥伦古鲁昂有联系的、由前占地者转变而来的商人们的鼓励，一个又一个农场里的人们纷纷发誓团结一致。”

内罗毕

以内罗毕为基地的随后的运动又如何呢？它成功利用的又是何种现存的社会结构和既有的集体认同呢？我们能够确认那些在城市运动中发挥与“基库尤中央协会”的老手们、奥伦古鲁昂的激进分子们以及巡回流动的商人们在较早发生的占地者起义中同样作用的居间联络者吗？幸运的是，较之奥伦古鲁昂，关于内罗毕有远为系统的学术研究成果可以用于回答这些问题，而这些材料又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

关于这第二种更为激进的起誓运动的起源，目前仍然是辩论的主题（参见 Buijtenhuijs 1982:14），不过，有关这一运动的大的轮廓还是有着总体上的一致意见。斯宾塞提供了有关这一运动起始的有代表性的叙述：

尽管某些住在内罗毕的人们已经采取了〔奥伦古鲁昂〕的起誓做法，但这多半还是发生在乡村地区。为了使这种起誓做法传播到内罗毕，“姆巴里”（Mbari）〔这一称谓是保留给基库尤社会内部王朝权利拥有者因此也就是传统的部落首领的〕指示……科伊南格去和两位最著名的工会领导人弗雷德·库拜和蒙加伊（J. M. Mungai）（分别为“交通和联合工人联盟”的秘书长和主席）联系，看他们是否愿意加入运动。科伊南格在1948年的晚些时候接触到他们二人，而他们提出了两个条件作为同意采取起誓做

法的前提。首先，起誓做法不再仅限于那些能够交得起费用的人……或者“基库尤中央协会”的成员们，抑或那些经“基库尤中央协会”允准的人们，而应当给予可信赖的所有基库尤人；其次，起誓应更加具有好战性。“姆巴里”在一阵犹豫之后最后还是表示了同意，而库拜和蒙加伊则带上他们最信任的十位同事到基安巴（酋长科伊南格的家）去起誓。这些人随后以“行动小组”而闻名。接着，库拜挑选出二十四名工会领导人，这些人也在基安巴起了 105 誓。之后，一组仔细挑选出的“罪犯”（用库拜的话说）起了誓，并被分派去缓慢而稳妥地做搜集武器的工作。再后来，起誓的是内罗毕的出租车司机们 [原文如此]，这些人在随后进一步的群众起誓活动中将会在组织交通方面做大量工作。[Spencer 1975: 9—10]

这第二种运动的早期加入者似乎来自两个主要的团结共同体，显然，其中最重要的共同体则是内罗毕的激进工团主义者群体。该群体以四种主要方式卷入这第二种运动，并由此而卷入“茅茅”运动中。首先，库拜和蒙加伊堪当这场运动的“领袖”之名；其次，最重要的“行动小组”不太相称地来自于工会运动；第三，另有二十四名工会领导人在运动的初期就“起了誓”；最后，工会重要分会之一出租车司机（工会）的普通成员们，是运动最早的——我们将会看到——也是最为重要的参加者。

在本书以及其他许多有关这次运动的描述（如 Furedi 1973）中，第二个表现突出的团结共同体是“Anake wa Forty”或所谓“四十小组”，库拜所提及的大部分“罪犯”均来源于此。“四十小组”本意是指小组成员从文化上已接近进入成年，但它实际

上却是由一伙年轻的街头恶棍或轻微犯罪者临时拼凑而成,这帮人被“行动小组”分派了为运动搜集武器这一首要任务。尽管到1949—1950年时,“四十小组”已不再以任何组织起来的方式而存在,但构成该小组核心的关系网,却继续充当了推进运动向前发展的重要突入点。

有关早期开启内罗毕运动的社会结构和集体认同的叙述就是这些,那么,那些促进了运动扩散的中介人又怎样呢?这里,有三类重要人物出自斯宾塞的叙述以及一些更具一般性的著述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重要人物当中的第一类却构成了一个因运动的目标变得更为激进和更具暴力色彩而很快抛弃运动的群体,他们组成了发起运动的“基库尤中央协会”的老手们与“姆巴里”掌权者(包括肯雅塔)之间的松散的关系网。不过,就这批人的确采取了行动以建立联系,并且因此而促进了运动向激进工会群体的传播所达到的程度而言,很显然,他们起到了充

106 当斗争中至关重要的中介人的作用。

第二组重要的中介人是所谓的“行动小组”,该小组(无论如何曾经在一段短时间内)对于起誓运动的扩散起到了中介作用。毕竟,正是“行动小组”为运动选定了征召第一批新加入者所依靠的组织和群体(比如,工会领导人们、“四十小组”、出租车司机)。不过,在许多方面,运动的关键中介人则是出租车司机,因为正是他们充当了在各类精英(如“姆巴里”、工会领导人)、大众、内罗毕与周围乡村地区之间建立起微弱联系的非常重要的中间人。的确,也恰是因为这一缘故,“行动小组”才利用他们来为运动服务。“行动小组”的这一选择可谓颇有灵感也颇具决定性意义,这是因为,当出租车穿梭往来于内罗毕和乡村居留地以及白人高地之间时,它们也就把起誓做法带到了那些对“行动小组”几乎一无所知、更谈不上让“行动小组”来指导其行动的越来越

越多的各类不同群体当中。由此可见,出租车司机所建立起来的微弱联系,促进了运动的扩散,而不是推动运动朝集中的方向发展。当局继宣布“紧急状态”后对主要领导人——包括库拜和蒙加伊——的大规模逮捕,则进一步地使运动失去中心而趋于分散。

集中统一领导的缺乏与正式的有组织的居间联络的缺席,显示出“茅茅”起义与1983—1986年间菲律宾反马科斯运动之间存在的巨大不同。在对这第二个案例做稍稍详细的描述之后,我们还将在结论部分中回到这些问题上。我们意在由此而改进我们的认识,不仅试图改进有关诸机制之总体适当性的认识,而且试图改进有关这些机制的特定结合与发生序列是如何形成了一次不断展开的斗争事件的认识。

菲律宾的黄色革命

我们关于斗争动员的第二个案例,涉及的是1983—1986年在菲律宾展开的一场运动,这场运动最终推翻了持续了大约十七年之久的费迪南德·马科斯在菲律宾的独裁统治。该运动之所以被称为“黄色革命”,是因为在斗争高潮阶段的游行和示威中,黄丝带(黄色也是贝尼格诺·阿基诺最喜爱的颜色),成为参加游行和示威的人们的象征物的缘故。尽管积极反对马科斯的行动早已有之,但从事这一反对行动的主要行动者——共产党——却置身于黄色革命的局外。这场斗争使新的、主要是精英群体和中产阶级的群体加入到反对马科斯政权的行列中,并且由于马科斯的长期对手阿基诺在流亡美国回到菲律宾的1983年8月21日被暗杀而开始行动起来。阿基诺的遇刺,巩固并扩大了对现政权的反对,并且引发了一系列制度化的挑战

行动,而这些制度化的挑战,则由于马科斯对运动所作的反应而被恶化与极化。

刺杀行动过后,马科斯试图通过任命一个专门小组以展开对这一犯罪行为的调查,来平息人们对刺杀行动的义愤,但由于马科斯将他个人的一些长期朋友和亲信硬塞进调查小组,此举却只能是火上浇油。迫于国内外的反对压力,马科斯最终在这一问题上做出让步,他重新任命了一个新的——或多或少是中立的——委员会以调查刺杀行动,不过,在整个斗争进程中他将不断重复继公然的挑衅和不妥协态度之后而做出勉强努力以求平息事态的总体模式。高潮因1986年2月“仓促选举”——此次选举的消息马科斯已于上一年的秋季在美国电视上发布——的举行而到来,设计这次选举的目的,是在通过显示民众对马科斯政权的支持,以安抚马科斯的批评者们。尽管有国内和国际的选举监察组在场,但马科斯的军队还是采取了公开的选举欺骗和对选民进行恐吓以及推迟公布选举结果的做法,然后宣布马科斯以很大的得票优势而赢得选举。

2月16日,当马科斯的竞选对手科里·阿基诺号召举行总罢工以抗议选举结果时,事态发展到了顶点。几万名示威者响应阿基诺的号召走上了街头,六天后,国防部长J.P.恩里尔和F.拉莫斯中将——此前一直是马科斯的盟友——夺取了设在马尼拉阿吉纳尔多营地的军队总部的控制权。出于对马科斯采取军事报复行动的担心,大主教海梅·C.西恩(Jaime Cardinal Sin)号召市民包围军事基地以防发生军事叛乱,成千上万的市民又一次响应号召,从而有效阻止了马科斯可能做出的军事上的反应。由于无法采取军事行动,又失去政治上的支持——甚至失去了里根政府的支持,马科斯于2月25日离开菲律宾,流亡至夏威夷。阿基诺随后宣誓就任菲律宾新总统,继而开启了

一个有不同党派参与冲突的激烈的动员时期。党派斗争的焦点则是菲律宾政治的重构,这一后来时期的斗争至少延续到了1987年。不过本章只是集中于黄色革命本身,与在茅茅起义问题上一样,我们将以这一事件背后的广泛的历史变化过程作为我们叙述的开端。

108

引起黄色革命的历史变化过程

由于黄色革命混合着长期的变化过程与突发性的具有转变作用的事件——这些事件有助于引发革命,这次革命遂成为一个颇为有趣的案例(McAdam and Sewell 2001; Sewell 1996)。在这些突发性的事件当中,阿基诺的遇刺无疑充当了直接引发斗争事件的催化剂。不过,要充分地理解这一重要事件,尤其是理解马尼拉的中产阶级和精英分子对这一事件所作的反应,则必得将暗杀事件置于适当的历史情境之中。而这将要求我们对迨至阿基诺遇刺时马科斯政权的统治历史做一番叙述。这段历史系由两个各不相同却又显然是相互联系的故事情节组成,其一是关于马科斯与阿基诺二人之间不断展开的个人以及政治上的竞争与长期不和,另一则是有关马科斯从最初与安德森(Anderson 1998)所谓“菲律宾的党魁民主”保持一致,到后来与这种党魁操纵的民主制的决裂。我们的叙述将从后一故事开始。

菲律宾共和国在1946年的建立,几乎没有给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的基本分配带来任何改变。独立前控制菲律宾社会的一小撮有权势的家族,继续构成了独立后统治菲律宾的寡头政治群体。唯一真正的变化是强有力的总统职位的设立——仅有的限制是只能连任两届——这预示着(并且一度促生了)寡头政治的循环往复,将成为菲律宾政治的一大制度化特征。马科

斯在 1965 年登上总统职位,是与当时存在的规范—制度化的框架完全一致的,但他在 1972 年(这是马科斯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任期的倒数第二年)宣布实施戒严法,则标志着与党魁操纵的民主体制中已确立起来的传统习惯,以及确立这些传统和习惯的其他寡头政治成员们的决裂,对此,安德森(1998:214—215)解释道:

就寡头政治而言,马科斯直接攻击的是这一体制的要害——“法治”,从一开始,马科斯就运用他手中掌握的实施戒严法的无限权力,向那些梦想反对他或取代他的寡头政治成员们发出忠告,要他们明白财产并非权力,因为在戒严法的一击之下,财产便不再成其为财产了。洛佩斯王朝……突然失去了它的大众传媒帝国及其对马尼拉主要电力供应的控制。稍后则有面积达 500 公顷的奥斯门德大庄园(Hacienda Osmenda)被拿来进行所谓的“土地改革”。没有任何可以求助的对象,因为法官全都受到威吓,而立法机构则充斥着马科斯的盟友和他的逢迎者。不过,马科斯决没有兴趣去颠覆既定的社会秩序,对于那些见风使舵和避开政治而追求利润和财富的寡头政治成员们,马科斯多半没让他们受到多少干扰。

109

但戒严法的持续生效并不仅仅由于马科斯已经将其他的寡头政治成员同化过来,在这之外,他还动员了一支强有力的或许有些混杂的同盟力量,这些人最先赋予戒严法体制以逐步增加的合法性。安德森(1998:215)再次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洞见:

在开始时,戒严法体制拥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

它的那一套反共产主义的、“改革主义的”、“现代化的”以及“法律与秩序”的辞令,引来了失意的可能的技术统治论者,许多……城市中产阶级,甚至一部分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支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政权的贪婪和暴力的一面变得越来越明显,而对该政权的许多支持也日益枯竭。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技术统治论者已是精疲力竭,而城市中产阶级也愈益意识到马尼拉政权的腐朽、大学体制的遭毁坏、被垄断的大众传媒所具有的卑鄙与荒谬特点,以及整个国家经济上的衰落。

在已经与马科斯疏远的前盟友当中,还应当加上菲律宾天主教会的各级官员们。到20世纪70年代结束之际,所有这些群体都已深为憎恶马科斯政权,其中有些已开始采取行动。

依随后发生的事件看来,工商业界和教会在反马科斯的活动中特别值得关注。尽管马科斯政权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在整个70年代始终在不断恶化,但教会的领导层却并不希望“因严厉批评政府或偏袒那些在教会所组织的社会正义计划中表现最为积极者,而冒与政府关系破裂之险”(Youngblood 1982: 52)。不过,马科斯政权对教会内部左翼激进分子日益增加的镇压做法,还是使得教会领导层不可能继续保持这种策略性的沉默。部分地受教皇于1981年访问菲律宾的鼓舞,教会领导人开始对政府提出了更公开的挑战。“1983年1月,‘菲律宾天主教主教会议’(CBCP)决定退出‘教会—军队联络委员会’,以示对军队与教会激进主义分子之间日益上升的尖锐冲突的公开承认”(Hedman 1998: 278)。一个月后,“一些主教发表了一封言辞激烈的致教区信徒的信,谴责政府的镇压措施和腐败以及对经济的管理不善”(Youngblood 1990: 197)。

110 尽管马尼拉温和的工商业界在从事反对活动方面落在了教会之后,但他们还是和教会一样,经历了从最初支持继而沉默地表示容忍到最后公开反对马科斯政权的过程。如果说,“菲律宾社会进步促进会”(PBSP)这类团体早在马科斯的第二届任期(1969—1973)内就已经开始从事各种政治活动的话,那么,工商业界的大多数则依然坚定地支持这一政权,并把戒严法的宣布视为政治经济生活必要的稳定物。但是,20世纪70年代中晚期日益受到损害的公民自由权利状况、农村中日趋增加的共产党起义的威胁,以及整个70年代经济的急剧衰退,则逐渐销蚀了工商业界对马科斯政权的支持。尽管如此,和教会一样,工商业界在80年代到来之际,在这些或那些问题上多半仍然是保持沉默。伊娃—洛塔·赫德曼(Hedman 1998:289—290)写道:

只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衰退的开始,这种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波,冲击了整个菲律宾,并由此而促成了“亲信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政治经济学的解体……一度与“菲律宾社会进步促进会”联系在一起的那些谨慎的非政治性的宣言和计划,逐渐让位于20世纪80年代复兴的企业行动主义,这种行动主义聚集在“马卡蒂商业俱乐部”日益坦率有力的声音周围,并在1981年第一次登上了菲律宾的民族政治舞台。

在动员和表达日趋增长的对现政权的共同反对方面,较之“马卡蒂商业俱乐部”甚至更为重要的团体,是“菲律宾商人会议”。该团体最初成立于1971年,一开始也是将自身视为现政权的同盟的。但是,如同以上我们所概略介绍的总体模式一样,到80年代初,商人会议则已经变成了产生反马科斯情绪和行动

的温床。

迄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菲律宾社会关键的制度与意识形态核心——它们一度是马科斯的重要盟友——已然变得公开敌视该政权了。简言之,阿基诺的遇刺并未在任何简单的意义上导致运动的发生。“如果说暗杀行动提供了引发在乡村集市和城市商业区里的祈祷守夜和五彩集会之类行动的催化剂,那么,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天主教会以及诸多社团协会之迅捷而协调一致地恢复活动,则反映了”……此处所论及的长期社会变化(Hedman:266)。不过,说菲律宾社会的关键组成部分,到 80 年代初已与当时的政权严重疏离,并不是要低估阿基诺遇刺以及马科斯—阿基诺之间较广义的长期争斗对于事件发生的重要性。

黄色革命中的威胁与机遇归因

菲律宾的经历凸现了与单个突发事件相连的“大爆炸” (“big bang”)说的局限。这是因为起催化作用的事件常常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事件的最初始起点。在菲律宾的例子中,阿基诺的遇刺仅仅是使得马科斯与阿基诺之间长期的政治敌对达到了顶点,而他们之间的争斗,则至少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确,马科斯在 1972 年宣布实施戒严法,部分地是为了在计划于 1973 年举行的总统竞选中避免面对阿基诺的竞争。随后,阿基诺以各种“政治罪行”为名遭到马科斯政府的监禁。不过,阿基诺尽管身陷囹圄,还是在 1978 年的立法会议中期选举中领导了一批反对派候选人的竞选活动,而当局虽然通过选举当中的舞弊行为,使阿基诺本人未能当选,但由于他反对马科斯政权的英勇行动,他的个人影响反而因此变得更为突出。

在卡特政府的压力下,阿基诺终于获释并被允许去美国做心脏手术。此后,他一直留在美国,过着流亡生活,利用一切机会发表对马科斯政权的反对意见。据说,阿基诺在1983年回到菲律宾,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有关马科斯健康状况不佳因此不可能长期把握权力的传言的促使。阿基诺也的确认为他能够劝说马科斯“做出将权力和平转交给反对派的安排,或者在不能做到这一点时,使他本人取得反对派领袖的地位”(Lande 1986: 115)。换言之,正是阿基诺对马科斯新近变得能够接纳挑战或者易于受到挑战的这一信念,才促使阿基诺结束他的流亡生涯返回菲律宾。

如果说阿基诺的行动是被一种“政治机遇”感所驱使的话,那么,暗杀行动便代表了武装部队中忠于马科斯的分子,因对阿基诺回到菲律宾感到威胁而做出的一种创新性的——即便也是愚蠢的——策略性反应。其结果则是,暗杀行动促成了一种对于菲律宾未来政治变化无常之总体上的不确定感,而这一不确定感——如同我们已经表明的——对于斗争政治中的持续性事件来说,又有着如此的重要性。

更准确地说,这种总体上的不确定感,其本身也源于冲突中的关键各方继暗杀事件发生后对冲突所作的反应。具体而言,正是那些马科斯政权名义上的支持者或者此前保持沉默的社会精英们,对于暗杀行为以及更为普遍地对马科斯政府的强烈谴责,促使人们对形势做出了“危机”的界说。这些新的批评者囊括了菲律宾的工商各界、主流新闻媒体、某些美国政府官员以及

海梅·西恩和菲律宾天主教会的各级官员。^①而这些群体中排在最后的一个群体也是运动之初最为重要的群体。

西恩和其他教会高级官员多年来一直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这种压力来自一批活跃于以教会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穷人中的左翼分子,他们要求公开、直接地反对马科斯政权。不过,直到暗杀行动发生时,西恩总体上还是避免了公开批评马科斯政权抑或在一些政治问题上采取强烈立场。这并不是说西恩和正式的教会官方体系,如同体现在“菲律宾天主教主教会议”那里一样,是马科斯政权的坚强盟友。相反,教会与马科斯政权之间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变得紧张的关系,由于政府在各级教会组织中开展的日益令人反感的反“共产党人渗透”运动,而在80年代初期进一步削弱(Youngblood 1987:352)。不过,裂隙基本上还不太容易看出,因此,在公众看来,教会仍然保持了对马科斯政权的默许式支持。

随着暗杀事件的发生,形势急剧地起了变化。西恩和其他教会官员对阿基诺之死做出了直接而强烈的反应,他们既为政府在刺杀行动中的明显过失,又因为它后来在负责调查暗杀事件的小组中硬塞进忠于马科斯的人,而对政府提出尖锐的批评。在继刺杀行动后出现的如此有力的反政府浪潮中,西恩向那些不活跃却具有政治警觉性的中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发出了至

^① 第七章将就革命形势如何转变为革命的结果这一关键问题展开讨论,我们认为,这一转变的关键是精英背叛与形成跨阶级联合的过程。这里,我们的意思是说,先前与当权政府结盟的政治和/或经济精英与传统反对派群体之间合作关系的建立。我们运用了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的实例来说明这一过程,但黄色革命却奇异地与尼加拉瓜革命这一案例具有相似之处。与尼加拉瓜发生的情形相似,马科斯被先前与他的统治有牵连的精英们所抛弃——以及菲律宾中产阶级的大量背叛——是造成冲突带来成功的革命结果的关键。

关重要的信号。西恩以他对于马科斯政权日益尖锐和经常性的批评,帮助公众清楚地表达和形成对诸事件的反应,把为许多人所感受到的个人情绪变成为公众的声音。暗杀行动与有关菲律宾民主的可悲现状激怒了他,也使他深感不安。

西恩的背叛大大促成了使事件得以持续的危机感和不确定感的出现。这种总体不确定感,又与紧随暗杀事件而来的一些日子里所发展出的对于威胁和机遇的解释联系起来。对于名义上保守的中产阶级,暗杀事件开始被视为对菲律宾残存的稳定局面的深刻威胁;而对于传统的左翼反对派——他们从未怀疑马科斯政权所造成的威胁——阿基诺之死则被当作一次将马科斯赶下台的真正“机遇”而被紧紧抓住。

尽管动用了各种政治花招,马科斯却始终未能重建起总体性的政治稳定感和政治秩序,而这种政治稳定感和政治秩序原本有可能削弱那些进一步刺激冲突发展的对于威胁和机遇的共同感受。相反,一如在所有斗争事件之逐步升级阶段中出现的情形,马科斯所采取的行动只是起到了加强那种日益增长的社会危机感和总体不确定感的作用。甚至马科斯之离开菲律宾和科里·阿基诺之就任总统也未能立即恢复起——在认识的或结构的意义上——在此前两年半的时间里失去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与之相反,由于缺乏对科里·阿基诺本人政治倾向的了解,加之她又于1986年4月23日发出起草新宪法的号召,结果引发了为期近一年的、由所有有志于就菲律宾新政治秩序的形式与实质内容展开角逐的各方参与的激烈的政治动员和政治互动。

文森特·布德罗(Boudreau 即出著作:10)记录了那种明显可感的不确定感,以及那种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的感觉,这种感受成了紧随阿基诺要求对菲律宾政治进行正式重构后的那段时

期的特征。“一些个人和协会匆忙闯入这一真空,热望参与政府的重建。这是一个半夜常常会有电话的时期,当时的首都,各种传闻和流言一个接着一个,而一些激进主义分子也会在集会和举行示威的间歇期,感到有些犹豫和徘徊。”只是到了阿基诺政府的政策和总的政治现状变得更为清晰时(正式批准新宪法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步骤),那种总体不确定感——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威胁和机遇的感觉——才开始消退,而作为所有斗争事件之特征的高水平动员和互动也随之消退。

黄色革命中的社会利用和居间联络

布德罗在其关于马科斯政权被推翻期间及之后的菲律宾民众动员的翔实研究中,恰当地对一些从事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的学者提出了责备,布德罗的责备是,这些学者未能认真对待那些既使普通公民被动员起来,为诸如黄色革命之类的广泛民族运动服务,也使他们在后来斗争进入低潮时被遣散的动态过程。简言之,布德罗很大程度上关心的是那些我们称为“社会利用”和“居间联络”的动力机制。从这种总的理论兴趣出发,布德罗推出了一部有关动员和遣散的力作,此书成为迄今所能见到的最为翔实的此类著述之一。 114

在其他为数不多的对社会利用和居间联络进行的系统研究中,另有一项也以反马科斯运动作为其关注的焦点。不过,由伊娃—洛塔·赫德曼(1998)所从事的这第二种研究,聚焦的则是与布德罗大为不同的一些群体和社会行动者。而把他们的研究合在一起,便涵盖了作为斗争事件之特征的两种彼此相对的主要动员和遣散模式。这两种研究不仅分别赢得了我们的关注,其结合形式也同样博得我们的注意。

布德罗的研究总体上集中关注的是左翼反对派从基层贫民组织中吸收新的合作伙伴的努力,从时间上看,布德罗并不严格关注起源问题,但他的叙述是如此丰富翔实,以致可以为我们提供考察一种重要的社会利用和居间联络形式的总窗口,而社会利用和居间联络的这一重要形式既说明了菲律宾的斗争,同时也具有针对许多斗争事件而言的一般性意义。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些过程,经由这些过程,各反对派组织都企图对此前不活跃的(或者充其量稍显活跃的)社会集团中存在着的建立在共同命运和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日常认同与日常关系网络加以利用。

布德罗发现,我们已论及的既有行动者与新出现的行动者之间的复杂混合,是许多逾越界限的斗争实例所具有的基本特点。他写道(即出著作:8):“这次起义的发生,既有赖于二十年来所进行的反政府活动,也取决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段时间里所展开的更具自发性的骚乱和抗议活动。[支持军事叛乱的最后一批示威行动]……以及引发这些示威行动的喧嚣的竞选活动,在使无组织的市民和中产阶级加入集体示威和抗议活动的过程中起到了显著作用。不过,这些抗议活动同样也有赖于若干组织良好的长期政治运动所提供的组织资源与行动主义传统。”

在斗争事件发生期间,各类既有反对派组织——学生的、农业经营者的和工人的,等等——得以迅速壮大。另外,它还产生115 出或者重新激活了代表传统的菲律宾左翼势力的若干大型组织。这些组织包括:“新民族主义联盟”(BAYAN)、“人民组织同盟”(KASAMA)以及“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促进同盟”(BISIG),后者把自身视为从事民众阵线活动的“新民族主义联盟”的社会主义替代物。正是交织在一起的大量既有的部门性质的(学生、

农业经营者和工人)协会以及一些大型组织,在反马科斯的斗争过程中充当了社会利用和居间联络的重要角色。

受暗杀事件的刺激,这些小的部门性的组织开始从事计划中的吸收新成员的活动,意在将更多为他们所掌握的直接选民吸引到斗争中来,不仅如此,这一过程甚至在菲律宾社会的所有阶层中同时得以进行。农场主和农民的地方组织利用暗杀事件(以及马科斯随后制造出的每一暴行)以吸收新成员,同样地,全国各地的农场主协会尤其是“自由农场主同盟”,在试图激活和扩大名义上受其控制的地方分支机构的数量时,也变得越来越好斗。

不过,在冲突展开期间同时出现的这些局部的、地区性的以及全国性的部门利益的动员和集合,还仅仅是我们所讲述的故事的一半,而且只不过是其不太有趣的一半。毕竟,这些部门利益仅仅代表着菲律宾社会内部为数不多的部分左翼反对派的利益,黄色革命的特征与其说是传统反对派组织的加速行动,还不如说是既担心共产主义革命威胁又厌恶马科斯政权的菲律宾中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的积极动员。赫德曼(1998)在她的研究中讲述的便是有关社会利用和居间联络的这另一半的故事。

如同赫德曼告诉我们的,加入斗争运动的后一部分人,并不是由一些已确立的部门性组织,而是由运动中新出现的一些更为温和的大型组织带入运动中的;在较小程度上,他们的介入则是一些对中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的生活至关重要的机构与名流们直接呼吁的结果。海梅·C. 西恩在马科斯政权的最后日子里向市民发出包围阿吉纳尔多营地的号召,或许是后者表现其活力的最富戏剧性的实例,不过几家保守的报纸和全国性的商业协会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在那些将中产和上层中产阶级带入斗争的更为温和的——

并且典型地属于转瞬即逝的——大型组织中,其中的三个特别值得提及。第一个是“以精神和使命而统一起来的民族”(BANDILA),一个与天主教会长期结盟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该组织在斗争事件中的中心地位又一次说明了教会在使得中产阶级参与运动合法化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二个组织“阿基诺的正义,所有人的正义”(JAJA)在斗争的初期出现时,只不过充当了协调作为运动特征的街头示威行动的工具而已。

像第二个组织一样,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组织“自由选举民族运动”(NAMFREL)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该组织与其说意在使部门利益得以有组织的表达,还不如说是针对一项特殊问题而采取的临时性解决办法。当时的问题是如何确保1986年2月的“仓促选举”得以公正地进行,而不致使得选举欺诈和选民受到威胁这一马科斯政权长期以来在选举中奉行的主要做法得以蔓延和猖獗。“自由选举民族运动”的出现便是针对该问题所做出的反应。尽管名义上属于超党派的组织,但赫德曼的研究还是清楚地表明,“自由选举民族运动”不仅充当了反马科斯的行动主义的温床,并且成为吸引中产阶级参加斗争的正常途径。

与布德罗在研究中所涉及的吸收新成员与动员的模式不同,赫德曼的研究所表明的一个总体观点是,商业中产阶级和天主教中产阶级远远地避开了既有的菲律宾左翼的部门性组织,而赞同和支持此处论及的温和的大型组织,或者,他们只是通过菲律宾社会的一些既有机构(比如:天主教会、商业协会)以吸收自己的新成员。

缺席的共产党人

在我们就社会利用和居间联络问题做出结论之前,让我们

就菲律宾政治中另一重要行动者所做出的不在黄色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一证明具有高度重要性的决定,简单地说几句。我们所说的这一决定,指的是共产党起义者避免积极介入 1983—1986 年及其后的诸重大事件的决定。我们之所以着手考虑这一问题,不仅是为了对菲律宾的情形做出完整描述,也是为了证实这样的论点:社会利用和居间联络不仅包括先前的构造与联系,它们同样还包括实际采取的行动策略和行动路线。共产党人及其所开展的驱逐马科斯的斗争,便可以作如是观。

在那场斗争开始的前夕,组织良好的共产党人就已经既对马科斯政权也更一般地对菲律宾的政治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117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本尼迪克特·柯克夫利特说,

菲律宾的政治风向有利于“新人民军”(NPA)和菲律宾共产党(CPP)的加速发展。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极少数成员和更加少得可怜的枪支开始,共产党和游击队已经成长为深受马科斯政权以及与其统治相连的巨大经济和政治问题之累的非菲律宾国内不可忽视的政治军事力量。迄 80 年代中期,“新人民军”的成员已达到 20000 至 24000 人,控制了大约 20% 的菲律宾村庄和城郊地区……但到 90 年代初,这一地下运动的命运急剧衰落。“新人民军”的“群众基础”减少到只占村庄和城郊的 3%……而“新人民军”的武装成员也已降至大约 10600 人左右。[Kerkvliet 1996:9]

共产党起义者命运的急剧衰落可以追溯至黄色革命,追溯至起义领导人在黄色革命的若干年间以及阿基诺政权的初期所

做出的策略选择。尽管这些选择是在经历过一番有力竞争后做出的,但避免积极参与反马科斯运动以及随后做出的避免积极参与阿基诺政权的决定,却在每一关键时刻得以重申。在这一点上,保持安全距离的姿态的影响始终是灾难性的:

尽管共产党人既不曾鼓动也不曾阻止过 1986 年的反抗运动(即便他们曾经有过如此想法),但菲律宾共产党的内外批评者们还是一致认为:倘若他们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则……(共产党人)运动就会更少受政治体制的变化之害。假如他们不曾选择抵制参与的做法,而是加入到先是在选举投票中接着是在街头击败马科斯的广泛的反对运动之中,那么,革命运动就会处在一种对随后的事件进程发挥影响的更有利地位。[Weekley 1996:29]

何以解释共产党人的这一严重失策呢?罗斯尼·鲁滕(Rutten 1991, 1996)在有关运动全盛期的村庄一级共产党组织的内容丰富的民族志著作中,清楚地向我们表明:这一失误不能归因于他们缺乏对相关社会利用和居间联络任务加以运用的技巧,相反,共产党起义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很好地起到了更一般地引发农民动员的导火索作用。在她从实地调查的庄园里,鲁滕记录了组织者是如何缓慢而艰苦地成功渗透和利用当地的教会与工会以及它们赖以建立的集体认同的。这一成功努力,部分地表现为斯诺和本福德(1988)所谓“架桥”(frame bridging)现象——有意识地努力将运动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与现存的文化架构结合起来——的一个经典实例。鲁滕解释道:

早期的行动主义分子们,通过与其社会网络及与当地许多庄园和村庄的教会和工会建立联系,而最终与庄园内的工人建立联系。而且,他们还与“解放神学”结合起来,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与“新人民军”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全国各地的菲律宾共产党——“新人民军”,对反对戒严法体制和响应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的社会正义号召的罗马天主教教士,也早已产生很大兴趣。在西内格罗斯岛,进步的教士和修女们支持两个好战的联合组织:“自由农场主联盟”……和作为工会组织的“糖业工人全国同盟”……“新人民军”的行动主义分子最终开始了从“基督教基础社群”和工会在当地的组织者中间征募、吸收他们的新成员的工作。[Rutten 1996:120]

在有效地利用了这两个关键的当地机构之后,“新人民军”的组织者们要在庄园社会内更全面地建立强有力的信任与忠诚关系,以及将这些人际资源转变为“新人民军”在村庄一级的正式而有效的阵地,就不是什么难事了。然后,通过把这些村庄一级的阵地连接成更广泛的起义网络,当地的组织者们的居间联络和中介作用终于造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即便存在着地区性差异的)民族运动的出现。

既然具备了这种合适的结构,人们便会有充足的理由想象,共产党人会积极地投身于1983—1986年的危机,也会企图从意识形态方面和结构方面,与反马科斯联盟的各成员组织建立起强有力的联系。倘若他们如此做了,那么,斗争事件的结果以及菲律宾的政治结构,或许就会显得与当今的情形大为不同了。由此可见,共产党人所做出的抵制黄色革命的决定,其作用是使所有斗争事件都具有的那种偶然的、互动性的、依赖情境的本质

得到了强调。贝尼格诺·阿基诺的遇刺,从根本上改变了菲律宾的政治情境,不过,不是这一行动本身引起了转变的发生,而是冲突各方互动性形成的对于这一行动的解释及其新的行动路线,才最终导致了斗争事件的发生。这些解释中之最为重要的解释,以及在我们所提及的这一案例中共产党人的“无为”(inaction)路线,则是“新人民军”和菲律宾共产党内部占支配地位的解释和有关行动路线的态度。

最后,菲律宾共产党人的例子,使我们再次注意到历史与文化在形成某一斗争事件之所有各方的行动方面所具有的过分重要性。大部分时候,人们把文化当作是一整套认识的、情感的和行为的具有约束力的规范,而不是把它作为其行动之可选择的工具。黄色革命期间的共产党智囊团似乎便是如此:

该党的历史以及它在突然宣布选举前所处的战略形势,妨碍了它做出不同的决定……像任何组织机构一样,该党自身的历史与文化,始终是它做出决策的强有力的决定因素——它们塑造了一种方式,依据这种方式,该党所留意的是它周围的“客观的、结构性的事实”,并且从总体上趋向于放慢适应外在变化的过程。在菲律宾政治历史和革命运动发展的特殊时刻,菲律宾共产党领导层的重要人物,却不能理解除经过检验证明是可靠的长期人民战争之外的一些变化。

深陷于以前的历史当中,误导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使他们对当时变动不居的菲律宾政治之可能前景产生了误解。

结论

相同的基本动员机制——集体归因、社会利用和居间联络——出现在我们已经做出比较的两个明显不同的斗争事件当中。个别而直接地加以考虑,这些机制在任何地方都产生出了相同的效果。例如,集体归因总是能够让人们得出有关可能与或然的新定义,并且由此改变其策略选择。不过,动员的整体轨迹及其结果,却绝非在任何地方都遵循同样的模式。其所以不同,是因为这些机制之激活作用的次序、组合、互动与情境,深刻地影响着它们的共同后果。要阐明这一可变性,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存在于我们手头的两个斗争事件之间的一些区别好了。

在居间联络之总体效果上的差异

来看看肯尼亚和菲律宾两地起居间联络作用的关键因素。尽管马科斯的统治具有独裁、腐败和强烈的压迫性质,但菲律宾仍然保留了代表传统左翼与保守的商业和天主教共同体的大量局部的、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协会。如布德罗(即出著作)的分析所清楚地表明的,传统左翼组织在紧随阿基诺遇刺之后和整个冲突展开期间,充当了社会利用和居间联络的工具;而且,如赫德曼的著作所阐明的,后一些组织则在马科斯政权的丧钟开始敲响之际,被动员起来以反对马科斯的统治。在斗争期间,不仅重要的教会和商业机构被利用起来,它们还帮助产生出一大批新创立的大型组织——包括“自由选举民族运动”在内,这些 120 组织又对大多数的民众动员起到了居间联络的作用。

与茅茅起义对比就更是清楚不过了。在肯尼亚,斗争事件

发生的前夕，几乎没什么已建立的政治协会存在。大规模的逮捕行动伴随着“紧急状态”的宣布，则更使得表现积极的很少几个政治协会，例如“基库尤中央协会”（KCA）和“肯尼亚非洲人联盟”（KAU）遭受破坏。缺少集中统一的动员结构，从而赋予运动以更多网状的、分散的特征，它同时也使殖民当局深感迷惑。沉湎于正式“指挥系统”的旧观念，殖民当局无法想象除正式“指挥系统”之外的其他任何社会组织，相应地，他们无视所有现成的证据，而坚持认为起义是一次有计划的阴谋。对肯雅塔的审判，便是他们力图寻找被推定的起义领导人的最明显表现。

对这两个案例当中存在着的居间联络所做的地点和集中程度上的对比（菲律宾的程度高、肯尼亚的程度低），有助于说明何以茅茅起义较之黄色革命具有程度要高得多的暴力色彩。比如，正式组织也许比那些较少被正式加以组织也更为分散的起义群体，要更倾向于避免暴力手段。这里存在着的假定是：正式组织倾向于把更多的利害得失寄托于现存体制之上，因此较少愿意为达成运动的目标而运用暴力。当然，这还只是我们的推测，不过，这种推测不仅能够与某些理论（Gerth and Mills 1946；Michels 1962；Piven and Cloward 1977）相一致，而且，它也与眼下我们正在探究的两个案例所表现出的不同轨迹相吻合。

在确认与撤销合法性之总体效果上的差异

这两个案例在结果上的差别，并非全由其动员的动力机制方面存在的最初差异所致。后来在斗争事件中起作用的其他机制，对于肯尼亚和菲律宾的政治斗争之为不同的轨迹和结果，有着深刻的影响。来看一组我们将在第五章和第七章中更详细

地研究的成对机制：合法性确认与撤销合法性确认。合法性确认需要使行动者、其具体做法以及他们的要求的合法性得到外部权威的确认，而撤销合法性确认则是此类合法性的授予者撤销其对于合法性的确认。我们在此分析的两个案例，其在合法性确认和撤销合法性确认——作为与其他机制交织发挥作用的机制——的动力结构和可变结果方面，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121

我们在讨论茅茅起义时，曾经对肯雅塔和其他主要肯尼亚民族主义者的受审及随后的被判下狱稍有谈及。用机制来对此加以表述，则这次审判行动可谓有效地使肯雅塔和温和的民族主义运动甚至茅茅起义——它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一直被描述为一个暴力的、返祖性的迷信崇拜——失去了合法性。此类撤销合法性确认的成功努力，在塑造随后的斗争事件时具有高度的重要性。撤销肯雅塔的合法性排除了他在殖民当局和起义者之间充当中间人的可能，而如果殖民当局当初与肯雅塔合作——实质性地确认他作为合法的交涉伙伴——我们就会看到那种被一些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贴上“激进一翼效应”标签的情形的出现，而那些温和的行动者们就会利用极化的形势，以增加他们与当局讨价还价的力量（参见第六章）。最终的结果，或许很可能就是独立进程的加速与肯雅塔上升为正式的政治权威。相反，由于所有土著行动者都失去合法性，殖民当局便能够暂时得以使独立运动离开原定进程，并且较为泰然地对茅茅起义加以孤立和镇压。

合法性确认与撤销合法性确认在黄色革命中发挥了同样有力但总体上更为有利的作用。一方面，处于萌芽状态的反马科斯运动，在一切关键时刻均得益于合法性的确认。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也许是西恩给予运动的早期的、毫不含糊的支持。如果说运动的主要特点是温和的中产阶级的动员，那么，是西恩而不

是其他任何人,发出了参与斗争具有合法性的信号。不过,斗争事件却由于其他一些决定性的合法性确认而被中断,比如,“阿格里夫委员会”(the Agrave Board)的调查结果,由于牵涉到一些与马科斯关系密切者参与策划和实施对贝尼格诺·阿基诺的暗杀行动,而在使马科斯政权失去合法性的同时,又赋予各种反马科斯的力量以合法性。

撤销合法性确认还有力地来自于前殖民宗主国,前殖民宗主国持续存在的对菲律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决不能被低估。通过电视,菲律宾的一般民众能够每天从美国的电视上看到他们的国家被描绘成由一群腐败的、御用的和作奸犯科的政客们所控制的图景,这一事实也有力地促进了马科斯政权之失去合法性。由里根总统派遣的确保公正和民主选举的美国官方选举监督小组,更加强了那种前殖民权力撤销其对于马科斯政权的合法性确认的意味。如同卡尔·兰德在他的著作中所描述的:

马科斯曾说,他最大的错误是号召举行二月大选。而他的另一个错误想必便是邀请外国观察员,包括来自美国的几个代表团到菲律宾。这些代表团当中,最突出的成员是美国参议员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到达菲律宾时,卢格还是带着一种开放的心态,但到选举结束之际,卢格已确信,选举过程由于政府大规模的欺诈行为而存在严重缺陷。卢格于是匆忙赶回华盛顿,并在说服里根总统相信这一事实时发挥了关键作用。[Lande 1987:41]

接着,里根总统在危机的最后时刻决定性地撤销他拖延已久的对马科斯的支持,这成了马科斯政权时期所发生的撤销合法性

确认的最后实例。

从以上三组实际考察中,我们能够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 首先,相同的基本动员机制——机遇和威胁的集体归因、社会利用和居间联络——出现于明显不同的两个斗争事件当中,暗示出这些机制将会成为任何动员和遣散过程的有力组成部分。这一推测尚需得到提炼,尚需一再被检验,但它提出较少留意斗争之形式与结果的差异,而更多关注其共同具有的动力机制与过程。
- 其次,在唤起对这两个案例中的三类机制之重要性的注意时,我们绝不声言这些机制在这两个案例中或者在其他任何地方,将产生一致的共同效果。相反,这两个案例之殊为不同的轨迹,大多归因于此处所讨论的表现形式不同的过程。辨识斗争中的诸机制只是分析的起始点,它还必须由此而延伸至对机制的发生次序、组合方式及背景的探讨。
- 第三,我们并不坚持认为,我们所列示的三个动员机制,穷尽了我们所举出的两个案例或者任何斗争事件中的动力机制。在菲律宾的例子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合法性确认,在我们下一章要论及的南亚和南非的几个案例中,将会起到更大的作用。不过,尚有其他一些机制——认同改变和激进化——在第六章将要论及的唤起美国反奴隶制和西班牙民主化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让我们就转向这些案例并转到斗争的这些机制上去。

123

五 斗争行动

20世纪60年代早期,阿米塔乌·高希生活在达卡——当时的东巴基斯坦首府,那儿是他父亲供职的印度外交使团的驻地。高希说道:

作为“外国人”而生活于达卡,对我们不啻具有一种讽刺意味,因为达卡事实上是我们祖籍所在的城市,我的双亲全都出身于一度很是兴旺的当地印度教中产阶级家庭。不过,早在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巴基斯坦国创立之前,我的祖辈就已经向西迁去,而正是由于他们的热衷迁徙,我们现在才成了印度人。因此,尽管我们现在仍然操的是达卡方言,而且还有几位亲戚仍然生活在达卡市中心的印度教徒老社区,但达卡对于我们来说,却已经是属于外国的领土了。
[Ghosh 1992:205]

对于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印度教徒来说,高希这个名字显示出该家族历史上属于较高种姓。这位高希讲述了发生在1964年1月的某个晚上的故事,当天夜里,他父亲命他们家的厨师把当时只有八岁的阿米塔乌带到主卧室去避一避。当这位胆怯的厨师偷偷走到附近的阳台,想对楼下发生了什么看个究竟时,小阿米塔乌也跟在他后面朝下看,他因此而目击了楼下

所发生的一幕,近三十年后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一大群人聚拢在我们家房子的四周,暴民人数有好几百,在他们手中燃烧着的火炬的映照下,他们的脸上闪着红光,用破布系在棍子上制成的火炬所发出的火焰,似乎正靠着我们家的围墙打转,四周是涡流似的火海。我朝外看时,火焰开始围着我们家的房子跳动旋转,而就在这帮人在墙外围着的时候,墙里面的人聚集在花园旁边的磨坊内,畏缩地挤做一团,用手捂着脸。[Ghosh 1992:208]

在这一幕半回忆式的场景中,待在围墙里面的是印度教徒,而围墙外的则是穆斯林,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恐惧与仇恨。当天夜里,墙外的人群——他们多半是达卡当地人——最后不过是朝花园围墙里面扔扔石子。第二天早晨,攻击者们终于离去,受到攻击的一家人在花园里安顿下来,而那位厨师也恢复了镇定: 124

随后,我们蹲坐在一个角落里,他用手指着围在我们四周的那群人,对着我的耳朵,低声跟我讲起了这些人的故事。我开始弄明白这些故事的内涵是许多年之后的事,通过浏览一大堆当时的报纸,我发现,就在我看见火焰围着我们家围墙四周舞动的那同一个晚上,加尔各答也发生了一场类似的骚乱,不过,在那儿,受到攻击的是穆斯林,而攻击者则是印度教徒。但同样是在这两个城市,在达卡和加尔各答,也存在着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彼此营救援助对方教徒的相同事例,于是才有许许多多的人免于杀身之祸——这一点必须指出并且必须始终被指出,因为它才是使我们恢

复清醒神志的符咒。[Ghosh 1992:209—210]

自 1964 年以来,有关世界上许多地方发生此类政治斗争的报道,频率越来越高(Gurr and Harff 1994)。通常,报道者们给这些事件贴上这一类的标签,诸如:“社群冲突”(communal conflict)、“族群竞争”、“部族主义”、“民族主义”、“由来已久的仇恨”,甚至“种族屠杀”——此类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为人们不情愿地熟悉了的标签。不过,以当前对于斗争政治所作分析的冷静眼光看来,高希的生动描述具有三个特征:把墙外的人(而不是里面的人)称作“暴徒”;把与这一事件相似的另一个事件描述为“骚乱”;以及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这类术语来指称卷入其中的人们无可置疑的属性。这三个特征引发了我们的一些疑问。“暴徒”一词源于“流动的俗民”(mobile vulgus)或浮躁的平民,是当局、掌权者和敌人描述他们所不赞赏的人群时所采用的典型用语。而“骚乱”一词同样也传达出对那种其直接参加者几乎肯定会提出其他如示威、游行、集会、报复、战斗等等要求的集体行动的谴责。

至于像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这类集体名词,通常人们确实这样来看待它们:仿佛它们标明了另一些人的基本的、一贯的属性,有时甚至标明的就是这另一些人本身。内含于这类集体名词中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它们所指的是那种具备单一标识符的自我引导的模块。尽管这种观念对于那些想要成为团结一致之共同体之未来领袖的人们颇具吸引力,但以此作为描述和解释社会行为的基础,就几乎难以让人信服了。一旦遭遇某些相反的现实,它便失去了其可信性。这里,要注意的是,一个普通人在大部分的时候可能具备各种各样的身份:夫(妻)、父(母)亲、家庭成员、旅行者、消费者、工人、监工、这一或那一群体的成员。

而我们能够目睹的事实是,一个人可以同时表达其复杂自我的 125 方方面面的情形,是何其地少见——事实上人们是如此多地通过彼此之间的沟通,而有选择地表达其不同认同的。再看一些例外的社会化、规训和(种族)隔离的情形,它们似乎是使得某种认同始终具有对其他认同的支配地位的必要条件,就像发生在军队院校里老生欺负新生、作为新成员而加入某个迷信组织或者创建一个恐怖主义网络的情形那样。不过,甚至这些极端的措施也常常不能使其他一些认同——性别认同、血缘关系认同或朋友认同——居于从属地位。要认识到,认同和认同的内容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会随着人们因获得新的认同而对其行为做出调节,随着人们企图对其他人归之于他们的认同加以重新界定,以及在诸如工人—老板、彼此追求的一对男女或者姻亲关系这类复杂关系中巧妙地解决谁是谁的问题,而以诸多方式发生改变。最后还要考虑的是,某种个人行动通常展现出的那种反复无常的、即兴的、反应性的、协商性的和社会性形成的特点。审慎的、有效的、自主的自我引导是颇为罕见的,个人始终生活在仅仅只存在一种认同之中的情形也同样颇为鲜见。

认同之复杂性又将我们带回到我们曾间接提出的关于斗争政治的三个基本问题上:

行动者:提出要求的是谁? 他们为何如此行事?

认同:他们以及其他人说他们是谁? 他们又为何如是说?

行动:他们以何种形式提出要求? 为什么?

本章将分两次来对这三个问题进行探讨,首先寻找就这三

126 个问题进行提问的有关概念,然后再对少数一再重现的因果机制——它们有助于回答各种斗争中的一些“为什么”的问题——加以辨识。在从事这两方面的探讨时,我们所寻求的并非某种总体性的解释,而是一些有益的、局部的简化。我们的简化强调的是以社会互动作为斗争的所在地和基础,这类简化含蓄地利用了政治斗争与争论性会话之间的相似性,当然,这里的争论性会话是动态的,它不能还原为会话者的最初意图。尤为重要的是,我们打破了那种常见的假定,这种假定认为:意图——或者更糟,参与者所给出的理由——说明了社会过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最终是以对有关单一行动者及其表现的断言的评述,来验证在形形色色的斗争政治中起重要作用的那些断言的。自我推进的统一性之定规,结果证明既是一种社会性地组织起来的幻想,又是一种深刻的斗争政治的真理。

首先,我们结合二战以来发生在南亚的印穆冲突来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由此而逐渐对形成和改变行动者、认同以及行动的诸机制做出详细说明。然后,我们以更为简洁的方式表明,一些与认同相关的机制同样出现在1985年至1995年的南非政治斗争中。最后,我们提出这样的观点:当前讨论的这些机制——居间联络、范畴形成、对象转换以及合法性确认——以相似的方式作用于范围广泛的斗争政治中。所谓它们以相似的方式起作用,即是说,它们丝毫没有产生相同的轨迹或结果。无论发生于何时何地,每一机制都包含着相同的直接因果联系,但整个事件的轨迹和结果却并不相同,因为诸机制的最初条件、次序及其组合方式结合在一起产生出了不同的结果。因此,斗争政治的分析家们最终还必须把握纷繁复杂的最初条件、次序及组合方式。不过,眼下我们可以通过详述与认同相关的诸关键机制,来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帕尼普尔的印度教徒对穆斯林

要更清晰地了解目前所讨论的问题,还是让我们先从 1964 年的达卡冲突向前二十五年,然后再从 1964 年的达卡冲突倒退十年。1990 年前后的一段时期,美国的民族志学者贝思·罗伊 (Beth Roy) 多次在孟加拉的帕尼普尔村庄逗留。(当然,在被连续瓜分之前,帕尼普尔先是属于印度,接着又归属巴基斯坦。)在这个有外居地主、小土地拥有者和无地农业工人居住的村子里,恒河盆地变化不定的水资源加深了普通农民对于财产权和边界的关注。该村包括了印度教徒家庭和穆斯林家庭,但它也包括一整套更精细的并且常常是相互交叉的区分,较著者如种姓、阶级、财产以及性别区分。

尽管一些信任罗伊的帕尼普尔居民,最初把他们自己描绘成生活在多文化和谐共处的友邻关系中,但罗伊最终还是接触到这个村庄过去发生的深刻冲突的证据。在当地,她遇见了一位属于高级种姓 Kayastha 成员的高希先生。[苏赫·卡卡尔尖刻地说道,“Kayastha 以与他们为之效力的主人——不管作为主人的统治者是英国人还是穆斯林——相一致而闻名。”(Kakar 127 1996:10)]高希先生最先向罗伊透露说,这个村子曾经经历过一系列的暴力冲突 (Roy 1994:15—16),罗伊则不停地问及有关 1954 年事件的问题,直到她搜集了一大堆故事以及构成这些故事的诸多斗争细节。一旦高希先生为她开了头,罗伊便穷追不舍了。

1954 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 吴拉姆·法基尔家的母牛绳子松了,它穿过吴拉姆家的地界,跑到库马尔·塔尔汉尼亚家的地里,吃了他家地里的小扁豆。当时,帕尼普尔属于巴基斯

坦——一个以穆斯林为主但拥有大量印度少数民族的国家——它所属的东巴基斯坦只是到后来才得以独立成为穆斯林占压倒多数的孟加拉国。在该村最广泛的宗教分野中，母牛的所有者吴拉姆属于穆斯林，而扁豆的所有人库马尔属于印度教徒。库马尔的朋友们逮住了母牛，吴拉姆则在随后强行从那些看住它的人们的抗议声中将母牛放走。这两人本来可以把他们的争执带到当地法院，而法院毫无疑问也会根据受损情况命吴拉姆赔偿库马尔的损失。

但两人并未选择立即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而是各自召集来自己的亲属、保护人和支持者们，结果，一场小小的争端迅速促成了越来越大的集团之间对抗的发生。例如，第二天，吴拉姆挑衅式的把他家的母牛拴在同一地点后离开，而当他后来回来时却发现，有人将他家的母牛（现在成了好几头）移到了他自家的扁豆地里。当吴拉姆开始把他家地里的母牛赶出去时，库马尔的两个兄弟也走进地里，企图把吴拉姆和前一天闯祸的母牛带走，一位印度教长者建议将吴拉姆放开，但当后者威胁说要报之以可怕的后果时，他们又再次将吴拉姆抓住：

他们又一次向我冲来，再次抓住我。然后，他们将我捆起来并开始拖我，其中一人还用镰刀砍了我的右臂。我大叫起来，远远站着的一些穆斯林听见我的喊叫声，便开始朝我跑来，他们走近我，把我放开。[Roy 1994:55]

事态继续扩大，双方都有一些人开始彼此抢夺对方的牛，双方的一些支持者们最终操起刀子、镰刀、长柄镰刀、剑、棍棒、盾和矛，彼此列阵对峙，充满敌意地相互辱骂，一些年轻人则彼此向对方发起攻击，警察进行干预并最终向人群开了火。警察开

枪打死了两三个人,驱散了人群。由于各方都要求得到公平合理的处理,以及许多此前的旁观者们加入冲突之中,同时由于地方当局力求和解与息事宁人,出面干预的巴基斯坦行政当局的级别也在不断上升。伴随着冲突一步步向外与向上发展,对冲突的重新界定也在不断进行,事件越是向更深和更高层次发展,它就越来越少地与存在于当地农民中的复杂的种姓和阶级关系相关联,而越来越多地变成全国性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斗争的一部分(参见 Turner 1982:69—70)。如同发生在科西嘉岛上的个人之间的争执逐步升级为部族间的争斗一样,在南亚,局部的争吵变成了社区之间的战争。128

甚至当地人也在犯事之后对他们彼此间的冲突做了重新界定。比如,高希先生和他的穆斯林对手们都说到,除了作为旁观者、和事老或者调停人,他们最初都与冲突毫无干系。对高希来说,冲突在印度教徒这边开始于 Namasudras,一个由农民和渔民组成的低级种姓的成员们,而不是由像他这样的受尊敬的人们开头的,他本人则完全置身于冲突之外。不过,像高希先生这样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开始不把斗争定义为 Namasudras 和对应于他们的低级种姓的穆斯林之间的冲突,而是从总体上把斗争视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对抗。在人们的集体性记忆当中,这些更大的范畴开始占据上风。

如同保罗·布拉斯在谈到当时的印度时所说:

在村庄一级地区及其周围,“迦提”(jati),种姓在当地的表現形式,能够为经济行动、政治组织和社会冲突提供一种基础。不过,在一个地区大小的单位中,相应地,一些超出“迦提”范围的较大的政治行动或政治联合单位,就成为开展有效政治行动所必需的了……在国家一级的层面上,

种姓作为持续的政治动员的基础事实上已变得无效,这是因为,在这一层面上,诸种姓范畴缺少了适当的社会内涵或经济内涵。取代种姓而作为政治冲突之组织原则的替代物存在于印度政治的每一层级,尤其是地区一级以上的行政层级中。在这些层级中,诸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这类范畴变得更加突出,语言忠诚变得至关重要,一个人作为移居者或作为“本地人”的身份地位也许是决定性的,作为政治分野之派性的、党派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会盛行一时。[Brass 1994:155;印度有关语言忠诚的资格条件,见 Laitin 2000]

斯坦利·坦比亚在对英迪拉·甘地被他的两名锡克教卫兵刺杀后,发生在德里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的暴力冲突所作的分析中,特别提到了一起与布拉斯的评述颇为相似的例子:

129 德里骚乱的参加者都是谁呢?人们很容易受诱惑同时也很舒服地把那些参与闹事者说成是陌生人和敌人而非朋友与邻人,但如此绝对的二元对立却绝非与事实相符。不过,可以这样说,参与其中的暴民的暴力行动越是朝着使人们积极动员的方向发展,越是使人们装备起毁灭性的手段并诱使他们使用暴力,就越是有可能产生一种由一些参与共谋的“外来者”所提供并得到内部知情者与合作者帮助的导向作用。[Tambiah 1997:1178—1179]

就在她不断追溯她所讲述的故事时,贝思·罗伊也就为我们揭示了南亚政治斗争中的等级制度。

个人主义的认同观与相关性的认同观

罗伊的研究除了它叙述中的移情色彩和机敏的探察能力外,其对于行动者、行动及认同之复杂性的充满耐心的揭示与分析,也是它的令人着迷之处。《母牛带来的麻烦》(*Some Trouble with Cows*)(这一标题便反映了罗伊所搜集的有关 1954 年冲突的最初一批故事之一)集中探讨的是认同问题:

当我考虑有关村庄这一层级的社群主义(communalism)时,我想知道的是,人们是怎样看待他们自己所处的世界的,他们又是如何将他们自己的愿望置于该世界之中的,而他们的政治可能感又是如何受到远处的变化之风的影响的。颇为常见的断言是,最为隐秘的家庭行为事实上也是社会性地建构而成的。集体经历则是经由内化为关于世界的一些不可见假定的观念之网而转变为心理现实的。为弄清集体行为之心理现实,我以为,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理解与社会地点的共享区域。例如,群体行动是通过认同的经历,亦即某一个体在共同体中所居的位置及其与他人的关系之复杂建构而得以阐明的。与之相似,行动的意志产生于具体的思想意识,这些思想意识常常被体验为常识或者被经验为未经检验的有关权利和权力的假定。[Roy 1994: 3]

在这一段导论性的文字中以及对旧冲突的整个重建当中,罗伊显示出她在两种观点之间的一种矛盾心理。有时她把认同和行动视为复合的个人心理现实,有时又把认同和行动定位于

社会关系中：“某一个体在共同体内的地位及其与他人的关系。”她因此而指明了当代斗争政治分析中存在的一个主要困难（见 Cerulo 1997:393—394）。我们正力图加以拆解和改善的经典社会运动范式遭遇了这一困难，而一大批其他的理性主义的、文化论的、现象学的以及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案同样遭受了这一难题的困扰。

130 难在于：人类以血肉之躯而生活于世间，他们把一些经验累积在他们的神经系统中，并把他们与现实世界的遭际，组织为诸多的认识、情感以及有目的的行动，他们讲述着有关他们自己审慎而有效地做出行动的故事，抑或讲述他们因为受无法控制的情感、弱点、怀有恶意的其他人、坏运气或不愿顺从的本性的阻碍，而不能如此行动的故事，还讲述有关其他人的类似的故事。人们相信，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许许多多连续的、精确限定的、自我推进的个人的世界，在其中，这些个人所抱有的意图与一些偶然事件及自然的限制彼此互动而产生出全部社会生活。在许多说法当中，这些“自然的限制”是以强有力的他人所反复灌输和强力推行的规范、价值和脚本为特征的——但它们后来也被自我推进的个人内在化了。

不过，细察起来，同样的这些人结果证明也是一再重复地与其他人形成互动、重新商讨他们自己是谁、调整他们所占据的范围界限、改变其行动以对他人的反应做出快速回应、选择并且改变可用的脚本、临时采取联合行动的新形式、说一些以前人们从未说过的语句、对他们在他们自己不能加以详尽描述的社会关系网中所处的位置做出预先反应。他们讲述的是有关他们自己以及那些促进他们的社会互动的其他人的故事，而不是去列示关于个人生活的能够得到证实的事实。他们实际上是生活在具有深刻相关性的诸多世界之中的。一旦发生社会建构，它也是

社会性地发生的,而不是发生于与世隔绝的个人心灵深处。

这一问题成为描述和解释斗争政治时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对参与政治斗争给予个人化的说明,是政治行动者们的典型做法,尽管这些“个人”——被政治行动者们赋予了限定的、统一的、连续的自我推进特征的个人们——常常是一些诸如共同体、阶级、军队、商号、联合会、利益集团或者社会运动组织之类的群体行动者。政治行动者们将道德评价和责任加之卷入其中的个人身上,因为个人的行动而称赞或指责他们,为个人所公开宣布的认同加上从不受欢迎(比如暴民)到值得赞赏(比如烈士)之类的等级评定。据此,斗争政治中的种种努力就变成了对参与其中的最重要的行动者做出对立的描述——将他们描述为可敬的或不足取的、统一的或零碎的、大的或小的、守信的或不受承诺约束的、强大的或软弱的、与外部有充分联系的或与世隔绝的、持久的或短暂的、理性的或非理性的、贪婪的或慷慨大方的行动者。

不过,对同样的努力加以细心考察,最终会使一位哪怕是很幼稚的观察者,都能够弄明白差不多每一位战斗指挥官、工会领袖或者政治组织者私下里所承认的东西,那便是:政治认同的公开表达和其他形式的斗争参与,都是经由高度的协调,偶然的临时处措,战术上的机动,对其他参与者所发出的信号做出反应,对什么可能发生、什么是可欲的或者什么是有效的即时给予重新解释,以及对那些引起新的临时行动的意外后果胸有成竹,而取得进展的。行动者们与变化不定的界线、内在的结构以及与 131 认同之间所发生的互动,结果证明渗透到分析家们远观或回顾时称为行动者驱动的战爭、罢工、反叛、竞选运动或者社会运动这些现象之中了。由此而生出了调和个人主义形象与互动性现实的困难。

行动者、认同和行动

谁是行动者？何种人可能会参与政治斗争？换句话说，何种人可能提出一致的公开要求——这些要求把政府当作目标抑或第三方，并且，这些要求一旦实现就将明显影响提出要求者之外的人们的利益？原则上，任何内在于某个既定政治体的彼此联系的一群人——他们有着现成的关于他们在该政治体中的共同命运的定义——都具备成为行动者的资格。实际上，除了极少部分人之外，每一位参与提出要求的行动者，至少都牵涉到一群先前即与之相互联系的人们，而在这些人当中，早已流传着为他们所广泛接受的有关其战略处境——机遇、威胁、可能的行动手段、这些行动之可能的后果、对于这些后果的估价、采取行动的能力、对一切斗争的记忆，以及可能参与任一行动的其他各方的详细清单——的许多故事。

而且，如此这般的行动者们实际上此前通常都已确立起他们与其他集体行动者之间的斗争性的或者非斗争性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又已经形成行动者们的内部结构并帮助产生出有关他们的故事来。最后，实际说来，提出要求的行动者们的单位常常不是由全体活着的个人组成，而是由诸如职业和邻里关系这样的群体、组织、社会关系集束以及社会地点所组成。行动者们是由展示出部分地与其他行动者共享的历史、文化以及集体性联系的网络所组成的。1964年1月，聚集在阿米塔乌·高希家围墙外、打着火把并且朝墙里扔砖头的那“几百人”，构成的正是这样的网络。

不过，此类行动者们几乎从不把他们自己描绘成一些紧密合成的网络。相反，他们提出的是集体性名词，他们称自己是工

人、妇女、X地方的居民、反对Y的联合阵线。组成高希家墙外的人群的成员们把他们自己视为穆斯林,而墙里的人们则把自己视为印度教徒。其他各方则常常反驳这些自我描述并代之以乌合之众、不良之徒或者群氓之类的集体名词。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通常接受的是这种暗含的观念:行动者们具备了单一的 132 认同。户口调查人员则通过把全部人口一齐纳入宗教范畴,而帮了这种观念的忙。比如,印度1981年的人口普查,就把全国人口的11%列为穆斯林,其实,从穆斯林只占旁遮普人口的1%到占查谟和克什米尔人口的64%,各地的差距很大(Brass 1994:231)。那么,我们能否把这些数字当作客观事实,并依此而对穆斯林—印度教徒的冲突做出评估呢?戴维·卢登对如此做法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力的见解:

和“穆斯林”这一术语一样,“印度教徒”一词所构想的认同,是根据许多方式而被定义出来的一种认同,甚至同一个人也会根据语境的不同对之做出不同的界定。我们现在无从知道,如果在1800年、1900年、1947年或者1993年的印度,去问人们“你所信奉的宗教是什么?”,到底有多少印度人会把自己视为印度教徒。不过,我们称为“印度教”的这种巨大的宗教传统,并不具备类似于《古兰经》、“乌玛”(Umma,伊斯兰教信仰者的共同体)、《圣经》、天主教会抑或犹太法典所具有的单一的、一致认可的一整套核心制度,果真有类似的一整套制度,那么一种印度教的宗教认同可能早已从传统上得到统一了。印度教的核心哲学信条——dharma(宗教义务、律法)、karma(业、因果报应)、samsara(轮回)——将那种把印度教徒分成身份等级不同的四种范畴(varnas):婆罗门(Brahman)、刹帝利(Kshatriya)、吠舍

(Vaisya)和首陀罗(Shudra)的做法加以理性化,而正是难以数计的种姓集团(“迦提”)之间的区别,而不是其相似之处,才构成了印度教社会认同之首要的基础……依其定义,印度教的认同是多重的,而印度也是由包括穆斯林、拜火教、锡克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在内的许许多多其他的宗教认同组成的。[Ludden 1996:6—7]

而且,一旦我们像勒登对印度教所作的分析那样,把其他那些看似单一的集团加以放大,则它们也会开始显得破碎和不同。

怎么回事呢?总体上,认同是由社会关系及其表达组成的,就像从这一或那一行动者的角度所看到的那样。它们并不表现为普通人或集体行动者的持续不变的或者无所不包的属性。具有母亲的身份就是去保持对小孩的某种关系,而在某种情境下具备了母亲身份的这同一个人,在另一种情境下则很容易地就接受了经理、顾客、女毕业生和姊妹这样的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子集合是范畴性的,它们依据将一些X与一些Y分开的界线而定,确立起一些X与X的关系、一些X与一些Y以及一些Y和Y之间的关系。在达卡和帕尼普尔,穆斯林/印度教徒形成了一对具有广泛影响的范畴,但在南亚其他地方,穆斯林/基督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以及佛教徒/基督教徒也形成了同样的范畴,更不用说在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和基督教徒内部所存在的彼此分离和彼此联合的突出区别了。每一对彼此区分或彼此联合的范畴,不仅有明确的界线划分,而且划定了一套超越

133 这一界线的局部可变的

关系。把所有的认同都看成是诸多社会关系及其表达形式,则它们便都具有现实或潜在的政治的一面。无论丈夫—妻子或穆斯林—印度教徒,每一对范畴都有它自身历史性地累积而成的协

商和斗争形式。许多以认同为基础的协商和斗争都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成了有关共同的善(common good)的问题,它们是:关于不平等、公平、权利、义务的问题。公开辩论和私下里的认同常常发生互动,就像男人和女人把有关性别不平等的公开斗争中的问题和术语,运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时候所发生的那样。最后,所有的政治体都为以共同的认同为基础的一些提出要求的行动留有余地,而且,所有的政治体都在政治生活中明确建立起一些认同,以宗教少数派之名而提出的要求说明了第一种现象,在公民和外国人之间设置法律上的区别则表明了第二种现象。我们承认认同政治在这一术语的某些意义上的无处不在,不过,当认同合乎以上两个方面时,我们还是把这些认同明确地称为政治性的:当人们以认同为基础而公开提出要求时,政府则既是这些要求的目标又是这些要求的第三方。

因此,就其包含了与政府的关系而言,认同是政治性的。政府官员、退伍军人、公民、被监禁的重刑犯以及享受福利者就是明显的例子。诸如工人、居民和妇女之类的身份在某些政体内同样成为政治性的,在这些地方要么政府是由具有这些身份的人们所实际统治,要么就是任何支持同一计划的一群人都享有表达集体要求的权利。当代印度政治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是,如果人民党(BJP)掌握了全部权力,这一渊源于印度民族主义的影响日益增加的政党,是否会使得印度的世俗国家政府机构打上宗教范畴的烙印。

在当今印度,那些共享日常宗教认同的人们,已经具备了形成属于他们自己的政党的权利,只要他们把自己视为体现着独特生活方式而不是独特教义信条的代表即可。而在土耳其、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阿富汗以及前苏联的部分地区,当局现在

所做的则是反对这种权利。在这种意义上,印度的许多宗教认同已然是政治认同了。的确,如同阿米塔乌·高希和贝思·罗伊所表明的,在某些方面,南亚的印度教徒/穆斯林所组成的这对范畴,主要是在与政府的关系中起作用的(如见 Copland 1998)。

134 它标明的是一种政治区分,而不是将两种定义明确的、单一的、先验的世界观彼此分割开来。在尚不清楚但也许是很大的程度上,范畴成员的共同取向源于而不是导致了不同范畴的成员之间经常性的政治关系。

不过,政治认同是沿着从嵌入(embedded)到分离(detached)的路径而做连续性变化的。“嵌入的”认同表明的是范围广泛的日常社会关系,如同一个村子里的某个特定的家庭,其成员身份强烈影响着其与大多数其他村民之间的关系。“分离的”认同表明的则仅仅是一种狭隘和特定范围的具有间断性的社会关系,就像在一所特定的学校里,其毕业班的成员身份的重要性会逐渐减少为偶然的重聚或碰巧相遇(不管这一身份在他们是低年级时表现得多么有力)。不过,分离的认同一旦被激活,有时也会起很大作用,如同在一些秘密会社、退伍军人以及一些非婚生子女那里所发生的情形那样。嵌入式的认同能够分离,就像职业或地点的划分开始取代血统世系上的划分,而血统关系的范围和影响力因此而减少那样。分离式的认同也可以嵌入,像彼此相邻的两地居民相互开战、在彼此间划出明显界线并且每每相遇便相互侵扰或谩骂时那样。简言之,“嵌入的”和“分离的”之类的标签,描述的并非认同的内容,而是它们与日常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

政治认同不仅出现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也出现在斗争政治中。比如,政府官员就典型地具有这样的职业特点,他们的职业使其既与各种非斗争性的社会关系打交道,也与斗争性的公共

政治打交道。不过,某些政治认同却源于或者专属于斗争。图 5.1 扼要地显示出我们所想到的变化领域,它指出的是,(尽管日常认同与嵌入认同、斗争性认同与分离的认同有某些经验的相关)但日常—斗争与嵌入—分离这两种区分,从逻辑上说是彼此独立的。它宣称,家庭通常提供了主要是在日常生活而不是在斗争政治中起作用的嵌入式认同的基础,不过,当政府的户口调查人员清查家庭成员人数、军队基于家庭年轻成员与其配偶及子女的关系而征召其入伍或免除其服兵役的义务时,抑或某人组织起一户户家庭对城市更新方案做出反应时,家庭认同便呈现出政治性的色调来。所有这些都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很容易地就变成斗争性的关系。某一陪审团成员的身份,同样主要是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而不是在公共斗争中发挥作用,不过也具有一种对于大多数社会互动而言的分离关系。偶尔,陪审团成员的身份也为参与斗争政治提供基础,就像对判决结果失望的诉讼方攻击法官和陪审团时所发生的那样。这便是为何我们把它称作一种主要是居于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分离认同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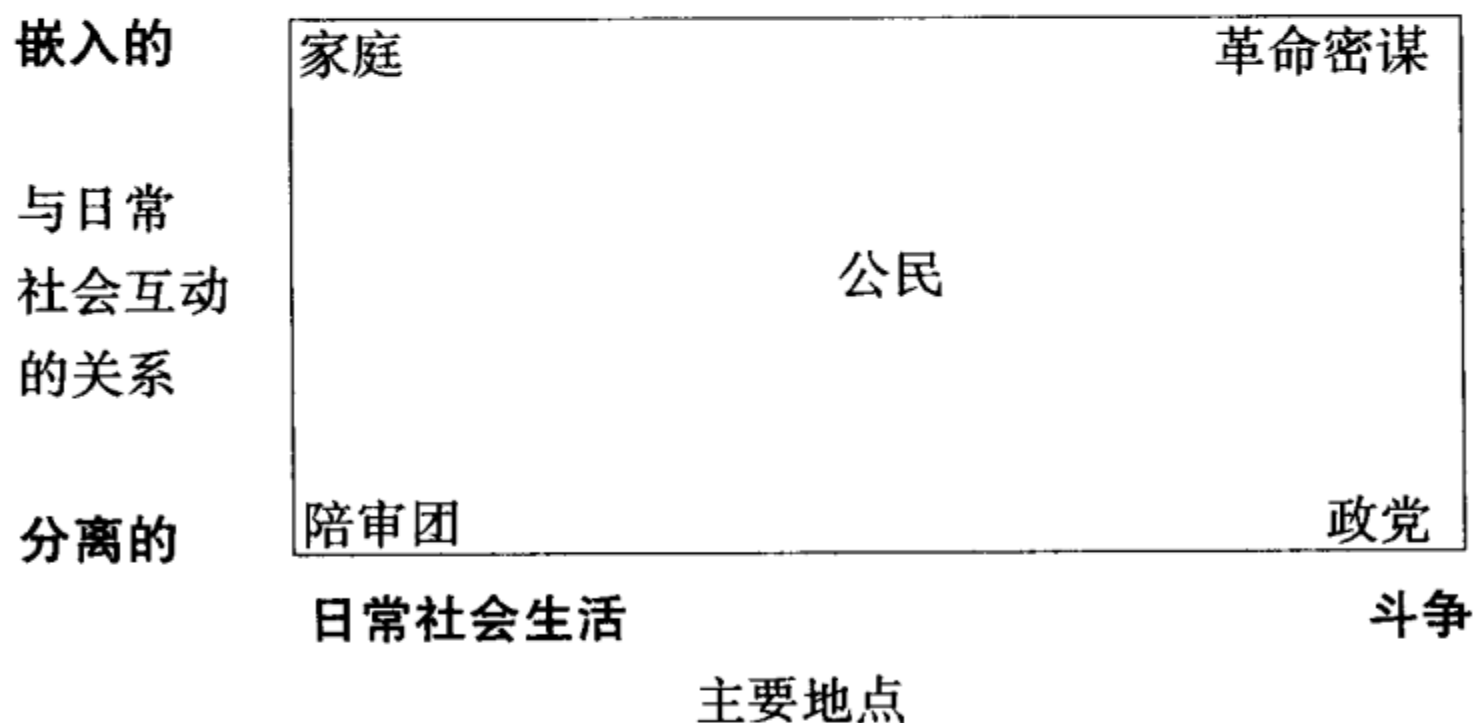


图 5.1 斗争认同的地点

为什么我们把革命密谋置于右上角,把嵌入与斗争政治所在的位置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政治认同,革命共谋中的成员身份通常包含着范围广泛的社会生活——亦即构成一种嵌入式的认同——但它的重要性却来自使之与政府和其他政治行动者联系起来的斗争性要求。尽管参与某些党派与共谋中的成员身份相类似,但总体上,党派成员身份是间歇性地且主要是在斗争政治高潮时表现其活力的,因此,它被放到分离的/斗争的一角。公民身份出现在图中正中心的位置,是要表明:较之出现在各个角上的其他身份,公民身份从分离的和日常的(像有资格享受国家福利时那样)到多半是嵌入式的和斗争性的(像最近发生的有关谁是属于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科索沃、克罗地亚或波斯尼亚的公民的斗争中表现出的那样),其变化范围要更大。如其他斗争认同一样,公民身份实际上占据的是一种与我们所指出的两个维度有关的不规则的空间,而不是这里简单分派给它的单一的一点。

在斗争政治进程中,行动者们是以认同的名义而采取行动的,认同限定了他们与特定的他者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行动实际上是由与其他人的互动——以提出要求为中心的互动——所组成,他们上演的是由配对的认同彼此相互地、公开地提出要求的一幕。以他们所声称的集体认同之名,对话者们代表行动者要求、命令、请求、恳求、请愿、哀求、许诺、建议、威胁、攻击、摧毁、没收或者相反依据权力而要求那些为其他人所掌握的资产。当代表其他人的对话者以他们自己的政治认同之名而做出答复时,一起斗争事件便开始了。随着这一过程的继续,相应有关的认同常常发生改变。贝思·罗伊所重建的复杂事件便是以两个农民之间的口角开始,却以印度教徒、穆斯林以及政府官员之间

的准军事行动而告结束的。

斗争手法与政治互动

此类对话式的、戏剧化的斗争性互动景致,把我们的注意力带到了实际提出要求时编制脚本和即兴表演的结合上来。与行动者们从技术上能够胜任的所有其他互动相比较而言,在某种特定的场景与事件中,他们反复运用的是少部分的常规做法,其创新之举则限于他们以前的互动所确立的范围内。比如,在印度,以印度教为基础的人民党,就曾以用车队和战车队来宣传他们的事业的方式,投入到全国大选的争夺之中:

两轮无篷战车本身即是新与旧的混合物:两轮无篷车的上部构造被安放在现代的敞篷货车和有篷货车上,再配以高音喇叭、电力发动机等等。事实上,它们不过是精心构制而成的现代组合物,甚至还从彼得·布鲁克电影《摩诃婆罗多》中借用了某些装饰性要素,像[BJP 的主席拉尔·]阿德瓦尼(Lal Advani)1990年乘坐的两轮无篷车便是如此。“朝圣”与“圣战”的“宗教性”目标与选举中的算计和对政治权力的追求混合在一起。新加入的年轻成员成为志愿的“神圣工作者”(karsevaks),印度教的圣哲和祭司将他们的仪式性的吟唱与好战的凶残混在一起,而在举行被称为 pujas 和 yajnas 的向神献祭的仪式时,那些视自己为印度民族的复兴者和未来国务大臣的政治家们,也虔诚地参与其中。[Tambiah 1996:248;另见 Davis 1996]

因此,并非一种日常的表演,而是整个一大批公开的表演,将印

度教的要求传达给人民党的追随者们、其竞争对手们以及政府，
137 并且间接地传达给焦虑不安地注视着穆斯林。

由此，我们便可以合理地谈及斗争的手法了：它们是易于为特定的配对身份所利用的、彼此间相互提出要求的常例做法的有限总集。我们借用了一个戏剧舞台上的说法——常备剧目（repertoire）——以传达这样的观念：公开提出要求的参与者们采用了他们此前已经用于表演或者至少遵循着的（戏剧）脚本。他们并非真的发明了一种有效的新行动或者表达了他们所感觉到的任何冲动，而只不过是将其已知的常规做法重新运用于对当时的环境做出反应而已。在如此做的时候，他们便获取了协调、预料、代表和解释彼此行动的集体能力。由此，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彼此相关的经理和工人们便具备了在岗交谈、表达怨愤的程序、临时解雇、提供就业、示威、罢工、向政府官员诉请以及其他一些做法，以为彼此提出斗争性要求之用。在他们所采用的这些现成的“常备剧目”之外，是那些曾经在西方国家经理—工人关系中经常发生，而现在从技术上说依旧可能做到的诸如洗劫某个无赖老板或工人的房子之类的惯常做法。尽管严格地说，“常备剧目”属于彼此配对的两种身份，但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还是常常将其推广应用到某些人、某个时期和/或地点，比如用以指 20 世纪 90 年代印度宗教激进分子中盛行的斗争常用方法。

属于常用手法范围内的一些做法通常并未严格而精确地依据脚本，它们类似于遵守隐含的互动规则，但所有参与会谈者却不断有即兴表达的交谈。因此，今天的示威与昨天的示威相比，在谁参加示威、天气是否有雨、警察如何操纵今天的人群、参加者昨天都学到一些什么，以及当局是如何对昨天的要求做出反应的这些方面，就呈现出很大不同。以同样方式开头的示威，却

会以群众集会、庄严的游行、对公共建筑物发动攻击或者警察与行动主义分子之间展开阵地战的不同形式告终。的确,一些老套的做法通常会和靠死背演说稿来做演说一样全无效果:它们减少了行为者的战略优势,破坏了参加者提出要求的信念,使事件的新闻价值降低。其结果是,小规模的创新行动持续地改变着斗争手法,尤其当一批或另一批参与者发现,一种新的策略、信息或者自我表达带来其前所未有的回报时,更是如此。

来看一下那些已然拥有确定的提出要求之常用手法的行动者们所处的战略环境。图 5.2 把处于行动边缘的某个单一的斗争参加者的处境加以简化,以此对比方说 1964 年 1 月的某个晚上那些蜷缩在阿米塔乌·高希家院子里的难民们做理想化的概述。发生在同一范畴的以前的互动历史,已经确立了由图 5.2 的互动—结果网栅表示出的共同的默契,沿着水平轴,存在着与院墙外的攻击者、与达卡当局以及与高希一家的 N 种可能的互动。可供采用的互动也许包括了某些还击方式、某些逃避的方式以及向当局诉求的某些方式,只有详尽的历史研究能够告诉我们当时可用的惯常做法的真实形式。从单独一方的角度来看,那些可能的互动构成了当时危险形势下相应的常用手法。在垂直的那条轴上,显示的则是那些可能的互动之可能产生的结果,它们同样是由如此形势下先前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在这一理想化的矩阵的每个单元格里,出现了两个相连的项:(1)互动 X 的开启将产生结果 Y 的可能性,以及(2)一种将 Y 与 X 关联起来的因果理论。由此,行动者可以从结果推论出适当的互动,从互动推论出可能的结果,或者更可能同时对二者做出推论。甚至在这种极端的简化当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以前的经验在形成高度选择性的斗争手法时,所具有的巨大重要性。

我们还可以将图 5.2 的方案复杂化并使之更为动态。我们

可以描绘出两个提出要求者(比方说,院子里的难民和高希一家)和一个要求的对象(比方说院墙外的包围者们)以及两种互动——认知的和策略的互动。于是图表中就会出现两个互动—结果网栅,以记录提出要求者和要求对象对于诸多可能性做出不同理解的事实,因为每一方都只有有关另一方的资源、能力和策略方案的有限信息,同时也因为每一方开始面对与历史上的斗争多少有些不同的斗争。

在这个仍然简化的略图中,要求者 1 和 2 已经在他们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和可能的结果方面达成一致,尽管他们很可能在可能产生的结果之可取性方面存在不一致。要求者 1 和 2 正忙于和他们共享的互动—结果网栅进行认知性互动,从中得出他们可能的行动路线,而与此同时,要求的对象也正在进行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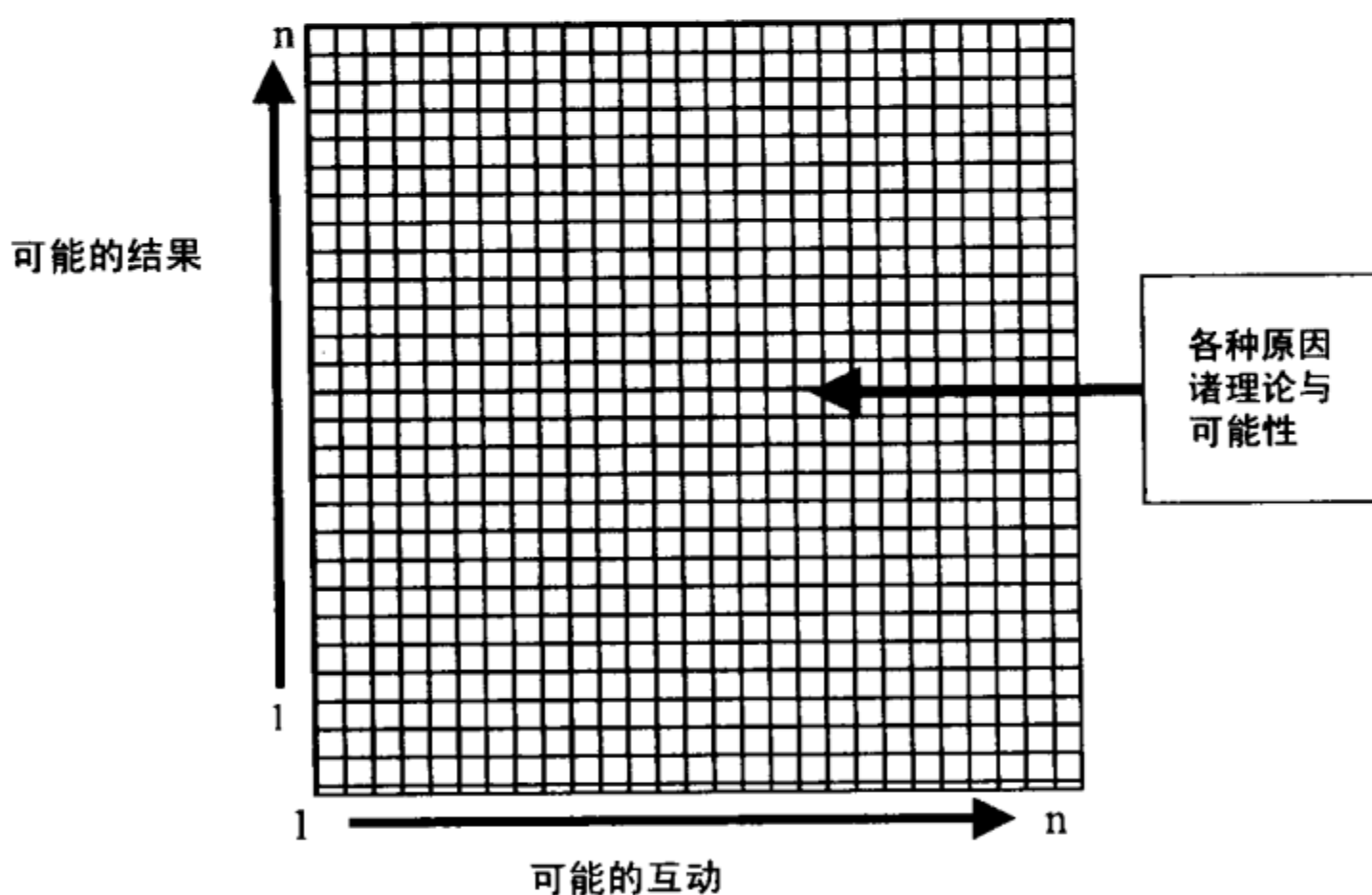


图 5.2 互动结果网栅

类似的认知互动。当他们和他们所提要求的对象展开斗争时，要求者 1 和 2 也在进行着策略性的互动——彼此相互威胁或者哄骗，制造新的劳动分工，如此等等。如同电影中多次重复的镜头，这些互动在两个网栅的接近处及其内容上引起变更，而这又接着影响到下一轮互动，小规模的创新在斗争事件进程中自始至终得以持续。该模型并未提供一幅有关斗争政治的现实主义图画，它所表明的是，我们何以能够将历史与文化结合到对斗争的叙述中，而不致湮没策略性的互动。

如同我们已在帕尼普尔关于母牛和小扁豆的斗争中所看到的，开始于日常生活中非斗争性的常用手法范围内——像放牛、划分地界等日常事务——的互动，有时候会转化为斗争政治的常用手法。它们不只是逐步升级、爆发或者自发地突然出现，而是转变为不同的互动常备剧目。正如一些能说两种语言的朋友，常常在表示语气、主题或者语境变化时，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采取另一种交流方式(Gumperz 1982:ch.4)。他们之所以采取如此做法，是因为社会网络和共同的默契引导参与者形成了对于什么正在发生的可用定义、达成了交流与合作的可用方法、解决冲突的可用实际做法以及可用文化习惯用语。当观察者把这些事件描述为“自发的”事件时(如他们经常所做的那样)，他们便在这样的两类事件之间——在那种发生了从非斗 140 争性互动到斗争性互动的系统而微妙转变的事件，与那些直接产生于至少经过参与者中一方事先审慎考虑和组织的事件之间，做出了一种隐含的区分。

斗争手法在三个方面变化：

特殊主义[与模式化相反]：提出要求的各种形式是如何特定地与某些地点、群体或议题相关联的。

规模: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很容易被区别开来的各种人群,究竟有多少参与了要求的提出。

居中调停:与直接面对要求对象相反,要求的传达依赖于有特权的中间人的程度。

总之,建立在嵌入式认同之上的斗争政治,表现出具有相对特殊的和小规模的常用手法的特点,而与此同时,又分化为在局部范围内的相互直接对抗(常常是暴力的对抗)和在较大规模上的当局调停这两部分。建立在分离认同基础上的斗争政治,则更均匀地包括了模式化的、总体的提出要求的形式,大规模的协调,以及对于特定的代表或政治中间人的依赖。从某个随意的观察者的角度看,较之基于分离认同的斗争,基于嵌入认同的斗争,通常显得更具有“自发性”。不过,从我们分析的角度出发,这一差别涉及的是把日常生活与斗争政治连接起来的不同种类的转变,在分离的认同在斗争中占优势的地方,政治中间人、各种协会、广泛的通信网络以及全国范围的各种事件,就会在转入斗争互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注意这种观点所具有的消极和积极含义。从消极的含义上说,它否认我们能够通过假定以博弈式的计算为基础而互动的单一的、有自我意识的政治行动者们的存在,来对斗争政治做出解释;不过,在积极的含义上,它则要求我们去描述和解释一些形成行动者及其认同的过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过程也包括了那些特定的环境,在其中,一些集团的领袖们,就好像他们正在掌控着或者正在对以博弈式计算为基础而展开互动的单一的、有自我意识的政治行动者们做出反应一样,的确能够发

挥作用。这便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对作为斗争政治基础的、处于变动中的社会关系的分析。

141

机制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强调的都是一些概念上的问题:是如何就行动者、认同以及行动发问而不是如何回答有关它们的问题。我们的概念汇编是基于斗争政治与交谈——尤其是包括多个对话者、听众以及虽不在场却有关的几方在内的论争性的交谈——之间的大致类似而做出的,这些类似之处阐明了一再出现于斗争中的原因机制。下面,让我们通过辨识四种机制——来自行动者、认同和行动区域的三种机制,外加处理行动者、认同和行动之间相互影响的一种机制——来对我们所提出框架的效用加以阐明。我们可以把这些机制叫做居间联络、范畴形成、对象转换和合法性确认。

居间联络 指的是两个或者更多目前互不关联的社会地点,经过某一在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或它们与另一地点之间的关系中起媒介作用的单元而联系起来。最简单地说,地点和单元是一些单个的人,但居间联络也通过小群体、组织、地方以及在一定限度内通过计划而起作用。在某种简单的居间联络形式中,地点1和2(比方说,帕尼普尔和邻近村子里的印度教徒)没有任何现存的联系,但中间人(比如高希先生)不仅将它们二者联系起来,而且代表它们向它们的要求对象(比如该地区的警察局长)说话。这一模式的运作很容易通过以下方式被加以详细描述:比如,通过地点1和2之间直接联系的建立,合并其他地点,中间人与最初的要求对象之间开始讨价还价,或者两个地点因具有共同的成员和/或活动而朝部分相同的立场发展。

居间联络创造出新的集体行动者。当新近建立联系的各地点储藏了互补性的资源时,就会像罗纳德·伯特(Burt 1992)所指出的那样,居间联络便为有关各方尤其是中间人制造出新的有利条件。同样地,先前存在着的居间联络关系之破裂,则导致政治变化的发生并且损害中间人的权力(Gould 1998)。

中间人在社会地位及其做法(modus operandi)上变化很大,而这又会对他们参与其事的斗争带来重要后果。中间人的名称种类各异,包括:当地精英、仲裁人、兼具两种文化者、翻译人员、对话者、政治中间人、贵族、教士以及(部族)首领。一些中间人有意让他们的委托人相互隔离,另一些中间人则积极地使他们的委托人彼此融合。有些中间人一旦达成一项关键性的联系便迅速离开,另一些人则通过持续的讨价还价以确立他们自己的地位。有些人通过使某些地点与其野心勃勃的竞争对手配合、
142 通过与要求对象达成肮脏交易、通过将一些可用资源转而用于达到他们自己的个人目的或者通过驱赶支持者,而削弱这些地点有效提出要求的能力。有些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充当中间人,因为他们只是将其活动视为传播流言、交际、收集信息、帮忙或者互相帮助而已。不过,在所有这些情形中,居间联络改变了某一特定政体中相互联系着的许多群人——他们能够达成有关他们在该政体内之共同命运的定义。居间联络在政治行动者们中间造成了新的界限与联系。

范畴形成 造就了认同。一种社会范畴是由一系列的地点所组成,这些地点享有一个使它们全都区别于和全都关联于至少是一批明显被这一界限排除在外的地点的界限。范畴形成的发生借助于三个不同的亚机制:人为制造(invention)、借用和遭遇。“人为制造”包括了权威性的划分界限和制定有关越界关系的规定,就像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以法令的形式确定波斯尼亚

人谁是塞族、谁不是塞族,继而规定塞族人如何与非塞族人相处那样。“借用”则涉及引入已经存在于别处的一整套界限—关系组合,并将其置于本地,一如乡村的法国革命者们依照爱国者/贵族这条已在巴黎和其他主要法国城市造成分裂的分界线,而彼此区分一样。“遭遇”涉及的则是先前分离的(但具备良好的内在联系的)网络之间的最初接触,在此过程中,某一网络的成员们开始与另一网络的成员争夺资源,开始互动性地产生有关界线的定义以及超出这一界线的关系。诺贝尔特·埃利亚斯和约翰·斯科特森(Elias and Scotson 1994)描述了莱斯特城外相邻的两个地方彼此相似的人们之间的遭遇,他们制造出一整套相互带有敌意的区别、标签、默契和实际做法,以此将新来者与当地的长期居民分隔开来。他们制造出新的配对的范畴。

再看一起发生在中东的遭遇的例子。曾作为一名民族志学者在埃及度过多年的阿米塔乌·高希,复述了他的一个名叫伊斯梅尔的朋友 1988 年所讲的有关在伊拉克的埃及工人的故事:

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埃及与阿尔及利亚进行了一场足球赛,以决定哪个队最终将参加世界杯赛。埃及队赢得了这场比赛,各地的埃及人因此而欣喜若狂。在伊拉克,集居在一起的二三百万埃及人——所有这些人全都是年轻人,全为男性、没有家庭、孩子和妻子,一心只盯着他们新买的电视机——冲出了他们的住处,欣喜若狂地冲上街头。他们的足球队为他们带回了自尊,而这是他们的卡式录音机和电视机所无法带给他们的。对于从未有过正常政治生活,或许除了在朝圣时外从未目睹过大规模人群的伊拉克人来说,如此结群而出的埃及人想必有似于世界末日时的善恶大决战的来临。他们所做出的反应是对街上的埃及人

发动攻击——常常伴以训练有素地使用枪炮,攻击那些欢欣鼓舞、手无寸铁的埃及工人们。[Ghosh 1992:352—352]

也就在那个时候,伊斯梅尔决定离开盛产石油的伊拉克,回到他那贫穷、以出口劳动力为主的埃及小村庄。他所经历的范畴形成过程使他胆战心惊。

人为制造、借用、遭遇以及它们的共同组合,都没有在界线的这一或那一边造成一个完整的圆周或者一个同质的人口;相互混杂的情形、进一步的区分以及不同程度的一致始终继续存在。范畴形成从容进行且以不连续的增量出现,但它有力地影响着斗争参与者作为其互动之名义的认同。因此,形成某一特定人口的人们是作为妇女、市民、伊拉克人,还是作为财产拥有者而提出集体要求,部分地取决于居间联络,部分地则取决于范畴形成。

对象转换 对斗争手法影响很大。对象转换意味着提出要求者与要求对象之间关系的改变,就像在帕尼普尔,处于变动中的各方及其中间人向巴基斯坦行政当局寻求支持,并由此而推进了当地冲突的军事化。对象转换常常在斗争的策略性互动期间短期出现;(例如)一伙相互打斗的家伙联合起来对付警察,一位介入市场内冲突的官员把相互冲突的顾客转移到对自己的攻击上,某个被围困的税收员请来市长。当然,这些转换通常使行动者及其所展示的配对的认同发生改变,但它们同样影响可用的、适当的以及可能生效的集体提出要求的诸多形式。对象转换也以较长时间并在斗争互动之外出现。例如,当被选出的立法机关获得相对于国王、军阀以及政治恩主的权力时,提出要求不仅是针对立法机关及其成员,而且转向竞选运动、竞选实力的展示以及诸如游说议员之类的伎俩(Tilly 1997)。这类使政府

受议会控制的情形通常促进斗争手法从特殊到模式化、从小规模到大规模的转变,以及从由当地名流居中调停到受政治中间人和立法者指导或居中调停的转变。印度国民大会党在 1885 年的形成,及其经甘地的协调而采取的层级结构——差不多与英国所采取的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相一致,既促进了印度领导人日益倾向于英国议会的统治方式,也是由印度领导人的这一取向所产生的结果。在他们的行动范围内,这些为他们所采取的步骤产生出模式化的、大规模的、相对未经调停的对于英国各政党、政府以及议会的要求(Johnson 1996:156—162)。在早期的若干年间,国大党则是借助某个正常的英国压力集团,通过游说议员、请愿和草拟声明,以提出自己的要求的(Bose and Jalal 1998:116—117)。

正因为斗争手法居于社会关系之中,而不在个人行动者或者认同之内,对象转换因此显得事关紧要;对象之转换,选取了或者产生出相互提出要求的独特形式。固然,长期的对象转换与其他影响形成的过程相互交叉。当工人和经理之间关系发生变化以及政府多少积极地干预管理方和工人之间的争端时,所有三方都经历了内在的转变,但只有某些转变直接来自于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政府成为管理方和工人提出其要求的更为突出的对象,不过这一变化是在与其他许多变化的相互依赖中发生的。对象转换部分地也有赖于居间联络和范畴形成,这是由于中间人使行动者与独特的要求对象联系起来,而且,新范畴的形成也为另一群类似的要求者带来新的支持者、敌人和听众。

合法性确认 指的是外部的权威对行动者、其各种做法及其要求的确认。它是某种非常普遍的现象的一个政治上的版本。在思考势力弱小且处于欧洲外围的瑞典何以加入到 1630 年的欧洲激战问题时,埃里克·林玛对这一普遍现象进行了仔细

的反思：

我要对认同的社会特征加以强调：人们独自并不能决定他们是谁或他们是干什么的，任何此类决定的做出总是与他人一起进行的。我们需要的是，承认我们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人，而且，仅当我们被承认时，我们才能最终着手建立一种认同。寻求承认将因此而开始占据那些拿不定他们是谁的人们或群体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想受到认真对待，都想得到尊重，我们也都想被承认为我们所宣称的那种人。不过，承认却极少是自动的，在我们赢得它之前，我们常常被要求去证实我们对自己所做的解释的确适合于我们本身。为了提供此类证据，我们常常被迫去行动——为了让人们确信我们所作的自我描述的适用性，我们必须进行战斗。[Ringmar 1996:13—14]

林玛的言语中传达出合法性确认主要是一种满足某种心理
145 需要的方式这一令人遗憾的含义来。不过，他对于瑞典介入三十年战争所做的分析，还是很充分地表明了瑞典之介入战争，是有着远较民族自我满足为多的利害攸关在内的：由于瑞典的开战勇气，改变了它与所有其他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赋予它的外交以前所未有的可信性，并且影响到其欧洲邻国的政策，因此，瑞典作为一个强国而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的确，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1648)确立了一系列新的强国，这些国家现在被视为拥有主权的国家，它们既构成了欧洲舞台上被确认的主要行动者，又集体性地构成了到达和离开这一舞台的确认者。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这些强国的后继者延续了这一确认的过程，并且最终将其延伸到世界上的所有国家。

这一过程出现于每一政治体当中,无论是属于国际、国家还是当地规模的。每一个政治体都含蓄地制定出一份有权存在、有权去行动、去提出要求和/或有权按常例利用政府所控制的资源的政治行动者们的名册,由此而划定其成员与挑战者。通过这种做法,每一政治体还含蓄地(有时也清晰地)传播其在可以接受的政治组织、成员身份、认同、活动以及提出要求方面所确立的评判标准。一些组织则专司监督和确认这些组织、成员身份、认同、活动以及要求之提出的可以接受或不能接受。举一个极端但有意义的例子:1945年,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此过程中对欧洲地图做出广泛的重新划分的列强们,将承认有效国家的任务让与了联合国。在随即掀起的巨大非殖民化浪潮时期,联合国官员付出大量努力以甄别以下形式的表现和要求:

我们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因此我们理应拥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是一个遭受了不公正压迫的民族,因此我们理应得到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理应重新获得独立。

我们的殖民主子准备给予我们以独立。

我们要求领导一个新国家的权利比我们对手的更有效。

每一项要求必然带来由有抱负的国家领导人所采取的行动——这些表现展示了有关合法权利、领导人身份、行政能力、民众支持、内部军事控制力、经济生存能力,以及从至少是从一些强国所获得的支持的证据。这些做法还必须是多价的,它要在殊为不同的听众——其中一些人彼此不和——中间确立起可

146 信性。最起码的听众群,不仅包括联合国的官员,还包括前殖民各国的领导人、本地选民、宣称有权代表国家的对立要求者,以及常常会在这时提出其领土要求的邻国的统治者。在列强代表的指导下,联合国官员们更多地拒绝而不是接受了各种要求,但在1945年至1990年间,他们还是确认了一百多个新国家,当然,这些国家的确认,是以联合国官员们所建议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作为条件的。

在这个极端的例子中,世界列强创造了一个以激进的方式使提出要求得以标准化的国际官僚机构。但类似的过程在整个斗争政治世界中,更少官僚性和更小规模地发生作用。每个政权都会沿着从被指定的到被容忍的再到被禁止的这样的连续统一体,而对各种形式的组织、公开宣称的认同以及诸多形式的集体互动做出分类。的确,大量的政治斗争关系到当权的政府应该指定、容忍或者禁止哪些形式的组织、哪些认同以及哪些形式的集体互动。那种在印度被人们随意地称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东西,集中要求的便是在这方面给予印度教以优先权,这里的印度教是如同 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RSS)——1925年发源于那格浦尔的一个协调性组织——所定义的印度教。由于RSS声称锡克教徒和佛教徒实际上是印度教徒,该组织的计划强调的是国家对印度教徒/穆斯林这一成对范畴的确认(Tambiah 1996:244—245)。一个当权的RSS联合政府,是否会真正地将它的整个计划写入法律之中,仍然有待观察。

一些政权,包括南亚的政权在内,在它们规定、容忍和禁止何种组织、认同以及集体互动方面,存在重大不同。但所有这些政权都创制出一些这方面的程序,以对其可接受性做出公开甄别。这些程序以法律、登记、监督、警察行动、补助金、公共场所的组织以及起镇压作用的警察而得以明确。如伊斯梅尔讲述的

1988年的故事所暗示的那样,当年持镇压态度的伊拉克政权,未曾给埃及工人的群众性街头示威留有余地,这使得那些狂喜不已的埃及工人成了遭受伊拉克年轻人攻击的可怜猎物。

正因为确认事关紧要,因此,斗争政治中的一些重要因素——某种严格的手段——目的推算会使之变得神秘莫测——实际上具有清晰的意义。例如,社会运动的参加者们为何花费大量的精力在共有认同的公开证实上:一起游行、展示共同的象征、在彼此间实施团结?许多观察者认为这种团结一致和共同的认同带给参与者们的是内在的满足,但这种解释既忽视了在许多场合中认同展示给参与者带来的只是苦难,也忽视了一些领导人为了支持公开宣称的认同而在协调正确的公众行动时所做出的努力。在集体价值、团结、人数和承诺方面成功地提出要求,引出了承认作为一种有能力在下一次政治斗争中产生影响的可靠政治选手的出场。在南亚,群体合法性确认作为对某个主要宗教范畴而言的有效对话者,给予某个组织或者某个领导人网络以很大的重要性。 147

相互交叉的机制在南亚

在南亚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冲突中,我们提出的所有四个机制相互发生交叉。在印度的阿约提亚(Ayodhya),有一座16世纪的清真寺,清真寺以第一位莫卧儿皇帝巴布尔的名字而命名为巴布尔寺。20世纪80年代期间,一些好战的印度教群体开始要求毁掉这所寺院,并建造一座罗摩(Ram,史诗英雄罗摩衍那)庙宇。就在1989年大选之前,人民党的一些激进主义分子将他们所谓的圣砖运抵阿约提亚,并且隆重地为他们计划中的庙宇举行了奠基仪式。第二年,该党的主席阿德瓦尼乘着他

的两轮战车,做穿越北印度的朝圣旅行,沿途威胁着要开始在阿约提亚建造罗摩神庙。阿德瓦尼是从索姆纳特(Somnath)——一个虚构出来的穆斯林曾经毁掉一座印度教大庙的地点——开始他的朝圣之旅的。

阿德瓦尼的追随者们将他乘坐的丰田牌有篷货车打扮成传说中的英雄阿朱那(Arjuna)的战车模样——人们所熟悉的那种在经过沿途的城镇和村庄时,能够引来鲜花、椰子、燃香、檀香膏以及妇女们祷告的形象(Kakar 1996:49)。当局在阿德瓦尼开始他阿约提亚之行的最后一段行程前将他逮捕,但此时他的许多追随者已经先他而抵达这座城市。当他的一些追随者们冲破警察设在出事的清真寺附近的路障时,警察向他们开了火,打死了“几十”名人民党激进主义分子。如苏赫·卡卡尔所讲述的:

他们的尸体在萨与河的岸边被焚化,骨灰被属于人民党的工人们带回到这些死者受到欢呼拥戴的不同地方的村庄和城镇。在那些地方,他们被颂扬成为印度教事业献身的烈士。不久,印度教徒—穆斯林暴乱便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爆发了。[Kakar 1996:51]

不过,这些“暴乱”也集中在属于较高种姓的学生们对国民政府恢复采取一项有利于“其他低级种姓”的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公开
148 抵制上(Tambiah 1996:249)。

根据苏赫·卡卡尔的报道,1990年在海德拉巴,暴力仍在继续:

在阿约提亚以南一千多英里处,暴乱开始于萨达尔——一位属于穆斯林的电动黄包车司机被两名印度教徒

所杀。尽管这一谋杀行动后来同对立的两伙人之间的土地争端联系起来,但在当时,它却是在该市日益上升的印度教徒—穆斯林紧张关系的背景下制造出来的。穆斯林则以在该城不同地方刺伤四名印度教徒作为报复。随后,马吉德汗,一位靠从政和犯罪行为而形成幕后势力的有影响的萨布兹曼底当地的领导人,被一些属于人民党的工人们用剑所伤,传言他因此而丧命。穆斯林暴徒们则在这座有城墙的城市的大街小巷四处活动,继之以印度教暴徒们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到处行动,1990年的暴乱由此而展开。暴乱持续了十周,据称有三百多人死亡,另有几千人受伤。[Kakar 1996:51]

尽管海德拉巴事件中的流血和伤亡远远超过1954年帕尼普尔的事件,但事件通过对象转换而逐步升级的机制却同样出现在两次冲突中。

冲突并没有就此结束,1992年12月6日,人民党的好战分子们当真摧毁了阿约提亚的穆斯林寺庙,并且开始在寺庙旧址上建造一所印度教庙宇。“像所有此前的运动及其所选定的日期一样,”查图维迪评论道:

选择12月6日也带有一种隐藏的印度教含义。这一天是为期十八天的摩诃婆罗多战争——在战争中,克里西那神激励阿朱那不惜代价以尽其职责——开始的日子。如同在此前的许多场合中那样,“维西瓦印度教大会”(VHP)又一次利用了印度教仪式的象征主义,以此传达出一种大大有利于该组织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印度教认同的强烈信息。[Chaturvedi and Chaturvedi 1996:182—183]

大约就在同时,在北方邦的一些人民党好战分子攻击并毁坏了在法扎巴德的一座清真寺,他们也在为阿约提亚运动招募新成员。在北方邦的巴巴卡加翁村,贱民工人的高种姓剥削者们也企图(但后来证明是颇不成功地)为此目的而征募这些工人们加入泛印度教联盟(Dube 1998:212—214)。好战分子们在阿约提亚的工作是居间联络、范畴形成以及对象转换结合的产物。他们接着便寻求处境艰难的中央政府对于他们所采取行动的合法性确认。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印度许多地区印度教徒的警察与穆斯林警察之间的斗争,导致总计大约 1200 人死亡(Bose and Jalal 1998:228;Brass 1997:214—253;Chaturvedi and Chaturvedi 1996;Madan 1997:56—58;Tambiah 1996:251)。

居间联络、范畴形成、对象转换以及合法性确认全都出现在
149 这些冲突中。桑德拉·弗赖塔格指出了 19 世纪 80—90 年代的母牛保护运动与一个世纪后印度表面上的集体斗争之间的高度相似性。弗赖塔格说道:“把当地的认同和价值与一种更广义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的能力,是母牛保护运动有别于当时其他类似的地方性集体行动之处”(Freitag 1996:216)。在这场运动中:

在当地大人物的保护下,一些巡回游说者们召集会议,会场上张贴着的海报讲述的便是有必要保护“母亲牛”(Mother Cow)的故事。为一些新成立的母牛保护协会而印制的规则被当作模板:当人们在某个地方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母牛保护协会时,他们便会对这些规则加以修改,以反映当地的风俗传统以及该地区特殊的社会摩擦。从印制的规则中我们发现,一些地方的母牛保护协会针对的是穆斯

林,与此同时,另一些地方则针对的是低级种姓、不可接触者,或者针对一些巡游的团体。在一些城市,皈依基督教者常常成为攻击的目标。[Freitag 1996:216—217]

同样地,阿约提亚骚动也有赖于一些组织和地方领导人的居间联络,涉及印度教/穆斯林范畴关系的加强和转变,使对象从当地的敌人转换为国民政府,以及——就其不成功而言——企图获得对于从穆斯林手中重新夺取古代印度教宗教地点的传统做法的确认。尽管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因果机制以对印度教/穆斯林冲突做出总体上的说明,但我们所提出的这一小批机制,对于我们解释南亚形势的一些重要特征有所助益。

居间联络、范畴形成、对象转换以及合法性确认不必同时出现。例如,居间联络通常在使得几个受侵害的工人群体采取协调行动以反对同一群雇主时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些情形中,范畴常常已经存在,而对象却并不发生转换,对工会和工人的合法性确认是在有效行动者直接依循官僚政治的常例时才会涉及到。单个的机制也不必在其他不同地方产生出相同的总体结果来。在南亚的冲突中,对象转换则一再重复地使一伙暴民、一些投机分子或者个体农民们相互争斗的局部冲突,变得与全国性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冲突的斗争手法、修辞用语和范畴相类似。

不过,对象转换在其他地方有时候则是横向地或者向下发生作用——或者通过将斗争互动转移到另一相似的背景,或者使当地的敌人变成那些代表全国性事业的人们的牺牲品。在第一种情形中,相互搏斗的一伙人有时则联合起来以对付前来驱散他们的警察;在第二种情形中,继持不同政见者和当局之间的协同斗争而来的劫掠行为,常常与持不同政见者最初的要求对象或者他们所提的要求毫无关系。在任何一种情形下,不仅互 150

动的各方发生重要变化,而且斗争手法、修辞用语以及范畴也发生重要变化。

出现于南非的各种认同机制

南非在 1980 年至 1995 年期间的经历,以其与南亚远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组合方式以及不同的结果,为我们提供了居间联络、范畴形成、对象转换以及合法性确认的许多例子。整个这一时期,随着非洲黑人发动反对剥削的斗争,外国政府和组织采取更有效的抵制行动,对黑人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种族隔离体系的削弱,南非经济中国内外投资的急剧下降,富裕白人之逃离该国,执政的国民党本身围绕采取遏制还是融合政策发生分裂——大约 30% 的南非白人党员因此而离开该党——精心设计的南非种族隔离体系终于瓦解。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政府交替使用的做法是:一方面,企图在政府中增选一些混血(“有色的”)南非人、亚裔南非人以及一些顺从的黑人领袖;另一方面,继续维持镇压。一系列复杂的策略互动将相互竞争的黑人领袖们、其他种族一族群范畴的代表们,诸如南非白人或有色人、政府的军事力量以及政府成员本身,相互连接起来。

居间联络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好战的“黑人意识运动”[BC,由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于 1969 年创立,旨在有意地与非种族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NC)形成对照],便是在 80 年代期间开始形成新的联合的。“黑人意识运动”在组织被称为“国民论坛”的抵制阵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组织还使自己与一些以好战的黑人为基础的工会结成紧密的同盟。在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黑人意识运动”的一些激进主

义分子开始组织一些运动：

受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日益增加的联系的影响，许多“黑人意识运动”的激进主义分子断定：一种更少意识形态而更多以群众为基础、局部组织起来的抵抗形式是当前之所需。1979年时，这个国家为安抚其反对者所进行的改革，为更大规模的群众组织提供了生存空间，从而无意识地鼓励了这一新的策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出现的群众组织虽然得益于这些改革，同时却又通过公开拒绝改革以进一步支持和推进他们的诉求。例如，当博塔(P. W. Botha)后来 151 建议设立一个新的三院制议会，以通过给予其有限代表权的方式而重新赢得有色人和亚裔的忠诚时，激进分子们则利用这一建议，作为地方性的抵抗得以在建立于1983年的“联合民主阵线”(UDF)之下实现统一的推动力。[Marx 1998:202—203]

这种组织方面的努力，是在地方性的公民协会广泛形成和工人的战斗性普遍得到重大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Price 1991: 162—182)。由来自575个不同组织形成的全国性的“联合民主阵线”——它本身便是一次居间联络的壮举——利用了当时还属于非法组织的“黑人意识运动”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所建立的一些联系，而它所利用的联系实际上远不止如此。1985年，一个由一些工会组成的类似的(和实际上重叠的)联盟形成了“南非工会大会”(COSATU)。这些有着良好联系的组织协调了对政府的广泛抵抗行动。尽管政府在大多数工业中心宣布了紧急状态(1985年7月)，尽管许多社区组织遭到禁止，数以千计的激进主义分子不加审判就被当局拘禁，黑人的动员在80年代后期

却仍然在加速进行。抵抗与国际压力的结合,动摇了白人对公众政治的控制权。

在国内和国际压力下,甚至南非白人集团也开始出现裂隙。1982年,一些反对任何形式妥协的国民党议员就已经离开该党,组成了一个人数较少的、坚定的“保守党”。余下的国民党议员则采取了一些谨慎的和解步骤,1989年,国民党领袖、总理德克勒克与此前被禁止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举行了谈判,到1990年,德克勒克则在政府事务上与非国大进行了密切的商谈。获释出狱的非国大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成了国家政治事务的主要参与者。1991年,南非工会大会的激进主义分子西里尔·拉马菲萨(Cyril Ramaphosa)以非国大秘书长而赢得选举。与此同时,此前一直接受政府和国民党暗中支持的、由夸祖鲁家园酋长M.布特莱齐领导的“英卡塔自由党”(Inkatha Freedom Party)突然发现自己处于日益孤立的境地。英卡塔加强了对非国大对手的攻击,但在1994年的大选中,英卡塔仅仅得到全国黑人选票的大约6%,相形之下,非国大却赢得了75%的黑人选票。

不过,非国大在1990年至1994年赢得大选的几年间,也不得不走上谈判一途。1989年苏联的部分解体,减少了非国大在外交和财政方面的外部支持,而这反过来又鼓励美国对双方施压,以使双方达成妥协性的解决办法而排除革命。如同乔·斯洛沃(Joe Slovo),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在1992年所说:

制定一个在其中探讨谈判过程中一些较大问题的框架的起点,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谈判?我们要谈判,是因为到80年代末,我们断定:作为日益加剧的危机的结果,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权力集团,不再能够继续以

旧的方式进行统治,而且他们也在真诚地寻求与过去做出一些决裂。与此同时,我们明显不是在对付一个被挫败了的敌人,而早期那种经由解放运动而革命性地夺取政权的方式,也不可能被现实性地提出。这种力量平衡(它还将继续反映当前的现实)的紧要关头,提供了一种将可能的谈判提上议事日程的标准时机。而我们也正确地发起了整个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非国大被接受为主要的谈判对手。[Saul 1994:178]

于是,一种半革命性的形势让位于一种明显协商性的妥协。我们看到,斯洛沃所分析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将(a)非国大被政府当局以及其他一些大国所确认,与(b)发生在非国大内部以及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动员起来的各不相同的反对派力量之间的居间联络,结合到了一起。

以纳塔尔的英卡塔动员为例,由酋长布特莱齐领导的夸祖鲁家园,是由散布在德班(Durban)内地的29个大块和41个小块土地所组成。夸祖鲁将它的劳动力出口到整个纳塔尔——一个以沿海的德班为中心,并且环绕夸祖鲁的更大的地区——的城区和工业区。它还将大量季节性流动工人派往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兰德(Rand)。夸祖鲁的许多移民(尤其是在兰德)住在由雇主提供的寄宿舍里,在种族隔离制度下,这些寄宿舍常常设在为非洲人所建立的有色人种居住区内。作为居住在被隔离地区的清一色的男性群体,他们一再和有色人种居住区的居民尤其是年轻的男性居民发生冲突。

在整个夸祖鲁及其移民所在的大部分地方,手下控制着听命于他们的一帮人的军阀式首领们,玩弄的是典型的间接统治的把戏。在他们自己的领地内,他们招募并且训练一些季节性

工人实行保护措施,从对诸如啤酒之类商品的垄断中获利,从当地的商人那里收取各色各样的费用。布特莱齐酋长的英卡塔自由党长期享有由他们提供的财政、政治以及(在必要时的)军事支持:

153 各类军阀式首领之所以倾向于加入英卡塔,是因为在夸祖鲁,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一种等物交换(*quid pro quo*)的基础上——作为换取不受外在干预而自行其是的一种回报,他们答应在英卡塔纠集力量时为其派出一些人马,同时也会为任何一场必要的战斗提供“士兵”。有时候,他们用汽车为那些需要协助的军阀式首领送去一些保安人员,或者组织保安人员实施对联合民主阵线/非国大……据点的攻击。[Minnaar 1992:65]

整个 70 年代期间,一种基于反对种族隔离的非国大与英卡塔的联盟似乎还有出现的可能。但到了 80 年代,布特莱齐和非国大已变成不共戴天的敌人。联合民主阵线在 1983 年的形成,南非工会大会在 1985 年的成立,以及他们在纳塔尔所从事的协调反对南非政府方面的共同努力,构成了对英卡塔在夸祖鲁及其附近地区工人中所享有的霸权的威胁。英卡塔为此而进行了回击。例如,当一些附属于南非工会大会的工会,开始在纳塔尔的彼得马里茨堡(Pietermaritzburg)地区组织工人时,英卡塔也随即在此创立了一个与之抗衡的工会,策划了对属于联合民主阵线的工人枪击,并且开始在附近的有色人种居住区展开一场侵略性的强制征募运动。在 1985 年至 1988 年期间的彼得马里茨堡地区,联合民主阵线与英卡塔之间的斗争,致使大约 691 人死亡(Minnaar 1992:65)。而一些军阀式首领及其追随者

们,则充当了英卡塔采取行动时的重要执行者。

然而,在继 1990 年以非洲人为基础的政党得到承认后的动员时期,许多军阀式首领却变成了更为积极的英卡塔代理人,他们不仅继续从事他们的标准式活动,而且增加了他们支付给布特莱齐所领导的党的贡金,提供人手为英卡塔公开展示其所受到的支持助威,并且组织实施对非国大激进主义分子的攻击。(在 1984 年至 1989 年的南非政治冲突中,全国大约有超过 5500 人死于冲突,但在 1990 年至 1993 年,这一数字便上升为 13500 人或者更多,其中,大部分死者是非洲人,他们死于同样是非洲人的另一些人之手(Charney 1999: 184; 另见 Seidman 2000)。与此同时,有色人种居住区的英卡塔的反对者们——尤其是学生和失业的毕业生们——日益使他们自己与非国大结成同盟;而一些广泛形成的市民协会,如同这些市民协会中的一些网络在有色人种居住区之间建立起相互联系一样,把青年激进主义分子们与其社区内的较为年长和资历更深的成员们联系起来。于是,居间联络之网便在纳塔尔造成了两股令人生畏的政治势力。

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居间联络机制为我们提供了对 1980 年至 1995 年间南非政治中的许多结盟和重新结盟现象的解释。中间人使以前互不相连的地点联系起来,由此而促进了新的集体行动者及其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新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新认同之生成。1990 年之后迅即高涨的非洲人的大动员,较少依赖于把新成员引入斗争政治之中,而更多地有赖于将那些已被 154 小规模地卷入斗争中的人们整合到更大的政治行动者之中。居间联络为之提供了所需的连接。

在 1980 年至 1995 年南非动荡的历史进程中:

- 当政治组织者将一些相互分离的派系和地区引入共同的阵线时,居间联络反复显现。
- 对象转换使得政治行动者们时而在国际行动者、国家当局和当地对象中间提出其要求,时而在斗争常用方法、措辞和范畴方面做出相应变化。
- 合法性确认既在对前后相继的国家政权做出国际反应时,又在以前遭禁止的政治经济组织被承认为南非政治中的有效行动者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 由于大部分关键范畴在种族隔离政策下或者之前已经形成,范畴形成在南非公众政治中所起的作用较不突出。

或许,1980年至1995年间南非最重要的范畴转变,涉及的是非洲人内部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大量非洲妇女成为有偿劳动力与男性对配偶及子女赡养的日益减少相结合,促进了妇女作为一个其代言人宣称她们拥有不同于男性的独特政治境遇、怨愤和利益的重要公众范畴的出现。“当政治组织蔓延和动员加强之际,”盖伊·塞德曼说道,

妇女日益开始组织起她们自己的团体。到1986年,不同的妇女组织已在南非的大部分地区形成。例如,1979年成立于开普敦的“妇女联合组织”,1983年成立的“瓦尔妇女组织”,以及最初成立于1954年、在1980年代初期恢复活动的“南非妇女同盟”。迄至20世纪80年代末,许多这类团体已开始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明确表达出一种性别观点。[Seidman 1993:306]

即便如此,在1989—1994年的过渡时期,妇女并未明显地作为

一个独特的政治集团,或者作为新的解决办法中单独的一方而出现。非国大内部的女权主义动议,通常在大会投票时遭遇败绩(Seidman 1993:312—315)。直到那时,范畴形成进展缓慢,而对于妇女代表权的确认则完全不曾发生。

155

不过,随着非国大的掌权,平衡发生了变化。范畴形成和合法性确认出现了互动。参与南非未来谈判的各方在1991年一致同意,创建一个负责监督一些政治重组建议之性别影响的“性别咨询委员会”。在纳尔逊·曼德拉的领导下,非国大全国总部采取了一项从1992年起把妇女包括在所有重要委员会当中的政策。在有关新宪法的多方谈判期间:

1993年初,非国大的妇女激进主义分子得出结论认为:性别咨询委员会不合适,妇女必须有更直接的介入。为确保妇女们的声音能够出现在谈判会议室里,在1993年3月发生的一次几乎未曾加以宣扬的事件当中,非国大的妇女激进主义分子们强行闯入谈判会议室,阻止会谈进行,直到妇女们真的坐到了谈判桌上。令人惊讶的是,参加谈判的所有26方居然接受了这一性别配额——这项决定反映出各地的妇女在提出民主建设中的性别代表权问题方面所达到的程度。每个两人小组中,女性必须在其中占一半名额,于是,最终接受一部临时宪法并使大选开始进行的半数谈判代表就成了女性——一种对新宪法下所创立的各种机构具有真正隐含意义的代表构成。[Seidman 1999:294]

性别不平等等问题得到日益明显的关注,妇女的政治发言权以及公共事务向妇女开放,是南非国内的动员与国际上女权主义者的激进主义运动合流的产物。1990年代,南非的女权主义

者们能够通过向国际上的女权主义盟友发出呼吁,并利用她们自身的广泛国际经历,以坚持其“有效的民主化要求政府支持妇女权利”的主张。1995年,出席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大会的南非高级代表团一回到南非,便广泛宣传要把推进性别平等当作一项“得到国际承认的义务”(Seidman 1999:297)。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范畴形成开始起作用,妇女作为南非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种族、政治和经济分化中的政治认同,也就应运而生了。目标转换则出现在将新政府当成女权主义提出要求的明确目标上。而当南非领导人对性别政治加以改造,以使其适合国际标准时,合法性确认也引人注目地出现了。女权主义领导人们所进行的居间联络,使得制定出一些总体上依据性别而不管妇女们当中存在着大量种族和族群方面不同的计划成为可能。

156 于是,对最近发生于南亚和南非的经历所作的详尽考察,为我们展示了在两种环境下使行动者、行动和认同发生改变的相似机制。不过,相似性也就到此为止了。就在我们目睹了南亚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全国性范畴划分取代其他的冲突与合作基础的日益上升的趋势之际,在南非,我们则看到了在较短一段时期内出现在认同及其相互关系上的大规模重整的证据。更一般地说,机制在其中起作用的这两种环境以及诸机制相互连接的特殊形式,显然会对影响认同的诸机制所产生的政治后果具有很大影响。在不同环境和形式不同的斗争政治中起作用的相似原因和结果,绝不能保证它们将大规模地产生出相似的结构和序列。

居间联络、范畴形成、对象转换及合法性确认

单个地来说,我们的这四个改变认同的机制,基本是以相同

的形式重现于范围广泛的斗争政治当中的。来看一看居间联络：经过某一在它们彼此之间关系以及/或它们与另一地点之间的关系中起媒介作用的单元，而将两个或者更多目前互不关联的社会地点联系起来。居间联络减少了不同地点之间交流与协调的交易成本，为联合使用位于不同地点的资源提供了便利，并且创造出新的潜在的集体行动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居间联络确立起一些偏于利用同样的联系而不是其他可能的联系——它们会从原则上产生出不同的集体互动——之倾向。例如，在前一章里，我们看到了在 1950 年代的肯尼亚斗争时期，巡回商人们是如何把内罗毕与位于高地的起义中心联系起来的。这些中间人帮助形成了一种使殖民当局长期感到困惑的高度分散但相当有效的交流结构。事实上，殖民当局一直在搜查他们认为是由肯雅塔领导的一个并不存在的、集中的阴谋组织。

我们可以把范畴形成视为一个单一的机制，或者也可以把它看成是由三个紧密关联的机制组成的一个集束。范畴形成造就出一系列的地点，这些地点共有一个界限，此界限使它们全都区别于或全都关联于至少是一批明显被排除在该界限外的地点。我们称为人为制造的这一范畴形成的变量，使得权威性的划定新界限以及对超越这一界限的关系做出规定成为必要。当人们将已经在其他地方发挥作用的界限与越界关系置于本地时，范畴形成则通过借用而发生。而当一些先前分离的但具备良好内在联系的网络的成员开始彼此接触、开始相互争夺资源、开始互动性地商定有关界限以及超出这一界限的关系时，我们的第三个变量，遭遇，就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些范畴。以这三种变量的形式，范畴形成出现于从民族主义到种族灭绝再到民主化的大范围的斗争政治之中。例如，第六章将为我们揭示，在 19 世纪初的美国，当赞成和反对奴隶制的各种力量在它们相互

间制造出一种可怕的界限时,范畴形成所发挥的作用。有时,遭遇、人为制造和借用全都对在美国不同地区形成这种界限起到了促进作用。

对象转换改变的是要求者与要求对象之间的关系。典型的例子包括从攻击当地的敌人转向攻击其假定的盟友,以及呼吁第三方干预争端。对象转换激活新的或者不同的社会关系,由此而使得可用的信息、资源及互动脚本发生改变。其所以不同于同类的居间联络,是因为它集中于提出要求,以及因此而始终改变着先前已被激活的有关谁是谁的问题的答案。没有对要求者、要求对象及其相互之间关系至少是隐含的识别,就绝不会发生提出要求的情况。我们已经看到,对象转换在帕尼普尔冲突的逐步升级,以及在南非呼吁对种族隔离政权实施国际制裁的过程中,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第六章将再次向我们展示,对象转换在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持不同政见者们向他们的欧洲盟友发出寻求支持的呼吁时起作用的情形。

至于说合法性确认,它指的是外部权威对行动者、其诸多做法及其要求的确认。要记住的是,几乎每个人、每一社会地点抑或每一政治行动者都保持了与其他人、其他社会地点或政治行动者的多重关系,因此也就具有了多种可得到的认同——一种关系便有一种认同。合法性确认是作为一种强有力的选择性机制而在斗争政治中起作用的,这是因为某个提供确认的地点总是对范围极为有限的一些认同、作为以及要求给予承认。于是,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联合国对那种以“我们是一个民族”为名而采取的一些行动进行了评价,并拒绝了大部分的此类要求。尽管自 1945 年以来,以这种方式提出要求的行动者数目达到几千个,但仅有一百多个得到了联合国的承认,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前一章则为我们展示了美国充当 1986 年菲律宾反对费

迪南德·马科斯行动的确认代理人的情景。

我们的四个机制——居间联络、范畴形成、对象转换以及合法性确认——远不足以从总体上为斗争政治提供一个全面的模式。我们只是把它们作为一再重现于各种背景中的认同塑造机制的实例，而不是将其视为一套无论背景如何都会以同样方式发生作用的纯粹的互动装置。我们已经集中探讨了这些机制在改变行动者、行动以及认同方面的地位，我们还必须探究它们在动员、民主化和斗争轨迹中所居的地位。在不同的背景下，这四种机制会以不同方式相互连接并且产生出对比鲜明的结果，不过，每一种机制都会在殊为不同的时代、地区、社会背景和各种类型的斗争中起到相似的作用。我们可以从战争、革命、劳资冲突、民族主义、社会运动以及民主化当中，发现到它们的一再重现。

我们的论点是：对于行动者、认同和行动来说，某些因果机制是在范围广泛的斗争政治中发挥着它们的作用的。它们使斗争政治中重大的矛盾现象之一——一些社会网络的偶然集合如何设法制造出那些坚定的、统一的、自我激发的政治行动者们的幻想，然后又好像他们真的相信这种幻想一样去公开地采取行动——清楚地呈现出来。

159

六 斗争的转变

1856年5月,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著名废奴主义者,在美国参议院发表他那关于“对堪萨斯的犯罪”的演说之后,被人用大头棒打得几乎致死(Sewell 1976:279—280)。萨姆纳在演说中对支持堪萨斯领地内各种强烈亲奴隶制势力的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安德鲁·巴特勒(Andrew Butler)展开了攻击,其中充满了即便在当时看来也是颇为激烈的责骂之词。萨姆纳此举激怒了巴特勒的表兄弟,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Preston Brooks),他走近坐在参议员席上的萨姆纳,指责后者诽谤他的亲戚和他所属的州,并将萨姆纳打得不省人事(Ransom 1989:153)。萨姆纳最终得以从布鲁克斯的这次袭击中死里逃生。由于这一事件发生在堪萨斯领地内拥护奴隶制的势力向反对奴隶制的移民发动攻击的过程中,于是,“流血的萨姆纳”就和“流血的堪萨斯”一起成为一种象征,新成立的共和党内因加入有关自由国家、自由土地和自由人民争论而形成的联合,则围绕这一象征而得以恢复。“现在,第二次美国革命开始了。”一位废奴派记者本·韦德(Ben Wade)警告说(转引自 Sewell 1976:280)。他说对了——但没人能够猜想到这场血腥内战会伴之以巨大的暴行。

1973年12月20日,一场更大的暴力行动在弗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爆发——那儿,早在三十多年前进行的另一场内战,宣

告了一个独裁统治时期的开始。在马德里的一条狭窄的街道上,巴斯克恐怖主义小组“埃塔”(ETA)安放的一枚炸弹,将佛朗哥政府的总理 L. C. 布兰科(Luis Carrero Blanco)炸死(Payne 1987:588—90;Reinares 1987:123)。鉴于布兰科和独裁者佛朗哥有着密切关系,以及他决意使西班牙成为反对共济会—共产主义阴谋的堡垒,此人堪称佛朗哥政权的得力支撑。他之遇刺身亡似乎是对年迈独裁者退出舞台时可能会发生的情景(一场新内战)的可怕预兆。不过,这样的一场大灾难却从未降临:代之而起的则是发生了一场向民主的和平过渡。随之而来的精英解决办法则宽恕了旧政权的忠实拥护者们,并且事实上还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纳入过渡政府之中。过渡政府还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派接纳进立法机构,将西班牙导入一个非政治化的过程。 160

精英、制度与斗争政治

一面是发生于美国参议院内的一场几乎致命的暴力,另一面则是出现于西班牙街头的恐怖主义暴行。为何前者促成了一场残忍的内战,后者却开启了一次最终通向民主的平稳过渡呢?“西班牙人已经经历过一次内战,他们会因此而想办法去避免另一场内战”,做这样的回答显然是不够的。倘若后见之明足以阻止灾难的重现,那么,这个世纪便不会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一再复发的一系列巴尔干冲突了。一种更好的提出问题的方式则是把问题直接与斗争的动力机制联系起来,兹叙述如下:

尽管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发生在西班牙的冲突进程使这个国家从独裁统治转向了民主,而且,这一进程也包含

着大量的政治斗争,但为何西班牙的冲突轨迹有似于一次和平的抗议周期,而发生在美国的冲突却逐步升级为革命的逻辑呢?

来自当今政治科学中的对立传统的两种方法,分别对此给出了部分答案。二者都集中于个人的动机与制度性的妥协。

- 一些历史制度学派的学者诸如吉勒莫·奥唐奈和菲利普·施密特认为,西班牙的过渡应当被看作是政治精英之间在制度性妥协方面成功进行讨价还价的结果——也就是政府和反对派之间达成的所谓“改革协议”(reforma pactada)的结果。[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
- 一些理性制度学派的学者诸如巴里·韦恩加斯特则把内战前美国政体的瓦解,解释为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造成制度性妥协的一项精英协议的崩溃所产生的结果。[Weingast 1999;也见 Riker 1982]

这些分析家们令人赞赏地给予个人、群体和党派的互动以密切的关注,不过,就在他们强调个人动机和精英妥协之际,这两种解释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发生于每一事件之前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大量斗争政治,并且也忽视了那些造就了新的行动者和新的认同、改变了制度性政治的政治变化与冲突机制。

161 尽管对一些环境机制略有提示,但理性主义分析家们在对内战前美国政党体系的失败加以解释时,援引的主要还是认知性的个体机制的例子。研究西班牙向民主过渡的制度学派学者们则涉及了一种相关性的机制——居间联络,但他们却将这一机制局限于一些精英分子,并且忽视了斗争的动力机制(Pérez Díaz

1993:ch. 5)。

日趋瓦解的精英共识无疑是(内战前的)美国统一趋于瓦解的一个关键变量,而一种新的精英共识的建构,则成为西班牙向民主过渡的关键。不过,我们所看到的是更大范围的一些机制,它们在这两个国家各自冲突的关键转折时期,使其精英和非精英都卷入其中:

居间联络 发生在将政府支持者和反对派分开的主要分界线之内及其之外

认同改变 (两个政治行动者之间共同划定的边界的改变,以及二者超越这一边界的关系的改变,)如这两个国家在临近我们所考察的事件时所发生的那样

激进化 在占优势的要求、计划、自我描述与超出这一边界之外的其他人的描述之间日益增加的矛盾,与之相对的是,

会聚 或者是那种有时被称之为“激进一翼效应”的东西。会聚发生时,某个政治连续体的一个或两个极端之间日益增加的矛盾,驱使较为不极端的政治行动者们形成更紧密的联盟

我们并不认为这两个案例是彼此相似的。事实上,正因为它们的互不相同,我们才选取了这两个例子。我们也并不声称这些机制的相互组合产生了相同的结果,相反,它们与殊为不同的环境机制相结合,产生出了不同的结果。在美国,从抗议周期

的逻辑向一种革命的螺旋上升逻辑之转变,可以通过区域性的镜像认同的形成,通过在反奴隶制激进主义分子、本土主义者以及西部移民之间的居间联络安排的增加,以及通过(a)冲突临近之际北方和南方各自观点的激进化,和(b)双方的温和与激进力量之间的会聚,而被加以描绘。我们接着要表明的是,在西班牙,受同样重大的认同改变、新的居间联络安排以及在政府和反对派阵营内部发生的分裂的驱使,激进化在斗争得到制度性控制的同时,被会聚所抵消。

变成一场革命的运动周期:内战前政治体的瓦解

要理解内战前美国政治体的动态,我们必须追溯到距离内战更远的时期(见 Rustow 1970)。这便把我们带回到 19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这一时期正是废奴主义运动以及作为第二个政党体系的杰克逊民主党人出现的年代。有关奴隶制问题的第一次重要的制度性冲突——因密苏里领地是应该作为奴隶州还是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的问题而起——同样也出现在这一时期。密苏里问题是通过达成一项非正式的协议——由缅因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联邦以平衡密苏里以奴隶州的身份加入联邦——而得以解决的(Poole and Rosenthal 1997:94)。由此而产生出韦恩加斯特认为会减少随后四十年里在接纳新州进入联邦问题上的斗争的“平衡规则”(Weingast 1999:151)。但该协议既不完善也很脆弱,这不仅是因为它常常为一些变节的政治家们所破坏,而且也因为奴隶制之外的一些问题加深了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分裂,同时还由于一个新的过于自信的行动者——西部——使天平发生了有利于北方一侧的改变之故。

要对斗争的得以遏制及其最终之逾越界限加以理解,有必

要记住的是：除了声名狼藉的五分之三规则之外，联邦宪法的制定者们小心翼翼地绕过了奴隶制问题，把有关奴隶制问题的规则制定，交到了各个新州的手里。^① 确实，北方人在民选的众议院里拥有席位上的优势，但为了诱使那些（通常人口较少的）奴隶州加入联邦，宪法制定者们特意创立了一个参议院——它按照每州（无论其大小）两个席位的方法来分配参议员议席。尽管众议院内反奴隶制的行动主义者定期提出一些反奴隶制的决议，但各州代表权相等的参议院却使南方得以同样定期地阻止这些决议的通过。只有在参议院内自由州的数目开始严重超出奴隶州的数目，或者当其他问题与奴隶制问题相结合而使得北方和西部走到一起的情形出现，这一平衡才会改变。这便促使来自南北双方的一些寻求稳定的政治家们，力求在新自由州加入联邦时，让奴隶州也同时或几乎同时获准进入联邦，以此来达到双方的平衡。 163

他们为何要这么做呢？1828年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以南方作为其稳固基础的民主党控制了国会和总统职位，他们利用他们所占有的地位以捍卫奴隶制。辉格党则发生了分裂：鉴于从北方商业利益集团——这些人从为南方提供资金以及将南方的棉花装船运至英国的过程中获利——所获得的大量支持，他们因此而不愿反对这一制度。不仅如此，民主党和辉格党甚至在它们各自处于少数地位的一些地区，也分别拥有大量的本党选民，而如果让奴隶制问题使政治争论极化，就会使辉格党冒失去它在南方的飞地、民主党冒失去其在北方和西部的飞地之险。

^① 五分之三规则规定：出于国会议员席位分配的目的，非自由人将按自由人的3/5计算。其他关键决定是：第一款，第二十小节，其中规定将劳工合同的控制置于各州的掌握之下，以及第四款，第二小节，该项规定阻止奴隶通过逃往北方而获取自由。

两党还需要争取大多数的大学选票以使本党的总统候选人当选。由于这样一些缘故,两党的领袖们便有意将部分地造成分裂的奴隶制问题置于政治议程之外(Ransom 1989: 29—32; Silbey 1985)。就将奴隶制问题交给各州处置而言,存在着的是—种“党派的需要”(partisan imperative),它成了非正式的平衡规则的基础,并且加强了宪法所制定的制度性规则。

在一些州里,存在着有关奴隶制规定的一些例外情形:奴隶贸易、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制以及州际奴隶贩运。尽管这些问题在内战前期始终困扰着联邦,但还没有一个问题足以导致联邦的分裂。奴隶贸易在1808年成为非法,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制问题尽管具有某种象征性意义,但还是属于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而州际奴隶贩运问题则多半操于法院之手。当然,这并未使州际奴隶贩运问题成为不是问题的问题,将逃跑的奴隶交还给他们的所有者还是被安稳地交给了多半是同情奴隶主利益的高等法院来处理。

向西扩张具有造成冲突的最大潜力,这一点人人都清楚。随着移民所带来的北方人口的膨胀,南北双方之间在人口和经济活力方面既有的平衡开始发生改变(Ransom 1989: 131)。反之,就在那种对于南方地区正在失去它们所保有的与北方同等地位的担心在南方人中广泛传播之际,南方人指望通过建立新奴隶州以跟上北方的扩张步伐。只要奴隶州与自由州之间的平衡仍然处于稳定状态,政治冲突就会得到遏制。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为止,只是在得克萨斯加入联邦的问题引发争执和墨西哥战争时,这一平衡才受到过严重威胁。

然而,倘若这里所说的便是内战前美国政党体系的大致情形,那它又为什么会瓦解呢?一种传统的解释是把它归之于北方更具活力和不断扩张的经济,不过,单单经济扩张本身决不能

解释政治变化。这里,只需要想一想南非在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几十年间,其经济是如何繁荣就可以了。韦恩加斯特关于一些政治家具有背叛交叉平衡原则的动机的观点,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但问题是,倘若他们的选民对奴隶制问题态度冷漠,那么精英们又为什么要背叛呢?我们的论点有如下四个方面:

- 首先,对于奴隶制问题,北方和西部的投票人日益表现出关心而不是漠不关心,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奴隶们很友好。
- 其次,对于制度的反对将其他一些问题囊括到一种正在出现的政治认同当中,这一政治认同刺激了南方在镜像认同上的改变。
- 第三,在一系列政治构成中,这些认同与本土主义以及西部自由劳动力经济的扩张结合到一起,并在新成立的共和党内北方和西部利益之间的居间联络中达到顶点。
- 第四,尽管共和党人绝非反奴隶制的支持者,但他们在北方和西部存在着的选举利益,还是促使他们将这两个地区以共享的经济利益为中心而统一起来,而他们能够在这两个地区谋取选举多数,也使他们失去了与南方进一步妥协的刺激。

这四点有赖于我们对发生于政治精英之外的斗争政治中的变化所作的理解,现在,就让我们转到对这几点的探讨上去。

从道德废奴到政治性的反奴隶制

就在国会通过制度性的妥协以避免奴隶制问题之际,在华

盛顿之外,奴隶制问题却在日益激化。围绕奴隶制问题而出现了许多问题: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制问题、赞成奴隶制与反对奴隶制的一些派别在边疆地区展开的游击战争、跨越州界的非法转移奴隶以及专为阻止这一行为而通过的逃亡奴隶法案。像在其他此类案例中所发生的一样,一个不受欢迎的问题被一帮人数很少但很积极的少数派坚持不懈地加以推进,废奴派运动即是如此。

165 作为一场社会运动的废奴运动,绝没有超出一个微小的少数派之外,这一运动因它的乌托邦色彩而受到嘲弄,并被视为一种带来不适的刺激物,甚至在北方也不例外。和狂热宗教、禁酒、严守安息日、妇女权利以及反共济会运动一样,废奴运动出现于19世纪20年代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它保留了与这些运动共同的相似之处。研究这一时期的“新”派美国史学家们教导我们的是,不要把废奴运动浪漫化或者对其重要性加以夸大(Silbey 1985:88—91)。的确,废奴主义者数量很少,并且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思想上的分歧(Sewell 1976:40),不过,他们还是通过两种间接的方式,对政治产生了影响。首先,废奴主义提供了一套关于奴隶制之罪恶与遭天谴的语言,以描述被大多数美国人视为一种财产形式的奴隶制的特征(Davis 1969; Foner 1995:ch. 3)。其次,它帮助形成了一代反奴隶制的政治家,这些人被大量吸引到19世纪40和50年代涌现出的政党中,并于随后加入到共和党之中(Barnes 1957; Sewell 1976)。尽管最著名的道德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在他的大部分生涯中拒绝政治,但反奴隶制运动还是成为一种政治性的派别运动,带有超越辉格党与民主党之间存在的党派界限的选举潜力。回到我们在第一章中所做的类型学分析,可以看出的是,它是在各种制度的内部引发出逾越界限的斗

争政治的。

反奴隶制从一场道德义愤运动演化为一种政治行动主义，其过程是缓慢和不平衡的。最初出现的是 19 世纪 30 年代的游说议员和请愿活动(Barnes 1957)，接下来是 40 年代和 50 年代自由党和自由土壤党的形成(Sewell 1976: ch. 1, 3)，最后则是 1856 年共和党的出现，该党随 1860 年林肯的当选而成为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就在道德废奴主义者将他们自己完全孤立起来的同时，反奴隶制的政治行动主义者们却在政治范围内开展工作，与温和的奴隶制反对者们以及其他极少与奴隶制发生利害关系的人们结成同盟。当民主党人斯蒂芬·A. 道格拉斯(Stephen A. Douglas)在 1856 年企图通过允许奴隶制发展到 1820 年密苏里妥协线以北，来为他的总统野心奠定全国性的选民基础时，反奴隶制的政治行动主义者们便展示出了他们在政治上所具有的敏锐判断力。“几乎所有的[反奴隶制的力量]很快就看出了这一举动所提供的政治机遇，并且急于要对这些机遇加以利用。”(Sewell 1976:260)

不过，要不是因为有了美国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较大的变化，政治上的反奴隶制运动依然只能是软弱无力的：首先是一系列使北方和西部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使它们日益与南方分离的结构性变化；其次是发生在这两个地区的有助于冲突激进化的认同改变；第三则是为在反奴隶制运动、本土主义以及西部移民之间形成同盟而进行的居间联络，此一做法摧毁了内战前的美国政党体制安排，并且导致共和党的出现与内战的发生。

166

结构性变化

1845 年至 1854 年间，有近三百万的移民进入美国——他

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自爱尔兰和德国,其中许多人是城里人并且嗜好烈性酒(Ransom 1989:131)。由于大多数的新来者落足北方,从而压低了这里的工资水平并且诱使许多北方人向西迁移,由此而出现一条强大的移民和重新安置的经济/人口空缺链。这一扩张使得南方以其更为静态的农业社会而被远远地抛在后面。

不仅仅是北方和西部的人口增长要比南方快得多,而且,大多数的西部移民来自于东北方的非奴隶州,有着共同的新教背景和进取精神。尽管经济增长的早些时期曾经使北方和南方联系起来,但随着北方的扩张,“当更多的贸易沿着一条东西轴线而非南北轴线而展开时,整个北方的经济已日益形成为一个整体”(Weingast 1999:184)。

紧张状态伴随着整合在继续发展。外来移民组成的新美国人因社会混乱和酗酒而受到普遍指责(Ransom 1989:133; Silbey 1967:47—63),而禁酒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一项重要成果。移民中的许多人(尤其是爱尔兰人)被东部城市的民主党核心组织为选举目的而动员起来这一事实,使得北方和西部的新教选民将民主党人与外来移民等同视之。而新的、勇于进取的、主要由新教徒组成的西部各州,则成为有利于本土主义以及反对与北方农场主争夺土地的南方奴隶主的人口基地。

北方和南方的认同改变

如果说,人口和经济的变化为政治变化提供了一种结构性的基础,那么,这一变化也通过形成新的认同而促进了集体行动的出现。以自由人移居西部自由土地的计划为核心,反奴隶制的行动主义者与持非废奴主义立场的北方人汇集到了一起。

这个为即将到来的国家分裂做出了最大一份努力的政党,生动有力地将自己称为“自由土壤党”(Sewell 1976:ch.8)。“自由土壤”代表的是一代农场主和想要成为农场主的人们的愿望——这些人焦虑地注视着拥有奴隶的南方农场主们所表现出的竞争性的西进动力。无论他们如何看待奴隶——许多西部人鄙视奴隶——允许奴隶制进入西部各个新州,都将赋予南方人以北方人所失去的经济利益。“自由土壤党”便是对此做出直接反应的结果。 167

不过,“自由土壤”远不止是一种政党思想,它成了西部政治的主要构架,它把那些作为道德废奴主义者而进入政治的人,与那些主要关心的是西部的拓殖和创造一个非奴隶制社会的人们联系起来。前者所带来的是赋予 19 世纪中期的美国政治以天启式气息的道德热情,从后者那里则生出了将奴隶制农业排除在西部竞争之外的实际愿望。当政治废奴主义者、西部农场主以及东部的商人和新教徒之间的联系得以形成之际,他们的社会观与政治认同也得以拓展为这样一种信念,即坚持自由人在自由土地上雇佣自由劳动力的原则,而反对“非法的奴隶式的强制和劳动条件在北方出现”(Foner 1995:xxiii)。如同福纳所描述的:

政治性的反奴隶制运动不仅是一种消极的学说,是对南方奴隶制以及奠基于其上的社会所发动的一场攻击;它更是对北方的社会制度——一种有活力的、不断扩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其成就和命运几乎完全是它赋予普通劳动者以尊严和各种机遇所带来的结果——所具有的优越性的一种肯定。[Foner 1995:11]

反奴隶制运动赋予这一新的认同以道德的外衣。就像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流产问题一样,它不过是那种囊括了许许多多立场和观点的象征性问题而已。“我们反对奴隶制的扩张,”《纽约邮报》在 1857 年写道,

因为它贬抑劳动者,贬损人的个性,腐蚀、败坏年轻人……它妨碍集中定居并且由此而妨碍了建立任何一种普遍性的公众机构体系——无论是文学的还是宗教的机构——它造就了诸多不良情感,却并未提供任何惩治或者控制它们的手段,它还导致社会出现一种无法无天的状态。
[引自 Sewell 1976:293]

19 世纪 50 年代的冲突,造成南方出现一种认同改变的镜像过程。根据弗雷德里克森的说法,1830 年之前,“公开断言[黑人]永远低人一等的现象极其罕见”(Fredrickson 1971:321)。但是,当反奴隶制的支持者们大肆鼓吹自由劳动力的优点,以反对南方的“奴隶权力”时,南方人则形成了一种卑鄙的、唯利是图的和自以为是的北方人形象,他们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有关他们自己的文明是建立于家庭、宗教和对传统的尊重之上的南方人形象(Genovese 1969:第 2 部分,及 1992;Wyatt-Brown 1979)。如同弗雷德里克森不无讥讽地指出的:“对废奴主义者的攻击……迫使种族压迫的推行者们,要发展出一套与其行为相一致的学说来。”(Fredrickson 1971:321)

南方人被那些要求他们无偿放弃财产的道德说教所激怒。而诸如《汤姆叔叔的小屋》之类的小说,则在北方激起了更为愤怒的反应与辩驳,从而使“奴隶制问题在随后的几年里被置于读者大众的面前”(Sewell 1976:235)。当地区之间新闻舆论方面

的联系被切断后,北南双方都依靠的是对国会辩论的单方面报道、来自一些被迫从敌对环境中逃离的家庭所提供的可怕证言、有关边疆地区尤其是“血腥的堪萨斯”领地内发生在赞成奴隶制的移民和反奴隶制的移民之间日益增长的暴力对抗的传说,来作为各自的消息来源。

发生在堪萨斯的奴隶制与自由劳动、废奴主义者与赞成奴隶制的保安人员之间的争斗,蕴含着的是南北双方在认同方面的日趋两极化。一如迈克尔·费尔曼所描述的:

大多数来到堪萨斯的移民,是那些或许并未发展出强烈的亲奴隶制抑或反奴隶制情感的西部人……但普遍存在的先入之见,日常的相互摩擦,以及相互间的战争,使得模糊的感觉变成了尖锐对立的认同。[Fellman 1979:289]

居间联络和激进化

20世纪60年代的“新”政治史学家,把诸如“流血的堪萨斯”之类的奴隶制问题,看成是直到内战爆发前夕美国全国性政治中出现的局部焦点的一个例外。但“局部问题”反映出的却是重要的地区经济利益,这些经济利益与其说是和反奴隶制运动相对立的,不如说是与之相交的——它们使得跨地区联盟的形成成为可能(Weingast 1999)。对奴隶制的道德攻击并未导致国家统一的瓦解,致使统一瓦解的是政治性的反奴隶制运动与“自由土壤党”的会聚,以及新一代政治中间人在他们之间进行的居间联络活动;此外,还应该加上对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工人阶级移民入境所做的本土主义反应——它引发了所谓“无知”

(Know-Nothing)运动,并且为形成跨地区、跨问题的政治联合奠定了基础(Ransom 1989:135)。

本土主义和向西扩张对于政党制度的分裂性影响,在1854年的国会选举中已是显而易见。当时的情形是,“无知”运动的参加者和“自由土壤党”人一起,突然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尽管这两个党都未能赢得参议院的议席,但他们还是通过相互合作而在众议院获得了43个席位,由此而威胁到辉格党与民主党之间的选举平衡,并引发了一个激进化的周期。民主党人通过1856年的总统选举夺回了他们的损失(Ransom 1989:137),而本土主义、“自由土壤党”和反奴隶制运动则携手开启了美国第二政党体系瓦解的进程。

这并不仅仅是党派的重新组合:1856年的选举发生在经典的抗议周期内,在这一周期中,以前各不相同的一些冲突结合到了一起。斯蒂芬·道格拉斯(他对此负有责任)在当时写道,民主党的失败来自于

这样的一座坩锅,在其中盛满了的是废奴主义、缅因州的酒类立法主义与北方辉格主义的残留物,以及反天主教的新教感情和反对外国人的本土感情(引自 Ransom 1989:135)。

由此而来的结果是,美国政治体制中出现了区域性的、意识形态的和党派的极化,平衡规则的破坏,以及由极化而发展为对立的主权国家的情形。

林肯在1860年的大选中就体现出了这一新的联合及其明确表现出的形式。作为一位来自西部、充其量是不够热情的反奴隶制拥护者,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还是一个厌恶新事物者,林

肯在 1860 年发起的竞选运动,还是使得北方与西部以及本土主义者、自由土壤党人、辉格党人、北方的民主党人聚拢起来而形成了联合。南方人把林肯的当选理解为政党体系已被奴隶制的分裂性所压服,事情当然绝非如此简单,不过,由于他们将奴隶制扩大到西部的可能性受阻,以及总统职位与国会都被控制在一个无需南方选票的区域性的政党联盟之手,南方各州只得要么屈就于共和党的霸权,要么便从联邦中分离出去。于是,抗议周期并不是以对现行政策的革新而告终,一场原本已被控制在制度性惯例之中的政治冲突导致了一次革命的发生。

与妥协相对的会聚

虽然南方和北方仍都处于不统一的状态,但两者之间的距离却通过各自政治阵营内发生的激进化而被拉大。在南方,随着脱离联邦的日期临近,以及处于南方纵深地带的一些大奴隶州集结起其军事力量,他们便意识到地区统一的必要性,并为此而采取措施使那些犹豫不决的边境州加入到脱离联邦的行列中(Crofts 1989)。在北方和西部,共和党内一些激进的反奴隶制支持者们,则以类似于导致“萨姆纳的棒打”之类的演说,将他们的一些较为温和的同事推向与南方对抗的立场上。对此,福纳总结道:

170

当共和党内出现保守倾向时,一些激进的领导人便故意在国会发表一些煽动性的演说,这些演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力地将反奴隶制运动中的宗教和道德问题展示在人们的面前。[Foner 1995:111]

到 1858 年,美国政治中依地区而进行的重新整合已经完成,北方和西部形成了一个坚实的多数,而民主党却越来越成为一个地方性的政党(Poole and Rosenthal 1997:99)。

居间联络、认同改变、激进化以及会聚:这些绝非解释所有斗争事件的因果机制目录,而一些特定系列的机制,也并非在任何情境中都会以相同的方式结合。居间联络和认同改变在不同的条件下的结合,则可能会产生全然不同的结果。例如,当某些群体发生激进化时,另外一些群体却会聚在一个中心周围。这一点我们能够通过转向我们所涉及的第二个事件——西班牙向民主的过渡(西班牙的事件为我们展示的是:在一种社会政治制度被另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以和平的、日益上升的和非常文明的方式所取代时,这些机制是如何结合的)——来加以阐明。

一场从未发生的内战:西班牙向民主的过渡

如果说,有某个国家似乎已处于爆发内战的危险境地的话,那么,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最后几年的西班牙便是如此。布兰科在 1973 年的遭暗杀,不仅毁掉了旧制度的一根支柱,而且引发了极化的稳定增长,这种极化形势使人回想起 20 世纪 30 年代毁灭性的国内冲突,许多人担心这一冲突会再次在西班牙爆发(Fernández 1995)。据斯坦利·佩恩估计,在那场内战中,双方有超过 10 万人被处死或遭谋杀(Payne 1987:219)。佩雷斯·迪亚斯则提醒我们,在共和国控制的地区内,有近乎 7000 名教士在共和国建立的头几个月里被谋杀(Pérez Díaz 1993:129)。这场有如美国内战中州与州之间的战争一样的大灾难,一点一滴都烙在西班牙人的政治记忆中。

从这场战争中产生的佛朗哥政权,无情地镇压共和国的支

持者们。到 1939 年,战后被监禁的人数已增加到 27 万人 (Pérez Díaz 1993:223)。尽管很少有纳粹式的大规模处决,但国家主义当局还是系统地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展开对共和国的同情者、工联主义者以及那些犯有“严重消极”(“grave passivity”)罪者的逮捕行动 (Maravall 1979:67)。国家教会则通过举行“游行、列队行进、盛装入场式、向圣心和圣母献祭、公开声明天主教信仰和服从教皇”(Pérez Díaz 1993:131),而致力于推行一项道德纯洁政策。主张地方自治者纷纷逃避,官方禁止此类要求的提出,而他们的文化表达则被迫采取了民歌、流行歌曲和舞蹈的形式 (Buxo i Rey 1995:126; Johnston 1991:ch. 4; Pérez-Agote 1987:3—10)。

镇压行动并未随社会秩序的正常化而结束 (Linz 1973:181)。迟至反对派行动处于最低潮的 1958—1961 年间,欧洲大赦委员会还报道说,大约有 600 人以政治犯的罪名被判刑入狱 (Maravall 1979:73)。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早期出现的劳资冲突,则引发了新一轮的逮捕工会分子和普通工人的高潮 (Maravall 1979:73)。而在进入 70 年代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警察和民事卫队对于工人的抗议行动也仍然是报以逮捕和毒打。

不过,西班牙还是通过一个主要是和平的自由化进程——一些人称之为“协定性的变革”——实现了从独裁主义政权向民主的君主政体的转变。根据大部分专家学者的说法,迄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这个国家已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它的民主体制 (Linz and Montero 1999; Linz and Stepan 1996:108; Morlino 1998:19)。这些作者们把这场过渡当成主要是由精英与旧制度的联合而产生的结果,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以极端主义者的暴力行动和劳工们日益增长的战斗性为标志的极化过程(但

是参见 Maravall 1979;Reinares 1987:127)。

存在着大量有关精英会聚的论述。在布兰科遭暗杀后采取的镇压性措施失败后,西班牙向民主过渡的最关键人物是后佛朗哥时期的第一位首相阿道夫·苏亚雷斯(Adolfo Suárez),是他“用独裁主义制度之砖”建立起一个民主体制(Linz and Stepan 1996:93—96;Preston 1986:ch. 5)。正是苏亚雷斯,使得佛朗哥政权的温和分子与一些反对党以及工会之间达成了一些协议,使西班牙“成为现代精英解决办法的样板”(Gunther 1992),并且发起了一个地方自治化的过程(Pérez Díaz 1990:198—201)。

172 西班牙的经历在一些从事民主化研究的学人们中间,引起了反对早先激起争论的结构性模式的有益反应。那些担心两次战争之间的冲突重演的人们,从和平过渡中得到宽慰并且从中得出了这样的经验教训:“协议式的”、精英领导的过渡,能够为其他地方向民主化成功转变建构出一种模式(di Palma 1990; Gunther 1992;Karl 1990;但参见 Linz and Stepan 1996:56)。不过(像新制度主义学者对美国内战的叙述以及在面对巴斯克地区的暴力反叛时),这些叙述对于斗争政治或者除精英谈判之外的过渡机制,令人惊讶地少有谈及。

斗争的制度性控制

有关西班牙向民主过渡的故事,有如下一些主要的组成因素:一些“从独裁政权中退出的”精英小团体,在一个日益被消蚀的独裁政权——它无法阻止已经开始了的自由化趋势——中,利用了一个自由化的过程;通过将温和分子越来越多地包括在一些协议和协定中,这些群体架设起与反对派沟通的桥梁,使这些反对派确信他们能够经受玩民主游戏的风险;他们之参与这

一过程,以及他们所愿意做出的让步,反过来又使一些反动的精英们——有名的“地堡”(“bunker”)——确信:他们也根本无需因赞成旧制度的自由化而担心。^①

故事还在继续。当旧政权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团体看出参与宪法性谈判有利于自身利益,并且使他们的追随者确信要支持这一行动以减少损失时,自由化的过程就会像滚雪球似的一旦开始便不断向前发展。从1976年7月(苏亚雷斯政府成立时)的制宪前谈判到1977年6月(举行第一次大选时)这段时期,是这一过程之最为关键的阶段,这一阶段所起的作用则是在以前处于分裂状态的精英之间建立信任和减少不确定性(Linz and Stepan 1996:91—98;Pérez Díaz 1993:218—225)。

制定协议的做法延伸到政治改革的范围之外。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蒙克洛阿(Moncloa)协定允诺政府将实施对各种政府机构与经济生活的连续性改革计划。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之参与此一过程,使得资方对受其影响的工人们会避免采取过激的罢工活动和提出极端要求深信不疑。故事至少因此而继续得以展开。军事干预因苏亚雷斯对一些关键问题事先做了细致的安排,以及由于没有任何重要的政治派别主动敦促军队进行干预, 173 而得以避免(Gunther 1992:66)。这一过程建立起有组织的工商业团体(CEOE)的权威,并且,以牺牲一些更为激进也更小的工会为代价(Pérez Díaz 1990:225),而增强了两个主要的工会同盟[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委员会”(CC.OO)和社会主义者领导的

^① 当然,不同的作者所讲述的故事存在着一些变化。在朱塞佩·迪·帕尔马(Giuseppe di Palma)和唐纳德·谢尔(Donald Share)强调精英们的作为,以及奥唐奈和施密特强调佛朗哥政权内部的自由化的同时,马维尔(Maravall)和普雷斯顿(Preston)强调的则是既在西班牙社会中又在佛朗哥政权内部精英们当中所发生的斗争,这些斗争使得1976—1979年之间的一些协议成为可能。

“工人工会总会”(UGT)]的实力。该过程以开启此一过程的政治家苏亚雷斯及其所属政党“民主中心联盟”(UCD)在其任期届满并被温和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PSOE)所取代后主动退出而达到顶点。这一政府更替导致了政府与反对党之间的早期的和平变更,并由此而导致了民主的巩固(Linz and Montero 1999:21—31)。

像出现在美国参议院里的平衡规则一样,这些由即将离任的西班牙精英们及其反对派竞争者们所制定的协议和做出的制度性妥协,是以每个行动者在最佳政策结果方面做出让步,来换取一系列使各方均能够追求其目标的制度性安排(Przeworski 1986)。不过,正如平衡规则有赖于政党体系的相互合作,以及将斗争控制在美国社会内部一样,撇开旧政权的本质和西班牙社会内部的斗争政治,便很难对这些奠定了西班牙向民主过渡之基础的协议加以理解了。

一个独裁主义政权

这个政权究属何种政权?随着西班牙共和国的失败与反动势力在欧洲的胜利,西班牙的新统治者们首先袭用了法西斯极权主义的许多外部标志:一排排身着蓝衫列队行进以示对独裁者支持的好战分子们,一个为将国家的优先权转交给精选出来的资本家和工人代表而设计出的社团主义组织,一个被设计成代表“合理的”意见的“民族运动”,一个没有立法创制权也无权对立法施加影响的橡皮图章式的“议会”(Cortes),对西班牙共和国曾经许诺给难以驾驭的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地方自治加以压制,充斥着军人的统治集团与其成员主要来自于上层阶级的高级文官机构,一个不仅整肃道德秩序而且充当独裁政

权堡垒的国家教会 (Maravall 1979: 4—6; Payne 1987: 517 及 ch. 12; Pérez Díaz 1990: ch. 3)。

但是,佛朗哥是那种太过精明也太过谨慎的领袖,以至于不曾完全采用他的欧洲法西斯盟友们所竭力敦促采取的单一政党模式。当战争出现不利于轴心国集团的趋势时,他便让他手下的长枪党分子与他的法西斯盟友们保持一定距离,通过精心安 174 排的骗局组成内阁,并且通过由一批忠于独裁者个人的人所领导的一系列软弱无力的机构来进行统治。这个政权的特征完全可以被称作是“独裁主义的”,只不过它同时也具备了有限的多元主义,它是心态保守的而不是有着严格意识形态的,它培植的是冷漠而不是动员,它甚至还有一个毫无实权的大众政党 (Linz 1970; Linz and Stepan 1996: ch. 3)。

孤立于西方世界的文化和政治趋势之外是维持国家控制的一项重要武器。佛朗哥分子们确信,西班牙几乎独力地承担着对抗世界范围的共济会—共产主义阴谋的任务,他们因此而努力使西班牙置身于那些表达不同政见的趋向抑或是现代化的潮流之外。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成功可以通过直至过渡时期的一些年里,西班牙仍然表现出低水平的日常犯罪率和很高程度的宗教性而得以衡量。迟至 20 世纪 60 年代末,宣称自己是“(信仰)热烈的”或者是“厉行(信仰)的”天主教徒的人数仍然占到了西班牙人口的 77% (Fundación FQESSA 1970: 448; Montero 1997)。

经济上的统制是独裁政权用以使西班牙免于西方腐蚀性潮流影响的第二种机制 (Maravall 1979: 66—69)。不过,一如在法西斯意大利所发生的那样,经济统制具有与意愿相背的效果:它鼓励了一种缺乏竞争力的私人部门和一个受保护的、充斥着亲信的财政体系;在一个敌视集体主义的体制内造就出一个大型

的受保护的公众部门。低工资和垂直形成的企业联合,使工人们几乎没有任何自治可言,不过他们也因此很难被解雇;而一种非正式的集体讨价还价形式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期间获准出现,则是为了排除劳资冲突的可能。

第三种资源则是西班牙使自身远离国际政治中的冲突与联合的能力。我们能够记起发生在格尔尼卡的一些恐怖事件以及西班牙内战中外国共产党人和法西斯主义者的人侵,但我们很容易忘记的是,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不同,佛朗哥使西班牙避免了为希特勒的战争而分担代价。随着冷战的开始,美国成为西班牙在国际上的主要保护人,为佛朗哥政权提供了关键的合法化保证,并使得独裁统治得以维持比它本来可能维系的更长的生存周期。^①

结构变化

随着欧洲经济奇迹的出现,西班牙的经济也开始从邻国经济的扩张中受益——其中,从旅游中得到的收益尤为突出。不过,日益明显的是,倘若西班牙仍然保持神圣的孤立,那么,它的经济便会窒息而亡。工业和旅游业受惠于大量的补贴,工人们则被鼓励移居其他国家,在那儿,他们不仅成了外汇的来源,并且也因此而暴露于颠覆性观念的影响之下(Malefakis 1982: 219)。1964 至 1973 年间,经济以巨大的比率——每年 7.3%——增长,与此同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从 1960 年的不

^① 在一次私下交流中,戴维·格林伍德(Davydd Greenwood)指出,“据我们所知,1949 年时,佛朗哥已即将垮台,当时的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告诉杜鲁门,可以用很小的代价得到西班牙。于是便有了 1949 年之后的‘伪马歇尔计划’和美国在西班牙的一些基地。从那时起,美国便成了佛朗哥的最大主顾之一。”

足 300 美元上升到 1970 年的 3260 美元 (Gunther, Sani, and Shabad 1986:24)。到 20 世纪 60 年代,西班牙已由“胜利的专政”变成了“一种发展的专政”(Carr 1980:165),这场经济繁荣直到石油危机冲击后的 1974 年和 1975 年才开始衰退。

人口流动是结构变化最为生动的标志 (Maravall 1979:25)。1961 年至 1968 年间,有超过 290 万人改变了居住地点,而从 1950 年到 1970 年的二十年间,农业人口则由占总人口的 42% 下降到只占 25% (Maravall 1995:71)。伴随着这种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动的,是传统形式的大地产的衰落,以及西班牙一度激进的农业无产阶级的消失 (Linz and Montero 1999:82; Malefakis 1970)。其结果是,工业劳动力的增加和服务部门的急剧增长以及实际收入的上升,人均收入在 1960 年至 1975 年间实际增加两倍。

然而,在这个国家所存在的顽固的社团主义制度与这种经济急剧增长的新势头之间,许多矛盾也应运而生。缺少一个现代的财政体系、社会政策的不稳定、对邻国经济繁荣的依赖以及低工资工人的大量存在,与独裁政权对社会动荡和不稳定的担心结合起来,妨碍着西班牙对于它所具有的新的经济地位的适应。其中的一个指标便是收入方面存在的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迄至 1970 年,一批美国政治学家们写道:

就收入而言,占西班牙人口 1.23% 的最上层,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据的份额 (22.39%),比占总人口 52.2% 的社会底层所占的份额 (他们仅拥有国民收入的 21.62%) 还要大。 [Gunther, Sani, and Shabad 1986:26]

正当佛朗哥的控制有所减退,一次新的斗争政治浪潮也正在酝

酿之际,一场经济危机在 1973 年席卷了整个西方,等待西班牙 176 的将是尤为沉重的打击。

独裁政权中的斗争政治

历时三十多年的佛朗哥统治和战后一些年的经济增长,已经抹去了内战所留下的冲突遗产吗?佛朗哥退出舞台后,西班牙的传统政治裂缝又会发生些什么呢?1967年,西班牙最具权威的翻译人士胡安·林茨提出,在佛朗哥之后的选举中,共产党和左翼社会主义者也许会赢得 41% 的选票,而右翼只会取得 14% 的选票。林茨并且希望,一个按照意大利方式形成的基督教民主党,会填补这两者所留下的空白(Linz 1967:267)。

60 年代结束时,劳资冲突在西欧的重启,也为西班牙的集体行动提供了现成的模式(Crouch and Pizzorno 1978),所不同的是,在西班牙,由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的工人委员会是一些工厂里的主要组织者。自 60 年代中期起,西班牙工人阶级的罢工行动,一直维持在一种“与广义的西欧模式相当适合的水平上,即便这种形式的劳资冲突[在西班牙]是不合法的”。罢工所导致的工作时间损失,从 1966 年的 150 万小时上升到 1970 年的 870 万小时(Fishman 1990:88)。不只是经济抗议而已,到 1965 年,一种新形式的集体行动“地区性总罢工”发展起来了,它结合着经济和政治要求并且展示了工人们具有很高的政治动员而不只是职业动员的能力(Maravall 1979:ch. 2)。

尽管工人们采取的策略是温和的(Durán Muñoz 1997),也是自我克制的(Pérez Díaz 1993:ch. 5),但这场工业冲突大潮还是向政治反对派发出了这样的信号:存在着一个向民主化转变的大众基础。斗争在工业地区中扩散,并且,它还通过团结罢工

数量的增长——此类罢工从 60 年代中期占全部罢工的 4% 增加到 1967 年之后的 45% 以上——展示出工人阶级的统一。70 年代早期,尤其是在一些老工业地区(从事采矿业的阿斯图里亚斯,从事金属工业的巴斯克地区,以及加泰罗尼亚和马德里),甚至还包括一些新兴工业地区在内,团结罢工已变得越来越常见。在巴斯克地区,这类罢工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就在 1974 年的一次冲突期间,有 80% 的当地活跃人口参加到一场地区性的总罢工当中(Maravall 1979:37)。

在巴斯克还有加泰罗尼亚地区,西班牙政府则面临着那种形式更猛烈的抵抗。毕竟,它们都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地区,而佛朗哥的文化政策压制了这些地区的地方主义志趣。分离主义运动在这两个地区逐渐兴起,这些运动把经济要求与对马德里政权的中央集权政策的憎恨结合起来。正是从这两个地区,发展出了使用暴力的和具有重要象征性意义的抵抗,自 1960 年至佛朗哥去世的当年,“埃塔”(秘密的巴斯克恐怖主义运动)造成了 43 人死亡(Linz and Stepan 1996:99),并且明确表示出一种暴力文化(Pérez-Agote 1987:ch. 1)。佛朗哥死后,暴力活动加剧,1978 年的死亡人数上升至 67 人,这一年也是新宪法通过之年;1979 年是举行第二次大选以及巴斯克自治条例通过之年,当年的死亡人数则达到 76 人(Reinares 1987:127)。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则更为平和,但这个西班牙最具“欧洲”性的地区,却造就了一种微妙且具有重要象征性意义的抵抗形式(Buxo i Rey 1995:95;Johnston 1991;Pérez-Agote 1990:194—197)。

反对派的形成已远远超出工厂和两个少数民族地区之外,仿效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天主教教士们,尤其是下层神职人员,日益使他们自己卷入到民主运动之中。随着西班牙主教会议对官方的工人联合组织的谴责及其提出工会合法化的要求,

教士反对派(及其与其他部门的反对派的会聚)率先成为明显可见的反对力量(Preston 1986:16);教士阶层的新态度则鼓励了与“天主教青年工人”(JOC)联系在一起的年轻教士以及工人教士们——他们中的许多人与流动工人们一起生活在大城市的外围——的激进化(Preston 1986:18—19)。一种新的宗教行动主义——它蔑视西班牙教会的“国家天主教”并且渴望一种“真实性的道德”——在独裁政权的一旁发展起来(Pérez Díaz 1990:157—161)。

与此同时,在一些大学里,成长于经济发展年代、受国外学术研究的挑战以及为新闻控制放松所激励的新一代大学生们,正在制造出一些非法的左翼团体、持久性的集会以及群众示威。迄至60年代末,像在罗马和巴黎一样,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一些大学里,很容易地就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书册(Payne 1987:519)。“这些大学渐渐成为西班牙社会内部的一个亚文化区,”马拉韦尔写道,“而且,在这些飞地中,主导的观念是学生运动的观念。”(1979:117)

存在于一个不断扩展的社会中的街区,是日益增长的动员的另一个来源。1964年,政府颁布“结社法”(Ley de Asociaciones),将一些由父母亲、邻里、消费者组成的协会以及其他一些团体合法化(Bier 1980:27—32)。民众组织得以在这种半官方的框架之外逐渐兴起,由此而导致出现了一些受市政当局支持的竞争性的且常常是半官方的组织(Blyth 1999:9)。迄至70年代早期,围绕着从警察施暴和房地产行业的高价,直到圣诞节的照明不足与绿色空间的匮乏这样一些问题,街区团体得以在整个西班牙组织起来(Blyth 1999:10)。到1974年,官方的和半官方的团体开始以城市为基础协调它们的行动努力,将它们的要求从严格意义上的街区问题,扩展到针对“腐败和不民主的当

地官员以及缺少投资”问题,它们甚至还提出了改变当地政治等级的要求(Bier 1980:40—44;Blyth 1999:10—11)。

一个独裁主义的政权又是如何能够维持对一个社会——它正在从经济上、伦理上和思想上开展动员,并且正在从事从工厂到少数民族地区再到城市中的街区方面的组织行动——的全盘控制呢?在60年代中期,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以从经济的发展以及将所谓的“专家治国论”分子吸纳进统治圈内——这造成了对诸如“长枪党人”之类传统支持者们的伤害——的做法中找到。有点难以捉摸的世俗天主教团体,“天主事工会”(Opus Dei,拉丁文,意为“神的工作”。——译者),就把它在西班牙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的上升归于这一由独裁政权所提供的“缝隙”;新闻检查的放松和一大批恢复出版的新杂志的出现,也同样如此(Maxwell 1983)。然而,当罢工激增以及“埃塔”的暴力活动加剧时,加强镇压便成了政府做出的选择。

“精英过渡学派”的支持者们有时忘掉了过渡之前的严厉镇压氛围。到1973年,被“公共秩序法庭”判为有罪的案件比60年代早期增长了250%(Maravell 1979:41;Payne 1987:502)。出于对巴斯克地区不断上升的恐怖主义的担心,政府以暂时停职、解雇和逮捕的办法而做出回击(Maravell 1979:41)。继布兰科遇刺身亡而来的一波逮捕行动之后,出现了斗争政治的一个低点。卡雷罗(Carrero)的继任者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不是通过重新集结政府各个部门以扩大政府统治的基础,而是任命了一个“主要由属于独裁政权官僚核心的一些残余分子组成”的内阁,从而既把军事上的技术统治论者也把属于“天主事工会”的技术统治论者——这些人在改革时期已经进入政府——排除在外(Payne 1987:592—593)。从1973年到1975年底,超过6300名巴斯克人遭到逮捕(Payne 1987:601)。

镇压与斗争的扩散

179 尽管镇压措施是由巴斯克恐怖主义引起的,但镇压却不仅产生了使政府与巴斯克地区疏离的影响,而且产生了使它与劳工、教会、政治反对派、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及原本更愿意以经济的方式来解决工业纠纷的一些重要工业家们相互疏离的影响。它还使西班牙与欧洲相互隔绝,将西班牙孤立于其商业精英们希望加入其中的新出现的欧共体之外(Marks 1993)。1970年举行的针对巴斯克民族主义者的布戈尔斯审判,引起了整个欧洲的巴斯克民族主义运动同情者们的关注(Reinares 1987: 123)。

镇压并未能够使斗争得以遏制。不仅“埃塔”的恐怖主义行动在整个1974年和1975年继续展开(Pérez Díaz 1990:200),而且,到1975年,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也已上升到1450万天。1976年(政治谈判最关键的一年),罢工日更是上升到1500万个工作日。60年代的大部分罢工行动是因经济要求而起,此时的罢工中日益增多的部分则是由政治性的要求而起(Maravell 1979:33—37)。政治斗争还发展到了工厂以外,仅《祖国报》(*El País*)在1976年5月4日到1978年底的这段时间里,就报道了大约800起的集体行动。也就在有关过渡协议的谈判正在进行之际,西班牙人纷纷拥上了街头。1974年,一小部分诸如“反法西斯爱国革命阵线”(FRAP)和“蒙哥马利改善协会”(MIL)之类的左翼团体,也开始成为人所共知的组织。一度分裂为军事派与政治—军事派的“埃塔”,则彻底实现了两派的分离并被置于武装好战分子们的控制之下(Reinares 1987:124—125)。一些右翼团体、工会、街区协会、学生以及一些“另类”

(alternative)群体,全都加入到冲突之中。^①

镇压本身也引起了针对它的斗争浪潮。甚至还在弗朗哥去世之前,数以千计的西班牙人就举行示威,要求“给予弗朗哥专政时期的所有政治犯以特赦,在许多情况下与这一要求相伴的则是大赦劳工的要求”(Aguilar Fernández 1997:89)。赞同大赦的集体行动与对内战的集体回忆密切相连,并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萦绕在集体行动者们心头的……使当局确信这些行动将会是和平性的行动的念头”之所以产生的原因(Aguilar Fernández 1997:89)。这一波示威行动显示了大众抗议与精英政治相互交织的错综复杂的方式。如同南希·伯密欧所总结的:

精英协议当然是西班牙民主化的关键,但这些协议却是在一种极端主义和温和方式同时存在的形势下达成的。
[Bermeo 1997:309][181]

180

不仅极端主义和温和做法同时发生,而且精英和非精英的斗争彼此关联——按佩雷斯·迪亚斯的说法叫做“填隙式选择”(“interstitial choices”)(Pérez Díaz 1990:6)。如果说西班牙的精英和反精英分子是通过在会议室里进行慎重的谈判过程而达成了过渡的话,那么,它部分地也应归因于在街头、工厂以及少数民族地区所发生的逾越界限的斗争所造成的压力。

^① 更为复杂的巴斯克民族主义运动——它是如此经常地变成“埃塔”的武装攻击行动——也从工人阶级和持不同政见的天主教徒中汲取力量。三本有关这方面的重要论著分别是:阿苏尔门迪的著作(Azurmendí 1998),帕拉卢纳和佩雷斯—阿格特的著作(Parraluna and Pérez-Agote 1982),以及佩雷斯—阿格特的著作(1987)。

认同改变

那么,过渡政治为什么会如此节制呢?部分的原因在于国家所拥有的连续不断的强制力,它通过一直到过渡时期以及在过渡期间都存在着的对持不同意见者连续不断的镇压而显现出来(Durán Muñoz 1997:ch. 5—6)。部分地则应归于反对派抑制动员以免为军队采取先发制人的政变行动提供借口的决心(Fernández 1997)。第三个因素则涉及到示威者自身的温和目标以及他们对民主的真诚拥护(Fishman 1990;Pérez Díaz 1990:ch. 5)。然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答案,这一答案只有通过我们对旧政权行将完结之前发生在西班牙社会内部的一些深远变化的理解,才能被我们领悟到。从一个立于欧洲外缘并且视欧洲为“国外”的国家这一角度上说,西班牙的精英以及整个国家都经历了一场思想和行为上的范式转换。这一“欧洲参照,以及欧洲认同在西班牙的建构,一直是整个过程中起作用的最为关键的机制之一”(Pérez Díaz 1990:5)。

来看一看宗教:受 20 世纪 60 年代发生在梵蒂冈的一些变化的鼓舞,天主教会的一些领导人经历了一个从内部进行改革的过程。但改革是由对一个开始朝世俗方向演进的社会做出回应的更为年轻一代的教士和虔诚的平信徒们领导的。迄至 60 年代末,教士作为一种职业已经变得不太受人欢迎而社会上去教堂的人数也已经减少(Fund. FOESSA 1970:470;Pérez Díaz 1990:165)。尽管西班牙的大多数人仍然宣称他们奉行天主教仪式,但在城市以及在一大批更为年轻的社会成员中,做礼拜的人数却急剧地下降了(Fund. FOESSA 1970:442—444;Linz and Montero 1999:88—90)。

由于宗教狂热的减退,西班牙在世俗教育和文化方面对欧洲的开放得以扩大,在校大学生人数从1961年的7.6万人上升到十年后的22.9万人(Maravall 1995:71),而且有许多人留学国外。到佛朗哥去世时,大学已经发展出一种政治上持不同意 181 见的文化,并且在佛朗哥去世前五至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于持续的动荡状态。此外,随着1966年颁布的新闻法中新闻审查制度的放松(Payne 1987:511),西班牙人能够更多地了解到有关世界和他们自己的国度里正在发生的事情。象征着这一点的是一些新出现的媒体,其中,最为引人注目地是《祖国报》的出现,该报极力仿效《世界报》(*Le Monde*),并且成为西班牙欧洲化的象征(Edles 1998:46;另见Maxwell 1983)。

西班牙不仅正在变得更像欧洲,而且,西班牙人也正在日益认同于欧洲。这一点通过反对佛朗哥的行动而最先体现出来。“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PSOE)在其遭放逐期间,即曾为支持西班牙加入欧洲进行了有力的争辩(Marks 1993:3—4)。西班牙工商界的情形也是如此,他们把他们自身迅速落后于其竞争者的原因归之于西班牙未能进入欧洲市场和未能接近欧洲的技术。这在60年代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了,当时,德米格尔和林茨即已在他们所做的研究中表明,西班牙的企业管理人员抵制家长式作风而乐于接受工业关系的现代模式(据 de Miguel 1976)。

与西班牙共和国时期尖锐对立的左—右认同形成对照的是,西班牙的中产阶级在经历向民主过渡的过程中,已然建构出一种新的政治认同。这一点,可以从冈萨雷斯所领导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温和派战胜其竞争对手中,从苏亚雷斯所领导的毫不知名的政党在后佛朗哥时代的第一次选举中的惊人胜利中,从共产主义在这次选举中所表现出的软弱无力中,以及从

各基督教民主党的失败中看出来。虽然这些基督教民主政党在西班牙都有着较长的历史,但它们所保有的整体主义(integralism)痕迹既令西班牙的世俗民众感到厌恶,教会的上层阶级又拒绝给予它们以支持(Edles 1998:68—69)。

过渡时期不仅出现了认同欧洲的取向,也存在着自治主义认同的具体化及其扩大。将地方自治纳入到新宪法中,决不是高高在上的精英们所做出的让步,事实上,在加泰罗尼亚,苏亚雷斯“避免与一些政治党派达成协议,而是和何塞普·塔拉德里亚斯(Josep Tarradellas)[加泰罗尼亚历史上一位著名领袖]达成了一项有关恢复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协定”(Pérez Díaz 1993:199)。通过将自治原则突出地纳入到宪法当中,苏亚雷斯对一些地方(自治)运动做出了回应,在这些地方,“各种制度的民主化演进正缓慢地为早期形式的自治论主张的出现提供可能”(Buxo i Rey 1995:127)。

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也是工人阶级和天主教徒反对佛朗哥主义的主要地区。例如,在加泰罗尼亚地区,通过与“许多积极参与工人运动的加泰罗尼亚工人”接触,以及通过与进步的天主教——它把自己变得更加为中产阶级所接受——之间存在着的关系,民族主义运动得以在70年代转变为“一个合法的反佛朗哥统治的反对派”(Johnston 1991:123—124)。争取“自治”的运动是发生在西班牙社会的一场更为普遍的认同改变的一部分——它是通过斗争政治而被建构起来的。甚至像安达卢西亚这样一些以往对地方民族主义几乎一无所知的地区,也开始因政府采取的地方化策略而蠢蠢欲动(Pérez Díaz 1990:200—202)。

居间联络

如同内战前发生在美国的人口运动一样,世俗化和经济现代化只是为潜在变化划出界限的结构过程,而认同改变不过显示出可以在其中采取行动的一些框架。像内战前美国反奴隶制联盟的形成一样,这些参数也必须转换成起作用的协定,以使西班牙能够超越那个已经统治了这个国家四十年的体制。

西班牙向民主过渡所采取的精英谈判模式,抓住了这一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可以在过渡进行之际被观察到。居间联络既发生在反对派内部,像它们的领导人先就“民主主义共同纲领”(Plataforma de Convergencia Democrática)进行谈判,随后又就“民主协作”(Coordinación Democrática)进行谈判时所做的那样;它后来也发生在反对派和旧政权内部的温和势力之间。但各类精英却不仅从以上这些谈判中选择用于修改宪法的方案,还代表他们所代表的或者宣称代表着的群体通过居间联络促成协议的形成。

的确,反对派领导人与旧政权的代表们达成妥协,为的是以制止“过激的罢工活动”来作为对政治改革的承诺的回报(1992:55)。不过,要不是因为拥有已被高度动员起来的工人阶级——其基层车间的好战分子们由于大多已接受了民主化的目标而变得“自我约束”——的支持,这些政治安排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了(Pérez Díaz 1990:222)。冈瑟正确地指出,蒙克洛阿协议最主要的收获是精英阶层的整合得以增强以及共产党得以合法化,不过,一些左翼政党之所以能够通过斡旋达成这一协议,也恰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尾随其后的工人阶级威胁的存在。

183

居间联络也在有组织的天主教徒中发生作用,在第二次梵

蒂冈公会议以及拒斥国家教会的一代天主教行动主义者得到发展之后,新一代的领导人进入了西班牙教会握有实权的各个层级。他们之中有所谓“沉默者小组”(Tácito group),“这个由天主教文职人员和专职工作人员组成的群体……最终成为领导人的摇篮以及为民主过渡提供政治方案的实验室”(Pérez Díaz 1993:169)。在1975年至1978年间,教会“在平息保守的右翼势力对于新的民主体制的敌意方面,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Pérez Díaz 1990:171)。

居间联络同样也在最高层之外展开。60年代的西班牙拥有许许多多将反对派团体相互联系起来地点。“工人委员会”利用工业关系中发生的一些变化,使来自不同工厂和不同部门的工人们彼此建立联系;一些青年教士则为反政府的行动主义者提供碰头和开展组织活动的避难所。到70年代早期,教士们甚至为示威支持巴斯克民族主义的其他一些神职人员、学生和工人,提供避难之处(Payne 1987:499;562—563)。

居间联络最为重要的地点也是通常为精英谈判模式所忽视的地点:它存在于两个主要的反对派政党之间。带着内战时期恶意的内部倾轧与背叛的历史回忆,彼此视若仇敌的两个政党:西班牙共产党(PCE)和社会党终于在70年代初签订了一系列协议,这些协议使得他们有可能在与政府进行的谈判开始之际,以联合阵线的形式出现在谈判桌前。当然,如若不是因为来自于双方基层党员中的温和观点的支撑,要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可能的;不过,这倒不啻告诉我们:认同转变和居间联络机制之间的相互密切配合,产生出了一个相对统一的反对派,而这一反对派所面对的则是一个持强硬路线的“地堡”与自由化支持者之间充满裂痕的政权联合。

会聚和激进化

在内战前的美国,当南北双方彼此距离越拉越远时,在各自内部都出现了一种极化现象。在西班牙,极端势力的激进化则使得温和的政府与反对派团体走到一起。会聚的产生是由于一些策略上的原因:反对派领导人牢牢记住的是内战所留下的创伤——以及哪一方最终赢得了内战;由于担心强硬的“地堡”们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他们极力寻求与政府中的温和势力达成协定。

184

但会聚也是由西班牙社会所发生的深层的、长期的变化所致。不妨拿教权主义和右翼选民与反教权主义和左翼支持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例子来看。在西班牙的历史上,教士问题曾经毒化了左右两翼之间的关系(Cruz 1997)。站在左翼一边实际便意味着持反教权主义的立场,而支持天主教价值具有世俗统治权则是保守主义的要素之一。像在所有天主教国家出现的情形一样,在西班牙,宗教虔信的程度在左右翼之间也存在差别(Linz and Montero 1999:88)。不过,到90年代,如J. R. 蒙特罗在他的著作中所表明的,左右翼意识形态与宗教虔敬程度之间的关联急剧地缩小了(Montero 1997: Table 6)。

然而,与会聚相对应的是,激进化也在左右两翼极端派那里出现。一方面,当过渡取得进展之际,站在政府一边的一些右翼团体反对政府所采取的允许斗争行动出现的“许可”政策;在其1976年所做的研究中,阿德尔·阿希莱斯(Adell Argilés)用数据表明,在马德里的抗议行动中,有10%的示威行动和24%的示

威参加者属于极端的右翼团体。^① 一些像“新活力”(Fuerza Nueva)和 Guerrilleros de Cristo Re 这样的团体开始出现在政府的右翼一侧。

而在另一方面,右翼的动员则是由巴斯克地区暴力行动的增加所引起并与之同时发生的。1975年4月,一项紧急状态法被宣布适用于巴斯克地区。8月,一项反恐怖主义法令也得以正式通过。当年9月,5名属于埃塔组织和反法西斯爱国革命阵线的好战分子被处死。1977年1月,有10人在马德里的黑色星期里丧生;5月,又有6人在巴斯克地区新一轮暴力活动中被杀。1978年(宪法获得批准之年),因极端派暴力活动而致死的人数上升到65人(Linz and Stepan 1996:99)。1981年,一场由部分军界人士发动的右翼政变——因埃塔的暴行以及政府无法遏制其暴行而引发——则威胁到民主政权本身的存续。

不过,发生在西班牙的激进化却有着与内战前美国的激进化正好相反的效果——它产生的是那种“激进一翼效应”,亦即:使极端派得以被孤立,迫使左翼的一些联盟与政党制定出和平的方案,并且增强了反对派政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尽管支持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独立的呼声在过渡开始之初有所
185 上升,但当“埃塔”恐怖主义行动增加,以及一项公民投票为西班牙自治条例的通过造就了民众基础时,它便急剧地下降了(Linz and Stepan 1996: 103—5; Pérez Díaz 1990: 198—204)。在埃塔恐怖主义分子与警察之间发生的每一轮武装冲突,都在民众中引起了更大的反感,并有助于产生出围绕政治光谱中心的会聚。

^① 阿德尔·阿希莱斯欣然为我们提供了出自他本人原创性研究的有关马德里极端右翼抗议的这些数据。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结构变化造就了一个资本主义的、世俗的和注重实效的社会的基础；认同改变则使得西班牙告别过去而面向欧洲；居间联络则造成了反对派内部及其与政府支持者当中的温和一派之间的联系；而激进化只是孤立了极端势力而没有导致社会发生分裂。就这样，原本有可能成为一场革命性震荡的事态，却表现得有如交织着精英活动的抗议周期。

19 世纪的美国与 20 世纪的西班牙

这两个事件在结果方面存在着一些出人意料之处。尽管 19 世纪 50 年代美国的政治冲突发生在一个经由制度化的政治而体现出的正式民主体制中，但是，这一针对自由土地和奴隶制问题的政治冲突，却与出现在美国社会根基部分的认同改变和裂隙扩大过程连接起来，产生出真正逾越界限的政治和一场民族性的灾难。西班牙的过渡尽管有劳工的、种族的、宗教的和市民的斗争浪潮同时卷入其中，它所呈现出的结果却是通过谈判而达成最少制度性分裂的协议形式。一面是美国的暴力悲剧，一面则是西班牙的和平过渡：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按传统说法是不可比的——情境。然而，对这两起斗争内部诸机制所给予的一致的比较研究式的关注，还是对理解这两起斗争事件的结果以及减少使表面上形式不同的斗争分析彼此隔绝的状况颇有助益。

对两起殊为不同的斗争事件所做的这种比较表明，将类似的一些机制（在此指的是认同改变、居间联络、激进化以及会聚）置于它们内在于其中的历史情境中，是如何有助于解释为何某些事件以内战而告终，另一些事件却依循的是一条有似于抗议周期的更加审慎的路径。不过，我们所针对的远不止是情境化

的问题。尽管有些人把内战前的美国政治主要看成是一场党派的重新组合(Gienapp 1987),把反奴隶制运动当作与穿插表演无异的小事件,另一些人则把西班牙的过渡视为一次“通过达成交易而实现的过渡”(“transition by transaction”)(Share 1986),但是,这两个过程却都不过是将精英阶层与积极动员起来的公众之关键部分联系在一起的更为广义的斗争事件的一部分。

在这两个案例中,制度性政治和精英政治成为突发性的深层转变的明显证据。只有着眼于社会运动中的具体行动和社会行动者,这些变化才能得以理解。在这两个案例中,那些肇始于少数派所发动的微弱的早期运动,与发生在精英政治及制度性政治中的变化会聚到一起,产生出主要的斗争事件和本质上全新的政体——在西班牙是那种带有包容性但分权的政体形式,在美国则出现了一个强大的(而不是由各州在其中占主导的)联邦体制。

但这两个事件所造成的短期成效不同于其所产生的长期结果。在西班牙,佛朗哥死后的第一阶段,是一个经由协议而出现的自由化时期,此一阶段的领导权掌握在旧政权当中更为讲求实效的那部分成员手里。在美国,内战的最初结果则是激进共和党人政治优势地位的确立,以及许诺给黑人奴隶以平等权利的南方重建活动的开展。然而,两者所呈现出的长期结果却颇为不同:西班牙的情形是,温和中间派的“民主中心联盟”(UCD)之退出,与反佛朗哥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下的民主体制的巩固;在美国,继重建之后出现的则是由一个使南方重新回复到白人霸权局面——尽管奴隶制已不复存在——的政权所带来的更加强大的联邦国家的巩固。

如果说,西班牙的过渡是精英分子通过采取主要是和平的手段而得以实现的,那么,这也是经由认同的改变、社会不同部

分之间的居间联络以及极端派的激进化与中间派的会聚之相互结合,才得以成为可能的。而倘若说美国在内战后仍然将南方黑人置于无代表权的地位,则主要是由北方和西部围绕一种有活力的资本主义扩张计划而集中起来的新的多数使然(Bensel 1990)。在这两个案例中,斗争都超越了传统政治边界,并且,斗争之转变都导致了各自政体的转变。

这里都发生了些什么?

留意我们就 19 世纪美国的斗争与 20 世纪西班牙的政治转变所作的奇怪比较中,正在发生的都是些什么:

首先,相似的因果机制——认同改变、居间联络、激进化以及会聚——在产生殊为不同的斗争事件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187

其次,这些机制所产生的更大规模的后果,严重依赖于它们在其中起作用的场景,依赖于它们发挥其活力的先后次序以及它们出现于其中的组合方式。

第三,对它们所作的分析,促使我们放弃我们最初在行动者、动员以及轨迹之间设立的临时性屏障。例如,乍看上去,认同改变似乎仅只关系到行动者,但结果很快便表明,它同时也是动员的驱策力和(斗争)轨迹的塑造者。

在第二部分的研究中,我们已经从我们开始出发的第二章——以美国的民权运动为例提出有关动员的问题,以 1789 年巴黎的革命为例提出有关认同的问题,以及以 20 世纪 60 年代末意大利的冲突为例,而提出有关斗争轨迹方面的问题——走得很远了。通过对肯尼亚的茅茅起义中的动员或遣散与菲律宾黄色革命之间的部分相似性(第四章),对印度教徒—穆斯林冲突中的行动者—行动—认同特征与南非结束种族隔离政策之间

的部分相似性(第五章),以及本章中对美国反奴隶制的轨迹与西班牙从佛朗哥政权向民主过渡之间的部分相似性的辨识,我们始终追寻着的是跨越两种不同边界——在表面不同的事件、场景以及斗争类型中;以及在行动者、动员和轨迹之间——的相同因果机制的踪迹。

来看一下我们在这三章中所强调的机制与过程:

- 在对肯尼亚和菲律宾所做的比较中出现的是:威胁或机遇的归因、社会利用、居间联络以及合法性确认
- 在对南亚与南非之比较中出现的是:居间联络、范畴构建、对象转换以及合法性确认
- 在美国与西班牙的比较中出现的是:认同改变、激进化以及会聚

机制之间的部分重叠有着特殊的意义。居间联络解释了全部六个事件所具有的重要特征,而认同改变、对象转换、合法性确认以及社会利用则形成了一个互动的机制束;大多数的机制则与激进化和会聚联系在一起。尽管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标签,但它们中没有一个排他性地属于任何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地——动员、认同或者轨迹——此三者也正是本书第一部分作为研究起点的三类不同的研究范围。

188 本章所引入的三个新机制(认同改变、激进化以及会聚)在较向民主过渡和民主的退化要远为广泛的斗争政治中,明显发挥着作用。被视为在两个政治行动者之间共同确定的界线以及跨越这一界线的相互关系方面所发生之变更的认同改变,在战争、民族主义的动员、革命以及其他许多形式的斗争中具有重要影响。回想一下就在当年的法国政府与它的臣民们就重新界定

它们彼此之间关系而进行谈判之际,认同改变是如何迅速而决定性地出现在1789年7月的巴黎的;再仔细考虑一下,那些集体地将他们自己界定为一个民族、个别地则视他们每个人都属于公民范畴的新臣民们,又是如何改变了法国的政治的,我们便可以说:认同改变事关重大。

很显然,激进化亦复如此——它加剧了主要的要求、计划、自我描述与对跨越政治行动者之间界线的其他人所做描述之间的矛盾。在战后意大利的抗议周期的若干早期阶段中(我们在第二章中加以探讨的),日益增加的矛盾将正在进行动员的学生和工人们与政府的坚定支持者们彼此分隔开来;而在南非、在肯尼亚的茅茅起义中、在菲律宾的黄色革命中以及在其他一些地方,我们也同样目睹了激进化的事实。像认同改变一样,激进化同样是一种有力的和作用范围广泛的机制。

最后还有会聚:它指的是某个政治连续体中的一个或者两个极端中所出现的日益增加的矛盾,驱使介于这些极端势力之间的政治行动者们结成更加紧密的联盟。对于从事社会运动研究的学者们来说,有关会聚的一个经典实例同样是我们第二章中曾经探讨过的例子:美国的民权运动。其中,以黑人民族主义者为一方和以种族隔离主义顽固分子为另一方的极端派的出现,促进了那些新近自封为温和派的人们——这些人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尚且彼此对立——结成了联盟。当作为反对派的共产党加入到政府多数派一边时,战后意大利抗议周期之后期阶段也同样发挥的是此类激进一翼的作用。不过,此类效果的产生却远远超出了社会运动的范围之外。例如,在民族主义的动员中,会聚通常将以前的竞争对手们——这些人不大光彩地唯恐被他们贴上极端派标签的另一些人采取毁灭性行动——聚拢到一起;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一种我们已经从一对特殊事件

中辨识出的机制,在范围广泛的斗争政治中发挥着它的作用。

与本书的起点相比,我们在目前所从事的研究中,预先便考虑到对这些机制加以识别。用于解释社会运动的经典政治过程研究议程,是以贴有社会变化、动员结构、构造过程、政治机遇、常用手法以及运动显现标签的一些“方块”作为其特征的;而那些未曾贴有标签的“箭头”则与这些“方块”相连。实际上,我们一直是把这些“箭头”置于显微镜下,以观察这些“箭头”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其结果是,我们从中发现了机制和过程:认知的、
189 相关性的以及环境的机制与过程。

本书第二部分中就机制和过程所作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克服在第一部分中已辨明了的标准研究议程的经常遭受批评的三个缺点:它所具有的静态的特点;它对于行动者之间相互影响的表述不足;以及它将复杂的经验过程化约为建构和策略性算计的做法。这一考察为我们提供的另一个好处是:它使我们避免了将社会运动、革命、民主化以及其他形式的斗争,分割为由各不相同的文献、著作依照彼此不同的程序加以处理的“自成一格的”现象的弊病。经由如此做法,它增强了我们抵制所谓总体法则和总体模式——(诸如)理想的社会运动是如何发生、发展的,以及理想的革命是如何发生、发展的,如此等等——之诱惑的能力。无论其本身有着怎样的弱点,这一通向机制、过程以及事件的路径和方法,还是无情地驱使我们去对发生在行动者——他们本身也处在持续不断的创造与转变之中——之间的动态的、
190 偶然的互动加以观察。而这便是第三部分的任务之所在了。

第三部分 应用与结论

七 革命的轨迹

让我们开始在更大范围内来对第二部分所详述的方法加以检验。在前一部分中,我们只是满足于表明,不仅可以从各自不同的事件中辨识出类似的一些机制来,而且,这些类似的机制也能够被用于澄清这些事件内部的因果关系。眼下,我们要问的问题则是:我们从不同事件当中所揭示出的这些类别的机制,是否能够阐明被其他人笼统地称作“革命”、“民族主义”和“民主化”的这样一些复杂的过程。我们将会看到,它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为证实我们的看法,我们把对于事件的比较扩大到一些通常仅限于彼此之间比较的非常大的转变过程上。第七章对 20 世纪晚期尼加拉瓜的革命过程及其成败进行了分析;第八章则对 19 世纪的意大利与 20 世纪的苏联在国家统一与瓦解方面做了比较;第九章通过对 19 世纪的瑞士与 20 世纪的墨西哥的民主化 [有时是非民主化 (de-democratization)] 过程加以比较,为这一三部曲画上句号。在第十章里,我们则转向某些尚未予以答复的问题,并且,通过把我们已从一系列案例中识别出来的一些组合形式的机制,运用到另一些案例以及三个全新的事件当中,以进一步检验我们所采用的方法的活力。

比较革命研究中的起源与结果之间

在一篇有影响的评论文章中,杰克·戈德斯通描述了早期的两代革命研究,第一代革命研究聚焦于革命的“自然史”,第二代革命研究则聚焦于“结构性张力”(Goldstone 1980)。第一代学者们依照严格的阶段划分来描述革命的轨迹;第二代学者则丝毫193 毫不予过程以任何关注,在他们那里,革命的起源是从基础性的社会张力中直接推断出来的。戈德斯通随后又描述了他所谓的革命研究的“第三代”学说——一种强调结构因素在革命起源中所起作用的比较研究方法。为“第三代”研究传统所强调的一些最重要的因素则包括了逐渐损害既存政权稳定性的广泛政治、经济和人口变化(Goldstone 1991;Skocpol 1979)。

至于这些晚近出现的理论学派是否最适于被描述为不同的“代”,目前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毕竟,研究革命的“结构方法”可以回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尽管如此,戈德斯通的文章还是抓住了——正如它促进了——出现在从事革命研究的学者中的一种明确的方向转变:它明显是比较性的,它所寻求的则是位于事件表面之下的根本性的革命原因,它使革命研究植根于国际基础上,并且,它还超出了对革命起源问题的研究,进而展开了对革命结果的探究。事实上,正是某一特殊种类的结果——社会革命——才是使得戈德斯通和斯科克波尔二人都对之产生兴趣的问题。

第三代革命研究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也留下了大量有待进一步完成的工作。首先,它所具有的结构主义特点,就几乎没有给行动者们企图实现他们的梦想、形成联盟、彼此学习以及犯各种错误留下多少余地。经由对过去二十年来所发生的文化转向

的反思,革命研究的“第四代”学说则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人的因素和文化建构在引发革命时的作用上。^①

我们在前几章里对诸如威胁和机遇的归因、社会利用以及认同改变之类因素所给予的关注,原本应当使我们对于革命研究中所发生的这一最新转向持有某种明显的同情态度;不过,这第四代的革命学说看来也存在着某些与第三代学说相同的问题。由于二者都把注意力狭隘地局限于一些重大的社会革命上,它们便因此而忽略了那些使社会革命有别于其他一些成功革命的因素,并且也因此而无法对那些起转变作用的机制——从革命形势中引发出革命的结果——加以考察。正如戈德斯通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些成功了的革命并不构成一个独特的类型,它们有着与社会运动、造反、不成功的革命以及抗议周期同样的一些特点(1998)。

194

这一有关革命研究之核心主题的残缺观念,具有两方面的消极影响。首先,它限制了对于革命形势如何转化为革命性结果所进行的系统研究的数量;其次,它把革命的起源问题与革命的轨迹混合到了一起。一种有关革命的全面理论说明,需要回答以下三个递进的问题:

1. 国家政权的竞争者们是在何种条件下、经由何种过程而出现的?
2. 这些竞争者是在何种条件下又是经由何种过程,才得以成功取代现存政权的?

^① 强调有必要做这种关注的人有:福兰(Foran 1993)、古德温(Goodwin 1994)、凯迪(Keddie 1995)、塞尔宾(Selbin 1993)、休厄尔(Sewell 1985)、沃瑟斯特罗姆(Wassersterom 1995)。

3. 为掌握一个新生国家而正在进行的这种斗争,是在何种条件下、经由何种过程而最终导致社会革命发生的?

这三个问题中,仅第一个问题可以通过对革命起源的分析而加以考察;而且,为对该问题做出回答,就需要一种有关革命形势——而不仅仅是那些导致成功结果的革命形势——的有代表性实例。第二、第三个问题则只有通过对(革命)轨迹——亦即对革命形势出现后所发生之事——的系统关注才能得以考察。此外,它们所要求的也是一些非常不同的事件实例:第一个问题要求的是一种革命形势的实例(其中仅有某些取得了成功),第三个问题所要求的则是产生出革命性结果的实例(其中仅有某些导致了社会革命的发生)。本章将略去第一个问题,而聚焦于一次成功的革命,并把注意力主要放在那些塑造了革命斗争参加者之命运的过程上。

在遵循这一程序而从事本章的研究之际,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帮助。为数不多的系统性的比较研究——它们提出了革命形势中的革命性结果问题——讲述了一个与我们的旨趣相类似的故事:蒂莫西·威克姆—克劳利的《拉丁美洲的游击队与革命》(Wickham-Crowley 1992)和查尔斯·蒂利的《欧洲革命,1492—1992》(1993),都向我们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极少数成功的案例是源自于大量革命形势的实例之中的。威克姆—克劳利在著作中所举的十一个拉丁美洲的革命案例,仅有两例产生出革命性结果;而蒂利从欧洲历史中列出的七百余九个革命性结果的例子中,成功的实例也只不过才有二十来个。(倘若我们转到第三个问题,则我们便会发现,转变为社会革命的例子甚至还会更少。)从如此之多的革命形势中产生出的成功实例却是如此之少,一定是因为有些什么事情正在发生——不是在革命的起源

抑或其结构性的条件方面发生了什么,而是在斗争的种种轨迹中发生了一些什么——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195

无论是结构主义者对于革命起源的强调,还是文化论者对于动因(agency)的集中关注,都没有在我们转向对斗争轨迹的探讨时产生太多影响。究其原因,则在于这两派学者均未曾对内在于斗争政治中的一些关键性互动——它们导致了新的结盟关系、新的认同的出现且导致压迫性政权的覆亡——有所涉及。至此,我们提出这样的看法将丝毫不会让人感到惊讶:当某一革命轨迹中所发生的情形被看成是许多因果机制交互作用的结果时,革命轨迹中所发生的种种才能更好地得以理解。我们并未对所有这类机制及其在一些革命形势实例中的互动提供系统的说明,相反,我们采用的是通过聚焦于1979年的尼加拉瓜革命,以此而特别将注意力集中于统治阶层联盟中的重要成员的背叛这一过程上。我们把这一体制内的背叛过程定义为“一个持续不变的过程,经由这一过程,此前稳定的统治阶层联盟当中的一些重要成员与革命群体或其他反对派群体密切合作,以支持后者的行动计划”。

我们对那些将体制内的同盟者与具有广泛基础的反对派群体联系起来的体制内的背叛,特别感兴趣。这样的一些群体(尽管不只是这些群体)大多数情况下似乎涉及的是一些成功的革命。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这样的一种联盟出现在为期十年的尼加拉瓜革命政治中。我们并不打算逐一追踪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德瓦伊雷(Anastasio Somoza Debayle)政权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之间的长期斗争,相反,我们只限于强调,体制内背叛的一些关键机制是如何起作用或者无法起作用的,强调事件内部之偶然事变的作用并对其转向革命做出描述。我们的目的是使得产生革命结果的过程凸现出来。

尼加拉瓜革命的轨迹

1979年索摩查政权被推翻,宣告了索摩查家族近五十年的残酷、腐败统治的结束。不仅如此,当桑地诺主义者试图——最终证明是不成功地——与此前曾与之结成一种脆弱革命联盟的反索摩查政权的温和派成员共享权力之际,索摩查政权的垮台同时也宣告了一个重要的民主化时期的到来。如果说,桑地诺主义者只是暂时地掌握了政权,那么,由他们所开创的民主改革却并非如此。尽管遭受了各种灾难的打击[包括代号为“米奇”(Mitch)的飓风所带来的巨大破坏],现今的尼加拉瓜已变成了一个与索摩查统治时期大为不同也远更民主的社会。倘若1979年的政权转移不适于被称为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或者“大革命”,那它也必得被视为一次具有重要革命成果的事件。在本节中,我们的任务则是在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去探求那些有助于说明在20世纪晚期的拉丁美洲,一种相当典型的革命形势如何发展为一次成功的、意义重大的国家政权转移的动态过程和机制。

我们为此必须首先确定尼加拉瓜是在何时进入一种革命形势的。我们把一种革命形势界定为包括了这样三个要素的形势(Tilly 1993:10):

- 竞争者或其联盟的出现,他们提出了控制国家或者国家之某些部分的排他性的竞争要求
- 公民中的重要部分承诺要为这些要求尽义务
- 统治者无力或不愿镇压这一替代性的联盟和/或(公民)对这些要求所作的承诺

尽管该定义在被加以运用时显然还需要进一步做出详细说明(比如,什么构成了“公民中的重要部分”?),但有一点似乎很清楚,那便是:到1970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已经动员了足够的民众支持,并且该组织自身也已显示出对于国民卫队的镇压行动有足够的适应能力,从而也就使尼加拉瓜的形势满足了所有这三个标准(Black 1981; Booth 1982; Christian 1986; Farhi 1990; Parsa 1999; Vilas 1986; Wickham-Crowley 1992)。因此也就能够把经历了整个70年代的革命形势说成是尼加拉瓜当时所具备的特征。不过,如同威克姆—克劳利在他所做的比较研究中所表明的,具备这种特征的拉丁美洲国家,并不只是尼加拉瓜一国。按照这种说法,仅仅二战后的这段时期,拉丁美洲就产生了其他十次革命形势,但在这十个案例中,却仅有古巴一例,其革命斗争过程产生了成功实现国家政权转移的结果。像古巴一样,尼加拉瓜也不过是一个例外,而不能算是一种常例或通则。

那么,我们又当如何解释这一例外呢?这里,体制内背叛的过程十分突出地显现出来:它不仅出现在大多数对革命所作的经验式描述中(Black 1981; Booth 1982; Christian 1986; Foran 1990; Parsa 1995; Selbin 1993),而且更普遍的出现在一些将成功与不成功的革命轨迹区分开来的比较分析中(Dix 1984; Mid- 197
larsky and Roberts 1985; Russell 1974; Wickham-Crowley 1989, 1992)。尼加拉瓜形势发展的结果是,到1979年,索摩查突然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广泛的反对派运动,构成这一运动的不仅有传统的左翼成员——学生、劳工联合会、农民以及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激进分子们,也包括了尼加拉瓜天主教会的高层、主流媒体以及许多工商界精英人物。在典型地出现于一连串戏

剧性的革命事件中的关键的制度性行动者们当中,唯有军队还依然忠于索摩查政权。

我们想要对包含在这一过程中的若干关键机制加以辨识。有三个机制似乎显得尤其重要,它们是:对精英利益的侵害、被突然强加的怨愤以及撤销合法性确认。我们并不把这些机制视为理解尼加拉瓜所发生的诸多事件的唯一关键所在,也不像罗塞塔·斯通(Rosetta Stone)那样,更为大胆地利用这些机制来解读所有的革命成果。我们只是主张,这些机制在鼓励体制内背叛的关键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他重要的机制也同样起作用,其中的一些机制我们将会顺便提及。眼下,我们的任务则是从“体制内背叛”问题后退一步,而提出这样的问题:“哪些不同形式的机制混合造成了体制内背叛,随之而来的结果又有哪些?”

革命斗争中的诸机制

如果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1970年时已在尼加拉瓜初步确立起一种革命形势的话,那么,它也是在缺少重要的精英同盟支持的前提下做到这一步的。尽管此时他们的队伍已较60年代初起步之际得到了很大的扩展,但桑地诺主义者仍然不过是尼加拉瓜一小部分处境最糟的社会群体的前锋而已。而且,就在70年代到来之际,该运动也只不过仅有尼加拉瓜偏远的北中部地区作为它真正的大本营;更重要的则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只是在学生、激进的劳工以及城市贫民中吸引了有限的追随者。然而,就是这个组织,到1977年时,却会成为将尼加拉瓜大多数精英机构的代表囊括其中的广泛的反对派联盟中无可争议的革命先锋。那么,这一切又是如何在不足五六年的短短时间里——这也是大部分拉美游击运动遭受失败的几年——发生的

呢？

现存有关尼加拉瓜革命的文献提醒我们的是：索摩查及其代理人的一些日常行动和做法，是造成精英分子大规模背叛旧政权而支持革命事业的最重要原因。由此，我们对事件在关键的 70 年代的发展演变所做的解释，就与杰夫·古德温在他那篇检讨革命研究的综述性文章中所作的两点总结形成了共鸣。古德温在他的文章中写道：

首先，大多数革命研究表明：带有压迫性或分裂性的政府行为，包括那些被认为是出于善意的做法，可能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它们可能会让存在于民众中的各种不同的怨愤集中起来，并且会使政府本身成为这些怨愤的聚焦点……其次，以上所考察的所有有关革命的研究提醒我们：某种独裁主义政权，不仅在强大的革命运动形成时表现得特别脆弱，而且，在这些运动实际推翻它时，也显得格外的脆弱；即是说，自主的、腐败的和压迫性的人格主义独裁统治……由于疏远各类精英和中间阶层以及各阶层普通民众，[他得出结论说]，已经使自己成了广泛的、多阶级参与的抗议运动所针对的靶子。[Goodwin 1994:757—758]

尼加拉瓜的情形便是如此。下面我们将要加以描述的三个机制中的两个，就集中针对的是索摩查的行动在促使尼加拉瓜的精英和中间阶层与桑地诺主义者结成不稳定的革命伙伴关系时所起的作用上。

对精英利益的侵害

事实上,所有持久存在的政权都是植根于精英行动者所结成的较为广泛的联合中,这一同盟关系则是通过相互承认和支持彼此利益而得以维系的。这一点,甚至对于索摩查政权来说,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度存在的事实。布莱克写道:

从一开始,索摩查政权就奠基于这个家族有能力在统治阶级内部获取支配权以及随后能够与残存的资产阶级达成一些相互有利的协定——一方面是政治协定,另一方面则是结成商业上的同盟——之上。在接受这些协议所规定的规则的的前提下,资产阶级自身则组成了尼加拉瓜银行(BANIC)和美洲银行(BANAMERICA)[两个范围广泛的商业网络],并由此而兴旺起来。随着他们的地位得以巩固,其对于索摩查政权的要求也在增加。农业综合企业、商业和工业都被按照一定份额交由他们掌握,资产阶级的每一群体都享有某些独占的利益范围,而他们对尼加拉瓜广大民众所实行的粗暴的独占控制,则导致了日益增长的带有暴力性质的阶级冲突的产生——这又使得他们需要仰仗索摩查政权去进行镇压。[Black 1981:62—63]

除哥斯达黎加之外,尼加拉瓜的政治经济基本格局与其他中美洲国家并无多少区别。而大部分中美洲国家的情形则是:它们都曾经历过与尼加拉瓜类似的革命运动的冲击,但它们都从这些革命运动中存续下来(Paige 1997; Yashar 1997)。这便很清楚地暗示出:总体上的阶级不平等和经济剥削也许有助于

引起革命形势的出现,但这些情况本身显然不足以产生出革命的结果来。而革命一旦发生,组成统治阶层联盟的各部分的物质和政治利益就必定会遭致严重损害。

普遍认为,决定性的突变是随着发生在1972年12月23日的大地震——它将(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夷为了平地——而到来的(Black 1981; Booth 1982; Christian 1986)。索摩查本人把这次地震称作一次“存在着种种可能性的革命”,他当然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事实是,索摩查以他那赤裸裸的贪婪而利用了这些可能性:他垄断了因重建马那瓜而造就的各类市场,除少数亲信外,不让任何人插手重建行动。最终,索摩查家族垄断性地把持了地震后的旧房拆除、房地产投机、道路施工以及新住房和商业大楼的建造,而新建的住房和商业大楼以四五倍于其原始价值的价格售出。索摩查个人的贪得无厌及其不愿与人分享由危机而获得的意外之财,加速了另一次更重大危机的来临。布莱克写道:

一夜之间,经济控制的方式以及索摩查与资产阶级的关系都发生了改变……地震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也把一个新术语: *competencia desleal*——不公平或不诚实的竞争——引入了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词汇当中。种种游戏规则,与之相伴的还有使独裁国家得以凝聚起来的脆弱共识,都一并遭到了破坏。[Black 1981:59—61]

统治阶层联盟中的第一个严重裂痕,几乎是紧随地震的发生而立即出现的,不过,要到1973年初,它才变得清晰可见。当时,两个代表商业精英利益的主要组织采取了反对索摩查政权的强硬政策立场。1974年,这两个组织:“私人倡议高级理事

会”(Consejo Superior de la Iniciative Privade,略作 COSIP,后来作 COSEP)和“尼加拉瓜发展协会”(Instituto Nicaraguense de Desarrollo,略作 INDE),通过共同举办一次尼加拉瓜经济精英会议——会议要求结束政府的腐败,并发出实行改革以帮助“大多数无依无靠者”的号召——进一步地使它们自己与索摩查政权疏远。同年,第三个主要的组织“民主解放联盟”(UDELA)出现,并很快使自己成为甚至比前两个组织中的任何一个都更为强大的反对派力量。民主解放联盟系由各种政治团体和工会团体拼凑而成,其疾呼之声既可归因于它对于精英经济利益的独立,也可归因于该组织的奠基者及其名义上的领袖 P. J. 查莫罗(Pedro Joaquín Chamorro)——《新闻》(*La Prensa*)杂志的主编,在全国享有知名度并受到尊敬的极少数公众人物之一——的名气和魅力。

不过,尽管独裁政权与传统统治阶级的主要成员之间已产生出明显的裂隙,但这些组织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准备倡导发动革命,当然,它们中也没有任何一个把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视为自己的盟友。然而,索摩查政权在此后三年间的倒行逆施,包括1974年12月强制实施极其野蛮的戒严法,却把体制内的精英反对派不断推向左倾。到1977年,亦即索摩查实施“戒严状态”的第三年,独裁政权与它以前的精英同盟者之间的小小裂隙已变成了巨大的裂口,而随着新商业税的开征以及一大批免税优惠的取消,裂痕变得更大了。如同布思所描述的:

大部分主要的商业利益集团,更愿意实行的还是那种“民族统一”式的改革:它将使尼加拉瓜摆脱索摩查集团的统治,不过却并不触动包括国民卫队和民族解放党(PLN)在内的尼加拉瓜的基本政治结构……尼加拉瓜一个重要的

资本家团体……则协助扩大了革命力量的联合并且确立了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商业……联系,这些人当中有实业家埃米利奥·巴尔托达诺·帕利埃斯(Emilio Baltodano Pallais),律师兼商人查莫罗博士(Dr. Joaquín Chamorro),经营超市的巨头费利佩·曼蒂卡(Felipe Mántica),以及国际银行家阿图罗·C.波拉斯(Arturo Cruz Porras)。他们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之间的联系及在1977年年中对后者的认可,据说导致了游击队领导人提出由他们四人以及另外八人共同组建革命政府内阁的建议。这个在1977年被曝光的“十二人小组”随即纷纷逃离尼加拉瓜,流亡国外。而在他们流亡国外之际,他们便开始展开游说,反对给予索摩查政权国际援助,并且开始在尼加拉瓜国内组织反索摩查政权的联盟。[Booth 1982:102]

这“十二人”的背叛,加剧了尼加拉瓜传统统治阶级的两极分化,而P.J.查莫罗在1978年1月10日的被谋杀,对于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来说,则标志着他们已经到了只能进不能退的地步。直到当时一直避免采取直接行动的“私人倡议高级理事会”和“尼加拉瓜发展协会”以及其他许多私营部门中的组织,此时则在一连串为抗议暗杀查莫罗和迫使索摩查下台的全国性罢工和企业停工行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独裁政权的最后十六个月里,索摩查感受到了尼加拉瓜精英背叛的全部重要性和多样性。事实上,随着他以前的精英盟友大部分已转而站到反对他的阵营中,索摩查也唯有通过镇压一途,才得以在那段时间里保住他作为独裁统治者的权力和地位。

被突然强加的怨愤

在一篇发表于1983年的有影响的文章中,爱德华·沃尔什(Edward Walsh)和雷克斯·沃兰德(Rex Warland)为社会运动研究引入了这样一个概念:“被突然强加的怨愤”。他们运用这一概念来加以描述的特定事件,是发生在三英里岛(the Three Mile Island)的核电厂事故。但他们觉得,这一事故不过是某种更具普遍意义情形的个别实例罢了:某些异常的事件,戏剧化地表现并提升了一些特殊问题(在他们的文章中指的是核能的危险性)在政治上的突出重要性。这两位作者所提到的其他一些例子也具有和三英里岛事件同样的“不可抗拒”(act of God)性,它们都不是人类有目的活动所产生的结果。不过看来,把这一概念扩大到使之包括一些有目的的行动——这些行动通过其造成的与三英里岛事故相同的惊恐与义愤而动员起反对力量——在内,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合理。

此类行动突出地发生在尼加拉瓜,而这些行动必须被视为推动对产生革命性结果如此关键的“体制内背叛”的另一些重要机制。诚如我们在对精英利益的侵害中所看到的,正是索摩查及其代理人,应对一系列“臭名昭著的”暴行负责(或被认为应对之负责),这些暴行使得索摩查政权的压迫性及其统治的专断性质,更加戏剧化地凸现出来。

在这些被突然强加的怨愤当中,没有什么比《新闻》杂志主编P.J.查莫罗的遇刺更为重要的了,该事件激起了精英和民众对索摩查政权的反对。民众对暗杀查莫罗的暴行做出了即时的反应,就在谋杀事件发生后的几小时之内,便有大约5万名哀悼者/示威者出现在查莫罗家的门外;两天后,在葬礼游行过程中,

总数达 3 万名的愤怒的暴民们纵火焚烧了 Plasmafersis 公司以及其他一些索摩查家族所拥有的商店。更为重要的是,如同佩奇所描述的:

对于尼加拉瓜的资产阶级来说,查莫罗的遇刺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查莫罗一直是根基深厚的保守党格拉那达家族中的核心人物,并被视为反对索摩查政权的象征。他的遇刺身亡向资产阶级的许多成员表明了:没有人是安全的。[Paige 1997:38]

更加广泛也更为好战的精英反对派的有组织的行动表达,是 1978 年 1 月 24 日举行的商业总罢工。此时,甚至作为索摩查政府正式伙伴的保守党,也通过敦促其成员抵制于当年 2 月举行的定期市政选举,而发出了反对自己置身其中的现政权的信号。

这一事件的背景、环境及其最终所造成的影响,与我们在第四章所讨论的暗杀事件——菲律宾的阿基诺在 1983 年遭谋杀——所具有的特点,颇有类似之处。在尼加拉瓜的例子中,有证据显示:暗杀行动是由 Plasmafersis 公司的所有者授意进行的,意在报复《新闻》杂志披露该公司将尼加拉瓜国内稀缺的血浆出口国外的做法。而该公司的所有人之一,波托卡雷罗 (Anastasio Somoza Portocarrero),是索摩查的儿子和索摩查家族政治王朝可能的继承人。这两起暗杀行动对于动员民众和精英反对其各自的政府当局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暗示:某种形式的被突然强加的怨愤与体制内背叛过程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因果联系。

不过,尽管查莫罗遇刺事件及其后果,具有将事态推向高潮

的重大意义,但该事件却并非不断展开的革命过程中唯一一例被突然强加的怨愤。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发生在菲律宾和尼加拉瓜的事件之间的又一相似之处及不同之点。其相似之处是,在这两个案例中,跨阶级联合的形成过程都不时地被打断,并且,很大程度上都是受一连串构思拙劣的政府行动的刺激而再起高潮的。它们的不同之点则在于:菲律宾的情形是,一系列的暴行以暗杀行动为开端,但在尼加拉瓜,暗杀事件却出现在这一断续过程接近尾声之际;尤其是,较早发生的几桩起催化作用的行动,成为衡量尼加拉瓜传统精英中出现日益上升的革命势头的重要参照点。

这些行动中之一最重要者当数索摩查在为期三十三个月的戒严期间,对政治自由和新闻自由所采取的压制措施了。为要更好地理解索摩查此举的重要性,在此,值得回想一下的是,当索摩查在1974年12月底最初宣布实施戒严时,大多数尼加拉瓜资产阶级或许曾是戒严法的支持者。这是因为,宣布实施戒严的时间正值一起重大事件发生的当口,这一事件之从根本上震惊尼加拉瓜精英,一如它激发起民众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一样。该事件便是1974年12月27日,桑地诺主义者对一次由索摩查政府的农业部长卡斯蒂略(José María Castillo)举办的假日聚会进行的成功突袭。

此次突袭行动中,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突击队抓获了一大批来自政府上层、外国使团、索摩查家族以及尼加拉瓜社会各界的人质;突袭行动也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突击队员们发表他们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国内和国际论坛,而最后,当索摩查答应他们所提出的全部要求时——包括为一大批工人(索摩查本人的国民卫队也在其内)增加工资、释放几名重要的政治犯、交付两百万美元的赎金以及(保证他们)安全飞往古巴——又为他们

带来了一次极其惊人的革命性胜利。而那些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突击队员们被送往机场时向他们欢呼致意的人群,则加深了这次突袭行动为索摩查所带来的耻辱。

203

对于尼加拉瓜资产阶级队伍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次突袭行动与其说是使他们蒙羞,不如说是令他们感到了惊惧。到这一事件出现时为止,发生在遥远北方的起义对他们还只是一种遥远的担忧。尽管反对索摩查的极端做法在精英分子内部已有增加,但他们仍然在政府反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战争中,站在政府一边。然而,如果说,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惧怕和担心,促使许多富有的尼加拉瓜人最初支持宣布戒严法的话,那么,当索摩查公然利用戒严法大肆发动对北方农民起义以及温和的反对派领导人的战争和镇压行动时,他的这些做法便使得富人阶层中许许多多的追随者们迅速地激进化了。随着对民主解放联盟几位领导人的随意监禁,对全国性劳工联合组织的严厉禁止,以及新闻检查制度的全面实行,索摩查的独裁意图已经在这些行动中变得清楚无疑了。最后,突袭行动与随之而来的宣布实施戒严法,终于“加剧了尼加拉瓜资产阶级中出现的政治危机,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勾画出那些……彻底忠于独裁统治的人,及另一些会越来越公开反对独裁统治的资产阶级群体来”(Black 1981:88)。索摩查对突袭行动做出的不加区别的反应,而不是相反,利用因突袭而产生的种种忧虑和恐惧以阻止精英背叛的潮流,将精英反对派更有力地推向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怀抱。

撤销合法性确认

至此,我们一直强调的是索摩查及其代理人在无意之间对

精英背叛——在我们看来,它对造成尼加拉瓜出现革命结果至关重要——所起到的激励作用。不过,为免于让人觉得我们似乎是在表明单是政府行动就塑造出了革命轨迹,还是让我们来探究一下这样一种机制,它将殊为不同群体中的行动者们——我们称之为确认者(certifying agents)——置于行动的中心。在第五章中,我们将合法性确认定义为外部权威对行动者、其行为及其要求加以确认的一种机制,而我们所谓撤销合法性确认,则指的是主要的确认者对此种确认的撤销。缺少最重要的精英群体的支持,甚至最无情的独裁统治也不会维持长久。

各种政权还深深地植根于确认(validation)的次级结构中,该结构通过这些政权与其他政权及跨国团体之间所建立的关系,将它们与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联系起来。如同我们在第四章的“黄色革命”中所看到的,其他一些重要国家撤销其对于某一政权的支持,通常会对受其支持的该政权的稳定性造成直接及间接影响。直接影响的方式包括从撤销至关重要的财政或者军事支持到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再到答应给予反叛者以援助,直至外国直接军事的干预;间接影响则集中于外国支持的撤除对重要的国内行动者所造成的冲击上。撤销合法性确认常常使得反叛者更大胆地加强其反政府的行动,或者促使一度作为政府支持者的精英团体背弃在他们看来已是无可救药的政府当局。这两种影响效果都清晰地呈现在我们所举的尼加拉瓜的例子中。

一段时间里,五个国家所采取的行动,动摇了索摩查政权并有效地使之失去了合法性确认。这五个国家分别是: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巴拿马、墨西哥以及美国,其中,美国的作用尤为重要。就美国而言,它充当的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个不情愿的盟友角色,换句话说,尽管美国一贯反对桑地诺民族解

放阵线,但美国在卡特总统当政时期的确又采取了几次明显鼓动革命过程的行动;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次行动是继卡特于1977年就任总统后,美国政府随即做出的急剧减少对索摩查政权援助的决定。为体现总统力求将对外援助与人权实际状况相结合的意图,美国对尼加拉瓜的经济援助在1974—1976年到1977—1978年期间,被削减了75%(Atkins 1977;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1977),同一时期,美国所提供的军事援助则下降了43%。

美国经济与军事方面援助的削减,对索摩查政权的稳定性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美国人权政策的直接结果“是致使用于国民卫队的各种资源的减少,并导致索摩查政权军事能力的削弱”(Booth 1982:129)。而其间接效果也许更为重要:经济援助的急剧削减,在使得独裁政府降低给予各主要部门的补贴的同时,也引发了大批外国投资者从尼加拉瓜经济中纷纷退出,所有这些事态发展的最终结果则是加剧了“对精英利益的侵害”——一种此前我们已讨论过的机制。

索摩查与美国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鼓舞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勇气。用布思(Booth 1982:129)的话说:“当独裁政权的政治大厦即将倾覆之际,反叛者们在较少担心他们必须在斗争中面对美国的同时,也变得更加大胆和更有勇气了。”正当起义者更为积极地展开行动时,美国所采取的第二个举动却进一步地削弱了索摩查政权应付起义者的能力。在卡特总统的压力下,索摩查于1977年9月答应解除他在突袭事件发生时宣布实施的为期达三十三个月的戒严命令。从某种严格的策略观点看,此举显然是一大错误。尽管戒严法的实施对于索摩查在国内所拥有的政治上的支持力量具有腐蚀作用,但在事实上,它却有效地限制了反叛活动的开展。而随着戒严法这一加在他们头

上的压迫性盖子的揭去,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便利用美国与索摩查之间出现裂痕这一有利时机,更加自由地放手进行动员, 205 1977年的10月和11月,起义者发动了到当时为止他们所曾发动的最大规模与持续时间最长的军事行动。颇为相同的一幕在九个月之后的1978年6月又一次再现,当时的情形是,索摩查在美国的压力下,同意邀请已于一年前逃往国外的温和反对派领导人——“十二人小组”——返回尼加拉瓜。这一次,索摩查的做法还是指望以此来讨好卡特政府,结果却是再一次地适得其反。美国增加援助的无望与“十二人小组”的回国,引发了一场喧嚣的机场群众集会与普遍的不满浪潮。

马科斯政权主要依靠的是美国的支持,而尼加拉瓜却深植于一个更为复杂的地区结构中,尽管这一结构也是由美国所主导。在其他一些对尼加拉瓜革命过程起促进作用的国家当中,哥斯达黎加也许是在撤销对索摩查政权的确认方面贡献最大的国家。受与其北方邻国尼加拉瓜之间存在的长期而尖锐冲突历史的推动,哥斯达黎加采取了许多方式,以援助尼加拉瓜的革命。没有什么比连续三任哥斯达黎加总统都给予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该国与尼加拉瓜毗邻的偏远的北部地区任意开展军事活动的自由,对尼加拉瓜革命的贡献更大了;就是在他们所提供的这一地区,反叛者们不受约束地建立并运作他们的训练基地、屡次发动对尼加拉瓜的越境进攻。

哥斯达黎加还允许从巴拿马开出的替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装运军火的船只进入该国,甚至小心翼翼地让本国公共安全部的人员直接将这些军火物资运送给反叛者(Booth 1982:131)。除了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提供庇护外,哥斯达黎加也充当了流亡的“十二人小组”的安身之所,在那儿,这些人得以自由地从事反索摩查的宣传与开展国际性募集资金活动。当哥斯

达黎加在 1978 年 10 月 23 日成为第一个与索摩查政权断绝外交关系的国家时,此类默许式的撤销确认的努力,便成了对索摩查政权的合法性确认的正式撤销了。

在有效地撤销对索摩查政府的确认方面,其他几个国家也扮演了较为次要但仍不失其重大意义的角色。如以上所提到的,巴拿马——也许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最奇怪的伙伴——通过充当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从古巴及其他地方购买到的武器装备的入口与主要运输干线,而直接为起义者提供帮助。

奥马尔·托里霍斯(Omar Torrijos)领导下的巴拿马政府,还为 1978 年 8 月占领尼加拉瓜国民宫——这对索摩查来说,是又一次令人尴尬的挫败——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突击小分队提供避难之所;为尽力阻止尼加拉瓜因报复哥斯达黎加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提供庇护而对其采取军事行动,托里霍斯则在为哥斯达黎加提供武器的同时,还许诺向其提供军事援助。

206

委内瑞拉和墨西哥也是该地区最积极和公开的索摩查政权反对者。委内瑞拉甚至比墨西哥更早采取了行动,1978 年 2 月,委内瑞拉第一次向美洲国家组织(OAS)发出公开号召,要求后者对索摩查政权实施制裁。1979 年 5 月,委内瑞拉最终说服其所有“安第斯协定”邻国,仿效它的做法,断绝与索摩查政权的外交关系。1978 年末,墨西哥会同委内瑞拉一起,利用“美洲国家组织”作为论坛,谴责索摩查并要求对其人权滥用状况展开调查;墨西哥还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其他金融机构暂停向尼加拉瓜贷款。与尼加拉瓜相邻的这些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日益切断了索摩查政权获取国际性的政治、金融和军事援助的来源——而这些国际援助对于那些依附性小国的长期生存却又如此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不断失去外部支持鼓励了我们已在上述分析性叙述中突出强调过的所有内在的动力机

制发生作用。

尼加拉瓜革命轨迹的中止既不是由体制内背叛的总体过程,也不是由我们对其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加以突出强调的三个机制所造成的。尽管我们把发生在重要的统治精英中的背叛行动视为索摩查政权瓦解的强烈预兆,但我们已经辨识出的一些机制,却既不是与这种情形有关的仅有的一些机制,也不一定是出现在所有成功的革命结果中的一些机制。然而,要是缺少重要的体制内背叛这类机制——我们发现其存在于尼加拉瓜——便很难想象会产生如此这样的一些结果了。

结论

从这一成功的革命中,我们还能得到其他什么教益吗?这其中的教益无疑很多,但作为结论我们只强调两个主要的因素,其一是关于偶然性在斗争动力中的作用,另一则是关于革命与其他斗争过程之间的类似之处。

偶然性与情境

针对比较革命研究领域中长期存在的结构论偏见,威廉·休厄尔(Sewell 1985,1996)要求更多地关注最初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他引用攻打巴士底狱(以及围绕这一事件的意义而在随后展开的论战)作为例证,主张对政治斗争进行更多的“事件性”(eventful)分析。在尼加拉瓜的案例中,如我们所一再看到的,首先出现的是一些偶然事件,其次则是领导层的战略决策,这些决策有时会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以及第三,因果机制的交集——由此而导致的结果则是结构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都未曾

预见的。

至于偶然性事件,在这一革命案例中,有一起偶然事件尤为关键,它成为这次革命在随后的路径选择上的转折点:

- 发生在马那瓜的地震以及索摩查对此所做的盗窃狂式的反应。

这一偶然性事件引发了突然且无法预测的决策、高度的不确定性以及新的威胁与机遇组合。在尼加拉瓜,地震为腐败与垄断权力的行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对这次事件所做出的反应在整个国家导致了动员的出现——通过威胁。被排除在从地震后的重建合同中获利之外的一部分尼加拉瓜商界精英们的悄悄动员,让许多人站到了一度曾是其利益维护者的索摩查政权反对者的行列。 223

但偶然发生的事件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偶然事件,它们又引发了塑造随后的斗争动力的其他一些机制。索摩查的镇压行动使得曾经为该政权提供重要支持的一部分人感到愤愤不平,由此而激励了越来越多的尼加拉瓜资产阶级背叛索摩查政权。这两种发展态势接着又触发了其他一些机制:尼加拉瓜之实施戒严加速了卡特政府撤销对索摩查政权的合法性确认。

最后,在我们的叙述中不断展现出的偶然性,大多是由各种不同机制的相互结合而产生。由于我们的兴趣主要在于展示我们的以机制与过程为基础的方法,这就使得我们一直把有关机制—互动的问题晾在了一边(到第十章,我们会重新回到这一问题上来)。不过,即便是对我们所叙述的这一案例做一简单的反思也可以表明:在与其他机制相互结合时,相似的机制会导致产生极为不同的后果。来看一下我们在许多事件中曾见过的激进

化机制：在尼加拉瓜，资产阶级被激怒与华盛顿撤销对索摩查政权的合法性确认结合起来，使得与以下层阶级为基础的桑地诺主义者之间结成强大的跨阶级联盟的行动得以展开。像美国的反奴隶制运动和西班牙的民主化运动一样，这一事件同样包含着强大的激进化机制，但由于其他机制的出现，其结果则是导向了革命的成功。

文化与革命的比较研究

现在我们可以就这一革命故事所留下的教益进行总结。回顾我们在本书一开始曾简要描述的从事革命研究的几代人的不同主张，我们发现，从这一案例中我们根本看不出任何与第一代研究革命的学者所强调的严格的阶段论相类似的东西；也看不出太多由第二代革命研究学者所确认的结构张力的痕迹来；而第三代学者的结构决定论同样无法解释我们所研究的这些重大事件。不过，对于注重文化因素的第四代学者，我们的反应还是有一些细微差别的。一方面，在对这一案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所做的简要总结中，我们确曾强调过斗争事件中文化过程的核心作用以及人的能动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当我们断言历史、文化以及解释性过程并非犹如外在的遮蔽物那样起作用，而是经由每一出戏剧中的主要演员的互动而发挥作用时，在这一点上我们便与我们那些更为坚定地持文化论观点的学界同道们分道扬镳了。

革命并非某种“单一的事情”(A Single Thing)。对斗争动力的全面叙述，要求我们同时把注意力放在长期的结构变化(如经济自由化、体制调整)，放在每一个行动者在解释机遇和风险方面的文化建构，以及围绕偶然事件而展开的短期互动上。不

过,结构、文化以及战略上的算计却并非全然居于斗争机制之外,而更是斗争机制之作用及相互作用的原材料。在以下两章中,我们将把这一视角运用于另外两个广泛的历史过程,即民族主义和民主化之上。

226

八 民族主义、民族解体与斗争

“总的来说,民族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易于理解的观念。不过,尽管它界定了总体的状况,但在详细说明一些特定事件时,却并不是十分有用。”沃尔德伦(Waldron 1985:427)写道。“形容词‘民族主义的’已经被以一种通常(不加解释地)认为是使之意味深长地区别于其他各种斗争形式的方式,而加之于一群人、运动以及情感之上。”看来,只要我们对民族主义的动力机制或它与其他形式的公共政治形式的互动毫无兴趣,那么,有沃尔德伦的这一分析性立场就足够了。然而,在我们的词典中,民族主义却只不过是斗争政治的一部分,一如我们反复论证的,我们不能把任何斗争政治事件理解为任何单一的话语、意识形态抑或表面上形式独特的斗争之表达。

要理解民族主义何以会出现,我们便必须了解其各色各样的政治渊源。我们需要了解,各种民族主义的政治渊源何时以及为何在有些时候会集中在民族主义的结果中;我们还必须问一问,在何种程度上,民族主义事件是结构因素、制度约束和文化常量所造就的结果,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它们又源于一连串的斗争。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便有可能发现,民族主义的结果是和动机、运动以及与民族主义毫无干系的国家政策交织在一起的,而我们也因此有可能从中找出那些与推动其他形式的斗争相类似的机制来。由此而来的必然结果是,我们定会发现,那些历史

已将其编码为相反的民族主义过程——诸如民族解体与建立民族国家之类——之基础的东西,其实是一些相似的机制。

本章聚焦于截然相反的两个过程:民族统一与民族解体过程,通过运用两个大规模的、预示性的、彼此不同的事件——19世纪意大利的统一和20世纪苏联的解体,以辨识那些一再重现 227 于各种不同的民族及种族背景中的机制和过程。意大利在19世纪60年代的统一,是通过将众多小邦兼并到皮蒙特—撒丁王国这一闪电般的过程而完成的,由此而产生的是一个软弱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和一个没有完全融为一体的精英集团。然而,随后的一百四十年,却几乎看不到带有独特的语言和文化形式的民族分离主义,出现在意大利半岛或者西西里和撒丁尼亚两个大岛上。

相形之下,当俄国沙皇制度垮台时,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却建立了一个由单一政党连接起来的巨大而整齐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地区语言获得了官方地位,而地区政治精英则被作为莫斯科的代理人,在莫斯科受到培训后又被送回其所在的地区。正是这同一群精英分子,构成了(苏联)国家解体——其发生之迅速有如意大利国家之形成,而其所引起的震惊甚至更大——的基础。一度巨大无比的苏维埃统一体如何沿着一度被弱化了了的民族界线而解体,在许多方面恰成了软弱而分散的意大利国家如何得以形成的逆命题。

我们将会发现,在这两个表面对立的政治过程中,起作用的却是一些相似的机制。在每一政治过程的内部,我们将看到的是:机遇的螺旋、认同改变、竞争以及居间联络的组合形式。那些在不同的背景中以不同方式结合起来的相似机制,将不会令我们的读者感到惊讶,而它们在诸如民族国家形成与民族解体之类对比鲜明的政治过程中被发现,也令我们所做的这一比较

更为有趣和更富挑衅性。其所以更富挑衅性,是因为它暗示出,对主要的历史事件进行编码的标准方式,更多地是仰赖政治结果而较少依靠有关的一些过程。其所以更为有趣,则源于它表明了:较之将机制当成仿佛它们是根据其各自不同的法则而起作用的东西来加以分类的做法,我们通过对那些推动了一大批斗争事件的机制的探究,而获得了更多的解释性方法。

话语中的民族主义,实践中的民族主义

在对民族主义进行分析时,最常见的做法是把它当作一种情感或者一种信念,而较少将其视为一种斗争政治。甚至从民族主义中分出了一个C阶段——大众民族运动阶段——的米洛斯洛夫·赫罗奇,也把这种以大众为基础的行动看成“仅仅是早在民族主义行动开始之前即已形成的民族主义思维方式的一种外化”(Hroch 1985:22—24)。和马克·贝辛格(即出著作:9) 228 一样,我们反对这种认知决定论,与此同时,我们不仅认为从B阶段向C阶段的过渡是有趣而值得探究的,并且主张,甚至赫罗奇发现只存在于B阶段的民族主义认同和偏好,也是在由民族主义事件构成的斗争政治中互动性地形成的。

不过,我们走得比这更远。事实上,甚至当民族主义被描述为一种“运动”时,有关民族主义的文献也几乎不曾注意到它与其他形式斗争之间的类似之处及互动关系。一些有关民族主义的定义,常常依靠的是对民族感情所做的主观/客观二分法,或者常常有赖于民族想象力以及好的民族主义与坏的民族主义的对抗——总之都是一些关于民族主义的不得要领的而非互动性的属性。很多学者则已被有关民族是实在性的还是人为制造出来的(Eley and Suny 1996),以及民族是否与语言、种族划分抑

或共同群体相符的问题,搅得心神不宁。而我们虽避开了有关主观/客观之争,以赞同民族是想象出来的,但同时我们也认为,比起民族主义在不同政治情境中与其他冲突以及其他政治形式——既有指定的,也有斗争性的——之间的互动来,这个问题就不再是那么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了。

最笼统地说来,民族主义包括两个密切相关的要求,它们是:各不同民族有权拥有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统治者有权将民族的文化定义强加给这些国家的居民们。民族主义政治由此而分为两种相互依赖的形式:目前尚未掌握他们自己国家的自我认同的民族成员们,企图赢得建立独立国家的种种尝试;以及统治者们在使他们关于民族利益与文化的定义成为在其统治的领土范围内占优势的定義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显而易见的是,在每一情形中,政治争端都既关系到谁有权去掌握何种领土,又关系到谁有权代表民族说话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我们追随着哈斯(Haas 1986)而从以下这些定义出发,以继续我们的探讨:

一个民族 即是一群声称他们是由一系列使其区别于外人的特点统一起来的个人,他们或则努力造就或则努力维系他们自己的国家。^①

一个民族国家 是一个其居民声称他们属于一个单一的民族,且愿意继续作为一个单一民族而存在的政治实体。 229

^① 哈斯使用了修饰语“社会性动员的”(socially-mobilized),而由于该修饰语和我们所采用的术语“动员”有所重叠,因此我们宁愿避免使用这一术语。不过,鉴于哈斯的学说中包含了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相关且导致理性化的观点,该修饰语对于哈斯的理论便是至关重要的了。

民族主义 是由一群人所提出的一种主张,这些人的主张是:他们应该构成一个民族或者他们已经是一个民族。

不过,这一属类范畴又分成:

- a. 民族感情,一种认为位于类别界线一侧的人们应当拥有在未来某一时刻实行自决的权力的主张。
- b. 民族意识形态,是一群作家和行动主义者所鼓吹的关于一个民族的许多论点和观念,其中包含着达成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纲领;以及
- c. 一个民族神话,当一个民族国家成功地得以创建时,为大多数公民超越其政治分歧而接受的关于一个民族国家的核心观念和主张。

一种民族主义运动 (在此,我们对哈斯的定义做了补充)是一场在(a)持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行动主义者与(b)国家和/或其他群体——它们不是反对这些人的要求,就是对其要求漠不关心——之间的斗争。

语言、族群性与民族主义

哈斯在把我们带到这一步的同时,却并未将民族主义无可挽回地与语言或者族群性紧紧地拴在一起——尽管它们常常也被作为民族感情、民族意识形态、民族神话以及民族运动的内容。不过,和民族主义本身一样,语言和族群性的中心地位是偶然的,并且是与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相连的。经由斗争政治,语言、族群性抑或种类独特性的其他象征,变成了被动员起来的政治认同形式。

以语言为例,根据一则古老的讽刺说法,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拥有自己的军队的方言。至少,就欧洲过去几个世纪的经历来说,这种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其因果关系却未必如此清楚,当某些语言群体创建国家并赋予国家以军队之际,另一些语言群体则形成并巩固了其时已被宣称是国家边界及军队之源头和正当理由的民族语言和文化。在诸如法国、英国和意大利这样一些国家里,被视为标准用语并得以在学校教育中被传授的语言,变成了最受欢迎的交流工具,而一些不足道的兄弟语言诸如布列塔尼语和奥弗涅语、威尔士语和康沃尔语、西西里语和拉地诺语,则衰落下去了。在欧洲大陆的东部,一小群知识分子则从某些古老的方言中,造出他们的“民族”语言并把它们想象成悠久而永恒的语言。 230

不论某种共同语言的存在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建立是如何重要,那种认为每个国家都拥有一个单一语言群体的观念,却无疑是一个相当晚近的观念。尽管对单一语言制(monolingualism)的偏好到1800年已在欧洲出现,但在随后的五十年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没有就此做出什么过分之举;而对于19世纪早期的一些民族运动来说,比起担心语言上的一致来,它们更担心的是民族的生存能力(Hobsbawm 1990: ch. 1)。如果说存在着某些将一群人划分为一个民族的一致评判标准的话,那么,它们便是如下三者:与某个现存的国家或者某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存在着历史性的联系;存在着一个久已被确立的文化精英阶层;或者“一种被证实了的征服能力”(Hobsbawm 1990: 37—38)。所谓不同国家应按不同的语言来界定的原则,既不见载于历史,也未获见于自然。

把语言纳入国家权力之中的做法也并不总是盛行。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和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和他们的贵族说话时,

用的就是法语；而满族人则长期保留着中国清朝统治者的秘密语言。加富尔说起法语比说意大利语感觉更舒服，而两西西里王国的统治者最感惬意的便是用那不勒斯当地方言说话。甚至到今天，法语、意大利语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罗曼什语与德语（它本身与瑞士德语方言的许多当地变种结合起来）一起，仍同样被作为有充分资格的语言而得以在瑞士盛行。瑞士的实践显示出了语言在作为民族划分标准时所具有的偶然性质。

实际上，少数民族语言也并不是以同样的速度，从所有已完全确立的民族国家中消失的。西西里语和威尼斯语，作为家庭语言在统一后的意大利便继续存在了好几十年；而在许多新近独立的国家里，一种“2+/-1”的语言方案也似乎正在出现，人们预期会在这些国家流行的语言同质化现象却并未发生（Laitin 1992, 2000）。至于在欧洲主要民族国家以及源于欧洲的一些民族国家中，则仅有法国和以色列保有对语言纯洁性的迷恋。

类似的模棱两可也出现在族群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方面。族群性是一种对共同起源、共享文化以及相互联系的命运的建构性主张，然而，与民族性不同的是，它决没有为它的追随者提供必要的政治立场，且与民族性之间保持着一种不断变化的和非本质的关系。“民族主义与族群性是彼此相关的，”斯蒂芬·科内尔和道格拉斯·哈特曼写道，“但它们并不相互等同，使民族主义最清晰地区别于族群性的，是它的政治性议程”。（Cornell and Hartman 1998:37）和其他的认同一样，民族性和族群性指的是一些社会关系而非个人特征，它们所依赖的是一些社会性地组织起来的范畴，并且包含着一些集体性权利和义务主张。

在族群性问题上，对于权利和义务的要求存在着程度和种类上的变化：从对血族关系的承认直到合法挑选出一些人予以特殊对待，其做法或是消极的也或是积极的。民族主义知识分

子、教士、语言教师、官僚、士兵以及寻租者们,都曾经在种族问题上表现得雄心勃勃,试图通过将种族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而使其提升为一种民族性;另一些人则已经把族群性建构成某个他们希望按照他们自己的想象而建立起来的现存国家的基础;还有一些人则真诚地将其忽略,而把民族认同建立在一些源于共同生活的标准上,建立在对邻人的共同怀疑抑或国家所确定的边界上。

建立国家与民族性

然而,在民族性问题上,权利和义务却使某一类别边界——某一国家之边界——一侧的人们相互联系起来,并且也使人们与保卫边界的国家代理人联系起来。其实,并非所有的民族性建构过程都是有目的行动之结果,许多民族性建构过程都不过是国家制度性发展抑或民族扩张的产物。早在“民族主义”一词被发明出来之前,一些拥有高度能力(high-capacity)的国家与一些高强度(high-intensity)经济体的兴起,便已经重绘了世界地图。这一对孪生的过程,既使民族语言得以标准化,又强使其中的几种语言成为商业活动和建立帝国的工具,将许多被广泛使用的语言逐出公众生活之外,并且制造出其中大多数居民只说一种得到承认的语言的庞大领土来。就在它们造就出统一而标准化的公民及其职责之际,国家也造就出民族语言来;而就在国家造就出民族语言之时,得到全国性确认的文化形式也就逐步发展起来;最后,就在这些文化形式被造就出来之际,其他一些文化形式则被归入到族群性、方言和民间传说一类的范畴了(Duara 1996)。

19世纪的欧洲人追随着一种早已由征服性的法国人——

这些处在扩张主义革命政权以及拿破仑政权统治下的法国人，鼓励当地的爱国者团体效法法兰西民族举行起义——所确立的模式。当起义取得成功，这些法国人便在被征服的领土上建立起法国式的政府，不过，到这个时候，他们则不仅不愿激起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也不愿赋予它们以真正的自治了。然而，建立
232 民族国家的运动却具有传染性，当法国人撤退、旧政权复辟之后，一小群共谋者——他们当中许多人是以前曾为法国人效力的行政人员——则利用了共和主义和民主的思想。在一个“机遇螺旋”以及仿效的经典实例中，由国家领导的(state-led)法国民族主义，导致了寻求建立国家的民族运动在那些其领土由法国所确定的地区产生，并通过与产生出新国家相同的过程而导致旧国家的瓦解。

由国家领导的民族主义以三种方式引起寻求建立国家的民族主义：

首先，通过在居住于一个民族化的国家周围地区、具备文化独特性的人们当中，产生出抵抗力量并引起他们提出自治要求的方式。

其次，通过使邻近一些国家中文化上与之存在联系的公民改变政治信仰，或者至少为他们的志向提供支持的方式。

第三，通过向那些处于无国家状态的可能的民族国家之可能的领导人，提供他们所钦羨的清晰可见的、有益的国家状态模式的方式。

一些形式更新的、国家领导的民族主义接着又出现了，它们通过把它们自己的话语与一些现存国家——诸如萨伏依王朝统治下的皮蒙特—撒丁王国以及老沙皇帝国——的合法性及其军事、

行政资源相结合,而与寻求建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展开竞争。

在欧洲内部,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为两种民族主义提供了多种机遇。前一种(国家领导的民族主义)威胁着一些传统国家和帝国的霸权,部分地导致了它们的崩溃,部分地——像在土耳其帝国那样——则导致了它们被重新定义为民族国家。在欧洲之外,同样的国家形成模式日益在美洲和东亚取得支配地位。寻求建国的民族主义导致了国家的解体,并且导致王朝国家和帝国被重新定义为民族国家。从本章选取分析的两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民族主义的互动来。

民族主义与斗争

那么,所有这一切又与斗争政治有何干系呢?尽管你未必能通过阅读大量有关民族主义的著作而了解这其中的关联,但它们与斗争政治之间的确有着许许多多的干系。

233

更多地是由于思想风尚而不是由于历史或政治方面的缘故,研究民族主义的传统学人诸如海斯(Hayes 1966)和科恩(Kohn 1955),还有他们的现代继承人如安德森(Anderson 1991)和巴利巴尔(Balibar 1991),都集中于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民族主义。他们几乎从不费神去对哈斯所谓的民族感情、意识形态以及神话加以区别,他们已热诚地忽视了民族主义斗争的政治,以及它与其他形式的政治之间的相互交叉。在传统主义者那里,这采取了研究民族主义理论家们明确表示出的意识形态的形式,尽管民族感情也常常被加以细究。

而在现代主义者那里,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民族主义,则将感情、意识形态和神话冷淡地合并于社会建构主义的框架之内。与始终聚焦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传统派不同,在研究民

族主义的现代学者们那里,人们经常难以分清究竟是谁在从事建构——是意识形态和运动,抑或是分析家们自己!至于社会建构是发生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他们的教室里,还是发生在与重要的其他¹的互动中,在这两种情形中并不总是很清楚。在斗争出现的地方,“文化战争”便取代了政治斗争(Smith 1996: 123),民族主义也便从政治当中被排除出去。马克·贝辛格由此评述道:“通常,建构主义从不对这样一些方式——通过它们,集体行动本身可能构成了民族性——发出质问。”(Beissinger 即出著作:10)

这类有关民族主义的著述还对斗争政治范围进行区段分割,而这是我们所拒斥的。来看一下我们所举的第二个案例:苏联的解体,马克·贝辛格写道:“公开性(Glasnost)并不是作为民族主义的爆发而开始的,但它还是被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了。……民族主义在公开性时期的第一次大爆发,差不多是在公开性已经开始了一年半之后的事情……而且这一次民族主义大爆发,也与那些最终成为主导民族主义运动议事日程的分离主义问题毫不相干”(Beissinger 即出著作:47)。如同贝辛格的著作所表明的,通过把民族主义与其他形式的斗争联系起来,而不是把它隔离起来专门对待,我们将会对民族主义有更多了解。

在此,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对整个世界的民族主义做通盘考察,而是要从总体上使民族主义与斗争政治更稳当地联系起来。为做到这一点,我们选取两个殊为不同的案例——处于民族统一前夕的意大利和摇摇欲坠、处于解体边缘的苏联,从其各自的民族主义运动背景开始我们的叙述。

当意大利在19世纪60年代走向统一时,它从未考虑过除意大利语以外的语言问题,其行政管理模式的设计,则旨在将意大利众多分散而互不联系的小邦并入皮蒙特王国。这个新出现

的民族国家采取了中央集权的形式,但它同时也是软弱无力的——如果其他的情形不变,这一点就会和人们所曾料想的一模一样——软弱到足以引起外围的憎恨和动员浪潮。然而,尽管革命一词在 19 世纪 60 年代的意大利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词 (Grew 1996),但地方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却表现得相当软弱且只是零星发生,甚至 20 世纪 60 年代的抗议周期,也并未导致严重的地方反叛。在缺少一个强大国家的情况下,意大利是如何使得一个有欠整合的半岛与两个独特的岛屿文化团结在一起的?这个难题则只有通过对国家建立过程中的政治互动,以及对建构新国家和维持民族统一所仰赖的机制的探究,才能得以解决。

相反,在苏联存在的七十余年时间里,苏联则将它下属的许多地方政府,按照民族原则组织在一起。一些地区如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被按照当地人口中占多数的某个民族的名词而加以命名,而这些“名义民族”(nominal nationality)的语言则被赋予形式上与俄语同等的地位。接受莫斯科培训的党的干部和行政干部都是从各地区的主导民族中招募的,地方上的委任制度也建立在种族基础上。在苏联解体之际,以民族原则组建起来的地方政治组织,则纷纷变成了向各个继之而起的国家提出领导权要求者,这些地方政治组织同时也使起重要作用的语言俄语的作用问题,成为除俄罗斯之外的各个后苏联国家政治上引起争议的问题。

曾经有一个民族神话在庞大的苏维埃帝国四处出现过吗?民族感情——既有从以前继承下来的,也有因苏维埃民族政策而建构出的——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能在苏联国家虚弱时迸发而出吗?抑或是那些由莫斯科培养来统治他们所在地区的共产党组织的干部(apparatchiks),在斗争过程中转变成民族主义者吗?一度硕大无朋的苏维埃国家在少数民族语言群体面前

何以变得如此脆弱,这在许多方面恰成为软弱而分散的意大利国家何以形成的反题。下面,让我们从较早发生的事件开始说起。

意大利:没有霸权的建国经历

235 当意大利在 19 世纪 60 年代走向统一时,皮蒙特国王维克多·伊曼纽尔和他的首相加富尔并未采取迁就意大利半岛以及两个岛屿上的异质力量的办法,而是选择了法国式民族主义的做法,兼并了该国的其他地区。他们不能容忍与被兼并地区各式各样的行政及文化传统达成妥协,结果则激起了意料之中的风暴:在仍旧处于教皇控制下的罗马,一些人阴谋策划让波旁王朝重新回到那不勒斯,并向大陆南端有组织的盗匪提供资助。在西西里,一种事实上的戒严状态是当地的新统治者控制农民暴力、共和主义及盗匪活动的唯一可用的方式(Riall 1998)。不过,除增加了威尼托区(Veneto)、教皇领地以及在一战中所获取的若干领土外,今天的意大利地图依然与在 1861 年时的情形颇为相似。

大多数关于意大利民族统一的讨论,都不出所料地开始于对马西莫·达泽格里欧简练的格言的复述,马西莫·达泽格里欧的这一格言是:“我们已经造就出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造就出意大利人来。”不过,此一说法所具有的欺骗性与它所具有的启发性不相上下。其所以具有启发性,是因为它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的确,1860 年以前,生活在意大利半岛以及两个主要岛屿上的大部分人,几乎不知道意大利,也极少有人说意大利语;而其所以具有欺骗性,则在于这一格言所蕴含着的这样一个未言明的假定:存在于 1860 年之前的意大利的这种事态是不同寻常

的。实际上,当我们考虑到很难在大多数未来民族国家中发现大众民族主义的踪影这一情形时,意大利的所谓独特性便成了颇具相对性的“独特”之处了。意大利民族统一的形成,是利用各种资源、机遇以及机制——它们赋予了意大利国家自那时以来所具有的持久性及其弱点——而达成的结果。

这里,经典社会运动研究范式可以帮助我们看出促成意大利实现统一的一些资源和机遇,主要有如下四类:

1. 意大利的统一结合了国家领导的民族主义与寻求建国的民族主义:加富尔和维克多·伊曼纽尔已经拥有了一个他们想要使之得到扩大的国家;马志尼则想要创建一个“此前并不存在的”国家;而反对波旁王朝的南方人,尤其是西西里人,则拥有一个他们想要摆脱其统治的王国(Riall 1998;Romeo 1963)。特别是在西西里,接受一班外国统治者(维克多·伊曼纽尔的皮蒙特—撒丁王国)的运动,因另一班外国统治者的垮台(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而得以推进。
2. 皮蒙特—撒丁王国的计划得到了欧洲大国的赞成(Lyttleton 1991:232;Mack Smith 1985:chs. 2—3)。加富尔能够操纵利用皮蒙特—撒丁王国的一些邻国:法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相互对立与竞争,也能够利用英国对于在地中海地区建立一个抗衡其竞争对手法国的强大国家所产生的兴趣。 236
3. 意大利的知识分子和职业精英拥有一种文学和行政的语言。意大利语——像许多民族主义的语言一样——“创造了一个介于拉丁语和口头方言之间的统一的交流与沟通地带”(Anderson 1991:44)。

4. 民族主义开始得到许多在 1860 年以前对民族统一的兴趣很成问题或者根本没有兴趣的人们的支持,同时,民族主义也是下面我们要加以探讨的斗争事件的产物,而不是其先决条件。

南部的革命

在有关意大利统一这个为人熟知的故事中,南部多半是被排除在主要行动者之外的。尽管北方的精英将南部贬作魔鬼居于其中的天堂,但在加里波第征服南部之前,当地即已爆发了一次有力的起义,而这次起义则在撤销对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之合法性确认方面,以及在新国家的形成方面,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次反对波旁王朝的革命的结果,则以特别尖锐的形式,体现出那些建构了新政治体的机制来。

在整个南部地区,贵族制的衰落、1812 年封建制从形式上的终结以及波旁王朝的土地改革政策,已经造就出一个新的地方性的中产阶级来。在南部各地,农民们几乎没有从波旁王朝的土改中得到什么好处,不仅如此,他们实际上还遭受着波旁王朝强制征收的可恨的“面粉加工”(macinato)税的盘剥。自 1820 年起,南部地区爆发了好几次暴力起义(多半是无效的)的浪潮——其中最为激烈的起义发生在 1847—1848 年。但西西里王国却有如某个英国笑话所说:是“三面被盐水而第四面被圣水所保护着(的地方)”。而它之能够存续下来,既是由于哈布斯堡王朝(1815 年之后亚平宁半岛的支配性力量)的容忍,也是由于西西里及意大利南部大陆有产阶级发生分裂所致。

在西西里,波旁王朝的改革在一群长期憎恨那不勒斯王国统治的孤傲的贵族近旁,创造出一个新的拥有土地的中产阶级,

这些人既憎恨为那不勒斯王国的统治效力,却又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条件去控制土地、操纵地方政府(Riall 1998:ch. 1)。主张自治与分离主义的情感,既受到地理位置上远离首府的有利条件驱使,也受到波旁王朝完全没有能力实施对该岛的有效统治鼓舞,同时还得到了岛屿东边的一小群民主主义者的激励。而使得中产阶级得以致富的同一场土地改革,却剥夺了农民在旧政权时期赖以生存的公用土地使用权。“到19世纪中期,”露西·里亚尔写道,“西西里的农民们已经变成了一支革命的力量。”(Riall 1998:57) 237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一种混合着不稳定和爆炸性的局面的出现,如同里亚尔所描述的,

它涉及的是一场发生在传统的和不那么传统的精英、自由派、民主主义者、自治论者、波旁王朝统治者、教士以及城市和乡村平民之间的多方面的、相互重叠的斗争……正是在西西里,反对波旁王朝的革命开始了,也正是在这里,政治与行政权威在1860年的垮台最富有戏剧性。[Riall 1998:27]

里亚尔的详尽描述为我们的看法提供了支持,我们的看法是:民族主义必须纳入与斗争政治或者其他政治形式的相互关系中来看待;民族主义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些事件,远远超出了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想象;并且,发生在建立民族国家过程中的斗争,是比一场“文化战争”远更明显可感的行动。事实上,许多民族主义是由并不具备民族主义自觉的要求与冲突之互动产生的。

在此,我们无法对这一段长期而复杂历史的所有细节加以

复述,因此,还是让我们聚焦于 1859—1861 年西西里所经历的一个简短周期上。在此一时期中,一方面,加富尔所采取的零星合并其他意大利小王国的政策,较此前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另一方面,加里波第和他的“千人军”,则因攻入西西里而令世人震惊;于是,加富尔——以一次出色却不乏嘲弄意味的先发制人的攻击行动——下令皮蒙特王国的军队向南部进军,表面上,这次进军是为了阻止加里波第的红衫军进入教皇国,而实际上却是为了控制加里波第所造成的革命形势。这里,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一事件的核心部分上:加里波第征服了西西里,这一行动触发了社会的和政治的冲突,但随后的结果则是,加里波第所赢得的胜利成果被加富尔据有。西西里斗争中的主要群体包括:支持加里波第的民主主义者,追随加富尔的自由主义温和派,利用加里波第进入西西里的机遇攻击地主的穷人,以及西西里的中上层阶级——他们最初本能地赞成自治,但最终还是成为加富尔合并政策的支持者。这些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则使得那些导致意大利统一实现并导致产生意大利民族国家诸多特殊性的机制显现出来。

1860 年的西西里:一起斗争事件

就在 1859 年到来之际,还很难看出加富尔和维克多·伊曼纽尔会成为整个亚平宁半岛尤其是西西里这一独特岛屿文化的统治者。鉴于奥地利人在米兰和波河流域设有堡垒,而一支法国驻军则保卫着教皇领地,因此,加富尔当时所能够制定的目标,不过是要把奥地利人逐出波河流域,并让皮蒙特取得对伦巴底—威尼托地区的控制权而已。加富尔为此在 1859 年通过挑起一场与奥地利(当时正值奥地利国力最为虚弱)的战争,并通

过挫败梦想建立共和国的米兰激进派,而实际展开了行动。加富尔此举得到了多方的支持,一方面,通过答应将尼斯地区割让给路易·拿破仑而赢得了法国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加富尔的这一行动打击的是普鲁士的竞争对手奥地利,因此也得到了普鲁士的支持;而由于英国希望看到一个独立的意大利起到平衡法国势力的作用,因此,英国也对加富尔此举表示了支持(Smith 1954:1)。

至此,所有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个小国试图变成一个为其他强邻所默认的中等国家的努力——这里,既没有斗争政治的影子,也几乎不见民族主义的征象。不过,素以机会主义者闻名的加富尔,却通过鼓励意大利中部各公国的民主主义者借民族主义之名举行公民投票,而将这些公国并入撒丁王国。这样,每一次兼并行动都采取被人戏称为加富尔的“朝鲜蓟”策略,而把一小块、一小块的领土零星添加到那个现存的国家——皮蒙特——撒丁王国——之中(Smith 1954:50)。马志尼所追求的通过一次强烈发泄式的民族起义而创造出一种意大利认同的梦想,则似乎在这种渐进的领土合并过程中被逐步消解了。尽管一向谨小慎微的加富尔仍然把意大利统一视为不切实际的狂想,但那不过是发生在加里波第远征西西里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冲突与要求出现之前的事。

西西里是意大利统一中“王室征服”模式的一个很大例外。在此前三百年的大部分时间受那不勒斯王国统治时期,西西里曾经有过两次短暂的宪政自由经历:一次是在拿破仑垮台与波旁王朝复辟期间,另一次则是在1847—1848年间,当时,西西里的资产阶级扮演了引发1848年欧洲革命的领导角色(Romeo 1950:306)。鉴于西西里是——或者说把自己看成是——那不勒斯王国的殖民地,因此这次革命便带有强烈的分离主义意味,

而把传统的自治论主张留给了该岛的各上层阶级(Riall 1998: ch. 1; Romeo 1963)。这次革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西西里的知识分子开始重述该岛一再遭到入侵的悲剧性的光荣历史,并且开始出版用西西里方言编纂而成的词典。然而,此时的西西里还几乎没有人严肃地思考过要为皮蒙特王国的维克多·伊曼纽尔而举起意大利民族主义旗帜的问题。

239 不过,尽管随加富尔征服中部意大利而来的城市起义与受到非法操纵的公民投票无异于王室政策的点缀,但加里波第之攻入西西里,他之迅速进军全岛,以及伴随他抵达巴勒摩而起的政治斗争,却构成了一个造就新认同与锻造新联盟的戏剧性的斗争周期。受城市中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自发起义与农村中备受苦难的农民反对地主和波旁王朝的起义激发(Riall 1998: ch. 2),一批 1848 年革命的流亡者回到岛内,他们充当了与山野中结伙造反的人们建立联系以及在城市中组织革命活动的传教士式的角色。而随着起义从巴勒摩扩散到其他主要中心城市并最终进入农村;这些革命的使者便极力敦促加里波第发动他的远征行动。

由于没有加富尔的支持——实际上,他还下令让皮蒙特王国的海军阻止这一行动,同时也由于加里波第所率领的军队是一支由马志尼党人、共和派、民主主义者、失业知识分子和冒险家组成的乌合之众,因此,加里波第在马沙拉(Marsala)的登陆——与早先发生的起义无异——正在失去其动力。但登陆行动的消息不仅引发了一场范围更大的农民起义,也激起了主要城市中的起义,助长了地方政府的崩溃与通信中断,并且因此而最终导致波旁王朝从西西里岛撤退至大陆。

像发生在世界上的许多民族主义事件一样,西西里革命也决非对于一场民族革命的同质想象,它是一次包括了许多其目

标远非民族主义的行动者,以及另一些只是在斗争进程中才变成民族主义者的行动者在内的斗争政治浪潮。聚集在加里波第和他的“千人军”周围的西西里人,有着各不相同的立场,怀着多种多样的动机:有反对波旁王朝土地改革和税收政策及其强行夺去西西里岛自治的贵族们,有寻求建立代议制政府的城市中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还有希望身着红衫的加里波第会成为使其从地主压迫下得以拯救的解放者的穷苦农民,以及许多当地持有土地和保有官职的机会主义者——这些人一旦发现加里波第似乎胜利在望,便立刻背叛摇摇欲坠的波旁王朝,投向加里波第。而那些把建立一个进步与自由政府的最大希望寄托在皮蒙特王国身上的自由民族主义者,在斗争周期开始之初,却几乎未见踪影。

在加里波第担任西西里的“独裁者”以及随后皮蒙特王国设立临时机构(Luogotenenza)时期,这些各不相同的立场终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冲突的产生。在农民们寻求土地所有权、民主主义者期望建立一个立宪会议——它可能从加富尔那里为西西里赢得较优惠的条件——的同时,自治论者却在寻求建立一个西西里国家,土地拥有者们则想要维持——或许增加——他们在当地的权势。结果,自治论者、民主主义者和农民全都以失败告终。就自治论者而言,加富尔曾经暗示,一旦西西里的选民赞成与皮蒙特合并,他会友善地对待地方自治问题,但如同后来的结果所证明的,加富尔此番暗示不过是虚伪的表态;民主主义者同样被合并行动——它使南部和西西里附属于皮蒙特王国中央集权的政府结构——所击败,他们的失败同时也是由温和派从他们内部成功分化出去所致(Riall 1998:127—128)。

240

至于说农民,加里波第的政府——尚在着手赢得对大陆南部的控制——则在他与当地的土地所有者阶级联手消灭无政府

状态时,抛弃了他当初对农民许下的把土地分配给他们的诺言(Riall 1998:89—90)。而当地的这些土地所有者阶级,则利用被他们轻易垄断的拍卖教会和波旁王朝土地的机会,以扩充他们自己的权力、财富,并通过支持合并以阻止农村地区出现的无政府状态。尽管当加里波第在西西里登陆时,还几乎没有人具备意大利民族主义的观念,但是,对混乱无序状态的担心,却使他们汇集到皮蒙特王国的统一事业当中。如同兰佩杜沙笔下的少年英雄坦克雷迪告诉他那位贵族叔叔时所说的:“倘若有如我们这般的人们不介入其中的话,那么,其他人[亦即黑手党成员和那些胡作非为者]将会带给你们一个共和国。”(Tomasi di Lampedusa 1960:42)。就这样,在当年10月举行的一次公民投票中,赞成与皮蒙特王国合并的意见终于赢得了压倒性的多数。至此,一个几乎不曾被想象过的意大利,作为一场充斥着阶级冲突、恐惧、野心、不确定性以及军事实力较量的复杂游戏之结果,而最终变成了现实。

西西里人为何如此迅速地接受了合并?他们是被加富尔的温言软语所征服?抑或是对加里波第时而声势颇壮、时而犹疑不决的行动方式感到气馁?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断然没有显示出对意大利的深爱!由于社会分裂似乎会对财产造成威胁,因此,加富尔的一些代理人(无外乎通过鼓励反对加里波第政府的示威活动的方式),从那些被农村和城市起义吓坏了的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群体中,赢得了对合并政策的支持。经由一段斗争插曲,以当地民众起义和由民主主义者领导的游击战形式而开始的一切,终以岛内精英打着公民投票的幌子而予以支持的王室征服的方式而告结束。就像兰佩杜沙笔下的那位少年英雄在对他叔父所说的另一段话中所言:“倘若我们想要使一切维持其现状不变,则改变一切便是必要之举了。”(Tomasi di

Lampedusa 1960:42)

随着在西西里和大陆南部地区的掌权,新政权便把皮蒙特王国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以及行政管理上的中央集权制,严格应用于这些被征服地区。此外,新政权还发动了一系列无情的军事打击行动,对农村地区的盗匪活动与波旁王朝支持者的活动予以镇压。在大陆南部地区,一些支持叛匪的村庄被整村地予以毁灭(Mack Smith 1969:55—59);在西西里,新政权也发动了一系列军事行动,以摧毁当地抵制统一的力量(Riall 1998:chs.5—7)。结果,1866年,一场全面展开的城市和农村起义爆发,起义得到了波旁王朝拥护者、民主主义者、城市穷人和农村地区的盗匪的支持(Riall 1998:ch.8)。

不过,比采取军事行动更多的则是推行一体化的整合措施:一种现代财政体系,外加皮蒙特王国因对奥地利战争而欠下的沉重债务所具有的破坏性影响,被全数加在了这个缺乏现代经济资源的地区之上(Remeo 1950)。自由关税联盟则打开了北方商品向南部渗透的大门,此举扼杀了波旁王朝创办的为数不多的几家新生工业,并在使巴勒摩这座首府城市沦为一座地方性城镇时,毁了许多巴勒摩商人和工匠们的谋生之道。1866年西西里起义喊出“共和国万岁!”与“宗教万岁!”的口号这一事实,显示出新政府在西西里岛所拥有的统治基础是多么地狭小(Riall 1998:207)。

但一种特殊形式的整合,带着对西西里和南部地区在统一国家中所处地位的深刻影响出现了。自加里波第政府建立之时起,出于建立新政权、征税及控制农村地区混乱秩序的实际需要,新政府将那些此前既不支持民主主义者也不支持温和自由派的当地精英引入民族事业之中。除了为一种残暴的土地所有制提供保护外,这些当地精英还从对当地和该地区政府的控制

中,获得了日益增加的报偿。在一些城镇,当地的统治精英基本是由同一家族的成员组成,他们为发财致富而串通一气,并合谋将他们的政敌排除在外(Riall 1998:95—100)。如同里亚尔指出的,由加里波第和他的继任者任命的这些新的地方官员们

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追求实施的是他们自己的独立政策而不是执行巴勒摩政府的指令……一些地方长官甚至利用他们握有的大权追求其个人目标……那些在波旁王朝统治时期担任过选举人、十人长、市长、副市长的人们,甚至一些有名的间谍,如今却成了民主主义者领导下的新政权在当地设立的政府委员会的主席或成员,或者成为国民卫队的指挥官。[Riall 1998:95,96,99]

由于起义行动所构成的挑战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而警察和卡宾枪手却似乎无法对付这些起义,因此政府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得将带有各种意识形态色彩的当地精英吸纳到政府内部。此举所造成的后果在1866年起义爆发后达到顶点,当时,巴勒摩的警察头子“恢复采取了与犯罪分子合谋串通以维持公共秩序这一波旁王朝的老做法”。对西西里乡村地区的精英们来说,“控制和操纵当地政府,成为维系他们在当地所拥有的权势的关键”(Riall 1998:227)。这种状况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力量及其合法性,甚至当它增强了当地精英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性时也是如此。

直到1876年,议会左派才在德普雷提斯的领导下开始掌权,不过,到此时为止,议会左派只是靠着与右翼势力作对,靠它对权力和地位的渴望(Lyttleton 1991:223)以及对皮蒙特王国霸权的憎恨,才得以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派别的。德普雷提

斯的势力主要是在南部地区,那里,通过当地官员对选举活动的干预,加之一些右派议员为换取恩惠而“转变”为左派的支持者,更兼有与当地精英之间达成的一系列交易,结果是那些曾被右翼用以恢复秩序的策略,变成了一种具有某种共识的机制。不仅来自左翼的民主主义者和马志尼党人以及各派天主教徒,而且右翼保守党人——当然还有那些寻求地方自治的人们——都普遍感到,他们被一个几乎不曾实现那些曾经为之奋战者的愿望的政权出卖了。到19世纪70年代,我们再也看不到用西西里语编成的词典出版,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已经产生出一个没有多少权威的国家,并且,通过建立附庸关系、提供报偿与保护的方式,这个国家已经使原本会起而反对它的西西里精英与之联系在一起了。

统一的各种机制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让我们所讲述的故事就此打住,因为我们已经表明:意大利的形成,既不是通过一场所谓的“文化战争”,也不是通过一场显然属于民族主义性质的运动,而是经由那种将政治和军事行动、阶级冲突以及形式多样的斗争政治结合起来的组合方式而得以成就的。而这一事件是通过那些我们已从一些非民族主义事件中熟悉了机制,而得以被迅速推向高潮的。在此,我们将聚焦于会在本章第二部分的民族解体案例中再次出现的四个机制:机遇螺旋、认同改变、竞争和居间联络。

机遇螺旋

发生在故事的不同阶段中的种种——加里波第入侵西西里的惊人之举、加富尔所做的若干政策改变、西西里农民对土地的占领、自治论者集结在合并政策的旗下——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不断变化与不断扩大的机遇这一为许多从事斗争政治研究的学者所熟悉的机制。机遇螺旋通过一连串的环境变化、对环境变化所作的解释、行动以及反动——这一发生序列在一个行动改变了另一个行动者的环境时会再行重复——而起作用。

1860年4月西西里起义所提供的机遇，使加里波第确信，他可以领着他的那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军队，去开始那桩对加富尔来说似乎是无望而危险的使命。而加里波第所取得的最初
243 成功，接着引发了农民的占地运动，导致警察和当地官员逃到城里并进而削弱波旁王朝进行顽抗的决心。于是，这一连串的成功又使得加富尔确信，他要利用西西里起义和加里波第入侵西西里所造成的双重机遇。对这一具有催化作用的时刻，麦克·史密斯熟练地做了总结：

这场民族运动并不是很强大，不过，它却在一个短暂的时段中与一场强有力的社会运动恰好重合。当[波旁]政府因每个村庄里的主要家族采取不合作态度而陷于瘫痪时，政治叛乱便和社会革命相互联手，并进而从巴勒摩蔓延至农村地区。这种情形接着又引起整个西西里地方政权的崩溃，警察则各自逃生，岛内一些家族之间的宿怨和社会上的各种怨愤也一时公开爆发，整个社会因此而很快陷入一种可以说是完全解体的状态之中。[Mack Smith 1954:9]

认同改变

然而,革命也并不是由各种机遇单独造成的:一种认同及从属关系的转变过程,也因1860年4月和5月所发生的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件而被触发。尽管在加里波第发动远征之前,还几乎没有人相信意大利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到1860年4月底,英国驻那不勒斯的公使就做出了这样的评说:“与皮蒙特王国合并以及一个单一意大利国家的观念,在过去六个月里已取得惊人的发展。”(引自Mack Smith 1954:8)当然,这种观念想必不曾对大量无地的西西里农民——他们更为关心的是社会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产生过多少影响,但他们的起义行动却有助于推动许多有财产的西西里人从自治论者转入保皇党阵营。

加里波第最初的做法是为了争取农民的支持,“但他很快便发现,要使自己在政治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唯一的选择却在于赢得地主们的支持”(Mack Smith 1969:42),而地主们则为了寻求保护以反对他们自己领地上的农民,已然纷纷投靠到持合并主义立场的一方去了。“因此,依照它自身的逻辑,一场原本源自农民起而反对土地所有者的运动,却以土地所有者反对农民而告终”(Mack Smith 1969:42),并且也因此以赞成合并反对自治而告终。持自治论立场的上层各阶级对于统一的意大利国家所具有的热情,很快将会因当局违背其地方分权的诺言而冷却下来,但在1860年的时候,这些人还是成了热心的合并论者(Romeo 1950:339)。

不仅西西里的精英阶层,甚至加富尔本人也同样为我们展

示了斗争政治在转变认同时所具有的力量。直到 1860 年,加富尔充其量还只不过是一名意大利邦联的支持者,此前,他一直把意大利统一视为一个充满着外国干涉和共和主义革命危险的马志尼式的幻想(Mack Smith 1954:23)。然而,当加里波第成功远征西西里的消息在北方渐渐传开,而从法国方面又传来不干涉其行动的承诺时,加富尔的态度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变,他称加里波第的远征为“本世纪最富诗意之举”,并且为加里波第派去增援部队、送去武器装备,以支持这场战役(Mack Smith 1954:29—30)。从这时起,加富尔便成了一名彻底的合并政策拥护者,他从此再也不理会波旁王朝,并且开始谋划着建立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国家了。

竞争

促使加富尔做出转变的动因,还不止于他对加里波第的远征壮举所表现出的热情,以及他对于领土扩张的热中。温和派与民主主义者之间的政治竞争同样也是在整个事件进程中发挥作用,且有助于推动谨小慎微的加富尔和维克多·伊曼纽尔转向一种更具攻击性政策的机制。“千人军”在西西里登陆的消息一传到英国,马志尼便立即悄悄摆脱监视他的英国警察并随即返抵意大利,他用一些富有战斗性的建议和设想激励加里波第的副手们,努力赋予整个运动以一种共和主义的吸引力。

对此,加富尔的顾问们立即做出了反应,他们力劝加富尔在支持加里波第远征方面比马志尼做得更多,否则便会冒让“红衫军”拥有实现其行动方案的广阔战场的危险。在西西里,加富尔的代理人拉法里纳则通过激起人们对社会革命的恐惧而努力削弱激进派的立场,温和派对于激进革命结果的担心,也驱使他们

采取一些过激行动,最终甚而导致加富尔采取进占教皇国的大胆步骤,加富尔此举既冒着令法国深感不悦之险,也使得天主教徒在意大利建国后的最初几十年间与这个新国家之间的关系显得颇为疏远。

居间联络

自加里波第担任西西里的“独裁者”时起,“中央政府与当地精英之间的关系,就倾向于更多地以短期性的、个人的获益为基础,而较少以公共服务或官僚政治理性的原则为基础”(Riall 1998:227)。这种情形,再加上反对派被宣布为非法,就使得民族国家失去了其在西西里所可能拥有的合法性,不过,这倒是增加了当地精英对于中央政府的依赖性。二战后,这种状况则在基督教民主党构建的权力体系中得以更新和完善(Chubb 1982; Schneider and Schneider 即出著作)。皮蒙特的温和派为换取对合并政策 245 的支持而与西西里精英们之间达成的暗中交易,确立了一种带有依附性质的居间联络模式,它将在未来几十年间支配意大利的南北关系。

在本章一开头,我们曾问过“一个由一批分散而互不联系的小国构筑而成的虚弱而无能的政治体,是如何避免了地方分离主义的猛烈爆发的”。眼下,我们可以冒险提出一个以我们在前几章中所探讨的居间联络概念作为基础的假设。如同利特尔顿在论及统一国家中的南部政治阶层时写道:“他们构成了地方政治中的雇佣军……追随任何能够许诺给他们一份诸如市政办事员或税收检查员之类职业的人们。他们尤为擅长的便是充当中间人的一些技巧。”(Lyttleton 1991:234)那些上升到民族政治层面的人,利用其所控制的当地的一些受保护者作为他们手

中的工具,而成为南方与北方之间的中介人(Lyttleton 1991: 246; Salvemini 1955:383—404)。

那些经由与北方政党领袖们进行联络而能够实现其个人及政治方面目的的精英们,或许可以成为蹩脚的爱国者,但他们几乎不可能具备追求自治论的或地方主义的计划——它们或许会再一次引发乡村革命——的动机。利特尔顿总结说:“由于缺乏真正的大众基础,且与当地带有依附性质的旧代表形式相结合,因此,自由派的策略基本上成了某种形式的居中调停。”(Lyttleton 1991:250)

机遇螺旋、认同改变、竞争以及居间联络,是一些在创建一个统一国家过程中起作用的机制,这个国家则是一个将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置于一个充满地方性差异的社会之上的统一体。倘若事情真的都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这种种差异早该导致周边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一再发生了。

然而,与之相反,这些差异的存在实际产生的却是一个没有霸权的民族国家。像葛兰西和萨尔维米尼这样的一些批评家,对这种弱的整合模式所付出的明显代价及其明显的机能不良——尤其是这种模式的整合是通过精英的中介而发生,且鼓励腐败,在一些边缘地区甚至还与犯罪行为混在一起——提出了批评(Schneider and Schneider 即出著作)。这种整合使许多普通南方人沦为深受土地所有者、黑手党以及腐败政客们之害的牺牲品。

把道德考量放在一边而从总体上看,意大利统一的这种模式,显示出的是一方面在合法化与国家具备强大实力之间、另一方面在国家的持久存在与国家力量软弱之间的一种折中。现在,我们再转到另一个例子上,在这一案例中,国家的实力很强
246 但最终却促成了国家的解体。

苏联及其继承者们

类似机制的运作在苏联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总体结果。在这个一度铁板一块的政党国家里,一种机遇螺旋迅速地经历了从自上而下自由化到民主运动、再到民族主义骚动、最后到分离主义和国家解体的发展过程。部分地由苏维埃民族政策所造就出的一些认同以及那种用来贯彻这一政策的共和国结构,很快转变成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共和国与共和国内部的一些小民族之间的竞争,以及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相互间的利益之争,则逐渐销蚀了中央政府对危机做出反应的能力。这里,也还有各种形式的居间联络——有些是从旧体制继承下来的,另一些则是全新的——填补了摇摇欲坠的中央政府所留下的真空。同样是在这里,那种在短短几年前似乎还不可能发生的情形,也开始被用一种后见之明的眼光看成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了。

不过,苏维埃的经历也提出了一系列与它的意大利对应物颇为不同的经验性问题,特别是:

1. 一个似乎如此坚固的、中央集权的、独裁的、资源丰富的政治经济体,如何在五六年之间就明显解体了?
2. 为何如此之多的斗争要求都是通过坚持种族、民族自我权利的形式而提出的?
3. 如此之多的旧政权时期的当权者,又是如何在大变革之后重新握有实权的?

要对过渡的关键时刻做出一以贯之的解释,就需要对此前所发生之事加以了解(Bunce 1999)。在以往我们对苏维埃所作

的描述中,我们夸大了民族政策较之对企事业和政党结构的控制所具有的核心作用。如今,我们并不声称是民族主义单独摧毁了苏联,而只是聚焦于那些赋予民族主义在苏联瓦解过程中以重要地位的机制。

苏联是在战争和革命的废墟上形成的。在一战中,它的帝国前任遭受了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重创,并失去了对波兰和波罗的海一些省份的控制。1917年,工人罢工、士兵叛乱与杜马(国民大会)的抵制行动相结合,终于迫使沙皇退位,一个由保守派和自由派组成的临时政府掌握了政权。不久,当布尔什维克领袖如列宁和托洛茨基等相继从流亡中返回俄国之际,由起义工人和士兵们组成的对抗政府(counter-governments)也正在各地纷纷形成。随后的斗争将多个政治派别和多种问题卷入其中,但到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已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具备了从临时政府手中夺取政权的充足实力。

1917年至1921年间,布尔什维克只是忙于维持昔日帝俄统治范围内的团结。列宁、托洛茨基及其合作者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通过把具有严密纪律的共产党(该党本身也部分地从退役或现役军人中招募新成员)安插在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官僚体系中,使国家回复到由文职人员控制的常态。而随着斯大林在1927年的全面掌权(以及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苏联则进入了一个超高速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官僚机构扩张和日益增长的党专政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带来的是一场巨大的人口冲击,和广泛的民族主义的自治要求,以及一次重要的将政治权力集中到中央的行动。与二战前相比依然未变乃至更甚的是,二战后的苏联经济和政体仍然依赖于这样三个要素的组合:(1)维持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2)在生活用品的生产和分配中,实行大规

模的劳动力协调与分工；(3)对所有政治表达实行严密的监视和控制。然而，就是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体系，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土崩瓦解了。

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在当时，苏联对1979年阿富汗左倾军事政变的援助，看上去就像是又一次不幸的冷战事故，但结果证明它对于后来的事态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美国源源不断地为阿富汗境内的各种反叛力量提供大量援助，苏联军队陷入了一种令人沮丧和屈辱的僵局之中。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则开始努力通过各种形式的分权和权力下放，以刺激经济的发展。1985年，持自由化立场的戈尔巴乔夫出任党的领袖，他不久便开始推行所谓的“改革”(perestroika)：一种使经济从军工生产转向民用生产，使其朝更多更好地生产消费品以及更高生产力方向发展的政策转变。戈尔巴乔夫还多少有些犹豫地推行了一套开放公众生活的计划——释放了一些政治犯，加速为犹太人办理出境签证，裁减军队，减少外部的军事介入，结束针对各种政治的、种族的和宗教的自治要求进行的暴力镇压。

生产和分配领域中央控制的减少，最终则开始促进：

- 小企业的激增
- 与外国资本家建立合作企业的尝试
- 长期把个人、家庭和企业联系在一起的黑市、灰色市场与互助网络更加公开地进行运作
- 上交给各中央组织的款项和商品大幅下降
- 将政府所拥有的各种证券和设备，转换成营利性的或者垄断性的私人分配网络，以使在任的经理们、头脑精明的企业家们以及那些对可欲的商品、设备或外汇已经享有

248

优先权的各类组织中的成员们从中得益

- 以私人性质的媒体和交流系统取代作为公共工具的媒体和交流系统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政府正在尝试开放并普及各民族市场之际,其结果是,中央政府给予其追随者以报酬的能力日渐下降,相应地,(由于从中央政府得到的报酬日减,)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经理们便因此而忙于史蒂芬·索尔尼克所谓的“纷纷向银行提款”。凡是存在他们能够将可变换的资产转变成使他们自己有利可图之物的情形,他们便变本加厉地这样去做,他们着手进行的是一场“盗窃国家”的行动(Solnick 1998)。这一过程到公开的民族主义运动变得显而易见时,已得到大大推进了。

在政治战线上,也发生了与之类似且互为依赖的中央权威的瓦解。戈尔巴乔夫推行其经济改革计划的结果,不仅疏远了那些曾经从重视发展军工企业中得益的生产者,而且也疏远了那些并不具备进入新的分配网络之一的现成手段的消费者,以及那些此前所拥有的权力现在遭受打击的官员。在一个经典的极化过程当中,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计划则为叶利钦之类的批评者和竞争对手们敞开了大门,叶利钦是一位从莫斯科基层组织上升到掌握俄罗斯联邦领导权的重要竞争对手。戈尔巴乔夫本人通过安抚、告诫与模棱两可的暗示方式,以求制约受到一定威胁但仍未被触动的军事和情报机构的努力,则在疏远了改革派的同时,也未能赢得顽固保守派对他的支持。在这同时,戈尔巴乔夫也企图获取使他能够得以放手推进经济转变的应急权力。此举则使他陷入与改革派竞争对手、政治自由主义者以及旧体制维护者之间的冲突之中。

尽管 1987 年出现了要求保证宗教和政治自由的强烈呼声,

但真正导致旧体制倾覆的,却是一股民族主义的和民族化的领导人争相取得财产和自由行动权以确保他们在新体制当中地位的热潮。在处置非俄罗斯地区的问题上,俄罗斯共产党一向采取的是指定各地的忠诚分子担任当地领导人的做法。他们把这些 249 这些人整合进共产党内部,从一些指定民族中挑选最有希望的成员作为这些忠诚分子们的继承人,并将他们安排在俄罗斯进行培训,同时也把许多俄罗斯人派往这些地区的新兴工业、行业以及行政部门中任职。俄罗斯语言和文化被作为行政部门和地区间交流的媒介而得以提倡,与此同时,非俄罗斯地区的当权者们则只要能够确保为国家提供岁入、各类物资和兵源,便被赋予在其统治范围内的充分行动自由以及中央政府所提供的军事支持。任何在该体系之外要求各种自由权的个人和群体,都被迅速予以镇压。只要地方领导人能够从中央得到强有力的支持,而他们在当地的竞争对手又不具备吁请民众支持的手段和希望,这种体系便能够有效进行运作。

这种体制所具有的力量最终证明也是导致它垮台的根源。戈尔巴乔夫及其合作者们所采取的,是将推进开放政治讨论、减少以军事手段介入政治控制、容忍与共产党相连的政治结构中存在多种选择、做出朝真正竞争性选举方向发展的姿态以及承认奖赏忠实追随者的能力下降同时并举的做法。当这一切发生之际,地方当权者及其竞争对手便突然获得了使他们自己远离中央政府、恢复争取民众支持、确立他们作为当地民众真正代表的有效资格、强调他们自己所属的民族在其疆界范围内具有优先权以及迫切要求新形式的自治的强烈刺激。在波罗的海几个共和国以及那些位于苏联西部或南部边界沿线的共和国中,与苏联之外的同源国家和权力机构——瑞典、芬兰、土耳其、伊朗、欧共体以及北约——建立特殊关系的可能性,则为它们提供了

苏联本身日益无法提供的政治影响和经济机遇。

时间地平线在快速地缩短。人们已不再能够指望从对现存体系的长期投资中得到回报,他们因此而转向短期获利或者干脆采取退出的办法。当戈尔巴乔夫为寻求达成一个新的同盟条约,赋予十五个共和国以更大的机遇但保留联邦政府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的优先权,而在1991年3月举行公民投票时,有六个共和国(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摩尔达维亚、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所有这些共和国都已开始了宣布其自身独立的过程)的领导人,对戈尔巴乔夫此举采取了联合抵制行动。对其他共和国来说,这种种结果则进一步证实了在俄罗斯与摇摇欲坠的联邦中的非俄罗斯部分之间所存在的分歧。而在苏联之外,250 一些资本投机家、发展经济学家、世界金融机构,以及像美国、土耳其、伊朗与欧盟之类的国家或国家联盟组织,则全都致力于采取各种行动和/或致力于遏制苏联动乱局势的外溢。

面对种族解体、经济崩溃、旧体制所掌握的权力日渐削弱,以及戈尔巴乔夫拒绝采取有力的镇压措施,许多身在其中的观察家和参加者们担心,军队、情报部门和共产党可能会试图逆转事态的进程。他们的担心不久即成为事实。1991年8月,一个其成员较为模糊的“紧急状态委员会”软禁了戈尔巴乔夫,但政变遭到叶利钦在莫斯科领导的抵制后以失败告终。在随后的四个月时间里,叶利钦试图继承戈尔巴乔夫的位子——不是作为共产党的书记,而是作为一个维持着大量经济、军事和外交权力的联邦的首脑,不过,甚至叶利钦的这种努力,也因苏联分化为一个轮廓不清且彼此争执不休的“联合体”(Commonwealth)——其中,波罗的海国家全体缺席,而另一些国家也开始急切要求退出——而作罢。

苏维埃政权一旦瓦解,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包括机会主义的

民族主义者叶利钦)便面临着一个严重的两难局面。一方面,他们声称俄罗斯人有权统治俄罗斯联邦——事实上,俄罗斯联邦还包括了数百万非俄罗斯少数民族在内,因此,他们的这种声言支持的是那种有名分的民族(titular nationalities,指出现在各共和国名称上的民族,以下译作“共和国民族”——译者),应当占有对联邦中其他民族而言的优势的原则。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对俄罗斯联邦之外的俄罗斯人——例如,在爱沙尼亚、立陶宛、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许多俄罗斯人——被作为低人一等的少数民族面临着要么被共和国民族同化,要么成为二等公民,要么移民出境的艰难选择提出强烈批评(Barrington 1995)。因此,一些新独立的邻国常常谴责俄罗斯联邦当局的帝国主义,也就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了。

马克·贝辛格所列的 1987 年至 1992 年整个苏联境内所发生的抗议事件目录,辨明了民众动员中的一次至关重要的转变。从 1987 年至 1989 年,抗议示威的数量迅速上升,然后在 1990 年达到一个顶峰,此后虽起伏很大但总体上却呈下降趋势。相形之下,群众性的暴力事件虽在 1989 年年中达到过一次小高潮,但开始强有力的迅猛上升却是在 1991 年,1992 年还常有此类事件爆发。到 1992 年,抗议事件的主要议题已经变成了共和国相互之间的边界划分问题(Beissinger 1998:294—305)。与此一转变相对应的则是另一场转变——一场从要求改革与要求民族代表权的大规模但相对和平的运动,向为争取民族权利而展开的激烈斗争的转变。像在意大利统一中所发生的一样,寻求 251 建立国家的民族主义(就那些寻求退出苏联的共和国而言)与由国家所领导的民族主义(就那些寻求在其领土范围内确立霸权的共和国领导人而言)发生了强有力的互动,不过,这种互动在这两个国家所产生的结果却截然相反。

斗争的各种机制

任何单一的斗争事件都不可能包含与其他任何斗争事件完全相同的机制——甚至在那些比我们此处提及的两个案例彼此更为相似的事件之间,也是如此。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内部的威胁与外部的机遇表现得比意大利统一过程中远更突出。不过,我们所提及的所有四个机制——机遇螺旋、认同改变、竞争以及居间联络——却是以更猛烈的方式在苏联解体中起作用的。

机遇螺旋

在苏联的情形中,几次机遇螺旋的出现前后相续。贝辛格在对民族主义斗争进行详细考察时,辨明了发生在苏联境内的分离主义动员的四个发展阶段(Beissinger 即出著作:141—144)。早在1986年,要求自治和保护呼声就不仅出现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乌克兰,而且也出现在哈萨克斯坦。这种现象的扩散或流传,部分地是由于波罗的海国家的有意劝导所致,但它的传播同时也是通过媒体报道和那些转而寻求国家资源以巩固其地位的精英们造成的(Beissinger 即出著作:139)。

这种互相仿效最初是以连锁反应的形式出现的:

由那些被当局拒绝移民国外的犹太人以及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发起的未曾受到压制的动员,影响到克里米亚鞑靼人当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做出举行一次抗议运动的决定,鞑靼人此举接着又影响到波罗的海地区的持不同政见者组

织示威行动的企图,而波罗的海地区的行动接下来又对亚美尼亚的行动主义分子的行为产生影响,如此等等,相继而发。[Beissinger 即出著作:48]

民族主义斗争的最早爆发严重依赖于先在的群体资源(比如人口规模、城市化),依赖于某些制度性的约束[比如,具有共和国身份的种族集团比那些不具备共和国身份的种族集团更可能参与其事]。但当斗争蔓延开来,这些结构和制度性因素的重要性便随之而逐渐消失,就像一些人数较少、城市化程度不高并且不具备共和国身份的种族集团,利用中央权力的日见削弱而争相仿效那些早期的起事者采取行动时所发生的那样。民族主义的斗争扩散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它不久就变得有如一次“潮汐”——用贝辛格的话说。如同一位苏联新闻记者在1990年所描述的,“有时,看起来仿佛整个国家都去参加一次集会、一次示威去了。”贝辛格总结道:“最终,民族主义斗争行动变得正常化,并且构成了一场巨大的民族主义分裂浪潮,它按照自身逻辑以多种重要方式而向前推进。”(Beissinger 即出著作:47—48) 252

机遇螺旋越出了纯粹斗争政治的范围,而及于精英阶层和经理人员的行为:先是通过争取那些中央控制不断减少的营利性和寻租式企业的外部支持,继而是那些在任的地方领导人及其竞争对手们对民族自治权利的直率主张;最后则是可变换的国家资源被任何可以将其席卷而去的人攫取。

认同改变

如果把先前的共产主义制度看成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整体,

那么,认同改变发生的速度之快便令人惊讶了。认同改变是随着那些共产党掌权时期的长期受益者,从与共产党及其传统保持一致转而赞成一系列临时性的替代物——其中,种族标签(包括俄罗斯民族)获得了日益增长的活动范围——而发生的。贝辛格描述了他在1987年对苏联摩尔多瓦地区所做的一次访问,在访问期间,当局为他和他的妻子指派了三名向导:一位称赞苏维埃制度的摩尔多瓦人,和一位对贝辛格本人的犹太身份表示怀疑的犹太人,以及一位“其主要目的似乎就是去监视那位摩尔多瓦人和那位犹太人”的乌克兰人。在经历了两年动乱后的1990年,贝辛格再次重返摩尔多瓦,他发现,那位摩尔多瓦人已经变成煽动民众的摩尔多瓦民族主义者,犹太人则已经移民至以色列,而那位乌克兰人也已迁回到(近乎独立的)乌克兰了。“在摩尔多瓦的这些遭遇,”贝辛格总结说,“是大规模的自我重新想象——它构成了苏联在其最后几年里的特征——的一个隐喻。”(Beissinger 即出著作:ch. 4)

竞争

竞争是在两条战线上发挥其作用的:在企图争取外部的经济和政治援助方面,以及在与之相关的企图夺取此前处于国家牢固掌控之下的一些组织与财产方面。在那些包括了不止一个组织良好的民族集团在内的小的政治区划中,一些在证明自己具有真正的当地公民身份方面竞争失败的民族集团,所面临的威胁在迅速上升。谁首先行动起来,谁就可能得到更多。一种事态逐步升级的局面开始出现,中央政府对某些民族所做的每一次让步,都给另一些民族提出更多要求以新的激励和先例,由此而来的则是对任何虽有独特认同但未能有效动员的人群日益

构成威胁。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一块位于阿塞拜疆境内、主要居民系亚美尼亚人的飞地——这类有不同民族混居的异质地区,相邻种族中的好战分子们为争夺所属种族的优先权而展开斗争,并且毫无顾忌地大肆屠杀。除阿塞拜疆外,摩尔达维亚、格鲁吉亚以及塔吉克斯坦也深受族群冲突之害。据称,1988年1月至1989年8月间,种族冲突造成了292人死亡,5520人受伤,另有36万人无家可归(Nahaylo and Swoboda 1990:336)。甚至在那些几乎没有声称其具备独特民族传统的共和国里,例如,在白俄罗斯,一种竞争的流行效应还是在这里产生出了一种被想象出来的民族历史,和一种用民族英雄作为其图像但很快发现民族英雄不够用、又转而用当地动物作为其图像的货币,以及那种使其最终变成一个完全依附于其俄罗斯邻邦的准国家的情形。

居间联络

居间联络的作用也许较不明显,不过它还是在三个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首先,一些共和国政府,像乌克兰政府,在把苏维埃国家改造成一个政党权威较小的邦联的过程中,充当了居间联络的角色(Beissinger 即出著作:36);其次,居间联络也有助于对一些共和国的统治者在整个革命性动乱进程中始终保持其统治的显著连续性做出说明;尽管一些草莽之士和企业界巨头已经出现在苏联社会的不同部分,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在1980年代当权的人们依然是前苏联时期当权的同一类人——在许多情况下就是同样的一批人。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作为一个巨大的中央集权体制的联系人,这些人一直享有接近信息、资源以及其他权力中心的特权。任何人都很难在制度性地位所提

供给他们的优势方面与他们匹敌(见 Willerton 1992)。第三个方面则与第一个方面正好相反:一旦地方领导人、企业家、工作小组以及普通市民开始拒绝向中央各权力部门提供货物与服务,这些中央权力部门便失去了其作为中间人的权力,它们也因此而不再能够重新分配资源以保持它们的地位,维系与其盟友
254 之间的关系,或保证它们从事某些它们最有义务去从事的活动。

就这样,机遇螺旋、认同改变、竞争以及居间联络展开了强有力的互动,不过,这些机制的互动,在苏联却产生出与在分崩离析的意大利创建统一国家的过程中大为不同的结果来。

哈萨克人的斗争

这里,我们把哈萨克斯坦当作对民族分裂以及民族认同形成进行更细致考察的一个有利观察点。尽管由国家领导的或者寻求建立国家的民族主义明显无望在这里立足,但苏维埃时代后期以及后苏维埃时期的哈萨克斯坦,还是经历了以民族主义要求之名而展开的内部斗争和重要转变。在这里,令人目眩的机遇螺旋同时改变了地方领导人与当地行动者及与国际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认同改变则发生在同一群地方领导人开始声称其所在的共和国具有与众不同的民族遗产或传统之时;为控制领土以及民族遗产而展开的竞争愈演愈烈,而由前苏维埃官员或职员进行的居间联络,则建立起新国家围绕它们而组织起来的各种联系。哈萨克斯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带有机会主义成分的民族主义的范例——同样形式的民族主义在 1985 年之后的苏联广泛出现,更不要说 1859 年之后的意大利半岛了。

哈萨克斯坦属于怎样一类地方呢?如同马莎·布里尔·奥尔科特在总结哈萨克斯坦的背景时所说:

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偶然形成的国家,从一个其边界绝不是按照一个独立国家来设计的前苏维埃共和国中造就出来的民族国家。独立塑造了哈萨克斯坦的政治本质——不过也并不总是以符合民主原则的方式。尽管它曾是公开性时代出现的第一批民众抗议之一——1986年的阿拉木图骚乱——的发源地,但在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前,它并未像它的邻国吉尔吉斯斯坦那样大步迈向民主化。尽管一些独立政治群体被组织起来,但它们缺少对政治过程的真正影响力。[Olcott 1997:201]

奥尔科特的精确总结,对进一步做出背景说明与进行解释提出了新的要求。

如今被称作哈萨克斯坦的这一片地域,以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商队往来其间的大片干草原为中心。今天的哈萨克斯坦靠近里海,与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中国接壤,穿越与俄罗斯联邦之间的辽阔边界,它还与西伯利亚、乌拉尔地区以及伏尔加河地区彼此相邻。哈萨克斯坦的领土面积为270万平方公里,大致相当于阿根廷的国土面积。在上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游牧的土耳其人一直是这片土地上的统治者。(现今的哈萨克语中包括了许多——其中大多为贬义词——属于定居民族的词汇,但没有把任何属于游牧民族的用语包括在内。)历史上,哈萨克斯坦牧民们经受过一次又一次的异族征服。 255

哈萨克斯坦在13世纪为不断扩张的蒙古人所征服,从15世纪后期起,该地区出现了自己的可汗。18和19世纪时,沙俄用武力强行将哈萨克斯坦并入俄帝国,随之而来的则是大量来

自北方的操俄语的农民移民进入该地区,俄罗斯的文化和政治影响由此而大大增加:“大约 150 万来自欧俄地区的新殖民者,在 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来到了哈萨克斯坦。”(Khazanov 1995:157)这些变化导致该地区原有的游牧民被边缘化,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因此而被迫从事定居农业。自我认同的哈萨克人曾经利用布尔什维克革命建立了一个自治共和国,该共和国从 1918 年持续到 1920 年,但这些哈萨克民族主义者很快便在苏维埃的军事威力面前屈服了。

随着斯大林掌权,一种典型斯大林式的通过亲莫斯科的哈萨克人来统治哈萨克地区的模式最终被确立起来,1924 年至 1933 年间,哈萨克人在当地共产党组织中所占的成员比例从 8% 上升到 53%(Suny 1993:103)。1936 年,斯大林政权终于在哈萨克斯坦造就出一个十足的苏维埃共和国,在该共和国里,那些处境优越的共和国民族的成员们——哈萨克人——获得了在工作、高等教育以及加入党组织方面的优先权。斯大林和他的继任者们还在这里建立起一套经济体系,其做法是将哈萨克斯坦的主要工商业中心,变成那些坐落在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全苏工商业中心的附属品,而不是在它们之间建立平等的相互联系。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一方面是农业集体化的强制推行,另一方面则是强使那些仍然过着游牧生活的哈萨克人落户于固定的居民点,迫于压力,哈萨克人毁掉了他们 80% 的牧群(Suny 1993:107;亦见 Viola 1996)。在抵制集体化政策期间,总计约 2000 万的哈萨克人口中,有大约四分之一死于暴力或饥馑。

历届苏维埃政权将大批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乌克兰以及高加索地区的技术人员、农民和政治犯带到哈萨克斯坦,与此同时,那些遭驱逐的土耳其游牧民则逐渐消失,或者逃往中

国。毫不奇怪,那些操俄语的居民都集中生活在一些具有俄罗斯取向的地点或其附近地区,而这便意味着哈萨克斯坦原有的种族平衡在地区分布上发生了巨大变化,1989年,在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中,仅有0.9%的人声称他们懂得哈萨克语(Smith, et al. 1998:150)。

256

诚然,与自上而下看相比,这种体制在从下往上看时显得大为不同。罗纳德·萨尼评述道:“在哈萨克人当中,苏维埃权力只是一个外表,隐于其下的则是地方权力的真实结构。”(Suny 1993:114)在基层农村地区,传统的地方领导人通过使他们自己变得适于地区性及全国性的权力,而适应了苏维埃的存在,但这种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与地区性及全国性权力之间关系的改变,构成的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深层变化。在城市以及俄罗斯人占优势的地区,整个生活方式则已经完全发生了改变,几个世纪游牧生活所留下的结构已被消除殆尽。

哈萨克人自身内部分为三个大的有时也是相互竞争的部落或曰zhus:主要集中在南部哈萨克斯坦的大部落(Great Horde),集中在中北部地区的中部落(Middle Horde),以及集中在西部的小部落(Lesser Horde)。1964年,哈萨克族出身的库纳耶夫成为该地区党组织的头头,他使自己与勃列日涅夫结成紧密的同盟,并最终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正式成员,库纳耶夫曾经把许多哈萨克人(尤其是来自他自己所属的大部落)安排到他所在的部门中。总的说来,中亚地区的民族领导人(库纳耶夫也在其中),都对戈尔巴乔夫的自由化政策持反对态度,这是因为后者威胁到他们在当地所拥有的恩荫权和控制权。

1986年,戈尔巴乔夫任命科尔宾,一位与哈萨克斯坦毫无联系的俄罗斯人,取代库纳耶夫在哈萨克斯坦所担任的职务,此举引发了哈萨克斯坦的学生以及其他人在首府阿拉木图发起反

政府的示威行动(Olcott 1997:205—206)。“科尔宾既对哈萨克斯坦持续衰退的经济无能为力,也没有能力控制这里复杂的社会和人口构成,”奥尔科特指出,“这导致科尔宾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便被纳扎尔巴耶夫所取代,后者出身哈萨克族,自1984年以来一直担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部长会议主席。”(Olcott 1997:206)

纳扎尔巴耶夫一方面通过与苏维埃各级政权的合作来开展经济方面的重组工作,但另一方面,在哈萨克斯坦内部,他却通过强调哈萨克民族主义来巩固他的权力。例如,1989年8月由纳扎尔巴耶夫提出的一项法案规定,将哈萨克语确立为国语,推进哈萨克语教学工作,并且将公共事业部门使用的语言改为哈萨克语。纳扎尔巴耶夫为此而不得不一方面采取措施阻止俄罗斯人反对组织的行动,另一方面又要应付更为激进的哈萨克民族主义组织所提出的激进要求。与此同时,他还进行了一系列组织政党的尝试——这些政党有望在给他提供支持的同时,充
257 当共产党的继承人——但由于这些举措已经成为纳扎尔巴耶夫的竞争对手们用来挑战其支配地位的工具,他的这番努力最终归于失败。不过,总体上,1989—1990年间举行的一些选举,还是使共产党统治时期从地方到国家层次的当权者们,重又回到权力拥有者的位置上。

纳扎尔巴耶夫对仍然作为苏联而存在的那种体制所做的承诺,并未阻止他在1991年8月那场失败的政变后所出现的不稳定时期灵活地做出立场改变。如同弗朗西斯·克莱因斯(Francis Clines)在当年8月26日从莫斯科所做的报道中所说:

既然中央政府已是摇摇欲坠,纳扎尔巴耶夫先生遂发出了他所在的共和国拒绝受俄罗斯影响的信号,他告诉他

的国民说：“哈萨克斯坦将决不再充当任何人的小兄弟。”纳扎尔巴耶夫从热心恢复联盟到完全走向其反面，其惊人转变可以从这一事实中看出来：就在一星期前，叶利钦先生和纳扎尔巴耶夫先生还是推动签署联盟条约的亲密同事，他们当时正在准备签署的是一项妥协性的协议，上周二，也就是政变发生后的第三天，戈尔巴乔夫先生曾誓言要让这项协议成为一纸开创共和国权力新时代的文件。[引自 Gwertzman and Kaufman 1991:556—557]

这并不是纳扎尔巴耶夫的最后一次转变。到1991年11月，纳扎尔巴耶夫还在与戈尔巴乔夫合作进行最后一次不成功的努力，以创建一个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在内的“主权国家联盟”。事实上，许多观察人士认为，戈尔巴乔夫打算让纳扎尔巴耶夫成为他的代理人以及该联盟的总统。

在苏联存在的最后时刻，1991年12月，纳扎尔巴耶夫赢得大选，成为哈萨克斯坦总统。苏联彻底瓦解后的1992年，纳扎尔巴耶夫终于又成功地创建了一个政党，“人民统一党”，此举是他在利用民众支持（至少在自我认同的哈萨克人当中）的又一成功之举。面对哈萨克斯坦境内俄罗斯人的反对与哈萨克民族主义动员的双重威胁，人民统一党为把持中央权力而继续进行着危险的斗争，不过，该党也从一个主要由哈萨克人组成的政府——它严密地控制着候选人、选举与议会——那里得到了有力的帮助。诚然，1995年3月，纳扎尔巴耶夫一度宣布取消规定的议会选举，并在当年年底举行新选举之前实际行使着总统紧急权力，但到2000年，纳扎尔巴耶夫已经牢牢地巩固了他的权力和地位，他所掌握的权力已足以让他在当年宣布自己为终

身任职的哈萨克斯坦总统。

在不断走向分裂的苏联,地方政治以一种受苏维埃政权所做的“共和国民族”定义强烈影响的形式,而呈现出了种族民族主义的特征——甚至在那些其领导人试图保持它们作为苏联或其继承者成员的身份的地方,比如像在哈萨克斯坦,也是如此。258 大多数情况下,中亚的民族主义更少依赖于共同民族情感之自下而上的动员,而更多地是有赖于自上而下的创建民族机构与民族认同。在谈及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诸国时,格雷厄姆·史密斯及其合作者们说道:

除了利用苏维埃的官僚结构及机构外,中亚各国还通过利用精心设计的一些民族化的政策和实践——这些政策和实践意在维护各自国家中的共和国民族的霸权地位——来巩固其独立的基础。尽管这些国家的宪法和其他立法性法案不乏保证所有公民平等的明确规定,但民族化的政策和实践还是特别明显地从新政权的体制安排、当地语言被赋予的特权地位、新修订的历史以及非共和国民族群体被排除在权力阶层之外这些方面表现出来。[Smith, et al. 1998:139]

随后,斗争就不再集中在这些国家所建立的新政权的形式及其文化框架上,而是集中在谁有权代表共和国民族——它们是被历届苏维埃政权所指定的——说话的问题上。不过,这场斗争却导致了(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俄罗斯人以及俄罗斯化的精英分子们的反对——它实际是一种寻求建立国家的民族主义形式。俄罗斯联邦则代表这两个群体,不断要求哈萨克斯坦政

府实行双重公民身份、采取措施保护俄语。一些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诸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等人,也通过鼓吹建立一个不仅包括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而且包括北哈萨克斯坦在内的“更大的俄罗斯”,而不断施加压力。与此同时,其他一些自我认同的民族,也提出了类似的自治甚或退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要求;例如,位于哈萨克斯坦西北部的哥萨克人,就已通过有力的斗争形式而进入到政治斗争之中。

在摆脱了苏联解体的强烈冲击之后,通过利用原先由苏维埃政权所提供的各种资源,纳扎尔巴耶夫这位当初由戈尔巴乔夫一手任命的前苏维埃地方政要,依旧牢牢地掌握着哈萨克斯坦的统治权。纳扎尔巴耶夫所采取的统治策略是把对内实行无情的传统主义(patrimonialism)与在国际舞台上奉行实用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他还采取联姻的做法,通过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Askar Akaev)的儿子,以赢得邻国的支持。在容忍(或许还受益于)前政府官员与现任政府官员所从事的大量寻租活动的同时,纳扎尔巴耶夫则始终在寻求提出一种既不疏远大量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俄罗斯人,又不得罪其北方强邻俄罗斯的有关哈萨克民族认同的定义。

鉴于对近邻塔吉克斯坦国内间断发生的内战,以及邻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不断出现的种族、语言、地区和宗教派别斗争(Atkin 1997; Fierman 1997; Huskey 1997; Juraeva 259 and Lubin 1996),纳扎尔巴耶夫对种族—语言方面的种种分歧采取了一种温和灵巧的处置方式。他甚至表示出对语言作为一种政治认同基础的怀疑:

我不接受所谓“讲俄语的人口”这一概念。我们当中又有谁不是讲俄语的呢? 毕竟,整个哈萨克斯坦,包括 99%

的哈萨克人都讲的是俄语。[Beissinger 1995:170]

唯一遭到纳扎尔巴耶夫政权积极镇压的民族主义团体,是一些俄罗斯人行动主义分子与鼓吹建立一个联合所有突厥民族的大国的好战的“阿拉什”(Alash)党。与此同时,纳扎尔巴耶夫政权一方面抵制来自外部势力(尤其是俄罗斯)要求其承认双重公民身份的压力,另一方面则从中国、蒙古、伊朗、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诸国吸引哈萨克人移民至哈萨克斯坦,而对其境内的俄罗斯人,则迫使他们要么宣布自己是外国人,要么声明自己是哈萨克斯坦的忠实公民。

由作为共和国民族的哈萨克人组成的政府当局,并未积极镇压或驱逐其他民族的成员,而是把哈萨克国民身份当成有利于那些心甘情愿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人们的一种保护性体系。而对于任何有权提出控制这个国家的要求的人们来说,这个国家都属于能够为他们带来丰厚回报的福地。这个国家(包括它所拥有的部分里海水域在内)有着储量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石油储量估计在 400 亿至 1780 亿桶之间,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在四分之一世纪内的石油消耗总量(Ingwerson 1997:1)。此外,它还盛产粮食,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危机发生前,哈萨克斯坦曾经是苏联相当大一部分商品粮的提供者。倘若这个国家能够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税收与投资体制,它便会拥有充裕的岁入可供国家开支,更不要说一些资本主义企业能够在这里赚钱发财了(见 Feige 1998)。

实际上,有权对这个国家提出要求者显然是按种族来划分的。20 世纪 90 年代初,人口统计学家们得出的统计数字是,该共和国人口的 44% 为哈萨克人,36% 为俄罗斯人,另有大约 10% 为出身其他各(欧洲)民族的“欧洲人”,剩下的 10% 人口系

由一百多个其他民族——其中主要为亚裔民族——构成(United Nations 1995:I,6)。到1997年,官方则声称,哈萨克斯坦人口的50.6%为哈萨克人,俄罗斯人则仅为32.2%(Smith, et al. 1998:153)。哈萨克人在哈萨克斯坦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上升,是人口生产方面的区别对待政策、俄罗斯人的迁出、哈萨克人从 260 中亚其他国家的迁入以及(最有可能)其他相互杂合的诸小民族改变其认同的结果。尽管如此,1995年宪法的起草者们还是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便是:这个国家的挂名民族总计仍然不过占到其总人口的一半,并且,这个国家的“混合语言”(lingua franca)也并非哈萨克语,而是俄语。

事实上,许多被官方认为是哈萨克人的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已经养成了只会说俄语一种语言的习惯,只是在迫于压力的时候,他们才打算略学一点哈萨克语。哈萨克当局充其量能够指望的是,新一代哈萨克人将会成长为同时说俄语和哈萨克语两种语言的一代人,但甚至是这样一种预期,如果没有在文化转变上做更大的努力,不大量减少与俄罗斯的联系,其前景也似乎是相当黯淡的。可见,哈萨克民族主义并不存在于其人口中广泛拥有的与某种单一文化的认同中,而是取决于哈萨克民族的领导人们在国际舞台上所提出的他们有权代表其境内哈萨克人的主张。

在哈萨克斯坦,我们再次看到了机遇螺旋、认同改变、竞争和居间联络这四个机制,但这一次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到它们的。在对外部环境变化,特别是与俄罗斯以及其他苏维埃共和国之间关系上的变化做出反应时,哈萨克领导人从声称他们是共产党人转变到宣称他们是哈萨克人和/或一个主权实体的统治者,其速度快得惊人。认同改变随着苏维埃中央政府在确认和支持其忠实成员的认同方面的能力与倾向之改变或衰

退,而多次出现在这同一个过程当中;竞争则两次登台亮相,一次是在哈萨克斯坦国内夺取资源的斗争中,另一次是在纳扎尔巴耶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以及其他共和国领导人之间的不断变化的联盟关系形成中;居间联络依然在两个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是在哈萨克斯坦国内确立哈萨克人认同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时,另一方面则在纳扎尔巴耶夫基本成功地操纵哈萨克斯坦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时,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斯坦作为俄罗斯的保护对象与完全不接受其保护问题上灵活的态度变化,其本身便构成了居间联络的一次精心之作。

意大利的统一对苏维埃的解体

从总体上当然同时也是就其结果来看,意大利在 1859 年至 1870 年间的斗争性统一,似乎是与 1985 年至 1995 年间苏维埃统一体的瓦解颇为不同的现象。是的,它们的确不同。在第一个案例中,一个只有勉强合法性的地方性政权通过征服、斗争和居间联络,而把一系列不同地区整合为一个虚弱却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且在它后来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避免了分离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出现;而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个曾经在七十四年时间里在那个幅员辽阔的帝国里行使着强有力霸权的强大国家,却迅速地归于解体了。

不过,这两个重大事件都包含着由国家领导的民族主义与寻求建立国家的民族主义之间,以及民族整合与民族分裂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在这两个事件当中,那些勉强可以被定义为基本属于民族主义性质的要求和冲突,集中出现在一些历史已经为其贴上“民族主义”标签的事件中。对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更为重要的则是,尽管两个事件的发展方向完全相反,内在于

它们之中的却是一些相同的因果机制。以不同的次序、不同的组合方式而在不同情境中起作用的这些机制,产生出了大为不同的结果:一方面产生的是一个通过居间联络而被粘合到一起的新的、持久存在的国家(如果是弱整合的话);另一方面产生的则是二十来个多少具备独立性质的国家。

显然,我们还可以指出这两个事件所共有的其他一些机制来,例如,承诺、认同威胁、压制、策略上的创新以及激进化这些我们在其他场合曾经强调过的机制。而我们之所以挑选出机遇螺旋、认同改变、竞争以及居间联络这几个机制来,是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它们在这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是如此突出,其次则是因为它们有助于解释这同一些事件所具有的某些令人迷惑的特征。

在意大利的案例中,我们通过所选取的这些机制,对这样一个令人感到迷惑的问题做出了解释,这个难题是:如此一批分散的、异质的政治体,居然由一个民族主义的计划与一个立宪君主国而结合到一起——尤其还是在遭到一个强有力的教会反对的情况下。竞争者们之间为争得民族衣钵(例如,加富尔、加里波第、马志尼以及他们各自的追随者们)而出现的动员和反动员,遵循着的是一种机遇螺旋的发展逻辑,导致的则是政治激进主义分子们——他们当初动员起来是为了反对当地的或本地区的敌人——迅速的认同改变,它同时也涉及到针对得到国际承认的民族权力而展开的直接竞争,并且,还严重依赖于由老革命家和地方当权者所提供的居间联络。某些像统治意大利南部的波旁王朝这样已持续存在很长时间的政权,则由于内部的起义和其他国家的态度转变而失去了合法性确认,一些临时性的联盟则被明确为政府的长期安排。就这样,一个看似摇摇欲坠实际却很耐久的国家,带着它那为其他各个政权所勉强接受但很有

效的优势,从各种斗争中产生出来,这个国家原本可能因为领土
262 沦丧、其他几个对手国家致力于某些与之相反的计划,而很轻易地宣告完结,或者回到从前的状态。

在苏联的崩溃这一案例中,我们已在前文提及的若干难题是

1. 一个似乎如此坚固的、中央集权的、独裁的和资源丰富的政治经济体,如何在五六年之间就明显解体了?
2. 为何如此之多的斗争要求都是通过坚持种族、民族自我权利的形式而提出的?
3. 如此之多的旧政权时期的当权者,又是如何在大变革之后重新握有实权的?

机遇螺旋、认同改变、竞争以及居间联络这四种机制本身,并未给这些问题提供详尽无遗的答案。不过,对于居间联络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里如何发挥作用的清晰了解,却帮助解释了一些地区性的领导人——他们的权力取决于莫斯科与他们所喜爱的当地选民之间的协商——是怎样如此迅速地做出了从坚定承诺到公然抵制的转变的。种族和民族主张的迅速兴起及其同样迅速地转为暴力对抗,有赖于所有四个机制的相互结合——就像,比如,一个共和国威胁退出苏联增加了另一个共和国威胁退出的有效性时所发生的那样。旧体制时期的当权者们重新出现在新政权当中,部分地是因为他们利用了旧国家所留下的各种遗产之敌——这是我们在本章未做详细讨论的机制之一。但他们同时也对从共产党和苏维埃认同到民族认同的转变做出了积极反应并帮助形成了这一转变——这种认同改变不是根据由来已久的各种认同,而是根据处于分裂中的苏联政府的

居中调停所造成的新认同做出的。

尽管我们也曾尝试将意大利的统一归入民主化的现存模式中,或者将国家形成和苏联解体归入到革命或帝国衰落的现存模式中,但从分析中所得出的结果却正好相反。我们并不把所有这些事件视为依照它们自身法则而运作的不同的大规模过程的具体实例,而是通过切近地探究这些事件以找出在范围广泛的斗争中起作用的政治机制,而获取更具解释性的手段。同样的教益也可以从我们对第三个大规模过程即民主化的分析中得出。

263

九 斗争的民主化

规矩的瑞士和狂躁的墨西哥形成了奇怪的一对,但它们走向民主的道路既都是斗争性的又都是与众不同的,把这两个国家的民主之路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有助于把民主化和斗争政治联系起来。对这两个国家的民主之路进行比较的结果证实: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这两个国家在经历了激烈的民众斗争之后,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民主。另外,比较还表明:最初的不同方向的民主之路——无论是瑞士法国式的中央集权的民主之路,还是墨西哥的民众革命的民主之路,都未必能决定未来的民主走向。在这一比较中,我们强调的事实是——走向民主的差别极大的路线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每一条通向民主的路线又都在公共政治的主流形式上留下了富有启示性的标记。通过对这样的民主路线的比较,那些反复出现的民主化机制最终被辨认出来,而这些机制在民主化过程中如同在其他斗争过程中一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不论是在瑞士、墨西哥,还是在其他地方,解释民主都需要对那些使政体民主化的反复出现的因果机制进行确认,另外还需要详细叙述影响这些机制出现及其相互联结的条件(Tilly 2000)。眼下,关于民主化的大多数理论,要么是停留在对条件的详细叙述上(如社会经济现代化);要么是跳过去只描述它是如何产生的(如通过精英之间的成功交易)。本章要在条件与描

述的分析空间中,找出一些宽广的过程(机制的组合及发生的序列),而尤其要辨认出如下一些过程,它们分别是:(a)使公共政治摆脱主导性的绝对不平等,和/或(b)使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实现整合。像前面几章一样,本章同样会挑选出几个机制,对它们给予特别的关注。这样的机制分别是:跨阶级联盟的形成,中间人的核心收买,保护—被保护网络的解散和已经为大家所熟悉的居间联络机制。

264

我们在瑞士和墨西哥之间进行的比较,还暴露出所有对民主的独特解释都面临着的严重局限:

- 作为测试的一个标准序列合格或是不合格
- 作为普遍的公众态度或政治文化的一种表达
- 作为训练有素的领导人的技巧
- 作为或多或少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 作为上述因素的某种结合

在分析中,我们强调斗争政治在民主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同时指出某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并提示一些能够帮助解释民主曲折性的要点。我们的方法是确定两条广泛的民主化之路——一个是弱小政府的民主化道路,另一个是强大政府的民主化之路——并用瑞士和墨西哥的案例对它们进行说明。最后,我们将集中讨论有助于这两条民主之路的动力机制,并用我们的两个不同寻常的案例来比较它们之间对比鲜明的结果。

定义与路径

当看到民主化时,我们凭什么就知道这是民主化呢? 迄今

为止,在给民主所下的有效定义中,可以分出三个彼此部分重合的范畴:实质性标准,它强调的是人类经验和社会纽带的质量;宪法性标准,它强调的是法律程序如公众选举和公民投票;政治过程标准,它强调的是政治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评论与批评,见 Bratton and van de Walle 1997; Collier and Levitsky 1997; Dawisha 1997)。而我们给民主下的定义是与政治过程这一范畴完全一致的。在目前情况下,我们的民主定义是:

只要一个政体能够维护广泛的公民权,维护平等和自主的公民地位,同时它又能在整体上把公民协商的约束力应用到政府行为和政府成员上,并且还能因此保护公民不受政府代理人的专断行为之害,那么我们就说这个政体是民主的。

我们之所以选择与政治过程这一范畴相一致的定義,理由有三。他们分别是:(a)它基本上抓住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民主理论家们所要描述的大部分内容,同时又避开了实质性和宪法性这两种定义所常常碰到的麻烦,(b)它把民主放在了一个在特征与实践上都有着变化的,并且在因果上有着联系的总体上更为宽泛的区域内,(c)它澄清了民众斗争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一个误解很深但又是关键性的因果关系。

除在其他方面外,政体的变化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广泛性(政府权限范围内的全体人员属于政治体成员的比例),平等性(属于政治体成员的人们拥有相似的自主权和接近政府机构及其资源的程度),协商性(政治体成员对政府机构、资源和活动所拥有的集体控制权的大小),最后一点是保护性(保护政治体成员以及他们的选民免受政府代理人的专断行为之害)。广泛

性、平等性、协商性和保护性彼此之间会部分地发生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是独立的、互不影响的。例如,独裁的平民政府,在有限的协商和保护的结合下通常会创造出相对宽泛和平等的政府成员身份。不过,为了使问题简单化,我们可以把广泛性、平等性、协商性和保护性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束变体,并称之为保护性协商。当保护性协商达到很高的程度时,我们就开始称之为民主。严格地说,民主化不是公共政治中各种变化的一个结果,而只是在公共政治中的一种特殊改变。

根据定义,如果民主需要很高程度的保护性协商,那么作为实际问题,它也需要公民权的制度化。这里所说的公民权是由权利和义务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构成的,它把政府代理人与其管辖的所有公民结合起来,这里,对所有公民的确定,主要是或者只是根据他们与某一特定政府之间的一般关系,而不是根据他们与某些统治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或基于种族、民族、性别或宗教而被归之于他们的持久特性来确定的。公民权能强化政治参与的广泛性和平等性,因为它能在民众中划分出哪些人可以享受有约束力的协商和保护以及享受程度的大小。民主化意味着向公民权、公民权的广泛性、公民权的平等性以及具有约束力的协商与保护的净转变。

图 9.1 勾画出了我们所遵循的推理路径。在政府能力低和保护性协商优势小的地方,政治生活就会出现分割的专制暴政:多种压制势力的并存,小规模专制暴君的存在,争夺更大范围权力的竞争者的出现,但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

图中的对角包含着公民权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之间的相互关系把隶属于政府管辖下的所有公民和政府代理人联系起来(这里所说的公民,其范畴的确定主要是或者只是根据他们与政府之间的一般关系来确定的,而不是根据他们与统治者之间的 266

特殊关系来确定的；同样，这里所说的公民也不是指那些基于持久特征如民族、种族、文化、性别或宗教而确定的公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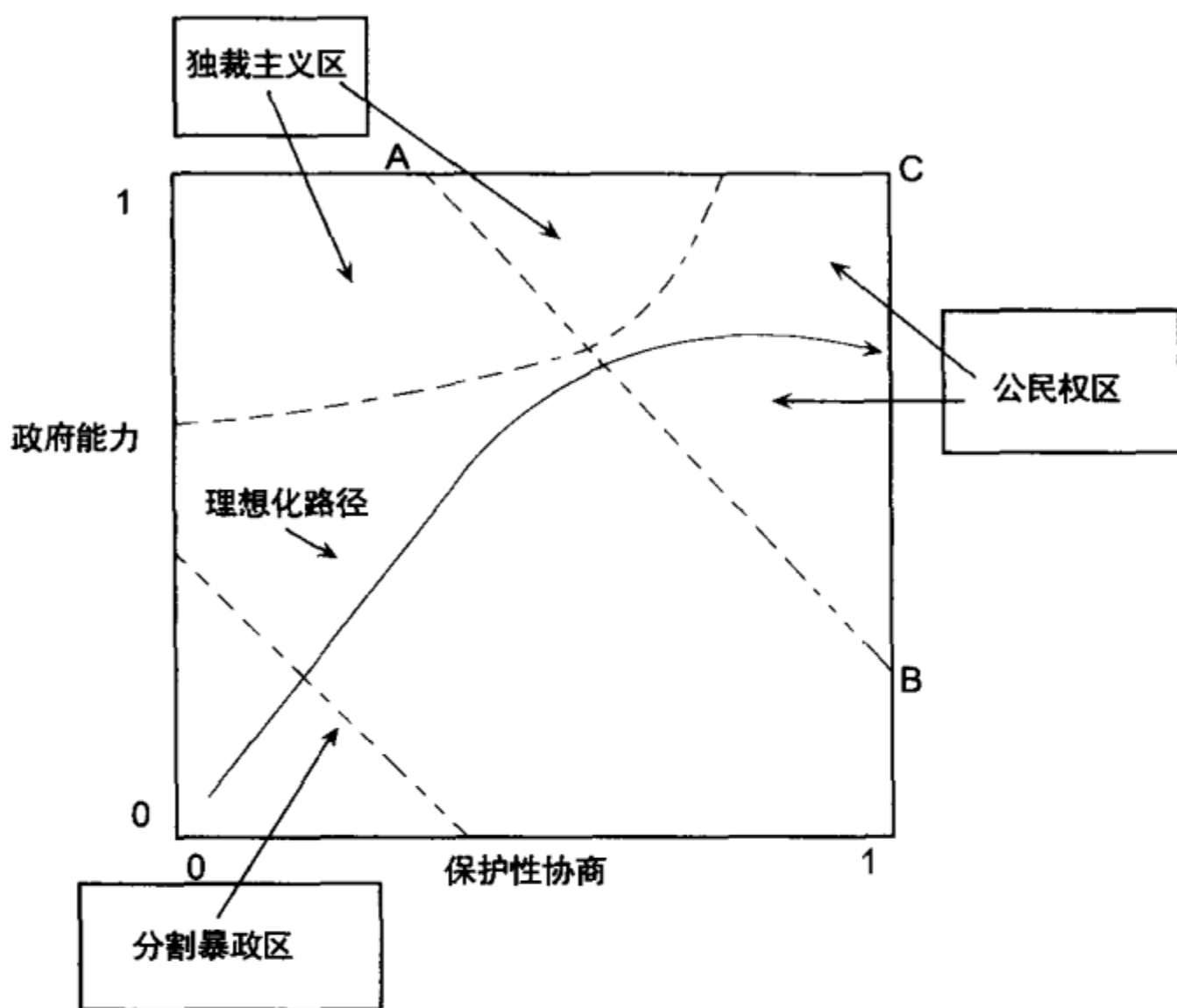


图 9.1 有效民主化

在图中三角形公民权区的 A 点，是一个保护性协商低、政府能力极强的结合点。它所描述的是一种被严格控制着的状态，一个我们不妨称为极权制的状态。纳粹德国的实例证明了位于该点最高处或最低处的政治过程。在 B 点上，保护性协商达到了最高位，但政府能力极低，因此面临着内外交攻的危险。尽管 19 世纪的比利时从未达到过这一点，但它却一再地向它靠近(Deneckere 1997)。C 点表示的则是最强政府能力与最高的

保护性协商的结合,但实际上它可能是不存在的。因为极强的 267
政府能力与极高的保护性协商是不相容的。循着这一推理路
径,它把我们引向了该图的左上角,并且把这个左上角划分为独
裁主义区,该区与公民权区有部分重叠但并不完全把它挤占。
这一推理方式同时也暗示了一条有效民主化的理想路径:方法
是先大体上同等程度地增加政府能力与保护性协商,使其进入
公民权区,然后开始降低,最后则适度减少已经具有了保护性协
商的政府能力。

斗争与民主化

对斗争与民主化之间关系的思考使我们走向斗争政治。我
们说民主化是向保护性协商的任何净转变至少有以下几个意
义:(a)有些群体需要这样的转变并且为使这样的转变能够发
生,他们愿意为之付出艰苦努力,(b)这些群体可能是由政府精
英、对抗精英和为了自身利益而要求转变的人们构成,或者是由
这些人的组合构成的,(c)另一些人则会因为看到他们的既得利
益和特权受到威胁而有可能反对它,但(d)除非是在回顾中,否
则当时的许多努力就不会被提出要求者和那些接受要求者视为
是对民主的要求。换句话说,民主化不是一个“单一的事物”,它
是由多种要求与反要求之间相互作用带来的一个偶然结果。在
斗争中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会产生新的关系网,这种新的关系网
通过保护性协商,会在为了公共利益而进行主张的人和反对这
些主张的人之间发挥作用。所有这些情况意味着(e)如同我们的
斗争轨迹所显示的那样,民主化不是一个有限的、线性的过
程,以及(f)在前面几章我们就已熟悉的各种斗争形式和过
程——社会运动、革命、战争、民族主义与劳工斗争——都是可

以相互结合而产生出保护性协商的。

斗争过程之间也可以相互结合致使政体偏离民主化。之所以会如此,不仅是因为有一些人反对民主本身,而且因为(很可能这是主要原因)打着民主的幌子提出的各种要求威胁了他们的既得利益。这些反面主张常常会使某些国家偏离民主,以至于某些好心的观察家们会把斗争本身解释为对民主的威胁。这些观察家们有着大量的案例可以引用来证明他们的观点:例如,导致内战爆发与佛朗哥政权产生的西班牙共和国的斗争;魏玛共和国的倒台和倒台后出现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农村叛乱和城市军事冲突之间的结合为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上台准备了条件(Linz and Stepan 1979)。

但这些案例都是偏离民主的案例。民主来自于民众的斗争,并且它还动员和重塑民众的斗争。民众斗争与民主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具有两个特征,这两个特征可以用来解释关于民主与斗争水火不容的错误印象。首先,从整体上看,民主化大大限制了威胁生命和财产的各种以公众的、集体的名义提出的要求,取而代之的是高度透明并且直接破坏性不大的各种互动。其次,在民主政体下,威胁和宣称采取某种行动(而不是不可商谈的直接行动)的现象,在通常情况下,要比在非民主政体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不过,事实上,这样的威胁常常会导致公开冲突;而如果这样的威胁没有导致冲突的话,它的可信性就会显得不够。

接下来,在分析中,我们的任务是去发现,各种政权在向保护性协商的净转变时所经历的过程及其产生的原因,尤其是那些将政体带入狭窄的公民权区和民主区的净转变。我们以观察为根据所提出的问题是想去理解斗争政治是如何以及何时引导政体走向狭窄的公民权区和民主区的。既然存在着许多在开始时向

民主靠近但后来又偏离了民主的政体,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希望那些主要是针对分析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也能用来解释这样的问题,即非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是如何发生的。既然有些壮观的斗争过程能够产生出民主,而另一些却未能产生出民主,还有一些斗争过程所产生的民主又非常脆弱,因此,用比较的方法来追溯斗争的各种过程,同样会指向我们的分析性问题。

强民主之路与弱民主之路

朝向保护性协商的运动与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政府能力——相互交叉。能力是指政府机关在其管辖的区域内对人、活动和资源变化的控制力的大小。除了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如果缺少实质性的政府能力,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决不会存在。这一点无论是从内因或是从外因来看都是正确的。从内因来看,维持保护、协商、平等性和广泛性,以对付强大的国内行动者企图颠覆依靠实质性的政府能力才能存在的上述要素,有赖于实质性的政府能力;从外因来看,缺少实质性能力的政府,易受到颠覆、攻击,甚至被土匪、反贼、游击队和外来政权征服。 269

在图 9.2 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极端的轨迹,它们的特征是从小独裁到某种类型的民主:

弱政府:该轨迹的特点是,它在开始的时候是保护性协商的扩大,但只是在很久以后才继以政府能力的大幅度加强,从而自下而上地进入有效的公民权区;不过,这样的民主之路只有少数现代国家才经历过。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大多数这样的国家在一开始不是被征服了就是瓦解了。

强政府:此轨迹的特点是,它在一开始就是政府能力的扩大,随后进入独裁主义区。在经历了一个独裁的公民权阶段后,保护性协商开始在公民权中扩大,最后出现一个不太集权的、较为民主的但政府能力仍旧很强的政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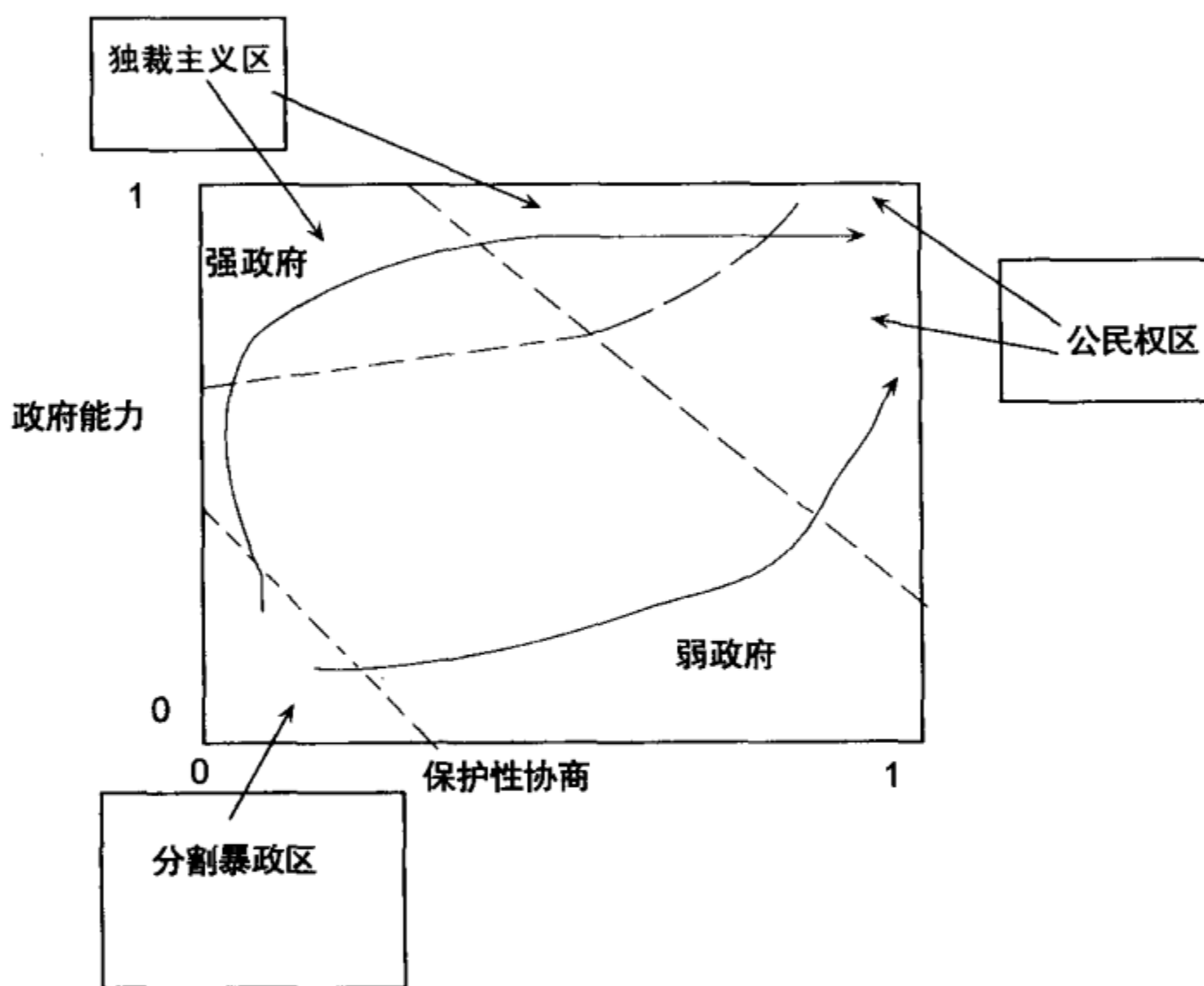


图 9.2 强政府与弱政府的民主轨迹之比较

270 在两个沿着强政府与弱政府之路的民主曲径的简单事例中,我们足以看出会有多少条路径能偏离介于独裁与保护性协商之间的那条道路。从波兰整个贵族阶层(尽管不是从波兰的农民、商人阶层)来看,18世纪的波兰政府与保护性协商之间的

联系可谓千丝万缕。尽管是在邻国列强的强硬干涉下,但波兰贵族毕竟还是选出了他们的国王(尽管有的国王在他们手中被废除),而且常常拥有一支远远超过王室的军队。作为一个拼凑起来的政府,波兰政权臭名昭著地丧失了其应有的能力,以至于在18世纪中期险些被哥萨克的叛乱及其他叛乱所毁灭。由于接二连三地被外来的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所征服,一个独立自主的波兰政权从179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威尼斯共和国令人惊讶地走过一段强政府的轨迹,但在19世纪晚期之前,它始终没有接近过民主。威尼斯的商人、海盗和军阀在10世纪至15世纪之间建立了一个欧洲最强大的、掠夺性的、运转有效的国家机器,它在环亚得里亚海的大部分地区和地中海的东部建立了一个侯国林立的帝国。该帝国的国家机器是一种等级森严的寡头政治,它在贸易和掠夺中变得越来越富,但不允许无论是来自国内的或是国外的威尼斯大众对公共事务表达他们的意见。当选总督只能是来自等级最高的威尼斯贵族。1600年以后,即使在威尼斯的商业霸权相对削弱的情况下,威尼斯共和国仍旧是少数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1797年,由于拿破仑的入侵,威尼斯才真正地、暂时地加入了采纳选举制的意大利新政权。但复辟后的威尼斯共和国在沦为奥地利的属国之前,一直在和欧洲的民主派进行着斗争,直到1866年。(其实,在这场斗争中,威尼斯共和国在1848年就失败了。)威尼斯保护性协商政体的建立是在其加入新建的意大利王国之后才开始的,尽管这个政体在保护性协商上做得非常有限,但在维持其存在的时间上还是相对持久的。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还很少有真正的历史能像旧时期的波兰与14至19世纪之间的威尼斯那样呈现出强烈的反差。在

多数描述过的案例中其路径更为离奇,它们在强政府和弱政府之间逆转突变。这些轨迹的绝大多数会时不时地进入或接近独裁主义区。不过,在民主化的所有案例中,出现了某些过程。这些过程具有三个关键性的特征:公共政治与物质不平等的部分隔离;个人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部分融合;保护性协商在公共政治的日常活动中的逐步实施。因为政体走的是一种强政府的轨迹,所以这些过程就需要独裁主义的国家机器解体;而走弱政府轨迹的政权,上述具有三个关键性特征的过程在政权能力的单纯创造中及对保护性协商的托管上都发挥着核心作用。在弱政府和强政府之间,扩大中的政府能力在向民主政治的转变中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

接下来我们要说明的是,民主化从来都不会在没有激烈斗争的情况下产生。斗争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是产生趋向民主的转变的净运动。在指向保护性协商的三个理想化的轨迹——强政府轨迹、弱政府轨迹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政府轨迹——中,都无一例外体现着公共政治与物质不平等的分离,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融合,以及公共政治改变的发生。在所有这些过程中,像跨阶级联盟的构成等具有本质特征的机制在每一过程中都反复出现。

我们用两个不同寻常的案例——其中之一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建立了民主的要素;另一个则至今还在民主的边缘犹豫徘徊——来检验强政府和弱政府在走向保护性协商的道路中所出现的一些过程和典型机制。为了使我们的分析的目标更进一步,我们将对作为案例的这两个国家(瑞士和墨西哥)的早期历史简要地予以提及,而对帮助民主化产生的各种变化机制的主要内容则略而不谈;但在彼此之间的对比有着建设意义的两个过程——公共政治与物质不平等的分离以及信任网络与公共政

治的整合——上,我们将投入主要的精力。在对这两个过程的分析中,我们仅选出四个重要的因果机制:跨阶级联盟的构成;中间人的核心委员增选;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网络的解体和居间联络。

截至 21 世纪初始,瑞士仍然是世界上较为古老的民主国家中的一员。尽管它仍旧继承着 19 世纪寡头政治的衣钵和一种拼合式的政权结构,但其公共事务的执行却是在公民协商下进行的;瑞士给凡是有资格成为其公民的人都提供实质性的保护;它大体上能包容一切形式的斗争,但条件是,这些斗争需符合由一百五十年来的民主经验按规范所确定和容忍的各种表现形式。与瑞士形成鲜明比照的墨西哥,就其革命以来的大部分历史来看,在伪民主体制中充满了独裁主义的实质。尽管大选能够带来总统和其他政府高官的有规律的轮换,但失败的政党对那些当选者的诚实常常构成威胁,而反对党直至最近仍无法动摇执政联盟的统治地位;游击队则会在各个地方时不时地冒出来,它们有时会在几个地方制造暴乱;墨西哥的人民仍旧受着上至总统下到警察等政府官员的极不公平的对待;总统职位的和平更换只有 2000 年的那一次。但与独裁的 19 世纪的历史相比,墨西哥还是向民主靠近了。 272

我们对瑞士和墨西哥所做的比较引发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离开独裁或寡头政治进而走向民主的不同路径的问题。图 9.3 在其范围内画出了自 1750 年到 1990 年期间,理想化的瑞士和墨西哥应走的民主轨迹。该图表明墨西哥更加接近强政府的民主路径,瑞士则更加接近弱政府的民主路径。但两者都没有十分接近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波兰和威尼斯这两个案例中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民主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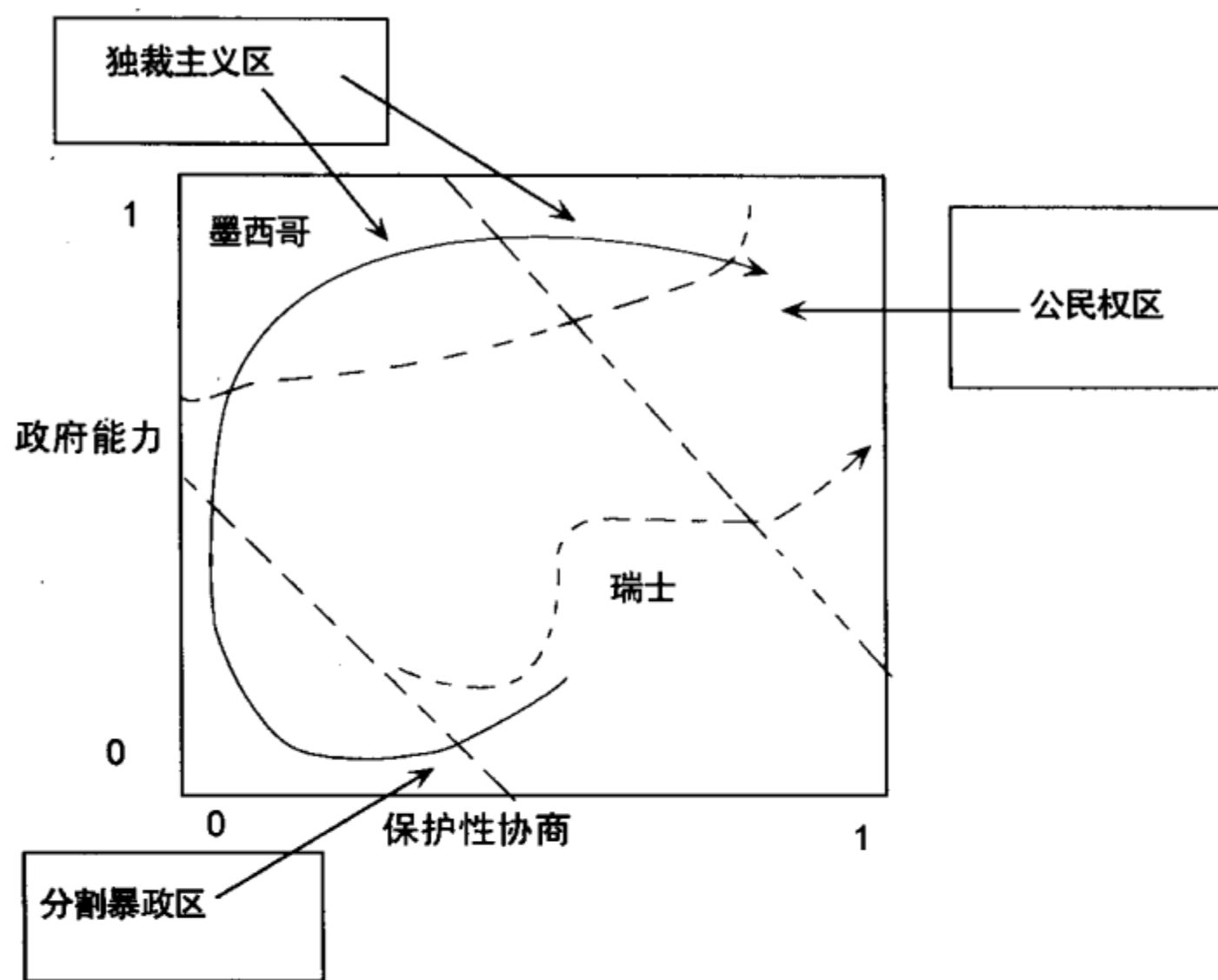


图 9.3 墨西哥和瑞士走向民主的道路,1750—1990 年

273 不过,该图表明情况也就是这些了,它留下的空白是这样两个过程:1848 年在瑞士产生的宝贵的半民主政治和 1928 年以后在墨西哥产生的半独裁主义政治。

过程与变化机制

我们解释过程与变化机制的依据到哪里去寻找呢?民主化是从相互作用的变化中产生的,该变化是指在分析中彼此独立但在因果关系上又是相互依赖的三组社会关系中的变化。这三组社会关系是指公共政治、不平等和信任网络,它们都与政体组

织的变化连在一起。在民主化过程中,政府管辖下的民众主体对政府机关、政府活动和政府资源获得了有约束性的、受保护的和相对平等的要求权。在一个相关的过程中,类别不平等在一些社会生活领域中降低,这些社会生活领域要么是构成,要么是直接支持公共政治的参与。最后,在人际关系网络的核心中,一个重要的转变发生了。这里所说的人际关系网络是指人们在从事风险大、周期长的事业如婚姻、长途贸易、行会成员身份和商业投资时所依赖的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在开始时是躲避政府的侦察和控制,但到后来,在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假定政府机关会满足其所期待的长期义务中参与了进去。在我们的分析中,凡是有这三组变化机制交叉的地方,就会产生有效的和持久的民主。征服、对抗、革命和殖民化,有时会加速民主化过程,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有着自身的独特性,而且是因为在越来越强烈的变化过程中,那些促进信任网络、类别不平等和公共政治向着民主化转变的同类机制会受到它们的强化和推进。

表 9.1 列出了一些机制和过程(原则上,依据上述观点,这些机制和过程很有可能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之间的不同组合与序列。在我们的分析图式和复杂的历史事件首次相遇时,我们不需要证据来证明每一个假设机制的运作情况。假如下列两条的主要内容都能够得以运用,那么,我们就将把这样的结果看作是一种鼓励:

- 信任网络和类别不平等中的变化,影响保护性协商的大小和性质
- 公共政治中的转变,同样影响保护性协商的大小和性质 274

表 9.1 促进非民主化的机制与过程样本

1. 不平等性

- 强制性控制的解除支持当前的剥削关系和机会垄断
- 改变适应能力的教育和交流支持当前的剥削关系和机会垄断
- 取代现行组织模式的教育和交流,因而改变新组织构成中不平等的竞争
- 不同类别中的财产和/或富裕在整体人口中的平均化
- 现行的类别不平等与公共政治的分离

2. 网络

- 为政府各种义务而创造的外部保证
 - 现行的信任网络扩大和融合到政体中去
- 政府对先前自主的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网络的吸收和破坏
- 现行信任网络的解体
- 为了重要的长期且高风险的事业而去接近有效的信任网络但又不能接近的扩大中的人口
- 新的长期且高风险的机会的出现超出了现行信任网络所具有的能力
- 为风险的降低和/或损失的补偿而使政府的资源实质性地提高
- 政府对承诺看得见的兑现有利于人口中新的实质性群体

3. 公共政治

- 从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几部分与先前被排斥在外的合法的政治行动者之间联盟的构成
- 在不平等的类别和/或特征明显的信任网络的各种联盟之间的居间联络

- 对先前政治构成中有自主权的中间阶层的核心拉拢或者清除
- 先前有自主权的军事力量的官僚化感染
- 非政府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网络从政府中的脱离或消解
- 通过政府的权限而强加一致性的政府结构和实践
- 在动员—镇压—谈判的循环中,目前被排斥在外的行动者以威胁政府和/或其统治阶级的方式集体行动,政府的镇压失败,斗争随后而起,解决的方法是对动员起来的行动者在政治立场和/或权利上做出让步
- 在剥夺—抵抗—讨价还价的循环中,政府机关要占有那些为非政府网络所控制和用于非政府目的资源,这些资源的拥有者便进行抵抗,斗争随后而起,解决的方法是人民让出拥有的资源,换来对方给予的可信任的担保,即将来不再受到他们的剥削

275

- 处在那些变化中的机制和过程总体上能够改变政府机关与信任网络之间的连结关系
- 处在那些变化中的机制和过程总体上能够改变类别不平等与公共政治之间的分离状态
- 处在那些变化中的机制和过程总体上能够影响政治参与的广泛性、平等性、束缚力和保护性
- 对抗、殖民化、征服和革命通过对某些同类型的机制和过程的促进来影响保护性协商
- 相似的机制和过程既影响瑞士又影响墨西哥的民主化和非民主化的道路

- 没有明显地更简单、更有力或更好的图式用来清楚地解释这两个系列事件

如果要对上述各个主张做逐项精细的研究,那么我们的分析就将复杂得令人难以接受。下面我们就只考察在瑞士和墨西哥走向民主化的极不相同的民主之路中的两项:在信任网络中的变化,与类别不平等对保护性协商的性质和程度构成的影响。我们的观点是(a)政体与信任网络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和(b)类别不平等与政权之间的分离——但未必是类别不平等的减少——之间的结合,有助于民主化的产生。说得更为具体些,我们的主张是:

- 跨阶级联盟的构成(跨越一个主要的阶级边界而创造出来的统一行动)促进类别不平等与公共政治之间的分离。
- 中间人的核心拉拢(将此前自主的中间人和下属阶层中的领导人整合到执政联盟中)促进信任网络整合到公共政治中去。
- 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网络的解体(当权者与其下属之间不相称的、私人性质的关系链的断裂)同样促进信任网络整合到公共政治中去。
- 居间联络(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前没有联系的社会地点,通过能够调节它们彼此和/或另一个场所之间的关系的纽带联系起来)有利于前面两个机制——跨阶级联盟的构成和中间人的核心拉拢。

276

然而,这些机制和过程在瑞士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的组合情况是极不相同的。在瑞士,它们的组合促进了一个长期有限

但相对稳定的民主化；但在墨西哥，它们的组合至今还没有产生出稳定的民主政权。在民主化过程方面，我们一开始看到的是瑞士的弱政府的民主路径；后来看到的则是墨西哥的强政府的民主之路。

瑞士

瑞士的经历又一次以“不叫的狗”而引人注目：在语言和宗教差异普遍存在的前提下，瑞士却转变成为代议制政府。在瑞士，重大的差别一直以来都存在于说日耳曼语的北部和东部各州，存在于说法语的西部边界各州，存在于说意大利语的南部边境和说罗曼什语的、被外国领土包围着的东南地区。即使在名义上是讲日耳曼语的地区，城市与城市之间在阿雷曼方言上也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这种方言从语系上来说，属于瑞士德语方言，作为语言的一种，它实际上被用于口语交流。然而，尽管有着基于宗教和从宗教改革沿续而来的主要裂隙，瑞士人却很少为语言之间的不同而进行斗争。

事实上，瑞士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其相当弱的政权结构下，它的代议制却充满着活力。在欧洲，有着相似政权结构的国家和地区，如波兰，总体上都是向政府能力更强（和民主程度更低）的邻邦强国俯首称臣。瑞士的地理地形使它在受到攻击时有能力组织军事防御。另外，强大邻国之间的相互角逐争斗也给了瑞士喘息的空间，这种情况就像当年的列支敦士敦和安道尔曾经享受过的天赐良机那样。瑞士的民主之路，不管在别的方面怎么样，的确是经历过激烈的民众斗争，其中还包括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进而言之，使一个能力更强的中央政府得以产生的那同一个过程，也给瑞士创造了一种有限的但真实的民主：和

以前的情况相比,这种民主有着相对广泛的——尽管是不平等的——公民权、有约束力的公民协商和使公民免受政府机关武断行为之害的实质性保护。由于得益于法国人的占领,瑞士很早就避开了走向民主的强政府的路径,并且,瑞士在对地方性割据的寡头政治和封建制不平等实行包容后,实现了走向民主的过渡。

在连续几个日耳曼帝国统治期间,瑞士是处于交战状态、长期分崩离析的封地之一,现在瑞士的大部分国土的独立地位实际上是通过1499年的“巴塞尔和约”获得的,到1648年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它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上述瑞士的这些地区对用于贸易、交通和军队调遣的阿尔卑斯山北方主要干道的控制,给了它们在政治和商业方面的生存条件,但同时也使它们常常成为邻国列强干涉的对象。卡尔·多伊奇这样说道:

瑞士早期社会秩序的独特性,体现在它奇怪的山区地形中。比如,像乌里(Uri)这样的州本是一个农业州,它的居民却是商业化的、武装化的和消息灵通的农民;它是一座天设地造的城池,高高低低的山峦就是它的城墙,险峻峭拔的关隘就是它的城门;同时,它又是一个拥有都市风格的农业地区,这种风格使其自视为一个自我管理的城市。在下面的米德兰,既住着来自像伯尔尼和苏黎世这样的城邦的市民,又住着有自己州郡身份的农民,样子真像一排夹馅的汉堡包。如此一来,这里就出现了另一种关系,即城市市民与乡下居民之间的关系。所以,小城镇的权利也就由来已久,而且它们的自治政府受到更多的尊重。[Deutsch 1976:34—35]

直到 18 世纪结束之前,瑞士还只不过是一个由十三个州组织起来的、结构松散的联邦,它和结盟的日内瓦、格劳宾登和瓦莱及作为它们构成单元的下属地区,如 Vaud, Lugano, Bellinzona 和 Valtellina 之间有着很强的纽带关系。从 16 世纪到 18 世纪期间,出于自身考虑,瑞士尽管几乎完全退出了国际战争,但它仍旧为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提供精锐的雇佣军。在这期间,瑞士的政治主要是在地方和州中运转的:对外,它抵御外强;对内,它防止大的分裂和抑制各种特权。

在这整个期间,与几乎整个欧洲相比,各州在政府能力相当有限的情况下所做的民主尝试的程度相当突出。乔纳森·斯坦伯格这样评论说,

在最后的几十年中,瑞士古老的联邦政治真是一种奇迹,一种由互相交叉的司法、年代久远的习俗、破旧不堪的各种特权和仪式,还有风气、法律和度量衡中的各种异常性拼凑起来的奇迹。在卢塞恩湖畔,独立的盖尔绍共和国,居民不过 2000 人,却国泰民安;它作为欧洲一个最小的自由国家,在当时的政治理论家看来,是非常让人羡慕的。哥廷根著名教授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施利瑟(Friedrich Christoph Schlisser)曾认真地考虑过在“一种普遍的历史”方面为该共和国撰写一部多卷本的史书,并把它作为整个欧洲历史的一个缩影。[Steinberg 1996:39—40]

1798 年,拿破仑(在瑞士革命党人的帮助下)征服了瑞士。同年,瑞士接受了一部新宪法,很快便出现了一个较为集权的政府形式。然而,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政府,它仍旧是脆弱的。仅在 1800 年到 1802 年之间,就有四次政变发生。1802 年,法军撤离

时,瑞士爆发了各种各样的叛乱。在此背景下,瑞士很快就被抛向了内战的边缘,只是因为1803年拿破仑的干涉和新宪法的强行实施才未使它分崩离析。1803年的瑞士政权是一个很有趣的“调解”(“Mediation”)政权,它恢复了各州的大部分权利,但这绝非是对旧体制的重建。重组后的瑞士联邦政府是和国民大会、官方的多语政策、各州之间享有相对的平等权以及公民在各州之间自由迁徙等一起运作的。

除了部分区域性的调整以外,一个弱小的中央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在经受住了1813年到1815年期间另外一次几近内战(在强权干涉下而避免)的摩擦后又经受住了拿破仑的失败。1815年,在解决战争的方案上,奥地利、法国、英国、葡萄牙、普鲁士、俄国、西班牙和瑞典共同接受了一项关于瑞士二十二个州的条约即“联邦协定”(the Federal Pact)。根据这个协定,上述各国保证了瑞士国土的永久中立地位及其边界的不可侵犯性。

处于联邦协定下的瑞士政府,其政体的运转没有永久的官僚机构、正规的军队、统一的币制、标准的度量单位和国旗,但有着内部习俗上多种多样的障碍、首都的不断变换和各州代表之间的没完没了的争吵(各州代表都没权偏离他们所在选区的要求和规定)。在此,我们要强调一下19世纪30年代政府能力的软弱性。1836年7月27日,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从伯尔尼给克劳德·弗朗索瓦·德·科塞尔(Claude Francois de Corcelle)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这样宣称:

以我作为一名美国人的气质来看,我早就对瑞士的联邦制宪法产生了一种傲慢的蔑视态度。直言不讳地说,这个宪法在我看来根本不是什么联邦制宪法而只能是一种合伙制(a league);在此宪法下的政府是一个世界上最软弱、

最无能、最笨拙的政府。它除了把它的人民引向可想而知的混乱之外还能有何作为？英国和这个所谓的共和国相比，在“共和”上是其千倍。（de Tocqueville 1983:70）

就全国而言，瑞士生活在一个更倾向于否决而不是采取统一变革的制度下。因为新教徒全都集中在更富有、更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州，所以，一个接近政治分裂的新教—自由—激进派与天主教—保守派之间的对立，在 19 世纪 30 年代以前的瑞士政治中变得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在城市中，还存在着这一拨那一拨的反教会人士。在保守派占优势的地区如巴塞尔，乡下人往往支持自由的或激进的行动方案。在生产资本越来越集中的地区如苏黎世，冲突使得强烈依附于寡头政治的特权资本家 279 与正在扩大中的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升级、斗争不断。这些扩大中的工人阶级越来越要求在公共政治中扩大他们的议事、论事的权力，并且他们还与资产阶级中持不同意见的激进派建立起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瑞士的政治问题在全国结盟的形势下变得尖锐起来。因为结盟使得十二个较为富裕的、以自由—新教为主导的州与十个较为贫穷的、以保守—天主教为主导的州在各州只有一个投票权的国民议会中展开了较量。（严格地说，冲突双方都有一些组织和单位，由于早期分裂的结果，使它们只有投半票的资格，但 12 比 10 的投票平衡没有改变）。因此，自由派便利用爱国主义和多数胜过少数的原则做文章，保守派则拿州的权利和宗教传统给予回敬。三个级别的公民权——市级、州级和国家级——之间也展开了竞争（见 Prak 1998）。

1830 年至 1848 年，斗争接连不断，并常常伴有激烈的暴力。1830 年这一年，正是比利时、法国革命滚滚而来之时，小规

模的革命也在瑞士的城市和州如阿尔高、卢塞恩、圣加伦(州)、沙夫豪森、索洛图恩、图尔高、沃州和苏黎世纷纷爆发。在此背景下,共和派和激进派也常常组建军队[他们的军队常常称为自由团,或者是义勇军战士(Freischärler)],并且试图武力夺取某些州的首府。这样的兵团尽管在卢塞恩失败了(1841年),但却成功地把新政推上了洛桑(1847年)、日内瓦(1847年)和纳沙泰尔(1848年)的权力舞台。

如果说在这之后瑞士的历史是风平浪静的,那么读一读它的编年史肯定会使你大吃一惊。在1831年、1832年、1833年、1834年、1839年、1847年和1848年期间,围绕着瑞士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特权而发起的斗争此伏彼起,震天动地。最大的一次军事交锋发生在1847年,契机是瑞士联邦议会命令解散两年前由天主教为主导的各州组成的互保联盟(Sonderbund)。但命令遭到了拒绝,于是,联邦议会便出兵弗里堡和楚格(这两个地方的军队没有怎么抵抗便缴械投降了);然后又兵进卢塞恩(在卢塞恩,进行了一场短时间的战斗)。互保联盟有兵力79000人,联邦议会有兵力99000人。最后,战争以前者死33人、后者死60人而告结束。互保联盟的失败,在整体上巩固了瑞士全境的自由派的优势地位,促进了瑞士政府在1848年采纳一种谨慎的自由宪法,该宪法在一定程度上类似美国的模式。

1848年的战争解决办法只是作为一场内战的结果而出现的;然而,战争的和平解决则从国家层面上为一个长期的、有限而稳定的民主制奠定了各种各样的基础。战争之所以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那是因为在地方和州的层次上已经具有了较为直接民主的州(如卢塞恩、乌里、施维茨、翁特瓦尔登和楚格)与已经建立了代议制的州(如日内瓦、弗里堡、沃州、伯尔尼、索洛图恩、阿尔高、苏黎世、沙夫豪森和提契诺)之间进行协商的结

果。

这样一来,就存在着两个悖论:一个是以民主的名义而展开的民众武装斗争;另一个是那些本地已经采取了直接民主的人,却激烈地反对全国性的民主。我们对第二个悖论的回答将有助于第一个悖论的解决。反对联邦改革的地方上的“直接民主”,实际上已通过参与国民大会的形式加入到了政府的组建中,因为国民大会的基础是令人妒羨的、受到保护的平等性,此种平等性只为有资历的公民在有限阶层内所享有。与那些享有相当程度的政治自主权的欧洲城市之间形成直接对比的是,瑞士公社(commune)和州的男性公民却有权利和义务在民团(civic militias)中携带武器——这样的传统一直沿续到19世纪。因此,有资格的投票者通常携带刀剑、匕首或刺刀作为他们区别于其他人的标志。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几个世纪内,各武装团体常常根据自己的需要或者意愿组织起来,在这个或那个权威的领导下举行抗议活动。有时,他们会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去推翻某一个政权,然后成立一个临时大会来审判或检讨当权者的所作所为;或者他们干脆通过强迫方式迫使当权者去召开国民大会(Head 1995)。

但瑞士的公众平等背后却存在着寡头政治、大男子主义和压迫强制。尽管国民大会中的多数人能够而且也曾经真的就拒绝过由某一公社或者某一州的官员所提出的建议,但实际上,国家权力中的重要岗位通常为有钱有势的人所把持,因此,凡是对他们的地位不利的任何严肃的建议,也就几乎到达不了由大会进行发言和表决的地步。在有地方政体的方方面面借助直接大会来阻挠政府日常工作的地方,州级单位通常采用否决权(在投票否决中,只有有资格的投票者的多数人才能推翻一项正式的提议,而不论实际上有多少人投票)或者采用公民投票制(此时,

就某一项提议进行投票的投票人中的多数掌握着投票的输赢,而不论实际上有多少人投票),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避免面对面的口舌之战。不论上述投票的程序如何,瑞士的几种直接民主模式都有一个典型的特征,那就是投票的参与者范围狭小,在一个画定的圈子内,这些参与者享有相对平等的权利、有约束力的协商和对任何人来说都可以享有的有限保护。另外,瑞士的直接民主还和地方和州级政治的强烈保护彼此相联以抵御外来干涉。总之,瑞士的民主制度在对个人自由的保护上要远远低于它对集体自主权的保护。

相反,那些采纳了代议制民主的州都是新教的、自由主义的、商业和工业化的州,它们在总体上扩大了公民在州级政治中参与的范围,而且它们还试图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全国性的工
281 会来保护和促进商业贸易并抵御瑞士邻邦的入侵。1830年至1848年期间,瑞士发生武装斗争的主要原因是,城市中的积极分子为了实现代议制民主而要击垮直接民主中的寡头政治。在此过程中,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事实上他们也成了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央政府的提倡者。但他们对某种全国统一的需要及山区州的顽强抵抗,却导致苏黎世和伯尔尼的城市市民(burghers)将州的自治永久整合在新的联邦解决方案中。

历经艰难赢得的1848年宪法使瑞士成了一个联邦制国家,而不是法国模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它在联邦政府和州之间分权。它按照美国风格创立了一个双峰并峙的代表制体系。在上议院,各州的代表席位等同;在下议院和保护地方语言的权利上,投票者在人数上也基本相等。尽管瑞士政府在1848年的新宪中取得了胜利,但宪法的制定者还得把他们的意见先交给州级代表审议,经多数代表同意后,再经过全国公民投票,经投票中的多数同意后,方可成为宪法。由于要经过这样一个繁琐的

程序,宪法制定者因而也就失去了建立一支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军队的建议,失去了建立一种全国性的公学制度的提议,失去了建立一个全国道路网的建议,失去了在全国推行单一语言制的建议(Ruffieux 1983:9)。

与 19 世纪晚期的法国或英国的民主模式相比较,瑞士的联邦体制度看上去就显得格外地分散和异质化:一部风格独特的宪法,各州都有自己的主导语言和公民权;种类繁多的权威和条约;排他性和为接受新的政治活动家而创造崇拜气氛的能力之间的出色结合。1999 年,莱昂内尔·戈斯曼这样说道,“就在不久以前,上了年龄的巴塞尔人,仍旧像说到法国去或到德国去那样说‘到瑞士去’。”[Gossman 2000:6]瑞士州府所做的许多事情,就像是一个非常集权的体制明确无误地分派给国家政权结构下的直属机关所做的许多事情。例如,即使是瑞士国家的军队也要部分地受制于地方州府:州府有权把军官提升为上尉军衔。公务员和大学教授必须居住在他们工作的州并向他们所在的州交税。当我们说起国家体制或联邦政府的时候,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一种简略说法,在它包含的政治意义中要么有联邦大会,它的直属机关,要么有各州之间的联合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瑞士宪法虽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但在瑞士的政治史上,上述沉渣仍旧存在,并继续对瑞士的斗争政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282 (Giugni and Passy 1997; Kriesi, et al. 1981; Kriesi, et al. 1995, Trechsel 2000)。

在我们的能力—保护空间中,就联邦州政府的轨迹来看,到 1848 年结束以前,瑞士政府在相当程度地提高其中央政权能力的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内意义深远地实现了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显而易见地扩大了群体和个体的政治平等权,与此同时,有约束力的政治协商和政治保护也得到维护。在这一点上,我们

可以有理由地说,瑞士联邦体制下的公民权是非独裁主义的公民权。在这两者之间,瑞士联邦政权的能力曾蒙受过严重的打击,它的保护作用曾一度下滑,而内战又使这个国家四分五裂。但在内战期间及结束以后,联邦政权使其能力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也许在法国的霸权统治下,即1798年到1803年期间是个例外)。从1803年始到1850年止,瑞士政治史的轨迹是一个充满了斗争、从弱政府走向民主的轨迹。

接下来,我们将集中讨论瑞士政治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即1830年到1848年。在这十九年中,瑞士(从整体来看)从一个动荡不安的联邦制国家最终走向一个相对稳定、半民主化的联邦制国家。我们之所以说这十九年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原因在于加盟联邦的各州之间争吵不休,彼此之间互不平等,内部的寡头政治依旧存在,这些州在政治上的联系也仅仅是少得可怜的中央制度,并由此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半民主的联邦制国家。就是在这样向民主迈进的道路上,瑞士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冲突,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小规模革命,经历了几乎可以把国家永久性地弄得四分五裂的内战。

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几个世纪中,地方上的寡头政治通过有限的直接民主方式,使它与所有被认为是瑞士国家政权的東西分开(Head 1995)。在1830年到1848年期间发生的武装斗争,主要就是因为那些要求推行代表制民主的积极分子;要实现他们的目标,这些积极分子就必须先打败由直接民主所奉行的寡头政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努力不仅创立了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央政权,还使得那些寡头们融合到一个由他们正在建立的、更为广泛的瑞士政体中。这些积极分子虽然没能扩大平等,但他们却使新生的国家政权与作为瑞士社会和地理标志的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分离开来,除此之外,他们还开始在一个被

分割的政体中编织起各种信任网络。

瑞士的不平等

类别的不平等很容易转化为政治权利和义务上的差异和集体斗争所依赖的种种基础。但是,由性别、宗教、种族、阶级或其他划分原则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普遍存在的类别不平等阻碍着民主化的过程。上述原因会在政治参与中滋生不平等,会在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上扩大不平等,会使有约束力的政治协商杂而不纯,会使保护公民不受政府机关专断行为之害的力度削弱。尽管民主化不依赖于全国人口中贫富不均的消除,但它依赖主要的、天天都见得到的各种不平等与公共政治之间形成的缓冲物。在极为不平等的 19 世纪早期,瑞士面临的问题就是用什么东西在公共政治和由语言、宗教、阶级、地方性等造成的深刻分歧之间来创造缓冲物的问题。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关注的重点是跨阶级联盟形成机制。其实,跨阶级联盟形成最早是在宗教的不同派别之间发生的,但后来它超出了宗教的范畴。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担任瑞士州政府职务的官员们有着强有力的居间联络作用。 283

下面,我们将把注意力紧紧集中在全国范围内。1830 年以后,瑞士国家政治相对民主的产生,部分原因是不同派别的民主人士在当地和地区上取得了政治权力,但这并不总是给当地和地区带来民主。比如,在高度工业化的外阿彭策尔半州,半年一次的全由男性公民参加的户外全体大会(Landsgemeinde)长期以来一直掌握着最高的政治权力。但随着入学年龄和工作条件的变化,该州在 1834 年实际上已把参加会议的最小年龄从十六岁提高到了十八岁,到 1876 时,又从十八岁提高到了二十岁

(Tanner 1982:396)。从年龄这一点上看,该州实际上是在非民主化(dedemocratized)。

另外,操纵全体大会日程的阿彭策尔州的主要州级官员,差不多全都来自在商界和工业界中地位显赫的家族。当轮到布勒尔镇执掌其所在教区的行政职权时,从1810年到1820年期间(在此之前法国霸权政治已经扩大了该区的政治参与),该镇所辖的穷人实际上要比1820年到1840年期间更多(Tanner 1982:382—383)。乡村、城镇和州中愈来愈大的物质和政治上的平等能够和国家政治中愈来愈大的平等彼此共生,前提是只要各区域之间彼此维持着一定程度的隔离。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瑞士政体的特征是惊人的平等与不平等之间的各种结合。城市或乡村的同胞公民、操相同方言的人、参加宗教礼拜的会众成员都坚持平等的公共立场。只要瑞士的生存方式依旧是依赖传统的农业、手工艺、阿尔卑斯山北方的船运业和雇佣军出口的话,那么地方化的政府就会使其行政管理制度像手套去适应手一样去适应贫富不均的格局。然而,在18世纪,随着瑞士棉纺业的扩大,新的工人阶级和企业主阶层也相继出现。这些新生阶级摆脱了城市资本家、商人、地主与手工艺人和农民之间通常有的那种社会关系。举例来说,到1774年时,在巴塞尔内地,把所有家庭的人都加在一起,农民所占的百分比只有17.6%,按日计酬的雇工占27.3%,剩下55.1%的劳动者是家庭和工场工人(Gschwind 1977:369;参见Braun 1960)。

法国占领军和他们的同盟瑞士革命党废除了城市中的行会和那些导致贫富不均的主要支柱。自1800年以来,以机器为基础的棉纺业城市化,给乡下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不满现状的手工纺织工人;而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纺织业机械化则是对上述

手工工人的清除。另外,纺织业的城市集中化还在瑞士的主要布业中心塑造了一个规模虽小却典型的工业资本家与无产者之间的联合(Braun 1965, Gyuner 1968)。在那些布业中心,有组织的行业 and 它们的老板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财富、土地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对应关系被削弱。

瑞士的工业化并没能降低贫富不均的程度,相反,在短时间内,贫富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但分割的、特权化的瑞士公共政治体制由于在政治权力上维持着土地寡头政治,所以,当工业化把瑞士的农民赶进城市的时候,它与普遍存在的贫富不均就越来越隔绝了。正是针对与公共政治的部分隔绝和地主精英们的主导地位,商人、专业人士和工业资本家为了支持某种政治改革而只好团结起来,有时,他们甚至还和主张激进政治的工业工人结成同盟。公民权的扩大和国家化曾保证提高他们与老的地主精英们对抗的权力,但实际情况却是牺牲了更为贫穷的工人接近政府的权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平等现象的转变——尤其是它与公共政治之间关系的转变——给了 19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间的瑞士民主一种小小的促进。

接下来我们讨论的重点是类别不平等和公共政治之间错综交叉的关系而不是类别不平等的扩大、缩小和改变。在表 9.1 的条目中,处在变化中的瑞士的不平等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机制来促进民主化过程的:(1)强制性控制的解除是对当前剥削关系和机会垄断的支持,(2)现行的类别不平等与公共政治之间的脱离,(3)跨阶级联盟的构成。对第一种机制我们将从略讨论,但有一点非常清楚,那就是行会的废除和机器生产的扩大瓦解了先前的瑞士政府的政治制度与行业组织之间的亲密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瑞士政治制度的改变与西欧民主—资本主义革命之间没有多大的差别。

在第二种机制——现行的类别不平等与公共政治之间的分离——中,被瑞士保留下来的政治制度是以一个心照不宣的假定为根据的。这个假定就是:围绕着以土地财产为纽带而形成的牢固的当地人口,会阻碍政治与经济权力的转变。这样一来,地方上的寡头们就会获得和保住他们与更加强大的国家统一体之间的满意关系。瑞士的政治体制之所以在 20 世纪还显得那么独特古怪,原因就在于此。这种独特性可以通过以下事实略见一斑:公民投票和更为间接的各种形式的代表制的并存,直到最近瑞士的妇女才享有了投票权,为使乡村文化不致灭绝而制定的一系列保护政策。这些措施补偿了信奉新教并取得胜利的各州的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治中日益增加的支配性。它们没有也不打算去遏制因工业化而出现的更加明显的贫富不均,但它们的确在阶级、性别、语言、宗教派别与公共政治之间建立了缓冲。

第三种机制——跨阶级联盟的构成——在 19 世纪瑞士民主的基础中反复出现。1830 年至 1848 年期间非常积极地推进瑞士民主制度的自由派(主要由新教徒构成)中的精英们是不可能单独行动的。他们除了到工人和农民中去寻找反对天主教保守派的同盟外,没有多少别的选择。这期间的工人、农民不仅是各州人口的主体,而且至今通常仍听命于他们所在地方的牧师、地主和商人。因此,在巴塞尔和施维茨这两个州,以联盟为基础的民众反抗城市寡头的斗争,早在 1847 年的大规模内战爆发之前就引发了多次小规模的内战,并致使那些更为自由的半州(half-cantons,即州中工业化的那部分)正式地从它们先前的依附关系中脱离出来。我们在前面提到那些联盟,又促进了对民众有利的两个结果的产生:工人、农民在国家政治中获得了一定的权利;中央政府的能力得到了加强。

瑞士的信任网络

在促进瑞士民主化的过程中,信任网络的改变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里,我们将把注意力放在中间人的核心拉拢、保护人一被保护人网络的解体和居间联络这三种机制对民主化所起的作用上。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会遇到表 9.1 中所列的一些其他机制。例如,为政府承诺而创造的外在保证,和无法接近有效的信任网络的人口的扩大。

自 16 世纪后期以来,瑞士的政治生活大都是在由贸易、语言、方言和宗教分割所形成的范围内进行的。由保护人一被保护人关系形成的纽带把那些分割区中的穷人和富人联系起来,特别是宗教,它在瑞士的政治生活中侵蚀着各分割区之间严格的分界。公社和州的公民身份,常常由宗教信仰决定。例如,在 1798 年法国征服以前,“除前来避难的多数加尔文教徒外,所有天主教徒和非茨温利派新教徒(Zwinglian),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乡下,都不能成为巴塞尔的公民”(Gschwind 1977:423)。尽管少数民族,其中包括犹太人,是在多数民族的夹缝中生活的,但其宗教信仰在公共立场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不过,在从 1750 年到 1840 年这一相当长的时间内,瑞士两个阶段的工业化削弱了基于宗教、语言、手工业所建立起来的信任网络,甚至也削弱了基于更加古老的阿尔卑斯山北方的各种贸易形式所建立起来的那些信任网络。首先,农村工业生机勃勃的发展使大批农民失去了土地;其次,从 1820 年左右开始,纺织业的工厂集中化——先从抽纱后到编织——迫使工人向工业城市转移,另外还给乡下的手工编织业带来了短时期的兴盛与衰落。法国占领者对行会的废除和来自传统行业之外的制造商

们之间的竞争,两者均给由熟练工人(在此之前,他们曾是小规模生产的组织者)构成的信任网络以很大的削弱(参见 Rosenband 1999:457)。

尽管新出现的工人,从整体上来说,大都来自旧式的农民家庭,但他们已改变了的社会环境把他们从传统的、互惠互利的和家长式的农村网络中分离了出来。例如,在苏黎世的内地,由工业化带来的增量效应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斗争之间的结合削弱了新教牧师们对家庭法、慈善业、学校、礼拜日活动以及地方金融的控制(Joris and Witzig 1992:26;也见 Joris 1994)。很有可能的是,类似的过程也同样腐蚀了农村妇女之间的互信互助的关系网络。

在 1848 年以前的瑞士,这些过程在以新教为主导的地区要比以天主教为主导的地区出现得更早、进行得更为深入。瑞士早期的工业化全都集中在以新教为主导的州如伯尔尼和苏黎世,而不是以天主教为主导的州如卢塞恩和高山区。直到目前还没有历史学家就上述差异给信任网络造成的影响做过研究。除从历史资料来重构人际关系网常常会遇到的困难外(比如见 Bearman 1991,1993;Gould 1995;Kalb 1997),瑞士的史学家们还得穿透弥漫在当时各种评论中的、有关社会解体的种种强有力的神话(Braun 1965:41—43)。但即便如此,我们仍能够做出下面的推断:与由新教构成的关系网相比,那些由血亲、教区成员、友谊、互帮互助和教父身份等构成的天主教关系网不仅显得更加与众不同,而且在与公共政治的关系上处于更为疏远的位置。类似的差异似乎隔离了新教徒、工业城市如苏黎世的世俗派与他们所在州的、内地农业的、保守的加尔文教教徒之间的关系。

基于上述事实,我们的分析是这样的:在瑞士的大部分地

区,农村的工业化、农村人口的无产者化、接着是城市人口爆炸般的激增全都破坏了原有信任网络的正常运作。这里所说的信任网络是指那些通过婚姻、信托、互帮互助、聊天、交易以及穷人与富人之间持久的保护人一被保护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关系网。这些过程激活了在信任网络(表 9.1 中的信任网络)名下所列举的大部分破坏机制:现行信任网络的解体,无法为长期且有风险的重要事业获得有效信任网络的人口的扩大,现行信任网络无法应付的长期且有风险的新机会的出现。

与此同时,一个生机勃勃的资产阶级把赌注投向了能力更强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能够废除内部习俗上的各种障碍,并能创造防御外来竞争的各种保护,建立标准的度量衡,建设商业方面的基础设施和扩大公共教育。建设国家机器的各项活动进一步激活了把信任网络依附于公共政治甚至政府本身的种种机制。资产阶级的领导人和扩大中的政府能力在以下几个方面彼此互动。这几个方面分别是:(1)为政府承诺所创造的外部保证,(2)现行信任网络与政体之间的融合和信任网络的扩大,(3)政府对先前存在的、有自主权的保护人一被保护人关系网络的吸收或破坏,(4)用于降低风险和/或赔偿损失的政府资源的实质性提 288 高,(5)政府以看得见的方式兑现对人口中新增的、有实质意义的群体有利的承诺。

这些机制所涵盖的范围包括从政府到依靠政府的公共政治中的各种机构——各种政党,各种选举,特殊利益协会,工人协会,等等。这些机构与人民信任网络之间的相互融合既帮助又委托这些人民监督政府的各种行为,争取集体的一致声音。瑞士政府从作为现行地方特权和等级制度的盾牌转变为调解中枢——可以肯定地说,此一转变在法国和普鲁士远比在瑞士进行得更为深刻——起到了一种溶剂和信任网络转换器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将见证在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相互整合中通常会出现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间人的核心拉拢这一机制起了关键作用,尤其因为独立联盟战争的解决方案把信奉天主教的、保守的领导者,连同他们所在的州,在成立联邦体制和对州自治权做出广泛让步的情况下,都一起牢固地、深深地融进了瑞士的国家政治中。随着工业化、商业化的出现和反对旧时代由地主—神父支配的保护制的中央政治制度的建立,独立联盟战争的双方都发生了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网络的解体。居间联络对上述两种机制都给予了促进。它在1848年战争的和平解决中起着关键的联络作用,在普通的瑞士公民和国家政治制度之间提供了新的联络网。

1848年以前,在信奉天主教的瑞士人中间似乎不曾出现过这样的融合,但在信奉新教的瑞士人中间,朝着这种融合的运动从1798年瑞士共和国的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了。从1798年到19世纪40年代,瑞士的联邦政府明显成了新教徒的政府;天主教徒越是总体上反对联邦权力,新教徒就越是拥护它和依赖它。这种倾向的详细证据在整体上表明,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更愿意在由联邦政府支持的证券市场中投资,更愿意向联邦政府纳税,更愿意参军服役,更愿意把儿女安置在取决于联邦政府支持的行业,在寻求联邦政府调解纠纷上,新教徒也远比天主教徒更为积极。

就我们所知,至今还没有人整理过有关这方面的关键性证据。在一个公共权力大都掌握在州政府手中的国家里,加之19世纪289世纪的瑞士人又没多少机会去关心这方面的问题,出现上述情况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下面所说的至少是一种暗示:在1803年到1813年的调停政府期间,以新教为主导的州如苏黎世、伯尔尼、巴塞尔、索洛图恩、沙夫豪森、阿尔高和沃州等交税

的比率要比它们的邻居、以天主教为主导的州高(de Capitani; 1983:166)。可以肯定的是,税率高的那些州要比它们相邻的州在工业、商业等方面整体上更为发达。从整体情况来看,19世纪的瑞士,资本主义和新教之间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是一种巧合。资本主义的发展瓦解了更古老的信任网络,并使国家政权更加成为企业老板和工人的事业所依靠的核心。

你也可以讲一个关于瑞士民主化的故事,在故事中把它说成是理性行为、文化决定或者结构变化等方面的反应:比如你可以把它说成是1848年冬春之交那场内战的输赢双方聪明协商的结果;说成是瑞士公民文化的一种必然的长期表现,但其政治制度建设的精确道路并不排斥偶然性;或者把它说成是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一种有特色的副产品。然而,我们已经回顾过的充满麻烦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1848年有限民主的形成是来自范围广泛的民众斗争。从1830到1847年底,军事冲突、外交冲突、群众冲突几乎已达到了永久分裂这个国家的程度。瑞士全国民主体制的创立远不是简单地采纳一些小规模的民主惯例,而是通过一定程度地修改那些管理大多数州的公共生活的各种协商形式实现的。内战的震撼加速了不平等、信任网络和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零星出现的公共政治的转变。瑞士人的公民权和它的民主,尽管有其局限性,仍然是人民群众不断斗争带来的结果。

墨西哥

尽管墨西哥不是瑞士的镜像,但也非常接近。在瑞士成功地抵御着外来侵略的几个世纪中,墨西哥却在经历着被西班牙征服、殖民以及土著人的大批被杀。对墨西哥的征服持续了三

290 个多世纪,经历了许多阶段,且缺少同质性。例如,虽然科特斯打败了阿兹特克人,但前者又和后者的土著敌人结成了联盟;虽说教会是征服者的奴婢,但它的传教士们要比剥削印第安劳动力的克列奥尔人更有可能维护对印第安人的索取;虽说哈布斯堡王朝是按其土生土长的本能对核心地区进行统治并把许多自治权都交给了地方官员,但波旁王朝却遵循着一种更加集权化的政策,他们把一种拼合式的共同特权(corporate privileges)留在了身后。这种核心统治、地方自治和共同特权相结合形成的政权结构给现代墨西哥动荡不安的历史埋下了不稳定的祸根,它使墨西哥的历史长期以来充满了造反、叛乱、革命、政变和外人的占领。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 1821 年赢取的独立,经历了十一年的血雨腥风。冲突始于克列奥尔人一印第安人多数派对半岛上一位权贵的反抗,继而他们组建一支独立的专业军队,导致 1814 年在米切沃肯州首次召开“宪法大会”。反抗半岛权贵的斗争和“宪法大会”这两次运动皆告失败,墨西哥独立的真正实现是在保守的奥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Augustin de Iturbide)领导下完成的。
- 自由的和保守的精英们彼此之间相互斗争几十载,在此期间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外国的干涉和占领,本国的膏腴之地被北部邻邦占据。
- 当正式的宪法保证和普遍认为的联邦主义被行政权的集中化和个人化的统治削弱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根深蒂固的独裁主义时期(the Porfiriato)。
- 从 1910 年开始的十年革命,其压倒性的特征是一场连续

不断的军事的/革命的独裁者(Caudillos)之间的斗争,大批的乡下穷人潮水般地卷入到地区性和全国性的斗争中。

- 1928年到1929年的政权危机,始于当选总统阿尔瓦罗·奥布雷贡(Alvaro Obregón)的遇袭身亡。这场政权危机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个协定方案的出台,其中心问题是一党主导的政权如何构成。

以上种种,在五十年经济增长、国内和平和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集权化进一步加强的背景下,产生了一个多少是稳定的、选举式的独裁主义政府。

接下来是,墨西哥在面对国际经济、大规模城市化和一系列的政权危机时,扩大了国内的不平等,腐蚀了围绕在执政党周围的信任网络,打开了独立的农民、工人、市民和教师动员的大门,产生了我们将在下面讨论的民主斗争时期。

我们将从墨西哥被占领后所经历的漫长而又曲折多难的历史中选出三件事来。第一件事,即使是在波旁政权的鼎盛时期, 291 这之后当然也如此,墨西哥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统一的社会运行过(Rubin 1997)。第二件事,在当地出生的克列奥尔人——他们不是当地的土著人——引导了走向独立的运动,并在墨西哥的政坛上掌握政权达五十余年。除了那些短暂而又通常无结果的军事冲突外,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一直是墨西哥政权听话的臣民而不是挑战者。第三件事,与瑞士多灾多难的弱小政权走向民主政治的经历相仿,墨西哥在强权政治下所走的民主政治之路也不轻松。

墨西哥对民主的首次尝试是由自由的和保守的精英们发起的,这些精英们制定了有墨西哥特色的民主宪法。

然而,这些精英们制定的民主宪法通常是一纸空文或者很容易被集权化的领导者操纵。从获得独立到首次经历独裁主义的五十余年间,墨西哥在多次破坏性的内战中蹒跚而行,摇摆于左倾统治与右倾统治之间,经历着从脆弱的独立自主到连续不断的被人干涉。例如,美国在1847年的强行干涉,法国在1862年到1867年间也不甘示弱。随后,在土著人贝尼托·华雷斯(Benito Juarez)的领导下,墨西哥出现了一次短暂的原型民主时期,即所谓的共和俱乐部(Republica Restaurada),在此期间有着合情合理的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执行权与立法权的分离(Cosío Villegas 1973)。但自波菲里奥·迪亚斯(Profirio Díaz)于1876年上台后,1857年通过的自由宪法变成了新政府建立政治秩序的工具。新确立的政治秩序,从技术上看,是代议制的、自由的和联邦的;但从内容上看,它又是一个权力集中的、立法和司法部门皆为总统亲信充斥的政治秩序。这样一来,承认墨西哥幅员辽阔和地区之间差别悬殊的形式化的联邦主义就被集权化的行政体系削弱了,总统职权的行使实际上也是仅凭个人兴趣。正如社会学家安多雷斯·莫里纳·恩里克斯(Andrés Molina Enríques)曾经说过的那样,迪亚斯管理着一个“整合的”政府,借助“整合,实权……以及有名无实的形式权力一并整合到了总统一个人身上……”,借助中立,“所有不同声音都被中立了”(引自Krauze 1997:10)。

不过,随着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突然而又壮观地闯进了墨西哥的政治生活中。1910年的革命,结合着广大民众对建立一个能够真正实行代议制的政府的自由主义愿望和实现自由、公平选举的渴望,导致了政府换人,激发了民族主义者对摆脱北美经济控制谋求独立的兴趣,引起了工人们要求承认工会、获得体面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的需求,掀起了

农民要求土地权的热浪。另外,这场革命还伴随着地域性的军事/政治独裁者之间的冲突。在运动与反运动、政变与反政变和“革命家族”(revolutionary family)内部独裁者将领们之间的个人斗争中,这场冲突一直拖了近十个年头。

292

历经十年的冲突过后,来自墨西哥北部的军人总统们——所谓“索诺兰王朝”(Sonoran dynasty)——连任总统之职。这个所谓的“索诺兰王朝”通过建立中央银行、扩大公民教育和实施军队正规化等制度实现了权力的集中。该王朝在艰难中执政,直到1928年总统阿尔瓦罗·奥布雷贡遇袭身亡引发政变危机时为止。政变危机的解决是通过革命家族中上百个小党派之间的联盟实现的(Knight 1992:131ff)。最后,在一位强有力的总统[他是长期掌权的制度革命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的先驱]的领导下,组建了一个社团主义—人格主义的政党,该政党通过权力集中化和国家机器高度政治化等方式把主要的精英群体(其中包括教会)都集中了起来。一份与商业界不太正式的协定虽说在政策上做了一些让步和失去了部分财产,却换来了执政党的自由执政。

这一系列事件在墨西哥的政治史上带来了一个相当稳定的政治体系,该体系的特点是:有选民而无反对党,有组织群体自治程度低,以及一直延续到战后时期的、公民各项自由的缺失(Whitehead 1995)。为解决军事政变频繁发生的问题,打消或降低工人、农民不断提出要求的念头或热情,团结来自革命阵营的诸多群体,创造一个反对敌人的统一阵线,墨西哥政界的精英们在下述要素的基础上拼凑了一个权力体系:

- 每六年为一个选举期,届时一位强有力的总统一旦选定,那么再次进行总统选举的可能性就没有了;选定的总统

有权从“革命家族”中提名候选人,并对司法、立法两院有很强的控制力。

- 一个单一的(或几乎是单一的)政党要在多重控制的功能上为这位君主式的总统(monarch-president)提供服务,这些控制功能包括社交、选举和政治诸方面(Krauze 1997: 243)。
- 一个软弱的联邦体制,它的作用在于传达中央政策、分配保护体系和控制执政党的当选人,另外,这个软弱联邦体制还为地方权力结构的自主发展提供一定的空间。
- 一个主张能真正代表社会上所有主要群体(工人、农民、中产阶级和军人等群体,且革命就是以这些群体的名义发动的)的联盟性/社团主义的结构体系。
- 把群众动员作为一种行政手段加以利用,既能表明该政体的民众根基,又能作为冲突性的政策的调节杠杆,还能表明对主张有限自治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容忍,而有限自治的主张如果不能完全被吸收的话,则常常会导致改革派去努力进行改革。

293

在这一结构的核心,有一组联系中心与外围的连线,这组连线通过政府机关、政府官员和当地的首脑[被含糊地称为地方政治首领(Caciques)]的关系网络传输政府服务和动员公民投票。后者(即外围)被前者(即中心)所控制和决定,必要的时候后者可以请有镇压作用的国家政权来给予帮助,但后者的最大作用在于它通过分配政府资源换来由它提供的稳定的选举结果和由它维持的社会和平(在这些方面,后者即外围类似我们在第八章看到的苏联民族共和国的领导者)。对于这个垂直的、依附性的金字塔来说,它和一个水平的、社团主义的协定连接了起来。这

里所说的协定是指在政党、利益群体和机关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协定,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愿望:那就是为了维持1928年至1929年期间获得的那种脆弱的稳定局势和一同分享政府中的肥缺。执政党为了确保自己执政的连续性而采取的措施是,在精英群体之间谨慎地讨价还价,制定旨在阻止新党派从全国与其竞争的选举法^①,把对斗争的打压和宽容结合起来。

1928年至1929年达成的协定把潜在的斗争者都团结到了执政党的周围。执政党依靠政治而不是诉诸武力的方法开始清除反对他们的党派领袖(Knight 1992)。为避免冲突而采取的战略性的决定是把精英群体团结到单一政党中来,这种战略性决定在政权中心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永久性的“秘密顾问团”(Camarilla),这一做法和我们在最后一章看到的南意大利政治史中反复出现的Trasfomismo模式很相似。这在左在右都为反对派开启了空间,但这个空间不是有效的政治空间,或者说,它不是接近资源以对执政党构成严重挑战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前的情况一直就是这样)。

对斗争的相对容忍使墨西哥的政治制度没有出现在拉丁美洲所常见的那种独裁政治。在革命爆发后的头二十年中,墨西哥的斗争既激烈而频繁,有胜利的革命将领领导的军事政变,有整体主义“基督拥护者”(integralist cristeros)领导的对世俗政权的攻击,有时而激烈的劳工斗争,有20世纪30年代借土地改革 294

^① 关键的选举条例似乎是专门用来阻止各党派超越其地区限定的,除非这些党派能够证明它们最低限度的全国性。对这样的选举条例进行修改,既有利于民主革命党(PRD)又有利于全国行动党(PAN)在地方和区域选举中的成功;正是因为该条例的修改,2000年的总统选举全国行动党才取得了成功。(见Cadena-Roa 1999年所作的总结。)

之名、经总统卡德纳斯(Cárdenas)同意并领导的农民运动。

相比之下,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墨西哥是一个相对和平的共存时期,但到60年代和70年代时工农运动日益增多,1968年还出现了一次有组织的学生运动,并引发了特拉特拉科广场(Tlatelaco Plaza)的血腥镇压。

当日历翻到20世纪80年代时,斗争基本成了墨西哥日常政治中相对稳定的伴随物了。不过,斗争这一伴随物在墨西哥城遭受悲剧性的地震时得到了加强(这次地震引发了潮水般的自治运动);另外,使斗争激化的因素还有执政党内部的四分五裂与进步的民主革命党在核心人物C.卡德纳斯领导下的形成,(卡德纳斯是30年代领导墨西哥进行改革的那位总统的儿子)。尽管我们把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反抗的民众身上,但是,在这几年内,从政体那里开始脱离出去的一个关键性的群体却是商业界的国际性群体,它在1982年的银行国有化中受到了伤害。

只要斗争还威胁不到制度革命党的霸权地位,制度革命党就允许一种较高程度的社会斗争的存在,这样做对该党来说甚至是有利的。即使过了底线的抗议很快遭到了镇压,但它带来的结果往往是改革。制度革命党的精英们更喜欢收买那些发动斗争的领袖们而不愿放任他们走向政治对抗。安德森和柯克罗夫特在1972年时写道:“制度革命党的领导者更愿意系统性地去努力争取反对他们的人,即使争取的结果是非常有限的实质性的支持;作为回报,该党的领导者愿意召见他们的反对者并对他们做出部分让步。”(Anderson and Cockroft 1972:232)这样一来,一种有限的斗争政治就成了墨西哥不彻底民主化的机制之一,它给执政党提供了借助于政权扩大影响的机会,同时又避免了集中反抗的形成。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奠定现代墨西哥的协定上建立起来的各种民主形式已开始打破其专制主义的外壳。从农民和土著人群体到工人再到城市中产阶级的各种运动,从独立的商业群体再到反对党的种种抗议,墨西哥的人民群众正在扩大他们参政议政的范围。当处在政府的社团主义家族之外的各种群体创造出一个重要且明显具有斗争性的公民社会——一方面以墨西哥城地震后形成 *Assambleas de barrio* 为象征,另一方面则以 20 世纪 90 年代发生在恰帕斯州的半暴动的延续作为标志——时,选举权和人权也就随之扩大了。从占据着政治左右 295 空间的一个中间派联盟(*centrist coalition*)来看,掌握政权的精英们无可奈何地退出了他们在政治左右空间中占据的地盘,与此同时,从经济角度看,这些精英们正在脱离他们的平民主义根基,在和周围的自治群体的交往中显得磨磨蹭蹭(*Cornelius, Eisenstadt, and Hindley 1999; Rubin 1997*)。

从 1988 年到目前这段时间,有两个强大的以全国为基础的政党把一些反对群体融合了起来——这两个强大的政党就是中左的民主革命党和中右的全国行动党(PAN)。中左的民主革命党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立法中获得了多数派的支持,中右的全国行动党在 2000 年的三方竞争中击败对手赢得总统大选。虽然双方都有很强的区域性堡垒,但他们都从不同的选区广泛吸收选举资源,同时在他们的内部都分别施行联盟政治。这两个政党很像一个典型的左派对右派的民主—资本主义模式,它与 20 世纪 30 年代由制度革命党建立起来的中间派垄断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墨西哥的变化机制

在一半成人人口没有投票权的情况下,瑞士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产生了有限但明确的民主化。从1910年开始,墨西哥的民主化为何也会像瑞士的民主化那样出现呢?尽管在参加投票的墨西哥全体选民中男女各占了成人人口的一半,尽管墨西哥有一个如今具有竞争性的政党体系和一种结构强健的斗争政治。一个不太恰当的回答是,墨西哥的独裁主义太牢固了——甚至它采用的选举类型也是如此。但现象背后有本质这个道理解释不了现象的牢固性,甚至也解释不了现象中的各种变化。不过,一个更加历史主义化的回答是,那些用来解决墨西哥问题的最初方案已为墨西哥后期政治的发展自动地确定了路线。但是,假如路线决定论就足够了的话,那么墨西哥为什么没有走它的克列奥尔解放者按其最初的自由本能所指定的路线呢?或者走它的法国或美国占领者所指定的路线呢?如果我们能从不平等的转变之间的互动、信任机制和新社会行动者对公共政治的各种应用这三个方面来解释墨西哥的民主轨迹的话,问题就能得到更好的回答。

在此,我们想再次强调四个相关的机制:跨阶级联盟的形成,中间人的核心拉拢,保护人—被保护人网络的解体和居间联络的功能。就墨西哥这一案例来看,跨阶级联盟的出现,的确促进了牢固的类别不平等与公共政治之间的分离。当中间人核心拉拢和保护人—被保护人网络解体发生时,二者都有利于信任网络和公共政治的融合。然而,在墨西哥,居间联络在创造反民主联盟的机会上至少和它在把政体推向民主上是一样的。

与瑞士解决独立联盟内战时采用的方法不同,墨西哥结束

革命的方法是在政权中建立寡头政治,这个寡头政治的基础是一个庞大的赞助或保护体系,同时,又是一个把国家政权广泛用于寻租的体系。另外,墨西哥结束革命的方法还把大多数印第安人和以印第安人为基础的信任网络都排斥在了公共政治的外围。这样结束革命的方法给墨西哥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严重障碍。

与大多数观察家看到的情况不同,我们眼中的墨西哥现代政府体系不是从1910年,而是从1928年开始的。我们之所以把墨西哥现代政府体系的开始定于1928年,主要原因在于1928年是墨西哥总统奥布雷贡遇袭身亡(刺杀总统的原因是为了保护革命的征服者免受其敌人之害)的那一年,也是根据在1928年制定的一项协定实现社会稳定的那一年(制定该项协定的参与者实际上包括了革命家族中所有主要的精英群体,另外还有犹豫不决的教会)。再者,1928年还是在全国范围内为团结社团主义各组织中的积极分子而建立了一个由政府领导的社团主义组织体系的一年;也是在这一年,那种依附性的、垂直的等级制度扩大了,扩大的目的在于通过加强政府能力把一个范围广泛、差异明显的外围整合到中心去。

上述政治结构的变化决不意味着政府是通过降低其对经济大权的垄断来掩盖一种右翼阴谋。墨西哥的现代政治体系建立后不久,拉萨罗·卡德纳斯总统就把生活恶化了的农民和制度革命党联合起来(尽管这是低级别的联盟),采取的办法是一种席卷全国的土地改革和由政府资金支持的“合作农场”(ejidos)体系的建立,后者有效地把农民和政府结合了起来,并且预示了农民自治运动的到来(Sanderson 1984)。这种合作社体系的建立因为把农民包括了进去,所以在以后的几代人中都没有爆发农民运动;另外,该体系还创造了一个政府权力渗透其中的农业部

门。与此同时,政府还通过它的社团主义工会联盟把劳工置于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借此取得了和商业之间更为密切的联系,甚至还实现了它与天主教会的和平共处。通过一种更多是取决于利益分配而不是镇压的微妙的平衡策略,这个政党国家发展出了一个复杂的体系——地域性的依附网络。此网络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众多关系的直接发展上,以及社团主义制度本身建构其内部运作上”,都成了关键(Heredia Rubio 1997:10)。但在五十余年的时间内,该网络也使墨西哥的政治发展偏离了民主化的道路。

就我们的第一个关键性过程——类别不平等与公共政治的分离——来说,制度革命党体制的创立遇到的情况如下:

- 政府的直接介入减缓了墨西哥在地域和社会制度上极为严重的不平等,因为政府介入的方法是通过富裕区到穷困区的系统转移,从独立的地主阶级和工业部门向依附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系统转移。
- 在把处于大联盟或广泛联盟以外的那些人口和与政府的霸权进行斗争的政治群体排除在有效的政治参与之外上,政权同样得到极大运用。

就我们的第二个关键性过程(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融合)来说,所遇到的情况是:

- 经强有力的居间联络者通过垂直的依附主义和水平的社团主义而连接起来的政府与私人信任网络之间的关系,却悖论性地削弱了除政府操纵之外的公共政治。
- 被家长式地定为印第安人的大部分群体以及他们的信任

网络都被排除在了公共政治之外。

- 在银行业、学术界和商业部门均创立一些不受政府干预的自治的避风港。

相互矛盾的是,信任网络与政府日常运作的部分融合却给这些信任网络(包括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口中的信任网络)制造了障碍,使这些网络不能和政府以外的公共政治相融合。这种受政府影响的社会平均化、由政府创造的政治不平等以及由居间联络者调和的信任网络三者之间的结合,使得制度革命党的精英们能够连续执政达七十来年。

虽然在此期间没有出现像征服、殖民或革命这样足以摇撼墨西哥社会的大的历史事件,但是,由墨西哥制度革命党建立起来的现代政治体系到20世纪60年代时还是开始崩溃了。这期间有四种变化深深地影响了不平等、信任网络和公共政治,因此也影响了民主化。

第一,受石油业趋于繁荣的影响和自墨西哥邻邦直至墨西哥北部经济繁荣的推动,战后经济的变化使大批农村人口潮水般涌向了城市。昔日的农民阶级摆脱了他们对地方政治首领的依附关系,和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在技术上受过培训,在从业上更适于市场而不是官场——两大阶级都淡化了他们对制度革命党体制的依赖性。特别是在墨西哥的北部,那里是独立经济成长最旺盛、根基最牢固的地方,这一新兴的中产阶级在那里创立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保守的政党——全国行动党(PAN),该党获得的牢固支持既来自该地区信奉天主教的教徒,又来自该地区有组织的商业团体。但即使在执政党——制度革命党——内部,也产生了急于用技术管理来解决社会问题和对制度革命党政权的寻租体制不满的精英。 298

第二,在与国际经济进一步融合的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技术管理的实施。国际资本和金融——它们在以前的行政管理下皆处于绝境——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刺激了墨西哥的经济增长。1982 年和 1995 年破坏性的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墨西哥政府被迫大幅度地削减公共开支。开支的削减给个人收入和制度革命党的社团主义结构所具有的能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制度革命党的社团主义结构的能力在于它能够提供该党政权所依赖的保护体系(Cook, Middlebrook, and Molinar Horcistas 1994; Hellman 1994a)。1994 年 1 月 1 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成为这次经济自由化过程的最高标志。所有这些变化都不同程度地削弱了社团主义/依附性结构的有效性,与此同时,一种更为自由的、建立在市场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网络正在取代这种结构。

第三,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化双双打开了墨西哥在文化和政治上进行跨国交流的大门。这不是经济自由化的一种简单反映。1968 年爆发的学生运动和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积聚力量的公民运动的浪潮都是后来自由化运动的先驱。但经济国际化却把由墨西哥政府扶持的公司都置于竞争中。国际间的交流把墨西哥的政治和刑事案件都直接暴露给了国际媒体。例如,在经济极为贫困、政治高度紧张的瓦哈卡州,墨西哥民众向美国的迁移成了一个最有新意的社会运动发展的基础,这个最有新意的社会运动是指以加利福尼亚/瓦哈卡州为基地的 Frente Indigena Oaxaqueno Binacional。

第四,作为政治体制变化的一种结果,墨西哥的政体越来越易于受到国际压力的影响。例如,1994 年以前的墨西哥警察一直无视国际媒体的关注,所以,在 1968 年,他们敢于在一个国际记者团(这些记者是为了 1968 年奥运会而走到一起的)的注目

下,在特拉特拉科广场上公然杀害上百名学生;但到了1994年,墨西哥政府只好压制自己而没去镇压恰帕斯地区的叛乱,部分原因是国际反应的担心(Hellman 1999)。不那么显著但同样是迫于国际社会的目光,墨西哥政府被迫接受了一系列的选举改革和国际社会对投票的监督,正是有了这些变化,反对党在大选中才能够进行有效斗争并最终在全国选举中取得胜利。

墨西哥的不平等

有关墨西哥新自由主义的文献无一不在强调它对墨西哥人口中范围广泛的群体的破坏性。由世界银行引发的公共开支的压缩被严重地转嫁给了贫苦农民和没有工会保护的工人,这突出体现在给贫苦农民所付酬金的压缩和无组织保护的工人实际工资的降低上。但使得这种突然性的工资惊慌在政治上产生爆炸效应的,是上述转嫁政策在本质上对几十年来一直维持城乡低收入者安于现状的国家政策发起了攻击。随着经济自由化的进一步加深,工人的实际工资即使在政府的直属部门,如石油加工和提炼业,也都出现了锐减;甚至公务员和大学教授的实际收入也大不如以前。

从事小规模生产的农民尤其成了这些政策的受害者。在咖啡生产的出口部门,由于政府撤出了它在市场营销中的代理机构——墨西哥咖啡协会,使得成千上万个小本生产者从此失去了保护,而不能免于中间商盘剥和80年代后期世界咖啡价格暴跌带来的打击(Snyder 1999)。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诞生,则把种植玉米和大豆的小生产者都直接暴露给了来自北美的价格更低的进口商品所形成的竞争。虽然那些种植水果、西瓜和番茄等的资金雄厚的生产者可以自由地将产品运抵美国市

场并从中获利,但政府不再保护农业价格的做法对小本生产者尤其是一种灾难,而这些小本生产者都曾是制度革命党农民联盟的一部分;此外,这种做法带来的另一种结果是自治群体的竞争打开了方便之门。

制度革命党的社团主义/依附性网络的削弱降低了曾在政府物资和服务的分配中起调节作用的居间联络者的权力和活动效果。上述网络的削弱为在有相同身份的人群周围进行动员提供了种种新的可能性,而在此之前这些人群在墨西哥政权的中心外围关系中是不被承认的。墨西哥的土著人口按其种族文化的不同分成了几百个群体,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地盘、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传统。这一分裂结构恰好和制度革命党的垂直权力体系非常吻合。在这个权力体系中,许多地方政治首领都有着土生土长的根基,或者起码是利用他们在制度革命党的国家机器中的地位来保护和增进支持他们的当地人的利益(Rubin 1997:ch.3)。这些关系与制度革命党的权力之间既是垂直的又是暗中竞争的;它使得土著人在不同地区结成同盟或者达成利益共识的动机非常有限。随着制度革命党的社团主义/依附性关系网的削弱,地方上不同群体之间的融合和跨地区同盟的形成,都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这将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信任网络。

墨西哥的信任网络

墨西哥的信任网络在革命爆发(1910年)前的特征是:在被西班牙殖民者条分块割的基础上形成了坚固的地方和社团主义信任网络。这样的信任网络在庄园经济体制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但1910年革命后的混乱局势却严重地冲击了它。20世

纪 30 年代制度革命党体制的建立的主要意义,是它在地方和区域的信任网络与政府的社团主义/依附性网络之间起到的联系作用,这种联系的建立是通过那些在此背景下享有特权的居间联络者实现的。在墨西哥,信任网络分为两种:一种是印第安人的信任网络,它几乎完全被排斥在了制度革命党的体制之外;另一种是与制度革命党体制相关的信任网络,它建立在执政党的社团主义/依附性网络的外围。居间联络者权利的获得是通过他们对政府机关和当地依附者之间关系的调解实现的。通过政府以及在政府内部建立信任网络的办法,墨西哥的政治家们给可供选择的自治性信任网络的发展设置了障碍(Fox 1994)。墨西哥的政治过程,除在政府本身的操纵下之外,对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之间的联系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那些从制度革命党的高层和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政府部门走出来的、主张新技术管理理论的精英们,以及他们对 80 年代金融危机做出的新自由主义的反应,开始对那些包孕在国家权力中的信任网络进行梳理。由于政府越来越疏远它和经济活动中关键部门之间原有的关系以及选举竞争的愈加公开和不愿非制度革命党的总督、市长在制度革命党中任职,所以,与制度革命党有纽带关系的各组织的领导人便失去这种纽带关系对他们未来稳定性的保证,他们的依附者也就随之失去了对投票可能带来的经济稳定的信任。而与此同时,一种新型的、独立的关系网络已开始出现,传统的保护人一被保护人关系则开始解体。

在工人、农民和邻里当中,自治的民众组织开始向执政党的社团主义武装进行挑战,他们利用动员这种武器为支持他们的人尽可能地争取利益(Hellman 1994b)。有组织的商业团体作为主张政治自治的玩家在政治游戏中开始出现,它在全国范围内给制度革命党以经济上的支持,但它在地方和总督或州长的

选举中则支持全国行动党的候选人。在劳工方面,像自治工人同盟会(Federación autonoma de trabajo)等新兴团体的出现对官方团体(墨西哥联邦贸易组织,Confederación mexicana de trabajo)构成了挑战。甚至在官方团体的内部,一支仍旧认为该团体是革命家族一部分的老近卫军也开始被那些更加好战和更加专业的劳工组织者所取代。

因此,在墨西哥的公共政治中,一个有力的讽刺便出现了。在墨西哥,许多新近出现的反对派的领袖们都出自制度革命党的保护人一被保护人关系政治。因为反对派的领袖们在建立他们的反对党和独立组织的时候,他们通常也建立甚至传播了他们本身的保护人一被保护人网络。另外,他们还在原先是局外人的人群中寻找依附者。但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使得一个自治性的信任网络取代政府主导的保护人一被保护人网络的过程开始了。这种自治性的信任网络在范围广泛的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之间创造的种种联系客观上都促进了民主化的过程。

一旦由政府控制的信任网络的关键部位开始松动,此时不仅新自由主义政治而且还有旨在吸收持反对意见的人的选举性社会政治都成了各种自治组织获得接近政府资源的机会。为了给社会提供一个基础性框架和整体服务,萨利纳斯政府制定并施行了“全国团结方案”(PRONASOL),该方案的目标是团结与反对派有纽带关系的各个地区。只要有可能,地方政治上的精英们就会控制“全国团结方案”在他们所在的区域内的开销;但在其他地方,独立团体也能获得接近这个方案的路径(Fox and Aranda 1996)。在瓦哈卡州,到处可见的各种形式的土著人自治政府可从一个中央政府一级的宪法改革案中获得一定权力(形成该改革案的部分原因是由恰帕斯地区的萨帕提斯塔叛乱构成的威胁)。

在墨西哥,依附主义并没有从当前的政治体制中销声匿迹,相反它变得更有竞争性了。例如,在墨西哥的南部地区,总督大员们即使在面对萨帕提斯塔叛乱的时候,仍能操纵公共资源来为他们谋取政治上的好处(Heredia Rubio 1997)。墨西哥是否会出现一个民主的、政府能力强的政治体制——即在我们所谓的“强政权道路”的最后阶段——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墨西哥的公共政治似乎正朝着我们在民主化体制中看到的被指定的、得到容忍的与被禁止的等各种不同斗争形式的结合发展,因为有些挑战者会根据自己的发现来成功地利用继承下来的民主形式,另外一些挑战者则会根据新的用途对它们加以改进,还有一些挑战者则试图去建构一个新的政体。

302

比较与总结

诚如我们预言的那样,瑞士和墨西哥的民主化过程,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依循的是根本不同的轨迹,而最终到达的目的地也差别巨大。如同任何一种可能存在的政体那样,瑞士出现的民主化和我们理想中的弱政权的民主化轨迹相近;墨西哥的民主之路则与我们理想中的强政权的民主化轨迹相仿。在过去,尽管瑞士有其寡头政治及其特殊性,但现在的瑞士却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民主政体下。相比之下,墨西哥在向公民权区和民主过渡的过程中却经历了政府权力的削弱、犯罪、腐败与右翼回潮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瑞士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目前所形成的政治局面是通过它们与国际社会之间极为不同的关系实现的——在许多外国列强的交叉压力下,瑞士长期地被外部列强包围着(尽管这种包围带有一定的保护性);而长期生活在北方邻国——巨型资本主义国

家阴影下的墨西哥,通过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已经成了这个邻国的经济伙伴。经过几个世纪的出口雇佣军和通过武力解决地方问题之后,瑞士在19世纪完成了一项历史上罕有的业绩——稳定地把军事力量置于了民事权力之下。与此不同的是,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墨西哥的统治者是否已经把他们的军队和警察控制在了民事权力的范围内。不过,从墨西哥在实现政府能力和保护性协商上所需的时间与变化的程度这两点来看,整体上,1800年以后的墨西哥历史要比瑞士的民主化轨迹更像那些现在有资格被称为民主的国家在其早期所走的民主化路径。

尽管如此,我们对瑞士和墨西哥民主过程的比较,在两个层面上都有助于一个关于民主化的一般解释。在其中一个层面上,我们发现不平等、信任网络和公共政治的转变,如我们期待的那样,是相互作用的,这些相互作用的转变推动了瑞士和墨西哥更加接近地走向民主。更明确地说,在我们的述评中,我们找到了三个关键性的变化地点:(1)一个是在不平等和公共政治的交界面上,(2)一个是在信任网络和公共政治的交界面上,(3)还有一个则是在公共政治的内部。我们这样说,并不等于宣布经济上的转变和公众舆论的改变与民主化无关,而是证明只要它们促进了民主化,那么它们就只有或主要是通过不平等、信任网络、公共政治等的转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得以实现。

在另一个层面上,我们发现了一些同类型的机制,它们在瑞士和墨西哥的民主化过程中反复出现。表9.1中所举的大多数机制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似乎都是有可能出现的机制,但这些机制基于它们对不平等、信任网络和公共政治的不同影响而被分成了不同的类型。在分析中,我们从这些机制中只挑出了四种机制:(1)跨阶级联盟的形成,(2)中间人的核心拉拢,(3)保护人

一被保护人网络的解体,(4)既古老又常见的居间联络。当政治分析家们了解到居间联络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时,他们很少会感到惊讶。另外,居间联络还区分了一般民主化和瑞士与墨西哥的具体民主化之间的不同。我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区分,是为了弄清居间联络的各种活动对于民主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这里所说的居间联络是指它能降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特殊纽带所具有的相对明显性,同时它又能把一国所有人口中的各类群体和政府代理人关联起来。

在对瑞士和墨西哥的斗争与民主化的分析中,我们得出了两个有力的结论:

1. 斗争与民主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连续不断的:各种民主政体在斗争政治中形成,反过来又影响斗争政治;
2. 用来解释斗争政治中的行动、动员和各种轨迹的类型相同的几组机制也能用来解释那些产生民主的不太常见的政治变化。

民主化不是一种特有现象——只能与政治的各种斗争形式一起进行分析,并且只是在罕有和危险的转折时刻才触及斗争形式的根本。民主化也不是由精英们为一个社会所规定的简单事物——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把一个社会变得更为民主(有一些研究民主化的学者们似乎就是这么认为的)。20世纪30年代,在墨西哥民主史上发生的情况就是一个明证:其曲折的民主化轨迹在我们看来就是源于上述那种复杂情形。民主化产生于我们在社会运动、抗议周期、革命和民族主义中所发现的同类型机制中。

相似的机制——但它们以不同的方式组合——也会在其他

形式的斗争中出现,这些斗争出于独立研究之目的常常被挑选出来。这些相似的机制也许会以相似的模式在名义上不同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中产生连锁反应。在本书的第十章,我们将把一些已被我们考察过的、产生于这种或那种斗争形式的机制组合应用到另外一些名义上性质有别的斗争形式中去。

十 结论

我们已经履行了我们的承诺,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承诺。出于研究各种社会运动之目的,我们已从一个静态的标准议程(带有一次只讨论一个行动者的偏向,这些行动者主要来自西方社会),走向一种更为动态的和相关性的、对斗争政治的描述,而且所涉及的是世界各地。当我们从逾越界限的事件中获得例证时,我们还着重说明了有节制的斗争模式与逾越界限的斗争模式之间存在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我们一直都坚持认为在文化主义、理性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斗争政治研究方法之间进行选择是徒劳无益的,但我们还是采纳了在上述三种方法中所发现的有用的真知灼见。我们已经提供了一个旨在探明那些在各种斗争事件中表现活跃的机制和过程的研究方案。

同时我们也模糊了行动者、动员和轨迹三者之间已有的传统界限,并在它们之间发现了一些相似的机制和过程。我们用了十四个差别显著的斗争事件来讨论和证明我们的观点,同时尽其所能地跨越那些明显不同的斗争类型——民主化、民族主义、社会运动、革命等等——之间的界限,以便在它们之间找出相似的机制和过程。最后,我们也避免做出任何声言,说我们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普遍模式,该模式可以应用于所有的斗争事件或者那些特殊种类的斗争事件。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本书是如何展开的:在第一部分(第一章

至第三章)我们论述了有关斗争的行动者/行动、动员/遣散和各种轨迹的现有分析,同时还就在研究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的不同方法中存在的优点与不足做出了评价。该部分指出了在研究斗争时运用更多的动力学、更多的相关分析和更多的因果类比的必要性,但这种必要性在第一部分还未能得到满足。在第二
305 部分(第四章至第六章)我们保留了关于行动、动员和各种轨迹三者之间的区分,但为了确认相似的机制和过程,我们在几对复杂的斗争事件之间进行了排列。

到第二部分结束时,人为地在行动者/行动、动员/遣散和各种轨迹之间所作的区分,其武断性已经变得格外明显,因此,寻找一些解释性机制和过程的意义也就随之显现了出来。在此阶段,我们通过对相关性机制的强调使分析达到了一种动态性的要求,取得了一种一次可以描述多个行动的能力,尽管我们仍旧承认认知机制和环境的机制的重要性。

因此,在第三部分(第七章至第九章)我们便摒弃了对行动、动员和各种轨迹三者之间所作的区分,而赞成在革命、民族主义和民主化这些形成对比的斗争事件之间进行各种比较。在该部分的三个章节中,我们没打算给这些现象创造一些新的普遍模式,或者给考察中的这些事件提供详尽无遗的解释。相反,我们用这三个章节证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相似的机制和过程不仅会在迥然不同的斗争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根据这些事件的不同次序、不同组合和不同背景,它们还会产生出在总体上不同的结果。

为了支持上述观点,我们已经找了很多证据,但还不够,我们仍有一段路程要走。在本章中,我们希望能够做四件事。第一件事,根据前面几章的论述,我们要得出一些关键性的结论并指出它们具有的实际内涵。第二件事,我们将简略地描述三个

附加的、有活力的过程,以便能够证明那些出自我们的备选研究方案的解释性框架。第三件事,我们将重温那些有关范围条件的一般问题,以便推测我们的方法会有多广的应用范围。第四件事,我们将指出在我们的方法中还存在着种种局限和那些仍旧摆在我们及其他研究斗争政治的学者面前的各种挑战。

我们的主张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什么?首先,我们已经简略地勾勒了对斗争政治中那些难以说明的重现所作的部分解释。例如,我们就是用重现的概率来说明在一个持久的斗争事件中那些长时间连续不断的行动是怎样突然转变方向的:这些持久的斗争事件包括某种政体的崩溃、一个游击组织夺取政权、一批激进分子由从事恐怖活动转向合作等。在对斗争政治的标准化叙述中,这样的逆转事件常常是由如下两种情形中的一种或二者同时造成的。首先,这种叙述会用蒸汽锅在压力逐渐达到极限时突然爆炸来进行类比,说某种行动的突然转向是由于某种压力越来越大直至超过了关键性的域限。其次,会说参与某种集体事业的人由于他们认识上的改变,行动也随之改变了;这些参与者的认识之所以会发生改变,部分原因也许是某种看得见的事件渐渐明朗后而形成了新的理解,或者有一位新的领导人清楚地表达了另外一种不同的观点。 306

我们并没有否认上述两种情形有时会在斗争中出现。恰恰相反,我们曾经声称域限效应(threshold effect)会偶尔在斗争中出现,同样也主张过认识上的转变一般而言部分取决于关系的变化和环境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考察的斗争行动中,有一些行动向我们表明其方向的改变是因为相关性机制和过程

的激活,这类相关性机制和过程包括居间联络、合法性确认、跨阶级联盟的形成等。因此,20世纪70年代后期,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巴拿马、墨西哥和美国政府纷纷对索摩查政权撤销合法性确认,鼓励了对该政权的叛离,与此同时,却促进了对桑地诺主义反对派的支持。与此相仿,居间联络、合法性确认和跨阶级联盟的形成在由贝斯·罗伊(Beth Roy)所描述的1954年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升级中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为了辨明在这些变化迅速的行动中相关性机制和过程所具有的核心作用,不满情绪的积聚和意识上的改变都有必要考虑进去。

我们的第二个贡献,是我们把一种更具动态性的相关性分析引入到了一个常被静止、孤立的叙述所把持的领域中去。更准确地说,斗争政治的分析家们早已描述过社会关系中的动态过程 and 变化,但他们的描述大多是旁白式的和描绘的而不是分析的 and 说明的。静止的、一次只集中于一个行动者、重构该行动者的自我推动仍旧是他们采用的主导模式。当然我们也有部分责任,因为我们自己的早期模式更适宜对静态的框架提供具体的说明,而不是提供连接这些框架的动态箭头。这些模式也同样更适宜一次只叙述一个行动者——个体的或集体的——的种种行动。

对相关性机制和过程的明确辨认有助于促进更为动态的斗争分析。请比较我们在第二章和第六章对不同轨迹所做的各种分析。在第二章讨论战后意大利经历的那一部分,我们借用了现有的运动经历模式和抗议周期模式,这样的讨论明显是把战后意大利经历的复杂事件当作一个整体而与这两个模糊了其路径之偶然性的模式结合了起来,因此,讨论也就提供不了多少可用于辨认关键结合点的指导,由于一次只关注一个行动者,没有或很少给战略性互动提供空间。相比之下,在第六章讨论美国废奴运动的动员和西班牙摆脱佛朗哥政权时,我们对这两大事

件进行了比较并试图对上述讨论中存在的缺陷加以弥补。在比较中,我们的注意力投向了对认同改变、居间联络、极化和会聚等的辨认上,并且把它们看作是在这两大事件中影响斗争轨迹变化的关键性因素。

下面是我们的第三个重要主张:我们已经突破了明显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斗争之间存在的障碍。我们一开始就抱怨人们在研究战争、革命、社会运动和其他形式的斗争政治时所采用的分割方法。我们给自己的抱怨所作的回答是到彼此有别的政治形式中寻找相似的因果机制和过程。例如,居间联络,它在第二部分的六大事件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六大事件分别是:茅茅起义,菲律宾的黄色革命,南亚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南非种族隔离政治的转变,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和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结束。在这些相同的事件中,我们会常常碰到认同改变、目标转换、合法性确认和社会利用与不同的斗争过程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结合。例如,在反费迪南德·马科斯政权的反对派的形成中,情况就是如此。如果这样的过程能够和我们预料的一样强健有力,那么在如此众多的、名义上不同的斗争中,它们就能够用来指导未来的研究者去比较这些不同类型的斗争的动力。

方法论内涵

在这几章中,我们没有怎么去明显地关注方法论,但是,我们的分析已经包含了一些重要的方法论内涵。现在我们从中选出四种内涵:(1)作为研究对象的斗争事件的同步升级和降级;(2)把对事件的解释转到机制和过程上去;(3)对认知的、相关性的和环境的机制做更好的描述,并使之得以整合;(4)使偶然性与解释相一致。

作为研究对象的斗争事件的同步升级和降级。降级包含着不承认这些事件的独特性。作为常规的或随意的实体,我们称之为革命、社会运动、战争乃至罢工的种种事件,其实都是观察者、参与者和分析家们在其回顾性的建构中形成的,它们本身并没有实质的内容,没有自然而然的历史,或者说没有自发行动的逻辑。不仅如此,它们还和更为常见的过程相互交叉——这就为308 避免对它们进行分割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根据。例如,如果我们仅仅注意了美国反对奴隶制度中的废奴运动,那么我们会把一种至关重要的张力结构给忽略掉,这种张力结构存在于合法的政治行动者与随后形成的国会联盟之间,这一张力结构不仅破坏了他们之间相互交叉的妥协而且还把长期受挫的废奴目标引向了成功。

然而,事件也会要求升级。一旦我们知道我们把事件和它们的历史以及它们的社会背景割裂了,我们就需要把标明这些事件的开端、结尾、界限和参与者的程序和标准弄清楚。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培养一种能够描绘可比事件的专业知识。这里有两个明显的挑战:

- 首先是把斗争事件从更为日常的或规定的政治(prescribed politics)中区分出来——看它们是有节制的事件还是逾越界限的事件。在本书中,我们已重点讨论了逾越界限的事件,但并没给区别斗争事件提供一种像工具包一样实用的东西。这对于采纳我们的方案的任何人来说都仍然是一个关键性的挑战。稍后我们将回到这一挑战上来。
- 第二个挑战的核心是,如何更好地理解将传统的命名形式应用于特殊事件时所依据的过程。一个既定的事件因

为这个过程而获得了革命、社会运动、战争、罢工或别的什么地位的话,那么这个过程就具有了政治分量和意义了。这些赋予事件的不同名称不仅会影响随后而来的分析家们对它们的解释,而且会影响参与者的行为和第三方对它们的反应。因此,在我们的议程中就包括了那些命名和划分各种事件的社会过程。

把对事件的解释转到机制和过程上去。虽然我们把分析指向了可比性事件并且还把它们作为观察单元加以保留,但我们的分析也建议放弃对全部事件中所有的明显特征都给予解释的努力。这样一来,我们的分析就排除了把事件与总体模式搭配起来的那种通常程序,以便证明某种模式不适合于某一事件的某一特征,而为了提升它的适用性我们就得对这种总体模式进行修改。在把全部事件和社会运动、战争、罢工、革命或其他斗争重现形式中的不变模式相搭配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解释说明的手段,然而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我们的分析没有提供多少希望,而当我们把全部事件与在斗争的所有变化中都不变的斗争模式相搭配的时候希望更少。

相反,我们建议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从事件中挑出来的几个特征上(例如,为何认同的迅速改变会在迥然不同的事件中发生),或者放在相似性事件中那些反复出现的过程上(例如,跨阶 309 级联盟的形成常常会创造或扩大革命形势,原因何在,情况如何)。在以上两种模式中,任何一种模式都含有对关键性机制和由这些机制组合而成的转变过程的确认。例如,在分析墨西哥的民主化中,我们决没有提供一个无所不包的阐述——该阐述能够囊括从 1980 年到 2000 年墨西哥的各种政治冲突,相反,我们通过分析证明了居间联络是怎样让意义重大的再次结盟产生

的,而这种再次结盟的产生在别的观察家看来往往归因于认识上的变化或者外力带来的影响。

对认知的、相关性的和环境的机制的详细说明与整合。由于考虑到斗争政治的理论家们常常轻视相关性的动力,所以,我们有意对相关机制做了强调。然而,在我们的具体分析中,相关性机制与认知和/或环境的机制之间的组合属于我们反复援引的内容。例如,我们称为“突然强加的怨愤”的这种机制,就既关系到行动者之间关系的改变又关系到至少是一个行动者认知上的改变。在灾难和战争中,相同的机制也通常会涉及到行动者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在观察两个或三个常常是相互连结的特征明显的机制,还是已经发现了由于认知的、相关性的和环境的变化而构成了一个有效的恒定组合(该组合可以证明把复杂事件当作一个单一的、有活力的过程来处理是恰当的),从原则上说是不清楚的。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也不能事先决定这些要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例如,认知转变总是先于关系变化——或是相反。认知的、相关性的和环境的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给斗争政治的理论与研究提出了紧迫的任务。

无论是相关性机制、认知机制或环境机制,在本书中,我们一般都加以回避的一个更为基本的挑战是对我们在分析中业已运用的各种机制之操作性的详尽说明。像在处理事件这一概念时一样,我们对机制也只是给出了一般性的分析定义,而把操作性的详细说明留在后面研究。尽管我们对这样的决定感觉坦然,但这一方法论的挑战对于我们方案之最终可行性所具有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算过分。缺少明晰而默契的经验观察来给任何一个既定的机制作标记,我们的方案就有变成一种以似

310 是而非的逻辑讲故事的练习的危险,而这种练习就极为常见地

折磨着斗争分析。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就这个关键的挑战再作些说明。

偶然性和机制。最后,偶然性一直都和我们的分析路径形影不离,因为在对斗争的叙述中,任何一位愿意放弃结构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或个人主义决定论的学者,都必然会考虑到偶然性。我们不止一次地总结说:如果行动者 Y 在时间 Z 上没能做他该做的事,那么事件 X 就不会发生。还记得马那瓜地震对尼加拉瓜革命……所产生的催化效应吗?这类事件虽然不可预测,但可借我们的机制加以理解,因为这些事件和我们的机制是吻合的,更具体地说,这些事件是与机遇和威胁的归因机制相一致的。马那瓜地震在被索摩查理解为政府扩大敛财机会的同时,作为对政府行为的一种反应,它又被解释为对尼加拉瓜上层资产阶级利益构成的一个威胁。

偶然性还通过机制的相互交叉在事先不能预料的地方发生。请回忆一下,我们在第六章中所分析的激进化在西班牙和美国内战前发生的种种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随着佛朗哥之死的临近,巴斯克民族主义运动的激进化对镇压和军事化构成了挑战,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这个激进化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既有居间联络又有跨阶级联盟的形成,所以该运动能够促使政府和反对派中的温和主义者走到一起,这种敌对双方的会聚引导他们去制定一个向着民主过渡的公约。与西班牙的情况不同,当反奴隶制运动与转向西部寻求土地的北方人以及新共和党中北方和西部政治家们之间新联盟的居间联络结合起来的时候,美国反奴隶制运动的发展也引起了激进化。以上两者都是激进化的案例,但它们所引发的结果不同:一个导致了会聚的产生,另一个导致内战发生。不同斗争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偶然结果,仍将是我们的计划议程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研究斗争政治的一个新方案

有鉴于此,我们将给斗争政治研究者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研究方案呢?我们要提供的方案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311 为了不迷失于细节,我们先列出该方案的大纲。

消极的一面

- 放弃用理性主义、文化论或结构主义来证明特殊事件的努力。
- 放弃把事件和经典社会运动模式或任何其他不变的总体模式相匹配并以此解释事件的做法;比如,在第二章中,我们不去分析已经涉及的抗议周期的恒定模式,而是确认在特定条件下能产生周期形成轨迹的机制和过程;把这些机制和过程与那些能产生不同轨迹形状的机制和过程加以比较;对上述不变的总体模式与可变的模式中所发现的相互关系和关键结合点进行比较。
- 放弃对那些只是添加一些要素或只是修改一些主要特征的标准模式的批评;例如,为使现行的革命总体模式能够适应新的案例而忘记把变量加在这样的总体模式上。
- 放弃通过是/非比较或相关性分析以给所有类别的事件确定必要和/或充分条件的努力;例如,把对罢工浪潮的研究从确认其发生的一般条件转向对其动力的分析上。
- 偶尔采用那些相同的方法,主要是为了明确必须要解释的东西;例如,通过倒退(regression)或别的以相关性为基础的分析来表明,动员会在传统的社会背景中典型地发生,这样的社会背景与以什么方式来判定动态的和互动

的机制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因为这样的机制会典型地塑造着动员的过程。

积极的一面

- 透过一系列案例,以确认和检验特定机制之特定的与可操作的标识之存在;例如,阐明精英背叛的代表性实例并通过一系列革命形势以检验它的存在。
- 对通常过程——一再出现的各种程序以及各种机制的不同组合——进行确认、研究和比较;例如,通过仔细研究在多种多样的斗争事件中极化之一再出现,把极化作为一个通常过程来加以理论化和解释。
- 详细描述某些特定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同时对来自众多事件的证据进行检验;例如,批评和改进本书中对认同转 312 变的有关叙述,方法是把我们的各种公式与新的、记载详尽的事例进行比较。
- 在试图解释全部事件时,首先确定这些事件的特征是什么及其由此而需要解释的是什么,其次要确认形成这些特征的机制和过程,然后,通过至少和一个在特征上与之不同的其他事件的比较来加强我们已取得的确证;例如,把我们对瑞士和墨西哥的民主化之间的比较扩大到新的事件上去,但并不希望新的事件会和这两个案例中的任何一个非常相似,而是假定一些机制如果影响了公共政治与信任网络的交界面的话,那么这些机制就会深刻地影响民主化的产生或者民主化的缺席。
- 以人们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一类事件来确认这类事件成问题的特征是什么,接着再明确造成这些成问题的特征的机制和过程;例如,把我们提供给革命、民族主义和民主

化的那类分析应用到国际战争、内战、行业冲突或社会运动等事件上去。

三个富有活力的过程

以上是对我们工作方案的一种简要陈述。本章要面临的挑战则是从简要的陈述转向用实例说明本书精心设计的方法的实用性。请就第二部分的相关内容做一回忆：我们曾在各种各样的案例中一个接一个地去发现那些反复出现的机制。到了第三部分，我们则把讨论的重点转向了非常宽泛的宏观历史过程——革命、民族主义、民主化——并试图在它们之中发现我们所说的大部分机制的出现。但这些常见的斗争形式说明不了我们就某些关键性问题所持的立场，这些关键性问题出自特殊案例与更为一般的各种解释之间的对立。平衡二者之所需的关键，在于对富有活力的、包含着几组相同或相似机制的过程详加说明。

本书一开始，我们就提醒：如果读者是来找对一切斗争政治都通用的各种规律的，那么就只好让他们扫兴了。该不该把我们的方案理解为一种提议，说每一个这样的事件都是由影响该事件的一组独一无二的机制和过程构成的？是不是我们只是重新发现了一种叙事史并给了它一个新的科学词汇？我们可不这样想。虽然我们深信靠推理来获得关于斗争总体法则的做法是徒劳无益的，但我们仍旧认为我们的方案——假如成功的话——能找到那些组合成富有活力的过程的几组反复出现的机制，而这些富有活力的过程反过来又会在数量惊人、范围宽广的各种事件中反复出现。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这一说法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已经暗示了一个分析斗争政治的新途径：既不把相同的总体法则一股脑地应用到世上所有的斗争上，也不让对不

同案例的所有描述都以一种案例为基础,而是要对斗争事件进行比较,并通过能够激活这些事件的动力的过程来对这一比较加以说明。

近些年来,有关斗争的起源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关注,因此,在第二章中我们才有信心用“动员”冒险草拟了一个临时程序。当时,我们对“动员”所持的观点是:它最好被视为由许多成分构成的一种组合物,这些成分包括机遇和威胁、现有地点的社会利用、各种认同、各种组织,以及以常见的斗争形式为核心的各种创新。我们在第二和第三部分所做的研究,还没有使我们从根本上对“动员”是怎样进行的这一主题做出修订。但斗争政治(如我们反复说的那样)不是随动员的开始而开始,又随动员的结束而结束的。斗争政治并不仅限于斗争的起源。在这几章中,我们借助一个案例接一个案例来聚焦各种机制以求发现一组范围较广的、富有活力的过程。我们的目标在于探询一系列范围广泛的事件,以便了解这些事件是否以反复出现的机制组合——富有活力的过程(这是许许多多案例中都有的一种结果)——的方式发生了连锁反应。

直言不讳地说,这些分析还只是探讨性的。的确,书中评述过的十四个案例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了这样的过程。在进行总结的这一章里,我们将选择三个关键的过程,它们在范围广泛的各类斗争事件中以基本相同的形式反复出现:

- 在斗争事件中新政治行动者及各种认同的建构
- 在这样的事件中政治群体的极化
- 在范围越来越广的政治斗争中的规模转移(从原来的一个地区发展到几个地区,甚至是整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以及由此而来的参与斗争的行动者及其互动性质的各种变化。

在第二章我们用三个基准案例来开始我们的探讨。它们分别是：美国的人权运动，法国大革命，意大利的学生斗争。现在让我们回到这三个案例上，以便证明我们的方案即使在非常熟悉的案例中也能有新的发现。用该书一贯的探讨精神，通过把
314 上述三个基准案例简单地应用到从斗争政治世界中选择出来的三个新的事件上，我们又一次继续前行。尽管我们没有声称，对这三个基准案例的探讨像对前面十四个案例的讨论一样彻底，但我们还是在三个基准案例中找到了能够证明是相同过程的强有力的证据，在这些相同的过程中包含着关联在一起的相同的机制，这些机制我们将在我们的基准案例中给以探讨。

表 10.1 三个富有活力的过程和六个例证

| 富有活力的过程 | 基准案例 | 例证 |
|---------|-------------|---------------|
| | | 新案例 |
| 行动者建构 | 美国的人权运动 | |
| 极化 | 法国大革命 | 马卢古战争, 1999 |
| 规模转移 | 法国/意大利的学生运动 | 卢旺达种族清洗, 1994 |

表 10.1 粗略地列出了三个很有活力的过程和六个我们将用来证明它们的案例。

行动者构成

贯穿本书，我们一直都在强调有节制的斗争与逾越界限的

斗争之间的区别。有节制的斗争是由构建而成的(即自我定义和公众认可的)政治行动者发起的。与此相反,逾越界限的斗争通常是指把先前无组织或不关心政治的行动者引入到公共冲突的过程中来。那么这些新的行动者是如何建构而成的?新的政治行动者可以以几种不同的方法产生,其中一些方法具有高度的制度化特点。例如,许多选举体系就包括了某些创立新政党的标准程式,在广阔的历史范围内,某些新的军事事实体的形成就是通过历史悠久的招募武装力量的程序完成的。不过,在此,我们集中关注的看来是另一种富有活力的过程,经由此一过程不同部分的公民能够获得名分和公共政治地位。图 10.1 提纲挈领地描述了行动者构成这一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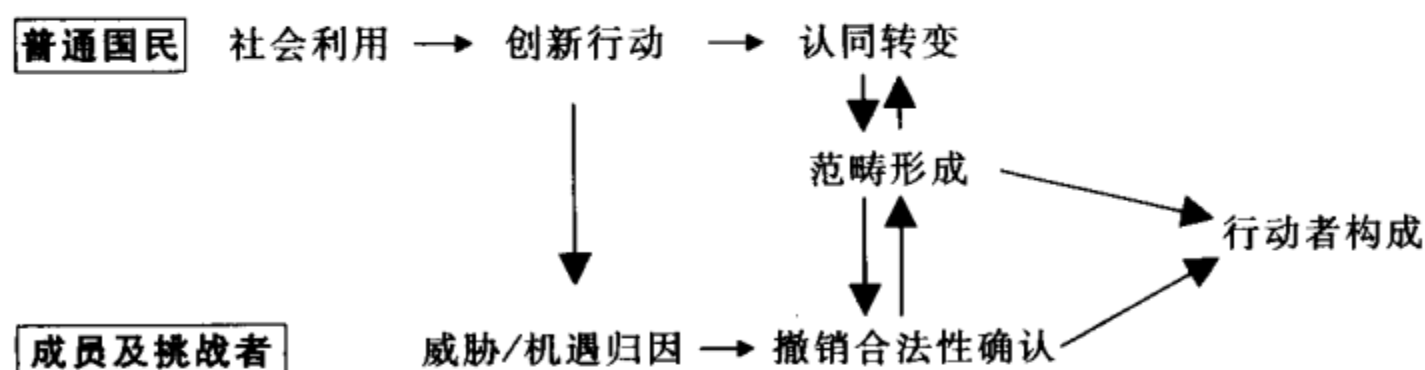
315

在该图中,最先那两个相联的机制对于看过第二章的读者来说应该是不陌生的。这两个机制——社会利用和创新性行动——在我们草拟的图表中,决定着动员过程中最后的动态连结。通过使某一现有群体在有关集体目的问题上重新定位,社会利用为创新性行动铺平了道路,但为使最初的动员过程得以充分实现,则这一行动意向就必须转化为创新性的集体行动,而一旦这种转化发生了,我们就可以说该群体的行动是斗争行动。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这一行动未必一定会带来该群体集体认同的转变。在我们已考察过的事件中,社会利用和创新性行动常常会激活另外两个机制,这两个机制导致了新行动者的公共构建与相关的集体认同。这两个已为我们所熟悉的机制是:

- 合法性确认:行动者的合法性、其行为和主张被其他政党,尤其是权力当局所认可。而合法性确认的对立面则是撤销合法性确认。
- 范畴形成:一组边界共享的地点的创立不仅使全体新行

动者与其他人区分开来,而且使它们与至少是一组明显被该边界排除在外的地点联系起来。

介于创新性行动与合法性确认/撤销合法性确认之间的因果联系是直截了当的。由于创新性行动违背了其他政党对于某一发展中的冲突所作的行为预期,这些反叛群体典型地激起了受其影响并旨在使形势(因创新性行动而使形势变得较为混乱和难以预测)回复到可以理解状态的其他人去努力做出解释。虽然这些解释努力会常常触及许多问题,但其核心仍然是企图公开断言那些暴动参与者的身份是合法(合法性确认)还是非法(撤销合法性确认),再扩大一点地说,由这些参与暴动的行动者所提出的各种主张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就后者(努力做出解释的人)而言,在企图做出合法性确认与撤销合法性确认的各种努力时,很难说他们就是被动者。相反,新生群体部分地还试图通过重新确定在其所处环境下他们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从公开的(和内部的)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以重新构建他们的认同和目的。这一过程的典型结果是一个新的行动者类别的形成、反叛群体方面的认同改变和对范围更为广泛的行动者(他们构成了一个新生的政治斗争领域)之间关系的重新构建。



317 图 10.1 经斗争互动产生的行动者构成

美国的人权运动

在第二章中,我们对战后美国人权斗争的出现做了一个简要的重新解释。这里,我们关注的核心是这一斗争的转折点: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联合抵制行动使该斗争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开始走向逾越界限的阶段,另外,这种联合抵制还引进了一个重要的新的行动者——人权运动。

把联合抵制行动从最初设想的为期一天的行动继续进行下去的决定,一下子使该市陷入了导致分裂的冲突中,并且还在一段时间内在当地引发了有关这次联合抵制的意义及其主要行动者之认同问题的激烈争执。由于全国性媒体对该事件所作的同情性报道,争执很快便在蒙哥马利以外的地区传播开来。对该事件的参与者持反对意见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该事件的早期就已经出现了。

《蒙哥马利广告人》(*Montgomery Advertiser*)发表的信件,明确无误地表明了种族隔离主义者对这场斗争所持的观点。1956年1月9日,该报刊登了由乔治·福斯特夫人(Mrs. George Forster)写的一封信,信中肯定了是“恐惧”而不是对种族现状的不满,才是当地黑人决定拒乘公共汽车的深层原因。福斯特声称:“有许多黑人……他们想乘但又怕乘公共汽车。那么这些人的恐惧来自何处?又是谁给他们带来了恐惧?”(引自 Burns 1997:118)。另一位白人作家用大家广泛认同的观点提要式地回答了福斯特夫人的疑问:蒙哥马利的黑人都只是简单地被唬住了“的一帮,他们整个地受着共产主义阵线——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的控制”(Burns 1997:116)。由于不愿相信当地黑人——用信中一个反复使用的短语说,即“我们的黑

人”——只靠自己就会自发地行动或者有能力发起一场这样规模的战役,因此,这场联合抵制就被归因于模糊不清的外部力量,极为常见地是把它与由共产党主导的“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联系起来。就他们的观点而言,美国南方的政治领袖们只是在尽义务,是维护“南方生活方式”的勇敢的保护者,同时也是颠覆性的“外部煽动”的牺牲品。

但在寄给北方报社的信件和有关联合抵制的社论中,对这场运动的有关叙述很快就出现了另外一种观点,并且也产生了支持这次运动的主要竞争对手。与种族隔离主义者所持的观点不同,自由主义者认为,联合抵制行动和规模更大的运动是蒙哥马利市黑人社群力图纠正几十年来他们一直遭受的压制的努力,是草根阶层英勇精神的表现。1956年,埃莉诺·罗斯福在其所写的文章中争辩说:“公共汽车抗议活动……已成为人民群众为捍卫自己的权利,向不平等的制度展开斗争所取得的显著业绩之一……在美国这个国家,就我们所知,这还是第一次。”(引自 Burns 1997:314)

自由派教士哈里·埃默森·弗斯迪克也同时说道:“位于亚拉巴马州的城市蒙哥马利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种族偏见和歧视是对上帝福音的根本违背……有尊严、有毅力和爱和平的蒙哥马利黑人们站了起来,他们对上述种种邪恶和不平等展开了斗争,这是上帝赐予这个国家的一份厚礼,同时也是一种教训,这种教训不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应该吸取。”(引自 Burns 1997:315—316)和种族隔离主义者一样,弗斯迪克也援引了同一公敌——共产主义,只不过弗斯迪克在这次对共产主义的指责中变换了一种角度,他说,那些捍卫“南方生活方式”的人,也正是资助和煽动共产党人的人,即便只是出于无意。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都旨在对反种族隔离运动给予合法

性确认(北方自由主义者)和不予合法性确认(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反种族隔离运动已成了公众对联合抵制争论的焦点。然而,在这场范围广泛的确定名分的斗争中,联合抵制行动的参与者很难说就扮演了被动者的角色。与这次运动相关的人物——其中马丁·路德·金最为著名——都投身到了“表意工作”(signifying work)或者说他们自己的事业中。这项工作的很大一部分被简·詹森(Jenson 1998)说成是“群体命名”(group naming),而我们则更愿意称之为范畴形成。蒙哥马利市的反叛者把自己的联合抵制行动建构为一场正在进行的运动后,我们该如何去认识这些暴动者呢?他们的种种行动使约定俗成的身份——这个群体或那个群体中的成员,“我们的黑人”等等——早已失去了恰当的依据,这种情形就像用传统的集体术语去描述新出现的群体那样不合时宜了。1956年3月,马丁·路德·金在一段后来被广泛引用的陈词中,为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做了新的界定。他指出:

我们在蒙哥马利进行的这场非暴力抗议意义重大,因为它向黑人、北方人和南方人表明,许许多多有关自己和其他黑人的陈腐观念都是毫无根据的。……在蒙哥马利,我们走的是一条崭新的道路。我们精神抖擞,扬眉吐气。甚至那些聚集到蒙哥马利的黑人记者也具备了一种新态度。一位退了休的记者正在伯明翰的一家餐馆吃午饭,当被问起蒙哥马利时,他便从座位上站起身来,想了一会儿说:“身为一名黑人,蒙哥马利使我感到骄傲。”(引自 Burns 1997:244)

在整个联合抵制行动期间及之后,该运动的领导者在无数次的发言中都援引过“新黑人”(new Negro)这一形象,其内涵不

言而喻：这次运动不仅仅是改变蒙哥马利公共汽车乘坐法的一种工具性努力，它还是南方黑人之间一种新的集体认同在更加广泛意义上的一次表现。因此，这些表述除阐明了范畴形成这一关键的机制外，还提供了作为斗争互动功能之“认同转变”的清晰且具有高度重要性的实例。

在运动开始之前，非洲裔美国人几乎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共同的种族身份，但是，这种意识的本性常常会因为其他身份（比如，阶级、地域、性别、黑皮肤）的介入而变得复杂，这些身份更易使人口分裂而不是团结。对许多人来说，运动的有力推进，有效地重组了这些身份，它把共同的种族身份放在了首位，同时它又平息了黑人社群中的种种分离，尽管这种平息不是根本的消除。一种强烈而又持久的种族意识成为这次运动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遗产之一，而蒙哥马利联合抵制行动在促使其发挥作用上提供了帮助。

在其他一些案例中，我们同样能找出行动者合法化这一相同的一般过程。例如，在茅茅起义中，行动者构成这一过程促进了范畴形成，和肯尼亚与英格兰两国各政党就是否认可而展开的斗争。但相比之下，蒙哥马利运动引发了大量的公众讨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而茅茅起义却只有一种声音，还是官方的声音。所以，茅茅起义尽管也是一个新的行动者，并且通过修改和传播有关这次叛乱的叙述而取得了合法地位，但人物刻画中的妖魔化性质有效地否认了这次运动的合法性，这样的结局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然而，一个更为严峻的考验是，我们在描述美国人权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时所勾画的行动者构成能否也同样应用到其他案例上。

文化大革命

在有关 1966 年北京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精彩叙述中,安德鲁·沃尔德(Walder 2000)清晰明了地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行动者构成之过程的实例。像对待蒙哥马利事件一样,沃尔德认为,较之在一种高度危险和不稳定的政治背景下发展为斗争互动的一种逻辑结果,认同改变在激发北京的行动方面并未产生太大作用,沃尔德对此所作的论说值得详细引述:

对 1966 年至 1968 年期间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派系活动的结构主义解释认为,促发集体行动的利益和认同在运动开始之前就已形成。重大事件发生的次序——各种学生派别由此而于 1966 年下半年在北京出现——却与结构主义的解释相矛盾。……各学生派别的形成是参与者 320 在不明朗的政治环境下采取初步行动以后才出现的,这种不明朗的政治环境在不同的高校之间差别极大。这些个体性的选择破坏了先前存在的地位群体和当地的政治网络,接下来又强加了一些新的政治认同——这些认同对于可能领导反对派的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来说具有非常严重的潜在后果。这些强加的认同限制了选择的范围,并在第一时间清楚地规定了利益的属性,最后成为群体构成和冲突的一个基础。[2000:1]

沃尔德的解释与我们在图 10.1 中所简单描绘的过程是相当吻合的。1966 年 5 月,持不同意见者在北京大学采取的初步行动被北京大学的党组织(它是把这些行动当成对合法政党的

一次“无组织、无纪律的派别攻击”来做出反应的)明确无误地定性为威胁。但到6月2日那一天,情况发生了变化。曾是持不同意见者借以发起攻击的大字报,这一天印发了一篇来自《人民日报》的社论,这篇赞扬性的社论清楚地表明了政府高层,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都视这次攻击为检验由政府任命的大学领导人的革命态度的一次机会。北京大学的持不同意见者所得到的来自政府高层的认可,在该市的其他一些大专院校产生了相似的影响,继而引发了图 10.1 中所表明的各种机制的混合。

在所有受到影响的高校中,围绕给予认可/不予认可的激烈斗争随之高涨起来。与此同时,持不同意见者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尖锐。另外,各种各样的外部“评论委员会”(review committees)和其他政党/政府精英们都借机参与到这场纷争中。当新生群体之间为了自保而必须进行势均力敌的斗争以便抵制对方的恶意攻击时,上述事件的激烈程度和常常伴随的生死攸关的严重性就迫使高度重要的认同转变的出现和各种利益共识的达成。社会心理学家用了一个术语“变换角色”(alter-cast)来把握这一过程,借助这一过程其他一些人通过描述以某种方式发生的既定改变,以力图形成其自身的行为。与许多斗争事件相仿,文化大革命也开启了这种竞争性的变换角色冲突。从这些冲突中一些新的集体认同与新构成的政治行动者出现了。

我们将用一个明确的预测来结束对该过程的讨论。我们的这一预测来自对所有已经评述过的案例所做的比较分析。尽管我们认为行动者构成这一过程有可能在极广泛的斗争事件中出现,但根据沃尔德的观点,我们还是假定它最有可能出现在这样的案例中,即与各种冲突相连的风险和作为风险结果的不稳定性都很高的案例中。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这一结论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第二个过程——极化。

极化

我们所说的极化是指在斗争事件中,提出要求者之间在政治和社会空间上的扩大,同时还指先前态度暧昧的或者态度温和的行动者向着这个极端或者那个极端或者两个极端的移动或转移。当极化发生时,它在斗争事件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伴随物,因为它能把温和的中心抽空,阻止先前的联盟重新组合,为未来联盟的构成提供新的渠道,甚至能在最为具体的政策问题中注入可以阻碍其解决的意识形态内容,它还能导致镇压、武装冲突和内战。

在前几章中,我们已经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极化过程的例子。在第六章,极化体现得最为明显:它瓦解了辉格党,使奴隶制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归入不同军事阵营,最后导致内战爆发。但以激进一翼效应的形式,极化却对西班牙的民主化产生了积极效果:由于害怕军事政变,极化以双方同意的民主化形式将政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聚拢起来。极化还以明显的形式出现在尼加拉瓜,出现在茅茅起义中,出现在菲律宾、瑞士和其他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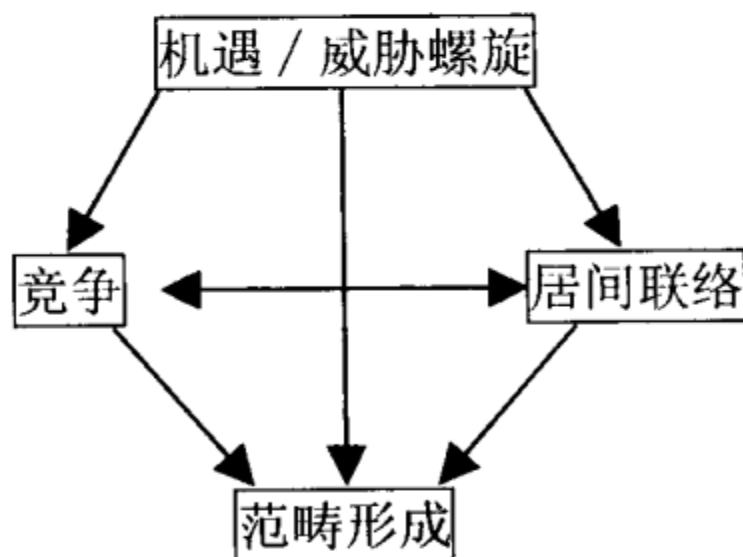
极化能与机遇/威胁螺旋机制、竞争机制、范畴形成机制、无处不在的居间联络机制等相结合。以1830年至1848年的瑞士为例,我们发现:1830年的情况是公社和州的身份构成了瑞士公共政治的主体,而国民身份几乎回答不了“你是谁?”这样的问题,甚至当把国民身份与外部强国连在一起时,情况也是如此。但自从信奉天主教的“独立联盟”在1845年形成以后,保守的天主教教徒和一个自由派的联盟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深,最后走到了内战的边缘。这一极化创造了一个新的边界,跨越这个边界,1848年的宪法制定者就不得不进行协商。一段时间内,极化并

没有减少边界双方已建构出的行动者之间存在的分歧,但它与竞争机制以及机遇/威胁螺旋机制结合,由此导致出现范畴形成和居间联络——它们再次成为对双方来说都是绝对关键的机制——而极化了瑞士政体,使它在1847年走到致命冲突的地步。

在接下来的一节中,我们将回到我们的第二个基准案例——法国大革命,来证明我们的方案所具有的力度,接着再简单地把我们的基准案例和一个完全不同的案例进行比较(这个完全不同的案例是指1999年在印度尼西亚爆发的马卢古内战),以便证明极化在斗争政治中是多么地常见。尽管这两个案例在范围、规模、行动者以及结果上都极为不同,但相同的机制在这两个案例中都出现了。

革命吞噬了它的孩子

在西方历史上,最有名的极化案例——一个给众多作家提供了未来革命模式的真正样板的案例——是1792—1793年国民公会中“山岳派”雅各宾派与他们此前的同志吉伦特派之间的分裂。



323 图 10.2 极化

根据这一事实,参与者和历代的史学家们已经具体化了这些分裂,而且还在某些案例的分裂中找到了法国政治之所以长久分裂的根源(见 Sydenham 1961: ch. 1 所作的评论)。这些人有时忘了上述这两个群体(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是在反对王室与反对支持王室的斐扬派的斗争中,仅仅在一年前才联合在一起的,它们都是从 1792 年 8 月至 9 月间雅各宾俱乐部内部分裂出来的(Higonnet 1998: 35)。换句话说,极化在法国的政治文化中并不是命中注定的;极化是一个过程,它来自革命中相互作用的政治关系。

在这个极化的事件中,国民公会中的左、右两派都在为争取态度暧昧、左右摇摆的“平原派”而进行着竞争。随着各派系围绕着一些领袖人物和一些共同主题经过重组而最终明确下来时,范畴也就随之形成了。由街头行动者所滋生的机遇螺旋机制在两个由代表们构成的顽固群体之间产生了各种张力,由居间联络创造的联盟帮助了胜利的雅各宾派去瓦解他们的敌人——吉伦特派。现在让我们回到这个过程上来,以阐明我们在极化中看到其运作的联合机制的各种作用。

我们要确立的第一点是,吉伦特派并非像他们后来的辩护者们所建构的那样,天生温和(Lamartine 1848; Tierchant 1993)。在制造战争上,他们比犹豫不决的罗伯斯庇尔更具有冒险性,与他们后来的敌人一样,他们利用无套裤汉的暴力以反对国王和作为登上权力宝座的跳板。来自左翼的、由无套裤汉所控制的巴黎公社的威胁,使吉伦特派产生了通过阻止革命向左倾斜以保护革命果实的愿望。

从 8 月开始的有关君主制问题的分歧,到 9 月时进一步扩大,而且愈演愈烈,最后导致了 1400 名囚犯被处决的巴黎大屠杀(Schama 1989: 630—637)。罗伯斯庇尔冷静地把此事件解释

为“一场民众运动而不是那种被人荒谬地认定的煽动性暴乱”（引自 Higonnet 1998:38）。随着国王的被逮捕、被定罪以及在遭到吉伦特派反对的情况下被处决,到12月和1月时分裂已变得不可逆转(Patrick 1972:39, ch. 4)。尽管吉伦特派承认国王有罪,但多数人还是怀疑国民公会是否有权对国王进行审判,有三分之二的吉伦派支持“请求民众”来决定是否对国王进行审判;百分之七十的吉伦特派投票赞成宽恕国王,这与百分之九十五的山岳派要求处死国王形成了鲜明对比(精确的投票数字见 Patrick 1972:78,93,96)。

324 吉伦特派支持公民投票和反对处决国王的立场在宪法上能找到根据,在政治上则表现出其谨慎的一面。但是,随着各省形势的趋紧,军事上的失利和背叛,以及城市粮食供应的几近瘫痪,吉伦特派发出的讲求法律、讲求节制的呼吁,在当时很容易地就被他们的反对者构建为失败主义者(如果不是真的叛国者)的行动。在街头起哄者和猎奇的新闻记者到处可见的巴黎,吉伦特派的种种主张“对于革命的激情来说几乎不起任何作用,而这种激情对于共和派来说如果不是其得以生存的手段,也是其得以前进的动力”(Patrick 1972:72)。从对革命的法国所经历事件的对比鲜明的解释中,极化产生了。

革命激情的推动力日益为雅各宾派用来服务于其政策:平息各省暴乱的使命;控制物价和向城市提供给养的激进的经济措施,以及(随着前线战事越来越糟)对贵族阶级和叛国者进行尖锐声讨。这个政党最初在是否向其邻国宣战问题上犹豫不决,它同时也开启了经济上的自由政策。然而,随着军事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加之经济上的停滞不前,罗伯斯庇尔及其同事就变得日益好战了。来自前线的压力引发了一场自发起义,同时促使罗伯斯庇尔政府对有抵触情绪的官员实施惩罚性的措施。各

省的叛乱引发了残酷的镇压与对联邦主义的怀疑。经济上的停滞和萧条最终迫使罗伯斯庇尔政府采取了控制物价和粮食供应的强硬措施,而要实施这些措施就必须要有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和对投机者及囤积居奇者进行镇压。战争、叛乱和经济强制导致了反对派与国外势力、叛徒、投机商和囤积者之间的结合。

雅各宾派的政策在巴黎区国民会议(Parisian Section assemblies)态度坚决和激进的群体中,找到了它的群众基础。在其鼎盛时期,一旦受到恰当的宣传鼓动并得到国民议会中同盟者的支持,一个很小的少数派就能够把整个邻近地区动员起来——尤其是巴黎北部和东部的平民区。1792年8月,正是这些少数派把成千上万的民众带上了街头并将王权打翻在地。1793年的1月和2月,他们又把怒火集中在处决国王的问题上。当年3月,他们则掀起了围绕食品问题的大范围的斗争并发起对吉伦特派控制的新闻界的攻击。这些冲突的结果是回复到对粮食市场的控制,以及雅各宾派经济观朝着煽动上述地区的激进“疯人派”(enragés)的观点的转变。

当春去夏来之时,上述地区变得更加好斗了(Higonnet 1998:55)。迄至1793年5月底,这些地区觉得自己的力量强大得足以占领巴黎公社了,因此到6月2日那一天,他们便包围了国民公会,并要求驱除和逮捕吉伦特派的领导人。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吓坏了的平原派的代表们最终和山岳派联合起来,将 325 29名吉伦特派的领袖人物从国民公会中驱逐了出去。一些吉伦特派的领袖逃出巴黎,到一些已经是骚动不安的省份煽动叛乱;另一些领导人遭到了软禁,但大多数吉伦特派领袖则在几个月后遭到处决。他们是有组织的恐怖制度下的首批牺牲者,而这一有组织的恐怖制度则在下一年成为法国政府的有效机器。

在这次血腥事件的全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互动在多大程度上构建了行动者,这些行动者在后来将被理解为似乎他们在事件一开始时就已经存在了。格尼菲这样写道:

事实上,雅各宾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政党,甚至也不是一个派系;雅各宾主义只不过构成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各个政党各个派系都在为自己主张的合法性(这也是该空间所能体现和合法化的)相互斗争,都在为自己追求的具体而又五花八门的目的互不相让。在革命的棋盘上,雅各宾主义不只是众多棋子中的一枚棋子,它本身就是一个棋盘,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革命的戏剧一直演到1794年。(Guenniffey 2000:220)

尽管“激进的山岳派”(Montagne)这个术语在1791年10月就已炮制出来,但“只有在激进的山岳派与温和的共和派——吉伦特派——及其在1792年秋发起的攻击正面相遇时才变得意义重大”(Soboul 1980:7)。接着,激进的山岳派这一术语在以下事件中“打造了它连贯的链条,这个事件就是山岳派毫不动摇地坚决执行对国王的审判、定罪和处决”(Lewis-Beck, et al. 1988:531),在随后的六个月里,则变得越来越激进。山岳派在国民公会中向来都只不过是一个少数派,但尽管如此,山岳派的激进主义还是在由以下要素构成的背景中壮大起来:吉伦特派对逮捕国王态度温和;前线和各省形势的极端恶化;各地区提要求时的嗓门愈加粗厉。山岳派的最后胜利不是来自于他们对恐怖手段的控制,而是等到他们的敌人都纷纷落败。他们的最后胜利取决于他们有能力说服、转化、胁迫由平原派——并非总是同一批人——构成的足够的代表人数投票支持他们(Lewis-Beck, et al.

1988:530)。极化产生于范畴形成、居间联络和竞争。这些机制相继对由饥馑、背叛与外国入侵所引发的机遇和威胁螺旋做出回应。

吉伦特派的情况又如何呢？如果说激进山岳派的认同是在其对外国及各省事态以及 1793 年初群众行动的反应中最后得以确定的话，那么，吉伦特派在其成为革命的牺牲品前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确定认同的经历，则并不清楚。这些最终成为革命牺牲品的吉伦特派，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曾和别的派别一同投过票，这一点当然是完全肯定的，但这其中的内在连贯性却也远非无懈可击。在六次有记录的主要投票中（其中四次都与国王的 326 判决有关），不足百分之七十的被认为是吉伦特派的人形成了“始终一贯的”右派这一范畴，这个比例仅高出平原派十个百分点（Lewis-Beck, et al. 1988:531）。只是当吉伦特派生死存亡最后关头临近的时候——在 4 月投票赞成马拉弹劾和 5 月份投票重新恢复四十人委员会的两次投票中——吉伦特派这一范畴才产生了近乎全体一致的温和的投票（Lewis-Beck, et al. 1988:534）。对此，辛顿汉姆总结说：“这个群体只是在到了其覆灭的当儿才成了一个实体。”（Syndenham 1961:176）

即使在吉伦特派有的坐牢、有的逃往外省的情形下，极化仍在继续，因为迫害给现在当权的雅各宾派带来了政治上的好处。由雅各宾政权把持的公安委员会最初使其找到了一个能够保全面子的折中方案（Syndenham 1961:21）。但是，随着军事形势的持续恶化和外省叛乱的连续不断，委员会的态度越来越强硬，指责他人的口气越来越严厉，受其指责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背景下，超过 75 名代表遭到逮捕，而最初被捕的 21 人则在 10 月底被送上了断头台（Syndenham 1961:28）。

山岳派/吉伦特派之间的极化源于一些处于连锁反应中的

机制：

- 竞争,由于吉伦特派和他们的对手在争夺态度暧昧的平原派代表时相互较劲,各不相让
- 机遇/威胁螺旋来自为雅各宾派提供支持的各派以及外省的叛乱和外国入侵威胁的相互结合
- 范畴形成,表现在山岳派以他们自己的信念为中心去改造共和派的类别认同并将他们的敌人排除在外
- 居间联络,表现在雅各宾派在犹豫不决的平原派成员与来自街头的血腥屠杀之间的调解,这些血腥屠杀很有可能把雅各宾派卷进去,假如他们不能成功地领导那些制造血腥屠杀的街头暴民的话

上述四种机制在 1793 年 7 月 2 日那一天全都出现了。当时,一批荷枪实弹的好斗分子包围了雅各宾派,紧接着出现的是平原派,他们对如果说服不了这批好斗分子后果将不堪设想的局势深感恐惧,在此背景下,雅各宾派呼吁驱除和清理他们的政治对手。由此,我们说 1792 年至 1793 年期间法国政治上出现的极化不是来自具有法国人气质的各种分裂,也不是革命所具有的 327 有的特质所致,而是由斗争的动力创造出来的。

马卢古省的社群斗争者

在 20 世纪转折时期,海洋岛国印度尼西亚即使和 18 世纪末的六边形的法国相比,似乎仍然是一个贫穷的伙伴,情况的确就是这样。海洋岛国印度尼西亚最早引起西方人注意的,是其商业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就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印度尼西亚的

情况来说,它最早是由荷兰人在 1850 年到 1910 年期间建立起来的。其版图的特点在当时是以爪哇、马卢古^①、南苏门答腊和西苏门答腊为中心构成的一个环形岛国。当地土著人的民族主义运动往最早算也只是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当时一位名叫苏加诺的人在这场运动中逐渐成为人们公认的领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占领了印度尼西亚。日本的占领提升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民族情感和苏加诺的声望(Kahin 1952)。二战结束时,印度尼西亚是作为由不同成分相互混杂的殖民主义创造出来的一个新国家出现的,另外,它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千岛之国。在印度尼西亚广阔的版图上,既有着五花八门的语言,又有着类别繁多的伊斯兰教徒、乡村中一块块信仰泛灵论的飞地与占人口百分之十五的基督教少数派之间的分裂。尽管如此,在苏哈托时代结束之前,除了信奉基督教的摩鹿加群岛之外,一直都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分裂主义运动。

作为总统,苏加诺凭借自己的巨大魅力及其在第三世界的国际声誉和一种巧妙的平衡策略把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整个团结了起来。在这种平衡策略的构成中,一部分是苏加诺政府与军队尽量保持着一定的疏远关系,另一部分则是尽量让强大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发挥作用——这一措施虽然赢得了来自苏联和中国的支持,却激怒了军事团体,同时也吓坏了国内的穆斯林领袖和西方列强。这种种压力与 1965 年的军事政变和大规模屠杀——在这一事件中,成千上万人在“免于共产主义毒害”的宗教纯化的幌子下遭杀害——一齐向苏加诺政府袭来,在此背景下,苏哈托将军的“新秩序”(New Order)政体得以建立

^① 感谢格里·范·克林肯(Gerry Van Klinken),在这个简短讨论中,我们从他还未发表的文章“马卢古战争,1999”中获取了大量的材料。

起来(Anderson 1966)。

苏哈托的盗窃狂政权持续了三十多年。在此期间,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和天然气岁入、国内华裔少数民族的企业家精神以及西方列强从外部提供的保护对该政权起到了推动作用,由此,苏哈托得以将政权建立在军队权力的基础上,建立在“波将金村”执政党戈尔卡(Golkar)上,建立在扩大中的国际市场对成本低廉的东南亚商品以及利润越来越高的石油的需求上(Sidel 1998:160)。在此过程中,苏哈托政府变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腐败低能政府。20世纪60年代攫取国家政权的军人团体,到90年代时已蜕变为一个商业帝国,而它的军事能量则因其对东帝汶的占领而被吸干。这样的军人政府所发出的每一项军事命令328 都有其商业上的含义和进行敲诈勒索的动机(Kammen 1999)。苏哈托的权力部分来自于国际贸易,部分地来自于地方垄断,还有一部分则来自于对所有外国投资收取的佣金。苏哈托的统治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一夜之间便土崩瓦解了(Sidel 1998:162—165)。

这场金融危机对整个亚洲来说都是严重的危机,但对印度尼西亚的打击尤甚,因为它和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危机恰巧同时爆发。危机期间,大量商店倒闭,失控的雅加达街头暴乱随处可见,印度尼西亚许多边远省份的社群斗争此起彼伏。暴乱首先从雅加达开始,很快从学生蔓延到“马萨”(massa),矛头迅即指向华人商行与机构(Sidel 1998)。这场以雅加达为起点的暴乱随后扩大到印度尼西亚的整个群岛(Robinson 1998; Rutherford 1999; Van Klinken 即出著作),既给已经出现的动乱——比如东帝汶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的暴动——火上浇油,又点燃了像马卢古暴乱这样的新火种。从1998年下半年到2000年之初,在这个条形的岛屿上,基督教教徒和伊斯兰教教徒之间一波又一波

的斗争,估计至少夺去了 3000—4000 人的生命;而由于暴力、惧怕和受到恫吓被迫背井离乡者大约也在 123000 到 370000 之间 (Van Klinken 即出著作:3)。

马卢古的大部分暴力行动都是一帮又一帮的年轻人所为,这一点,无论是在该省首府安汶(Ambon)还是在该省的内地都是如此。但以雅加达为基地的精英以及地方上的精英也同样被指责为这些冲突的主角,他们被指责为利用首都的权力真空在地方上为自己谋取利益,同时保护各自的各宗教群体免受其他宗教群体的种种攻击。这场冲突中的外部行动者,包括为了帮助他们的宗教同胞而从爪哇前来助战的伊斯兰战斗人员,也包括这之前在与穆斯林竞争者对抗中落败的基督教暴徒,他们继而返回家乡去为他们的基督教兄弟提供枪支弹药。由这些基督教恶棍组成的团伙是大部分最恶劣的暴力事件的罪魁祸首,甚至那些受命前去平息暴乱、恢复秩序的军人也卷入其中,“因为军事力量在社会中繁殖了显而易见的分裂主义”(Van Klinken 即出著作:33)。

在一个高失业率、四分五裂、中心—边缘冲突和种族冲突不断、共同体内部关系紧张以及村与村之间互相为敌的社会中去寻找暴力冲突的根源并不困难。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马卢古城区年轻人的比率格外地高,除此之外它的失业率也非常之高。从“新秩序”体制延续下来的中心—边缘关系的冲突,在苏哈托政权瓦解、戈尔卡保护体制崩溃时进一步恶化。大量穆斯林的迁入以及他们对有利可图的文职部门的侵占,对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基督教徒的地位构成了实际威胁。一个可信的案例能用来证明下述观点,即马卢古冲突象征着“一种……政治模式的一次复兴,该政治模式预示着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的到来,这一模式以许多小的权力中心都有其地方上的根基为特征”(Van 329

Klinken 即出著作:18)。

一直追随我们的读者会猜到:我们没有去寻找斗争的结构原因,而是去寻找那些引发矛盾冲突、创造斗争目标、形成相互之间的联盟以及极化斗争参与者的机制和过程。在一个大部分的社会制度都与宗教有关的地区,斗争动员的过程会得到现在已为我们所熟悉的许多机制的支持。比如,我们最早勾画的机制之一——社会利用,其情况就是如此。印度尼西亚的宗教社区组织在“新秩序”体制下是唯一没被社团化的组织,它们在斗争中成了表达各种利益(经济上的、民族文化上的等等)的避风港。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会在苏哈托政权倒台时成为动员大本营的原因。

在此,我们将重点讨论极化这一过程,像在法国大革命中一样,印度尼西亚的极化过程同样受到了机遇/威胁螺旋、竞争、范畴形成和居间联络机制的支持。

机遇/威胁螺旋:1998年10月,当雅加达的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爆发时,遥远的马卢古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做出了反应。对在雅加达暴乱中受到攻击的无辜者持同情态度的年轻的基督教徒攻击了马卢古的清真寺和商店,但同时又把他们所发动的攻击建构为对穆斯林“新来者”的防御行动。前戈尔卡政治家们很快抓住了因当局瘫痪而提供的机会,他们以社群为基础来招募支持者。

由穆斯林带来的威胁体现在基督徒的这一感觉中:穆斯林总督萨利赫·拉图康斯纳(Saleh Latuconsina)要任命穆斯林去担任由基督教徒所主导的文职部门的岗位。1998年10月,也就是在冲突爆发之前,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在马卢古流传开来。这本小册子宣称:马卢古的总督大人已经做好了打算,他要把三十

八个最高文官职位全都分派给穆斯林来担任(Van Klinken 即出著作:22)。这一插曲被许多人认为是马卢古整个冲突事件的导火索。

竞争:选举竞争是引发冲突的导火索。在“新秩序”体制下,马卢古一直都是戈尔卡的一个保留地,在大选中经常能够赢得高达百分之七十的多数选票。1998年苏哈托政权的垮台使当地的政治精英们陷入散乱状态,这使他们拼命在当地寻找支持源。由此,一个政治竞争的螺旋就开始了:在缺乏合法分裂的背景下,竞争很快转向了宗教并把它作为选举联盟的源泉(Van Klinken 即出著作:26)。

范畴形成:马卢古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进入了一个范畴划分格外明确的时期。北马卢古人口中的三分之二是穆斯林,而马卢古首府安汶人口中的五分之三是由信奉新教的基督徒组成(Van Klinken 引自1971年的人口普查:15)。一些村庄的划分是如此严格,以至于吃水用的水井也作了明确限定:这个是穆斯林的,那个是基督徒的,泾渭分明。类别不平等突出地表现在所从事的职业上:比如,在文职部门中,所有的职位基本都由基督教徒担任;而穆斯林则基本上占据了私营部门的所有岗位。随着冲突的蔓延和基督教徒与穆斯林双双被赶出或因恐惧而逃离他们的居住地,类别划分的界限就更加明显了。范·克林肯这样写道:到2000年1月时,“安汶岛的全境都被划分成了……黑白两区:白区代表着穆斯林,黑区代表着基督徒,在两区的交叉点上则由荷枪实弹的士兵们严守着。”来自黑白两区的战斗人员都穿着带有彩色条纹的服装借以区分他们的不同身份:穆斯林或是基督徒,这种情形让人更易想到的是政党色彩而不是宗教。

居间联络:宗教派系和土著人群体、向政府要职业的抗议者、失业青年、乡村名流、来自雅加达的基督教暴徒以及从爪哇其他地方来的穆斯林好战分子,这些有着不同身份、不同目的的人在政治操纵者——这些人有的与地下组织有关,有的则打着宗教的旗号,在宗教框架内活动——的穿梭调停下,以惊人的速度在极短的时间内便结成了几个结构松散的联盟。一旦冲突进入军事化阶段,相互竞争的群体被军队分隔开,即便那些曾紧密生活在一起的穆斯林与基督教徒,现在也不得不从实质上分开,他们的生活从此也不得不按照社群的界线进行重新调整了。正像在法国大革命中遇到的情形一样,1999年马卢古战争中的极化也同样是机遇/威胁螺旋、范畴形成、竞争和居间联络这些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规模转变

我们要说的最后一个过程是规模转变。规模转变是指在互有联系的斗争行动中,由于参加斗争的人数和斗争级别的变化而带来了斗争规模的扩大,这种扩大涉及行动者范围的扩大与行动者所提要求及其认同之间的连接。(在此,我们将忽略下降的规模转变,下降的规模转变能把范围广泛的互有联系的斗争行动进行小块分割;在不同的连锁反应中,下降的规模转变包含的机制是相似的。)绝大部分斗争行动在整个斗争过程中绝不会超出其最初发生的地方的、类别的或者制度的背景。但是在斗争政治的主要事件中,从定义上来说,几乎无一例外地至少都会涉及到规模转变的发生。从我们所列举的全部案例中,我们看

到,斗争一旦发生新的事件就会随之而来;新的行动者往往纠缠于那些已被他们的前辈们冒险尝试过的斗争形式;而更为广泛的要求和认同则在竞争者之间的互动中日益趋于明朗。

让我们随便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全部事件中选出两例来加以考虑。第一个例子:紧随1789年7月巴黎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之后,巴黎以外各省的很大一部分人口中出现的“大恐慌”四处传播,其特征就像讲述盗匪如约而至的故事一样;第二个例子:作为表示承诺和进行动员的一种手段,在肯尼亚的茅茅起义期间,激进的宣誓方式的采用与传播。在此,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我们将去探究作为斗争特点的机制和过程,是如何将一种斗争规模转变为另一种斗争规模的;以及,比如说,那些能够控制从地方斗争演变为全国性斗争的规模转变的同一类型机制和过程,是否能够在跨国层面的斗争中找到。

在我们的机制中,大部分的机制都能在不同层次的斗争中起桥梁作用。比如,在地方规模的斗争中出现的策略创新一旦被理解,就会以扩散的方式使原有的斗争规模由小变大。给予合法性确认有时会给小群体带来变化,但有时也会改变整个国家。相形之下,民主化从定义上来说有赖于政府和政体的在场,它也因此而属于从社群到世界范围的规模转变。尽管民族主义作家们可以在他们的大脑中虚构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来,但作为一种运动,民族主义却要求一个更为广泛的规模。

不仅是斗争的主要事件会使冲突从一个地点扩散到另一个地点,而且,随着斗争规模的转变和斗争的行动者把其进行斗争的意义向参与者传播,反对派和第三方也会发生改变。还记得1981年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吗?一开始它只是位于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的一次罢工,但这次罢工很快就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所有工厂之间蔓延开来。工厂与工厂之间工人人们的团结同时

成为这次运动的象征和成功的关键。规模转变不仅会扩大冲突,而且会创造新的行动纲领,围绕着新的行动纲领冲突不仅会得以组织化,而且游戏的筹码也会提高。

我们看到,规模转变作为一个富有活力的过程,是由两个有时会相互联系的路径构成的,这两个路径分别是:我们所谓的扩散/效仿路径和居间联络/范畴形成路径。这两个路径都会通过一个共同的、我们称之为相似性归因的机制通向规模转变。图10.3同时描绘了这两种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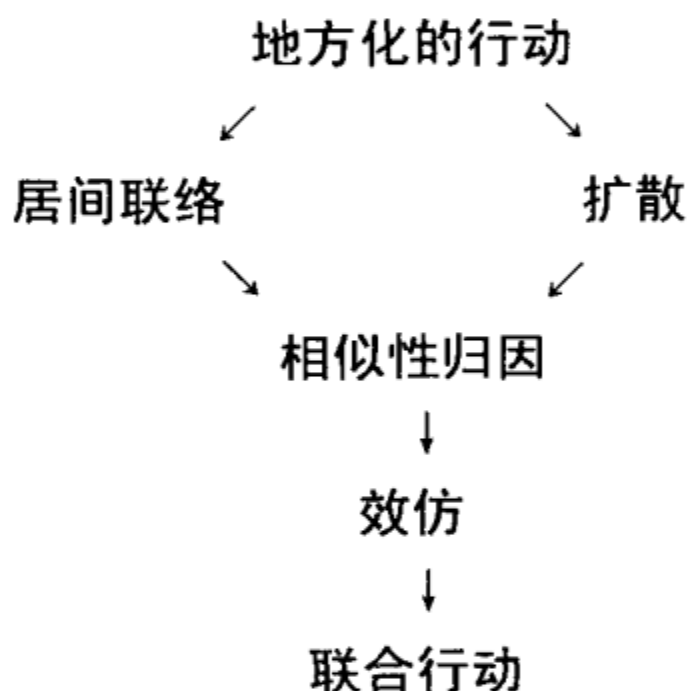


图 10.3 规模转变

扩散指的是沿斗争互动的传统界线所进行的信息传递,而居间联络则需要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目前还处于互不相连状态的社会地点联络起来。以上两种机制在我们的许多案例中都曾经发挥过作用。因此,比如说,在肯尼亚茅茅起义的扩大中,扩散机制和居间联络机制所起的作用都是非常明显的。不过,这里我们要把注意力投向在斗争模式和斗争扩大中都存在的一个意义深远的差别上(这里所指的斗争模式和斗争扩大取决于作为调节功能的机制——扩散或者居间联络——是否能够在斗争中

居于主导地位)。比较而言,主要通过扩散机制来扩大范围的斗争与通过居间联络来扩大范围的斗争,前者在地域规模和/或制度规模上几乎总是囿于一个较窄的范围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扩散不会超越那些划分互动区域的有代表性的界限(这些由来已久的界限构成了社会生活的特征)。因此,我们可以举例来说,在奥伦古鲁昂及其直接影响下的周围地区举行的最初的激进宣誓,似乎就是通过扩散这种机制来进一步扩大的,而在“紧急状态”之前出现的范围更广的激进宣誓活动,则既包含了居间联络又包含着扩散。居间联络和联盟形成则在日益扩展的冲突之中将先前分散的行动者团结起来。 333

尽管扩散机制和居间联络机制是特征上互不相同的两种机制,但二者都是通过图 10.3 中所附加的那两个机制来发挥效用的。在这两个附加机制中,头一种机制是相似性归因,我们把它定义为“在不同社会地点的行动者之间所实现的相互认同,确认彼此足够相似以证明共同行动的合理性”。该机制在研究扩散的学者们那里,是那种长期以来被当作在信息与接纳信息之间起调节作用而得到强调的机制(Strang and Meyer 1993; McAdam and Rucht 1993)。这样的理解当然是再简单不过了。因为仅有信息本身是不能引导一个人去采纳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文化目标或新的行为惯例的,信息要达到上述目的,就必须至少依赖创新者与采纳者之间所形成的最低限度的认同。

何种因素能使这样的认同更有可能形成呢?首先,这样的因素来自于那些可能的居间联络人,经过精心策划而在不同的斗争行动者之间构建出彼此足够相似的要求和认同——其相似性足以证明联盟构成之正当性。我们看到,这种精心设计的居间联络企图始终出现在斗争政治中:例如,法国 1793 年的旺代叛乱中,一个对抗巴黎的联盟——教士—君主主义者—地方主

义者之间的联盟——的形成；在美国内战前由共和党人于 1856 年发起的自由人—自由土地—弗里蒙特 (the Free Men-Free Soil-Fremont) 选举运动中；在把非洲裔美国人与拉美裔美国人联系起来的组合范畴——“有色人”——的创立中。期望通过运动来提升他们对那些先前有联系或根本就没有联系的群体之号召力的政治中间人们，在其所代表的群体与他们的影响力所指向的群体之间不断努力以求制造彼此的相似性。

相似性归因未必是一个有目的的、策略性的过程。第二种能在不同的行动者之间激励认同产生的因素是斯特朗和迈耶所谓的“制度性对等” (institutional equivalent) 概念。这两位作者强调，在某一特定的制度领域 (比如，城市规划) 中，政策制定者倾向于把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同行等同起来，由此则有利于政策创新的扩大与传播。在斗争政治的历史上，我们在批量生产带给工业的通道效应中看到制度性等同；在大规模生产单位中工作的工人们与管理层之间有着相似的关系，这些工人发现他们
334 要比，例如，在孤立车间工作的手工艺人更容易把他们的斗争与其他人的斗争结合起来。第三种因素是在相似性归属中对相似要求的揭示，这种揭示常常通过不同集体行动的表演而发生。1989 年，制度性等同和已被揭示出的相似性，在政治体制构成相似的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以快速扩散的集体行动形式聚集到了一起。

调节规模转变的最后一种机制是效仿机制。在我们的定义中，效仿机制是指“模仿其他人行动的集体行动”。作为一种机制，效仿机制尽管是清楚明了的，但它被包括在图 10.3 中却强调了一个要点：对先前行动的意识，甚至与行动者的强烈认同，都不能保证作为观察者的群体采取效仿行动。有些群体有时即使知道别的群体所发起的斗争行动，甚至还对这种斗争行动怀

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但出于害怕或者出于某种监视权力当局在他们自己采取行动之前会做出何种反应的明智愿望,而未能采取效仿行动。效仿行动本身就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成就,因此而恰当地被塑造为一种有别于其他机制的机制。

尽管扩散机制和居间联络机制在主要的斗争事件中常常结合在一起,但在影响规模转变的特征(取决于作为触发机制的扩散和居间联络哪一个会扮演主导角色)上,它们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主要是通过扩散机制的作用而使规模扩大的斗争,可能具有暴力和强烈的特点(比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少数民族集居区爆发的骚乱),但在范围和影响上,几乎总是要低于通过居间联络的作用而使规模扩大的斗争。何以如此呢?这里的原因是,扩散机制不太容易跨越对构成社会生活特征的互动进行区分的标准界线;而居间联络机制,从定义上来讲,就是用能跨越标准分界线的某些框架和行动把不同的行动者团结起来。

循着同样的推理路径,我们可以这样说,扩散机制在斗争的扩大中要远比居间联络机制更为常见。之所以说扩散机制更为常见,是因为通过确定的互动路线而联系起来的行动者,很有可能已经把相似性作为他们自己的属性;另外一种原因是,与居间联络机制相比,扩散在时间、中间人和框架转变上的投入都要少许多。由此,我们得到的另外一个结论是:居间联络机制,尽管不如扩散机制常见,但在对斗争事件的影响上,其作用则很可能要大得多。就通过居间联络而建立起来的联系有助于先前互不联系的群体发现他们彼此之间具有相似性的程度而言,斗争能够越过狭窄的地理、制度和/或类别界限而迅速扩散,并创造出一些新的认同——这些认同要比触发它们产生的事件本身更为持久。

335

让我们从这类事件中选择一个著名的案例来加以简要地说

明：在南方民权运动和北方大学校园里的白人学生运动之间，由于有了通过中介行动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联系纽带，1964年的“自由之夏计划”（the Freedom Summer project）引发了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不分种族”（“revolution beyond race”）的运动，该运动借以开展的方式则是激励许多看似迥然不同的群体（比如，白人大学生、妇女、西班牙裔美国人以及同性恋者，等等）与美国黑人达成彼此之间的认同，并从美国黑人运动中汲取教训。

学生运动的规模转变

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学生运动的规模转变中，扩散和居间联络这两种路径令人震惊却不太完美地汇合到了一起。从这个时期的学生运动几乎是同时发生在许多高校和许多国家，以及学生运动所采用的相似的象征符号和相似的斗争形式看，扩散机制和效仿机制都是显而易见的；但居间联络机制也同样出现在这些运动中。

在该书的第二章，我们曾经看到，意大利的学生运动在1967年的冬季到1968年的春季之间是如何通过对当地高校院系的一系列占领来进行组织和发动的。地方主义不再是阻止运动扩大的障碍；运动几乎同时在下列城市中出现：米兰和特伦托、比萨和佛罗伦萨、罗马和那不勒斯。当占领行动结束后，那些参加过行动的热情的大学学生们在假期回到了家乡，他们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件讲给年轻的弟弟、妹妹们听。这些年轻的弟弟、妹妹们随后便在他们所在的高中像他们的哥哥、姐姐们那样发起抗议运动。居间联络的作用不全都是垂直的。当一个学年结束时，那些曾在占领集会中组织过投票群体的学生们走出校园，将其他大学里与自己志趣相投的大学生联系起来，不仅如

此,他们还把他们的运动扩大到了其他领域——比如,那些位于城市边缘的贫民窟。一开始只是存在于大学里的小范围的群体网络,到后来却演变成了一个能涵盖全国的超议会组织。在这个庞大的组织中,每一个构成单元都有着自己的行动纲领、地方分支机构、报纸、富有特色的斗争形式以及游行总指挥的准军事性兵团(servizi d'ordine)。

当大学生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组织时,运动的框架也就随之发生了改变:从要求某一高校进行改革这一局部性问题扩大为对所有高校当局挑战的整体性发难,继而挑战整个消费社会,攻击政治体制。最能体现这种规模转变过程的学生运动莫过于1968年5月发生在法国的学生运动。当时,由于法国警察的铁腕政策,发生在南泰尔这所新大学里的学生与管理者之间的冲突激发了全国的学生,并引发了一场导致经济瘫痪的工人阶级罢工。这次危机为法国的政治体制带来了总体性的挑战。 336

规模转变也是一种跨国性的转变。那些在美国学习的年轻的德国人,把有关哥伦比亚和伯克利学生造反的振奋人心的消息,带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德国(McAdam and Rucht 1993)。而那些曾经到过意大利的年轻的法国共产党员,则试图用那些为法国共产党的姊妹党带来生机的改革去激发对该党死气沉沉现状的不满情绪。那些在法兰克福求学的意大利学生则为意大利带回了出自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思想要旨。这些可能的居间联络人虽然从未成功地建立过跨国性的学生联盟,但是,他们把美国学生运动的激情和策略成功地扩散到了西欧,并且在欧洲范围内帮助建构起一种新的学生政治认同。

规模转变常常因为受到一些因素——不可逾越的边界、来自政府的抵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之间的差别——阻碍而不

能在国与国之间产生。但在当今世界上,随着扩散/效仿和居间联络/范畴形成之间以跨国社会运动形成的形式结合,这种情形正在改变。全球化的电视网络、越来越频繁的移民与更加便利和便宜的交通,都将确保在此地爆发的运动会很快地传播到彼地,并且会常常被异地的人们所效仿。在人权、环境和妇女事业等领域,新型的联盟正在由“跨国行动主义者网络”进行着精心的建构(Keck and Sikkink 1998)。扩散和范畴形成这两种机制经常把矛头对准日益强大的国际性机构如欧盟、世界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这些国际性机构不仅给国际斗争提供了斗争的靶子,而且也给居间联络提供了发挥作用的舞台(Tarrow 2001)。

卢旺达的种族清洗

规模转变在集体暴力中常常会扮演重要角色。对个体和财产的攻击往往逐步升级为针对一个地区乃至全国而采取的范围广泛的、至少有某种程度协调配合的毁灭性行动。1994年的卢旺达种族清洗给世人提供了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事例(Des Forges, et al. 1999; Grimshaw 1999; Jones 1995; Mamdani 2001; Newbury and Newbury 2000; Uvin 1998)。1973年7月,卢旺达的高级军事长官、将军儒维纳尔·哈比亚利马纳),以一次没怎么流血的政变夺取了国家政权。不久,他着手建立了一个延续了二十年的—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哈比亚利马纳是一位来自卢旺达西北部的胡图族人,自他夺取政权的那一天起,便开始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位于乌干达和卢旺达北部边界的以图西族人为基础的军人;以卢旺达南部为基地的胡图族人政治领袖。

经过多次较早时期的跨越边界的突袭之后,1990年末,以图西族人为基础的“卢旺达爱国阵线”(RPF)从卢旺达北部发动

了一次入侵,遭到失败,但一年后他们再次向卢旺达发起了进攻。在卢旺达爱国阵线占领卢旺达领土的同时,它的进攻力量大肆驱赶位于其前方的难民(主要是胡图族人)。作为反应,哈比亚利马纳政府越来越支持先前被弃置的一项计划——建立“胡图族力量”。在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控制范围之外,1990年开始的对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实施的大屠杀起因于他们被指责为是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合作者。政府的准军事力量和更具独立性的“胡图人力量”敢死队是大屠杀的执行者。

1994年4月6日,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的座机在即将着陆于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机场时,被人用精密导弹击落。这次空难中死去的不仅有总统哈比亚利马纳本人,还包括陆军参谋长恩萨比马纳(Nsabimana)将军,布隆迪总统奚普里恩·恩达亚米拉(Cyprien Ntaryamira),以及其他几名随行人员。哈比亚利马纳和恩达亚米拉两位总统是在出席完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召开的非洲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首脑们就卢旺达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过渡政府进行了讨论(或许已经达成了共识)——返回卢旺达时,遭遇袭击的。在卢旺达国内外,不少实权派人物都有反对这一解决方案的理由。

由于哈比亚利马纳的遇袭身亡,一天之内,20世纪最大规模的大屠杀之一开始了。从大屠杀开始之时,军人和胡图族人政权中的激进分子不仅把目标直指几个图西族少数派的成员,而且把目标指向胡图族当中一些突出的反对派人士。随着参与屠杀的人数的扩大——从早已是专业刽子手的人到从未杀过人的大批公民——屠杀的规模也就随之转变了。用埃利森·戴斯·福格斯的话来说,这些

袭击者通常都以一小队一小队的形式出现,他们见人

就杀,不论被杀者是在家中、在街上还是藏在障碍物后。而一次场面更大的屠杀也发生了。最早是从4月7日的傍晚开始,有几个较大的群体抓住一个机会:当时,心惊胆战的图西族人和一些胡图族人正向着教堂、学校、医院和以前曾提供过庇护的政府大楼奔去,这就为集中屠杀他们创造了机会。在卢旺达西北部的吉塞尼(Gisenyi)地区,民兵们在尼永多(Nyundo)神学院杀死大约50人,在布索戈(Busogo)教堂杀死43人,在布尔萨撒马纳(Bursasamana)教区杀死大约150人。[Des Forges, et al. 1999:209]

大屠杀就这么继续着。尤其是 Interahamwe(最初由已故
338 总统哈比亚利马纳成立的胡图族民兵组织的成员),他们在追踪和屠杀被认为是他们敌人者的过程中表现异常活跃。最终,数以万计的卢旺达普通市民也参与到大屠杀中来,屠杀的主要对象是图西族人和被指控为偏袒图西族人的胡图族人。在总统哈比亚利马纳死后的十天内,对图西族人的袭击从偶尔的、局部的屠杀升级为全国范围的血腥杀戮。规模转变迅即发生,伴随着的则是毁灭性的灾难后果。

卢旺达的规模转变将态度明确的杀人者的行为与担惊受怕的普通民众联系起来。尽管先前已有联系的民兵与“胡图人力量”中的激进分子为大屠杀在不同地点的发生提供了关键的连接,但是:

成千上万的其他人并非情愿参与种族大屠杀,他们中的一些人只是出于受胁迫或者是对自己生命的担心才拿起了屠刀。与那些从不怀疑自己最初选择的狂热分子不同,他们要不停地自我思忖:究竟该不该这么去做?他们每次

都要掂量计划中的行动的性质,被指定的受害人的身份,参与屠杀所带来的好处和不参与屠杀将要付出的代价。但因为这些攻击是由被认为是合法的权力当局所号召或者吩咐的,所以那些心怀不安的参与者就会发现他们更容易去杀人犯罪,更容易相信或者假装相信他们并没有做错事。(Des Forges, et al. 1999:1—2)

在产生这种效果的过程中,扩散和居间联络机制共同发挥了作用。有关哈比亚利马纳遇难以及将对假想中的阴谋分子实施报复的消息,通过人际关系网络和大众媒体——尤其是“胡图族力量”控制的广播电台 Mille Collines——得以传播和扩散。出于警觉,由哈比亚利马纳政府组建的用于抵抗卢旺达爱国阵线进攻的一些地方自卫团体现在投入了行动。而早已建立起关系网络的“胡图族力量”中的激进分子也开始行动起来。不过,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由 Intera-hamwe 所提供的居间联络者,这些居间联络者不仅把各个地区彼此联系起来,而且在整体上给这些地区提供了杀人的武器。这些居间联络者明确强调,卢旺达爱国阵线及其支持者是一种共同的威胁;普通胡图族人中的爱国者受到了敌人的威胁;大屠杀不仅可以接受甚至是一种必要的反应;政府是那些杀死叛国者以及杀死不愿剿杀叛国者的人的支持者。因此,扩散机制和居间联络机制对于冲突的双方来说都促进了相似性归因,而对相似性归因的促进反过来又促进了联合行动,由此而来的则是种族清洗的骇人结果。

规模转变是一个不太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相对突出的扩散机制和居间联络机制尽管是变化不定的,但经过相似性归因和效仿两种机制的作用之后,通常情况下都能产生一个从局

部向更大规模联合行动的转变。像行动者构成和极化这两种机制一样,规模转变也以相似的方式在斗争政治的整个范围内运
339 作;然而,当它与别的机制和过程相结合时,就会产生从罢工浪潮到大规模屠杀的各种各样的斗争事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行动者构成、极化和规模转变都可以被视为富有活力的过程。

重温范围条件

现在,让我们重申一下我们赋予这些过程的解释性地位。它们并不构成有关斗争的一种普遍模式。它们同样也不应该被视为那些适用这些过程的特征更为有限的斗争的决定性模式。相反,这些过程对塑造斗争的具体特征的常见的动力路径做出了规定。因此,图 10.1 描述的是一个常见的动力路径,该路径直指通过斗争互动而形成的新的行动者;图 10.2 描述的是出现于斗争轨迹中之不断加剧的分裂;而图 10.3 描述的则是一组互有联系的机制,这些机制对斗争的扩大经常起调节作用;如此等等。

这样的描述留下了一个重要的、还没有做出回答的问题。对于这些不够全面的框架我们赋予其何种范围呢?尽管我们一直吹嘘我们所举案例的广泛性,但在事件的遴选上,我们的确还只是在斗争的两个方面使其多样性达到了最大化,而在其他几个方面却还是维持不变。我们的目标是把我们所选取的案例以及以不同形式命名的事件(比如,社会运动、革命或民主化)在地理分布上的广泛性推向最大化。不过,至少在其他三个方面,我们则试图使斗争的一些重要特征或多或少保持不变。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案例都是全国性的逾越界限的斗争事件,这些斗争事件又正好全都位于政治中的制度领域。做出减少这些方面

多样性的决定不仅是务实的,而且,考虑到我们的计划已经显示出来的雄心勃勃的范围,我们认为这也是完全明智的。但是,这一决定却使我们的有效分析范围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每一范围条件,意在澄清我们的解释主张。我们的主张是:我们的方案甚至比我们的案例所能暗示的范围还要宽。

规模:我们所有的案例在规模上基本上都是全国性的,这些案例所牵涉的解决冲突的办法都会从全国范围这一地域广度上影响到该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即便当国家的权力范围成为问题的核心时,像在意大利统一这一案例中,也是如此)。显然,我们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冲突的强度在受其影响的国家的每一地区都表现得一模一样。尽管冲突对于菲律宾全国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含义,但是“黄色革命”主要还是局限于该国的首都及其周边地区。

340

上述这个事例实际上强调了我们将就规模所提出的论点:明显具有全国性规模的斗争这一概念是一种错觉。就斗争行动发生的地点来说,全国性的斗争可能主要是地方性的或者是局部的。甚至当行动的分布在地理上更加广泛时,全国性斗争也仍然是由局部或者地方冲突组成的。作为全国性冲突标志的,不是斗争行动的发生地点,而是斗争在社会/政治方面所具有的更为宽泛的内涵。但既然我们的方案是一个用来研究斗争行动,或者更准确地说,研究斗争互动的方案,因此,该方案就应该能够应用到无论是在何地发生的斗争行动上。我们敢断定的是:我们的方法是那种既适用于分析本书中所突出强调的全全国性重大事件,也适用于分析完全是地方性的或局部冲突的方法。

逾越界限的斗争与有节制的斗争:我们所有的案例除了在规模上是“全国性”的以外,它们还都无一例外地是逾越界限的而不是有节制的案例。也就是说,所有这些案例都包含着新构建的政治行动者和创新性的行动。但是,正如本书第二章所下的定义那样,“斗争政治”这一总体名称既适用于逾越界限的斗争也适用于有节制的斗争。既如此,则我们有什么理由只关注前者而忽略后者呢?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个问题提得相当糟糕。我们的大多数案例,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作为有节制的斗争的事件出现的,最终则演化成更大范围的逾越界限的斗争。因此,我们在对案例的选择上并不是真的就忽略了有节制的斗争的动力。不过,在我们的案例中没有一个完全属于有节制的斗争的例子,这也是实话。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把我们的方法应用到这样的案例上时,它会不会也像以前那样有效?我们确信它会是这样。

让我们拿美国人权斗争的前期阶段为例:处在此阶段的斗争行动还是有节制的斗争行动,它对后期阶段的逾越界限的斗争的发动起了促进作用。如果我们把视线集中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十年,那么我们会清楚地发现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已经开始,但参与事件的关键人员都是合法的政治行动者,他们运用的也都是非常传统的斗争手段。我们的解释性方法也应该同样适用于该时期的那些更有节制的斗争。

341 冷战的开始构建了有助于斗争事件发生的关键性的社会变化过程。传统的民权组织清楚地看到了冷战提供给他们战略性机遇。通过把美国“黑人歧视政策”(Jim Crow policies)与苏维埃集团的压制自由做法加以类比,传统民权组织的领导人试图通过把民权改革构建为美国反对共产主义斗争的工具,以激发并不情愿的联邦政府开始采取行动。随着全国有色人种促进

会带头支持和穷究那些旨在日益侵蚀美国“黑人歧视政策”法律基础的案例,民权组织领导人的这一修辞努力也就随之加入到一个不断上升的针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法律攻击中。

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官员开始把国内的种族主义视为一种对美国外交关系的威胁,民权组织则加强了这一主题,南方的政治家们则以州政府的权利为由进行组织动员来回应这一威胁,美国的最高法院也开始抛弃那些支持隔离政策的有关法律。在美国的民权运动转入我们在第二章已经分析过的更为越界的斗争模式之前,几乎所有这些已为我们所熟悉的互动形式都在有节制的斗争的区域内出现了。

甚至这一对二战后民权斗争起因所做的程式化的解读,也同样有助于要点的说明。我们在第二章中所描绘的动员过程,非常适合于这种情形。广泛的社会变化过程——冷战是其最突出的表现——动摇了美国的种族政治体制,促发了创新性的解释过程和此处涉及到的三类合法行动者的行动。在此过程中,每一次新的行动都加强了维持斗争行动的共同的不确定感,反过来又激起其他党派对斗争做出回应性的行动。早在蒙哥马利事件把马丁·路德·金推向全国关注的焦点之前,反复不断的、互动性的斗争过程就已经开始了。

斗争的制度性地点:最后反映在我们案例中的一个限制条件是斗争的制度性地点。我们的所有事件都被放置在了一个清楚明了的政治背景中,也就是说,这个政治背景是在第二章中做过界定的政治背景,它的特征是“政府至少……(作为)一个要求者,一个要求对象,或者是支持要求的一方”。然而,那些不包含政权行动者的斗争事例是否就在我们的分析范围之外呢?我们有一种预感,即我们的分析框架能够很容易地适用于对任何正

式的制度化权力体制之内的斗争的分析。这一正式体制可能是一家公司、一个企业、一个地方性的志愿协会、一所教堂,抑或是整个一个教派。这种普通模式只需分析者有能力从围绕某个既定的组织或制度领域的形成问题而发生的争论中,确认出其中表现活跃的至少一个成员和一个挑战者就可以了。事实上,大量的经验研究早已存在,这些研究看来能够证实相同的动力和机制,对于发生在大量此类组织性/制度性背景下的各种斗争的发展所具有的突出作用。

尼尔·弗里格斯坦(Fligstein 1990)在其所著的《公司控制之转变》(*The Transformation of Corporate Control*)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历史角度来解释美国公司中“金融战略”兴起的原因,这种解释和我们在第二章中所描述的动员过程非常一致。弗里格斯坦看到,各种各样破坏稳定的变化过程——包括举足轻重的法院裁决——引发了公司内部解释性过程的出现,这些解释性过程则导致了来自金融和市场方面的挑战者——他们旨在从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制造业精英手中夺回控制权——采取创新性的集体行动。其他分析家们则从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部门以及其他领域中找到了各种斗争性的过程(例如,Rao, Morrill and Zald 2001)。

这些经验性的案例可以列举无数。关于组织化/制度化的变化与冲突的研究,越来越要求采用更为动态的、文化的和相关性的方法来进行,当我们把这种日益增加的理论要求和上述经验案例相结合的时候,其隐含之义就应该是清楚无疑了(Brint and Karabell 1991; Davis and McAdam 2001; DiMaggio 1988, 1991; DiMaggio and Powell 1991; Fligstein 1996; Friedland and Alford 1991; Hirsch 1986; Katzenstein 1998; Kurzman 1998; Morrill 1996; Rao, Morrill and Zald 2000; Zald and Berger 1978)。

斗争并不是政治王国中特有的现象,它是一种并非独特的一般现象,它和制度化权力关系的建立有着复杂难解的联系。不管这种权力的运用是不是为了正式的政治目的或者出于其他的制度性考虑——经济的、文化的或宗教的——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认为,把我们的研究方法限制在只应用于定义狭隘的政治王国中,根本是毫无道理的。

接下来呢?

前面两节的讨论使以下的工作议程更为清晰了。上面所描述的那些富有活力的过程给我们声称的这种并不完美的分析框架提供了广泛的例证。我们就宽松的范围条件所做的讨论,揭示出我们所希望的那些宽泛的比较。但我们是否已经达到这种目的了呢?没有,还相差很远。的确,我们的观点和方案在许多方面会被证明是错误的。这样说可能更好一些:我们所希望的是促进新知识,而不是汇编旧信息。像其他人无疑会做的一样,我们的意图是从我们在本书中提供的一些初步阐释已经确认但 343 尚未解决的众多挑战中,选取一些来加以研究。现在就让我们集中讨论其中的四个挑战吧。

建筑师们说,魔鬼来自细节;就我们的情况而言,这细节就是方法论上的细节。大家看到,我们的分析一直是围绕着一根轴线在转,这根轴线就是对各种各样的解释性机制所做的貌似有理但并不系统的展开。我们还没有在任何地方证实这些机制中的任何一个所具有的经验现实性。由此就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挑战,它存在于这些机制以及其他候选机制的运作,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系统且具有经验性的探询中。

在这一点上,我们还遇到了第二个操作性的挑战。尽管我

们已经把核心的重要性赋予了“斗争事件”这一概念,但是我们还没能对它的经验特征详细地做出描述。作为分析家,我们将如何去界定这些事件呢?我们是否应该依靠斗争参与者所具有的共同认识呢?抑或是作为分析家介入其中,并以根据我们的理论而得出的特征为基础来定义这些事件呢?我们提出这些问题,不是为了回答它们,而是为了强调其所具有的那些重大挑战。如果我们在对斗争的研究中是把事件作为观察的基本单位的话,那么我们最好能够创造出一种用来确认这些事件的可靠的方法来。

第三个主要挑战是一个更加概念化的挑战,它是听从我们号召的每一个人都面临的挑战。在不否认认知机制和环境机制之有效性的前提下,由我们提出的关于斗争的种种解释突出强调了相关性机制的作用。相形之下,采用现象学的以及理性主义方法的分析家们,总体上强调的则是认知机制,而把相关性机制和环境条件视为限制和/或资源。还有的分析家把注意力集中在环境机制上;资源动员理论和组织生态学的极端版本就属于这个范畴。尽管我们把强调的重点放在了相关性机制上,但任何恰当的斗争理论都必须比本书远为坚定地和环境机制、认知机制和相关性机制之间实现整合。即使接受我们方案的人也必须回过头来,去重温我们在本书开始时所提出的那些难题,其中一个最明显的难题便是认知机制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和调节环境效应和关系效应的。

下面是我们遇到的最后一个挑战,但这个挑战并非不重要。当我们开始着手写作本书的时候,我们曾想象要让我们的全部工作围绕对政府、政权和政体的各种变化做详尽而又完善的分析而组织起来。但我们很快就意识到,这样的做法只会使我们的分析变得异常复杂,让人无法忍受。那些有关民主与非民主、

强政府与弱政府之间存在着的种种差异,以及有关政府压制、宽容与提供便利的种种形式的思考,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案例中,但在很大程度上,本书还是回避了就政治结构所做的标准分析。其结果是,我们在一开始所采纳的作为一种启发式框架的政体模式,并没有被我们计划中的核心内容——动态的、相关性的分析所改变。在我们的分析中,政府是作为强有力的行动者反复出现的,但不是作为动态的、竞争性的以及通常我们所认为的不断被再创造的实体而出现的。要想使我们的观点得以全面实现,就必须用这些更为动态和相关性的术语来对政府行动者做出更为令人满意的描述。

历史、文化与局部知识

在结束全书讨论之际,先让我们说明一个问题——一个那些更多关注个别事件、个别国家与个别历史时期,而较少关注斗争总体模式的学者们所面对的问题。当我们试图去把某一具体的社会事件所具有的环境和特征与创造出理解社会生活的更为通用的模式这一愿望相调和的时候,想一想这将面临怎样深刻的挑战?这是一个令人止步不前的挑战,一个可以转变为下述突出问题的挑战:历史、文化和局部知识所具有的特殊性能否与更具总体性地聚焦于认知的、相关性的和环境机制的做法相调和?尽管这种分析性的调和之举具有诸多内在的困难,但我们还是决定像开始本书一样来结束本书:我们相信,我们的方案适用于对特定社会过程的解释,一如它适用于本书所聚焦的那些总体机制和过程。实际上,那些试图解释特殊事件的分析家们,通过确认超出这些特殊事件的解释性原则,也是这么做的。我们以我们所提出的机制和过程作为这样的原则。

什么是文化的特殊性呢？如果我们把文化视为共同享有的理解，视为借助于符号、物体、习俗和惯例而做出的对这种共同享有的理解之表达的话，那么，我们有关斗争事件的经验性叙述则充满着文化气息。比如，在茅茅起义的案例中，居间联络的有效性就取决于既作为信仰又作为惯例的宣誓这一历史悠久的文化共鸣；这是普遍过程中的一个具体体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抗议周期的发展过程中，由“自由之夏”计划锻造的意识形态纽带同样促进了居间联络——不过，其所采用的方式吸收了
345 美国文化中的惯例和人际关系处理方法。在上述两个案例中，促进居间联络的理解和惯例可能并没有太多区别，但居间联络这个一般性概念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它们在各自案例中的具体体现。

有一点值得强调：我们确信，通过我们所论及的机制和过程的作用，特殊的文化理解 and 实践能产生出相当普遍的效果；我们还确信，通过对惯常做法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文化是怎样在斗争事件中交叉重合的。

不仅如此，某一特定事件的历史和文化的细节鼓励而不是阻碍对斗争动力以及斗争认识的更具总体性的理解。当我们从比较的角度来看问题时，文化理解在很多情况下都不是独特的。我们将提及两个能体现这种关系的事例来说明我们的观点：第一个事例关系到各种斗争形式——社会运动、革命、民族主义、民主化等等的具体化，我们已经在学术上批评过这样的具体化，但这种种形式则已然获得了一种文化地位——这一文化地位使它们成为现实世界的行动者们依循的有力模式。

参与提出斗争要求的行动者们，他们的手头有可以援引的先前事件的种种模式以及关于这些模式的种种故事。1848 年，欧洲的革命者早已了解到 1789—1799 年的法国大革命，而且

(正如卡尔·马克思在其《路易·波拿的雾月十八日》一著中所尖刻评论的那样),他们甚至还试图重演 1789 年、1792 年或 1795 年的法国历史。这是因为那些把他们的行动说成是革命、战争、民主化或者一种社会运动的行动者们,往往在使他们以及其他行动者的注意力集中于某种模式的同时,也就降低或减少了其他模式的相关性,而这些模式从原则上讲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历史上的先例有其重要性的一面,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试图去理解这些先例在限制斗争的机制和过程方面是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带来了怎样的后果的。

更进一步说:许多已被证明对我们的分析很重要的机制,实际上都取决于与性质相同的先前事件有联系的模式、故事以及惯常做法的存在。合法性确认和撤销合法性确认为我们提供了最明显的例子:确认机构总是依据此前已经确立的关于有效政治行动者的各种观念而采取行动。联合国把一个新民族(例如,东帝汶)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予以确认就具有这方面的性质,而其他国际机构在把某些政权确定为民主的、稳定的、经济健全的、尊重人权的,或在上述各方面都不成功时,也同样具有这种性质。

346

还有一些机制也涉及到援引先前存在的模式、故事和决定斗争行动方向选择的信仰。比如,“被突然强加的怨愤”似乎就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在对某种外来干预做出反应。有人把这类事件归入到现成的文化模板中,且在这一过程中对这些模板进行修改。某些种类的文化框架——比如斯诺和本福德(1992)所系统陈述的所谓“主导框架”(master frames)——在许多斗争事例中产生了广泛的共鸣。接受跨越斗争的种种事件、国家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富有活力的斗争机制和过程的概念,并不是要抛弃文化以及地域知识塑造斗争这一观念,而是要为赞成特殊主义

(particularism)与制定普遍规律之间实现和解提供一种策略。通过把我们的分析性范畴嵌入到我们所研究的每一斗争事件所具有的历史和文化个性中,我们确信,斗争分析家们能够发现那些典型地促发斗争的更为普遍的、更为动态的过程。

347 我们的工作只是提供了一个起点,仅此而已。

参考文献

- Adell Argilés, Ramon (1989): *La Transición Política en la Calle. Manifestaciones Políticas de Grupos y Masas. Madrid 1976—1987*. Madrid: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 (1998): "El estudio de la movilización, como indicador de participación sociopolítica: parámetros analíticos y significado,"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to the Sixth Spanish Congress of Sociology.
- Aguilar Fernández, Paloma (1995): *La memoria histórica de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1936—1939): Un proceso de aprendizaje político*. Madrid: Centro de Estudios Avanzados en Ciencias Sociales.
- (1997):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The Case of the Political Amnesty in the Spanish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Democratization* 4: 88—109.
- Alberoni, Francesco (1968): *Statu nascenti*. Bologna: Il Mulino.
- Anderson, Benedict (1966): "The 1965 Coup in Indonesia: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October 1, 1965, Coup in Indonesia." Unpublished research monograph, Cornell University.
-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Rev. edn.
- (1998):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 Anderson, Bo, and James D. Cockroft (1972): "Control and Co-optation in Mexican Politics," in J. D. Cockroft, A. G. Frank, and D. L. Johnson,

eds. *Dependence and Underdevelopment: Latin Americ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Doubleday.

APS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5): "Review Symposium: The Qualitative-Quantitative Disputation: Gray King,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s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454—481.

Atkins, Muriel (1997): "Thwarted Democratization in Tajikistan," in 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 eds. *Conflict, Cleavage, and Change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Democrat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tkins, G. Pope (1977): *Latin America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Azurmendi, Mikel (1998): *La Herida patriótica: La cultura del nacionalismo vasco*. Madrid: Taurus.

Baer, Marc (1992): *Theatre and Disorder in Late Georgian Lond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libar, Etienne (1991): "The Nation Form: History and Ideology," in E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eds.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London: Verso.

Barnes, Gilbert Hobbs (1957): *The Antislavery Impulse, 1830—1844*. Gloucester, MA: Peter Smith.

Barnett, Donald L., and Karari Njama (1966): *Mau Mau from Withi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arrington, Lowell (1995):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nsequences of Citizenship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Europe-Asia Studies* 47:731—763.

Bates, Robert H., Avner Grief, Margaret Levi, Jean-Laurent Rosenthal, and Barry R. Weingast (1997): *Analytic Narrativ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earman, Peter S. (1991): "Desertion as Localism: Army Unit Solidarity and Group Norms in the U. S. Civil War," *Social Forces* 70:321—342.
- (1993): *Relations into Rhetorics. Local Elite Social Structure in Norfolk, England, 1540—1640*.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Beissinger, Mark (1995): "The Persisting Ambiguity of Empire," *Post-Soviet Affairs* 11:149—184.
- (1996): "How Nationalisms Spread: Eastern Europe Adrift the Tides and Cycles of Nationalist Contention," *Social Research* 63:97—146.
- (1998): "Event Analysis in Transitional Societies: Protest Mobiliza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Dieter Rucht, Ruud Koopmans and Friedhelm Neidhardt, eds. *Acts of Dissent.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Protest*. Berlin: Sigma.
- (forthcoming): *The Tides of Nationalism: Order, Event,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 Unpublished m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 Bensel, Richard (1990): *Yankee Leviathan: The Origins of Central State Authority in America, 1859—187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rman, Bruce, and John Lonsdale (1992): *Unhappy Valley: Conflict in Kenya and Africa*. London: James Curry.
- Bermeo, Nancy (1997): "Myths of Moderation: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during Democratic Transi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s* 27:305—322.
- (1997):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Madrid: working paper 1997/97, Instituto Juan March de Estudios e Investigaciones.
- Bier, Alice Gail (1980): *Crecimiento urbano y participación vecinal*. Madrid: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ciológicas.
- Blank, George (1981): *Triumph of the People: The Sandinista Revolution in Nicaragua*. London: Zed Press.
- Black, George, and Robin Munro (1993): *Black Hands of Beijing*,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 Blyth, Stuart (1999): "Spain 1974—1977; Democratic Opposition, Neighbor-

- hood Association and Civil Society," unpublished paper, University of Wolverhampton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European Studies.
- Booth, John A. (1982): *The End and the Beginning: The Nicaraguan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Bose, Sugata, and Ayesha Jalal (1998): *Modern South Asia. History, Culture,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 Boudreau, Vincent (forthcoming): *At the Margins of the Movement: Grassroots and Cadre in Philippine Protest*. Manila: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 Brass, Paul R. (1994): *The Politics of India Since Independ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IV—1. 2d edn.
- (1996): ed. *Riots and Pogrom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1997): *Theft of an Idol. Text and Context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Collective Viol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raun, Rudolf (1960): *Industrialisierung und Volksleben*. Zurich: Rentsch.
- (1965): *Sozialer und kultureller Wandel in einem ländlichen Industriegebiet*. Zurich: Rentsch.
- Brewer, John (1979—1980): "Theater and Counter-Theater in Georgian Politics: The Mock Elections at Garrat," *Radical History Review* 22: 7—40.
- Brint, Steven, and Jerome Karabel (1991): "Institutional Origins and Transformations: The Case of American Community Colleges," pp. 337—360 in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rinton, Crane (1938): *The Anatomy of a Revolution*. New York: Norton.
- Brook, Timothy (1998): *Quelling the Peop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ijtenhuijs, Rob (1982): *Essays on Mau Mau*. Leiden: African Studies Centre.

- Bunce, Valerie (1981): *Do New Leaders Make a Difference? Executive Succession and public Policy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9): *Subversive Institutions. The Desig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rns, Stewart, ed. (1997): *Daybreak of Freedom*. Durham: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Burt, Ronald S.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urt, Ronald S. , and Marc Knez (1995): "Kinds of Third-Party Effects on Trust,"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7 255—292.
- Butsch, Richard (1995): "American Theater Riots and Class Relations, 1754—1849," *Theater Annual* 48:41—59.
- (2000): *The Making of American Audiences: From Stage to Television, 1750—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xo i Rey, Maria Jesus (1995): "El imaginario etnico en Cataluña," *Antropológico* No. 18:119—132.
- Cadena-Roa, Jorge (1999): "State Pacts,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Mexico'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unpublished paper; UNAM.
- Calhoun, Craig (1994): *Neither Gods nor Emperors: Students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5): "'New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in Mark Traugott, ed, *Repertoires an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arr, Raymond (1980): *Modern Spain, 1875—198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rson, Clayborne (1981): *In Struggle: SNCC and the Black Awakening of the 1960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erulo, Karen A. (1997): "Identity Construction: New Issues, New Direc-

- 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3:385—409.
- Charney, Craig (1999): "Civil Society, Political Violence,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s: Business and the Peace Process in South Africa 1990 to 1994,"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1:182—206.
- Chaturvedi, Jayati, and Gyaneshwar Chaturvedi (1996): "Dharma Yudh: Communal Violence, Riots, and Public Space in Ayodhya and Agra City: 1990 and 1992," in Paul R. Brass, ed. *Riots and Pogrom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Christian, Shirley (1986): *Revolution in the Famil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Chubb, Judith (1982): *Politics, Power and Poverty in Southern Italy: A Tale of Two Cit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llier, David, and Steven Levitsky (1997): "Democracy with Adjectives: Conceptual Innovation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World Politics* 49:430—451.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1979): "Human Rights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Assistance: Experiences and Issue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Report to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 S. Senate.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Connor, Walker (1994): *Ethnonationalism. The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ok, Maria Lorena, Kevin J. Middlebrook, and Juan Molinar Horcasitas, eds. (1994):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Regime Change in Mexico*. La Jolla, CA: Center for U. S. - Mexican Studies.
- Cooper, Frederick (1996): *Decolonization and African Socie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pland, Ian (1998): "The Further Shores of Partition: Ethnic Cleansing in Rajasthan 1947," *Past and Present* 160:203—239.

- Cornelius, Wayne, Todd A. Eisenstadt, and Jane Hindley, eds. (1999): *Sub-national Politic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Mexico*. La Jolla: Center for U. S. -Mexican Studies.
- Cornell, Stephen, and Douglas Hartmann (1998): *Ethnicity and Race. Making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 Cosío Villegas, Daniel (1973): *La Constitución de 1857 y sus críticos*. Mexico City: S. E. P.
- Crofts, Daniel W. (1989): *Reluctant Confederates: Upper South Unionists in the Secession Crisi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Crouch, Colin, and Alessandro Pizzorno (1978): *The Resurgence of Class Conflict in Western Europe after 1968*, 2 vols, London: Macmillan.
- Cruz, Rafael, ed, (1997): *El anticlericalismo*, Madrid: Marcial Pons.
- CSCE [Commission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1998): *Political Reform and Human Rights in Uzbekistan, Kyrgyzstan and Kazakhstan*. Washington, DC: CSCE.
- Daniel, E. Valentine (1996): *Charred Lullabies. Chapters in an Anthropography of Viol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David Brion (1969): *The Slave Power Conspiracy and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Gerald F. , and Doug McAdam (2001): "Corporations, Cla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fter Managerialism,"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 Behavior* 22: 195—238.
- Davis, Natalie Zemon (1975):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avis, Richard H. (1996): "The Iconography of Rama's Chariot," in David Ludden, ed. *Contesting the Nation: Religion, Commu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emocracy in Ind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Dawisha, Karen (1997): "Democratiz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esearch Concepts and Methodologies," in 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 eds.

-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in East-Central Europe*.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 Capitani, François (1983): "Vie et mort de l'Ancien Régime," in Jean-Claude Favez, ed.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Suisse et des Suisses*, vol. 2. Lausanne: Payot.
- de Miguel, Amando (1976): "Spanish Political Attitudes 1970," in Stanley G. Payne, ed,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wentieth-Century Spain*.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 della Porta, Donatella (1990): *Il terrorismo di sinistra*. Bologna: Il Mulino.
- (1998): "Police Knowledge and Protest Policing: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Italian Case," in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Herbert Reiter, eds. *Policing Protest. The Control of Mass Demonstra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Deneckere, Gita (1997): *Sire, het volk mort. Sociaal protest in België (1831—1918)*. Antwerp: Baarn; Ghent; Amsab.
- Des Forges, Alison, et al. (1999): *Leave None to Tell the Story. Genocide in Rwanda*.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 de Tocqueville, Alexis (1983): *Correspondance d' Alexis de Tocqueville et de François de Corcelle*. Paris: Gallimard. Oeuvres Complètes, t, XV.
- Deutsch, Karl (1976): *Die Schweiz als ein paradigmatischer Fall politischer Integratiion*, Bern: Haupt.
- DiMaggio, Paul (1988): "Interest and Agency in Institutional Theory," pp. 3—21 in Lynn G. Zucker, ed. *Institutional Patterns and Organizations: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Cambridge, MA: Ballinger.
- DiMaggio, Paul, and Walter W. Powell (1991): "Introduction," pp. 1—37 in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i Palma, Giuseppe (1990): *To Craft Democracies: An Essay on Democratic*

- Trans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ix, Robert H. (1984): "Why Revolutions Succeed and Fail." *Polity* 16: 423—446.
- Duara, Prasenjit (1996): "Historicizing National Identity, or Who Imagines What and When," in Geoff Eley and Ronald Grigor Suny, eds. *Becoming National: A Rea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rán Muñoz, Rafael (1997): "Acciones colectivas y transiciones a la democracia: España y Portugal. 1974—1997," Doctoral thesis,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Madrid (to be published as *Contención y transgresión. Las movilizaciones sociales y el estado en las transiciones Española y portuguesa*. Madrid: Centro de Estudios Constitucionales.)
- Edgerton, Robert B. (1989): *Mau Mau: An African Crucibl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Edles, Laura Desfor (1998): *Symbol and Ritual in the New Spa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the New Sp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isinger, Peter (1973): "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11—28.
- Elias, Norbert, and John L. Scotson (1994): *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 A Sociological Enquiry into Community Problems*. London: Sage. 2d edn.
- Eley, Geoff, and Ronald Grigor Suny eds. (1996): *Becoming National: A Rea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lster, Jon (1989):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ne, Daria (1996): "Ethnicity and Regionalism in Uzbekistan. Maintaining Stability through Authoritarian Control," in Leokadia Drobizheva, Rose Gottemoeller, Catherine McArdle Kelleher and Lee Walker, eds. *Ethnic Conflict in the Post-Soviet World. Case Studies and Analysis*.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Farhi, Farideh (1990): *States and Urban-Based Revolutions: Iran and Nicaragu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Feige, Edgar (1998): "Underground Activi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Productive, Protective, and Predatory Behavior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in Joan M. Nelson, Charles Tilly and Lee Walker, eds. *Transforming Post-Communist Political Economies*. Washington: National Academy Press.

Fellman, Michael (1979): "Rehearsal for the Civil War: Antislavery and Proslavery at the Fighting Point in Kansas, 1854—1856," in Lewis Perry and Michael Fellman, eds. *Antislavery Reconsidere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Abolitionist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Fierman, William (1997):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Uzbekistan: Democratization," in 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 eds. *Conflict, Cleavage, and Change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Democrat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ner, Samuel E. (1997): *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3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shman, Robert M. (1990): *Working-Class Organization and the Return to Democracy in Spai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Fligstein, Neil (1990):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rporate Contro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Markets as Politics: A Political Cultural Approach to Market Institu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656—673.

Foner, Eric (1995):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an, John (1990): "A Theory of the Third World Social Revolu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Madrid, Spain, July 1990.

- (1993): "Theories of Revolution Revisited: Toward a Fourth Genera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11:1—20.
- (1997): "The Future of Revolutions at the *fin-de-siècle*," *Third World Quarterly* 18:791—820.
- Fox, Jonathan (1994): "The difficult Transition from Clientelism to Citizenship: Lessons from Mexico," *World Politics* 46:151—184.
- (1995): "Governanc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Mexico: State Intervention and Public Accountabili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2:1—30.
- Fox, Jonathan, and Josefina Aranda (1996):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Oaxaca's Municipal Funds Program*, La Jolla: Center for U. S. -Mex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Monograph Series no. 42.
- Franzosi, Roberto (1995): *The Puzzle of Strikes. Class and State Strategies in Postwar Ita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edrickson, George M. (1971): *The Black Image in the White Mind*.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1981): *White Supremacy. A Comparative Study in American and South Africa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eitag, Sandria B. (1996): "Contesting in Public: Colonial Legacies and Contemporary Communalism," in David Ludden, ed. *Contesting the Nation. Religion, Commu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emocracy in Ind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Friedland, Roger, and Robert R. Alford (1991): "Bringing Society Back In: Symbols,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 pp. 232—262 in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undación FOESSA (1970): *Informe sociológico sobre la situación social de España*. Madrid: Editorial Euramerica.
- Furedi, Frank (1973): "The African Crown in Nairobi: Popular Movements and Elite Politics."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14 (No. 1)

- (1974a): "Olenguruone in Mau Mau Historiograph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One-Day Conference on the Mau Mau Rebellion, Institute of Commonwealth Studies, March 29, 1974.
- (1974b): "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the Mau Mau Movement in the White Highlands,"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 (No. 4)
- Gambetta, Diego (1988): "Can we Trust Trust?" in Diego Gambetta, ed.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Oxford: Blackwell.
- (1993): *The Sicilian Mafia. The Business of Private Prote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8): "Concatenations of Mechanisms," in Peter Hedström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Social Mechanism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mson, William A. (1989): *Power and Discontent*. Homewood: Dorsey. Rev. edn. (1990):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 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 2d edn. (1992): *Talking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mson, William A., Bruce Fireman, and Steven Rytina (1982): *Encounters with Unjust Authority*. Homewood, Ill: Dorsey.
- Garmendia, José A., Francisco Parra Luna, and Alfonso Pérez-Agote (1982): *Abertzales y vascos: Identificación vascista y nacionalista en el País Vasco*. Madrid: Akal.
- Geddes, Barbara (1990): "How the Cases You Choose Affect the Answers You Get: Selection Bia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James A. Stimson, ed. *Political Analysis 2*.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Genovese, Eugene (1969): *The World the Slaveholders Made: Two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 (1992): *The Slaveholders' Dilemma: Freedom and Progress in Southern Conservative Thought, 1820—1860*.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Gerth, Hans H. , and C. Wright Mills (1946):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hosh, Amitav (1992): *In an Antique Land. History in the Guise of a Traveler's Tale*. New York: Vintage.
- Gienapp, Willam E. (1987): *Origins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nsborg, Paul (1989): *Storia d' Italia dal dopoguerra a oggi. Società e politica 1943—1988*. Turin: Einaudi. 2 vols.
- Giugni, Marco, and Florence Passy (1997): *Histoires de mobilisation politique en Suisse. De la contestation à l' intégration*. Paris: L' Harmattan. Suisse. De la contestation a l' integration. Paris: L' Harmattan.
- Godechot, Jacques (1965): *La Prise de la Bastille*. Paris: Gallimard.
- Goldstone, Jack (1980): "Theories of Revolution: The Third Generation," *World Politics* 32:425—453.
- (1980): "The Weakness of Organ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1017—1042.
- (1991):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8): "Social Movements or Revolutions? On the Evolution and Outcomes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Marco Guigni, Doug McAdam, and Charles Tilly, eds. *From Contention to Democracy*. Boulder, CO: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Goodwin. Jeff (1994): "Old Regimes and Revolutions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World: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8: 575—604.
- (1994): "Toward a New Sociology of Revolutions," *Theory and Society* 23: 731—766.
- Goodwin. Jeff, James Jasper, Charles Tilly, et al. (1999): "Mini-Symposium on social Movements," *Sociological Forum* 14:27—136.

- Gossman, Lionel (2000): *Basel in the Age of Burkhardt. A Study in Unseasonable Idea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uld, Roger V. (1995): *Insurgent Ident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8): "Political Networks and the Local/National Boundary in the Whiskey Rebellion," in Michael P. Hanagan, Leslie Page Moch and Wayne te Brake, eds. *Challenging Authority.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99): "Collective Violence and Group Solidarity: Evidence from a Feuding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356—380.
- Granovetter, Mark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1360—1380.
- Granovetter, Mark, and Charles Tilly (1988): "Inequality and Labor processes," in Neil J. Smelser, ed. *Handbook of Sociology*. Newbury Park, CA: Sage.
- Greif, Avner (1994):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2:912—950.
- Greif, Avner, Paul Milgrom, and Barry R. Weingast (1994): "Coordination, Commitment, and Enforcement: The Case of the Merchant Guil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2:745—775.
- Grew, Raymond (1996): "The Paradoxes of Italy's Nineteenth-Century Political Culture," in Isser Woloch, ed. *Revolution and Meaning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imshaw, Allen D. (1999): "Genocide and Democide," *Encyclopedia of Violence, Peace, and Conflict* 2: 53—74. Sun Diego: Academic Press.
- Gruner, Erich (1968): *Die Arbeiter in der Schweiz im 19. Jahrhundert*. Bern: Francke.
- Gschwind, Franz (1977): *Bevölkerungsentwicklung und Wirtschaftsstruktur*

- der Landschaft Basel im 18. Jahrhundert*. Liestal: Kantonale Druck-
sachen- und Materialzentrale.
- Guenniffey, Patrice (2000): *La politique de la Terreur. Essai sur la violence
révolutionnaire, 1789—1794*. Paris: Fayard.
- Gumperz, John J. (1982): *Discourse Strateg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
- Gunther, Richard (1992): "Spain: The Very Model of the Modern Elite Set-
tlement." in John Higley and Richard Gunther, eds. *Elit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 New York: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unther, Richard, Giacomo Sani and Goldie Shabad (1986): *Spain after
Franco: The Making of a Competitive Party Syst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urr, Ted Robert, and Barbara Harff (1994): *Ethnic Conflict in World poli-
tics*. Boulder, CO: Westview.
- Gwertzman, Bernard, and Michael T. Kaufman eds. (1991):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Revised edn. New York: Random House.
- Haas, Ernst B. (1986): "What is Nationalism and Why Should We Study I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0: 707—744.
- (1997): *Nationalism, Liberalism, and Progres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all, Peter (1986): *Governing the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State Interven-
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yes, Carleton (1966): *Essays on Nationalism*. New York: Macmillan.
- Head, Randolph C. (1995): *Early Modern Democracy in the Grisons. Social
Order and Political Language in a Swiss Mountain Canton, 1470—16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chter, Michael, and Satoshi Kanazawa (1997): "Sociological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3: 191—214.

- Hedman, Eva-Lotta Elisabet (1998): *In the Name of Civil Society: Contesting Free Elections in the Post-Colonial Philippines*. Ph. D. diss.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Cornell University.
- Hedström, Peter, Rickard Sandel, and Charlotta Stern (2000): "Mesolevel Networks and the Diffusion of Social Movements: The Case of the Swedish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145—172.
- Hedström, Pet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1998): *Social Mechanism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llman, Judith Adler (1983): *Mexico in Crisis*.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 (1994a): *Mexican Live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1994b): "Mexican Popular Movements, Clientelism and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21:124—142.
- (1999): "Real and Virtual Chiapas: Magic Realism and the Left," in 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 eds. *Necessary and University Utopias: Socialist Register 2000*. Rendlesham: Merlin.
- Heredia Rubió, Blanca (1997): "Clientelism in Flux: Democratization and Interest Intermediation in Contemporary Mexico," *Documentos de Trabajo del 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y Docencia Económicas*, No. 31.
- Higonnet, Patrice (1985):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Antecedents of Revolutionary Discontinuity: Montagnards and Girondins,"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C/396:513—544.
- (1998): *Goodness Beyond Virtue: Jacobins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irsch, Paul M. (1986): "From Ambushes to Golden Parachutes: Corporate Takeovers as an Instance of Cultural Framing and Institutional Regene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801—937.
- Hobsbawm, Eric J.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9. Pro-*

- 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roch, Miroslav (1985): *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Patriotic Groups among the Smaller European Nation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nt, Lynn (1984):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2): *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uskey Eugene (1997): "Kyrgyzstan: The Fate of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In 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 eds. *Conflict, Cleavage, and Change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Democrat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ngwerson, Marshall (1997): "Into the Steppe of Genghis Khan Ride the Conquerors of a Sea's Oil Bount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electronic edition, August 18, 1997.
- Jarman, Neil (1997): *Material Conflicts. Parades and Visual Displays in Northern Ireland*. Oxford: Berg.
- Jenson, Jane (1998): "Social Movement Naming Practices and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Working Paper 1998/114, Instituto Juan March de Estudios e Investigaciones, Madrid.
- Johnson, Charles S. (1941): *Growing Up in the Black Belt*.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 Johnson, Hank (1991): *Tales of Nationalism: Catalonia 1939—1979*.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Jones, Bruce (1995): "Intervention without Border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Rwanda, 1990—1994,"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4:225—249.
- Joris, Elisabeth (1994): "Auswirkungen der Industrialisierung auf Alltag und

- Lebenszusammenhänge von Frauen in Zürcher Oberland (1820—1940),” in Joseba Agirreazkuenaga and Mikel Urquijo (1994): eds. *Historias Regionales-Historia Nacional: La Confederación Helvética*. Bilbao: Servicio Editorial, Universidad del País Vasco.
- Joris, Elisabeth, and Heidi Witzig (1992): *Brave Frauen, Aufmüpfige Weiber. Wie sich die Industrialisierung auf Alltag und Lebenszusammenhänge von Frauen auswirkte (1820—1940)* Zurich: Chronos.
- Juraeva, Gavhar, and Nancy Lubin (1996): “Ethnic Conflict in Tajikistan,” in Leokadia Drobizheva, Rose Gottemoeller, Catherine McArdle Kelleher and Lee Walker, eds. *Ethnic Conflict in the Post-Soviet World. Case Studies and Analysis*, Armonk, NY: M. E. Sharpe.
- Kahin, George McT. (1952):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akar, Sudhir (1996): *The Colors of Violence. Cultural Identities. Religion and Confli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ammen, Douglas (1999): “Not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ast Timor Military Command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Indonesia,” *Indonesia* 67:61—76.
- Karl, Terry Lynn (1990): “Dilemmas of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23:1—23.
- Kattenburg, Paul (1980): *The Vietnam Trauma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5—1975*.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Katzenstein, Marry Fainsod (1998): *Faithful and Fearless: Moving Feminism into the Church and the Milita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atzenstein, Peter J. (1984): *Corporatism and Change: Austria, Switzerland,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eck, Margaret, and Kathryn Sikkink (1998):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 Transnational Activists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eddie, Nikki R. , ed. (1995): *Debating Revolution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Khazanov, Anatoly M. (1995): *After the USSR.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in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King, Martin Luther Jr. (1963): *Why We Can't Wai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King, Gary,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landermans, Bert (1994): "Transient Identities: How Activists Change During the Life Cycle of the Dutch Peace Movement," in Larana, Enrique, Hank Johnston, and Joseph R. Gusfield, eds. *New Social Movements: From Ideology to Ident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Knight, Alan (1992): "Mexico's Elite Settlement: Conjecture and Consequences," in John Higley and Richard Gunther, eds. *Elit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3): "State Power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Mexico," in Neil Harvey, ed. *Mexico: Dilemmas of Trans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and British Academic Press.
- Kohn, Hans (1955): *Nation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56): *Nationalism and Liberty. The Swiss Exampl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Krauze, Enrique (1998): *Mexico: Biography of Power; A History of Modern Mexico, 1810—1996*. New York: Harper.
- Kriesi, Hanspeter, Ruud Koopmans, Jan Willem Duyvendak, and Marco Giugni

- (1995):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Kriesi, Hanspeter, René Levy, Gilbert Ganguillet, and Heinz Zwicky (1981): *Politische Aktivierung in der Schweiz, 1945—1978*. Diessenhofen: Verlag Rüegger.
- Kurzman, Charles (1998): "Organizational Opportunity and Social Movement Mobiliz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ur Religious Movements," *Mobilization* 3:23—49.
- Laitin, David (1992): *Language Repertoires and State Construction in Af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Identity in Formation. The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Near Abroa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9):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Ethnically Mixed States: Nationality Reformation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in George Steinmetz, ed. *State/Culture. State Formation after the Cultural Tur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2000): "Language Conflict and Violence: Or the Straw That Strengthened the Camel's Back." In Paul C. Stern and Daniel Druckman, eds., *International Conflict Resolution After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 Lamartine, Alphonse de (1848): *Histoire des Girondins*. 5 vols. Paris: Furne.
- Lande, Carl H., (1986): "The Political Crisis," in John Bresnan, ed., *Crisis in the Philippines: The Marcos Era and Beyon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7): "Introducti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in Carl H. Lande ed. *Rebuilding a Nation*.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Press.
- Lawson, Steven F. (1976): *Black Ballots: Voting Rights in the South 1944—196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ewis-Beck, Michael S., Anne Hildreth, and Alan B. Spitzer (1988): "Was

- There a Girondist Faction in the National Assembly?"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5:519—536.
- Lichbach, Mark Irving (1987): "Deterrence or Escalation? The Puzzle of Aggregate Studies of Repression and Dissen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1:266—297.
- (1995): *The Rebel's Dilemm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98): "Contending Theories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the Structure-Action Problem of Social Order,"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 401—424.
- Lichbach, Mark Irving and Alan S. Zuckerman, eds. (1997):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ndenberger, Thomas (1995): *Strassenpolitik. Zur Sozialgeschichte der öffentlichen Ordnung in Berlin 1900 bis 1914*. Bonn: Dietz.
- Linz, Juan (1967): "The Party System of Spain: Past and Future," in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Stein Rokkan, ed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70):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Spain," In Eric Allardt and Stein Rokkan, eds. *Mass Politic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73): "Opposition In and Under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Case of Spain," in Robert Dahl, ed. *Regimes and Opposi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79): "From Great Hopes to Civil War," in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eds.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inz, Juan, and José Ramón Montero (1999): "The Party Systems of Spain: Old Cleavages and New Challenges," Estudio/Working Paper 1999/138. Madrid: Instituto Juan March de Estudios e Investigaciones.
- Linz, Juan, and Alfred Stepan, eds. (1979):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cy*.

-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60):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New York: Doubleday.
- Lonsdale, John (2000): "Kenyatta's Trials: Breaking and Making an African Nationalist," in Peter Coss, ed. *The Moral World of the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owi, Theodore (1971): *The Politics of Disorder*. New York: Norton.
- Ludden, David, ed. (1996): *Contesting the Nation. Religion Commu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emocracy in Ind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Lumley, Robert (1990): *States of Emergency: Cultures of Revolt in Italy from 1968 to 1970*. New York: Verso.
- Lyttleton, Adrian (1991): "The Middle Classes in Liberal Italy," in John A. Davis and Paul Ginsborg, ed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the Risorgimen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ck Smith, Denis (1954): *Cavour and Garibaldi 1860: A Study in Political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68): ed. *The Making of Italy, 1796—1870*. New York: Walker and Co.
- (1969): *Italy, A Modern History*, rev. e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85): *Cavour*. New York: Knopf.
- Madan, T. N. (1997): "Religio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India," in Martin E. Marty and R. Scott Appleby, eds. *Religion, Ethnicity, and Self-Identity. Nations in Turmoil*.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Salzburg Seminar.
- Malefakis, Edward E. (1970): *Agrarian Reform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 Spain: Origins of the Civil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82): "Spain and its Francoist Heritage," in John W. Herz, ed.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Westport, CT: Greenwood.
- Mamdani, Mahmood (1996): *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1): *When Victims Turn Killers: Colonialism, Nativism,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ravall, José Maria (1978): *Dictatorship and Political Dissent: Workers and Students in Franco's Spain*. New York: St. Martin's.
- Marks, Gary T., ed. (1971): *Racial Conflict*. Little, Brown.
- Marks, Michael P. (1993): "The 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cy in Post-Franco Spain: Ideas, Interes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ew York.
- Marx, Anthony W. (1998): *Making Race and Nation. A Comparis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outh Africa, and Brazi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x, Karl (1973):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David Fernbach, ed. *Surveys from Exile*. London: Allen Lane and New Left Review.
- Maxwell, Kenneth, ed. (1983): *The Press and the Rebirth of Iberian Democracy*. Westport, CT: Greenwood.
- Mays, Benjamin, and Joseph W. Nicholson (1969): *The Negro's Church*. New York: Arno Press and the New York Times.
- McAdam, Doug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3): "Tactical Innovation and the Pace of Insurgen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735—754.
- (1999):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

- 1970, rev. ed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cAdam, Doug, and Dieter Rucht (1993): "The Cross-National Diffusion of Movement Ideas." *The Annals* 528:56—74.
- McAdam, Doug, and William H. Sewell, Jr. (2001): "It's About Time: Temporality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Ronald Aminzade et al., *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 Doug, and Sidney Tarrow (2001): "Charles Tilly: Big Structure, Large Processes, Enormous Headaches," *Journal of Complex Trajectories* 14:1995—2000.
- McAdam, Doug, and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1997): "Toward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Revolutions," in Mark Irving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rman,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arthy, John, and Mayer N. Zald (1973): *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Morristown, NJ: General Learning Corporation.
-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1212—1241.
- (1987): ed. *Social Movements in an Organizational Society*. New Brunswick and Oxford: Transaction Press.
- McTeem, Dugney (2000): "Improbable but Fruitful Collaborations," *Review of Social Anomalies* 14:237—261.
- Meier, August, and Elliott Rudwick (1973): *CO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rton, Robert K. (1968): "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i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Michels, Robert (1962): *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Minnaar, Anthony (1992): *Patterns of Conflict. Case Studies of Conflict in Natal*. Pretoria: 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 Montero, José Ramón (1997): "Secularization and Cleavage Decline: Religiosity, Electoral Behavior, and Generational Change in Spain," presented to the ECPR Joint Sessions, Bern.
- Moore, Barrington Jr.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 Morlino, Leonardo (1998): *Democracy Between Consolidation and Crisis: Parties, Groups, and Citizens in Southern Europe*. Oxfor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orrill, Calvin (1996): *The Executive Wa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orris, Aldon (1984):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Black Communities Organizing for Change*. New York: Free Press.
- Myers, Daniel J. (2000): "The Diffusion of Collective Violence: Infectiousness, Susceptibility, and Mass Media Network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173—208.
- Nahaylo, Bohdan, and Victor Swoboda (1990):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New York: Free Press.
- Newbury, David, and Catharine Newbury (2000): "Bringing the Peasants Back In: Agrarian Theme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Corrosion of Statist Historiography in Rwand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5:832—877.
- Nirenberg, David (1996): *Communities of Violence. Persecution of Minor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O'Donnell, Guillermo,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Oi, Jean C. (1991):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Olcott, Martha Brill (1997):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Kazakhstan," in 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 eds., *Conflict, Cleavage, and Change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Democrat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liver, Pamela (1989): "Bringing the Crowd Back In: The Nonorganizational Element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 and Change* 11:1—30, Greenwich, CT: JAI, 1—30.
- Oliver, Pamela E., and Daniel J. Myers (1999): "How Events Enter the Public Sphere: Conflict, Location and Sponsorship in Local Newspaper Coverage of Public Ev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38—87.
- Olson, Mancur, J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Ozouf, Mona (1988):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ige, Jeffery M. (1997): *Coffee and Pow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rsa, Misagh (1995): "Conversion or Coalition: Ideology in the Iranian and Nicaraguan Revolution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9:23—60.
- (2000): *States, Ideologies &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ran, Nicaragua, and the Philippin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trick, Alison (1972): *The Men of the First French Republic: Political Alignments in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1792*.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Payne, Charles M. (1995): *I've Got the Light of Freedom. The Organizing Tradition and the Mississippi Freedom Strugg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 California Press.
- Payne, Stanley G. (1987): *The Franco Regime, 1936—1975*.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Pérez Díaz, Victor (1990):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and the 'Invention' of a Democratic Tradition," *Estudios/Working Papers 1990/1*, Madrid: Instituto Juan March de Estudios e Investigaciones.
- (1993):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érez-Agote, Alfonso (1987): *El nacionalismo vasco a la salida del franquismo*. Madrid: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ciológicas.
- Piven, Frances Fox, and Richard Cloward (1977): *Poor People's Movements: 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il*.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Plotz, John M. (2000): *The Crowd: British Litera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oole, Jonathan, and Howard Rosenthal (1997): *Congress: A Political-Economic History of Roll Call Vot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rak, Maarten (1998): "Burghers into Citizens: Urban and National Citizenship in the Netherlands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Era (c. 1800)," in Michael P. Hanagan and Charles Tilly, eds. *Expanding Citizenship, Reconfiguring State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Preston, Paul (1986): *The Triumph of Democracy in Spain*. New York: Methuen.
- Przeworski, Adam (1986):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 eds.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ism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Ragin, Charles C. (1987):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4): *Constructing Social Research. The Unity and Diversity of Method*.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Pine Forge.
- (2000): *Fuzzy-Set Social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aines, Howell (1983): *My Soul is Rested: Movement Days in the Deep South Remembere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Rao, Hayagreeva, Calvin Morrill, and Mayer Zald (2001): "Power Plays: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New Organizational Form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 Behavior*. Forthcoming.
- Rancière, Jacques (1992): *Les mots de l'histoire. Essai de poétique du savoir*. Paris: Seuil.
- Ransom, Roger L. (1989): *Conflict and Compromis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lavery. Emancipation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einares, Fernando (1987): "The Dynamics of Terrorism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Spain," in Paul Wilkinson and Alasdair M. Stewart, eds. *Contemporary Research on Terrorism*. Aberdeen University Press.
- Riall, Lucy (1998): *Sicily and the Unification of Italy: Liberal Local Power, 1859—186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ker, William (1982): *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 San Francisco: Freeman.
- Ringmar, Erik (1996): *Identity, Interest and Action. A Cultural Explanation of Sweden's Intervention in the Thirty Years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binson, Geoffrey (1998): "Rawan is as Rawan Does: The Origins of Disorder in New Order Aceh," *Indonesia* 66: 128—155.
- Romeo, Rosario (1950): *Il Risorgimento in Sicilia*. Bari: Laterza.
- (1963a): *Mezzogiorno e Sicilia nel Risorgimento* (Naples: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 (1963b): *Risorgimento e capitalismo*. Bari: Laterza.

- Rosberg, Carl G. , Jr. , and John Nottingham 1966. *The Myth of "Mau Mau": Nationalism in Kenya*. New York: Praeger.
- Rosenband, Leonard N. (1999): "Social Capital in the Early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9:435—458.
- Rosenthal, Naomi B. , and Michael Schwartz (1990): "Spontaneity and Democracy in Social Movements," in Bert Klandermans, ed. *Organizing for Change: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2. Greenwich, CT: JAI.
- Roy, Beth (1994): *Some Trouble with Cows. Making Sense of Social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ubin, Jeffrey W. (1997): *Decentering the Regime: Ethnicity, Radicalism, and Democrac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Russell, Diana (1974): *Rebellion, Revolution and Armed Forc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Rutherford, Danilyn (1999): "Waiting for the End in Biak: Violence, Order, and a Flag Raising," *Indonesia* 67:40—59.
- Rutten, Roseanne (1991): "Class and Kin: Conflicting Loyalties on a Philippine Hacienda," in Frans Husken and Jeremy Kemp, eds. *Cognition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Leiden: KITLV Press.
- (1994): "Courting the Workers' Vote in a Hacienda Region: Rhetoric and Response in the 1992 Philippine Elections." *Filipinas* 22:1—34.
- (1996): "Popular Support for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CPP-NPA: Experiences in a Hacienda in Negros Occidental 1978—1995," in Patricio N. Abinales, ed. *The Revolution Falter: The Left in Philippine Politics After 1986*.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Publications.
- Salvati, Michele (1981): "May 1968 and the Hot Autumn of 1969: The Responses of Two Ruling Classes," in Suzanne Berger, ed. *Organizing Interests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lvemini, Gaetano (1955): *Scritti sulla questione meridionale, 1896—1955*.

Turin: Einaudi.

Sanderson, Susan R. Walsh (1984): *Land Reform in Mexico: 1910—1980*.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Saul, John S. (1994): "Glob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South African Transition," *Socialist Register 1994*: 171—202.

Schama, Simon (1989):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Knopf.

Schneider, Jane C., and Peter T. Schneider (forthcoming): *Reversible Destiny: Mafia, Antimafia, and the Struggle for Palermo*.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eidman, Gay W. (1993): "'No Freedom without the Women': Mobilization and Gender in South Africa 1970—1992," *Signs* 18:291—320.

(1994): *Manufacturing Militance. Workers' Movements in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1970—198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Gendered Citizenship. South Afric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Gendered State," *Gender and Society* 13:287—307.

(2000): "Blurred Lines: Nonviolence in South Africa,"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33:161—168.

Selbin, Eric (1993): *Modern Latin American Revolution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Sewell, Richard H. (1976): *Ballots for Freedom: Antislavery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37—1860*. New York: W. W. Norton.

Sewell, William H., Jr. (1985): "Ideologi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Cas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7:57—85.

(1994): *A Rhetoric of Bourgeois Revolution: The Abbé Sieyès and "What is the Third Estat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 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 *Theory and Society* 25:841—881.

Share, Donald (1986): *The Making of Spanish Democracy*. New York:

- Praeger.
- Sidel, John T. (1998): "Macet Total: Logics of Circulation and Accumulation in the Demise of Indonesia's New Order," *Indonesia* 66:160—194.
- Siegel, James T. (1998): "Early Thoughts on the Violence of May 13 and 14, 1998 in Jakarta," *Indonesia* 66:76—06.
- Silbey, Joel (1967):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1840—1860*.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1985): *The Partisan Imperative: The Dynamics of American Politics Before the Civil Wa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Anthony D. (1990): "The Supersession of 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31:1—31.
- (1996): "The Origins of Nations," in Geoff Eley and Ronald Grigor Suny, eds. *Becoming National: A Reader*. New York: Oxford of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Graham, Vivien Law, Andrew Wilson, Annette Bohr, and Edward Allworth (1998): *Nation-building in the Post-Soviet Borderland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now, David, and Robert Benford (1988):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in Bert Kla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 eds.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cross Cultures*. Greenwich, CT: JAI.
- (1992): "Master Frames and Cycles of Protest," in Aldon Morris and Carol McC. Mueller, eds.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now, David A., E. Burke Rochford, Jr., Steven K. Worden, and Robert D. Benford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464—481.

- Snyder, Richard (1999): "After the State Withdraws: Neoliberalism and Subnational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Mexico," in Wayne A. Cornelius, Todd A. Eisenstadt and Jane Hindley, eds. *Subnational Politic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Mexico*. La Jolla, CA: Center for U. S. -Mexican Studies.
- Soboul, Albert (1980): "Introduction," *Actes du Colloque: Girondins et Montagnards*. Paris: Société des Etudes Robespirres.
- Solnik, Steven L. (1998): *Stealing the State: Control and Collapse in Soviet Institu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pencer, John (1975): "KAU and 'Mau Mau': Some Connections," Unpublished Paper. (1977): *The Kenya African Union 1944—1953: A Party in Search of a Constituency*. Ph. D. Study, Columbia University.
- (1983): *James Beuttah, Freedom Fighter*. Nairobi: Stellascope Publishing Co.
- Steinberg, Jonathan (1996): *Why Switzerland?* 2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einberg, Marc W. (1999): *Fighting Words. Working-Class Formation, Collective Action, and Discourse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tinchcombe, Arthur L. (1991): "The Conditions of Fruitfulness of Theorizing About Mechanisms in Social Scienc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1:367—388.
- (1998):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s a Mechanism: Corporations, Universities and Nation-States in Competitive Fields," in Peter Hedström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Social Mechanism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9): "Ending Revolutions and Building New Government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49—74.
- Strang, David, and John W. Meyer (1993):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for Diffusion," *Theory and Society* 47:242—243.

- Suny, Ronald Grigor (1993):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5): "Ambiguous Categories; States, Empires, and Nations," *Post-Soviet Affairs* 11:185—196.
- Sydenham, Michael J. (1961): *The Girondins*.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Athlone Press.
- (1974): *The First French Republic; 1792—1804*.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Athlone Press.
- Tambiah, Stanley J. (1996): *Leveling Crowds. Ethnonationalist Conflicts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South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7): "Friends, Neighbors, Enemies, Strangers: Aggressor and Victim in Civilian Ethnic Riot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45:1177—1188.
- Tanner, Albert (1982): *Spulen-Weben-Sticken. Die Industrialisierung in Appenzell Ausserrhoden*. Zurich: Juris Druck.
- Tarrow, Sidney (1989): *Democracy and Disorder: Protest and Politics in Italy 1965—197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8): *Power in Movement*.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1): "Transnational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4, forthcoming.
- Tierchant, Hélène (1993): *Hommes de la Gironde ou la Liberté éclairée*. Bordeaux: Dossiers d'Aquitaine.
- Tilly, Charles (1964): *The Vendé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1993): *European Revolutions, 1492—1992*. Oxford: Blackwell.
- (1995): "State-Instigated Violence 1900—1999,"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9:161—179.

- (1997): "Parliamentarization of Popular Contention in Great Britain, 1758—1834," *Theory and Society* 26:245—273.
- (2000):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of Democratiza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18:1—16.
- (2001): "Mechanisms in Political Process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4, forthcoming.
- Tomasi di Lampedusa, Giuseppe (1960): *Il gattopardo*. Milan: Feltrinelli.
- Traugott, Mark, ed. (1995): *Repertoires an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Trechsel, Alexander (2000): *Feuerwerk Volksrechte. Die Volksabstimmungen in den schweizerischen Kantonen 1970—1996*. Basel: Helbing and Lichtenhahn.
- Turner, Victor (1982): *From Ritual to Theatre: The Human Seriousness of Play*. New York: Performing Arts Journal Publications.
- United Nations (1995): *Kazakhstan. The Challenge of Transition.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5*. www.undp.org/undp/rbec/nhdr/Kazakhstan.
- Uvin, Peter (1998): *Aiding Violence. The Development Enterprise in Rwanda*. West Hartford, CT: Kumarian Press.
- Van Klinken, Gerry (2001): "The Maluku Wars of 1999: Bringing Society Back In," *Indonesia*, forthcoming.
- Vilas, Carlos. (1986): *The Sandinista Revolution: National Liber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entral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Viola, Lynne (1996): *Peasant Rebels under Stalin.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olkov, Vadim (1999): "Violent Entrepreneurship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 51:741—754.
- Walder, Andrew G.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0):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i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Structural Explanation Reconsidered," Unpublished pape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tanford University.
- Walder, Andrew, Bobai Li, and Donald J. Treiman (2001):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State Socialist Regimes: Dual Career into Urban Chinese Elite, 1949—199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forthcoming.
- Waldron, Arthur N. (1985):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and Historical Explanation," *World Politics* 37:416—433.
- Walton, John (1984): *Primitive Rebel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Revolu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sserstrom, Jeffrey N. (1995): "Bringing Culture Back In and other Caveats: A Critique of Jack Goldstone's Recent Essays on Revolution," in Nikki R. Keddie ed. *Debating Revolution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1991):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ekley, Kathleen (1996): "From Vanguard to Rearguard: The Theoretical Roots of the Crisi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in Patricio N. Abinales, ed., *The Revolution Falter: The Left in Philippine Politics After 1986*.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Publications.
- Weingast, Barry (1999):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Civil War: Institutions, Commitment, and American Democracy," in Robert Bates, et al. *Analytic Narrativ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hitehead, Laurence (1995): "An Elusive Transition: The Slow Motion Demise of Authoritarian Dominant Party Rule in Mexico." *Democratization* 2:246—269.
- Wickham-Crowley, Timothy (1989): "Winners and Losers and Also-Rans: Toward 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Latin American Guerrilla Movements," in

- Susan Eckstein, ed. *Power and Popular Protest: Lat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2): *Guerrillas and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surgents and Regimes since 1956*.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4): "Elites, Elite Settlement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n 1950—1980,"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8:543—574.
- Willerton, John P. (1992): *Patronage and Politics in the USS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oungblood, Robert L. (1982): "Structural Imperialism: An Analysis of the Catholic Bishops' Conference of the Philippin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5:29—56.
- (1987): "Church and State in the Philippines: Some Implications for United States Policy," in Carl H. Lande, ed. *Rebuilding a Nation*.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Press.
- (1990): *Marcos Against the Churc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the Philippin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Zald, Mayer N. and, Michael A. Berger (1978): "Social Movements in Organizations: Coup d'Etat, Insurgency, and Mass Movem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823—861.
- Zhao, Dingxin (1997): "Decline of Political Control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the Rise of the 1989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40:159—182.
- (1998): "Ecologies of Social Movements: Student Mobilization during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Beij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1493—1592.
- (2000): *The Power of Tiananme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Zolberg, Aristide R. (1972): "Moments of Madness," *Politics and Society* 2:183—207.

索引

(条目后的数字为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

- abolitionist movement 废奴运动:在
内战前的美国,163—166
- action 行动:斗争行动,73;斗争政治
中的行动,132—137;效仿行动,
335;斗争行动的规模转变,331—
332;行动的社会建构,61
- action, collective 集体行动:经典社
会运动研究议程中的集体行动,
14—18
- action, innovative 创新性行动:为创
新性行动铺平道路的社会利用,
316;在民权运动中,49—50;在法
国革命中,60;与合法性确认/撤
销合法性相关的创新性行动,316
- Action Group, Kenya 肯尼亚的“行动
小组”,106—107
- actor constitution 行动者构成:在茅
茅起义中,320;在美国民权运动
中,318—320
- actor 行动者:在反马科斯运动中,
115—116;得到合法性确认的与
失去合法性确认的行动者,121;
在民权运动中,46—47;行动者的
要求,138—139;经由斗争互动的
行动者构成,315—317;在斗争政
治中,10—11,56—57,131—137;
在斗争互动中,74;在斗争事件
中,30—32;在斗争政治中的形成
与转变,56;认同形成,132—133,
141;行动者之间的互动,131—
132;与其他人的互动,56,137;发
生在行动者身上的激进一翼效
应,70;在西西里起义及其被合并
于意大利的过程中,238—240;被
确认具有合法性,121,145,158,
204,316
- actor, collective 集体行动者:由居间
联络人造就的集体行动者,142;
集体行动者的组织、商讨与谈判,
61—62

- actor, contentious 斗争中的行动者：为斗争行动者所采用的居间联络, 102; 斗争行动者的互动, 61
- actor, political 政治行动者：政治行动者的组合, 12; 在斗争事件中的构成, 314—316; 新政治行动者的出现, 315; 不同政权中的政治行动者, 146; 居间联络在政治行动者之间所起的作用, 143
- Adell Argilés, Ramon 阿德尔·阿希莱斯, 拉蒙, 185
- Advani, Lal 阿德瓦尼, 拉尔, 148
-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 非国大, 151—156; 权力增长对非国大所产生的作用, 156
- agent of diffusion 扩散的代理人：在奥伦古鲁昂起义中, 104—105
- Aguilar Fernández, Paloma 阿吉拉·费尔南德斯, 帕洛马, 180
- Akaev, Askar 阿卡耶夫, 阿斯卡 259
- analogies, causal 因果类比, 74
- Anderson, Benedict 安德森, 本尼迪克特, 109—110
- Anderson, Bo 安德森, 波, 295
- Anti-Fascist Revolutionary Patriotic Front (FRAP, Frente Sandinista le Liberacion Nacinal), Spain “反法西斯革命爱国阵线”, 西班牙, 180, 185
- antislavery, political 政治上的反奴隶制运动：社会变化所产生的效果, 166—168; 政治上反奴隶制运动的出现, 166
- apartheid system, South Africa 种族隔离制度,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垮台, 151; 反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治联盟, 154
- appropriation, social 社会利用：作为因果机制的社会利用, 92; 在民权运动中, 44, 47—48; 在斗争事件中, 47—48; 在法国大革命中, 59—63; 伴有社会利用的创新性行动, 316; 在菲律宾“黄色革命”中, 114—117
- Aquino, Benigno 阿基诺, 贝尼格诺, 107—108, 111—114, 122
- Aquino, Cory 阿基诺, 科里, 108—109, 114
- Arias Navarro, Carlos 阿里亚斯·纳瓦罗, 卡洛斯, 179
- assassination 暗杀：贝尼格诺·阿基诺的被暗杀, 108, 111—114, 116, 122, 202; 卡雷罗·布兰科的被暗杀, 160, 171—172; 查莫罗的被暗杀, 201—203; 英迪拉·甘地的被暗杀, 129; 与基库尤人抵抗运动相关的暗杀行动, 100—101
- attribution of similarity 相似性归因：

- 在集体行动中,335;定义,334;在卢旺达种族屠杀中,339;在规模转变中,333—334
- attribution of threat and opportunity 威胁与机遇归因:在民权运动中,46—47;作为因果机制的威胁与机遇归因,92;在法国革命中,58—63;在战后的肯尼亚,95—98
- authoritarianism 独裁主义:强加于政治体成员身上的独裁主义,79;在墨西哥,296;在西班牙,177—179
- Autonomous Workers' Federation (FAT, Federación autonoma de trabajo), Mexico, 自治工人联盟, 墨西哥,302
- Bank of America (BANKAMERICA), Nicaragua, “美洲银行”,尼加拉瓜,199
- Basque Homeland and Freedom (ETA: Euzkadi Ta Azkatasuna), Spain, “巴斯克人家园与自由”(埃塔),160,178—180,185—186
- Beissinger, Mark 贝辛格,马克,234,251—253
- Berman, Bruce 伯曼,布鲁斯,93,105
- Bermeo, Nancy 伯密欧,南希,180
- 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 India 人民党,印度,134,137,148—149
- Bier, Alice Gail 比埃尔,埃里斯·盖尔,179
- Biko, Steve, 比科,史蒂夫,151
- Black, George 布莱克,乔治,199,200,211,213—214,219—220
- Black Consciousness “黑人觉醒”,151—215
- Blyth, Stuart 布莱斯,斯图亚特,179
- Booth, John A. 布思,约翰·A.,201,205
- borrowing in category formation 范畴形成中的借用,143—144,157—158
- Botha, P. W. 博塔,P. W. 152
- Boudreau, Vincent 布德罗,文森特 114—115,120
- Brass, Paul 布拉斯,保罗,129
- Brezhnev, Leonid 勃列日涅夫,列奥尼德,248,257
- Brokerage 居间联络:在美国内战前的各群体中,162;作为因果机制的居间联络,92;在斗争政治中,127,157—159,334;在创建统一的意大利的过程中,245—246;对居间联络的界定,26,102,142;在肯尼亚和菲律宾的斗争事件中的不同,120—121;在苏联解体过程中,247,254—255,263;作为公共政治的推动者,276;在法国大革

- 命中, 327; 在印穆冲突中, 148—151; 在哈斯萨克斯坦, 261; 在马尔古群岛, 331; 在墨西哥, 296—297, 310; 有赖于居间联络的目标转换, 145; 在菲律宾“黄色革命”中, 114—117; 在极化过程中, 322—323; 居间联络的潜在作用, 70; 在推进瑞士民主的进程中, 287, 289; 作为相关性机制的居间联络, 26; 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 304; 在西班牙过渡政治时期的作用, 183, 186; 在罢工中的作用, 150; 在卢旺达种族屠杀中, 339; 在规模转变中, 333; 在南非(1980—1995), 151—157; 在西班牙向民主制的过渡中, 162; 在斗争扩散的过程中, 335; 在瑞士跨阶级联盟形成中, 284
- brokerage/coalition formation pathway 居间联络/联盟形成的路径: 导致规模转变的居间联络/联盟形成路径, 332—333
- broker 中间人: 造就集体行动者, 142; 作为中间人的肯尼亚巡回商人, 157; 在墨西哥制度革命党统治下, 301; 在奥伦古鲁昂起誓运动的扩散中, 103—106; 中间人的不同变化, 142—143
- Brook, Timothy 布鲁克, 蒂莫西 221—222
- Brooks, Preston 布鲁克斯, 普雷斯顿, 160
- Bunce, Valerie 邦斯, 瓦莱丽, 82—83
- Burns, Stewart 伯恩斯, 斯图尔特, 318—319
- Buthlezi, Mangosuthu 布特莱奇, 蒙哥苏图, 152—154
- Butler, Andrew 巴特勒, 安德鲁, 160
- capacity, governmental 政府能力, 269; 与政府能力相互交叉的保护性协商, 269
- Cárdenas, Cuauhtémoc 卡德纳斯, 库奥提摩克, 295
- Cárdenas, Lazaro 卡德纳斯, 拉扎罗, 295, 297
- Carrero Blabco, Luis 卡雷罗·布兰科, 路易斯, 160, 171, 179
- Carter Administration 卡特政府 112, 205—206, 224
- categories 范畴: 制造出新的配对范畴, 143; 南非的转变, 155
- category formation 范畴形成: 作为范畴形成的借用, 143—144, 157—158; 在斗争政治中, 127, 157—159; 作为范畴形成的遭遇, 143—144, 157—158; 在法国大革命中, 327; 在印穆冲突中, 148—151; 由范畴形成创造的认同,

- 143;不断递增的范畴形成,144;
作为范畴形成的人为制造,143—
144,157—158;在马卢古群岛,
331;目标转换所依赖的范畴形
成,145;在极化过程中,322—
323;在南非(1980—1995),151—
157;范畴形成中的亚机制,143
- Catholic Bishops' Conference of the
Philippines(CBCP)菲律宾天主教
主教大会,110,113
- Catholic Church, Philippines 菲律宾
天主教会,110—114
- Cavour, Camillo 加富尔,卡米洛
236,238—240,143—145
- certification 合法性确认:在斗争政
治中,127,147—148,157—159;
肯尼亚与菲律宾的斗争事件中合
法性确认之不同,121—123;在非
律宾“黄色革命”中的作用,122—
123;在印穆冲突中,148—151;在
南非(1980—95),151—157;使行
动者得到确认,121,145,158,
204,316
- challengers 挑战者:对现存组织的利
用,44,47;在斗争互动中,74
- Chamorro, Pedro Joaquin 查莫罗,佩
德罗·乔昆,200—203
- change processe 变化过程:在菲律宾
“黄色革命”中,109—111;在二战
后的肯尼亚,93—95
- Chiapas rebellion, Mexico 恰帕斯起
义,墨西哥,295,300,302
- citizenship in democracy 民主体制下
的公民权 266—267
- civil right, United States 民权,美国,
49,318—320
- Civil Rights Movement 民权运动:
经典社会运动研究议程对民权运
动的研究,19—20;有节制的斗争
阶段,38—39;民权运动中的动
力,43—44;影响民权运动发生的
诸因素,46—47;在密西西比的格
林伍德,19—20;民权运动中的创
新,49;对民权运动的静态的描
述,39—42;民权运动的逾越界限
阶段,39—40,46
- civil society, Mexico 公民社会,墨西
哥,295
- Civil War, American 美国内战:内战
的环境的、认知的及相关性的机
制,26;内战前发生的诸重要事
件,163—171
- claim making 提出要求:行动者提出
要求,137;集中于提出要求的目
标转换,158;公开提出要求的参
与者,138
- clientelism in Mexican politics 墨西
哥政治中的依附主义,302

Clines, Francis 克莱因斯, 弗朗西斯, 258

coalition formation: 联盟形成: 尼加拉瓜, 203 ; 菲律宾, 203

coalition formation, cross-class 跨阶级联盟形成: 跨阶级联盟形成的后果, 276; 在墨西哥, 296; 在瑞士, 284, 286

coalition, political 政治联盟, 151—152

Cockcroft, James D. 柯克罗夫特, 詹姆斯, 295

Coleman, James 科尔曼, 詹姆斯, 25

collective action 集体行动: 在肯尼亚的有节制斗争中, 95—18; 认同动员对集体行动的影响, 56; 集体行动中的效仿, 335; 引导集体行动之流的因素, 49; 美国内战前的认同形成, 167; 创新性集体行动, 48—50, 60—63; 1789 年法国的创新性行动, 60; 集体行动之制度性对等物与明显的相似性, 335; 在意大利学生运动中 (1967—1968), 63—67; 导致逾越界限的斗争 (在肯尼亚), 98—102; 旨在进行动员的集体行动, 316; 集体行动的仪式, 49

Communist Party of Philippines (CCP) 菲律宾共产党, 118—120

comparison, paired 配对比较: 基于定性证据的配对比较, 81; 共同基础的配对比较, 81—82; 最为相似与最为不同体系分析, 80—81; 不同基础的配对比较, 81—84

competition 竞争: 在造就意大利统一过程中, 245—246, 262; 在苏联解体过程中, 247, 253—254, 263; 在法国大革命中, 327; 在哈萨克斯坦, 261; 在马卢古群岛, 330—331; 在极化中, 322—323; 权力竞争, 67—68; 导致威胁—机遇归因的竞争, 95—96

Confederation of Spanish Employees' Organization (CEOE: Confederación Español de Organizaciones Empresariales) 西班牙雇工组织联盟, 174

conflict 冲突: 加里波第统治下的西西里, 240; 印穆冲突, 127—137, 140, 148—151

confrontation: as single episode 遭遇: 作为单一事件, 29

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 (CORE) 种族平等大会, 68

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 (COSATU) 南非工会大会, 152, 154

constitutions 宪法: 墨西哥宪法,

- 292; 瑞士宪法 (1789, 1803, 1848), 278—279, 282; 美国宪法中的五分之三原则, 163
- consultation, protected 保护性协商: 在民主化过程中, 266—268; 影响保护性协商的诸因素, 274; 产生保护性协商的斗争形式与过程, 268; 向保护性协商发展, 269; 在不同政体中的保护性协商, 266; 强政府与弱政府通向保护性协商之路, 272—274
- contention 斗争: 基于嵌入式或分离式认同的斗争, 141; 居间联络在斗争传播中的作用, 335; 能产生保护性协商的斗争, 268; 有节制的斗争, 6—8, 72, 315; 民权运动的有节制阶段, 38—39; 斗争在西班牙的扩散, 179—181; 对斗争的经验研究, 84—85; 民族斗争事件, 8; 斗争在肯尼亚的不断升级, 98—102; 形成尼加拉瓜斗争的事件, 224; 斗争事件的实例, 6; 对斗争的解释, 20—22; 创新性斗争, 49; 斗争的制度性地点, 342—343; 民众斗争与民主的相互依赖, 269; 革命斗争中的诸机制, 198—199; 作为斗争基础的社会互动, 126; 通过扩散而传播, 335; 经由居间联络而传播, 333—334;
- 瑞士 (1830 年代—1840 年代), 280; 对斗争的容忍 (墨西哥), 294; 逾越界限的斗争, 6—8, 12, 72, 315; 逾越界限与有节制的斗争, 341; 民权运动向逾越界限阶段的过渡, 39—40; 跨国的斗争, 337; 看待斗争的不同方式, 73
- contingency 偶然性: 在机制分析中的作用, 311; 在斗争动力中的作用, 223—225
- convergence 会聚: 伴有激进化的会聚在西班牙, 184—186; 伴有激进化的会聚在美国, 170—171
- cooptation 拉拢: 中间人的拉拢, 276; 中间人拉拢在墨西哥, 296; 中间人拉拢在瑞士, 287, 289
- Cornell, Stephen 康奈尔, 斯蒂芬, 231—232
- Costa Rica 哥斯达黎加, 206
- Cuba 古巴, 197
- cultural approaches 文化方法: 斗争政治研究的文化方法, 21—22, 57—58
- culturalism 文化论: 斗争政治研究的文化论, 57—58
- d'Azeglio, Massimo 达泽格里欧, 马西莫 236
- decertification 撤销合法性确认: 定义, 204; 在肯尼亚与菲律宾的不

同之处,121—123;在茅茅起义的作用,122;在菲律宾“黄色革命”中的作用,122—123;在尼加拉瓜政体背叛过程中,198,204—207,224

decolonization 非殖民化:二战后,146—147;在二战后的肯尼亚,95—96

de Flesselles, Jacques 德·弗莱塞勒,雅克,54

de Klerk, F. W., 德克拉克,152

de Launey (marquis) 德洛内(侯爵),54

democracy 民主:定义,78;偏离民主,268—269,271;作为议会民主制的肯尼亚,93;民主解释的局限,265;在尼加拉瓜,197;政治—过程定义,265;民主体制下的保护性协商,266—268;民主体制下的政府能力的作用,269;通向民主的强政权与弱政权之路,270;瑞士的直接民主,281,283;瑞士的代议制民主,277—281;西班牙向民主的过渡,160—161

democratization 民主化:作为公共政治变化的民主化,266;作为斗争事件的民主化,36;有效的民主化,266—267;加速民主化的因素,274;抑制民主化的不平等,

283—284;民主化进程中要求与反要求的互动,268;推进民主化的过程与机制,274—276;因果机制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304;导向民主化的地点变化,303

democratization, Mexico 民主化,墨西哥:导向民主化的各种变化,298—299;民主化的障碍,296—297;民主化的时间范围,296

democratization, Swiss 民主化,瑞士:民主化的时间,296;伴随民主化而得以改变的不平等,285—286

Depretis, Agostino 德普雷提斯,阿格斯提诺,242—243

Des Forges, Alison 德斯弗格斯,埃利森,338

Deutsch, Karl 多伊奇,卡尔 278

Diaz, Porfirio 迪亚斯,波菲里奥 292

diffusion 扩散:在卢旺达种族屠杀中,339;在规模转变中,333;在苏联的民族主义斗争中,252—253;在斗争的扩散中,335;在斗争轨迹中,68—70

diffusion/emulation pathway 扩散/效仿路径:导向规模转变的扩散/效仿机制,332—333

direct rule 直接统治:由国家能力增长而来的直接统治,78

disintegration, Soviet Union 苏联解

- 体, 247, 253—255, 261—263
- dissolution 解体: 墨西哥的保护人—被保护人网络的解体, 296; 保护人—被保护人网络的解体, 276; 瑞士的保护人—被保护人网络的解体, 287
- Dixiecrat revolt(1948) 美国南部民主党人的叛乱, 49
- Douglas, Stephen A. 道格拉斯, 斯蒂芬, 166, 170
- East Africa Trades Union Congress (EATUC) 东非工会大会, 96—97
- Edgerton, Robert B. 埃杰顿, 罗伯特, 93
-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艾森豪威尔政府, 47
- Elias, Norbert 埃利亚斯, 诺伯特, 143
- Elster, Jon 埃尔斯特, 乔恩, 25
- emulation 效仿: 在集体行动中, 335; 界定, 335; 扩散/效仿路径, 332—333; 在规模转变中, 333
- encounter in category formation 范畴形成中的遭遇, 143—144; 157—158
-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194
- Enrile, Jun Ponce 恩里尔, 琼·庞斯, 108
- episode 事件: 界定, 85; 作为原因的事件之定义, 24; 事件中的动员, 29; 事件中的极化, 29; 事件中的过程, 28—29
- episode of contention 斗争事件: 斗争事件中的因果机制与过程, 28—32; 有节制的斗争事件, 8; 定义, 85; 促进斗争事件出现的因素, 97; 斗争事件的布局与形式, 75—78; 斗争事件中的动员, 29; 民族性斗争事件, 314—315; 斗争事件中的新政治行动者及认同, 314—315; 斗争事件中的极化, 29, 322; 斗争事件中的过程, 28—29; 伴随着规模转变的斗争事件, 314—315, 332; 斗争事件中的社会利用, 47—48; 逾越界限的斗争事件, 8
- equality 平等: 政治体内成员的平等, 79; 体制内的平等, 266; 瑞士的平等, 284—285
- ethnic groups, Mexico 族群, 墨西哥, 300
- ethnicity 族群性与民族主义之不同, 231—232; 哈萨克斯坦国内的族群性, 256; 与民族性的关系, 231—232
- Falange, Spain 长枪党, 西班牙, 179
- federal system 联邦制: 在墨西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251, 257—258
- Gossman, Lionel 戈斯曼, 莱昂内尔, 282
- government 政府: 根据政治认同的政府统治, 134; 瑞士直接民主制中的政府, 281; 瑞士的政府形式, 278—279
- Gramsci, Antonio 葛兰西, 安托尼奥, 63, 246
- Granovetter, Mark 格拉诺维特, 马克, 25
- Greenwood, Davydd 格林伍德, 戴维, 175 注 3
- grievance, suddenly imposed 被突然强加的怨愤: 在尼加拉瓜政体背叛过程中, 198; 201—204
- Griffiths, James 格里菲思, 詹姆斯 97—98
- Group of Twelve, Nicaragua “十二人小组”, 尼加拉瓜, 201, 206
- Guenniffey, Patrice 格尼菲, 帕特里克斯, 326
- Gunther, Richard 冈瑟, 理查德, 176, 183
- Haas, Ernst 哈斯, 埃尔内斯特, 229—230
- Habyarimana, Juvénal 哈比亚利马纳, 儒维纳尔, 337—339
- Hall, Peter 霍尔, 彼得, 82
- Hardy, Simeon-Prosper 哈迪, 西米恩—普罗斯珀, 3, 53—54
- Hartmann, Douglas 哈特曼, 道格拉斯, 231—231
- Hedman, Eva-Lotta 赫德曼, 伊娃—洛塔, 11, 115, 116—117, 120
- Hedström, Peter 赫德斯特罗姆, 彼得, 25
- Higher Council of Private Enterprise (COSIP, later COSEP: Consejo Superior de Iniciativa Privada), Nicaragua 私营企业高级会议, 尼加拉瓜, 200—201
- Hindu-Muslim conflicts 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 印穆冲突中的行动者、认同及行动, 132—137; 印穆冲突中的互动, 140; 相互交叉的机制(在东南亚), 148—151; 在印度的帕尼普尔, 127—130
- Hroch, Miroslav 赫罗奇, 米洛斯洛夫, 228
- Iberian Liberation Movement (MIL), Spain 伊比利亚解放运动, 西班牙, 180
- identity 认同: 行动者的认同, 132—137; 作为认同的公民身份, 136; 在斗争政治中, 141; 建立在嵌入式与分离式认同基础上的斗争政

治,141;造就法国共和派的认同,59—60;分离式认同,135,141;对认同的不同看法,130—132;嵌入式认同,135,141;印穆冲突中的认同,130;家族认同,135;斗争性认同的地点,135—136;社会互动中得以改变的认同,126;宗教认同,134;认同的社会特点,145;作为社会关系的认同,133—134

identity, political 政治认同:有关政治认同的要求,56;嵌入式与分离式政治认同,135;政治认同的形成,55—56;根据政治认同而行使的政府统治,134;作为政治认同的语言,230—231;在社会生活与斗争政治中的政治认同,135

identity formation 认同形成:法国大革命中行动者的认同形成,55—63;美国内战前的认同形成,167;范畴形成所造成的认同形成,143—144;政治认同形成机制,28

identity shift 认同改变:在兼并西西里的过程中,244—245;在造就意大利统一的过程中,244—246,262;在苏联解体过程中,247,253,263;在哈萨克斯坦,261;在西班牙的过渡时期中,181—186;在美国,167—169

immigration, United States (1845—

1854)移民,美国,167

Indonesian Communist Party (PKI)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328

industrialization, Swiss 工业化,瑞士:开端,285;早期工业化的集中,288;伴随工业化的人口变化,285,287;工业化对信任网络的破坏,287—288

inequality 不平等:影响保护性协商的诸多变化,274—275;跨阶级联盟形成对不平等的影响,276;墨西哥的远离类别不平等,297—298;作为一系列社会关系的不平等,274;瑞士实质上的不平等,283—286

information diffusion 信息扩散,333—334

infringement of elite interests, Nicaragua 对精英利益的侵犯,尼加拉瓜,198,199—201

Inkatha Freedom Party, South Africa 英卡塔自由党,南非,152—154

institutional equivalence 制度对等物,334

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PRI), Mexico 制度革命党,墨西哥;293—296;对制度革命党的挑战,301—302;社团主义网络的衰落,300—301;把农民并入制度革

- 命党,297;社团主义体制的建立(20世纪30年代),301;加强制度革命党权力的各种机制,297—298
- Instrumentation(贯彻国家预期政策的)手段:通过运用手段以实现国家能力的增长,78
- integration 整合:意大利因果机制的整合,262;墨西哥信任网络的整合,298;瑞士信任网络及公共政治的整合,289
- interactions 互动:西西里革命中行动者的互动,238—240;认知性的互动,139—140;在集体行动中,49;斗争性互动,72—74,137;互动—结果格栅,139—140;斗争互动中的常用手法,137—141;限制互动的斗争常用手法,49;从非斗争性互动向斗争性互动的转变,140—141;战略互动,139—140
- internationalization 国际化:在墨西哥民主转变过程中的作用,299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7
- Invention 人为制造:在范畴形成中的作用,143—144,157—158
- Italy 意大利:统一过程中的居间联络,245—246;统一过程中的认同改变,244—246,262;因果机制的整合在意大利,262;统一过程中的动员,262;皮蒙特在统一后的霸权,241—243;意大利的统一过程,235—240,244—246,262;意大利的建国,235—246;统一(1859—1870),235—241,261—262;意大利的斗争浪潮,30—32
- Juarez, Benito 华雷斯,贝尼托,292
- Justice for Aquino, Justice for All (JAJA) Philippines “阿基诺的正义,所有人的正义”,菲律宾,117
- Kakar, Sudhir 卡卡,萨德赫,148—149
- Katzenstein, Peter 卡赞斯坦,彼得,82
- Kazakhstan 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地缘政治,255—256;对某些民族主义群体的镇压,260;对苏联集体化的抵制,256;作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哈萨克斯坦,256
- Kennedy administration 肯尼迪政府,47
- Kenya 肯尼亚:威胁和机遇归因在肯尼亚,95—98;中间人和居间联络在肯尼亚,120—121,157;合法性确认与撤销合法性确认在肯尼亚,121—123;肯尼亚的变化过程,93—95;肯雅塔与“肯尼亚非洲人同盟”的有节制政治行动,

100;非殖民化在肯尼亚,95—96;斗争的逐步升级,98—102;肯尼亚的动员,95—98;有节制斗争中的动员,97—98;多种族和睦相处主义政策,96;肯尼亚的民族主义,95—96,101;作为议会民主制国家的肯尼亚,93;肯尼亚的团结,106;存在于肯尼亚的不确定性,97,102

Kenyan African Union (KAU) 肯尼亚非洲人联盟:肯尼亚非洲人联盟的有节制政治行动,100—101;肯尼亚非洲人联盟的形成,96;与土地有关的请愿行动,97—98

Kenyatta, Jomo 肯雅塔,约莫;92,96—97,100—101,157;肯雅塔失去合法性确认所产生的影响,122

Kerkvliet, Benedict 柯克夫利特,本尼迪克特,118

Kikuyu Central Association (KAC) 基库尤中央协会,99—100,104

Kikuyu Highlands Squatters Landlords Association 基库尤高地占地地主协会,99

Kikuyu people 基库尤民族:奥伦古鲁昂占地者的集体行动,98—100 (1940s);破坏基库尤人生活的诸因素,94—95;奥伦古鲁昂占地者的起誓运动,99—100,103;起誓

运动在内罗毕的传播,105—107

King, Martin Luther, Jr. 金,小马丁·路德,40,48,50,319

Koinange (Kikuyu chief) 科伊南格(基库尤人酋长),105

Kolbin, Gennadi 科尔宾,杰纳迪,257

Kubai, Fred 库拜,弗雷德,97,105—107

Kanaev, Dinmukhamed 库纳耶夫,丁姆克哈默德,257

Ladner, Joyce 拉德纳,乔伊斯,19—20

La Farina, Giuseppe 拉法里纳,居塞佩,245

Lampedusa, Tomasi di 兰佩杜沙,托马西·迪,241

Lande, Carl 兰德,卡尔,122—123

language 语言:作为政治认同基础的语言,260;少数民族语言,230—231;作为政治认同的语言,230—231;哈萨克斯坦的国家语言,257,261;国家创造的民族语言,232;意大利统一时期的语言(1860s),235,237

Lenin, V. I. 列宁 248

Lennox-Boyd, Alan 伦诺克斯—博伊德,艾伦,93

Lincoln, Abraham 林肯,亚伯拉罕,170

- Linz, Juan 林茨,胡安,177,185
- Lonsdale, John 朗斯代尔,约翰,93,97,101,105
- Louis XVI(king of France)路易十六(法国国王),52
- Ludden, David 卢登,戴维,133
- Lyttleton, Adrian 利特尔顿,阿德里安,246
- McCarthy, John 麦卡锡,约翰,15
- Mack Smith, Denis 麦克·史密斯,丹尼斯,244
- Macleod, Ian 麦克利奥德,伊恩,93
- Macmillan, Harold 麦克米兰,哈罗德,93
- Makati Business Club, Philippines“马卡蒂商业俱乐部”,菲律宾,111
- Mandela, Nelson 曼德拉,纳尔逊,152,156
- Maravall, José Maria 马拉韦尔,何塞·玛利亚,178,180
- Marcos, Ferdinand 马科斯,费迪南德,107—114,122
- Marx, Anthony W. 马克斯,安东尼,151—152
- Marx, Karl 马克思,卡尔,194,346
- Mau Mau revolt, Kenya 茅茅起义,肯尼亚,6—7;导致起义发生的居间联络,120—121;茅茅起义中出现的合法性确认与撤销合法性确认,121—123;威胁—机遇的竞争性解释,95—96;茅茅起义中不同派别的发展,95;与菲律宾“黄色革命”的不同,91;撤销合法性确认的影响,122;茅茅起义的逐步升级(1952),92;运动的起源,93—94;茅茅起义中的社会利用与居间联络,102—103
- Mazzini, Giuseppe 马志尼,居塞佩,239,245
- mechanism-interaction issue 机制—互动问题,224
- mechanism 机制:威胁和机遇归因,92;居间联络,92;作为机制的范畴形成,316;作为机制的合法性确认,316;认知机制,25—26,310;作为机制的权力竞争,67—68;定义,24—25;作为机制的扩散,68—70;环境机制,25,58—59,310;机制的功能,25;动员过程中的机制,28;机制的运作说明,310;政治认同形成机制,28;推进民主化的机制,274—276;作为机制的激进化,68—70;机制的辨认,26—27;一再出现的机制,13—14,33—35;相关性机制,26,310;机制与过程的关系,12—13,27—28;作为机制的镇压,68—70;作为机制的社会利用与被突

然强加的怨愤,310;有关机制的种种观点,24—25

mediation 中介:斗争常用手法的中
介,141

Merton, Robert 默顿,罗伯特,24—
25

methodology in analyses of con-
tentious politics 斗争政治分析中
的方法论,308—311

Mexican Coffee Institute, MEX 墨西
哥咖啡协会,300

Mexico 墨西哥:类别平等的缺席,
297—298;墨西哥的独裁主义,
296;居间联络在墨西哥,296—
297,301,310;恰帕斯起义,295,
300,302;公民运动(1970s),299;
墨西哥的民众协会,295;依附主
义在墨西哥,302;墨西哥宪法,
292;中间人拉拢,296;跨阶级联
盟的形成,296;墨西哥的民主化,
296—299,304;保护人—被保护
人网络的解体,296;经济增长
(1960s),299;墨西哥的联邦制
度,292;后革命时期的寡头统治,
297;学生运动,(1968),299;对斗
争的容忍,294;墨西哥的信任网
络;298

Minnaar, Anthony 米纳尔,安东尼,
153—154

mobilization 动员:动员中的威胁与
机遇归因,95—96;引发尼加拉瓜
动员的条件,223—224;肯尼亚有
节制斗争中的动员,97—98;动员
的动态框架,43—45,50—51;斗
争事件中的动员,29;意大利学生
运动中的动员(1967—1968),
30—32,63—64;动员中的机制与
过程,13,28;在亚拉巴马的蒙哥
马利市,38—43;肯尼亚民族主义
者的动员,95—96;动员对于集体
行动的必要性,316;在菲律宾的
“黄色革命”中,107;在战后的肯
尼亚,96;西班牙右翼势力的动
员,185;苏联分离主义者的动员,
252;在西班牙,177—179;在意大
利统一过程中,262

mobilizing structure 动员结构:在经
典社会运动研究议程中,14,17—
18,50

Moncloa Pact 蒙克洛阿协定,183

Montero, José Ramón 蒙特罗,何塞·
拉蒙,185

Montgomery Improvement Associa-
tion(MIA)蒙哥马利改进协会,40

More, Barrington 摩尔,巴林顿,82

multiracialism policy 多种族主义政
策,96

Mungai, J. M. 蒙加伊, J. M., 105—

- 107
- myth, national 民族神话, 230
- Nation 民族: 定义, 229
- National Action Party (PAN), Mexico
民族行动党, 墨西哥, 294 注,
296, 298, 302
-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
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
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 42, 46, 68,
342
-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中亚的民族
主义, 258—259; 民族主义的要
求, 229; 作为斗争事件的民族主
义, 36; 定义, 230; 与族群性之不
同, 231—232; 俄罗斯寻求建立国
家的民族主义, 259; 在“公开性”
时期, 234; 印度民族主义, 147; 印
度尼西亚民族主义, 328; 意大利
由国家领导的民族主义与寻求建
立国家的民族主义, 236, 262; 在
哈萨克斯坦, 255—259, 261; 民族
主义运动, 230; 民族主义意识形
态, 230; 在战后的肯尼亚, 95—
96, 101; 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247; 苏联由国家领导的民族主义
与寻求建立国家的民族主义,
251—252, 262; 由国家领导的与
寻求建立国家的民族主义, 233;
寻求建立国家的民族主义, 233;
对民族主义的支持(意大利), 237
- nationality 民族(性): 哈萨克民族,
260—261; 通过权利和义务而联
结起来的人们, 232; 与族群性的
关系, 231; 民族在苏联地方政府
与政治中, 235
- National Liberation Party (PLN),
Nicaragua 民族解放党, 尼加拉
瓜, 201, 221
- National Movement for Free Elections
(NAMFREL), Philippines 全国自
由选举运动, 菲律宾, 117
- National Party (NP), South Africa 国
民党, 南非, 151—152
- National Solidarity Program
(PRONASOL, Program National
de Solidaridad), Mexico 民族团结
纲领, 墨西哥, 302
- nation-state 民族国家: 定义, 229; 把
国家与帝国重新定义为民族国
家, 233; 作为民族国家的统一的
意大利, 246
- Nation United in Spirit and Mission
(BANDILA), Philippines “精神与
使命民族统一”, 菲律宾, 117
- Nazarbaev, Nursltan 纳扎尔巴耶夫,
纳苏坦, 257—260
- Necker, Jacques 内克, 雅克, 3, 4,
53—55

- network 网络:网络中的行动者, 132;墨西哥的保护人—被保护人网络,296
- New Nationalist Alliance(BAYAN), Philippines 新民族主义者联盟,菲律宾,116
- New People's Army(NPA), Philippines 新人民军,菲律宾,118—120
- Nicaragua 尼加拉瓜:跨阶级联盟的形成,203;撤销对索摩查政权的合法性确认,307;外国撤除对尼加拉瓜的支持,205—207;对精英利益的侵犯,198—201;尼加拉瓜的革命形势(1970s),197;偶然性在尼加拉瓜斗争中的作用,223—225;尼加拉瓜的革命轨迹,196—198
- Nicaraguan Bank(BANIC)尼加拉瓜银行,199
- Nicaragu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INDE)“尼加拉瓜发展协会”,200—201
- Nixon, Richard M. 尼克松,理查德,6—7
-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29,300
- Nottingham, John 诺丁汉,约翰,92—93
- object shift 目标转换:在斗争政治中,127,157—159;定义、作用以及目标转换的发生,144—145;对斗争常用手法的影响,144;目标转换的作用,158;在印穆冲突中,148—151;在南非(1980—1995),151—157
- Obregón, Alvaro 奥布雷贡,阿尔瓦罗,293,297
- O'Donnell, Guillermo 奥唐奈,吉勒莫,161
- Olcott, Martha Brill 奥尔科特,马莎·布里尔,255,257
- Olson, Mancur 奥尔森,曼科,15
- opportunity 机遇:在斗争政治中,243;解释与归因,48
- opportunity/threat spiral 机遇/威胁螺旋:在苏联解体过程中,247,252—253,263;在法国大革命中,324,327;在哈萨克斯坦,261;在马卢古群岛,330;在极化中,322—323;在意大利统一中,243—244,262
- Opus Dei, Spain 天主事工会,西班牙,179
-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OAS) 美洲国家组织,207
- Paige, Jeffrey M. 佩奇,杰弗里 M.,

- 202
- Parks, Rosa 帕克斯, 罗莎, 39—40, 46
- participation, democratic 民主参与: 在墨西哥, 295
- Party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PRD), Mexico 民主革命党, 墨西哥, 294 页注, 295—296
- Payne, Charles 佩恩, 查尔斯, 19—20, 184
- Payne, Stanley 佩恩, 斯坦利, 171
- penetration: 渗透: 增强国家能力的渗透, 78
- People's Unity Party, Kazakhstan 人民统一党, 哈萨克斯坦, 258
- Pérez Díaz, Victor 佩雷斯·迪亚斯, 维克托, 171—172, 180—181, 183—184
- Performance 表演: 在斗争常用手法中, 138
-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es 现象学方法, 21—22
- Philippine Business for Social Progress (PBSP) 菲律宾社会进步商会, 110
- Philippine Businessmen's Conference 菲律宾商人会议, 111
- Philippine Communist Party 菲律宾共产党, 107
- Philippines 菲律宾: 反马科斯的庞大组织, 115—117; 居间联络, 114—117, 120—121; 菲律宾的党魁民主, 109; 跨阶级联盟的形成, 203; 菲律宾的不确定性, 112—114
- Philippine Yellow Revolution 菲律宾黄色革命: 黄色革命中共共产党的缺席, 117—120; 黄色革命中的威胁和机遇归因, 111—114; 导致黄色革命的居间联络, 120—121; 黄色革命中的合法性确认与撤销合法性确认, 121—123; 黄色革命的变化过程, 109—111; 与茅茅起义的不同, 91; 黄色革命中的合法性确认与撤销合法性确认的影响, 122; 黄色革命中的社会利用与居间联络, 114—117
- Piedmont 皮蒙特: 通过多次兼并以建成统一的意大利, 239—241; 加富尔对小国的逐一兼并策略, 239
- Polarization 极化: 在内战前的美国, 184; 与其他机制的结合, 322—323; 定义, 322; 在事件中, 29; 极化的例子, 322; 在法国大革命中, 323—327; 在意大利学生运动中 (1967—1968), 64
- political cycle theory 政治周期理论, 65—67
- political opportunity 政治机遇: 在经

典社会运动研究议程中,14—18
 politics 政治:瑞士政治生活的特点,286;大部分政治生活所具有的特征,5;废奴主义对美国政治的影响,166;民族主义政治的形式,229;制度化的政治,6—7;非制度化的政治,6—7;种族政治,42
 politics, contentious 斗争政治:斗争政治中的行动者,56—57,131—137;斗争政治中的居间联络,334;基于嵌入式与分离式认同的斗争政治,141;斗争政治中的认知机制,26;斗争政治的组成,12;有节制的斗争政治,7—8;斗争政治研究的文化论,57—58;定义,5;斗争政治的动态框架,43—45;斗争政治中的动员的动态框架,44—5;斗争政治的环境机制,25;斗争政治的偶发性本质,5;斗争政治在肯尼亚的演进,98—102;法国大革命中的斗争政治,55—58;斗争政治中的认同改变机制,157;斗争政治的制度性对等物,334;斗争政治动态分析,307;斗争政治在墨西哥,294—295;斗争政治中的动员性认同,56;斗争政治的新研究方案,311—313;斗争政治中的机遇,243;斗争政治中的极化,322—323;斗争政治中的

政治认同,135;斗争政治研究中的理性主义方法,57;斗争政治中一再出现的因果机制,13—14,33—35;斗争政治中的相关性机制,26;被激活的机制与过程的逆转,307;对斗争政治中出现的一些反复所作的一般描述,306—307;合法性确认在斗争政治中的作用,158;斗争政治中的规模转变,339—340;作为斗争政治的西里革命,240;经典社会运动研究议程对斗争政治的解释,16—18;西班牙独裁体制下的斗争政治,177—179;瑞士的斗争政治,282—283;改变认同的斗争政治,244—245;逾越界限的斗争政治,7—8;运用经典社会运动研究议程而对斗争政治进行的分析,42—43

polity 政治体:政治体内的成员身份,78—79;政治体内的政治行动者,146

polity model 政体模式,11—12

processe 过程:作为因果链的过程,27;社会过程中的因果机制,12—13;斗争过程,268;连续性的过程,8—9;定义,27;偶发性的过程,8—9;政治过程,15—16;推进民主化的过程,274—276;与机制

- 的关系,27—28
- processe, causal 因果过程:定义,24;
一再出现的因果过程,33—34
- protection 保护:政府提供的保护,
266
- protest cycle model 抗议周期模式 6,
65—67
- public politics 公众政治:作为公众
政治促进因素的居间联络,276;
公众政治的组成,12;作为一整套
社会关系的公众政治,274;影响
保护性协商的变化,274—275;作
为变化地点的公众政治,303;与
公众政治相互交织的不平等在瑞
士,285—286;与公众政治相连的
信任网络在瑞士,288
- public politics, Mexico 公众政治,墨
西哥:自治信任网络的出现,302;
与类别不平等的分离,297—298;
信任网络被整合进公众政治,
298;革命后信任网络被排除在公
众政治之外,297
- radicalization 激进化:美国奴隶制事
件中的激进化,225;促成会聚的
激进化(在西班牙),184—186;西
班牙民主化事件中的激进化,
225;斗争轨迹中的激进化,68—
70
- Ramaphose, Cyril 拉马菲萨,西里
尔,152
- Ramos, Fidel 拉莫斯,菲德尔,108
- 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RSS), India 国民自愿服务团,印
度,147
- rationalism, 理性主义:斗争政治研
究中的理性主义方法,57
- rationalist analyse 理性主义分析,
21—23,57—58,73
- Reagan administration 里根政府
122—123
- regime defection 体制内背叛:撤销
合法性确认在体制内背叛过程
中,198,204—27;对精英利益的
侵犯在体制内背叛过程中,198—
201;在尼加拉瓜,197—198,
221—223;被突然强加的怨愤在
体制内背叛过程中,198,201—
204
- regimes 政体:政体的广泛性,266;
撤销对政体支持的作用,204—
205;深置于确认结构中的各种政
体,204;各种政体的变异,266
- repertoires 常用手法:常用手法的动
态形式,48—50;常用手法的演化
与限制性行动,49;从以前继承下
来的老斗争手法,49;常用手法的
变化,138;由议会化促成的常用
手法的改变,144—145;常用手法

- 内的一些实际做法,138;逾越界限的常用手法,48—49
- repertoire, contentious 斗争的手法,137—141,138—141;目标转换对斗争的手法的影响,139—144;斗争的手法据以变化的特殊主义,141
- repertoire of contention 斗争常用手法:在经典社会运动研究议程中,14—18;对象转换对斗争常用手法的影响,144
- repression 镇压:在哈萨克斯坦,260;在斗争轨迹中,68—70
- resource mobilization 资源动员:资源动员理论的基础,44;资源动员的模式,15
- Revolution, Mexico(1910)革命,墨西哥,292
- revolution 革命:革命的比较研究,193—195;作为斗争事件的革命,36;法国的革命(1789),52—55;对革命的全面描述,195;革命中的体制内背叛过程,197—198;“自然史”所描述的革命轨迹,193—194;尼加拉瓜的革命轨迹,196—198
- Riall, Lucy 里亚尔,露西,237—238
- Ringmar, Erik 林玛,埃里克,145—146
- Roosevelt, Eleanor 罗斯福,埃莉诺,318—319
- Rosberg, Carl G., Jr. 罗斯伯格,小卡尔,92—93
- Roy, Beth 罗伊,贝思,127—130,137
- Rutten, Roseanne 鲁滕,罗斯尼,118—119
- Rwanda Patriotic Front (RPF) 卢旺达爱国阵线,338—339
- Salvemini, Gaetano 萨尔维米尼,盖塔诺,246
- Sandin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FSLN), Nicaragua,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尼加拉瓜 197—198,201,203—206
- Sandin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FSLN),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196—198;从哥斯达黎加得到的援助,206;反叛行动(1977),205—206;成功的突袭行动(1974),203—204
- Sani, Giacomo 萨尼,贾科莫,176
- scale 规模:斗争常用手法的规模,141;民族规模,340—341
- scale shift 规模转变:导致规模转变的居间联络/同盟形成路径,332—333;斗争行动中的规模转变,331—332;斗争政治中的规模转变,339;导致规模转变的扩散/

- 效仿路径,332—333;规模转变中的效仿,333,335;卢旺达种族屠杀中的规模转变,337—340,学生运动中的规模转变,336—337;跨国的规模转变,337
- Schmitter, Philippe 施密特, 菲利普, 161
- scope conditions 范围条件: 斗争政治研究中的范围条件, 33
- Scotson, John 斯科特森, 约翰, 143
- Second Great Awakening “第二次大觉醒”, 165, 167
- Seidman, Gay 塞德曼, 盖伊, 155—156
- sentiment, national 民族感情, 230
- Sewell Richard H. 休厄尔, 理查德, 168
- Sewell William H., Jr. 休厄尔, 小威廉, 223
- Shabad, Goldie 沙巴德, 戈尔迪, 176
- Sicily 西西里: 附属于皮蒙特, 240; 加里波第对西西里的征服, 238—240, 243; 在西西里的加里波第政府, 241—242; 西西里当地人的反叛, 237—240; 西西里起义 (1866), 241—242
- Sin, Jaime (cardinal) 西恩, 贾梅 (红衣主教), 108, 112—113, 116, 122
- situations, revolutionary 革命形势: 定义, 197; 在战后拉丁美洲, 197
- slavery 奴隶制: 美国内战前与奴隶制的制度性妥协, 163—165; 有关奴隶制的国家层面的规定, 164
- Slovo, Joe 斯洛沃, 乔, 133
- Smith, Graham 史密斯, 格雷厄姆, 259
- social changes processe 社会变化过程: 在菲律宾黄色革命中, 109—111
- social changes processe 社会变化过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肯尼亚, 93—5
- social construction 社会建构: 社会建构的现代派观点, 234
- social interaction 社会互动: 社会互动导致其他变化发生的作用, 57; 作为斗争基础的社会互动, 126; 在社会互动中得以改变的认同, 126
- social life 社会生活: 与斗争政治相联系的社会生活, 141; 社会生活中的分离式与嵌入式认同, 135—136
- social movement agenda 社会运动议程: 经典社会运动研究议程对斗争政治的分析, 42—43; 经典社会运动研究议程, 14—20, 41—42; 经典社会运动研究议程对互动的

- 处理,73—74;经典社会运动研究
议程与意大利的统一,236—237
- social relation 社会关系:斗争政治
中的社会关系,141;作为社会关
系的不平等,274;作为社会关系
的民族性与族群性,232;激活社
会关系的目标转换,158;作为社
会关系的公众政治,274;作为社
会关系的信任网络,274
- social site 社会地点:与居间联络相
联的社会地点,142,157
- solidarity 团结:肯尼亚各社群的团
结,106;基库尤人建立团结的实
践,99—100
- Solidarity movement, Poland 团结工
会运动,波兰,332
- Solnick, steven 索尔尼克,史蒂芬,
249
- Somoza Debayle, Anastasio 索摩查·
德瓦伊雷,阿纳斯塔西奥,196,
198,200
- Somoza regime, Nicaragua 索摩查政
权,尼加拉瓜:存在于索摩查政权
中的广泛联盟,199;使索摩查政
权发生动摇的因素,205—207;与
索摩查政权的逐步分离,200—
201;索摩查政权的戒严法,201;
索摩查政权之被推翻,(1979),
196—198;“戒严”,203,205
- South Africa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
151,154;居间联络在南非,151—
157;范畴形成在南非,151—157;
南非的女权运动,155—156;认同
机制在南非,151—157;目标转换
在南非,151—157;妇女在南非政
治中的作用,155—156
-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
ference(SCLC)南方基督教领导人
会议,40
- Soviet Union 苏联:解体(1985—
1995),261—262;中央控制减少
的影响,248—249;苏联的形成,
247—248;“改革”的引进,248;苏
联解体中的各种斗争机制,252—
261;苏联的民族主义斗争,252—
253;苏联地方政府中的民族性,
235
- Spain 西班牙:独裁主义在西班牙,
174—179;居间联络在西班牙,
162,183,186;西班牙对斗争的控
制,173—175;斗争在西班牙的扩
散,179—181;认同改变,181—
186;激进化与会聚在西班牙,
184—186;西班牙的结构性变化
(1960—1975),176;向民主制的
过渡,160—161,173—186
- Spanish Communist Party(PCE)西班
牙共产党,184

- Spanish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PSOE)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 174, 182, 187
- Spencer, John 斯宾塞, 约翰, 105—106
- Stalin, Josef 斯大林, 约瑟夫, 248, 256
- standardization 标准化: 实现国家能力增长所需的标准化, 78
- state 政府: 强政府之路, 270—271; 弱政府之路, 270
- state building 建立国家: 建国过程中的共同语言, 231; 法国大革命中的建国行动, 59; 在意大利, 235—246; 民族在建国过程中的作用, 232—235
- state capacity 国家能力: 定义, 78; 国家能力增长的后果, 78
- Steinberg, Jonathan 斯坦伯格, 乔纳森, 278
- Stinchcombe, Arthur 斯廷奇库姆, 阿瑟, 25
- strike wave 罢工浪潮: 政治斗争中的罢工浪潮, 51
- structural analyse 结构主义分析, 21—23
- student movement 学生运动, 意大利的学生运动, 63—67; 墨西哥的学生运动, 299; 西班牙的学生运动, 178
- Suárez, Adolfo 苏亚雷斯, 阿道夫, 172—173
- suddenly imposed grievances: Nicaragua 被突然强加的怨愤, 尼加拉瓜, 201—204
- Suharto 苏哈托, 328—329
- Sukarno 苏加诺, 328
- Sumner, Charles 萨姆纳, 查尔斯, 160, 170
- Suny, Ronald 萨尼, 罗纳德, 257
- Supreme Court 最高法院: 沃伦高等法院的司法行动主义, 47
- Swedberg, Richard 斯韦德伯格, 理查德, 25
- Switzerland 瑞士: 跨阶级联盟的形成, 286; 城市化对瑞士的影响, 285; 宗教在瑞士的作用, 287; 信任网络在推动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 287—290
- Tambiah, Stanley 坦比亚, 斯坦利, 129—130, 137
- threat 威胁: 对威胁的解释与归因, 48
- Tilly, Charles 蒂利, 查尔斯, 195, 197
- Tocqueville, Alexis de 托克维尔, 亚历克西斯·德, 279
- Torrijos, Omar 托里霍斯, 奥马尔, 206

trajectory of contention 斗争轨迹:有关斗争轨迹的现有研究方法,73;斗争轨迹中的扩散、镇压与激进化,68—70;斗争轨迹在意大利学生运动中(1967—1968),63—64

trajectory 轨迹:革命史中的轨迹,193—194;尼加拉瓜革命的轨迹,196—198

Trotsky, Leon 托洛茨基,列昂,248

Truman, Harry S. 杜鲁门,哈里,46

Truman administration 杜鲁门政府,47

trust network 信任网络:影响保护性协商的各种变化,274—275;促进信任网络整合的各种因素,276;后革命时期信任网络被排除,297;作为一整套社会关系的信任网络,274;作为变化地点的信任网络,303;瑞士的信任网络,287

trust network, Mexico 信任网络,墨西哥:自治信任网络的出现,302;信任网络被整合进公众政治,298;革命前地方的与社团主义的信任网络,301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有关菲律宾政治的,112—114;不确定性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60;在斗争事件中作为一种影响因素的不确定

性,97;在肯尼亚,97,102;与俄罗斯失败政变相关的不确定性,258

Union of Democratic Liberation (UDEL), Nicaragua 民主解放联盟,尼加拉瓜,200,204

Union of Democratic Center (UCD), Spain 民主中心联盟,西班牙,174,187

United Democratic Front (UDF), South Africa 统一民主阵线,南非,152,154

United States 合美国:共和党内的反奴隶制派别,166;居间联络与激进化在美国,169—170;民权,49,318—320;“自由土壤党”,167—170;认同改变在美国,167—169;移民入境,167;“无知运动”,169;激进化与会聚在美国,170—171;美国的结构变化,167—166;239

violence, collective 集体暴力:集体暴力的规模转变,337—340

Wade, Ben 韦德,本,160

Walder, Andrew 沃尔德,安德鲁,320—321

Waldron, Arthur N. 沃尔德伦,阿瑟,227

Walsh, Edward 沃尔什,爱德华,201—202

- Walton, John 沃尔顿, 约翰, 94
- war: as political contention 战争: 作为政治斗争, 51
- Warland, Rex 沃兰德, 雷克斯, 201—202
- Waruhiu(Kikuyu chief)瓦鲁休(基库尤酋长), 92, 101
- Weekly, Kathleen 威克利, 凯瑟琳, 118, 120
- Weingast, Barry 韦恩加斯特, 巴里, 161, 163, 165
- White Citizens Councils 白人公民会议, 49
- white settlers, Kenya 白人定居者, 肯尼亚: 战后白人移民入境的影响, 94—97; 对基库尤人进攻的恐惧, 100
- Wickham-Crowley, Timothy 威克姆—克劳利, 蒂莫西, 195, 197
- Workers' Commissions (CCOO), Spain 工人委员会, 西班牙, 174, 177, 184
- Yeltsin, Boris 叶利钦, 鲍里斯, 249, 251
- Young Catholic Workers(JOC), Spain 天主教青年工人, 西班牙, 178
- Zald, Mayer 扎尔德, 迈耶, 15

译后记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本校外语学院屈平老师的协助,他承担了本书第九、十两章的翻译任务,全书最后由李义中统校定稿。在翻译过程中,南京大学的刘金源博士、宋立宏博士,本校外语学院的李建英博士等,为书中出现的大量外文专有名词的翻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在此深表谢忱。对导师钱乘旦先生以及北京大学刘东先生所给予我的信任,则尤表衷心的感谢!

译者初涉译事,译文中难免有舛误之处,敬请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指正。

李义中

2005年12月于安庆师范学院

人文与社会译丛

第一批书目

- 1.《政治自由主义》,[美]J. 罗尔斯著,万俊人译 28.80 元
- 2.《文化的解释》,[美]C. 格尔茨著,韩莉译 24.50 元
- 3.《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法]B. 斯蒂格勒著,裴程译
16.60 元
- 4.《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德]A. G. 弗兰克著,高铨等译 13.60 元
- 5.《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波]F. 兹纳涅茨基、
[美]W. I. 托马斯著,张友云译 9.20 元
- 6.《现代性的后果》,[英]A. 吉登斯著,田禾译 10.00 元
- 7.《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美]M. 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
14.20 元
- 8.《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下册),[英]E. P. 汤普森著,
钱乘旦等译 54.50 元
- 9.《知识人的社会角色》,[波]F. 兹纳涅茨基著,郑斌祥译 11.50 元

第二批书目

- 10.《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美]D. 克兰著,赵国新译
13.00 元
- 11.《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美]R. M. 昂格尔著,吴玉章等译
15.20 元
- 12.《后形而上学思想》,[德]J. 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 15.00 元

- 13.《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美]M.桑德尔著,万俊人等译 15.00元
- 14.《临床医学的诞生》,[法]M.福柯著,刘北成译 12.20元
- 15.《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英]J.C.斯科特著,程立显等译 15.80元
- 16.《俄国思想家》,[英]I.伯林著,彭淮栋译 18.50元
- 17.《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加]C.泰勒著,韩震等译 34.50元
- 18.《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美]L.施特劳斯著,申彤译 11.80元
- 19.《现代性与大屠杀》,[英]Z.鲍曼著,杨渝东等译 17.00元

第三批书目

- 20.《新功能主义及其后》,[英]J.亚历山大著,彭牧等译 15.80元
- 21.《自由史论》,[英]J.阿克顿著,胡传胜等译 27.00元
- 22.《伯林谈话录》,[英]I.伯林等著,杨慎钦译 13.50元
- 23.《阶级斗争》,[法]雷蒙·阿隆著,周以光译 13.50元
- 24.《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美]M.沃尔泽著,
褚松燕等译 24.80元
- 25.《大萧条的孩子们》,[美]G.埃尔德著,田禾等译 27.30元
- 26.《黑格尔》,[加]C.泰勒著,张国清等译 43.00元
- 27.《反潮流》,[英]I.伯林著,冯克利译 26.60元
- 28.《统治阶级》,[意]G.莫斯卡著,贾鹤鹏译 30.80元
- 29.《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德]J.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 24.60元

第四批书目

- 30.《自由论》(《自由四论》扩充版),[英]I.伯林著,胡传胜译 23.20元
- 31.《保守主义》,[德]K.曼海姆著,李朝晖、牟建君译 16.00元

- | | |
|--------------------------------|--------|
| 32.《科学的反革命》,[英]L.哈耶克著,冯克利译 | 15.20元 |
| 33.《实践感》,[法]P.布迪厄著,蒋梓骅译 | 22.60元 |
| 34.《风险社会》,[德]U.贝克著,何博闻译 | 17.70元 |
| 35.《社会行动的结构》,[美]T.帕森斯著,彭刚等译 | 43.50元 |
| 36.《个体的社会》,[德]N.埃里亚斯著,翟三江、陆兴华译 | 15.30元 |
| 37.《传统的发明》,[英]E.霍布斯鲍姆著,顾杭、庞冠群译 | 21.20元 |
| 38.《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美]L.施特劳斯著,申彤译 | 25.00元 |
| 39.《追寻美德》,[美]A.麦金太尔著,宋继杰译 | 18.90元 |

第五批书目

- | | |
|---------------------------------|--------|
| 40.《现实感》,[英]I.伯林著,潘荣荣、林茂译 | 18.00元 |
| 41.《扭曲的人性之材》,[英]I.伯林著,岳秀坤译(即出) | |
| 42.《启蒙的时代》,[英]I.伯林著,孙尚扬、杨深译 | 17.00元 |
| 43.《元史学》,[美]海登·怀特著,陈新译 | 33.50元 |
| 44.《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英]J.B.汤普森著,高铨等译 | 24.50元 |
| 45.《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加]J.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 | 29.50元 |
| 46.《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美]R.K.默顿著,唐少杰等译 | 48.00元 |
| 47.《黑皮肤,白面具》,[法]F.法农著,万冰译 | 14.00元 |
| 48.《德国的历史观》,[美]G.伊格尔斯著,彭刚、顾杭译 | 29.50元 |
| 49.《全世界受苦的人》,[法]F.法农著,万冰译 | 17.80元 |
| 50.《知识分子的鸦片》,[法]R.阿隆著,吕一民、顾杭译 | 20.50元 |

第六批书目

- | | |
|------------------------------|--------|
| 51.《驯化君主》,[美]H.C.曼斯菲尔德著,冯克利译 | 28.00元 |
| 52.《黑格尔导读》,[法]A.科耶夫著,姜志辉译 | 45.00元 |
| 53.《象征交换与死亡》,[法]J.波德里亚著,车槿山译 | 22.50元 |

- 54.《自由及其背叛》,[英]I.伯林著,赵国新译 15.00 元
- 55.《启蒙的三个批评者》,[英]I.伯林著,马寅卯译(即出)
- 56.《运动中的力量》,[美]S.塔罗著,吴庆宏译 23.50 元
- 57.《斗争的动力》,[美]D.麦克亚当,S.塔罗,C.蒂利著,李义中等译 31.50 元
- 58.《善的脆弱性》,[美]M.纳斯鲍姆著,徐向东译(即出)
- 59.《弱者的武器》,[美]J.C.斯科特著,郭于华等译(即出)
- 60.《图绘》,[美]S.弗里德曼著,赵国新译(即出)

读者信息反馈表

尊敬的读者:您好!

感谢您选购译林版“人文与社会译丛”。为更好地为您服务,让您及时了解这套书的出版进度,请抽空填写下表。我们将按您指定的通讯方式及时向您提供新书目录及内容简介。凡寄回本表者,如向我社邮购图书,将享受九〇折的价格优惠,并免收邮资。

有关“人文与社会译丛”及本社的其他资讯,欢迎点击www.yilin.com浏览。

| | | | | | | | |
|-------------|--|-----|----------------|-----|---|-----------|--|
| 姓 名 | | 性 别 | | 年 龄 | | 学 历 / 职 称 | |
| 工作单位 | | | | | | | |
| 通讯地址 | | | | | | | |
| 邮政编码 | | | 电 话 / 传 真 | | | | |
| Email 地址 | | | | | | | |
| 希望收到新书信息的方式 | <input type="checkbox"/> 信函 <input type="checkbox"/> 传真 <input type="checkbox"/> 电子邮件 | | 是否愿意收到本社其他图书信息 | | <input type="checkbox"/> 愿意 <input type="checkbox"/> 不愿意 | | |
| 您的建议 | | | | | | | |

译林出版社发行部

210009 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电话:86-(0)25-83300223;83300970;86637608

传真:86-(0)25-86633278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斗争的动力

作者 = [美] D . 麦克亚当、S . 塔罗、C . 蒂利著 , 李义中等译

页数 = 5 1 2

出版社 = 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 = 2 0 0 6 年 9 月 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作者简介

主编的话

前言与致谢

目录

第一部分 问题何在？

一 他们为何怒吼？

二 斗争的轮廓

三 比较、机制与事件

第二部分 尝试性的解决之道

四 比较视角下的动员

五 斗争行动

六 斗争的转变

第三部分 应用与结论

七 革命的轨迹

八 民族主义、民族解体与斗争

九 斗争的民主化

十 结论

参考文献

索引

人文与社会译丛书目